

文革史话

之

第五部

折戟沉沙

上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文革史话之第五部折戟沉沙 / 刘朝驹著. --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 2021. 9

ISBN 978 - 988 - 15988 - 4 - 4

I. ①文… II. ①刘…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书 名	文革史话之第五部折戟沉沙
作 者	刘朝驹
出 版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行部(00852 - 21962638)
总社地址	香港九龙弥敦道 208 - 212 号四海大厦
经 销	香港九龙书店
总 编 审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出版策划	宋艳丽
印 刷	北京云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988 - 15988 - 4 - 4
定 价	6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zgwh.cn/>

目 录

◇上 卷◇

第 1148 回:送玉米,毛泽东石门停留 丰台站,见北京军政领导	1
第 1149 回:回北京,动员吴法宪检讨 十月一,斯诺登上天安门	11
第 1150 回:毛批语,吴法宪、叶群检查 “五一六”,再提“不能一风吹”	17
第 1151 回:周恩来。详细阐述“五一六” 说北航,蒯大富再回清华	23
第 1152 回:下批示,全国掀起营高潮 枪声响,谭甫仁喋血春城	29
第 1153 回:细排查,数日内毫无结果 枪再响,谭甫仁事件告破	37
第 1154 回:有疑团,保卫部办学习班 难交代,景儒林上吊自杀	44

第 1155 回:毛泽东,北京与斯诺长谈 发信息,中美要高级接触	52
第 1156 回:华北会,批李雪峰、郑维山 姚文元,写报告汇报学习	60
第 1157 回:来加温,江青到京西宾馆 跳跃快,再追问《六号简报》	68
第 1158 回:在党内,陈伯达问题公开 又到会,江青成会议主角	76
第 1159 回:赶紧追,哪里去了黄道霞 细交待,三天白了秘书头	82
第 1160 回:“要谨慎”,转济南军区报告 见斯诺,谈文革生产情况	89
第 1161 回:大改组,华北会终于结束 发文件,陈伯达罪行材料	96
第 1162 回:再建立,“五一六”专案小组 没想到,大本营竟在南京	103
第 1163 回:戴维堤,气急大骂军代表 毛泽东,批评军委办事组	111
第 1164 回:外交部,重修英国代办处 “五一六”,北大、地院也在抓	120
第 1165 回:离苏州,林彪回到北戴河 抓艾玲,上海清查“五一六”	126
第 1166 回:北戴河,恩来向林彪汇报 睡朦胧,邀请美乒乓访华	133

第 1167 回:四一五,批陈整风汇报会 庆五一,陈毅身患结肠癌	141
第 1168 回:礼花放,林彪竟不辞而别 为大局,周恩来费尽心机	148
第 1169 回:加西亚,廿九期《外交简报》 纠错错,还历史本来面貌	155
第 1170 回:迎美使,钓鱼台仔细安排 盛情邀,江青为林彪照相	162
第 1171 回:外交部,姚登山批斗逮捕 巧安排,基辛格悄悄进京	169
第 1172 回:开场白,逐字念长长讲稿 立场明,周恩来侃侃而谈	175
第 1173 回:会谈毕,即赴游泳池汇报 毛泽东,先与熊向晖漫谈	182
第 1174 回:达共识,《中美公告》惊世界 “峻岭”谁,林彪在《孜孜不倦》	189
第 1175 回:黑龙江,潘复生撤职审查 赴青岛,开封清查“五一六”	196
第 1176 回:做体检,叶群回京日夜忙 毛泽东,武昌见鄂豫领导	204
第 1177 回:一元化,广州军区报《纪要》 《国际歌》,奴隶们创造历史	211
第 1178 回:湘粤桂,众头脑齐集长沙 讲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219

第 1179 回:要学习,水至清则无鱼 聚“九所”,毛泽东再说庐山	228
第 1180 回:苏闽赣,三巨头会在南昌 说“路线”,许世友委实不安	235
第 1181 回:程世清,揭林彪再爆新事 西湖边,陈励耘手足无措	242
第 1182 回:听反映,连夜安排移专列 离杭州,毛泽东突然抵沪	249
第 1183 回:不见人,上海等候许世友 饭局间,专列已北上离沪	256
第 1184 回:不停留,一路疾驰奔天津 丰台歇,布兵南口欲为何	264
第 1185 回:无声息,毛泽东悄然回京 北戴河,电话震惊周恩来	270
第 1186 回:查飞机,总理坐镇大会堂 电话惊,莲花峰一片混乱	279
第 1187 回:难阻挡,“大红旗”冲过人墙 枪声响,李文普倒地受伤	288
第 1188 回:接报告,林彪已离开住地 电掣般,“大红旗”冲过护栏	295
第 1189 回:仓皇间,三叉戟强行升空 周恩来,中南海见毛泽东	302
第 1190 回:“由他去”,毛泽东不让拦截 禁空令,周恩来紧急部署	309

第 1191 回：直升机，周宇驰挟持北上 急召见，北京吴德和吴忠	317
第 1192 回：定方案，卫戍区紧急动员 四川厅，召开政治局会议	324
第 1193 回：忙通报，周恩来分秒不停 难逃脱，周宇驰自杀身亡	331
第 1194 回：迫降场，拒其他部队进入 回家后，胡世寿夜难入寐	340
第 1195 回：飞机场，全部被陆军占领 召总长，部署战备诸事宜	349
第 1196 回：问电话，李作鹏修改记录 侦听到，蒙古有飞机坠毁	356
第 1197 回：急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 指示到，派大使亲临现场	364
第 1198 回：见鲁珉，竟揭出惊天阴谋 李德生，再查空军江腾蛟	371
第 1199 回：进“亚疗”，武健华赴北戴河 许大使，到坠机现场勘察	378
第 1200 回：法新社，报道林彪已出事 拼字条，惊现林彪俩“手令”	384
第 1201 回：拟《通知》，政治局举杯相庆 葬林彪，丁盛汇报“李必达”	394
第 1202 回：检讨难，黄、邱二人抱头哭 谢静宜，受委托看望总理	403

第 1203 回:许世友,王洪文进京开会 审江、王,巨大冰山渐显现	410
第五部上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418

第 1148 回：送玉米，毛泽东石门停留 丰台站，见北京军政领导

上部《欲罢不能》最后说到，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林彪及各路神仙纷纷下了庐山，奔赴各地。1970 年 9 月 9 日晚，刚刚从庐山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康生，即在人民大会堂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

周恩来让吴法宪先谈。于是吴法宪把 8 月 14 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争吵以来的事情说了一遍。然后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继续检讨。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

康生不同意他的说法，他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

周恩来说：“你在 8 月 14 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

吴法宪对周恩来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康生说：“吴法宪，你说毛主席伟大谦虚，这句话不对。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严格。”

李作鹏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

邱会作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黄永胜说：“这件事我是 14 日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

谈话进行了 4 个小时，黄、吴、李、邱 4 人的口径一致。

9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

(一)组成由康生、李德生、周恩来负责的陈伯达专案组。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处理。

(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原经常参加议事的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12人外，今后如有重大政策问题讨论，还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3人参加；正在休养期间的刘伯承、谢富治二人拟不通知。

(三)今后在国际来往上，只实行必要的个别出访，不举行周游；拟起草一外交通报告驻外各使馆。不要随便答复问题。

叶剑英作为陈伯达专案小组的特别顾问，代表周恩来和中央去福建、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

9月11日，周恩来和康生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10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各事。

9月12日晚，周恩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继续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

周恩来说：“上次我和康老找你们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待你们之间的活动。要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不吭声。

周恩来说：“永胜同志，请你先谈。”

黄永胜说：“经过回忆，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庐山会议前我没有参加宪法的修改，我只是听到吴法宪说会议上有争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上庐山前，我准备的发言材料只是军事工作报告，别的工作我没有参与。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他们在庐山上的事情我要负责任。”

康生说：“你负什么责任？”

黄永胜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

康生说：“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参加！”

黄永胜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

吴法宪说：“上次谈话，我已经把庐山会议上的情况实事求是、原原本本地都说了。8月14日的争论，我当时就向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总理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活动。”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

李作鹏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在中南组我没怎么发言，叶群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在中南组没有放什么毒，也没有起哄。”

邱会作说：“我同你康老在一个组里，你知道我讲了什么，我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天才论，还念了语录，你当时还说，邱会作同志善于学习，并且号召西北组的同志向我学习，怎么过了几天你就反了过来，说我邱会作怎么不对，你怎么这样两个态度。”

康生说：“你念的语录很好，你说的错话我没有同意吧！”

他们两个人争论了起来。

最后，周恩来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现在没有向你们提出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讲。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

9月10日，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南昌，晚上到达长沙。

9月11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湖南领导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汇报工作。谈话中，毛泽东问：“你们湖南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工业省？”

华国锋汇报了湖南正在开工建设的湘黔铁路、枝柳铁路湖南段和凤滩水电站、资江氮肥厂、省维尼纶厂等大型项目的情况，表示湖南一定抓紧工业基础建设，落实毛主席把湖南建成工业省的指示。

9月15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向武昌。在列车上，他问汪东兴：“你在想什么？”

汪东兴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好嘛！”

汪东兴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泽东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专列当天抵达武昌。毛泽东住进东湖宾馆，接着与刘丰谈话。

这天，汪东兴把第二次书面检查呈送给毛主席。他在检查中说：

“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

“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他在检查中揭发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9月15日是中秋节。这天晚上，江青从外边带回了两个玉米，对工作人员说：“主席给了我5个玉米，我给了康老、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这两个给我留半个，另外的给你们工作人员吃了吧。”

姚文元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记载：

“8月15日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张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晚餐时吃了。一面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

康生的秘书黄宗汉事后回忆说，康生收到江青送来的玉米后，对黄宗汉说：

“那五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玉」寓指‘欲’，意思就是说，庐山会

议上的问题还没有完，预示着还有更大的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嘛。‘米’寓指‘迷’，意思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以此可以看出来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所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五个玉米的含义的。”

第二天，9月16日，毛泽东看过汪东兴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在汪东兴写给他的信上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

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16日上午10时30分，毛泽东让护士长吴旭君通知汪东兴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11时50分。

毛泽东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250多人（指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泽东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六号简报》时，毛泽东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

就改正。”

毛泽东问：“你说他们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汪东兴说：“我不清楚。”

毛泽东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

汪东兴说：“不清楚。”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 24 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毛泽东要汪东兴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他还说：

“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

汪东兴说：“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回北京。我的那封信可以叫通讯员先带回去。”据汪东兴说，他这样讲主要是考虑毛泽东的旅途安全。

但是，毛泽东还是坚持要他乘坐文件来的飞机先回北京。他说：“早一天回去，让他们早一点觉悟也好嘛。”

于是，汪东兴准备第二天早上先飞回北京。

当天下午，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找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小时。谈起庐山会议时，曾思玉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

汪东兴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

曾思玉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慢慢地了解了。”

汪东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

曾思玉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

天才没有错。”

汪东兴说：“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

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

晚饭后，汪东兴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已经休息了，汪东兴就没有打扰他。午夜 24 时吃过夜餐后，汪东兴上床休息。到了凌晨 4 时左右，护士长吴旭君来敲他的门，汪东兴正要起身开门，吴旭君说不用开了。她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并且告诉他说：“你不要起来了，看一看条子就行了。”

汪东兴捡起条子见上面写着：“主席讲，你不要走了，一齐走。”

9月17日，汪东兴和毛泽东一起乘专列离开武昌返回北京。专列路过石家庄时，在石家庄车站停了一下，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了河北省革委会正、副主任李雪峰、刘子厚和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27军军长闫川野、政委马杰等6人。

毛泽东问到《六号简报》的事时，因为汪东兴在场，李雪峰觉得这事应该问汪东兴，不应该问他，就说：“是受陈伯达、汪东兴发言的影响。”

汪东兴插话说，他怀疑《简报》先送陈伯达看了。

李雪峰反驳说：“没有。”

李雪峰认为，《简报》的责任应该属于汪东兴，而不属于华北组。华北组发言，整理后由中办发《简报》。至于《简报》为什么印得那么快，那是中办的责任。

而汪东兴觉得，那份《简报》的印发过程他都不知道，印发那么快，没有陈伯达从中指挥是不可能的。

两人当着毛泽东的面争论许久。

毛泽东制止两人争论，说陈伯达历史可疑，是“船上老鼠”，在延安先跟张闻天当秘书，看张闻天不行了，就主动找到毛泽东，当了他的秘书，现在到处搬弄是非，是骗子，劝大家不要上此人当，等等。

当汪东兴向毛泽东解释他对陈伯达的活动事先不知情时，毛泽东

说：“不包括你，没有你的事。”

接着，毛泽东问了河北的形势，说：“河北的形势很好嘛！”

毛泽东问李雪峰等人，河北省省会设在石家庄好还是设在保定或天津好？

李雪峰等人出于战备考虑，说石家庄离太行山近，太行山很深，还是在石家庄好。

9月19日上午8时，正在内蒙的郑维山秘书杜辛接到汪东兴的电话，问：“郑司令现在哪里？”

“在伊克昭盟乌审旗。”杜辛回答。

“晚饭前能不能赶到北京？”

杜辛回答：“乘飞机可以，我马上叫郑维山同志接电话。”

汪东兴不耐烦地说：“不用了，你告诉他，赶不回来就算了。”

政治敏感极强的杜辛觉得这事不简单，放下电话，很快报告了出门在外的郑维山，并建议先打电话问一下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是否晚上有重要活动？还说下午赶回北京没有问题。因为杜辛知道，虽然郑维山所在地没有机场，但是可以派直升机去，将他们送到毕克旗，那里有大机场，下午就可以赶回北京。

郑维山很快要通了汪东兴的电话。他在电话中间：“汪主任，是不是有特别急的事情？如果立即坐小飞机，再转车，明天下午还是能赶回去的。”

汪东兴说：“安全重要，不要勉强回来了。”

在石家庄时，汪东兴将同曾思玉谈话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后“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

9月19日中午，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接到李雪峰的电话，让他和郑维山下午17时到丰台火车站专线停车处，毛泽东要接见。郑维山当时在军区内蒙古前指，陈先瑞只好一个人前去。吴德也接到了通知。

下午17时，吴德、陈先瑞准时来到丰台火车站。晚上19时30分，在汪东兴的带领下，吴德、陈先瑞他们鱼贯走入停靠在丰台火车站的毛泽东专列。

毛泽东看了一眼陈先瑞，问道：

“你们的司令官呢?”

陈先瑞忙答道：“郑维山同志去了内蒙前指，还没赶回来。”

毛泽东接着问：“庐山会议你们传达了没有？”

“传达了。”陈先瑞回答。

“怎么传达的？”

“分片传达的，对陈伯达的问题先下毛毛雨，然后专门讨论。”陈先瑞说。

“我们在市革委会领导小组和卫戍区党委常委中传达了，当时议了一下，还没有讨论。”吴德接着说。

“这个办法好，何必那样急。”毛泽东不动声色。

毛泽东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你们不知道底细。”

“什么天才，我读了八年孔夫子，又读了六年资产阶级的书，学的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那时不知道马克思。直到1918年，我24岁，才知道马克思。”

“我这一路主要讲路线问题。路线正确一切都有，路线错了就会垮台。路线对了，人少会有人，没有枪会有枪，也会有政权；路线错了，人再多、枪再多也没有用。”

谈到领导班子问题时，毛泽东说：“要讲团结，参与‘二月逆流’的陈毅还选作中央委员，这就是标准嘛。基层干部要稳定，军队干部也要稳定一下好。要有长期打算。要搞好团结，党内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是常有的，有意见就让人家说，不让人家说就不能真正达到团结。有意见今天不说，明天还是要说，最后还是包不住，爆发了就受不了了。党内总有一些不同的人，这也不碍大局。至于个别人他要跳就让他跳，我们也不怕。”

“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

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你们可以读一下《波拿巴第三政变记》，那是马克思早年著作，当时只34岁，你们再看一看《法兰西内战》，就有不同。”

毛泽东谈及了陈伯达的问题后，再次重提《六号简报》，并说陈伯达和《六号简报》是有联系的。毛泽东点了李雪峰、郑维山、解学恭的名，还批评郑维山有“路线错误”。

陈先瑞如坐针毡，忙红着脸起身答道：“主席，我也受蒙蔽，上了陈伯达的当，要检讨。”

“有则改之，善莫大焉。”毛泽东大手一挥。

其实，从庐山一回到北京，郑维山、陈先瑞就在9月8日召集驻北京附近几个单位的军常委以上的领导开会，传达了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分片传达完陈伯达问题后，郑维山启程赶往内蒙古。临行前，他告诉主持军区工作的陈先瑞：“把传达情况向中央写个报告。”

陈先瑞说：“我已经请示过黄总长，黄总长说不用写报告了。”

实际上，对于这样的问题，北京军区不敢怠慢，传达结束后还是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送上去后，上头很快有了反应。康生在报告上批示：“奇怪？毫无揭发！”

第 1149 回：回北京，动员吴法宪检讨 十月一，斯诺登上天安门

9月18日，林彪、叶群从北戴河飞回北京。

9月19日晚上，林彪、叶群召见黄永胜、吴法宪。

9月22日，周恩来看到毛泽东21日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后，与康生一起来到林彪那里，将毛泽东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给林彪看，提议“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

林彪表示同意。

这天，林彪向毛泽东报送《关于南京军区党委等单位传达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摘要》。其中第五页报告了贵州省在讨论团结问题时，“到会的军队干部一致认为，部分参加‘三结合’的军代表，滋长了骄傲情绪，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决定分期举办军队干部学习班，重点解决这个问题，以进一步开展拥政爱民年活动。”林彪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线，并注明：“此类问题已告军委办事处作为专题研究，以便改正三支两军人员中所出现的不良倾向。”

当天，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在汪东兴已经做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

9月23日下午17时30分，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一行，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在座。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这个世界我看是天下大乱，不太平。”

范文同说：“这就是革命。”

毛泽东：“是啊，上回我就跟黎笋同志谈了，看样子打不起来大仗，几个大国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对方。”

他们说到中美两国的华沙会谈，提到美国基辛格想到中国来访

问，毛泽东说：“他说还要到北京来谈，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又不是我们提出来的。他嫌华沙不好，我们说，好嘛，你来吧。可是，他又不来了。美国那个国家也有困难，不要只看到你们自己有困难，美国的困难更大。”

谈到中国，毛泽东说：“我们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不仅是内部的工作，还有一些驻外使馆的工作。一个大使管不了新闻，管不了武官，管不了商务参赞，管不了经济援助，都是一些北京的条条专政来管。新闻归新华社来管，外贸归外贸部管。这个条条专政的问题在我们国内也是现在才开始解决。”

谈到国际援助，毛泽东说：“我看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讲话算数。马克思主义不是讲阶级吗？讲国际主义吗？工人阶级不分国界吗？现在别的国家在那里打仗流血，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打仗，不过是给一些物资，这还要讲价钱吗？”

9月25日，毛泽东在林彪9月22日报送的《关于南京军区党委等单位传达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摘要》上批示：“第五页上所提处理意见很好，应该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周、康阅，退林办。”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海军司令哈桑。他说：“有人说我们修地道花钱太多了，我们根本没有花钱，国家预算没有这笔钱，老百姓自己搞的嘛。”

9月29日，林彪找吴法宪谈话。他说：

“我对毛主席说，我选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毛主席向我问起曹里怀，我说曹里怀这个人我了解，从延安到东北我都了解他，工作稀稀拉拉，没有干劲，办事不认真。我认为空军的工作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他们是搞得不错的，所以我把空军立作标兵。”

林彪接着说：“过去庐山会议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

我是不会怪你的。”

“检查不要涉及别人，不要因为你一讲，一倒一大片。”

吴法宪当即表示：“回去立即就给毛主席打电话请求接见。”回到家里，他马上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求“见一见毛主席。”

过了一会儿，徐业夫打回电话说：“主席的意见，国庆节前太忙，以后再说吧。”

当天，吴法宪即写出了他的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这天，毛泽东约周恩来、康生，商议派郭沫若为特使参加吊唁埃及总统纳赛尔去世活动。谈话中，提到传阅汪东兴的书面检讨信和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汪东兴的信是他自己要写的，别人没想通，不忙写检讨，这些人的错误与陈案性质不同。”

1970年10月1日，两个陌生而特殊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就是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他的夫人。他们夫妇刚从陕北志丹县参观返回北京不久，周恩来就邀请他们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活动。对于斯诺来说，这肯定是一种特殊而意外的荣誉。因为这一天，他站立在中国政治的中心。

斯诺从1928到1941年间，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中国。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他是第一个深入陕北苏区系统采访，并第一个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他在这次采访中写出的《西行漫记》，在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1年，斯诺离开中国。当他再次踏上中国土地，已是19年后，新中国成立后的1960年夏天。1970年8月，斯诺携夫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实现的。

1970年7月31日，斯诺夫妇从瑞士乘飞机到香港，由于身体虚弱，又有高烧，一直在香港休养有半月之久。8月14日，他们坐火车抵广州，换飞机到北京。开始在国内访问，周恩来事先特地从五七干校调来原驻埃及大使黄华全程陪同。

8月18日，正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吃着烤鸭的斯诺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到首都体育馆去一趟。

斯诺马上意识到，一定有重要的人物要同他见面。他猜想一定是周恩来总理。

斯诺猜对了。当时周恩来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起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观看中国与朝鲜两国乒乓球队的比赛。

周恩来简略地了解了斯诺的访问计划，关切地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情况。由于即将要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周恩来便安排斯诺夫妇前往陕北志丹县参观采访，那里曾是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地方，当年被称为保安县。

斯诺非常高兴，说：“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当时您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您为我草拟了一个92天旅程的计划，还找了一匹马让我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呢！这次您再次安排我去保安县，我想昔日的情景，一定能唤起了我不少难忘的回忆啊。”

果然，斯诺旧地重游，思绪万千。他来到当年走过的山路，住过的窑洞，和毛泽东促膝夜谈的地方。30多年的巨变，令他深感“保安同全中国一样，也已经站起来了。”

斯诺返回北京不久就接到参加国庆活动的邀请。

10月1日上午10时，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又一次地升上来，把党、政、军领导人和一些贵宾陆续送到。当周恩来看见斯诺夫妇上到天安门城楼，便迎上前去，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斯诺先生，欢迎你。”

“是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啊。”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情绪更加激动：“当年您安排我去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

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事。今天又让我上天安门！肯定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这时，广播里响起了《东方红》乐曲，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顿时，“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天。斯诺夫妇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向毛泽东走去。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恩来笑着对毛泽东说。毛泽东一眼就认出是斯诺。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他热情地和斯诺握手：

“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非常高兴见到您。您看起来比5年前年轻了，身体也更好了。”斯诺激动地说。

“马马虎虎。你身体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马马虎虎。来之前，我开过刀，现在好了。”斯诺回答说。

毛泽东仔细地看了看斯诺，关心他说：“你要注意，不要太累。”

斯诺点了点头说：“对了，这话我必须听。”接着他高兴地告诉毛泽东：“我5天前才从保安回来。保安变化大极了。当年从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3天，这次才花了两个半小时。”

“有一些变化。”说着，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对斯诺说：“对了，你去年12月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

“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斯诺内疚地说。

毛泽东笑着摆了摆手说：“你当时怎么看就应该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斯诺向林彪问好，同时打量着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他在延安时就采访过的老朋友、并在《西行漫记》中大加夸赞的林彪。

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斯诺始料未及的。1968年6月15日，斯诺在给朋友张歆海的一封信中曾认为：“从逻辑上说周恩来应当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我们的视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与周恩来

的威望与能力相比的人了。”

毛泽东一边同斯诺亲切交谈，一边伸出手，带着斯诺夫妇朝城楼前的栏杆走去。顿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万首翘望，红旗翻滚，“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毛泽东也高举右臂，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斯诺看着这番情景，万分激动，眼眶也湿润了。

毛泽东与斯诺约定“以后再谈”。

国庆之夜，林彪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叶群借此机会找毛泽东谈话。回到毛家湾，叶群显得很高兴，认为谈得“很好”。她好像放下了千斤重担，决定给毛泽东写一个检讨报告。

10月2日，毛泽东看了陈伯达9月23日写的、29日报送毛泽东的检讨信，批示：“送林、周、康阅。请周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下。”

第二天，10月3日，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代表中央找陈伯达谈话，传达毛泽东要他“边养身体，边看书学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政治、国事不用再操心”的指示。

10月8日晚，毛泽东在钓鱼台迎宾馆会见朝鲜首相金日成，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在座。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

“有两年搞武斗，上一次我跟朴成哲同志谈过，所以1967、68年两年生产低落，69年，就是去年，跟今年，才起来了。反革命也查出一些了，搞大联合了，不打仗了。我们中国内部搞内战呢！我们叫全面内战。谁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搞这一套啊？我们没有计划的。后头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中央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解决，学校也是一个一个地解决。”

“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1967年7、8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516’。”

会谈结束时，金日成说带来了几个理论问题，毛泽东说：“可以同恩来同志、康生同志谈。”

第 1150 回：毛批语，吴法宪、叶群检查 “五一六”，再提“不能一风吹”

10月13日，叶群向毛泽东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这是由叶群亲自布置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替她写的。检讨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检讨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的谆谆教导，使我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并说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吴法宪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半个月。10月14日，毛泽东终于批示：

“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吴法宪在检讨书中讲到他“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在关系全局性的原则问题上，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

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

毛泽东在这句话的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吴法宪交代8月23日晚12点前后，陈伯达来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到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段话下边也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办事组各同志

(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

毛泽东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

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8月27日晚上12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泽东在“伟大谦虚”这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在下面画了横线,对其中的“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更画了双道横线,写道:“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吴法宪提到陈伯达8月27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伯达发言稿上有“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

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吴法宪的检讨书中写道“……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

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批道:“这样对。”

第二天,10月15日,毛泽东又阅批了叶群13日送来的书面检讨:“此件已阅。”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

毛泽东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

毛泽东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毛泽东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

毛泽东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

叶群还说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

毛泽东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

毛泽东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叶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

毛泽东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

的人。”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泽东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当晚，周恩来将毛泽东批示的吴法宪的检讨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阅，并在附信中说：

“法宪同志的检讨信和主席批示，已送呈林副主席看过。”

“主席要汪东兴告诉我和康老，在请示林副主席后约有关同志一起谈谈。还有，主席对叶群同志检讨信，也有批示，待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阅后再送你们。”

随后，周恩来同康生到林彪处，同林彪商量约黄永胜等人谈话事。

吴法宪看了毛泽东的批示，吓得不轻，和军委办事组其他人商量，黄永胜若无其事，李作鹏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

吴法宪和黄永胜又拿着毛泽东批示去找叶群。

10月16日，林彪在驻地再次会见将毛泽东批件送来的周恩来、康生。

随即，周恩来将毛泽东对吴法宪、叶群检讨的批示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阅，并附信要求他们“仔细阅读”，“待阅后当商定约谈时间”。

吴法宪看到毛泽东对叶群检讨的批示后，让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比较一下。他们都说，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

10月16日，周恩来约黄永胜谈话。

10月19日，周恩来会见斯诺。谈话时，说到自己的健康情况。周恩来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的少，所以我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73了。”

据时任中央专案小组联合办公室的陈伟1971年6月30日讲话记录说，1970年10月20日，毛泽东再次提到“516”问题，他说：“‘516’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陈伟讲话还说：

1970年10月20日林副主席的批示精神是，“五·一六”问题不能

一风吹。

11月1日，周恩来约有关人员谈清查“516”集团问题，提及原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时说：

“中央专案组把主犯定了，从犯还没有定。清华的蒋南翔和刘少奇、彭真的案子有关。现在查明，他的历史没有背叛。他的思想很右，个人主义，是个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这和他的地主出身有关。文化大革命前，他吹捧刘少奇、彭真。‘一二·九学生运动刘少奇、彭真根本没有份。当时彭真反领导，被捕以后自首了。彭真就和一些坏分子来往。张洁清的叔叔是个大汉奸，彭真和他们来往。可是，蒋南翔吹捧刘少奇、彭真。1965年，中央到上海开会去了，留彭真在这里看家。那时纪念‘一二·九开大会，蒋南翔吹捧刘少奇、彭真，彭真几次站起来鼓掌，电视上有这些镜头。所以，群众怀疑他在历史上和这两个叛徒有关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正义的呼声。要允许群众怀疑，接受群众的审查。现在专案组还找不到材料，蒋和刘、彭只是工作关系，犯了严重路线错误。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提议要他下去劳动，不要老是关着。刘少奇、彭真常唱不同的调子，看来有矛盾，实际上是互相包庇。野心家，叛徒常常是两面派。天真地看问题，常常受欺骗，就容易犯错误。应该相信群众。要理解群众的正义呼声。领导同志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否则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得这样轰轰烈烈。”

周恩来说：“‘内查外调’；我的意思叫‘内检外调’。‘内查总是由上而下，还是调查，还是专案人员调查，还是不发动群众，自己查。‘内查外调都是调查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内部群众检举，然后外调。‘内检’；‘检就是检举，就是群众检举。‘外调’；就是外面专案去调。’

“考验一个干部，要看是否真正承认了错误，不经过群众讨论光书面检查不一定可靠。‘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要经过群众批判。把真实凭据搞到了，他就无话可说，否则一有机会，他就翻案。”

11月4日，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大操场召开揭批“516”大会，首先上台的是物理所的王昌衡。他交代说，他是“516”分子，他发展了一大批“516”分子，这批“516”分子又发展了更多的“516”分子。中科院群众组织“红联”的各级组织就是“516”的各级组织。

第二个上台的是化学所的。他讲的和王昌衡一样。这两个都被宣布“从宽处理”，算人民内部矛盾，回所工作。王昌衡所在的研究室还开了欢迎会。

第三个是经济问题，被从严处理。另外还当场揪上一个“516”分子从严处理。

而在此之前，中国科学院已经历了几次清查“516”。第一次是在1967年9月，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发表后，各群众组织自己清理自己，驻院军代表不允许两派组织相互攻击。因为文革中外语学院的“616”到中科院联合夺权委员会索取资料，如中科院出的小报等等，于是流传中科院和“516”有关系，其实这是当时群众组织间常有的事。这个问题很快搞清楚了，和“616”接触的是中科院的“造反团”。这次抓“516”就这样过去了。

1968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第一阶段还是造反派掌权，整了很多人，一些人被迫自杀。第二阶段是1968年后半年，工宣队进驻，清查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大小事件，造反派中一些人成为清理对象。

1970年1月初开始新一轮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运动，办学习班。虽然学习班办了几个星期就停了，但一些“重点人”被拘禁起来，而且风声越来越紧。过了几个月，物理所的大喇叭广播说，所政工组发布第一、第二号“战报”，宣布揪出了上百名“516”分子。要知道，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里，物理所被打成反党分子的一共才97人。现在的“516”已超过这个数。在此期间，中科院群众组织的头头、院革委会委员邹协成在被拘禁期间自杀身亡。到了11月4日，又召开了这次大会。

第 1151 回：周恩来。详细阐述“五一六” 说北航，蒯大富再回清华

11月4日、9日、18日、20日，周恩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对清查“516”的工作和方针、政策做了细致的阐述。他首先对1970年3月27日中央关于清查“516”的《通知》做了解释：

“从67年宣布‘516’是反革命组织。主席在姚文元的文章上写了‘516’是反革命组织一段话，当时没有用黑体字发表。1968年一二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516’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傅。当时只成立‘516’专案叫第三办公室，是公安部搞的，专案就是当专案搞。在群众方面，1967年9月讲了一下，重点讲的‘516’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材料掌握得不够。1968年3月24日、27日开大会批判杨、余、傅，讲了一下以后，大家听了林副主席的录音报告，以后就没有继续发动，后来就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又开‘九大’，又搞了一次……”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516’。1月24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3月27日发了个材料，讲‘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516’反革命集团，对清查‘516’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516’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516’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对“516”的性质，周恩来说：

“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

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津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516’,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516’。”“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此口一开,清查“516”说不扩大化,也不可能不扩大化了,下面的办案人员只要说你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就要查你的“516”问题,因为“总理这么说的。”也许,毛泽东、周恩来此时想反对的只是当时盛行的极“左”思潮,而并非要破获什么“组织”之类的东西。但是,事与愿违。

接着,周恩来特别提到了几个大的事件,首先是卫生系统 1967 年 3 月 10 日开的会,致使一些中央领导的病历外泄。他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群众查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病历,都查到家属头上去了。戚本禹说,查出来了材料交给他,就有问题了,他拿去干什么?就是彭真的病历你拿去干什么?”

“北京医院死了个赵尔陆,是心脏病暴发死的,后来,几个坏人一定要追查,要写成吃安眠药死了,这不许可嘛!后来查出来是几个坏医生搞的。……比赵尔陆早死的还有一个孙志远,至于跟贺龙、邓小平紧一点,是工作关系,他是管国防工业的,我告诉医院要注意一下,谢华不晓得,我亲自去抓,有多少个部长住在里面,这是中央关心不关

心的问题。”“我看他们，组织抢救，林副主席打电话要我去看，有人就查林副主席通过谁打的电话……国防工业‘915’‘916’都去查，现在介绍信都找到了，抢救孙志远是对的。”

“孙正搞了个‘3.10’。他看了几个发言稿子，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历混同在一起……内容都是攻击性的。……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49期上他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集中起批评对方，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来。你把这些事情报中央是好的，但你铅印是不允许的。这些事情是不好的，是反革命阴谋活动，但方法是错误的，当时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

“3.10对抗中央指示，我们让不要开。他说已经停了，后来发现没有停，先念同志打电话追查，他说停了，实际没有停，就把我和先念同志的话告诉他才停了。第二天又开黑会，不久贴出‘打倒李先念’的标语，说李先念同志是大叛徒，这是反革命行动。主席看样板戏时说‘这口号是怎么来的？’主席在接见了朝鲜代表团时也说：‘不知道这口号是怎么回事。’”

“1967年的‘3.10’黑会，名为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名字是冠冕堂皇的，群众的心情是好的，会的本身群众要求开是好意的，客观效果很坏，起了放毒的作用，被阴谋家利用，被孙正利用……是反中央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卫生口突破了‘3.10’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8.11’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在‘516’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516’没有关系，刘雨来说他比‘516’还‘516’，那好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516’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定案，这真是可笑的。‘516’就是利用《5.16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516’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11月9日,周恩来再次与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清查“516”,他说: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516’。”

“‘516’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8月11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11月18日,周恩来第三次与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清查“516”,提到了外交部的问题:

“利用了48小时的声明,这个事我应该负责,我批了。不过他们总是要找借口的,不是48小时他们也要找别的借口。那个时候,香港当局封了三个报馆,都是外围的外围。不是《大公报》,也不是《文汇报》。包括《晶报》在内,而且香港当局也只说封一年。事情没搞清就送来批,制造借口。他们利用这个借口,搞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是个阴谋。到现在还有人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民族义愤,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还这样说法,不晓得是什么精神面貌!……主席和外国朋友谈起‘516’,总要举例讲火烧英国代办处。”

他还说:

“66年刚开完十一中全会,就得到一本北航出的《战略战术》。那是什么战略战术,把戈培尔那一套都用上了,说撒谎久就成了真的了。我看大吃一惊,你说不对,他偏相信那些东西,不让他搞非要搞。”

“武汉的事情,本来主席只叫富治同志去,那里的部队原来是他指挥的,和他熟,陈再道这些人他都熟。王力后来也要去,说他们小萝卜头留下来干啥!富治打电话来说,‘他们也要去’。你说他支持‘地派’,可是他带的人都是‘天派’的,不要以为他们只是支持一派的,都插手了。”

在清查“516”运动中,清华大学首当其冲的是蒯大富。此时蒯大富已经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为了推动清华大学的清查“516”运动,清华大学军宣队、工宣队研究,决定成立蒯大富专案组,将他揪回清华进行审查。专案组由军宣队和工宣队成员及学校的有关人员

组成,具体研究、部署了清查蒯大富“516”问题的措施:

一是在全校造舆论,以群众名义张贴《蒯大富是何许人也?》等大字报,披露已经掌握的蒯大富的有关罪行,要求将蒯大富揪回清华进行清查。大字报是由军宣队的人换了便服,和工宣队的工人一起,在晚上扛了梯子贴到清华大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第二天,这张大字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二是请示上级同意,派人赴宁夏以接蒯大富到北京参加有关会议的名义,将其带回清华大学。

蒯大富于1970年11月18日被带回清华大学,关押在工字厅的一个单独房间里,由工宣队派人24小时看守。蒯大富有什么反映,随时出简报上报军宣队、工宣队总部领导。

11月20日,周恩来第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到清查“516”问题。他说: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11月21日,纪登奎、李先念到卫生部谈清查“516”,纪登奎特别提到卫生部1967年3月10日的“310大会”。

11月29日,纪登奎又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提出了清查“516”需要调查清楚的几件事情。他说:

“农林部关于‘516’问题是个没有揭开盖子的单位,罪行是有的,先要搞事实:

- (1)农大‘516’反革命组织首先是从农林口出来的。
- (2)有没有人去冲中办学习班的?冲中办学习班是整汪东兴同志的材料,抓汪联络站就在水产部大楼办公。
- (3)农林部有没有人去围困中南海?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吗?
- (4)有没有人参加秦化龙的八七黑会?回来怎样贯彻的?交代了没有?应不应交代?

- (5) 碰机要室, 抢档案有没有?
- (6) 为秦化龙平反, 对抗周总理指示, 查清了没有?
- (7) 农林口各部与吴传启、潘梓年, 农大‘516’的联系要查清。
- (8) 有参加碰政治部的活动没有? 有一个部和化工部一个组织抢档案要查清。
- (9) 你们部不是在抓‘516’时出现反动标语‘抓 516 防止为二月逆流翻案’、‘516 是造反派’等, 对抗毛主席?”

1970 年 10 月下旬, 毛泽东的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转成肺炎。

11 月 6 日, 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 康生任组长, 组员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担任。

11 月 6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 要求广大干部学习六本马、恩、列、斯著作和五本毛泽东的著作:

- 一、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 二、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 三、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选读)
- 四、恩格斯: 反杜林论(选读)
- 五、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
- 六、列宁: 国家与革命(选读)

毛主席五本著作:

- 一、实践论
- 二、矛盾论
-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11 月 7 日, 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联名请示毛泽东、林彪, 提议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所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扩大印发范围至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领导小组, 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党和政府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11 月 13 日, 毛泽东严厉批评黄永胜:“你黄永胜是总参谋长, 是个头儿。你一天到晚不抓大事, 只抓小事, 不参不谋, 路线问题、团结问题你就抓不住。”

第 1152 回：下批示，全国掀起野营高潮 枪声响，谭甫仁喋血春城

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在报告的最后一页，毛泽东批示：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还在一年前，1969年11至12月间，沈阳军区116师将部队拉出营房，进行“千里野营”。与此同时，新疆军区、济南军区的一些部队也开始在组织单项训练的基础上，走出营房进行综合性的野营训练。为提高部队能走、会打的本领，他们在野营训练中增加行程、加大难度、提高速度，取得了良好效果，部队的野战生存能力明显提高。

1970年2月3日，总参谋部转发沈阳军区《陆军第116师“千里野营”总结报告》。报告认为，野营训练为促进战备思想落实提供了一条好途径，为全面建设连队提供了一条好路子，为培养部队优良战斗作风提供了一个好方法，为部队适应战时生活管理提供了一个好措施。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以及新疆、济南军区关于野营训练情况的另外两个文件后，充分肯定这些部队野营训练的做法，于2月21日批示：

这样训练好。

全军贯彻毛泽东的批示，迅速掀起野营训练的热潮。当年春夏时节，各军区、军兵种纷纷组织部队野营训练，北方部队实行春季野营拉

练,南方部队实行夏季野营拉练。野营训练中也暴露出部队综合能力不强等问题,如有些装具不适应行军作战的要求,战士负荷太重;行军中经常出现前面休息后面跑,宿营时两个小时进不了房;通信器材数量少、质量差,不能保证通信联络,等等。

北京卫戍区自1969年7月至1970年8月,也先后分4批组织13个分队进行了千里和两千里战备野营拉练。事后,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召集相关业务部门组成研讨班子,对这次野营拉练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上报了《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1970年11月17日,北京卫戍区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呈报了此报告。

毛泽东“1124”批示后,军委办事组哪敢怠慢,立即于11月25日向北京卫戍区领导作了传达。11月26日,北京卫戍区迅速召开全区团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的批示,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中央也当即召集京津沪等地代表,就野营拉练问题座谈。12月6日,周恩来接见进京出席座谈会的全体人员。这天,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练两个月。按照这一部署,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斗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

《通知》要求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守备任务、施工基建和生产任务的部队及海、空军地面部队,军队院校和大军区以上机关都要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拉练。

12月8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要求“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11月24日重要批示为纲,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的通知稿送呈毛泽东。

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大、中城市(包括省、地直属市)学校的野营拉练,可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期分批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批20天到30天。”

《通知》中说:“野营训练,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进行战史、村史、厂

史、家史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通知还要求：“参加野营训练的人员，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传播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帮助社队修理农机具，给群众治病，等等。既进行野营训练，又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福利。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机关工作人员，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野营训练的意义，已超出了战备的范围，而带有浓厚的阶级教育、生产劳动教育、路线教育、组织纪律性教育的色彩。

全军从总部机关到基层连队，从陆军到海军、空军，从野战部队到地方部队，从院校到医院、仓库、兵站等，野营训练迅速开展起来。这次大规模野营训练于1971年4月上旬结束，全军共有540个师级以上机关、43所院校、90%以上的野战部队投入野营拉练，行程一般在千里以上。

中央通知下发后，全国各地也闻风而动，纷纷立即开会研究布置落实，有的省、市还专门成立了“野营拉练指挥部”，毛泽东对部队千里野营拉练的两次批示，不仅在全军掀起野营大拉练的热潮，也揭开了全国亿万民众野营大拉练的序幕。当时，各行各业普遍组成野营拉练队伍，手举红旗，肩扛背包，身着军装，以棍当枪，组成浩浩荡荡的拉练大军，奔赴祖国的角角落落。一时间，神州大地人如海，歌如潮，埋锅造饭，浓烟滚滚。拉练队伍，川流不息。杀声阵阵，到处呈现战备景象。

庐山会议的事情还在继续。11月8日，北京军区党委决定召开全委会，揭发陈伯达的问题。在这次全委会上，38军的领导，对陈伯达进行了揭发批判。会后，起草了一个报告，郑维山在审查这个报告时，删掉陈伯达提出的“华北搞经济协作，要轮流坐庄，北京军区作后盾”等话。

12月10日，这份署名“三十八军党委”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案头。

报告一开头就说：“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报告举例说：“1967年12月25日，他参加了北京军区党委全会，用一种奇特的语言讲个别军和个别地方把军队内部矛盾暴露到社会上，谁都能听懂，他是诬指38军。军区全委会开了20多天，矛头一直指向38军，逼38军同志作检讨。

陈伯达从来不提林副主席。1967年秋、冬，他在首都接见保定赴京代表团和到保定视察时，在公开场合共讲话12次，其中208处提到他自己，17处提到郑维山同志，但却只字不提敬爱的林副主席。1967年12月25日他在北京军区党委全会上讲话，1969年11月25日他在北京军区党委召开的战备会上讲话，有68处宣扬他个人，只有一二处提及林副主席。今年7月，陈伯达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内蒙前线……

在军内外讲话8次，闭口不提毛主席的战备指示，根本不提林副主席。

……陈伯达在群众面前，总是宣传他个人的一套，含沙射影地反对毛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据我们知道，他参加北京军区的几次重要会议，就贩卖了许多私货。”

报告第二部分，揭发“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我军于1967年初奉命调华北以来，越来越感到，陈伯达的手伸得很长，活动反常、手段恶劣。据我们所知，北京军区的许多重要会议，他都到场讲话……”

报告列举了一些会议的例证后说：“由于陈伯达的卑鄙做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会议后，不少群众和兄弟部队对38军产生误解。12月31日，全省10个专区一派群众和部分驻军、军事院校的代表齐集保定，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公开宣传‘38军是支持全省的反军派’，‘要揪出反军派的黑后台’。

1968年1月26日，陈伯达勾结杨成武，在北京军区主持的成立河北省革委会筹备会上，当着全省驻军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暗示38军搞‘武汉事件’……由于陈伯达恶毒煽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猖狂的逆流，说38军是黑线部队。……有的人把陈伯达当成‘精神支柱’，把他

的讲话当‘圣经’，说‘解决保定问题，首先要落实陈伯达同志的指示……’”

12月16日，毛泽东在38军的报告上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当天，周恩来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38军报告的批示。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上商定，先约北京军区党委郑维山、李雪峰等8名常委于18日前来中央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商量召开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的问题。

这天，中共中央以中发[1970]76号文件转发38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

恰在此时，南疆春城昆明发生了一件惊天血案。

1970年12月17日凌晨4时许，春城昆明薄雾弥漫，晨曦未露，人们都还在静谧中酣睡。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昆明军区大院的宁静。不一会儿，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邹贤玉在睡梦中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她抓起话筒，里面传来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发颤的声音：

“32号院响了几枪，你们快来人！”

邹贤玉一愣，32号院，这不正是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家吗？她睡意顿消，马上反问一句：“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枪？”

“反正出事了，你要陈秘书、汪秘书快来吧！”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邹贤玉惊出一身冷汗，急忙穿衣下床，正要给负责谭甫仁日常生活的事务秘书陈永柱打电话，床头的电话又响起来，她拿起电话，是谭政委的警卫员李洪亮打过来的。李洪亮惊恐得几乎说不成话，但意思还是表达出来了：谭政委被人枪杀了！

邹贤玉脑袋“嗡”地一声蒙了，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她立即给军区党办主任王克学、军区分管保卫工作的副政委蔡顺礼、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副司令员刘春山、副政委周兴、雷起云等有关领导一一通了电话；报告“谭政委家出事了”。

谭甫仁从北京带来的秘书、时任军区党办主任的王克学首先赶到32号院，只见谭甫仁浑身是血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他顿时惊呆了，本能地大喊警卫员“小李、小李！”但静悄悄的毫无动静。王克学跑到警卫室，两个年轻战士正呼呼睡大觉，他气愤地大喊：“你们怎么睡得像头猪，快给我起来！”

这时，警卫员李洪亮也从厕所哆哆嗦嗦地出来，原来这个军人竟然被枪声吓的躲进厕所。

这时，蔡顺礼、刘春山、周兴、雷起云等其他军区领导也陆续赶来。很快，平时十分安静的32号院就已经是人声嘈杂，乱作一团。大家上到二楼，只见谭甫仁的妻子王里岩也倒在卫生间门旁的血泊中，脑门上一个明显的子弹弹洞，鲜血已有些凝结。

人们手忙脚乱地把谭甫仁及妻子王里岩送到军区总医院抢救。

执掌云南党、政、军帅印的省级领导被刺身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党的高级将领被暗杀的恶性事件。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于清晨6时，立即向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极为震惊，当即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与此同时，军委总参谋长黄永胜也接到了昆明军区的报告，随即做出相应的批示，并指令在京的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立即返回昆明，主持昆明军区的领导工作。

周兴副政委与周恩来通完电话，于当日早7时主持召开昆明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司、政、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通报了谭甫仁夫妇遭暗杀事件，传达了周恩来和黄永胜的指示。

会议决定立即成立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因为案件发生的时间是12月17日，按照时钟表示法，“12·17”亦可理解为零点17分，所以在当时正式的文档和会议上，这个案件被称为“017案件”，

该案件的侦破小组也简称为“017专案组”。组长由周兴担任，王必成、蔡顺礼为副组长，成员有昆明军区副参谋长赵润博、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保卫部长景儒林、组织部长孟肖野、党办主任王克学等。专案组的日常工作由昆明军区蔡顺礼副政委负责，保卫部长景儒林为专案组办公室主任。

周兴提出：除军区总医院进行全力抢救外，要抓紧破案，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保护、勘查现场，找知情人了解情况；查对枪支、子弹。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都为这起特大案件的发生而震惊，尤其是在军区首脑机关，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省革委会主任这一级人物被杀，更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早上6时，昆明军区参谋长就已通知军区司令部军务部封锁了军区大院，所有人员进出大院都须经过批准。到了上班时间，军区大门紧闭，通知停止办公，各单位组织学习。顿时，军区大院气氛显得十分紧张、恐怖，空气都好像凝固了一样。专案组根据常委会精神，将会议决定迅速传达到全军区和全省各地区。公安部派的人员也及时赶到昆明。一场艰巨而复杂的侦破工作紧张地进行着。

刚送进医院的谭甫仁尚有一点儿血压，但随即就没有了。经检查，他身中三枪：一枪击中腹部；一枪击中头部，子弹从右耳根进，从左耳根出；另一枪击中右臂，弹头嵌在骨中。其腹腔内积满了血，肚子胀得鼓鼓的，医生们打开腹腔抽出积血。又剖开胸腔，由几个医生轮流在心脏上进行按摩，但毫无结果。忙碌了整整一个上午，奇迹并没有发生，谭甫仁的心脏再也没有跳动起来。

谭夫人王里岩身中两枪，一处在胸部，一处在脑门，都是要害处，实际上当场已经休命，医生只抢救了10分钟就放弃了努力。

当日下午15时许，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奉中央军委领导之命乘专机由北京赶到昆明，一出机场就直奔医院，他察看了谭甫仁夫妇的伤势情况，询问了抢救经过，同意医生们所做出的“王里岩已当场休命，谭甫仁伤势太重，接近休命，无法抢救”的结论。

当天下午，昆明军区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联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谭甫仁遇害案。会议做出三项决定：1.迅速成立临时工作班子，负责处理全省的日常工作；2.迅速成立专案小组，调动一切侦破手段，力

争尽快捕获凶手，并将详情上报中央，听候中央的处理；3. 安排好谭甫仁的善后工作。

专案组首先将案发当晚住在32号院内的6个人全部进行隔离审查，他们是：王里岩的妹妹王文莹，他住在别墅的一楼；谭甫仁夫妇的未婚儿媳吴小红，她住在楼上谭甫仁的隔壁；警卫员李洪亮，他住在平房警卫室；以及住在伙房的保姆和住在门岗的两名战士。

经反复盘问上述6人，吴小红和保姆及两个门岗都说当时睡得正香，没听见任何动静，更没见到凶手的身影。两个门岗是被前来抢救谭甫仁夫妇的干部敲门喊醒的，其中一人称当时正在梦中摸鱼呢。李洪亮是被谭甫仁的喊声惊醒的，他正在穿衣服时就听见了院里响起一阵枪声，吓得赶紧趴到床底下没敢出来！待院内静下来后，他才急忙给秘书邹贤玉打了电话报警，然后又躲进厕所藏起来。直到听见王克学的喊声才敢露头。

案发时惟一同凶手照过一面的是住在楼下客厅西侧的王文莹，她是军区女篮队员。当天清晨5时左右，听见楼上有人大声说话，她只听清姐姐王里岩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接着就是厮打的声音和几声枪响。

她觉得事情不妙，正要上楼看个究竟，就看见谭甫仁披着衣服匆匆下了楼，她问道：“姐夫，楼上出了什么事？”谭甫仁说：“我也不知道。”他没停步，直接拐进通往楼后小平房的长廊。这时候，又见一个身穿军装，个头有1.8米左右，身材有些发胖，年龄大约有40岁的人追下楼来，手中好像提着一把手枪，直向长廊上追去。不一会儿，她就听谭甫仁在院中连喊两声：“小李！小李！”紧接着就是几声令人心惊肉跳的枪响。

她顿感出了大事，慌忙给秘书邹贤玉家拨了电话。

专案组在对有关人员进行隔离审查的同时，派人封闭了32号院，随即请当地公安人员协同军区保卫干部进行现场勘查，同时对参加抢救的人员也进行了调查访问。

第 1153 回：细排查，数日内毫无结果 枪再响，谭甫仁事件告破

谭甫仁夫妇居住的 32 号院位于军区大院的中心，是解放后公私合营充公的大资本家杨希辰一座独立的别墅式宅院。大门口平时有 5 名战士昼夜轮流站岗。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批示后，这 5 人中有 3 名战士参加部队的“千里野营拉练”了，此时 32 号院站岗的只有 2 名战士了。于是站岗变为坐岗，坐岗变为睡觉，看似戒备森严的武装警卫形同虚设。

谭甫仁一家住的是 32 号院中惟一的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小洋楼，进门是一个半圆形客厅，客厅西侧阳面是谭甫仁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隔壁有两三间卧室，王文莹就住在其中一间。客厅北侧是楼梯，楼梯下面有一条通向后院的小长廊。楼上共有四个房间，谭甫仁夫妇住的是套房，两室共用一个卫生间，两个卧室之间有门相通，但各个卧室又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各有各的屋门。吴小红住在谭甫仁隔壁靠近楼梯的一个房间。小楼后边是一个小院，有一排平房是厨房和警卫员李洪亮的住室。平房后边有一个小养鱼池，紧挨着养鱼池就是近两米高的院墙。院墙之高，一般人除非用梯子，否则爬不上去的。和 32 号院后墙平行的，是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的家，也是一幢别墅。两幢别墅背靠背，后墙之间的距离约摸两三米。王必成的围墙也很高。两堵高墙之间的夹道就被谭甫仁的警卫员用砖石在两端砌起短墙，围出一个长条形的小天地，开垦成了菜畦，种些葱蒜豆苗之类的作物，并从 32 号的厨房专门开一小门与菜地相通。

两幢别墅高墙之间的短墙远远低于别墅本身的围墙。现场勘查发现，院西北角短墙外有一把凳子，这把凳子是邻近 32 号院南军区机关干部食堂的。32 号院对过，隔着一条路，就是军区机关的干部食堂。凳子上留有两个清晰的解放牌胶鞋印。这个食堂内养着一只大狼狗，晚上一有动静就“汪汪”直叫，所以平时也不用锁门。可是，案发这晚

却偏偏没人听见狗的叫声。出事那天早晨，狗的主人发现，原来这只狼狗竟神秘地失踪了！

院墙内有一个白色的皮鞋包装盒，上面也有一个清晰的解放牌胶鞋印。院墙内外部有新鲜的蹬蹭痕迹。厨房的前后窗户都开着的，窗台上和临窗的案板上都留有相同的胶鞋印。据此判断，刺客是从军区大院的北门进入大院，绕过司令部大楼走到干部大食堂，从食堂拿出一把凳子放在32号院西北角的外面，踩着凳子越墙进了32号院，绕过养鱼池，从后窗跳进厨房，又从厨房的前窗跳入前院。通过小长廊溜进小洋楼，作案后又顺原路逃离现场。

由此可以断定，凶手非常熟悉32号院和整个军区大院的环境，极有可能是军区大院内部的人。因为只有军人才能自由出入军区大院。

现场勘查人员从楼外和楼上两个中心现场共搜获8个手枪弹壳和5颗手枪弹头，其中楼上发现3个弹壳，两颗弹头，楼外院内发现5个弹壳，3颗弹头，加上医生从谭甫仁臂骨中取出的一颗弹头，共6颗弹头。经鉴定均系同一支59式手枪发射。

公安技术人员在现场勘查大约两个钟头时，封闭现场的一名军区干部不耐烦地催问：“勘查完了没有？你们这可是搞技术的呀！”在这种情况下，公安民警没顾上提取痕迹物证，匆忙收场。

综合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的情况，军区保卫部部长景儒林向专案组汇报他们推断凶手的作案过程：凶手上楼后直奔王里岩的房间，因房门未拴，故推门而入，王里岩被惊醒后，拉开床头灯，只见凶手正向她逼近。她显然认识凶手，一边起床一边问：

“你怎么这时候来啦？”

凶手大概说了一句：“我找谭政委！”说着举枪便向王里岩射击。

也许是由于紧张手腕发抖，这一枪打空了，子弹射入墙内。在危急关头，王里岩为了保护谭甫仁的安全，便堵住了通向丈夫卧室的门，与凶手展开搏斗，凶手这时贴身向王里岩的胸部开了一枪，王里岩应声倒地。凶手惟恐王里岩不死，将枪口顶着她的眉心又补了一枪，子弹从脑后飞出后，钻入了木质地板。

住在另一间卧室的谭甫仁被惊醒后意识到危险，便急忙穿上裤子，披上“三位一体”的上衣，就是为了穿、脱方便，将衬衣、毛衣、罩衣

三件套在了一起，然后从自己的屋门出去急匆匆下了楼梯，想叫警卫员李洪亮前来支援。

谭甫仁赶到李洪亮门外时连声喊道：“小李！小李！”屋里却没有动静。这时尾追而来的凶手冲着谭甫仁的背后接连打了两枪，这两枪都没有击中谭甫仁的身体，而是穿越过敞开的上衣击在李洪亮的屋门的门框上。谭甫仁这时转过身来，迎着凶手冒烟的枪口冲过去，凶手又一枪打在谭甫仁的腹部，谭踉跄了一下继续往前冲。凶手紧接着向谭打出了第四枪，这一枪打在了谭的右上臂，谭侧身倒在地上。凶手来到谭跟前，将枪口抵在谭右侧太阳穴处第五次扣动了扳机，子弹从右侧太阳穴穿入，从左侧太阳穴飞出。就这样，一个从1928年就参加革命，历经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国防建设披肝沥胆奋斗了40多年的中将，永远地倒下了。

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往外地，专案组立即采取措施，封锁了整个昆明市。部队在街道巡逻，空中交通完全关闭，陆路交通也实施了严格管制，车站道口过往人等均需进行严格盘查。与此同时，军警对全城大街小巷、十字路口、公共汽车站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根据王文莹提供的线索以及侦破人员对现场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圆脸、大眼睛、微胖者，均视作犯罪嫌疑人予以扣留。

12月18日晨，昆明火车站戒备森严。当开往贵阳、长沙、武汉、郑州方向的62次列车即将进站时，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冲进了候车室，不到5分钟，整个车站被包围。车站广播里传来急迫的声音：“根据上级紧急指示，开往贵阳、长沙、武汉、郑州方向的62次列车，现在暂时停开。车站的所有人员原地不动，接受检查！”这个通知被反复播出的同时，部队开始对车站所有人员进行检查。有好几位身材高大的军人当场被扣留。在远离火车站的昆明田家坝机场也被军警包围。飞往北京的140次航班和飞往广州的1031次航班在即将起飞时，突然接到通知暂缓起飞，荷枪实弹的军警对候机室全体乘客进行了严密的检查。又有一名身高1.75米以上的军人被带走。

军区大院的排查工作也在缜密而紧张地进行。“017专案组”查询了所有岗哨记录，从记录上看，军区大院四道大门在12月16日晚至17日凌晨都没有外人进来过。另外，对军区大院所有的围墙作了

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翻越的痕迹。这说明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在军区大院内居住。

案发后的3天内,昆明军区机关停止办公,每个人都要写出在12月16日晚至17日凌晨这段时间内自己的位置、在做什么、证明人。但是,在对军区大院内居住的人员进行排查过程中,几乎所有人员都能找到两个以上的人证明自己当时所在的位置和去向。

核实人员又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普遍调查青壮年男性12月17日早晨5点至7点之间的行踪,每一个被调查的对象均须有两人以上证明,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这样,当时一个仅有40多万人的昆明市,几乎家家户户,角角落落都触及到了。

与人员核实同时进行的还有查验枪支,即清查检验全军区所有的59式手枪,逐人逐枪核查,军区保卫部的大部分干部分派到各单位进行督促检查。

与核实人员一样,查枪毫无结果,所有佩发的59式手枪一枪一弹不少。这使专案组大惑不解:59式手枪当时只在军队干部中装备,而地方上一支没发,即使公安机关也尚未佩发,难道凶手是从外地部队中偷盗的枪支?

其实不然,查枪工作尽管看起来力度很大,但却留有一个死角,那就是军区保卫部自身没有查。原来,59式手枪在当时比较少,只是二级部长以上和保卫、作战部门配用。保卫部除干部配用外,还有一部分枪支存在保卫部保密室的保险柜中,而且枪弹混存,由秘书袁孔祥负责保管。景儒林没有给袁孔祥布置清查枪支的任务。32号院血案发生后多日,保卫部人员整天忙忙碌碌地去检查别人,却偏偏没有检查自己的枪。也许他们认为,我们保卫部的枪难道还会出问题?

然而,意料不到的事还真发生了:在全军区检验枪支后的第9天,12月25日,当保卫部副部长王庆和要用枪时,袁孔祥打开保险柜,发现锁在里面的59式手枪竟少了两支,并且还丢了20发子弹!再把其它柜子打开寻找,仍无枪的踪影,小袁被吓的五魂出壳。他想,办公楼门口有哨兵,保密室装有子弹锁的铁门,保险柜有密码,只有他知道密码才能打开保险柜,保密室的门窗没有撬动痕迹,保险柜的暗锁也完好无损,而里面的枪弹却不翼而飞。

小袁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报告了景儒林。景儒林也感到是个问题，但他没有往“017 案件”上想，只是认为是袁孔祥本身出了纰漏，当即将袁孔祥隔离审查，并且和保卫部副部长一起，对袁孔祥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逼供、诱供。

袁孔祥死活不承认自己偷去了枪支子弹，但又说不清两支手枪的下落。被追逼得急了，最后，只好说炮兵师有个老乡找他，说即将复员，想带支枪去打鸟，于是就给老乡两支枪。景儒林如获至宝，将袁孔祥收监。

第二天，当袁孔祥上车去监狱时，又翻供，一口咬定没有从保险柜中往外拿枪。景儒林不信，执意派人去湖南找那个复员军人作调查，结果，根本就没有借枪之事，那个复员军人甚至就没到过昆明。景儒林要求湖南地方再继续作那个复员军人的工作。

审查袁孔祥毫无结果，只好将他隔离反省。

其实，保卫部有机会有条件接触保密室和保险柜的钥匙的范围很小，只要认真地深追细查，就不难找到嫌疑人。遗憾的是，景儒林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

查检验枪工作也搁了浅。

时间过去了近半个月，“017 案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周恩来对此非常生气，再次明确指示：破案并不难，问题很可能出在内部。

于是，昆明军区急调 11 军副军长赵泽莽到昆明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主持“017 专案组”的破案工作。赵泽莽上任后迅速把侦破重点收缩到军区内部。他让事发现场的唯一目击人，王文莹到军区每个办公室指认。数目下来，还是没有结果，“017 专案组”加大了内部排查工作的力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春。就在“017 专案组”走投无路的时候，外围调查摸底工作获得了重要线索：专案组成员在军区政治部家属院走访时，住在该院的 8 岁男孩马苏红反映，12 月 17 日清晨 5 点多钟，他用木盆顶着的小屋门突然被推开，进来一个穿军装的胖胖的大个子，脸庞圆圆的，好像还满头大汗，他冲着睡眼惺忪的马苏红问道：

“陈汉中科长住在哪儿？”

马苏红指了指上边，回答说：“就住在楼上。”

那人转身就往楼上去。

经走访住在楼上的陈汉中的妻子，她证实，那天早晨5点多钟，她还没有起床，未拴住的房门突然被推开，来人开口就问：“陈科长在家吗？”她说：“不在，到上海出差了。”那人一听未进屋，就转身走了。她提供的该人身材特征与马苏红所反映的完全一致，估计这个人与在32号院王文莹所见到的凶手极可能是同一人。

32号院和政治部家属院相距不远，也就是7、8分钟的路程，而目击者所提供的时问又大体吻合，所以，很可能是凶手在32号院作案后马上赶到了政治部家属院。

过了约7、8天，马苏红放学回家，正好与住在同院的王冬昆同学走在一起，他突然想起，那天早晨他所见到的那个胖军人很像是王冬昆的爸爸。

专案组拿来一张包括王冬昆的爸爸在内的集体照片让马苏红辨认，马苏红仔细逐人看了看，然后果断地指着其中一人说：“就是他，他是冬昆的爸爸。”

专案组人员愕然了。原来，王冬昆的爸爸叫王自正，是军区保卫部刚提拔不久的副科长，身材与王文莹、马苏红等所见的可疑人完全相符，但他此时因被原籍老乡检举有历史反革命问题，正被隔离在西坝原战俘管理所内受审查，他的住室中有保卫警卫人员谭崇访监视，门外有一个班。

西坝原军区俘虏管理所离军区大院有两三公里的距离，是一个约666平方米的空闲院，大门朝东，临一条南北街，大门通常不上锁，晚间则从里面闩住。门口北侧临街有两间平房，为王自正的隔离室。隔离室分里外间，负责日夜陪伴监管王自正的保警队员谭崇访住在里间，王自正住在外间，中间有屋门。两间房前后各有一对窗户，其中临街的窗户小，有钢筋护栏，人出不去。距离室门外3米多远有一棵大槐树，哨兵就在大槐树底下站岗。西南角是一片用矮墙圈起来的菜地和厕所，厕所是全院惟一的公用厕所。

小院北侧坐北朝南有一座二层小楼，是专案审查人员办公的地方。南侧有一排平房，是站岗士兵的宿舍，住着1个班的战士24小时

轮流看守,他怎么可能在监管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溜出来盗枪、杀人,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回去躲藏呢?除非他有“分身术”,要么有“燕子李三”的那一套本领。

所以,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而态度最坚决、最不相信是王自正作案的就是军区保卫部长、王自正的主管领导景儒林。景儒林曾不止一次地说:“关押王自正的房间夜晚电灯长明。门口哨兵时刻不离,他若能出来作案,那可真是今古奇谈了!”

也正因为如此,当初进行大范围摸底的人员来到西坝问情况,轻易地把王自正排除在外。

第 1154 回：有疑团，保卫部办学习班 难交代，景儒林上吊自杀

尽管有些人不相信王自正会在戒备森严的隔离室中溜出来作案？但他毕竟符合作案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又被目击者从照片中辨认出来。所以，专案组还是决定让马苏红到西坝俘管所对王自正本人直接辨认一下。

12月31日中午，当专案组人员领着马苏红走进西坝俘管所大院时，王自正好一手拿着扫帚。一手插在裤兜中扫院子，马苏红一眼便认出了王自正，脱口说道：“是他，就是他！”

这话被王自正听到了，他抬眼一看这个小家伙似曾相识，转而不禁大惊失色，急忙转过身去，强装镇静继续打扫院子。

王自正的反常表现自然逃不过专案组人员的眼睛，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怀疑。

然而，当蔡顺礼副政委等专案组领导听取了上述情况的汇报后，依然没有下决心对王自正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而是派军区干部部副部长谢新锷，军区保卫部科长何凤毓、副科长李伯志和公安部派来的技术干部前去西坝提取王自正的指纹和脚印，想再确认核实一下。

谢新锷，何凤毓等人于12月31日晚22时左右来到西坝之后，正好刚从上海出差回来的“王自正专案组”组长陈汉中也在。陈汉中向他们反映了如下几点重要情况：

一、1970年12月17日早上7点半左右，刚换岗的战士喊王自正起床。听见王自正在院西南角的厕所里回答说：“我在上厕所，拉肚子！”

“你为什么不请假？”站岗战士质问道。

王自正说：“我向上一班请过了。”

不一会儿，王自正捂着肚子回到了隔离室。经询问上一班站岗的，王自正上厕所前根本没请假，也没人见他何时上的厕所。

二、从32号院血案发生后，王自正的神情一直很反常，紧张不安，不时探头望着窗外，像是在观察什么。

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不同寻常的消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同志逝世》。报道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同志，于1970年12月18日在昆明不幸逝世，终年60岁。”

12月24日，当王自正看到前一天的报纸上刊登出谭甫仁逝世的消息后，他禁不住失声窃笑了几声。

三、12月31日中午王自正发现被马苏红辨认出来之后，回到隔离室突然失声痛哭，哭声中说了一句：“以后就见不到老婆孩子了！”

谢新锣等人听到上述情况之后，认为事关重大，王自正的嫌疑骤然上升，还有没有必要提取他的指纹、脚印，需向专案组领导请示报告。于是，马上派人回到军区向专案组领导当面报告了新获悉的情况及改变原行动计划的建议。

可是，当晚军区大院刚刚举办过年终会餐，专案组的有关领导都喝得东倒西歪，满嘴酒气，对来人汇报的重要情况或许就没有真正听进去，加之他们一直对王自正作案持怀疑态度，又是酒后头脑不太清醒的时候，所以未加深思就做出“按计划执行”的决定。

谢新锣等人只好按原定计划执行。这个计划是让王自正带上喝水的缸子到俘管所食堂，顺便问些情况，从他的水缸子上提取指纹，同时派人到其住处提取他的鞋印。

陈汉中建议待王自正睡着之后，再叫醒他进行提取。临近午夜，陈汉中、李伯志来到王自正的隔离室，陈汉中以平淡的口气对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说：

“王自正，起来，拿上你的缸子，到食堂去一下，有点儿事。”

王自正当时并未睡着，甚至也没有脱掉衣服，他一边起身，一边问道：

“什么时候？”

“现在。”

“好吧。”

说着，王自正下了床。就在他穿上鞋子的一刹那，突然从被子底下摸出一支59式手枪，转身对着陈汉中和李伯志“啪、啪”各打了一枪。陈、李猝不及防，一枪击中李伯志的右手，一枪从陈汉中的大衣右上袖射入，从前腹部穿过，在肚皮上形成擦伤。李伯志转身冲了出去，边跑边喊：“快来人哪！快来人哪！”

王自正也提着手枪跟在李伯志后面，从陈汉中身边夺门而出，向院南狂奔。站在大槐树底下值勤的战士听到屋里响起枪声还没反应过来，就见王自正拿着手枪从屋里冲了出来，一边对着战士打枪，一边拼命地向西南角厕所处跑去。这时，枪声把住在南屋的全班战士也都惊醒了，他们纷纷提着枪跑出来对着王自正乱放起来，顷刻之间，俘管所院内枪声大作，喊声一片。

王自正环顾四周，发现一切对自己不利，便陡然转身，躲进了离他不远的厕所里。他见战士们一边打枪一边追来，料定越墙逃跑无望。就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只见血浆迸飞，一命呜呼。

随后提取王自正的指纹和胶鞋，经与现场提取的指纹和鞋印检验比对，认定同一。王自正的身高、体态、相貌与王文莹提供的情况一致。由此，已经可以完全确定王自正是杀害谭甫仁夫妇的凶手无疑。

经检验，王自正自杀的59式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支手枪中的一支，但不是杀害谭甫仁夫妇的那一支。经搜查他的身上和住处，也未发现另一支手枪。是罪犯把枪藏起来了，还是在同伙手中呢？专案组经过研究分析，并从政治部家属院到俘管所沿线二三里地，反复查看寻找，并派出成连的战士在那么寒冷的气温下，赤脚在俘管所旁边的西坝河，排成数路横队，在冰凉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寻找，均未找到。大家认为罪犯是在俘管所厕所附近翻越南墙进出西坝的，很可能把枪扔到厕所里。于是组织战士掏厕所找枪，开始时边掏边找，用脸盆掏出粪便倒在旁边的菜地里，由于粪便臭气熏人，后来找的也不仔细了，当粪便、淤泥、砖头杂物等都掏光了，也没有见到枪支。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在给菜地施肥时，当打碎粪堆时，发现了一支59式手枪，经检验确系杀害谭甫仁夫妇的那一支，枪号正是保卫部丢的两支枪之一。至此，保卫部丢的两支59式手枪都找到了，缴获未射击过的子弹和已射过的11发子弹，也正好是保卫部丢子弹的数目。017案

件取得了重大进展。

王自正的遗物中,有平时写的3本日记。日记写得很零乱,有人说是像“天书”。专案组拿到手后,觉得没有什么有用东西,也没有认真仔细的研究。

罪犯找到了,枪支查到了,按理案子可以结了。但凶手自杀了,没有了口供,许多情况还搞不清楚,王自正究竟是何许人,他为什么要杀害全军区的最高首长,他是独自一人作案还是纠集了一个集团,他又是如何在严密看守的隔离室中潜出潜入盗枪杀人的?作案有无背景或同伙?背后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罪犯是如何实施犯罪过程的?以及与案件有牵连的一些疑问。这些问题都不清楚。

轰动春城的谭甫仁夫妇被暗杀案,并没有因凶犯王自正畏罪自杀而画上句号,相反,却给人们留下一串难解之谜……

王自正是何许人呢?他为什么会关在俘管所呢?这还得从一封来自河南内黄县武拐公社的检举信说起。

检举信缘于1947年7月的一起反革命报复案件:那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曾一度占领内黄县。内黄县富农出身的王志政为了给被共产党镇压的亲戚报仇,参加其堂兄组织的还乡团,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枪杀了内黄县武拐村武委会主任武不会,制造了当时的“武拐事件”。后来国民党军队败逃,王志政随即逃离家乡,多年未有音信。

解放初期,王志政的堂兄、枪杀武不会的首犯被人民政府镇压,而王志政却一直逍遙法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当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展开,群众把当年还乡团杀害武委会主任一案重新提出,强烈要求将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王志政揪出来。群众中有人反映,王志政当年跑到外地之后,编造出身历史,混入了解放军的南下大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曾给老家亲属来过一封信,称已从部队转业,单位好像是个旧市锡矿五队。武拐公社革委会当即给个旧锡矿五队寄去一份检举信,但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于是。公社和大队革委会又进一步围绕着王志政与家人的联系情况进行调查。有人反映,王志政有一次跟家人的通信地址好像是“昆明靖国新村50号”。于是,革委会以王志政亲友的名义试探性地给这个地址发出一封信,但不久信被退回来,原因是“查无此人”。

武拐公社革委会的办案人员仍不放弃，他们干脆把检举信寄给了云南省革委会。这封检举信转到了革委会人保组。当时，昆明军区保卫部的何凤毓科长恰巧在该组支左。他看过检举信之后，觉得“王志政”很像是保卫部的副科长王自正，便将此信转给军区干部部部长王一民。王一民阅后又转交给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雷起云。雷起云对这封检举信非常重视，直接呈报给军区政委谭甫仁。谭甫仁也认为此事重大，如果是枪杀共产党的富农分子混入了部队，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谭甫仁遂将此事便提交军区党委进行了研究，决定先派人到其家乡进行调查核实，如情况属实则立即将王自正隔离审查。

其实，昆明军区保卫部的这个“王自正”就是河南省内黄县参与枪杀共产党基层干部武不会的那个“王志政”。他畏罪潜逃后，在外地改名“王自正”参加了解放军。他编造了历史，伪装积极，骗得领导信任，很快入了党，提了干。后调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任保密员、秘书，1970年刚被提为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之所以能在部队长期隐蔽下来，除了组织上疏于审查之外，主要是他很少和家乡联系，即使写信也诡称转业到某某生产大队、某某锡矿，以迷惑家乡，他提干后把老婆李素民接到部队，与家乡的联系就更少了。

昆明军区外调人员刚到王自正的原籍进行调查，王自正的一个侄子便马上给王自正通风报信。王自正做贼心虚，惶恐不安，立即让妻子回老家找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但已无用，情况属实，“王志政”就是“王自正”。于是，1970年4月，报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和政委谭甫仁批准后，王自正被隔离审查，关在原西坝俘管所的政治部审查组。这个专案组由干部部陈汉中科长负责，保卫部长景儒林直接领导。

之后，王自正供认自己参与了杀害武委会主任一事，但一口咬定没动手，没开枪，仅仅是个从犯。因该案的首犯已被处死，死无对证，所以检举揭发的主要事实难以查清，王自正一直被隔离审查了7个月结不了案。

但是，已失去人身自由的王自正要实施其杀人计划是何其难哉！如果没有同伙的协助，他怎能轻而易举地摆脱看管人员的监视，又畅通无阻地进入32号院连杀两人，然后再悄无声息地窜回隔离室隐藏？而如果有同谋同伙，那可能是谁呢？

专案组锁定的首选目标是王自正专案组的负责人陈汉中。

专案组怀疑陈汉中是王自正幕后策划者的根据有好几条：

首先，陈汉中作为审查王自正的负责人，表面上看来他对王的态度很严很凶，时常对王自正训斥一顿，并且王自正在日记中也多处流露出对陈汉中极为不满，甚至切齿愤恨。但这些都似乎是假相，是不是为了掩盖两人之间的同伙关系故意做戏？

其次，王自正作案为什么偏偏选在陈汉中出差期间？他在 32 号院杀人之后为什么又到了陈汉中家？

第三，也就是最令人可疑的一点，就是 31 日晚上，王自正在几米之内对陈汉中开枪竟只擦伤了他的一点儿肚皮，陈汉中衣服上共有 18 个弹洞，其中胳膊上的洞同腹部衬衣、毛衣、罩衣、大衣上的洞竟不在一条直线上。王自正冲他只打了一枪，这一枪所穿的洞不可能不在一条直线上啊！因此，专案组怀疑陈汉中自己冲自己打了一枪。否则，人们难以解释：如果王自正同陈汉中没有特殊关系，如果王自正真的那么恨他，那么，王自正在陈汉中从其身边冲出屋门时为什么不照他头上补一枪？

当晚事发后，陈汉中曾对他人吹嘘自己在王自正行凶时是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同对方搏斗，但现场情况证明他说的并不是真话，他为什么要编造假话呢？

因此，专案组果断地决定将陈汉中隔离审查，将其同王自正的妻子李素云及子女 3 人以及住在 32 号院的 6 人等重点审查对象一起关押在昆明北郊黑龙潭一空闲干休所内进行审查。拥有几十名办案人员的专案办公室也设在该处。

同陈汉中一起被隔离审查的还有谭崇访。他一直与王自正住在里外间，专门负责监管王自正，王自正潜出潜入隔离室怎能瞒得了他？是他麻痹大意没发现呢，还是发现了以后知情不报，或者是被王自正拉下水成为同伙？

尤其令人不能原谅的是，陈汉中，李伯志去隔离室传唤王自正时，谭崇访正在里屋睡觉，在王自正开枪行凶的关键时刻，他不仅不挺身而出，从背后擒住王自正，反而吓得跳窗而逃。假如他当时表现得勇敢一些，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王自正自杀的。

专案组考虑到,王自正在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出去作案,站岗的战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不定有人充当了他的帮凶。因此,全班12名战士均被隔离审查。

本来,侦破“017案”的主力是保卫部,但破来破去却破到了保卫部自己头上:凶手是保卫部的人,负责监管审查的也是保卫部的人,盗的又是保卫部的枪,暗杀的则是保卫部的头号保卫对象。因此,最难逃关系、压力最大、首当其冲的就是保卫部部长景儒林。加之当时地方和部队均有较严重的派性,就连专案组成员也有所谓“八派”、“炮派”之分。当时对“017案”有一个基本定调,那就是“集团作案”;在破案中也有一个警示性的口号,那就是“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所以,两派谁也不敢否认“集团作案”的定论,谁都想从对立的一派中挖出王自正的幕后策划、支持者,而景儒林则无疑处于斗争交会的风口浪尖上。他陷入深深的自愧、自责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在确定王自正是凶手之后,问景儒林谁与王自正关系密切时,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名字,问谁能进保密室时,他又点了一任又一任的秘书。因此,保卫部不少人被怀疑,成了被审查对象。关押这些人的地点四周岗哨森严,气氛恐怖紧张。景儒林自己也感到压力很大,整日情绪懊丧,坐卧不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用他自己的话说,“凶手是保卫部的人,偷的是保卫部的枪,杀得是保卫部保卫的头号对象,叫我无脸见人。”这种情绪已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他的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1年初,解放军总政保卫部召开驻京单位保卫部部长会议,要求昆明军区保卫部派人出席,在会上介绍一下“017案”情况,以使人们引以为戒,防止类似案件发生。军区领导决定让景儒林参加,但他找到副政委蔡顺礼推辞,说他没脸见人,坚决不愿意去。蔡顺礼给他做工作,并提出让军区党办主任王克学一同去,并让专案组准备好了案情介绍材料。到会之后,景儒林执意不发言,硬让王克学代替他介绍了案情。

1971年春节过后,昆明军区政治部党委决定将保卫部一窝端,连同军区政治部专案组人员,被审查对象等,统统到军区步校办学习班。

军区步校在昆明东部八公里,那里的生活设施比较好,外边无干

扰,学习班地址选在这里,又便于保密,但有的房间窗子外钉上了木栅条。景儒林和干部部长王一民参加了学习班,而且都是学习班领导成员,住的都是加木栅条的单间房。军区派了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孙呈祥协助景儒林具体掌管学习班。开学时,蔡顺礼作了动员报告,讲了学习班的意义、要求、希望和纪律。景儒林作了人员编组、作息时间和讨论动员报告的安排。

开学第二天,要联系实际讨论揭发了,到早饭时仍不见景儒林起床,孙呈祥在门口呼叫也无反应,当勤务员站在凳子上从门上窗子往里看时,只见景儒林用尼龙绳套在自己脖子上,另一端挂在蚊帐上,坐势下垂,打开房门进屋内,发现他早已自缢身亡。他留在桌子上的字条上写道:“保卫部原来就是个烂摊子,我来保卫部后,还在继续烂下去……保卫部出了这些事,叫我怎么说得清呀!”

景儒林的死,又给专案组蒙上一层阴影,他为什么自杀?是否与谭甫仁案有关联?这无疑又给专案组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难点。

景儒林自杀之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泽莽接替担任专案办公室主任。

昆明军区机关相继发生暗杀、自杀等案件,更引起人们的各种猜疑:谭甫仁被谋杀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在当时的情况下,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如此震慑人心,而谭甫仁身边的戒备森严,能对他如此成功实施暗杀,肯定绝非普通人能够所为,也绝非个别人能够所为,肯定该是一个错综复杂、蓄谋已久、集团策划的惊天大案。

第 1155 回：毛泽东，北京与斯诺长谈 发信息，中美要高级接触

春城血案我们暂告一段落，再回到北京，看看此时国内外的局势如何。

10月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下旬，尼克松当面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商量，请叶海亚·汗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随后，他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上，在谈到国际问题时，“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在私下托齐奥塞斯库再次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

国庆节后，斯诺在中国各地继续访问。

11月5日，周恩来与斯诺及其夫人长谈。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周恩来：中美谈判从1955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对此，“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11月10日至14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叶海亚·汗来华访问。

10日晚，周恩来单独同叶海亚会谈时，叶海亚转达了尼克松准备派其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与中国相应的代表对话的口信。

周恩来感谢叶海亚去年以来几次转达尼克松口口信，并表示将把叶海亚的传话内容报毛泽东。

11月14日，周恩来在同叶海亚会谈时，回答尼克松的“口信”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

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周恩来特别说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

12月9日，美方正式获悉周恩来的“口信”。

11月14日，周恩来同罗马尼亚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会谈。勒杜列斯库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解决办法表示的关切，以及尼克松两次表示美方愿同中国领导人就改善中美关系进行谈判的愿望。

对此，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提出：如果美国真有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商谈。

12月18日，毛主席请斯诺去中南海谈话和吃早饭，一直谈到中午，共五个小时。

毛泽东谈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两派武斗，全面内战，说到了“516”，提到了王、关、戚，他说：

“就是那个时期。1967年7月July和8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516’。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有4个人……王、关、戚，还有一个下次我给你讲。”

毛泽东这里说的“还有一个”，应该就是陈伯达。此时陈伯达的问题还没有对外公开。

斯诺赶紧问：“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泽东：“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

毛泽东与斯诺谈到了“个人崇拜”的问题，他说：“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做华盛顿。你

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做哥伦比亚区。”

对“个人崇拜”，毛泽东表示：“可讨嫌了！”

但同时又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毛泽东建议尼克松来中国，他说：“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啰，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

斯诺一时不明白毛泽东的含意，只好听他讲下去。

毛泽东：“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

斯诺惊讶地睁大幽蓝的眼睛。

毛泽东：“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

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接着说：“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35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35年啊！那时落后得很，只有8000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30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路线被批判了。”

斯诺的思路仍停留在毛泽东刚才的话题上，他说：“主席，我有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但是……”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诺：“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泽东继续说：“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诺：“1972年。”

毛泽东预言：“1972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1000多万人。我说亚洲有12亿人，非洲有3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泽东：“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

斯诺问：“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说：“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 100 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接着，斯诺又问了当时全世界都关心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一场针对自己政权的革命？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说到这里，在座陪同的人都笑了起来。

斯诺问：“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问：“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的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泽东点点头说：“这些人分三种，第一种人是真的，第二种人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 Law and order 吗？他是喜欢那个 Law，是喜欢那个 order 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诺：“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泽东：“新宪法要写上。”

斯诺问：“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泽东说：“不怎么样。”

斯诺问：“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泽东说：“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斯诺又问：“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泽东回答：“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诺问：“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泽东：“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诺问：“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泽东说：“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他伸出小手指比划着，然后说：“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他伸出大拇指比划着，又说：“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毛泽东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后说：“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你看。”毛泽东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给斯诺看。

斯诺接着问：“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泽东回答：“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

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12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以通栏大标题刊载了《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新华社电讯，新华社电讯报道的是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游泳池的书房会见斯诺和他的妻子的消息。《人民日报》还配发了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与斯诺的合影。这天报眼位置的《毛主席语录》选用的是：“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这次会见后，唐闻生负责整理谈话的英文记录。根据斯诺的请求，经请示周恩来，由外交部领导审阅后，给了斯诺一份。斯诺结合自己记录下的那部分内容，把谈话整理成文，于1971年4月发表在美国《生活》周刊上。

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共同整理的中文记录,经毛泽东与周恩来审阅后,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至全国每个党支部。

这份文件送到毛家湾后,秘书于运深认为很重要,在“讲”文件时作为重点讲给林彪听。他还把毛泽东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专门画出来了,摘要讲。“四个伟大”虽不是林彪的创造,但经林彪1967年5月1日给清华大学题词后风靡全国。本来,林彪对毛泽东的批示、讲话、谈话等都是非常注意的。而这一次,于运深注意到,林彪更是格外注意的听。文件讲完后,林彪还要秘书把这份文件留下,他要再看看。这是以前于运深讲文件时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1971年1月5日,经过巴基斯坦总统的传话,尼克松总统的回答口信:“美国认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应包括解决其他问题的步骤,美国建议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做出各种安排。”

第 1156 回：华北会，批李雪峰、郑维山 姚文元，写报告汇报学习

1970 年 12 月 18 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对 38 军报告的批示。这次会议，将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军区政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雪峰等北京军区领导 9 人，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吴德、吴忠、杨俊生 3 人“扩大”到会。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有些地方还重复念了一遍。然后，沉默地望着北京军区的几位领导人。

郑维山首先表态说：“我坚决拥护主席的批示。我觉得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再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我相信，事实真相总会查清楚的！”

李雪峰等人也明确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召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建议。”

次日，12 月 19 日，周恩来关于召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请示报告递到了毛泽东那里，报告全文如下：

主席、林副主席：

昨(18 日)晚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和林副主席批示。华北到会的同志有：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解学恭、肖文玖、吴先恩、张南生、郑三生、尤太忠等九人，北京卫戍区有吴德、吴忠、杨俊生三同志。会上，先发了中央印发的讨论文件((1970)134 号)。读后，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的建议。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每个师二至三人，军四人，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党委常委、军分区二至三人，同级军兵种和代管部队、机构亦来相应人数，预计要来四百多人，时间性要长一些。在昨晚讨论中，解学恭、吴德、吴忠、杨俊生等同志都强调主席批示中“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

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两点。政治局同志也指出：“为何连林副主席也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为何北京军区两次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一次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的通知，一次传达中央 62 号指示）都只是分片传达，为何河北省的两次传达也是那样草率，一次了事，然后由各军、各地零星揭发，而不能集中讨论，追究原因。”经过大家发言，对郑维山、李雪峰两同志有了触动。郑说，过去上当犯错，现在有信心痛改；李说，过去在思想上有共同性。

为开好这个会，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同意吴先恩同志提议，在人到齐开大会之前，先以三天时间（19、20、21 日），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北京三人参加，约十五人），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同时由永胜、作鹏两同志也找三十八军开会同志谈谈，指出他们的报告是好的，起个推动作用，在会中也要从揭发批判达到团结。

以上处理，妥否，请主席批示。

12 月 19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这份请示报告文件上奋笔疾书：

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的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在这里，即将召开的会议已被毛泽东称之为“华北会议”。中共中央以中发[1970]77 号文件转发周恩来《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

19 日、20 日两天，郑维山主持召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研究安排召开华北会议事宜。

19 日当晚，黄永胜、李作鹏接见 38 军领导干部，宣读毛泽东 12 月 16 日的批示，说：“现在的问题是陈伯达与北京军区的关系是很好的。他自己讲北京军区是他的‘家’，要什么‘饭’吃等等。我们不理解他是什么意思。”“不要只攻击北京军区，为什么陈伯达成了你的太上皇，那样就把事情搞复杂了。”

20 日，北京军区正式接到中央通知，要求全军区正师以上干部和河北省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到京西宾馆报到。同日，周恩来约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谈话，商定他们参加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

事情。

李德生于11月18日向中央政治局请假，回安徽检查总结1970年的工作，部署1971年的工作，研究准备召开安徽省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12月19日，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请他立刻回北京，说是“主席有事情找他。”

李德生不敢怠慢，赶紧把安徽的工作向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省革委会副主任宋佩璋作了交待。第二天，12月20日，乘空军派来的专机赶回北京。

李德生下了飞机，没有停留，直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地。

毛泽东见了李德生，显得很高兴，问道：“你回来了，你们安徽形势怎么样啊？”

李德生不知道毛泽东特地把他叫回来，要谈什么事情，显然不是谈安徽的情况吧。他简要地汇报说：“从现在看，今年安徽粮食丰收已成定局，比去年增产，工业生产也不错。党的各级组织基本恢复了，我们正在筹备召开省的党代表大会。”

果然，毛泽东没有接着问下去，而是郑重地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去，担任司令员。”

李德生向毛泽东建议：“主席，北京军区的工作任务很重，我努力去做好。总政治部的事还管不管？”

毛泽东回答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总政治部还有副主任嘛。”

毛泽东说：“总政治部的工作还是搞好承办、批转。”毛泽东接着讲开了总政治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评价了从红军时期到解放以后，总政治部历届主任的情况。

毛泽东没有讲到北京军区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到北京军区应当注意什么，而是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哦。”

他又问李德生：“你知道北京最早是在什么地方吗？”

李德生当然答不上来。

毛泽东说：“有一个说法，叫做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啊。”

毛泽东交待李德生：“你先去参加华北会议，等公布了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命令后，再到职上任。”

21日，也就是李德生赶回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到京西宾馆，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华北会议。

这天，汪东兴也奉命参加华北会议。临行前，他请示毛泽东：“我要不要发言？”

毛泽东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

汪东兴又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

毛泽东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

说到这里，毛泽东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

1970年12月22日，北京的天气特别寒冷。京西宾馆的大礼堂里，整整齐齐地坐着449位来自全军高层领导机关和北京军区师以上的领导干部，以及河北省地（市）委书记以上干部。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华北会议”。

按惯例，这次会议也被分为小会、中会和大会。小会只有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参加，中会扩大到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则要求全体人员参加。

会议规定，所有与会人员一律不许私自外出，有重要事情外出，务必请假。同时规定：“会议要保密，会间不准打电话！”

12月24日，北京军区召开常委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李德生等以军委领导的身份出现在会场上，纪登奎等人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黄永胜首先传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传达之后，他介绍说：“周总理和军委办事组，按照毛主席的批示，要开一个有广度、有深度、长时间的会议。”

与会的400多位代表心情复杂，表现各异。多数人对这次会议的主题感到茫然：究竟是批陈伯达，还是批郑维山、李雪峰？要批郑维山、李雪峰，他们还都在主席台的位子上坐着，怎么个批法？因此，会议开始后，冷眼旁观者有之，唱高调却内容空洞的发言也有之，还有些平时就对郑维山、李雪峰有意见的人开始上下活动，准备材料……

这些情况很快反映到中央那里。

24日这天，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参加会议的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的汇报，将会议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梳理。最后，政治局形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华北会议还未形成认真批评和彻底揭露的精神，要求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主要小组会上继续做工作，打通思想，突破缺口，以影响大会。

第二天，12月25日，华北会议召开小会。各小组会议重点是批评郑维山、李雪峰。

当天，周恩来就华北会议的情况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目前会议还处在学习和表态的开始阶段，估计形势打开，将在年底年初。同时，汇报了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

26日，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分别在各小组会上继续发动揭批问题，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当天，周恩来在劝大家发言时说：“如果会议开的无力，中央要点名了。”

27日，郑维山和李雪峰在大会上作检查。

不久，中央政治局指定4个人帮郑维山写检查，其中包括他的现任秘书杜辛和前任秘书高惠卿，还有军区党委办公室的副科长张工和秘书刘耀。

另外，中央政治局又指定吴德、吴先恩等4个人来“帮助、督促”李雪峰、郑维山端正态度，交代问题。

一天，“帮郑小组”要郑维山交代跟陈伯达通电话的内容，郑维山说：“讲的都是一般具体问题，记不清了。同时，电话多数是秘书接的，我接时秘书也在场，要办的事也是通过秘书办的。”他们说：“那不行，交代不了。”

“过去做对了的，要从错的方面去讲，过去认为是正确的，要从错误方面去认识。”几个人告诉郑维山。

“每个问题都要写上动机。”在看了郑维山的一次检查后，“帮郑小组”成员说，“比如‘火烧杨勇’没有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动机，就是要当军区司令。”“比如，那一次陈伯达别有用心地问你：天津核心小组要不要扩大？王曼恬这个人怎么样？你说天津核心小组要扩大的事不知道，王曼恬你还不认识，回去给你问一下。陈伯达连忙说不用不用，你不懂我的意思。后来你去天津时，便向解学恭讲了这件事。

动机就是要打击王曼恬革命干部,讨好陈伯达。”

郑维山知道,他不作检讨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不能给自己乱戴帽子。被逼急了,他赌气说:“要检查,我可以作检查,你们怎么写我怎么讲,我一个字不改。但是有两条,你们写上了我也不讲。这两条:一是说聂荣臻是坏人,你写上了我也不讲;二是说华北部队就是‘六字号’的部队,是坏部队,写上了我也不讲!”

北京军区的前身是华北军区,基本部队是华北野战军,聂荣臻是华北军区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司令员。而杨成武则是北京军区的第一任司令员。1948年11月1日统一全军编制序列部队番号时,华北军区的第1、第2、第3兵团按原建制依次改称为第18、第19、第20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下属的纵队,依次改称第60、第61、第62、第63、第64、第65、第66、第67、第68、第70军,基本都是“六”字打头儿。这就是华北部队“六字号”的来历。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北京军区党委召开第12次全委扩大会,批山头主义,“六字号”部队是当时的主要话题。

12月28日,发言的火药味浓了些,批评郑维山、李雪峰骄傲自满、刚愎自用。但是,仍没有什么实质问题。

这时,北京卫戍区的一位领导清了清嗓子,要求发言。他说:“郑维山、李雪峰的检查不老实,你们的要害是跟陈伯达搞阴谋,不讲阴谋活动,这是对抗!……郑维山、李雪峰是陈伯达的打手,陈伯达在庐山向党发难是同打手商量了的!军区常委们都要揭盖子,不要捂。”

一时间,全场哗然。不少人震惊地看着他,也有人用眼睛的余光瞄向郑维山,还有的人低头不语,更多的是在交头接耳。

会议基调一下子升温。在随后几天的小会上,甚至在包括省、市、军以上干部参加的中会上,很多人纷纷批评郑维山、李雪峰。

但是,会议仍显揭批无力。

郑维山觉得,这些发难的人中,有的人是真批,但是没有内容;有的人是假批,实际是应付;多数的人不发言;还有少数人,在会议宣布问题之后就病了,或者离开,或者住院了,而在座者无不神情紧张。在400多位军队干部面前,他和李雪峰仍然是首长。郑维山认为,这次黄永胜等人仍然会像1968年北京军区第12次会议上一样,又是小题大

做罢了。其实,他和许多与会者一样,并不知道毛泽东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华北会议的真正目的。

当月,38军政委王猛提拔为北京军区副政委。

12月29日晨,姚文元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自己最近除学习中央指定的经典著作外,还很粗浅地读了一点历史和自然科学,想逐步改进自己知识贫乏的状况。”“赫胥黎为达尔文主义奋斗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比严译《天演论》好看多了,由于倾注全力证明人的老祖宗是猿,曾引起神学家们的狂叫怒骂。他用的方法是解剖学的比较方法,一当进入人类历史领域,就显得论据不足了。他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不了解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觉的能动性以及这种能动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个问题,他只回答了一半。此书在普及达尔文学说上有特殊的功劳。一种新的进步的学说要普及,不经过这种剧烈的批判,大约是不可能的。翻看了一点《五灯会元》,才知道宗教的唯心主义的虚妄是怎样用诡辩和折衷主义来装点门面的,这从反面教育自己辩证法的重要。另外还读了一些孙中山的东西。也看了一些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东西。逐步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从刘少奇的黑《修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一直到他在‘八大’的报告和决议,有一条同主席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的黑线贯串着,即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可能是刘少奇反动世界观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的许多文章、‘报告’中,都有抽象的即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法和论点。这是同国民党反动观点一致的。从这里,可以直接引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极‘左’、形‘左’实右的路线,可以直接引出复辟资本主义、为地富反坏右等剥削阶级服务的修正主义理论,同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相对抗;在认识论上,则必然同时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社会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这个根本观点相对抗。从国际上看,苏修叛徒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人道主义’‘人性论’之上的。批判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仍未批透。想认真搞一点材料及文章。此外,关于陈伯达,也要整理一些此人反动世界观的文字材料,揭发材料中这一部分很少。还

想整理一点思想史的材料，以执行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中‘继续研究’的任务。”

当天，毛泽东对姚文元的这份报告写下了如下批语：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第二天，12月30日，林彪也对姚文元的这份报告批示说：

“完全同意主席对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全体中央委员和高中级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极为重要。”

第 1157 回： 来加温，江青到京西宾馆 跳跃快，再追问《六号简报》

1970 年 12 月 30 日，身穿绿军装的江青走进了华北会议的会场。这天正在召开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小会议。江青的到来，使会议的气氛顿时有几分紧张。

江青看着会场上的人，问：“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有人向她解释说：“这是小会，还有中会、大会。”

“开什么小会？最小也要开中会。”江青毫不客气的冲口而出。

于是，这天的小会变成了中会，军区的军以上干部参加。

江青先是不动声色地听了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38 军副政委邢泽等人的发言，随后开始讲话。

1968 年“杨余傅事件”后召开北京军区党委第 12 次全体会议时，江青就到北京军区参加过那次会议，为邯郸磁县事件和郑维山有过交锋。而这一次与会的人数比上次更多，规模更大。

她说：“我首先向同志们讲一下，我对于 38 军任何人不认识，但我正是为 38 军受了陈伯达这个大坏蛋的气了。38 军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写信，曾经想见我，说见肖力也好，陈伯达为这个就压迫我。我想查这个人查不到，现在这个人查到了！”江青环顾四周问：“38 军到的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有个叫宋伟的啊？”

38 军军长刘海清站起来回答：“知道，是我们一个团的副政委。”另一个人补充道：“他在中央文革机关工作过。”

江青接着说：“他的材料证明他在那里完全是受排挤的。我和康老、春桥、文元是被架空的。我建议要宋伟同志到会来揭发！”

热烈的掌声。

江青接着说：“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要打断我的脊梁骨！打嘛，我也可以打断你的脊梁骨。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保卫党中央，保卫人民！傅崇碧冲进去，是由陈伯达秘书王保春勾结进去的。北京卫戍区

对这件事还没有个表态。请问卫戍区司令，还有总参，有没有这个职责呢？”

江青又说：“卫戍区对这几个要查，其中有一个周树青，还有邵崇永，你们一直没有把这些人当回事。这个事大概跟北京军区可能有点什么关系吧！邵崇永有个检查说，傅崇碧说过：不在于江青同志批评我，在于江青同志有察觉。察觉到什么？还不是察觉到他们的活动。这跟陈伯达都有联系的。傅崇碧冲了中央文革以后，杨成武就装病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

江青说到天津：“还有个江枫。”她突然口气一转：“解学恭、王曼恬同志他们立了功，特别是王曼恬同志。”“江枫、王亢之、李树夫完全给陈伯达做特务的。38军在北京市公安局有个支左的。”

刘海清补充说：“是我们副军长牟立善同志。”

“这个人被陈伯达赶走了。宋伟现在在不在？”江青伸长脖子，目光在会场中来回扫视。

还是刘海清回答：“在。”

江青又问：“在哪里？”

刘海清答：“在保定。”

江青有点失望：“代我告诉他，我没有见他，不是我怕陈伯达，是我遵守纪律！”

接下来，江青便说北京军区郑维山的问题：

“战友文工团简直是军队打、砸、抢的祖宗。郑维山同志你说老实话，王××（北京军区文工团吹小号的）上庐山前给我的两份报告，那么处理，那还不是‘516’？！抢人家的机密，党的机密。王××，还有个吹小号的，这还不是你们组织的。你这个‘战友’可了不得。我是提个问题你们考虑，有的还会揭发。王××这个人轻易处理，不追查，他是有组织的，他的行动是有训练的。在怀仁堂我要打电话给总理，他就把电话占上了，我都打不成电话。几次打、砸、抢都有他。我觉得郑维山同志对这些问题是很不认真对待的。是否你当时也参加了？当时有人说，北京军区有7个军，陈伯达他辖7个军，还不是太上皇？！”

“这几年，为军队我受小人的气，大阴谋家的气。陈伯达提出了个口号‘揪小爬虫’，他说他是‘小小老百姓’。什么小小老百姓？他才

是个小爬虫呢！他是小小小小爬虫，他是王八蛋、两面派！68年以后他对我就是一面派了，他勾结人整我、压我。这些问题卫戍区、总参不追究。你们不是保卫党中央、保卫人民吗？为什么不追究？我讲的不对，同志们可以批评我。”

接着，她的语气稍有缓和，继续说：“发言不要照本念，有什么就揭什么，揭得越彻底解决得越好，才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团结起来。”

她点着桌子，对李雪峰说：“李雪峰同志，你在北大时我们到北大，你说奉陪到底。你说：你们来我奉陪到底。把林副主席请去了，你不负责警卫，躲到角落里去了，几乎出了事。你是主体嘛，不是客体。北大是你的天下了？聂元梓则给我写了保证，这次到庐山又反对我们了，跟着你走了。最后两年又给我写信，说她又犯了错误。也没说什么错误，大概是对8341部队的吧？我叫老汪同志处理了。这和你没有关系？在天安门上我就说：你太不像样子了。我保了你好几次了，你说你要奉陪我们到底，现在我要奉陪你到底，看你低头不低头、认错不认错！”

李雪峰低头不语。

江青这里说的“奉陪到底”，应该是指1966年7月26日在北京大学的那次辩论会上李雪峰的讲话中的一段话：“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而“把林副主席请去了，你不负责警卫，躲到角落里去了，几乎出了事。”这句话应该是指1966年8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的事情。那次会议由于会场秩序混乱，致使正准备讲话的林彪讲话中断，会议被迫提前结束。详情可见《文革史话》第二部第一卷的125回。

没想到过去将近4年了，江青还记得。

江青继续说：

“你们《河北日报》把黄永胜同志的名字勾掉，印了杨成武、肖华的照片，我请总理、康老和你谈过这是错误的，你是怎么对待的？”

“你们打我，姚文元同志可以作证。你们打我，这样恶劣，你们奉陪到底，就是在北大！在庐山你们那样干，那样跟着陈伯达干，陈伯达是你们的太上老子！”

她看到郑维山，又大声说道：“郑维山你好好想一想，你在晋东南要开枪权、扫荡权，我要不讲可能几万人就完了。”

说到这里，江青又补充说：“我今天来参加会，请示了政治局，请示了总理，我不代表任何人，我也可以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江青向大家描述 1968 年的事情：

“当时在人大会堂，我遭到突然袭击，进来一批人，拿来一张图，要开枪权、扫荡权，怎么能够这样？！我当时还说，可以挖坑道，派装甲车、坦克去宣传，部队可以放在后面壮声威。当时还有人挖苦我，说江青同志还会打仗？我跟主席几十年，总懂得一点嘛！法宪、叶群可以作证。总理劝了你才制止。后来派了曹中南解决了。我认为那天你们是搞突然袭击，你和我坐在对面，那位置我是永远记得的，我很惊讶！”

“还有一件，肖望东从南京军区调来北京当文化部长，带来不少武器。一个文职官员，带了那么多武器，听说藏在北京军区，你查了吗？”

郑维山回答说：“有个报告！”

在 1968 年北京军区第 12 次会议上，郑维山已为此事专门给中央打了报告。

江青说：“我没看到啊！肖望东两次被捕。”她又转向大家说：“我看了你们的简报，会议还漂在表面上，很不深入。我看不要照稿子念，说错了也不要紧。不要怕人家抓小辫子，要抓大辫子。要有针对性，不要怕，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做主。”

江青终于收住话锋，示意别人发言。

天津驻军 66 军军长刘政从 66 军的角度想出这样的线索：“郑维山同志曾经问解学恭同志，66 军是不是和江枫有矛盾？王曼恬这个人怎么样？”

江青又插话：“你们军也是倒了霉的，也是叫陈伯达搞乱的，后来才好。我是称赞 66 军的嘛，依靠 66 军把这些坏人端出来的嘛。”

她指示刘政：“这个江枫，你们要好好搞一下，这个人不简单。江枫是陈伯达命令他去的，后来我们端出来了，陈伯达面无人色。我们是背着他的，如果告诉他坏了。解学恭同志要给江枫成立个专案组。”

解学恭立即回答：“已经成立了。”

接着是王曼恬发言。她发言后，江青又开始讲话了，还是针对郑

维山：“我和王曼恬就是这么个关系。郑维山你要查就查吧！先查我，再查她与主席的关系。好大的胆子，查到主席身上来了。你们有别的后台！”

郑维山后来回忆说，江青当时的这句话，让他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江青接着说：“68年端出个江枫，陈伯达是不赞成的。当时很多同志下不了决心，怕影响你们革委会，是我下的决心。陈伯达很狡猾，他仇恨革命，仇恨主席，仇恨我。”

“王曼恬揪出了陈伯达的几个心腹，当然他恨她。还有一个人在你们天津叫何其君，是陈伯达鬼老婆的什么人，自杀了，抹脖子了。谁知道自杀还是被杀。别看自杀，线索还要追。”

刘政说：“郑维山、李雪峰、陈伯达在天津和李树夫谈过。”

江青眼睛发亮，立即说道：“订攻守同盟嘛！”

她继续说：“郑维山的太上皇还有王力，是个小太上皇。河北省成立革委会，为什么非要结合杨一辰？你说是王力推荐的，那王力是你的太上皇了。这个人是叛徒集团的。”

“生气的事可多了。保定有个胶片厂，非常贵重的东西，一个手榴弹就可以全部炸毁。我要军管，后来38军军管了。这下可糟糕了，整天打，还要打江青。这一点郑维山你是有责任的！”

38军军长刘海清接话：“总理让派一个营，进不去，郑维山、陈先瑞不让派。”

实际情况是，当时周恩来指示，这支部队由卫戍区派，没有让北京军区派。

江青继续说：“在碰头会上，陈伯达对我说，你就是38军的口吻。38军我不认识一个人，河北省军区我也不认识一个人，我就认识一个军——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身边有4个工作人员，他们老家在河北。他们不敢告诉我千里堤都快决堤了，以后我才知道。”

“还有一件事，李雪峰成立革命委员会，从保定搬到石家庄，还有省军区。这里面有什么鬼？搬家后发了那么多枪。这个问题一定要交代，你们是不是想躲到后面去，让别人打，把38军打烂？是不是让

坏人冲到北京？我们看你们有这个战略思想，反动的战略思想，这个要交代。”

.....

“陈伯达67年要挟主席，不辞而别，后来走了，给我留一封信，就是在京西宾馆，就有你郑维山陪着。”

“你是大根据地，是反革命根据地！”

“你这个河北可不得了，保定的问题我愤怒极了。我愤怒是应该的。你们不珍惜人民的生命财产，就是珍惜你们自己的权。权是人民的，是党的。你们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脱离了人民，就会成军阀。我看会议看看日本的片子《军阀》。东条英机你们知道吗？他是侵略我们的大罪犯，这样的电影应该看，北京军区是不是要走上那条道路？这是很危险的。自觉不自觉跟着陈伯达走，也可能是自觉的，特别是郑维山、李雪峰！”

“我看郑维山、李雪峰的检查很不像样子。你们搬家，我看是有计划的，发枪就是要打38军。我并不认识38军，这是替党和人民说句话。”

“保定离天津这么近，天津为什么叫天津卫呢？因为它是北京大门，保定胶片厂打得那么厉害，口号就是打我。38军也进不去嘛！”

“郑维山，主席一再保你，可是你不跟主席走，跟陈伯达走。这一点我要告诉同志们，主席保了郑维山好多次，保了李雪峰好多次。你们不感谢主席，反而跟着反党分子陈伯达攻击主席，攻击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定是不管的啊，省革委会搬走，我看是同坏人弄到北京来，这是你们反动战略的目的，这个要交代！”

“主席保了你好多次，有一次照相，主席叫我找你，可是你不感谢，你辜负了毛主席。郑维山你好好检讨。我觉得郑维山还是可以改正的，最无动于衷的是李雪峰。他还在埋头记，你记好了，将来翻案可以整我！”

江青的思路又跳向别处：“《红旗》是个独立王国，总编辑、副总编辑都是大坏蛋，以后主席就不叫他管了，让姚文元去管，他恨透了主席。他对主席没有办法就恨我，恨姚文元同志。郑维山、李雪峰你们支持的就是这群王八蛋。陈伯达这个大坏蛋，他可能是苏修特务，他

和王明一块儿的。他自己说：‘你们可不要说我给苏修当特务。’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在庐山，我受了一天的围攻，我参加华东组。我是一个中央工作人员，我讲的很多话都是主席的，当然讲的不完全，有的不是原话。后来就点名了，华北组点了康生的名，华东组点了张春桥。他们要抓人了。李雪峰，就是你，你那份《简报》引起的，你叫你的秘书干的，你抢先发《简报》。有几个人签名啊？”

解学恭小声回答：“3个人。我、李雪峰、吴德。”

这时，江青死死地望着李雪峰，问：“你怎么抢先发《简报》？”

李雪峰不说话。

江青也不追究，继续说：“我听说王猛同志病了，住院。哪位同志代我问候？我并不认识他。当时我听说的，是陈伯达、杨成武商量好的，要把李光军、王猛调走。还有谁我记不得了……”

“要徐信同志去当军长。徐信来了吗？”说着，江青抬头扫视会场。

63军军长徐信站起来答道：“来了。”

江青问：“你知道吗？”

“不知道。”

江青继续：“李雪峰是摇鹅毛扇子的。保你好几次了，你无动于衷。”

“受气的同志，现在要翻身了，翻了身就容易翘尾巴，38军的同志要注意。我是不认识38军的，我是为了38军受气来啦！陈伯达镇压我好几次。我要求38军不要因为翻了身了，骄傲起来了，打个预防针。”

“陈伯达怎么出去的呢？要挟主席，不辞而别，就是在京西宾馆。”

“在华北组的《简报》上，有陈伯达的发言。陈伯达的发言，一个记录本，主席逼着他交出来，那是陈伯达反党啊！主席给了我，我送给了康老、总理。”

“主席要我们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不然会让人家牵着鼻子走，这是《我的一点意见》里讲的。不要畏难，我已攻读了4本，我就要读，为主席争口气。我已读了《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最后读老祖宗的《资本论》。不要上人家的当，听人家说马列的书难读就不读了，主

席的书难读就不读了。我被选进中央政治局，很不相称。你们虽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大军区、省军区、军的负责人，要懂得一点马列主义，必须精通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才能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你郑维山就是不学无术。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保你几次了，主席保你多次了。”

“我看他们事前有准备，郑维山、李雪峰同志要好好交代。这份《简报》是很不简单的，一早就交给了我，华东组也轰动了，点名要捉人，点了康生的名，张春桥的名。我没有参加宪法修改组，我要参加了，就要捉我。他们利用了广大党员对主席的热爱，好多人是上了当啦。郑维山、李雪峰同志我看不是上当的问题，你看二中全会前在华北那样搞。”

“温玉成也不好，我也不知道这个人，不认识这个人。对‘516’这么一个组织，不了了之。”

“你们卫戍区应该搞清，打我不是你们指使。你们应该把好几个人追回来，让他们交代，查清。不查清你们欠了一笔债，欠人民的，欠革命的债，不是欠我个人的！”

江青停了下来，王曼恬继续揭批。当她谈到文艺系统抓“516”问题时，江青又插话了：“……金敬迈是‘516’，他们在东北搞陈锡联，是打我的。你们对这些人亲，对我们疏，有时有敌视的味道。郑维山你要好好想一想，1967年冬，我见你，当时我并不认识你，保了你，当然也是为了保全军，这是应该的。金敬迈差一天就跑了，我们就抓不住了，是我告诉你。”说着，江青用手指向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望着江青，连连点头。这应该是说在广州抓金敬迈一事。

江青接着说：“派了一架飞机，从广州抓来的。金敬迈有交代口供。火烧英代办是傅崇碧布置的，北图事件是整我、总理、康老。午门会议是布置烧英代办的。大家知道一点，七凑八凑就搞清楚了，可是现在还都浮在面上。”

“叫宋伟来揭，不要怕嘛，有主席给我做主！”

这一天，江青讲了两个小时，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会后，江青为参加华北会议的全体人员，包括工作人员安排放映了影片《军阀》。

第 1158 回：在党内，陈伯达问题公开 又到会，江青成会议主角

1970 年 11 月 16 日，中央向地方的地区级、部队的师级单位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份《指示》指出：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为了教育干部，让较多的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中央决定将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向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项目组人员宣读和传达。传达内容要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为准。”

但是，这份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文件，直到 1971 年 1 月 1 日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发出。从这时起，陈伯达的问题在党内公开。

当 1971 年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北京京西宾馆里却没有多少新年的气氛。这里的批判斗争已经开始升温，郑维山、李雪峰等人被告知，要“闭门思过”，深刻检讨，不得离开京西宾馆。

此时，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周恩来都关注着这里的情况。

元旦这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分别告诉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要他们两三天内将华北会议开会经过和揭发陈伯达等人的情况作一系列报告送阅。

1 月 3 日下午 15 时，江青再次来到京西宾馆。当她走进会场时，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正在发言。看见江青进来，会场一阵骚动，几个工作人员忙着安排她入座。江青摆摆手，示意继续开会。

刘子厚说：“江青同志上次来讲话，把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具体化了……”

江青说：“我插一句话。我不是代表主席的，是代表我个人。我还没见到主席，我是请示了总理来的。我听了忍不住才讲的。如果我讲

错了，同志们可以批评，讲对了可以采纳。不要认为我说一句话是代表主席的。叶群同志代表林副主席没有，我不清楚。我没有。我连面也没见过主席，在你们这开了会，第二天才见了主席，不要以为我讲的就是代表主席、代表林副主席的。如果代表主席，我就记录起来拿来念了。我个人的意见，如果错了可以批评，如果对了，我坚持到底。”

刘子厚继续发言。当他谈到陈伯达打着中央文革旗号四处活动时，江青又说：“他的画皮！中央文革这张画皮实际他早就不要了。他打着旗号，他说他是中央常委，是太上皇就是了！”

刘子厚坐下。接着，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正光发言。当他讲到北京军区文工团抓肖华、抓杨勇、关郑维山的一些情况时，江青听不下去了，开口说道：“哪个说中央文革开了会？你又讲杨勇，又讲郑维山，我就不叫你讲了！”她皱紧眉头对张正光说：“当时是怕北京军区大乱。”

张正光低下头，只好改变话题。

这时江青的突然说：“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很好。应该把王××、吹小号的，还有一个……”她低下头，一时想不起名字。“应该找回来重新审查。还有个叫章亦敏的，一个叫石仰天的。看看章亦敏的档案就知道是特务。石仰天这个王八蛋公开反对我，反对我也不要紧，但他是不对的，他是北京军区的吧？还有一个丁莱夫，石仰天就是和丁莱夫起来要翻案的嘛！”

章亦敏，时任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

石仰天，时任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

江青继续说：“我听说这几个人还在大摇大摆的，”说到这里她动了气，指着郑维山说，“郑维山，是不是这样？对这样的人根本没人管！”

没等郑维山回答，江青已转向王曼恬说：“王曼恬，你起来说！”

话音未落，王曼恬站起身：“章亦敏原在北京军区组织专案组，没搞出问题，结果解散了。样板团要批斗他，把他领章、帽徽扒掉才能批斗，说明北京军区没人管，后来逮捕了。”

江青示意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正光继续发言。但是他没讲几句，江青又插话说：“同志们，我还想打断他的话，再提供一些我记录的材料，供同志们参考！不知有没有机会……”

“八条是怎样来的？就是陈伯达这个王八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几个老总压着林副主席要文化大革命刹车，逼着林副主席搞了几条。林副主席说要到中央文革讨论一下，到中央文革，陈伯达坐到了后面。徐向前这位老帅站起来拿着几条就走，说要去找主席批准，我说我们还没讨论，给追了回来。”

“67年7月，主席出巡大江南北，7、8、9三个月，这些反革命他们就想在那个时候夺权，全部夺权。有什么为证？首先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北图事件，午门会议。午门会议就是布置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样的围困中南海，开始在西门，就出不去了，我就告诉总理说，不行了，北门走不了啦，然后又到新华门，那里挂了旗帜，也出不去。我们的意思是叫他们撤退。最后走东华门，那里也挂了三面旗帜。我给总理说，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我们上了大当，他们都安排好了，有一个人，这个人我看不惯他，眼珠子上下转的，是轻工学院的，给总理讲，提出要在天安门开10万人大会，在中南海里面斗刘少奇，总理答应了，我们都同意了，给中南海拉了线。他们要斗刘少奇那个‘黑修养’，目的是搞臭康老，因工作关系，那个‘黑修养’，康老搞不出来，是陈伯达搞的。他们就是要搞康老，搞总理，过后我们才知道上了大当。”

“以后主席到武汉，好人都蒙在鼓里，说陈再道要杀害主席。我们着急得很，这个也上当了。林副主席也上当了，也开了天安门百万人大会，声讨陈再道。实际是王力回来把主席的指示给扣了起来，给贪污了，我们不知道。……这次庐山会议，他（陈伯达）被揪出来后，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了。他们军队的后台是杨、余、傅，想把几个大军区都搞掉，想把紧跟主席、林副主席南征北战的老同志一网打尽，换上他们的人。……那时南京已经平静了，就是主席已经到了上海，他们要开几十万人大会，要揪许世友同志，许世友同志已经退到了大别山。”

北京军区一位副司令员补充说：“当时要揪许世友同志，反27军，姚文元打电话说，这个会不能开。”

江青接着说：“我们得到一份东西，一看就知道是一箭双雕，危害主席，捉许世友，我打电话制止也不行。深夜了，我去大会堂请示总理，派一架高速飞机叫姚文元到上海报告主席。结果给了一架小飞

机，差一点把姚文元给触电死了。”

江青看着大家一脸困惑，解释说：“因为飞机小，飞不高，碰上雷电，差一点把姚文元触电死了。”

“姚文元向主席汇报了，主席就请张春桥乘了直升飞机把许世友同志接到上海。他（指许世友）自己还在那里不自觉！他是同情我的。还有你，”江青突然用手指向坐在附近的黄永胜，“也不自觉吧？！”

黄永胜被她一指，显得有些慌乱，不知该不该接茬。

江青仍自顾自地接着说下去：“金敬迈开会整你。就是说凡是跟主席、林副主席南征北战的老同志要一网打尽，这样来适应反革命的需要。这是他们的反革命战略。这一战略被伟大领袖毛主席击溃了。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很危险的事情啊！”

“还有抢档案，抢中央首长的医疗档案，我顶不住了，就请总理，我们俩一块顶，还是被他们抢了一些。这些他们都是合伙的。他们称赞杨成武，称赞傅崇碧、余立金。你，也是被称赞的，”江青指着郑维山，“郑维山你应该讲讲内幕，他们就不捉你。杨得志也是很不好过，傅崇碧这个王八蛋也是这样。你们想想看，他们是有计划地夺军权，有计划地夺党权，庐山会议就是夺党权，你是夺军权的！”

“这些我都不知道！”郑维山脸色铁青的说。他想反驳，但无从开口。

江青自顾自的接着讲：“阶级斗争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既然你们背后搞阴谋，那么也奉陪到底！”

江青接着说：“……他们要抓许世友，就是主席在上海。抄了许世友同志的家，抄了陈锡联的家，别人的家都抄了，唯独没抄你郑维山的家，这证明你是知道内幕的。”江青又转向黄永胜，“我不知道抄了你的家没有？”

黄永胜铁青着脸回答：“没有。”

江青提高了嗓门说：“都是‘三团两队’，‘天派地派’带头搞的，大后台是陈伯达，杨、余、傅他们。毛主席告诉我叫杨成武看看林副主席，他都不去。你们知道不知道，丑化人民解放军，搞黄色的东西，天安门、三座门贴得到处都是，故意丑化解放军！”

“三团两队”是指各大军区的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

工队。他们在文革初期是军队造反最早的单位。

江青又说到陈伯达：“陈伯达，我只举一个小例子，就知道是什么人……”

“天才理论家是陈伯达创造的，大树特树也是他创造的，我跟杨成武斗了3次，杨成武给我立了专案，戚本禹也给我立了专案。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清算一下了。67年7、8、9三个月，他们想大夺权，在全国大夺权，先搞乱军队，然后危害主席。你们是有一套计划的，你们应该交代。”

“为什么各大军区都捉，就不捉你郑维山，这不是怪事吗？起码你是深知内幕的人。噢！还有一件事，从聂荣臻开始，华北的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杨成武、你郑维山，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全国解放后各战略区的部队都有减缩，为什么唯独你华北的部队没有缩减？！”

江青又一次提起城南庄事件。这一回，她点了聂荣臻夫人张瑞华。

“你就相信聂荣臻、徐向前。我怀疑徐向前的老婆黄杰是叛徒，聂荣臻的老婆可能是特务。有一件事，48年主席由延安到华北，住在华北军区司令部驻地的阜平县城南庄，结果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是否张瑞华告的密？如果你的心还有一点向着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话，你就应该把这一点心交出来，把好心拿出来，把坏心去掉。”

江青又转向李雪峰：“李雪峰，你是个摇鹅毛扇子的，到现在还奉陪到底。我今天很累了，我是特意来奉陪你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反革命战略，他们一层层班子，一套套班子。”

众人以为江青的讲话要结束了，谁知，只听一声“对了”，已经“很累了”的江青又继续说着：“还有一个‘7分钟的闪电’，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题外的就不讲了。是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提供的汽车，提供的大衣、手电。”

王曼恬补充说：“发枪是那一年。”

“7分钟闪电”说的是1966年12月3日晚，叶向真他们劫走彭真一事。而王曼恬解释说“发枪是那一年”应该指的是1967年武装左派

时北京给北航和地院发枪。那一年北京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曾通过戚本禹、谢富治向在首都工作组工作的杨成武、郑维山提出借用汽车和军棉大衣。当时杨成武和郑维山说“部队动一兵一卒和军事装备都须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没有答应。而1967年李冬民提出借汽车和军棉大衣显然与1966年12月3日叶向真劫持彭真一事无任何关系。

此时的江青继续按照她的思路对郑维山说道：“67年7、8、9大夺权，还有二月兵变、北图事件、午门会议、火烧英代办，你也是深知内情的，应该交代！”

郑维山终于忍无可忍，大声吼道：“这些我都不知道！我相信主席和中央是会审查清楚的。”

一位军政委站起来质问：“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你怎么不知道？！”

郑维山大声反问：“谁能证明我知道？！”

无人应答。

江青继续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陈锡联就怕张祥久，我说非下了他的枪抓起来不可。关锋的女儿就在东北，是‘516’穿了军装，原来是不是躲在你们海军大院？我不相信你郑维山还有那么点心，就算几分之几的心吧，你是最知内幕的。”

“李雪峰你就恭恭敬敬陪着那么一个人，你跟那么一个人走。据说天才两个字，英文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神，神就是鬼，一种就是人。我对英文不懂，听人家说的。这一炮不一定打中。”

江青长出一口气，向椅背靠去说：“我讲完了，不对的请批评，我改正。对的，大家要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

第1159回：赶紧追，哪里去了黄道霞 细交待，三天白了秘书头

江青的发言真的把会议的温度升起来了，随后的揭发批判开始了，一位军政委对着郑维山说道：“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

一位军长也站起来，手扶着桌子，盯着自己的上级说：“郑维山一贯不老实的，一贯说假话的，现在该说真话了！”

看郑维山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一位省军区司令斥责说：“节节抗拒，反抗到底！”

一位军区副政委也质问道：“坏蛋为什么都来找你，你要交心！”

另一位军区副司令员说：“你有什么要老实交代什么！”

郑维山皱着眉头，还是一言不发。

这时，江青仿佛又想起了什么，对着众人说：“我打断你一句话，一会儿你还讲。我刚才讲话是专门请人录了音的，如果你们要，可以复制给你们一份，但要请示总理批准，政治局讨论。”

黄永胜似乎颇有感触的说到：“原来在北京也这样不安全。”

江青接过来说：“幸亏我有斗志，否则就完了。杨成武出事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我问是谁，就把电话放了，后来我的秘书告诉我，你不放下可以查。还有一个凶得狠的女的给我打电话，在北京那样不安全，又打电话，又爬墙，不安全就是了。李雪峰66年讲要给我奉陪到底，我只要不死也奉陪到底！郑维山你要开枪权、扫荡权，这回该我了！”

对于江青耿耿于怀的“奉陪到底”几个字，此时李雪峰解释说：“当时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思想不通。”

江青说：“现在应该通了吧！你恭恭敬敬地陪着陈伯达，你在河北干了些什么事？你把黄永胜的名字画掉那么多次。《河北日报》是你管的吧？在北大你想不通，现在你还是这样，一点不觉悟，你为什么还煽风点火？”

李雪峰知道江青这次指的是庐山会议上的《六号简报》，于是申辩说：“在庐山是陈伯达突然来的，《简报》是我签的名，什么时候发的我就不知道了。”

江青挺直身子，拍着桌子上的几张纸，大声说：“你抢先出《简报》嘛！”

李雪峰继续辩解：“当时规定《简报》要快，晚上讨论，汪东兴同志去了，《简报》另外发的。”

“汪东兴同志为你的《简报》都气坏了，每天到3点他还陪着主席，你们签发的嘛！你们抢先出《简报》！”江青说，“《简报》最早发出，这怎么解释？”她继续追问。

黄永胜也大声说道：“大事？每期《简报》都是大事！”

江青看了一眼黄永胜，说：“这个没有录音，还有个绝招，《简报》是记录稿，还有个原稿，是陈伯达亲自改的。”

“那天我和康老正在开会，总理派人送来了陈伯达的发言稿，不是记录稿，我们与陈伯达干了一仗，说他真狠毒啊，你想把毛主席周围的人一网打尽。从此再没见过这王八蛋。我当时讲，你拿了枪杀我的头好了，你们就是跟这样狠毒的人走啊！你们怎么解释呢？真狠毒！就是要颠覆我们国家，帮助苏修，颠覆世界革命根据地，这能容忍啊！”

“陈伯达如果当了副主席，你们不就是大臣了嘛！陈伯达不是要当副主席，其实要做主席，说穿了就是这个事。这样你们不就可以升官了！”

这时，有人喊：“《六号简报》是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写的，他一直跟着李雪峰，这中间有什么鬼，他应该知道。”

“你们说的那个黄道霞来了吗？”江青马上问。

“来了。”有人应了一声。

“那好，叫黄道霞来。”江青说。

可是，会场里哪有黄道霞的影子。

江青尖声质问：“没来？！怎么没来？”

“他回石家庄了。”刘子厚低声答道。

江青急了，冲着陈先瑞大发脾气：“他干什么去了？谁让去的？我已经知道，为什么逼他走？”

“我们已经派了两个车去追了。”陈先瑞报告。

原来,听说华北会议要追查陈伯达在石家庄的讲话及他在华北地区的所为,李雪峰生怕有一句话与事实有出入,别人就会觉得你交代问题不老实,在编造。而他来北京之前没有想到要带陈伯达在石家庄讲话的记录,他以为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北京军区和郑维山的问题,没有意识到对他牵扯那样重。而且一批李雪峰,他的秘书黄道霞就犯糊涂,一发急,更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因此,当会议追查到《六号简报》问题时,黄道霞提出来,要回石家庄取材料。那时,李雪峰没同意。后来,周恩来指名要黄道霞在会上发言,李雪峰这才点头同意黄道霞回石家庄,反正河北驻京办事处有车,也方便,快去快回。事不宜迟,黄道霞要了车,吃了中午饭就走了。谁知就在当天下午15时,江青又到会上来了,而且点名要见黄道霞。

此时,江青指着李雪峰说:“这个你要交代哟。”

黄永胜也说:“昨天开会通知要你的秘书揭发问题,你把秘书派走了,就很恶劣嘛!把罪证烧掉就坏了!”

“这里边有鬼!”有人随声附和。

“李雪峰同志,我现在还是叫你同志,你如果受委屈了,也要有政治家的风度,你的秘书干这么多的坏事,还叫他走了,我要是处在你这种情况,我就把秘书交给组织,交给党审查!”江青说。

“总理批准叫你的秘书今天下午参加会,结果走了。”纪登奎说。

“陈伯达也跟你一样,那个王保春,下了几次命令才找回来,你这个做法与陈伯达一样,你要把秘书赶快交出来!”江青说。

李雪峰辩解道:“我这里材料少,叫他取材料。”

黄永胜追问道:“你为什么不同一问?!”

李雪峰并不清楚,他的秘书此时去取材料和之前去取材料有什么本质不同,还是李德生点醒了他:“不少同志提到,你的秘书要参加会,揭发你的问题,总理今天下午批准,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把他放走了。”

江青声色俱厉:“到哪去了,赶快交代!”

她马上又对陈先瑞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文玖说:“要活的,不要死的。”

原来江青担心黄道霞会因为知道李雪峰的阴谋而被灭口。

“我们有人跟着，不会发生问题的。”陈先瑞赶紧说。

“你告诉我河北省警卫部队是哪个部队，负责人是谁？叫把秘书抓起来。”江青仍不放心，她抬起头环视会场：“哪个叫马辉？”

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站起来，立正回答：“我在。”

江青严肃地盯着马辉说：“现在我才知道你叫马辉，你要负责把人抓回来！人要活着回来，死了我找你！”

黄永胜强调：“一、人要抓回来；二、材料一份不能烧！”

马辉大声回答：“是！”

这时，在河北省革委会支左的炮 5 师政委问：“现在是不是把秘书、警卫员都抓起来？”

江青没有接茬，她无暇理会这句话，继续她的思路说：“出了新闻了，你采取什么态度？我觉得李雪峰太不老实了！”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可以要驻石家庄的 27 军负责把李雪峰的秘书抓回来。”

“不！”江青断然否定，“主要由马辉负责，他的秘书要死了，他的材料要烧了，你要负责，向党负责，要活的，要能说话！”

黄永胜说了一句：“还是不要这么紧张，要做工作动员他回来。”

江青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态度有些过于夸张，解释道：“我就是想建议同志们，不一定全面完整。我想把 66 年、67 年、68 年、70 年，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告诉同志们，请同志们琢磨一下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的斗争，要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我看斗争十分激烈，也许我这个纲上高了，上高了就降下来，刚才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人走了还不知道，而且还拿走了材料。”

再说黄道霞，当晚到石家庄刚一进屋，警卫就告诉他北京有电话找他。黄道霞马上就明白了，他往北京打完电话，向爱人交待了情况后说：“李雪峰一倒台我就要被关起来。”随后，他三言两语写好了离婚书，让爱人在上边签字。他爱人想也没想，把离婚书撕了。

这时，警卫打来电话说：“北京军区来人接你回去开会，门卫没让进。”

黄道霞要值班室找车马上回北京，一看表已经是夜里 23 时多了。

司机路不熟，绕到次日早上7点多钟才回到京西宾馆。于是，会议认为这是李雪峰又在搞阴谋，把黄道霞从石家庄带来的材料全部没收了，还规定李雪峰的秘书、警卫、司机都不能单独行动。李雪峰的窗户也被封了，外面另派警卫看着，黄道霞从石家庄回来也不让见。

这天上午不开会，刘子厚让河北省革委会的赵江告诉黄道霞，下午上会发言。

这时，会议已经从全会扩大到地市一级，河北省各地区军分区的司令员、革委会的领导都来了。下午的全会扩大会，有近100人参加。纪登奎、李德生、黄永胜、邱会作来了，李雪峰和郑维山也来了。江青和周恩来没来，但他们派了人来听。叶群则在后边的屋里听。黄道霞讲了一下午，讲《第六号简报》是怎么出来的，讲李雪峰与陈伯达的关系……

说起来，在中央全会上，各个组都要出简报。但华北组已经出过一份简报了，六个大组一个大组出一份简报，再排到华北组出第二号简报，应该是全会的“第七号简报”，而不应该是“第六号简报”。这说明，各个大组的简报还没出一轮，你华北组就抢先出了两份简报。当时，第一、二、三期《简报》已经印出来了，四、五期《简报》编了号还没印发，而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却印出来了，而且还发了下去，这是怎么回事？难怪毛泽东要怀疑。

对此，黄道霞解释说：“简报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管，还要印刷，因为不是在北京，是在江西，为了保密的需要，中央机要局没有去很多人，捡字只去了一个工人，印刷三个人。所以四号、五号《简报》送了，编了，但排字没排出来，所以就没发。”

那么，《第六号简报》为什么就能排出来并印发呢？对此，黄道霞和李雪峰就不知道了。因为排印都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的，这一情况，不用黄道霞再多解释，与会者也都清楚。

华北组二号简报，即《第六号简报》是黄道霞写的。黄道霞是李雪峰的秘书没错，但这次在庐山会议上，黄道霞不是以李雪峰秘书的身份，而是作为中办简报组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华北简报组工作的。黄道霞说，华北组负责简报工作的有3个人：一个是黄永胜的秘书王振，另一个是吴德的秘书，加上黄道霞。当时吴德的秘书另有任务，写简报

的事情就只有王振和黄道霞了。王振是部队来的,写简报是新手,他就推给黄道霞,华北组第一个简报就是黄道霞写的。

说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简报工作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而不是李雪峰的华北组。简报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召集简报组,交代任务,提出要求。简报写好后,由中办主任汪东兴和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签字,然后才能付印。

在这里,黄道霞没有再牵扯郑维山的秘书杜辛。

黄道霞还讲了《第六号简报》的写作过程:

那天晚上的会议,李雪峰没有参加,到政治局开会去了。华北组开会前,黄道霞把写好的《简报》交给他,李雪峰说:“先放那里,等我开完会回来再看。”

那天晚上,政治局的会议临时决定不开了,李雪峰回到华北组时,小组会还在进行,一直开到夜里 23 点多,黄道霞晚上 19 点多写好的《简报》稿已经在李雪峰那里压了 4 个多小时还没签发。

这么一说,基本把《第六号简报》说清楚了。李雪峰对《简报》积极是积极,但《第六号简报》并不是抢先,起码拖了四、五个钟头。黄道霞说他自己倒是有抢先的情绪,因为根据简报要及时的要求,是想快点发,但实际上并没有抢先。

黄道霞讲完,38 军军长说:“讲得很好。”

这个发言,黄道霞作了充分准备,因为实在是事关重大。讲了要让人相信。这是当年发生的事,他担心,当事人都在,有一点不合适,人家就会觉得你在编造,会觉得整个都不行。另外,他也希望能打破人们头脑中,他是“追随李雪峰”的印象。为了这篇发言,黄道霞一个晚上没睡。讲完后,他觉得太累了,回去吃完饭就睡了,一直睡到夜里 23 时左右。纪登奎派秘书来找他说:“你今天讲得挺好,赶快整理出来。”

黄道霞连夜整理了一个简报。当时才 30 多岁的黄道霞,就这 3 天,头发白了。

后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扬了黄道霞,说:“这个秘书实事求是,有党性,他讲的和我们分析得差不多。”

第二天,纪登奎找黄道霞谈话。他相信黄道霞讲的,说:“你发言

的简报江青也看了，送给毛主席，毛主席不信。”

后来，纪登奎代表江青第二次找到黄道霞说：“江青觉得你讲得很好，但还要再深入一些揭发，有什么遗漏？”

他又问：“李雪峰为什么让你回石家庄取材料。”

黄道霞说：“因时间太长，李雪峰记不住了，担心怀疑他捏造的，所以要找当时的记录。”

纪登奎说：“恐怕没这么简单，是准备翻案的吧？”他让黄道霞把庐山会议那天，小组会上发言的那些人排个次序，弄清楚都有谁发言，讲了些什么？

但是纪登奎和黄道霞还没有谈完，有人来通知纪登奎，毛泽东找他过去，纪登奎就走了。

第二天，纪登奎又来找黄道霞进行第三次谈话。这一次纪登奎的口气变了，说：“毛主席认为没那么简单，毛主席最大的不相信还是认为《第六号简报》有问题。”华北会议要求继续深挖下去。

第 1160 回：“要谨慎”，转济南军区报告 见斯诺，谈文革生产情况

1月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关于华北会议情况的汇报。会议认为，现在华北会议已进入高潮，在这种情况下，需注意加强领导，减少对立，以利团结。

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姚文元1970年12月29日关于学习问题向毛泽东的报告和毛泽东、林彪对该报告的批示，决定将批示和报告以中央文件印发中央委员和省、军级干部。

当夜，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政治局讨论情况，进一步提出：对郑维山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在经过“认真的批评”之后，“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否则，定性在先，非打成‘三反’不可，那就不会实事求是，不合主席对‘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的要求”。

1月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黄永胜、李德生等人开会，谈如何开好华北会议以团结全军。谈话中对李雪峰、郑维山进行了批评。

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后，军委办事组连夜开会，研究落实的具体办法。

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上，周恩来说：“主席、林副主席一直关心这个会，常问起来。李雪峰、郑维山同志发言简报3日送主席，我们4日向主席汇报。”

“第一，我们的意见与你们有相同的，有不同的。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会已经是高潮，你们认为未揭开盖子。我们报两种意见，一种李、郑与陈一起打倒，军区改组；另一种认为是方向、路线错误，要检讨……”

“说盖子未揭开，任何实质性问题未揭盖，也说得不对，如磁县开枪，就承认了嘛！”

“原想找郑、李谈，后加上解学恭、吴德、郑三生、先瑞、于厚。之后

有主席批示，按主席批示办，全国团结起来，与陈伯达划清界线，肃清流毒。个别犯错的沉痛检讨，要深入地整风，要彻底。”

“第二，先不定性。”周恩来望着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说：“你们四人写陈、郑、李集团，做绝了，那他们就只有听候审查了。当然，即便是方向路线错误，李、郑也要沉痛认识。”

“不要打横炮，省与省，军与军，一股绳有力量。”

“有点自我批评就欢迎。各种材料你们要核实，也不要都连起来。抓住大的，丢掉小的……”

“抓大的，小了就繁琐。人家提出你承认就好，不要一会儿翘尾巴，一会儿没有事。”

“郑为什么跟陈、跟聂、跟杨、跟张国焘？作风不正要抓住。”

“郑不要失去信心，又不要放下去，水平低，抓不住要害。”

“主席的印象是听不清楚。”

“陈伯达总有私话，好好挖一挖。”

为了组织印发江青在华北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周恩来报送毛泽东。

1月6日，周恩来先后向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华北地区党政军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意见，就落实毛泽东的意见，扩大华北会议范围做出安排。会议要求，郑维山、李雪峰不出席常委会，自行检查。

当天，毛泽东对周恩来报送的江青在华北会议的两次讲话记录稿批示说：“讲话不要印发。”

1月7日，周恩来通知郑维山、李雪峰写一个像样的检查。

这天，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当天报送的关于如何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对落实毛泽东1月5日晚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指示，做出六项具体安排。其中第六项说：“为集中大家注意力，拟印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十二月十六日、十九日两次批示和有关报告，及中央有关文件，编印华北会议的材料七件。另拟将江青同志两次讲话录音，加以删减，给大区同志放听。”

毛泽东批示：“照办。江青录音是否放听，请先将文字送我看后再定。”

1月8日,毛泽东看了济南军区政治部1月5日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和总政治部的《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在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的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

毛泽东批示:“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毛泽东在报告中“无限的精力”一语后批注说:“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

当天,林彪对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批示:“完全同意,希望按主席批示认真落实。”

当天,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批示印发政治局成员。

1月9日凌晨,周恩来致信江青说:对两次录音讲话的整理稿“我勾掉的几处,有的案尚未结,有的牵连太多,与主题无关,可以去掉”。对讲话中点名批评的情况,周恩来指出:“这样点名,未经讨论,恐不恰当。”并告:“主席在六日批示:讲话不要印发。七日批示:录音是否放听,请先将文字送我看过再定。我建议,你将这两次讲话录音的文字本先呈主席审阅。”

当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济南军区报告的批示,一致认为当前应以批修整风的自我教育运动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中心。会议还讨论了华北会议的情况。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近期将专门召开一两次政治局范围的批陈整风会议。

这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召开有总参、总政、总后,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及各军种、兵种负责人参加的143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黄永胜代表总参作军事工作报告,李德生代表总政作政治工作报告。座谈会自召开的当日起,也到京西宾馆列席了华北会议。

座谈会期间，吴法宪说：“我们军委办事组是不是在会议上作一个检讨，也好下个台。”

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纷纷数落他说：“屎不臭，挑起臭。”

吴法宪说：“我和叶群已经检讨过，虽然挨了批，总算有个交待。你们3个人没有写过检讨，不如借此机会作个检讨过关。”

黄、李、邱说：“你检讨过不了关，我们的检讨也过不了关，一样的。”

座谈会的简报上称军委办事组：“对毛主席跟得最紧”，“突出政治，狠抓根本”，“谦虚谨慎”，“办事认真”等等。

吴法宪认为：“这个话反映上去不好，让毛主席看到对我们不利。”

有的人不同意吴法宪的意见，这些简报就这样送上去。

1月9日至11日，在军委座谈会上，郑维山、李雪峰又作检查。

由于江青在会上说李雪峰把河北省省会从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检讨了此事经过：“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后，陈伯达直接出面在筹备会上讲话，进一步打击38军，压迫另一派群众组织。他策划了省会搬家，先由他出主意，我和郑维山同志同意，两人联名写了报告，用他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

与此同时，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向中央请示，提出河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好。周恩来批示：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

1月11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通知指出：

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妨碍极大。通知要求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学习济南军区报告的“三破三立”，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

这天，周恩来将江青在华北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录音整理稿报送毛泽东，并写道：“七日晚得主席批示，于次日告江青同志，昨晚商定将整理原稿划有我们拟删节处送主席审阅。现送上，是否在会上放听，请

主席审定。”

1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黄永胜、纪登奎、李德生关于华北会议情况汇报，商定召开大会及结束会议的安排。

13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11日送来的江青讲话整理稿后批示：“不要放听，也不要印发，可做内部材料保存。”

毛泽东收到上报的《华北会议对郑维山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和《华北会议对李雪峰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在揭发郑维山的材料中，列举了他的六大罪状：

（一）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活动。

七〇年六七月间，反党分子陈伯达到华北地区进行阴谋活动，郑维山同志是陈伯达这次华北之行的召集人。陈伯达到天津后，打电话要郑维山去，当时郑准备给林副主席汇报，林副主席处叫郑等几天……经过请示，黄永胜同志不同意去，没有去。后来，陈又从太原打电话，郑说“事不过三”，就于七月九日迫不及待地赶到大同去迎接陈伯达，准备去内蒙……

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郑维山于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到李雪峰住地，同李谈了一个多小时。据透露，郑在谈话中要李到北京、到军区工作。在全会上，陈伯达选择华北做反党阵地，搞突然袭击，郑维山积极响应。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郑维山、李雪峰在庐山上就商量好，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传达，分片进行，不集中学习和传达。郑还说，要防止有坏人利用陈伯达问题，破坏华北的大好形势……

郑维山主持的北京地区的传达，只讲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几张画皮、几大谎言，没有传达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的内容，没有组织讨论和揭发批判。黄永胜同志看了军区党委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报告后，指出这个报告很不像样子，要重写，要表态，要揭发，要批判。军区才在九月二十日召集军区司、政、后各部领导同志开了半天会应付了一下，根本没有揭发问题。

.....

与会同志指出，郑维山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如紧跟罗瑞卿搞大比武……紧跟杨成武，大搞山头主义、宗

派主义；这次，又紧跟陈伯达，错误十分严重。许多同志说，北京军区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五保卫”任务，像郑维山这样的领导，将把部队领到哪里去，我们很不放心。

(二)伙同陈伯达压制三十八军、破坏保定文化大革命。

.....

(三)伙同陈伯达在天津包庇坏人。

六七年五月底，天津市王亢之（原天津市委副书记、叛徒、日特）、方纪（原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风分子、周扬死党）、李树夫（原天津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陈伯达心腹）等为逃避群众的批判和斗争，窜来北京。六月四日，陈伯达通过李雪峰让郑维山同志替他们安排住处，保护起来。五日凌晨，郑即派人将王、方、李接往军区高干招待所，提供吃、住、通讯等一切便利条件，住了四十多天。

六月二十四日，郑维山和陈伯达在陈的办公室，与王、方、李等人密谈四个多小时。六月二十六日，陈又单独把郑找去布置说：“叫他们（王亢之等）先别站出来，避免嫌疑。”六月二十八日，郑又要这三个坏人把陈伯达二十四、二十六日的两次谈话内容，向李雪峰、解学恭等同志作了传达、布置，帮助这些坏人钻进天津市革委会。

六七年九月，李树夫被天津市革命群众揪斗，陈伯达叫秘书给郑维山打电话，说：“陈伯达讲李树夫是他派去的，根本不是什么‘五一六’分子。郑维山立即把这个黑指示通知了天津支左联络站。群众组织便把李树夫放了。

(四)耍两面派，说假话，向中央谎报情况。

.....

(五)关于武装群众问题。

六八年二月，河北省磁县两派群众武斗，郑维山违背中央指示，向部队布置说：“如有坏人抵抗，可以开枪，还击只能起威胁作用，一个点只能打死二三人，不能多了。”结果部队开了枪，消耗子弹一万多发，群众亡几十人，伤者很多，至今还扣押着五十七人。

六八年春，晋东南地区连续发生武斗。郑维山在中央解决晋东南问题的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受到江青同志的严厉批评……

(六)严重的军阀主义、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

郑维山一贯排斥异己，用恶劣的手法，扩张自己的山头.....

杨、余、傅反党问题揭开后，郑因追随杨成武搞“多中心”，受过批评，作过检讨。后来，他又搞“以郑维山为首的北京军区党委”。去年七月，又对反党分子陈伯达喊“以郑维山同志为首的内蒙前线指挥所”表示默认，他旧病复发，明知故犯。

1月15日，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斯诺就中国问题长谈。他向斯诺提供了有关中国国内生产情况的数字，认为总的形势是好的，基础经济受到的损失是相当有限的。

在谈到精简机构、下放干部问题时，周恩来说：“从前在城市里工作的有能力的干部，经过‘五七’干校的再教育之后，将到各地去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或者已经去了。加强从前属于中央政府现在下放给地方机构的工矿交通运输部门的领导，需要很多人。”

1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关于华北会议情况汇报，并商定召开大会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浙江省党的代表大会及人选事。

第 1161 回：大改组，华北会终于结束 发文件，陈伯达罪行材料

1月1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北会议问题，认为会议可以准备结束了。今后两天内，拟续开小组会，再听取大家意见，但也要注意自我教育的整风作用。最后，需有人代表中央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会上还研究了华北地区军政领导人调整安排的设想。

1月2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当天，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华北会议及北京军区司令员等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

“华北会议大会发言，已于昨日讲完。政治局昨夜开会认为，会议可以准备结束，最后政治局需要有人讲话，已商定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三同志今日拟一讲话提要，报请主席批准后再讲。”

报告还说：“即使中央指出李雪峰、郑维山错误，还不应与陈伯达放在一起，成为陈、李、郑反党集团，但用二分法清理他们错误在华北所遗留的后果，确需在会后进行一段艰苦的教育工作，如北京军区、华北局旧机构、河北省革委和河北省军区、天津市革委。而军队的团结，军民的团结，各地各单位的群众关系。连山西、内蒙在内，都需要很慎重地加以处理。因此，中央的发言和会议的传达，要很好地掌握分寸，有步骤地进行。”

报告建议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河北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三生去加强，内蒙古前指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主持，总政主任调张才千担任。

毛泽东批示：“照办。”对报告中的“在一两天内，希望主席能约我们一谈”一句，毛泽东批注“大约可以”。

1月20日至22日，周恩来审改了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起草的《在华北会议的讲话提纲》稿，并于22日将此稿送达毛泽东处。毛泽东批示：“已看一遍，大体可用。明天可能谈一次。”

22日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修改提纲稿。

因为23日下午就要召开给华北会议最后定性的政治局会议了，23日凌晨，周恩来约上李先念，安排与郑维山、李雪峰谈话。

郑维山早已等候在会议室，偌大的会议室只有他一个人。不一会儿，周恩来走了进来。

郑维山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总理，我不再作检查。”

“为什么？”

“因为情况明了，性质定了，决心下了，我等待审查。”

周恩来没有接这个话茬，而是问郑维山：“身体还行吧？”

郑维山说，多年的失眠症更严重了，每天都睡不着。

周恩来望着一脸倦容的郑维山，说：“主席叫你们好好想想，睡不着觉是好事，军区、省市总会有意见，要好好地学习，痛一下有好处。比如王诤、曾希圣、陈毅，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至于参加他们的会，可以不参加。23日文件要整一下，要秘书帮助一下，挖深一些，明天大会讲还可以帮。”

“……内因为主，秘书还可以帮。……有人帮助，好好想想，不要推。多找一些引起对自己意见多的，华北局还有人。”

1月23日晨，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谈话，商定《在华北会议的讲话提纲》。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提纲稿再做修改后，于当天下午，先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又召集有华北会议及军委座谈会各组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征求对《在华北会议的讲话提纲》稿的意见。此稿获绝大多数与会者赞同。

当夜，周恩来将提纲修改稿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在送审报告上批示：“同意。”又在信封上写了：“完全同意。”

1月24日晚21时，京西宾馆大礼堂里坐满了参加华北会议和军委座谈会的人员。

周恩来出现在主席台上，他被指定代表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总结。江青、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和军委办事组的其他成员也相继就座。

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提出了陈伯达的历史问题，说他曾被捕叛变。

讲话中历数了陈伯达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指出：这次会议通过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更加认清了他的反党罪行，进一步同他划清了界限。

讲话认为：“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李雪峰积极配合，郑维山表态支持。李雪峰有布置地抢先出《简报》，大造反党舆论，发出了向党进攻的檄文。李还煽动几位工农同志发言，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事后又推卸责任，嫁祸于人。陈伯达被揭发后，李还背着中央，为陈伯达打掩护。

九届二中全会后，李雪峰、郑维山违背中央指示，对陈伯达的反党问题不认真开会传达，不讨论，不揭发，不批判，仍然站在陈伯达一边。毛主席路过石家庄当面对李雪峰作了重要指示，李还是执迷不悟，存心抗拒，既不揭发陈伯达，也不交代自己的错误，更未向党的核心小组传达。”

周恩来同时指责李雪峰、郑维山“一贯地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

讲话说：“李雪峰和郑维山，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一个是军阀主义，作风严重不正，这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

李雪峰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人说了算，动辄骂人训人。

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竟然下令开枪打群众，伸手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他对同级以家长自居，对下级蛮横霸道。”

“郑维山过去紧跟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这次又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李雪峰过去紧跟刘、邓，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坏人混在一起，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紧跟陈伯达跑了。他和陈伯达的思想上有共同性、有个人野心。李雪峰还在庐山会议上搞了准备翻案、算账的材料，这次会议上又派人回去销赃灭证，在背后捣鬼。他对有的同志的揭发批

判很反感，甚至反咬一口。这种态度如不转变过来，那是很危险的。”

“根据会议中李雪峰、郑维山的检查和大家的揭发批判以及表现出来的情绪，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央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周恩来同时还讲了一些话：

“……郑维山是一个红小鬼，14岁参加红军，一直是在前方打仗，是有战功的。”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郑维山在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复杂的工作，要是没有责任心，没有党性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完成大量复杂工作任务。”

“郑维山为内蒙人民是做了好事的，解决内蒙问题是有功的。两次解放内蒙问题，主要是第二次对内蒙的军管。”

周恩来讲了3个小时。就在这个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主任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曾美同志任第二政委；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组长。尤太忠同志任内蒙前指司令员。”

讲话要求华北会议结束后，北京军区师以上党委，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都要按照中央既定的部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彻底肃清陈伯达的流毒和影响。

散会时，已是半夜24时。郑维山往外走时，已经十分虚弱。在上楼梯时，他不由自主地摇晃了一下，警卫员小李把他搀回了房间。虽然对于会议的决定，郑维山已是预料之中。但他还是有些不能接受，感到窝囊，不服。

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徐桐钢奉命去做郑维山的保卫工作，防止郑维山自杀。他找到郑维山的秘书和警卫员，要收回郑维山的安眠药。

郑维山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说完，他脱了衣服，到卫生间洗澡去了。

历时月余的华北会议结束。会后，军委座谈会从 26 日起转入原定议程。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分为 4 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陈伯达的反动历史”。主要内容有：“家庭出身和入党前的个人历史”，“和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关系”，“被捕叛变”，“失掉党的关系问题”，“托派问题”，“在天津工作时的错误和叛徒、特务、工贼刘少奇为陈翻案的问题”，“写反共文章”，“里通外国嫌疑”。

第二部分为“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要内容有：“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一贯投靠和追随刘少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

第三部分为“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主要内容有：“大派工作组，又把自己装扮成反工作组的英雄”，“陈伯达是萧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几次突出的反党阴谋活动”，“陈伯达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机会，炮制了一个继承刘贼唯生产力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裂党的黑纲领”，“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

第四部分为“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据林彪的秘书于运深后来回忆，1970 年庐山会议后，本来就深居简出的林彪，更加孤家寡人，情绪低落到谷底。林彪的房间从来不摆杂物，只有一台八音盒，叶群说是康生从抄家物品中选的。每当林彪要散步时，内勤就把八音盒上足弦，能放出十几首歌曲。但庐山会议后，林彪再也没有听过。听内勤说，林彪偶尔吃的零食也不再吃了。本来就不爱说话的他，此时更加沉默寡言，而且也不听秘书讲文件了，更不愿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什么，甚至多少天没有一句话。偶尔看场

电影，也只让警卫秘书李文普从中外战斗故事片中选些近战镜头，一部影片只选看一两本拷贝。他平时除了出去“转车”，就是独自一人在室内踱步，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蜷缩在沙发里。

这一段时间，林彪口述过几张纸条。例如：

“开朗、愉快、活泼”；

“转移注意力”；

“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要着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偏食，多换样子”；

“多运动”

……

他让保密员李根清把这些句子用毛笔抄成三份，分别贴在叶群、林豆豆、林立果卧室的门后。

1971年新年过后，林彪吩咐李根清：“你写句话挂到叶群卧室——‘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

李根清找叶群取条幅，叶群说：“不用写了。告诉首长，我知道了。”

1月31日晚上，黄永胜的秘书通知委办公厅秘书郭士兴到京西宾馆，叶群也在那里。叶群对郭士兴说：“总理查问我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在哪里。”接着她要郭士兴为她写一份收回记录的证明，证明当时是记录员为整理简报当场将记录稿送给叶群的。

郭士兴当场写好，落款时间是“一九七一年一月卅一日”。

黄永胜看后，说“要用当时的时间、口气、纸、铅笔写。”

叶群马上说：“还是总长想得周到。”

于是又让郭士兴从叶群带来的记录原稿上裁下半页纸，重写，落款时间改成“一九七零年八月廿四日下午”。

第二天，叶群给郭士兴打电话说：“我想了想，证明记录的事还是要用现在的时间好。”并说：“不要在证明里写是我给你打的电话，就写是我派人问你的。”接着，黄永胜的秘书又通知郭士兴到京西宾馆去，黄永胜说：“你按叶主任讲的再改写。”

这样，郭士兴又改写一遍：

叶主任：

您好。

您派人问到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您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上发言记录稿的事，现将当时情况汇报如下：当天是我和曾江同志（曾思玉同志的秘书）担任记录，因您的发言讲得快，我们记不下，记了一些也不全、不准确。为了整理简报，我们即将您的发言记录（两分），从记录本上取下来，面呈您审阅。

中南组记录 郭士兴

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

落款时间改为“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黄永胜看后，亲自封好送给叶群。

2月4日，已被免职的郑维山把他保存的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谢富治1967年8月6日给林彪的一封亲笔信同其他文件交给李德生、纪登奎。这封信中说：“中央决定陈伯达负责解决华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谢富治、郑维山协助，建议在华北地区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的海、空军领导同志参加。”

对这封信，当时林彪的批示是：“同意”。

其实，1967年8月9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周恩来和康生也宣布了中央的分工决定，即：周恩来管中南和西北，陈伯达管华北，康生管东北，江青管华东和西南。周恩来在这次会上说：“作这样的分工，是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推动形势发展，实现毛主席争取明年春天或稍晚些时候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

陈伯达在北京军区的活动有7次：4次是公派开会，两次“周游”，一次自己去“找饭吃”：是说有一次陈伯达从首钢回京途中，突然到北京军区要饭吃。除去这次他突然跑到北京军区“找饭吃”，另外6次，有两次是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自己去的。另外4次就是38军报告中所提到的公派会议，由郑维山陪同。

第 1162 回：再建立，“五一六”专案小组 没想到，大本营竟在南京

华北会议开的热热闹闹，但毕竟只是华北地区军政领导的事，和老百姓似乎关系不大。此时在全国，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天天都要搞的，还是清查“516”的运动。

1971 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下发 13 号文件：《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

据吴德在朱元石为他记录整理的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中记载：

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定我任抓“五一六”的办公小组的组长，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组长。

《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

《决定》“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

《决定》最后说：“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虽然中央的《决定》说“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但是一些省市查的一点也不亚于北京。1971 年 2 月，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 年 4 月派往南京大学任清查“516”工作队队长的迟明堂，这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此时也被一位已打成“516”的

南京大学中层干部检举为“516”，停职审查。这一突破，为江苏日后成批地方领导干部打成“516”开了先例。结果，江苏省专门负责审查“516”的“二办”，奉命抓紧对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排队摸底，又排出了一批涉嫌“516”问题的对象。至1971年4月，已经站出来在省革委工作的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又有100多名被点名为“516”，被首批送进省五七干校审查。其中有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干部。他们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许。随后，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下放在外地的干部也一批批揪回干校。

6月，江苏省省级机关在职干部被打成“516”的占到了33.4%。

至10月，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清查“516”被作为头等大事，与“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参加相关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0多场。4个多月内又有5000多人打成“516”。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

1970年10月，迟明堂隔离审查，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

11月，省级机关在职干部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连同已经打成“516”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

南京市革委会机关450余人，至1971年底已有107人打成“516”，加上挂上“大名单”的200余人，也占70%左右。

就连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南京军区被整理“516”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

1971年底，江苏省五七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省五七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1970年12月4日，北京电影学院五七干校清查“516”分子。一位姓崔的连长在“大批判再动员”后，布置了第一项专题批判任务，即“利用红旗政策。重点批判7分钟事件。”

“7分钟事件”就是1966年12月4日，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组织劫走彭真等人的那个事件。

次日，12月5日，北京电影学院五七干校召开“516反革命阴谋集团12.4(7分钟)事件批判大会”，参与1966年12月4日绑架彭真的彭宁、钱学格、马精武、谢飞“怀着三忠于四无限五保卫的心情”上台发言：

“1966年12月4日，正当我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当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一伙即将摇摇欲坠倒台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开始制造舆论，捞取政治资本，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王、关、戚、杨、余、傅直接策划演出了七分钟绑架彭真的反革命特务事件。这个事件的要害就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施加压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力图挽救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失去的天堂。这个反革命七分钟事件的要害，就是要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夺权的目的，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单是要彭真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线人物一起串供，而是王、关、戚、杨、余、傅和他们一起串通起来，搞复辟阴谋活动，蒙骗人民。”

会上另一位“五七战士”说，1966年12月4日抓走彭真是为了“串供”，而且“阴谋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彭真及一些黑帮串供，制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黑材料，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政变的一次演习，危害已经造成了。”而周恩来1966年12月4日接见他们时的讲话记录，被说成是“掩盖和篡改周总理指示，放反革命舆论”。崔连长评论说，“抓彭真即保彭真保黑帮”。

当晚，崔连长传达了“最新指示”，其实是毛泽东1967年的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516’”，以及林彪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516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随后长篇讲话，要求人人发言，“不发言就是中奸计”，“红旗政策恶毒之处在利用人心所向勾引青年，非如此不能号召”，甚至将“7分钟事件”的思想根源追溯到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说一些人“在7分钟事件中，自己还庆幸是机会主义的头脑，其实已经上了三十年代的

贼船。”

彭宁反复交代自己的“516 罪行”，写出了 140 多页的材料，其中包括“7 分钟事件”，但这些交代被一再指责为“重复”；彭宁本人不断受到“背后有人”、“态度不老实”、“错误估计形势”、“掩盖罪行”、“避重就轻”、“狡辩”、“想蒙混过关”、“新的恶毒攻击”、“继续阴谋新反扑”、“以细节掩盖实质”、“搞迷魂阵，反攻倒算”之类的斥责，人们一再勒令他“严肃对待自己的罪行”、“竹筒倒豆子”。有些当事人则发挥了揭发、质问的作用，有的参加了专案组，在会上专题介绍“7 分钟（事件）彭宁参与阴谋”的过程。

经历持久地“斗立场、斗态度”、“通过罪行打态度”后，彭宁渐渐承受不住压力，于 1971 年 10 月 4 日开始交代天方夜谭式的“反革命计划”，但大家很快发现他的交代“不能自圆其说，掩盖阴谋。交代有阴谋有组织，实际又无阴谋无组织，自己推翻了，漏掉了。”

幸好，1971 年 9 月 13 日，中国的政局发生巨变，有关“7 分钟事件”的密集批判也不了了之了。

1971 年 1 月，北京航空学院也在空军宣传队和工宣队领导下，在全院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彻底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在动员群众进行揭发检举的同时，对院内文革以来的所有重大事件进行清理，举办了重点人、重大事件，知情人等各种学习班 112 个，对重点审查对象 38 人实行隔离审查。

其实，早在 1970 年 5 月初，曾经在 1967 年武汉“720 事件”后，按照戚本禹的指示，组织北航学生到北京玉泉山和京西宾馆游行、冲中直招待所抓张体学等人的北航院革委会副主任田东，就已经在苏北农场学习班隔离审查了。与他一起关在学习班里的一位同学，因承受不了连轴转的批斗，精神压力太大，结果在押往批斗会的路上，乘押送人员不备，跑到办公楼的阳台上跳楼自杀。幸亏下面是农田，摔在耕地的松土上，只是摔断了腿，伤了腰，但捡了一条命。

1970 年 11 月，正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的北航革委会委员、女教师张树泉也被召回学校，要她交待怎么参加的“516”？说是洪平顺老师交待，他是张树泉发展加入“516”的，而且大字报写的有鼻子有眼，说是在 11 楼某某房间发展的“516”。专案组负责人拍着桌子对张树泉

说：“我们学校四百多人都知道韩爱晶和你们发展的。”

1971年2月8日，北航革委会常委侯玉山也从西北三线厂被揪回北航。

1971年3月8日午饭后，正在湖南株洲航空发动机厂干活的韩爱晶，看到军代表来到他身边，很谦和地对他说：“老韩，部里通知你回北京，你马上到天桥孙政委那里去，领导跟你谈。”

这是韩爱晶长这么大，第一次听有人叫他“老韩”。心想，这一刻来到了。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同学将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江青关于抓“516”的讲话发给韩爱晶。之后，厂里就有人说他是“516”。

韩爱晶回到北航，一进校园就听到高音喇叭在大声呼喊：

“打倒反革命‘516’骨干分子韩爱晶！”

“把‘516’骨干分子韩爱晶押回北航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

“韩爱晶反对敬爱的林副主席罪该万死！”

“韩爱晶反对敬爱的周总理罪该万死！”

“韩爱晶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

路灯照在大道上，一米两米见方的大字躺在路中间：

“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打倒谁！”

韩爱晶感到突然，也很奇怪：“在北京我是最早反对‘516’的，凭什么给我扣上‘516’骨干分子的帽子？！”

他被带进13楼一层的一个大房间，里面的窗户装上了铁栏杆，被遮得严严实实，不透光线。几个年轻人早等在这里，他们对韩爱晶投来异样的目光。

晚上睡觉时，两个小伙子面对面坐在床两头看守着韩爱晶。

没几天，韩爱晶被带到俱乐部台前接受批判。每当听到说他“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周总理”的内容时，韩爱晶就会回头冲着发言的人大喊：

“造谣！胡说！”“造谣！胡说！”

在一次参加系里召开批斗会时，他又冲着发言人大喊：“造谣！胡说！”几个工农兵学员突然从下面冲上来，抓住他的头发和胳膊，狠狠地把他按在地上。批判会开成一锅粥。从此就没再开批斗韩爱晶的

大会了。

学校召开落实政策大会，“钢铁纵队”教师洪平顺承认自己是“516”，当场解除隔离，与家人团聚。

但是韩爱晶不管专案组采用什么方法，就是不承认自己是“516”，也不承认反对中央领导。他除了谈问题或写材料，就是抓紧时间看书看报。一天，军代表老田奇怪地问他：

“别人犯错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痛哭流涕，人整个变了个人。你倒好，像进党校了，看书看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任凭千种妙计，你自有一定之规！木头疙瘩不开窍，你受过什么特殊训练？”

韩爱晶说：“我承认犯了严重错误，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对不起北航师生，但我不是‘516’，不是反革命。我犯错误，是由于我缺少马克思主义，缺少毛泽东思想，没有和工农结合，我世界观有问题，我现在正好补马列的课。你是空军的干部，我1946年生，在红旗下长大，我怎么是反革命？是台湾派来的吗？”

韩爱晶接着说：“你们知道你们是谁吗？你们是共产党、解放军，我干嘛怕你们啊，我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军，你们在我周围我一点也不怕，你们是自己人。再说，我哭哭啼啼，你们能把我放了吗？你们受过什么特殊训练，解放战争的时候，民船过长江，百万解放军战士还有船夫，国民党大炮打过来，一个炮弹掉下来，一船人可能就没了，都是农民子弟，年轻战士，你看我的命比他们值钱吗？”

老田问：“这什么意思？”

韩爱晶说：“我二十四、五岁。我上过天安门，住过中南海，见过毛主席，当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党和人民给我的太多了。那些战士死了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没什么比过江战士高贵的地方！我也问你一句话，如果我现在被台湾国民党抓去了，你看我会不会投降？我会像李玉和似的，从容不迫，决不投降！国民党我都不怕，怕共产党干嘛？我不是‘516’！咱们等着看，我没有反对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周总理！”

再看北航“红旗”戴维堤的遭遇。1968年12月30日，戴维堤和他的爱人、武汉“720事件”中的女将尹聚平来到北京738厂报到，成为该厂的正式员工。

北京738厂又叫国营北京有线电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之一，由苏联专家帮助援建，是中国第一家生产电子计算机和电话交换机的工厂，产品主要供给部队，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

追查“516”的风潮也在那里刮起。197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戴维堤和738厂的造反派头头们一个个被关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没过几天，尹聚平也因为“720”事件，被作为王力的“黑秘书”隔离审查。那天正好是他们的儿子一周岁。

738厂军管会把尹聚平从吃奶的孩子身边押走，召开了全厂批斗大会，宣布抓出了大“516”分子，混进中央代表团一级的，王力的黑秘书，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分子，就是尹聚平，立即隔离审查。同时宣布隔离审查的是一位刚从海军转业来738厂工作的钱植平，据说他文革中参加过“冲派”。

这位当过兵的男子汉在附近的“牛棚”里经受了数天的折磨之后，一时想不开，在厕所里上吊自杀了，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尹聚平的“牛棚”是一间长一米六八、宽一米二小水房。万幸的是，尹聚平身高一米六六，小房的长度还多出两公分。

“老实交待，你是怎样混进中央代表团的？”“你跟王力干了些什么？”“王力什么时候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反军乱军的？”“你的黑手是怎么伸进738厂的？”“戴维堤是坏头头，你老实交待他的罪行！”……

“尹聚平，听说你父母是老革命，你生父是革命烈士。我们不管那一套。现在老革命和烈士中叛徒、特务多得很，谁知道你老子是不是叛徒、特务？这很难说，我们不管这些。王力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你给他当秘书，知道的情况一定不少，你要老实交待。看你的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交待好了，可以从宽处理。我们讲人道主义，今后不会再有人打你，也不会不让你喝水，你累了可以坐一会儿，但问题交代不清不能睡觉。革命嘛，需要付出点代价。”

从此，尹聚平的斗室里面装上了200度的电灯泡，整夜不熄。“车轮战”开始了，不准尹聚平坐下，更不准睡觉。连续几天轮番逼供，只

有到天亮时才让坐下打一会儿盹。接班的看守又来了，立即站起来，又开始了一天的逼供……

尹聚平悲愤欲绝。作为父辈们都是共产党人的烈士后代，一个年轻的孩子妈妈，蒙受如此摧残和奇耻大辱，要不是想到儿子，她真不想活了，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也免得受罪了。

尹聚平不明白，生父是1946年牺牲的革命烈士，母亲是38年的老党员，继父是1929年入党的老资格共产党人，丈夫戴维堤的亲人中有四位烈士。如今夫妇双双成了“516”，反革命？而抓她的人，从军管会到看守，很好多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第 1163 回：戴维堤，气急大骂军代表 毛泽东，批评军委办事组

1971 年 3 月 17 日，738 厂的军管会组织了批斗“516”分子大会。一些人被押上台去，低头弯腰，痛苦流涕而又口若悬河。不但承认自己是填了登记表的“516”分子，而且交待出了几十、几百个发展对象。在交待他们发展的“516”分子时，显然是按军管会的要求，用念某某某代替姓名。当会场的高音喇叭将“我发展了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这样绕口令似的奇妙声音，在 738 厂的上空环绕时，吓坏了台下的数千名职工，不知这些“某某某”里是否有自己？这声音也惊呆了周围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于是，一切都凝固了，人们侧耳静听，不知道 738 厂大院里上演什么好戏？其中有一个头头竟然连续说了 10 分钟的“某某某”。按两秒钟说一个计算，他一口气交待出了 300 多个“516”分子。不几天，738 厂竟抓出了 1000 多个“516”分子。军管会王主任在全厂大会上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伸出 4 个手指头大声说道：“同志们，谁说 738 厂没有‘516’分子？现在已经四位数了！四位数了！同志们！”

戴维堤在 738 厂的好朋友张君，是厂革委会人事组织负责人，为人忠厚老实，甚至有些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他无造反派的气魄，但有造反派的观点，抓“516”一开始，他就被军管会关起来了。

张君患有慢性心脏病，身心压力都很大，家有还多病的老母。军管会抓住他急于想回家的心理拿他开刀，对他进行逼供。开始几天，张君尚能顶得住，拒不承认“516”问题。随着逼供的加剧和压力的增大，他顶不住了，终于痛哭流涕地向军管会承认自己参加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他幻想着承认了就能放他回家。

军管会很高兴，这是 738 厂内抓出的第一个“516”分子。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个就不愁第二个，第三个……打过仗的军管会负责人知道突破口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张君可能是一条大鱼。他是管人事

组织工作的，他既是“516”分子，一定发展了不少人。738 厂的“516”之鱼一定少不了。于是，军管会负责人在全厂大会上洋洋得意地说：“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738 厂这座庙不小，水也很多很深，‘516’这些王八、游鱼少不了。林副统帅要求我们‘一个不漏’，我的办法就是‘网大眼小’。‘516’分子这次一个也跑不了。不把 738 厂的‘516’分子抓干净，我们决不收兵。我们还是那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张君既然开了口，下面的事就由不得他了。这正如长江、黄河大堤一样，只要开了一个小口子，就很难堵上了。

“要想早点回家，就要竹筒倒豆子。说吧，是谁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军管会的人边问边记录。

“67 年我去北航串连时，认识了戴维堤，是他发展我参加‘516’的。他让我在工厂里发展‘516’成员，并交代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张君此时的嘴吧已经像决口的黄河大堤。

军管会的人又惊又喜，立即紧追不舍。

“你发展谁参加了‘516’？”

“我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认识的人多，发展的人也多，让我好好想一想。不过，你们要替我保密。”

“这点你放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你一边想，一边写出来，记错了也不要紧，但不要漏掉，一个都不要漏掉。我们不搞蒋介石那一套，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我们是一个不杀，但一个也不放过。你老实交代吧！交代的好，可以从宽处理。”

于是，张君把厂里 300 多个干部、工人的名字写了出来，其中包括文革初期挨过批斗的原党委书记、现任革委会主任等一批老干部，都成了‘516’分子。

就这样，一批批干部、工人被谈话、审查。不承认怎么办？很好办，关押，逼供：“发展你的人都交代了，被你发展的人也交代了，你还等什么？”

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多人便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对于某些交代问题不太痛快像挤牙膏一样的人，军管会便让某些工人看守们练练拳脚，并长期关着不放。

戴维堤被关后，军管会的专案组让他交待问题，戴维堤自己并不在乎。“学习班”嘛，学几天就完了。文化革命中干了那么多事，审查审查也是应该的，反正自己文革中也没干什么坏事，经得起审查。他把自己文革中一年多的全部所作所为写成了材料，请军管会过目，并要求回家看看儿子。

但是，戴维堤的材料被退了回来，军管会说那是宣言书和请功表，不是交待材料，要戴维堤态度放端正一点，脑袋放聪明一点。至于回家，那就看他自己交待的如何了。

戴维堤非常想自己的儿子。当时，他还不知道尹聚平也被关了起来。一天晚上，他趁着看守们在外面打扑克，偷偷打开了窗子，跑回了家，一间厂子附近的农村小屋。

一进门，他惊呆了：尹聚平70多岁的姥姥正在喂他的儿子。孩子站在潮湿的土地上，一边吃东西，一边用两只小手拿着快垂到地面的亮着的电灯泡玩。当他看见爸爸回来了，立即哭着让戴维堤抱，并喊“妈妈，妈妈！”姥姥哭着告诉戴维堤：“尹聚平前几天被厂里的人叫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戴维堤的热血一下子顶到了脑门上：“军管会这几个法西斯军人，真他妈的歹毒，简直不是人。我们犯了什么罪，如此对待我们？”

他把电灯线弄高，安慰了姥姥几句，亲了儿子一下，立即头也不回的赶回了“学习班”。

这时军管会正在组织人抓他，见戴维堤自己回来了，松了一口气。但此时的戴维堤怒火难消，冲着管专案组的军代表，破口大骂道：“我操你妈的姓×的，蒋介石害得我家破人亡，你们害得我妻离子散。老子一家都是当兵的，没有一个像你们这么混蛋的！你们别放我出去，否则我同你一块见阎王！”

他的嚣张气焰惹火了军管会，第二天，被押到厂里批斗了一场。批斗完后，军管会副主任来到关押他的房间训话：

“戴维堤，我告诉你，你给我放老实点。老子管过监狱，像你这样的，老子在监狱里见的多了。你的问题很严重，我们有充足的材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不化，死路一条。你不要认为你出身好，我们就不敢怎么着你，你的出身我们也要调查，烈士当中也有叛徒。我

我们现在是挽救你，要是换一个人，这样骂军管会，我们决不轻饶！”

“我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拿出来，我自己认为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骂军管会不对。可我家里确实有困难，一老一小没人管，出了人命怎么办？就是我和尹聚平有罪，那老人孩子无罪。我儿子绝对是烈士的后代。烈士也有叛徒，这话可是你说的，你是共产党员，不能这样胡说。我要求军管会派人给我看孩子，扣我的工资也可以。”

“你孩子的问题，我们会考虑的。你老实交待问题吧！告诉你，你们学校来了许多材料，你是‘516’的头头，问题严重，有许多人检举你。我们给你时间，让你主动交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否则就不算你主动交待的了。”副主任说完就走了。

过了几天，军管会派人买了火车票，把戴维堤家的一老一小送到了北京站，打发回了郑州尹聚平家。

半年之后，1971年秋的一天，戴维堤正在屋里“熬钟点”，忽听窗外楼下有哭叫声和喝斥声。他推开窗子往下一看，只见不知何时从河南回来的姥姥和他的儿子坐在地上，对着戴维堤的窗子哭喊着。有几个工人看守正在轰老太太走，周围有许多看热闹的人。

戴维堤大吃一惊，想从房门冲下去，可房门反锁着。他只好从窗子探出身子喊着“姥姥”，呼唤着儿子的名字。他心里难过之极，悲愤欲绝。已快两岁的儿子抬头呆呆地望着陌生的戴维堤，突然大声的哭喊起来。从儿子的哭叫声中，戴维堤分辩出了一声声“爸——爸——”的声音。他悲喜交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有人叫他爸爸……

原来，尹聚平的姥姥和儿子在河南郑州她父母家，一直没有戴维堤和尹聚平的消息，一家人都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尹聚平的母亲让她的弟弟、妹妹们把姥姥和尹聚平的儿子送到北京，希望能见戴维堤和尹聚平一面。

有一天，戴维堤看见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在楼下哭，是要给关在戴维堤旁边房间里的一个厂里的造反派头头送点吃的，看守们不让。小女孩趁她妈妈同看守们争吵的时候，飞快地跑上了楼，见了她爸爸一面。这个聪明的小女孩后来成了有名的歌星，她就是杭天琪。

戴维堤强烈要求军管会允许他和尹聚平分别见老人和孩子一面，如不答应，他将绝食，以死抗争。

军管会同意了：“戴维堤，你岳母家怂恿老人孩子回来大闹‘学习班’，这是破坏运动的行为，是错误的，这对你和尹聚平没有好处。好在不是你指使的，就算了。我们军管会还是讲政策、讲人道主义的。看在你是烈士子女面上，我们同意你看看儿子。这是军管会对你的关怀和照顾，是党的温暖，是军管会讲政策的体现。我们不是法西斯，我们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再骂军管会，我们就不客气了，你要为你的骂人承担一切后果。”

“谢谢军管会，只要让我见见儿子，我就不骂军管会是法西斯了。否则我就是法西斯。”戴维堤如是回答。

戴维堤想明白了：“既然造过反，就应付出代价。这是历史的惩罚。”

蒯大富在挨整时，曾发牢骚哀叹：“红卫兵是一年香，二年臭。”戴维堤又追加两句：“三年就挨斗，四年、五年成了‘516’。”

1972年5月13日，戴维堤终于可以离开关押他的“牛棚”。军代表向他宣布：“从今天起，改变审查方式，回车间劳动，但审查未完，要继续检查交待问题。”

最后，军代表拿出了一份材料说：“戴维堤，你自己看一下，这是揭发你的材料，本来不应该给你看，但已经无所谓了。当初让你交待‘516’问题，我们是事出有因的，你不要埋怨我们。”

戴维堤一看，是他的老同学张海写的“关于戴维堤问题的揭发材料”。字写得非常漂亮，工工整整，像印刷的一样，有几十张纸。材料揭发戴维堤在北航是如何发展张海参加了“516兵团”，有时间、地点、情节，样样俱全，十分逼真。戴维堤这时才明白，怪不得军管会始终逼他交待“516”问题，把他关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戴维堤心里没有丝毫怨恨张海的念头，只是立刻想到，他的这位张海同学，在单位不知是怎么被整？逼、供、信到什么程度？否则，一条七尺的汉子，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呢？738厂不是也有被整得自杀或疯了的吗？

戴维堤对军代表说：“现在你们怎么看这份材料？”

军代表笑了笑，说：“给你看材料，就说明我们的态度。‘516’组织登记表问题，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也没见到一份。不过，我们重在

罪行,罪行够了,也是‘516’,这是周总理说的。”

“周总理是这么说的吗?什么时候,在哪儿说的?”戴维提问。

“你出去后自己打听去吧!”军代表说。

而北航“红旗”的一把手韩爱晶,也于1971年3月8日从株洲带回北航隔离审查,说他是“516”骨干分子,有很多老师同学都填表加入,韩爱晶坚决否认。专案组将他关在北航的黑屋子里,要他交待“揪刘火线”的情况。可是北航是在“揪刘火线”最后5天才去的那里,具体的缘由韩爱晶并不清楚,最主要的是无资料和材料可以查找、回忆。性格执拗的韩爱晶在小黑屋里旧病复发,开始咳血。他渴望治病、渴望吃热饭、晒太阳。无奈之下,在专案组的帮助和启发下,写了一些材料,被收在“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批清协作办公室”整理的《关于围困中南海的一些罪证和线索》。“913事件”后,韩爱晶向专案组书面声明,此前写的材料一律作废。1978年9月21日,他再次向北京市公安局七处预审员正式递交书面声明:《对于1971年三月之后,在北航专案组工作人员用逼供信的方法要我写成的真假混杂的材料一律作废》。

1971年2月12日,林彪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乘飞机前往苏州。仍然下榻南林饭店七号楼。

1970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经济发展较快,不仅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且达到和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3136.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其中,农业总产值716亿元,增长11.5%;工业总产值2420.8亿元,增长30.6%。财政收入662.9亿元,增长25.8%,收大于支13.5亿元。1970年基本上完成或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

1970年12月16日至1971年2月19日,国务院举行全国计划会议,拟定了1971年度国民经济计划。1971年的计划是高速度、高指标的计划。工农业总产值3350亿元,比上年增长12%。其中,农业总产值750亿元,增长7%;工业总产值2600亿元,增长13%。财政收支各为705亿元。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270亿元,其中用于三线地区的投资150亿元,占55.5%。新增职工140万到156万人。1971年实行基建投资、物资分配、财政收入支出的大包干,亦即权力下放。

2月19日,周恩来就结束全国计划会议一事致信毛泽东,汇报近日工作安排,毛泽东当天就在信上批示:“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周恩来当天即在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对计划会议的指示。

当晚,军委办事组紧急召开在京的各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批评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的指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第二天,军委办事组向中央写了一个检讨报告,对毛泽东的批评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报告称:“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

同日,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吴法宪、叶群过去写的检讨不够,要重新写一个。”

“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由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与此同时,毛泽东再次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好马列著作。

毛泽东和前几次不同,他这次没有再把阅件批转给林彪看,而只是写道:“周(恩来)、康(生)阅后,退军委。”

当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2月19日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次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2月2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帮助军委办事组成员变

被动为主动。

江青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作了检讨。

会上还通过了中央转发毛泽东2月19日关于批陈整风指示的补充通知。

黄永胜等人当天又召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会议，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再次进行“自我批评”。

2月23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帮助军委办事组成员变被动为主动的过程，并告黄永胜等都做了检讨。

这天，军委办事组在讨论毛泽东批评他们“根本不批陈”的指示时，黄永胜念了唐朝诗人章碣的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首诗，毛泽东曾在1945年书赠当时作为国民参政会“延安访问团”成员访问延安的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五四运动期间，身为北大学子的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先锋，而当时的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因傅斯年常到图书馆看书，故和毛泽东相识。

傅斯年访问延安时，曾与毛泽东通宵长谈。毛泽东高度赞扬傅斯年五四期间为反帝反封建做出的贡献。傅斯年对曰：“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通宵长谈结束时，傅斯年向毛泽东索要墨宝，毛泽东便将唐朝诗人章碣的这首《焚书坑》书赠傅斯年，并附信一封：“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1949年，傅斯年召集一批北大学者随蒋介石赴台湾，上飞机后才发现，空位甚多，应者寥寥，多数人对国民党已失去信心，愿留下来迎接共产党。

毛泽东对章碣这首诗情有独钟。1959年，他让康生查询章碣生平以及此诗是否是其作品。康生在12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碣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差不多，送上请阅。”

毛泽东不满这个说法，12月11日在康生的报告上写了致林克的信：“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1966年4月14日，毛泽东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又一次引用了章碣的《焚书坑》，接下来说：“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

黄永胜在会上念了章碣的这首诗后，许多人不知何意？但此诗开始在社会上流行。

2月26日，周恩来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谈话。

第 1164 回：外交部，重修英国代办处 “五一六”，北大、地院也在抓

1971 年 2 月，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竣工。2 月 24 日，英国代办处为修复迁居举办招待会，周恩来指示时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要向英国代办当面表示：“1967 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现在，我们给你们修复了，你们迁入新居，让我们举杯庆贺。”

在当晚的招待会上，章文晋司长怕被人认为自己“右倾”，没敢在众多外国使节出席的外交场合说出这番话。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召见外交部领导和当时参加招待会的人员，对章文晋进行了严肃批评。周恩来说：“毛主席几次都说火烧代办处是坏人搞的。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是当时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对这件事应公开向英方做出解释，当着其他外国大使的面也可以讲嘛！”

他还批评章文晋说：“你本人也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嘛，这些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大使说有什么要紧？而且还应该大声说！毛主席几次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讲话你们都学了，学而不用，不去实践，这就叫极‘左’思潮的影响嘛！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是平等的。人家来到我国，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们的同胞，那是不对的，但不能因此而烧它的代办处。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

2 月 28 日，林彪对清查“516”指示说：

“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516’，一个也不能漏掉。”

这应该就是后来在清查“516”时被大量引用的“林副主席的指示”。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聂元梓写信给康生，承认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康生在聂元梓的信封上批道：“请看这个两面派！”并将

这封信转给了北京大学军宣队。

据北京大学教师郭大暑后来回忆,1971年他奉8341部队军宣队指示,参加聂元梓的专案工作,住在当时军宣队总指挥部所在的哲学楼。参加这项专案工作的有三人,两个是军宣队的,还有一个就是郭大暑。据他回忆说,当他要聂元梓交待她的后台是谁时,聂元梓回答说:“我的后台是江青。”

聂元梓的专案搞了一年多,没有任何的结果。

北京大学在清查“516”时,把1967年初的“007密令”和1967年夏天发生在中南海外的“揪刘火线”,都列为“516”的重大活动之一,说“新北大公社”参加中南海外的“揪刘火线”是反对周恩来总理。

对“007密令”,专案组引用了“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北大物理系学生胡宗式的交待,称:“原新北大公社动态组长胡××称:1967年初,南方某群众组织的许××,要我把陷害总理的所谓‘0007密令’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我请示了聂元梓,聂说,你们把它送到中央文革记者那里。由聂元梓电话联系,我到44楼三楼,向中央文革(驻北大)记者上交了这份材料。”

胡宗式的原件是这样写的:

1967年3月,湘江风雷北京支队队长许维刚(北京机械学院学生)找到我,想通过聂元梓将一份材料(即有关007密令问题,湘江风雷头头的上报材料)转交江青。材料大致内容如下:

在1966年12月初,“湘江风雷”的一个成员在湖南省军区门口,看到一辆三轮摩托车从门内驶出,从车上掉下一张纸,他拾起,见一个字条:

密令 007号

兹定于12月30日在……起事

手谕

他拿到湘江风雷总部,头头们用“雷锋日记”对笔体,认为是总理的字体,便认为总理利用湖南省军区搞军事政变,整材料上告中央。后来中央“二·四”批示把“湘江风雷”定为反动组织(几个月后平反)。坏头头认为是总理搞的报复,“湘江风雷”的头头张辉便整材料。材料中说密令怎么发现的,军区的人怎么追查,他们曾经把它藏在蚊帐杆

里，被人盗取，又怎么追回。他们将材料复写了三份，想法托人送中央。许维刚的这份是其中之一。

我把这份材料交给聂元梓。第二天聂对我说：“反总理是不对的，这份材料我不给转。你把它交给中央记者站驻北大的记者。你到44楼3楼，我先打个电话。”我在转交材料时写了一个附言，说明了许维刚的身份并且写了“这是对总理的陷害”。

胡宗式1968年初分配到宝鸡902厂。1971年1月，他正和爱人在南京岳母家度蜜月时，接到厂里发来的催促回厂的电报。2月19日上午，他回到厂里，当晚即由厂干部科的吴长顺陪同北京大学李桂勋一起，“护送”他乘火车赴京。21日凌晨2时左右到了北京大学。上午10时，住进43楼211室，窗上钉了木条，门上贴的大标语是：“誓与5.16反革命集团血战到底！”物理系组成了20多人的专案组，有工宣队队员、学生和老师，组长是原“井冈山兵团”的张万祥，副组长是原“新北大公社”的庄逢源。此次审查，进行了两年又两个月。

审查胡宗式的目的是要他承认自己是“516”。2月27日晚上21时后，物理系宣传队指导员、8341部队的连指导员杨宗佑对胡宗式说：“你来了一个星期了，我们没有动你，是叫你安一下心。过去说我们掌握你70%，现在可以说掌握你100%。打开窗子说亮话吧，你是‘516’并且是骨干。是坦白呢，还是抗拒？从现在起和你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你倒霉就倒霉在聂元梓身上，你知道她在‘516’集团里处在什么地位吗？她不用填表，她有批准权。你以为材料烧了就查不出来吗？表烧了人还在。名册烧了，组织部长还在嘛！”

专案组对胡宗式说：“你不是首恶，但你是骨干”。

专案组用了3天时间专门谈“007”问题，逼胡宗式承认是反周恩来，说：“戚本禹用它反总理，材料是你提供的，你就是反总理”。

胡宗式坚决不承认，说：“我上交材料给的是中央文革，并且我在上面注明我的态度。如果我在上面写的是给戚本禹，你可以算。”

军宣队长说：“群众说你是反总理。”

胡宗式坚称：“不是！”

军宣队长：“那么说群众说错了？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你对毛主席的教导是怎么理解的？”

1971年3月2日,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的自首坦白大会。大会主席宣布坦白交待开始以后,原北大“井冈山”的负责人牛辉林第一个上台发言。他说:

“在洪涛的介绍下,我参加了‘516’反革命集团,并且发展了你们。”“我攻击江青,还作了反军演说,在王、关戚的操纵下搞打砸抢”。他重点宣传不要搞攻守同盟,说:“那是建立在私字上的,是靠不住的。过去我把名单交给了洪涛,现在我把名单交给了工宣队和军宣队。你们不要抱有幻想,攻守同盟是靠不住的,你们快坦白吧。”

第二个上台坦白的是“井冈山”的屈长江。他说牛辉林发展他参加了“516”,他忆苦思甜,痛恨自己上当受骗。

第三个上台的是“新北大公社”的方洗德。他说:在1967年4月13日晚,孙蓬一在全校大会上煽动炮打谢富治后,他罪恶地贴了谢副总理的大字报;在北大野心家的授意下,“以抓叛徒为名整了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的黑材料”。

方洗德发言后,台下又有几个人站起来要求上台坦白。会议主席说:“今天,要坦白的人很多,由于时间关系,就不一一上台坦白了。”他说清查“516”的形势大好,并介绍了北大“516”的情况,是“几条线,一条根”。

3月5日,北京大学江西分校召开揭发、批判孙蓬一、聂元梓反军、乱军问题大会。

我们再看北京地院的王大宾,他于1969年1月分配到四川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临行前,周恩来特意抽空接见了他,嘱咐他下去后不要介入四川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还建议他改名。于是,王大宾便用“王毅”的名字来到成都探矿机械厂。

1971年3月9日,北京地院军宣队李凡茂等人派专机到成都,将王大宾从成都抓回北京地院关押审查。这时,王大宾的未婚妻古宝琳也从地院毕业分配到了成都地质修配厂,他们正准备1971年5月1日结婚,没想到3月9日王大宾被抓走。那天凌晨,当王大宾被押上汽车时,古宝琳紧追过来,强忍眼泪,痛苦地目送他离去。王大宾紧贴车窗口见到此情此景,不知这次分离何时才能相见,心似刀割。

王大宾被抓最大的一件罪行就是“为彭德怀翻案”。军宣队指控

他和 1966 年 12 月被派去四川抓彭德怀的地院王大来一起，“与彭德怀密谋，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反对从四川揪彭德怀回北京”。而“东方红公社”在其小报上，不加批判地全文登出彭德怀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写给毛主席的“万言书”，就是别有用心为彭德怀翻案制造舆论。

另外，军宣队还指控王大宾：

1、与杨成武、傅崇碧关系密切，支持军队“冲派”，揪军内一小撮，反对林彪，企图让杨余傅上台；

2、在中央领导人的一次接见时，江青批评他时，顶撞江青，说江青的批评不符合事实，反对攻击江青；

3、地院“东方红”参与了 1967 年 7、8 月发生的“揪刘火线”活动，围困中南海。说他们揪刘少奇是假，目的是要搞反革命政变，反对周恩来，要揪出周恩来，让刘、邓上台。并说地院保护了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就是证据。

王大宾从四川工厂抓回北京地院后，被关进了有铁栏、铁门的房间近两年之久，开了几十次大小批斗会，每天的车轮审讯，逼他承认反对周恩来，并参与组织了地院的“516”组织。

为“地质学院 5.16 兵团”案，不仅关押了王大宾，还有许多师生，其中有文革起来造反的地院干部张海涛、李贵等，连高元贵、王焕等文革前的院领导也被说成是“地院 516 兵团”的黑高参。

王大宾听了 1971 年 5 月 31 日，财贸口群众批斗大会上，中央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的头头敖本立被宣布公开逮捕的大会录音，听了北师大批斗谭厚兰的录音。

地院水文系教员朱思贵是专案组长，他和空军学院驻地院军宣队的李凡茂给王大宾训话时说：“除了聂元梓不是‘516’外，所有的大小头头都是‘516’。”“你住的这个房子，原是张海涛住的。他出身也很好，你是知道的，一个贫农孤儿，14 岁参军入关的解放军小战士，顽固到底，临到逮捕他之前一天，他还说，他不是‘516’，说以他的党籍担保，地院不存在‘516 兵团’，不要搞无辜的师生们呢！现在好了，关在牢里，头发长得很长，后悔了，你别走他的老路。逮捕张海涛那天，李贵跳楼摔断腿了。唐威正也当场吓得站不住了。陆炎德识时务为俊

杰,他承认了,学习班也没进,地院‘516’的盖子就是这样揭开的。已一年多了,你现在不要顽固,没好下场的。”

对这些指控,王大宾坚决不承认。他坚持说:“外校的情况我不知道。地院的情况,我知道,贾振远录音中讲的是假话。地院根本不存在‘516兵团’,我不是‘516’。李贵、王焕、高元贵也不是,地院各级革委会的成员都不是。你们千万别上当,把问题搞错了。”

1972年春节前,王大宾押往地院江西干校批斗。他的老师宋祥彦已被关押460天,那天也被押上台陪斗。

第二天就是年三十了,宋祥彦的爱人刘照明老师上台发言,劝宋祥彦说:“承认了吧。小牛牛很想你回家过年。牛牛说,爸爸你就承认是‘516’吧,你就能回家过年的。你承认了吧,为了小牛牛。”

小牛牛是宋祥彦和刘照明他们4岁的儿子。刘老师声泪俱下的发言,让台上挨斗的王大宾撕心裂肺的痛。

也许是4岁儿子小牛牛的话太刺痛了宋祥彦的心,被朱思贵称为“臭狗屎”的他,为了小牛牛,终于违心地承认是“516”了。

为了“516”,地院李思田老师被逼用电自杀未死。李明哲老师被关押在地院江西干校,逃到山上吊死山中,两个月后才被上山农民发现。正是冬天,尸体已开始腐烂,目不忍睹。被迫害自杀的还有魏小平、李仲学、王海洪等学生。

王大宾的未婚妻古宝琳也成了抓“516”的重点清查对象,多经折磨,几乎整死。

王大宾的妈妈没有文化,大字不识几个,是山沟里的妇女,也被追问、审讯是否“516”。可怜这位山里的妇女说:“我虚岁刚过五十,还没有五十六。”

第 1165 回：离苏州，林彪回到北戴河 抓艾玲，上海清查“五一六”

1971 年 3 月 7 日，林彪携妻子叶群乘火车离开苏州，又回到北戴河。

此时的北戴河，海边依然是寒风萧萧，一片肃杀。夏日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海岸线，此时显得格外空寂而辽阔。

中央领导人用来消夏避暑的别墅区里，除了一些工作人员看管空房子外，很少再见首长们的身影。但是林彪却在这个最为清淡的季节里住进自己远离海边，也远离其他领导人的北戴河东联峰山莲花石旁的别墅。此别墅也叫莲花石别墅，又因在北戴河中直管理处别墅楼中排序 96 号，亦名 96 号楼。可它与毛泽东的 95 号别墅相距甚远。因为林彪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故而别墅也被亲密地连了号。不过后来当地老百姓还是喜欢直呼其“林彪楼”。



这座楼是林彪如日中天时修建的，按照林彪提出住得离热闹的地方远点，离其他首长远点，离海边远点的“三远点”要求，最后选址在距

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原莲花石公园内的联峰山莲花石旁，一处被大火烧毁的“松涛草堂”旧址上，1969年完工。整座楼格局与毛家湾类似，呈“工”字形，东西“两横”，分别是林彪、叶群的卧室、会客厅、办公室和室内车库。林彪住在东边，叶群住在西边。中间“一竖”，是走廊和工作人员的住处，这里既安全又安静。

这个青灰色工字型二层小楼，外观很普通。但内部设施颇具匠心。室内墙壁极为宽厚，木质门窗非常坚硬，窗户全部用厚重的红色落地窗帘遮掩，密不透风。一楼分别有林彪和叶群的卧室、盥洗室和办公室。

林彪卧室西墙上有四个用来放电影的放映孔，大小高低有序。

在一楼转角处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是专门为叶群设计建造的。

别墅旁是利用山的地形建造的车库，十分隐蔽，有从车库到楼内的汽车通道，汽车可以直接开进客厅里。

林彪因为战争年代负伤，伤到了中枢神经，从此怕风怕水。所以在他的别墅可以看见一处特殊的设施，一个带有屋顶天窗的日光浴室。林彪经常躺在天窗下的大躺椅上闭目养神，既享用了温暖的阳光，又躲开了风雨侵袭。这个天窗下的咫尺寸方世界不仅是林彪修复伤病的地方，也是思考问题的地方。

1971年3月28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3月中旬，为中国乒乓球队是否参加日本举行的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一事，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不赞成去的意见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原因：自文革开始后，中国的乒乓球队已近5年没有训练，如此出征，当年的乒坛世界冠军一旦输了怎么办？对此，周恩来以很大耐心说服不同意参赛的一方。

3月15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

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

当天，毛泽东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这天，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送审稿写了如下批语：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

只在 18 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17 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3 月 18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文章认为：

巴黎公社。这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军队和警察，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把枪杆子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

巴黎公社打破了资产阶级奴役人民的官僚机构，创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政策，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管理。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所总结的革命原则是什么呢？

概括起来说，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文章提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

同时还说：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好的，总是适合社会发展的。

文章再次提到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斗争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他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是在

共产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上海1968年“412”炮打张春桥失败后,《文汇报》的朱锡琪等人受到批判,《文汇报》“北办”负责人艾玲大为惊慌。几天之后,在北京的艾玲主动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份检查,表示自己给上海《文汇报》打电话传小道消息是错误的,但申明自己没有参与报社的“炮打”。这份检查送到了陈伯达的手里,陈伯达专门召见了艾玲,当面安抚并鼓励她说:“你写了一份又长又好的报告!”艾玲见陈伯达不但没有批评她,居然还称赞自己的检查,简直有些受宠若惊,当场表示要加倍努力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工作。“九大”之前,张春桥特别提名,让艾玲作为上海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出席“九大”。艾玲对此感激涕零,她在回上海参加“九大”代表学习班时,眼眶里含着热泪对徐景贤说:“我真没有想到……我实在不相称……”

“九大”闭幕以后,艾玲的政治地位节节上升。她调回上海任《文汇报》革委会主任,并补选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成为上海新闻界的头面人物。

《文汇报》军宣队是上海空4军派驻的。庐山会议后,王维国通过《文汇报》军宣队负责人,多次把艾玲请到空4军军部去。特别是在上海市第四届党代会期间,作为第四届党代会的代表的艾玲,几次在散会后,被接到巨鹿路的空4军招待所,和王维国等一起吃饭,并作较长时间的谈话。这些情况,很快被时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兼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一把手的徐海涛察觉了。党代会期间,艾玲就编在他的小组。徐海涛将这些情况向张春桥、王洪文和徐景贤作了报告。

张春桥听了大吃一惊,马上要徐海涛核实消息是否确凿。结果徐海涛又一次报告:就在上海市四届党代会选举市委领导人之前的那个中午,艾玲又被请到巨鹿路空4军招待所吃饭去了。

1971年3月21日傍晚,上海市四届党代会刚刚结束,张春桥把王洪文和徐景贤两人召到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在客厅里,张春桥开门见山地说:“找你们两个来要办一件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对艾玲进行隔离审查!”

张春桥没有说毛泽东什么时候作的指示,也没有说要对艾玲的哪些问题进行审查。王洪文坐在沙发上抽着烟,徐景贤在一旁屏息静气

地倾听，谁都不敢提问。

张春桥一反往常慢悠悠的神态，断然地说：“今天晚上就采取措施。可以把她放在少教所。”

“少教所”的全称是少年犯罪教养所。1968年，这里就成了关押、审查、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场所。

张春桥进一步布置说：“注意不要出事……还可以派几个可靠的人，到《文汇报》她的住处去，把一些重要的材料，包括《海瑞罢官》批判的有关资料，连同她的笔记本等等，统统集中起来，不要散失！”

张春桥最后又部署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从兴国路招待所出来，王洪文和徐景贤回到康平路市委小礼堂贵宾室，紧急召来两个信得过的人，委任为艾玲项目组的负责人，并布置他们先审查艾玲卷入1968年“412炮打”的问题。接着，徐景先让秘书小张通知艾玲和《文汇报》军宣队负责人老余一起到市委来开紧急会议。为了稳妥起见，还特意派小张乘着市委汽车队的轿车去《文汇报》社接人。

这天深夜，借住在《文汇报》社整理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提供的理科大批判资料的王绍玺，忽然接到徐景贤秘书通过报社转来的电话，通知他马上到康办贵宾室开会。王绍玺赶到后，看见房间里除王洪文、徐景贤外，还有几个人都不认识，而且似乎那几个人互相也不认识。经王洪文介绍才知道，其中一人是市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空2师师长刘忠朴，另一人是市专案办负责人翁默清，第三人是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成员郑惠仪。王洪文说：“找你们开这个小会，是因为出现了紧急情况，朱锡琪在干校听说要清查‘5·16’畏罪潜逃。清查‘5·16’，北京、江苏早已开始，声势很大，我们一直没有动。张春桥要我们马上行动，今天就有个任务。”

原《文汇报》造反派头头、市革会常委朱锡琪，此时因“4·12”炮打张春已被挂职到“五七干校”劳动。

外面传来汽车的停车声，贵宾室的玻璃门打开了，穿着短呢大衣，脚登软底女鞋的艾玲跟在王洪文的秘书小廖后面走了进来。《文汇报》军宣队负责人老余穿着空军制服，跟在她的后面。

艾玲进门后，发现王洪文、徐景贤二人一改平常的客气态度，没有

站起来和她热情握手，而是板着面孔，先是一愣。又看到其他人除王绍玺外都不认识，更显得不安。

王洪文示意她在侧面靠墙的小沙发上坐下，军宣队老余坐在她旁边，室内的空气显得紧张而凝重。艾玲下意识地打开手里的拎包，取出钢笔和笔记本，然后戴上那副常戴的黑边老花眼镜，准备随时做记录。

王洪文咳了一声，缓缓地说：“找你们来，是要宣布一件事：根据领导的指示，从现在起，对艾玲施行隔离审查！”

艾玲的笔顿时停住了。她蹙紧眉头，脸色发灰，慢慢地取下老花眼镜，看着王洪文，木然不动。

王洪文不知再说什么，就示意徐景贤讲话。徐景贤似乎还没有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虽也板着面孔，却用低沉平和的语气说：“要你交代问题，是春桥同志提出的，你要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不要心存侥幸。你交代问题不论涉及什么人，都可大胆实事求是地写下来，自己密封，指定交给春桥同志或其他中央领导，我们保证按你的要求传送。”

艾玲没有说话，只是朝徐景贤看了一眼，眼神里充满着困惑、抱怨和绝望的神情。她缓缓站起来，仍然蹙着眉头，默默地随着小廖走了。

把艾玲带走后，王洪文、徐景贤他们又把《文汇报》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邵传烈带进室内。此时，邵传烈已经很紧张了，王洪文对他说：“看见艾玲了吗？你要端正态度，大胆揭发并交待自己的问题。”

徐景贤说：“你也犯过错误，但和他们不同。当务之急，是把报纸办好，千万不出什么问题，你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要大胆揭发。”

王洪文说：“曾经和艾玲一起在北京办事处的，要拉到报社外办学习班，不用你们掺乎。”

徐景贤问：“原北办的人都去参加学习班，对报社工作会不会有影响？”

邵传烈说不会有影响。徐景贤又说：“有什么困难及时与我们联系。你要振作精神，把报纸办好。”

邵传烈走后，王洪文向与会的人宣布了以下事项：

建议成立一个清查“516”的工作班子，因为上海已有一个专案办了，这个清查“516”的工作班子就叫“二专办”，办公地点在宛平路 11

号的一幢小楼里。王洪文强调：“班子要精干，目前只设一个艾玲专案组。各系统的清查由他们自己负责，你们只负责联络勾通。”

当夜，王洪文派刚成立的“二专办”翁默清和王绍玺到《文汇报》社，向报社另一个造反派头头周国荣宣布市委对他隔离审查的决定。这时他们发现，周国荣因参加报社劳动扭伤了腰，行动不便，便准备向王洪文报告。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没有理睬，将周国荣带走。当晚，周国荣和艾玲都被送进了位于上海西郊漕河旁“少教所”的隔离室。

紧接着，艾玲专案组的人奉命抄了她的办公室和宿舍，把有关《海瑞罢官》批判的资料和笔记本等贴上封条，直送兴国路张春桥办公室。

次日，根据王洪文的指示，王绍玺和郑惠仪一起，在外滩市革会大楼里，向正在上海学习的《文汇报》“北办”全体编辑、记者等10多名工作人员宣布，市委决定对他们举办揭发艾玲学习班的决定。然后，郑惠仪把这些人安置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底层的房间，这里是原苏联领事馆。

上海“二专办”成立后，大家对什么是“516”并不清楚，几经要求，王洪文提供了周恩来及纪登奎、李作鹏等关于清查“516”的讲话稿，均非正式文件，且是节录，大家看了仍如在云里雾里。这时，徐景贤告知：“清查‘516’的最重要依据，是毛主席为姚文元1967年8月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的一段文字：‘516’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反动组织，主要罪行是制造分裂，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数不多，但隐藏很深，背后有黑手操纵指挥；活动以北京为主，有的已分散隐藏到各地了。”

第 1166 回：北戴河，恩来向林彪汇报 睡朦胧，邀请美乒乓访华

3月23日，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

23日下午，周恩来与康生、江青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3月24日，毛泽东在黄永胜3月21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

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谓‘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黄永胜在检讨中还提到1970年5月17日江青召集他们开会的事：“第三、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涉及的人和问题较多。当时，我们感到问题较大；所以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和我曾两次在一块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我和法宪同志便到主席那里去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问题也没有说清楚。两次四个同志在一起商量，而德生同志没有参加，这实际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

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约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和汪东兴谈批陈整风问题。

毛泽东说：

“我捡了两块石头，一是三十八军的报告，砸了一家伙，这一下与陈伯达划清了界限。这块石头，我砸出去以后，起了一些作用。真理不一定在我们这一边，往往在下边，三十八军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他（指陈伯达）讲了几次话，文件在那里，都清清楚楚。我看了济南军区的报告，又砸了出去，砸了骄傲自满的人。”

毛泽东又说：“积代会这么多不好，有的青年人去讲假话，不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事情（指1970年的庐山会议）就出在没有调查。第一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过关了。第二是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虽然写过多次，现在看来不够了，要再补写一个。第三是吴法宪多次要求见我，我没有见，要见今天一起见。第四周恩来带你们几个到北戴河，去向林彪同志汇报。”

毛泽东提到的“积代会”，是指当时盛行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同意召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2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决定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同日，约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修改黄永胜等3人的检讨。

3月26日，周恩来派专人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送给北戴河的林彪，并告知准备亲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3月2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3月24日至29日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内容，并告知，他准备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于29日晚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并说，现吴法宪、叶群也在重写他们的检讨。又告：“我们外出两天，拟仍按上次外出规定，党的宣传组织工作由江青、姚文元负责，政府事务由李先念负责，军委工作由刘贤权、阎仲川商办。”

毛泽东批示：“同意。”

据李德生后来回忆说：“在华北会议的基础上，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带着我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看林彪。总理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29日晚，周恩来和黄永胜等6人前往北戴河，并在3月30日、31日两天，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拟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同时，还介绍了叶剑英带领专案组在广东调查陈伯达的情况和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同时，黄永胜汇报了战备工作情况；李德生汇报了华北会议情况；纪登奎汇报了国务院的工作情况；周恩来还谈了外交工作情况。

汇报完以后，林彪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同意毛主席对黄、李、邱的批示。对三人检讨很高兴。

当林彪听周恩来说，毛泽东对吴法宪、叶群的检查不满意时，林彪“要求”他们“重写一次”。并说：“他们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对陈伯达的问题，林彪很震惊地表示：绝没想到陈伯达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是“很大胜利”，“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

谈话中，林彪承认自己也“犯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脱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林彪还为他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作了辩解。

当周恩来动员林彪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彪不表示出席，也不表示不出席，没有说话。

3月30日，毛泽东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指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泽东还在刘子厚检查的最后一页批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并批告：“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

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的职务。4月14日，王效禹下放到辽宁盘锦垦区的西安农场填鸭厂劳动，生活待遇还比较高。后来，也被撤职的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同样安排到这里劳动，两位文革早期的老干部造反派走到一起。当时肖华也在此。

4月1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林副主席要我们转报主

席,他对主席从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措施,都完全拥护和支持,并认为完全正确,效果显著。这次会议把陈伯达揪出来,真是最大胜利。他对几位同志(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很高兴,要吴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在结尾,周恩来来说:“我们表示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开时回到北京,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要我们代向政治局同志问好。”

当天,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并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虽然周恩来汇报时,尽量为林彪说些好话,但是林彪没有明确表示回京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事实却无法回避。据李德生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4月3日,周恩来约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开会,讨论中央关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通知事。

会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开会通知。该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批准后于4月5日发出。

4月3日,林彪、叶群离开北戴河去大连。叶群是坐专机当天到达,林彪坐专列第二天到达。

1971年3月27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按照惯例,开幕那天,国际乒联举行招待会。主人致词之后,大家就举着酒杯随意走动起来,这时几个热情奔放的美国选手与中国运动员相遇,他们兴奋地说:“啊,中国人,好久不见了。你们的球打得真好!”那时中美关系十分敏感,中国代表团领导立即将此情况向国内作了汇报。这毕竟是中美运动员之间的一次邂逅,所以国内方面也没有什么反应。

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之后,中美两国选手在游玩中又碰到了一起。热情爽朗的美国青年笑着问:“听说你们已邀请我们的朋友(指加拿大队和英国队)访问你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啊?”

中国队负责人再一次向国内报告:“美国队希望访华。”

4月4日,美国男队第三号选手格伦·科恩到训练馆练球,不想出来后,竟然找不到自己来时乘坐的汽车。正在这时,一辆带有乒乓球

锦标赛标志的大轿车开了过来，科恩情急生智，连连招手，轿车在他身边戛然停住，科恩赶紧跳上车，长吁了一口气。当他抬头环顾车内时，不禁暗自吃惊，原来同车的全都是中国人。于是他独自站在车门口，没有找位置坐下。

这时，坐在车子后边的庄则栋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科恩身边，通过翻译和科恩聊了起来。庄则栋对科恩表示欢迎并向他赠送了中国礼品。这一意外的举动把科恩乐坏了，他和庄则栋肩并肩站在一起直到抵达爱知县体育馆，他们俨然成了好朋友。

这一幕被敏感的记者发现，他们把照相机对准了庄则栋和科恩，此情此景立即成为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

中美两国运动员友好交流的举动更加触动了美国队。他们的副领队来到中国队的驻地，开门见山问中国队的负责人：“你们中国邀请我们南边的墨西哥队去访问，也邀请我们北边的加拿大队，你们能不能也向我们美国队发出邀请呢？”

美国队这次正式提出访华的要求的确非同小可。中国领队不能当场答复，马上向国内请示。这份请示电报送到了国家体委，国家体委立即和外交部磋商，一致做出了“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决定，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决定的报告4月3日送到周恩来手里，他也在报告上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段批语。

4月4日，报告继续上报到毛泽东手里。经过三天考虑，4月6日在世乒赛即将闭幕的前夕，毛泽东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并要他的护士长吴旭君看完这份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办理。

这个拒绝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似乎就此尘埃落定。如果没有后面的转折，这份报告在中美交往史上只是一份入档保存的文件而已。

4月6日，就在退回这份报告后的当天晚上，周恩来过来向毛泽东报告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也谈起了外交部和体委的负责人讨论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吃完饭，坐在床边。这天，他提前服了安眠药，可就是不肯躺下睡，一直坐在床边。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他困

极了，低着脑袋，就这么低着头睡，不肯躺下。

过了一会儿，只见毛泽东嘴里嘟嘟哝哝的，他突然间说话了，但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正在旁边吃饭的值班护士长吴旭君见状赶紧过来，听了半天，终于听出来了，毛泽东是要她去给王海容打电话，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我的天哪，”吴旭君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文件上可是总理和主席都画了圈的，要是办错了怎么办？”

而且，毛泽东自己有过交代：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说的话不算数。“那毛主席现在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话，那还算不算数呢？”

吴旭君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她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她仍然呆在那里没有动身，继续吃饭。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吴旭君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

吴旭君故意反问：“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

毛泽东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

吴旭君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

毛泽东把大手一挥，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

听了这句话，吴旭君拔腿就往值班室跑，给外交部打电话。通完电话回来，只见毛泽东还坐在那里等她回信。吴旭君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完后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4月7日晨，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作出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立即告外交部以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当天，中国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政府惊呆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做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尼克松总统立即批准接受邀请。当时《环球时报》刊登的《乒乓外交决策内幕》一文这样描述尼克松总统的反应:“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

世界轰动了,看似体育界之间的交流一下子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国际事件。8日晨,周恩来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批注:“(邀美国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4月14日,美国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中国贸易的禁令。

尼克松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4月14日下午14时30分,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了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恩来与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发表了讲话。他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语,对他们表示欢迎。

他说:“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周恩来略略提高了声音说:“欢迎你们!”

周恩来身边的斯廷霍文马上回应:“我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

周恩来立即肯定地回答:“可以去!”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对此报以热烈的鼓掌。

他在回答美国队员格伦·科恩询问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运动的看法时说：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吗。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在美国本土更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与美国民间之手已经握在一起，距离两国的官方握手也就为时不远了。

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尼克松发出了一个重要口信：

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很是高兴。他和基辛格都意识到：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有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尼克松做出了这样的决断。

4月29日，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对周恩来4月21日的口信回话，表示诚挚谢意，愿在两三个星期内给予答复。

第 1167 回：四一五，批陈整风汇报会 庆五一，陈毅身患结肠癌

4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为该组组员。

4月9日，叶群、吴法宪又交上了他们的检讨。吴法宪在4月9日检讨中也提到1970年5月17日江青召集他们开会的事，称：“去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永胜、作鹏、会作同志和我两次在一起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永胜同志和我一起向主席作了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

4月11日，毛泽东关于黄、吴、叶、李、邱的自我批评的批语：
恩来同志：

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4月14日，毛泽东决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及毛泽东相关的全部批语在会上散发给大家。这一举措，使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更加紧张，频频向林彪告急。

林彪依然躺在北戴河日光浴中迎着刺目的日光与窗外灿烂的春意，苦思冥想……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这次会议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后，林彪让秘书写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特别注明“遵嘱代写”的字样。

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的第二天，即4月15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99位，加上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其中包括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等人。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回顾了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开展批陈整风的过程，说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几次失

掉自我教育机会，在毛泽东一再督促下才做出检讨。针对军委办事组一直批陈不力的问题，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希望在庐山会议上犯有错误的同志能够联系实际，搞好自我教育。他说：“我们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会上，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

4月15日下午，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天通报一次情况。

4月15日至19日，批陈整风会议分几个大组进行讨论。周恩来参加了东北组讨论。

4月18日，汪东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又作了第三次检查。

周恩来托人带话给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说“毛主席的‘很好’和‘可以了’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他的目的是缓解吴法宪和叶群两人对毛泽东要他们重写书面检讨的紧张情绪。实际上，黄永胜等人在庐山会议后已成惊弓之鸟。吴法宪甚至闹着要跳楼自杀，半夜做噩梦从床上跌倒地上，大喊“林副主席救命”。

为了避免扩大矛盾引起更大混乱，周恩来尽量协调各方矛盾，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委员却不卖账。他们基本不知道中央高层曲折的内幕。

庐山会议以后，上海的王洪文在抓上海“批陈整风”的同时，也注意加强自身的学习，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他和徐景贤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每天上午在徐景贤家一起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以后又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有了一些学习体会以后，王洪文接受徐景贤的建议，由徐景贤代他起草了一份向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书面报告，汇报自己学习马列著作的情况和收获，并表示要坚决揭露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所推行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这份报告深得毛泽东的赞许，批示作为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参阅。

上海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是王洪文和徐景贤，他们在北京京西宾馆住下后，经常到其他省、市代表所住房间去串门，还两次到钓

鱼台去,想拜访康生和张春桥、姚文元,没有见到。二人在会上作了联合发言,说陈伯达等人在庐山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是一次未遂的政变。

会议进行到 19 日,有人站出来揭发吴法宪在庐山会议上私下串连的情况,这无疑是在波澜涌动的激流中又投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浪花和涟漪马上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和兴趣。

4 月 19 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各组召集人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决定延长讨论时间。

这天,4 月 19 日,林彪与叶群一起坐飞机回到北京。

4 月 20 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并通过叶群转达他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讲几句话的愿望。

这天中午,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因为有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为了稳住的阵脚,回来“坐镇”,必要时出来说话。

4 月 22 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进展情况。会议商定,从 24 日起,各组进入批陈整风、自我教育的经验交流阶段,并决定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黄永胜、姚文元、纪登奎 6 人起草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大纲。

4 月 24 日、25 日,周恩来参加华东、华北、中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六个组的讨论。

4 月 24 日,周恩来将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情况报告送呈毛泽东、林彪。报告中说:“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能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纪念在天安门观看焰火。”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当天,林彪的秘书于运深向林彪汇报周恩来这份报告,林彪听后,没有表态。

4 月 29 日,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会议总结。这个讲话提纲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起草的,为了不让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压力过大,只在一两处点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

等5人的名，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实践自己的申明。

这个总结报告稿起初是由会议秘书组起草的，后经政治局讨论，专门成立了一个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纪登奎参加的6人修改小组。

原来吴法宪他们对自己错误的调子提得很高，有些是言过其实，戴大帽子。后来由周恩来、黄永胜、李先念、张春桥他们多次修改，把一些过重的话都删去了。其中很多话都是张春桥提出删改的。当周恩来在总结报告中刚讲到“几位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时，董必武带头鼓起掌来，大家都跟着鼓起掌来，很快热烈的掌声响成一片，一下子会议气氛变了。在热烈的掌声中，鼓着掌的张春桥笑容满面地从座位站起，接着是姚文元、江青也站了起来，他们都过来和吴法宪等几个人紧紧握手一一握手，全场一片欢腾。

原来，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有过指示，说“还是要回到‘九大’路线上来，要团结、胜利。人家已经检讨了，就要鼓掌欢迎。”

会议结束后，张春桥手里拿着文件兴冲冲从会场出来，王洪文、徐景贤迎上去问了好，又说了他们准备第二天就回去，问张春桥对上海工作还有什么指示？

张春桥皱了一下眉头说：“你们很活跃嘛。”接着又换了一种较为缓和的语气说：“我过去在市革会扩大会上讲过，《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要求杨子荣做到四个字：‘大胆、谨慎’。又大胆，又谨慎，对立、统一，这是符合辩证法的，那时我说我们也要照少剑波说的话做，既要大胆，又要谨慎。但现在我不要你们‘大胆’，只希望你们‘谨慎’，谨慎再谨慎！”

5月1日，国际劳动节，北京及各地都组织了欢庆活动。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焰火晚会。

夜幕落下。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广场四周的建筑物穿上彩色灯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全世界各民族大团结万岁！”的巨幅霓虹牌耸立在广场上，闪烁光芒。

中央领导人陆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毛泽东也到了，他看见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对他说：“你好。”

托尔斯季科夫回答说：“你好。”

毛泽东好奇地问：“俄国话‘你好’怎么说？”

“四德拉斯维结。”托尔斯季科夫说。

“？”毛泽东好像没有听清。

“四德拉斯维结。”托尔斯季科夫连说了两遍。

“很难讲。”毛泽东笑了笑，一句英文脱口而出：“Very good。”

托尔斯季科夫也笑着说：“Very good。”

周恩来又把正在北京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回国去了）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握住这位副团长的手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泽东走进大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对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径直走到屏风后面坐下来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双手合十的常用礼节向毛泽东问好，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

突然，门口一阵涌动，周恩来大步流星走了进来，陈毅跟在。

1970年7月后，疏散到石家庄的陈毅常常感到腹痛并伴有腹泻。到8月底，他想请示中央回京治疗，但正好接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的通知，便先去了庐山。

九届二中全会快结束时，陈毅、徐向前等几位老干部曾向黄永胜提出要求：希望让他们回北京检查一下身体，没有获准。

张茜看陈毅病情加重，催他写信给周恩来，请求回北京治疗。周恩来接信后立即表示同意。1970年10月21日，陈毅回到北京，当天便由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直接给301医院负责首长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长打电话联系住院检查，于10月26日，住进301医院南楼三层六病室的套间，这是进门的第一个病室。因为陈毅住院没有带服务人员，安排这个病房离护士站近，便于照顾。据邱会作讲，这是301医院当时最好的病房。

住院期间，江青、叶剑英和吴法宪、邱会作都去医院看过陈毅。

经过专家会诊和肠胃钡餐透视等检查，并请北京的放射科专家会诊、讨论，认为“不显示肠癌迹象”。到12月22日，陈毅要求出院。曹根慧副院长希望他多住一段时间，再继续观察和检查。陈毅说：“毛主席快过生日了，我要去为毛主席祝寿。”

陈毅出院后，情况还是不太好，经常感到腹部疼痛。20天后，也就是1971年1月16日上午8时，他来南楼做理疗，理疗科的医生让他先检查一下。经南楼值班的陶医生检查，立即决定陈毅住院，并报告了曹根慧。

当天下午16时，曹根慧让腹外科专家陆惟善过来给陈毅会诊，同时请了北京医院外科的周光裕主任。他们摸到陈老总腹部有块状物，因为陈毅上次住院拍片还不到一个月，即便有肿瘤也不会长得如此之快，大家分析，根据疼痛的情况，急性阑尾炎的可能比较大，应立即进行手术。为了抢时间，301医院直接给周恩来打报告：陈毅阑尾炎亚急性发作，需要立即做切除阑尾的手术。并于下午17时许，送达中南海。

周恩来立即批准了301医院的手术报告，并派中南海的保健办主任卞志强医生陪张茜一同去医院为陈毅手术做准备。

晚18时15分，开始给陈毅做手术，靳来川院长，曹根慧院长，卞志强医生均到场督阵。

手术是按阑尾炎准备的，但是，打开陈毅的腹部一看，不是阑尾炎，在升结肠肝区摸到一硬块。

块状物是因肠梗阻积聚的粪便，病灶没有找到，找到病灶是必须的。但原来是为阑尾炎手术开的是一条竖的小口，现在要在腹部扩大探察必须再开一条横的刀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T”字形刀口，腹外科专家陆惟善和北京医院周光裕都同意这个方案，为了加强力量，靳来川院长又调来心肾科主任黄宛，外科副主任周明礼，病理科主治医生游联壁参加手术，同时让卞志强立即给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同意了这个的方案。

很快，包块暴露出来了。在陈毅结肠部位发现肿块，并与肝脏粘连，经快速病理检查确定为结肠癌。

陈毅的手术做了5个小时。

陈毅手术后两个月，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到日坛医院，由全国著名的放疗专家吴桓兴院长亲自为他做“放疗”。每周六次，剂量大小，时间长短，完全由吴院长根据陈毅的病情及对治疗的反应来控制。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陈毅身体开始好转，体重增加。这次他在天安门上出现，大家纷纷询问他手术后的恢复情况。老总笑哈哈地一一作了回答。他与在场的外宾一一握手。翻译们个个喜形于色：“陈老总身体很好，还能回外交部领导工作！”

周恩来将陈毅带到屏风后面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谁来了？”

毛泽东抬起眼帘，凝神细望，咧开嘴笑了。他站起身，去握陈毅手。

陈毅还和从前一样，先给毛泽东立正敬礼说：“报告主席，我来了。”然后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

“身体怎么样啊？”毛泽东一向言简意赅，这次却问了两句意思相同的重复话：“恢复得好吧？”

陈毅用力拍拍厚实的胸脯回答道：“恢复得很好，主席！”

“少个零件不要紧。”毛泽东与陈毅谈话总能保持轻松的气氛，“剩的零件不要出问题就好。”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陈毅看不到丝毫的情绪低落。

毛泽东望着陈毅，由衷地笑了。

西哈努克亲王过来紧紧捧着陈毅的手连声问候。

第1168回：礼花放，林彪竟不辞而别 为大局，周恩来费尽心机

按照预定的时间，焰火晚会就要开始了，但是还不见林彪的身影。周恩来有点着急，他让秘书打电话，询问林彪在什么地方。

从庐山下来后，林彪的情绪一直低沉，哪里也不想去，原来仅有的踱步和“转车”也几乎没有了，几乎整天就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不与任何人交谈，也不听讲文件。五一节的焰火晚会，他说身体不好，也不想参加。

毛泽东离开中南海时，周恩来曾亲自打电话到毛家湾，通知林彪办公室：“林副主席出发没有？叫他快来，主席已经出发了。”

电话是林彪办公室那天的值班秘书于运深接的，他立即向林彪做了报告，林彪没有说话。

毛泽东到天安门城楼后，周恩来再次给毛家湾打电话，还是秘书于运深接的，周恩来说“主席已经到了”，他再次请林彪赶快到天安门城楼来。

于运深立即向林彪通报，叶群也在一边催促说：“必须去，总理也打电话催了。”

林彪愁容满面，明显地很不情愿，但还是站起来，在内勤帮助下穿上大衣。

专车早就备好了，毛家湾距离天安门很近，警卫秘书李文普陪林彪去了天安门。

天安门城楼上，溴钨灯发出耀眼的亮光。烟火晚会就要开始了，工作人员来到大殿休息室，请首长们到城楼参加晚会。毛泽东站起身，对旁边的西哈努克作一个请的手势，率先走向城楼的平台。这时，林彪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

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他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他是国家代主席……

这时摄影记者杜修贤发现,最西侧的位子空着呢。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他看到,坐在旁边圆桌前的周恩来也在左右环顾。

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空空的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

周恩来不停地看表,焦急地等待着。终于,林彪和叶群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人们自觉的闪开了一条通路。

5月的天,林彪穿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径直的大步登楼。

叶群则面带笑容环顾左右,频频向周围的人挥手致意。

林彪走到毛泽东的桌前,敬了一个军礼。

毛泽东抬起头,向林彪点了点头。

叶群随后过去紧紧的握住毛泽东的手,不知说了些什么。

毛泽东笑了,用手指着叶群点了几下。

叶群很是激动,又连连的说着。

林彪走到西哈努克夫人旁边的空椅子上坐下,董必武探过头去,关切地问他:“身体不大好?”

林彪向董必武倾下头,望着桌面回答说:“不好。”

林彪确实让人感到身体不好,5月天穿着大衣,双手抄在袖筒里。天安门广场上灯火辉煌,人声鼎沸,他全然不闻不见,仿佛正在对付体内的寒冷。毛泽东还在与西哈努克谈话,没有看林彪这里。

叶群离开毛泽东那里后,又走向西边周恩来的那一桌,和周恩来握手后就靠着他坐了下来,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杜修贤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但是他觉得此时的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

突然,林彪起身离坐,向李文普和叶群内勤毕新清站立的地方走过来,毕新清以为他要如厕。谁知林彪到他们跟前,挥了一下手,说:“走,回去。”

毕新清愣住了,焰火正漫天飞舞,主席也没离位,他就不辞而别?毕新清见李文普已经跟着林彪走了,这才想起来赶紧去叫叶群。正在听叶群滔滔不绝倾述的周恩来,一听林彪走了,满脸尴尬,说不出

话来。

叶群慌乱了，忙不迭的给周恩来点了点头算是告别，跟着追下城楼。

当杜修贤再回头时，一下僵住了：“林副主席不在了！”

大惊失色后，他又感到自己非常可笑：“林副主席能到哪儿呢？还不是去卫生间了！”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林彪没有出现。杜修贤开始着急起来：“林副主席会不会走了？”想到这儿他心里煌煌的，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拍摄还没开始，林彪走了，他们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他仍不失信心地望着卫生间的方向，希望林彪会出现在他的镜头里。

毛泽东不动声色，和西哈努克亲王继续谈话。

“嘭——哗”，第一束礼花腾空而炸。

城楼上的人们忘记了那张空座位，目光被礼花拽到了五光十色的天幕。

西哈努克向董必武询问了几句，董必武说：“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也就释然了。

礼花仍在不断地往天上蹿，漆黑的天幕犹如坚硬无比的钢板，一撞上去，礼花就粉身碎骨，飞散出多姿多色的肢体。

“老杜。”是周恩来在叫杜修贤。杜修贤赶紧转身，但是他原地转了个圈，也没有看见周恩来。

“老杜，你过来！”

“还是总理的声音。人在哪儿呢？”杜修贤眼前都是穿梭不停的人影。终于，透过人影缝，他看见周恩来在大殿前的柱子旁着急地朝他招手：“过来，过来，快点。”

杜修贤赶紧走了过去。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周恩来劈头就问。

“啊呀，我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

“我问你照了没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电影电视呢？”

杜修贤刚想说没有，见周恩来着急的样子，话到嘴边变成了“不知道！”

周恩来思索片刻，说：“老杜，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叫来，都叫来！”

杜修贤见周恩来神色严峻，不敢多问，拔腿就朝外走，在大平台上找到了几个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其中几人是军管会的，他们随杜修贤走进休息室。

周恩来见杜修贤他们进来，站起身迎面走过去问道：

“电影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吗？”

“没有……”

“那么电视呢？”周恩来又问。

“没来得及拍，……”

“没有拍到，对不对？”周恩来讲话不像毛泽东爱讲反话。他是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晚上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不知谁这时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周恩来生气的问：“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你们都看见的，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眼快手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在场的人都一声不吭。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口气缓了些：“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心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靠解释。”

“是！总理，我们回去一定要好好整顿记者队伍，从思想上找原

因。以此为戒，杜绝类似事情发生。”

“对，要好好从思想上查一查，还有没有政治头脑？有没有工作职责？”

“是的，总理。”

周恩来双手抱胸，来回踱了几步。他扬起疲惫的脸，嗓音有点嘶哑，清咳了一声：“今天的活动有些特殊，有难度。这一点我清楚。但同志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变化的思想准备，不能老想办现成事吃现成饭。今天你们不要怪我对你们严厉，严厉一点有好处！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大家垂着头散开去。杜修贤一直躲在屏风后面，这时也轻轻地走出来，随着人群往外走。

“老杜，你等一下。”

杜修贤心里一哆嗦：“总理发现我了！”

“你快去冲洗照片，一个小时内送来，西花厅。”

“嗳！”他松了口气，旋即走进深沉的夜色里。

一路上，他为机子里的照片祷告，千万千万要成功啊！

暗房里，红色灯光中，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色相纸在透明显影药水里，一点一点地显影，深色的淡色的在水中快速变化。杜修贤喜出望外地将显影好的照片浸在定影水里，细细观看，此时他终于可以吐出一口气了——

说实话，这张照片作为资料照片或许比当作新闻照片用更为合适些。

——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讲话。

——林彪裹着呢大衣，像农民那样双手操在袖筒里，躬着背，也侧着脸和董必武交谈。

取景的角度有点偏……可仅此一张。

夜深了。杜修贤驱车来到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杜修贤轻轻推门走进去，周恩来没有发觉他，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杜修贤轻唤了一声“总理”，周恩来才停下笔，手扬了扬叫他坐。杜修贤没坐，把照片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照片，看到毛泽东和林彪的照片，问：“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呵，就这一张。”周恩来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

杜修贤不好回答，因为他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周恩来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

5月2日，报纸出来了，登在头版头条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杜修贤的那仅此一张的照片，标题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第二张照片下的说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华社记者摄。”这张照片与后来发行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71年五一纪录片镜头是一致的，但是不应该是1971年5月1日晚拍摄的。因为那晚林彪迟到了。

再说5月1日晚，林彪回到毛家湾，一进门，见到几位迎上来的秘书，就问道：

“你们看看，我像不像个病号？”

林彪问的唐突，秘书们无人应对。

据林彪秘书回忆，“批陈整风”开始后，林彪一蹶不振，不理政事。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后，林彪不再愿意听文件，哪怕是只批给“林、周、康”三个人的文件，秘书也报不上去，都由叶群处理。这时期，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总是把毛泽东、林彪的批语印在正文标题前面，用醒目的红字印着“毛主席批示：同意”，“林副主席批示：同意主席批示”；或“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发”，“林副主席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毛主席已圈阅”，“林副主席批示：同意主席批示”。这里，毛泽东的批语无可非议，林彪的批语却不伦不类。林办的秘书都知道，这种怪事不是林彪做出来的，而是叶群的杰

作。林彪在《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上的批语，在《中共中央转发38军党委〈关于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的通知》上的批语，在《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的通知》上的批语，在《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上的批语等，其实都是出自叶群之口，由保密员李根清代替林彪写上去的。有一次，于运深向李根清转达叶群口述的“林彪的”批语时，李根清忍不住向于运深提出意见：

“应该提出建议，这样批，逻辑不通，不如不批。”

于运深长叹一口气，说道：“我当面提过啦。主任说，你们不懂，坚持要这样批，没办法，你就这样批吧。”

林彪在5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焰火晚会上早退了，但是叶群没有与他一起走，而是继续留在天安门城楼上。她看到毛泽东进休息室休息，也跟了进去，与毛泽东谈了将近两个小时。

叶群对毛泽东说，林彪这两天身体生病很不舒服，要请病假，无奈这样的场合一定要出席，才勉强来了。毛泽东安慰了叶群。

回到毛家湾，叶群非常高兴，当晚，即把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向林办的秘书们炫耀一番，随后又告诉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

叶群说：“同主席谈得很好。”“主席谈笑风生地和我说了很多问题，还是和对我报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没有加新的东西。”

她说：毛泽东批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对林彪帮忙不怎么高明。”叶群向毛泽东解释是“帮了倒忙”。

叶群还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说：“别的没有什么事，”让他们宽心。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叶群心情轻松许多，还亲自到文物管理处选购文物。而林彪因毛家湾装修，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依然是闭门不出。

第 1169 回：加西亚，廿九期《外交简报》 纠错误，还历史本来面貌

1971 年 1 月 2 日，古巴驻华代办处举行古巴革命招待会时，周恩来亲自出席。中古关系已连续五年处于冷而不断的状态。周恩来亲临古巴使馆是 1966 年后的第一次，显然不是一般礼仪活动，因而引起了出席招待会的各国使节的极大关注，古巴代办加西亚更是激动不已。

招待会上，加西亚对周恩来谈了他对发展古中关系的一些看法，态度诚恳友好。他告诉周恩来，他已在北京近 4 年，即将离任，希望在返古之前能去外地看看，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近况。周恩来表示赞成，并要他同中国外交部商量。

过了两天，加西亚约见礼宾司副司长韩叙，正式提出在他离任前与其夫人和 10 岁的儿子同去外地参观的要求。韩叙同欧美司副司长凌青商量后，经外交部批准，同意加西亚一家作为外交部的客人，由外交部欧美司拉美组组长陶大剑陪同，到延安、井冈山等地访问，并电告当地省革委会外事组，请他们负责接待。

从 1 月 12 日至 26 日，加西亚一家先后访问了西安、延安、上海、南昌、井冈山、杭州等地。参观各地的革命历史遗址和纪念馆，如上海中共一大会议旧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也看了几处人民公社和工厂。有的地方安排有文化活动，如观看“红小兵”表演的革命歌舞节目等。

离开延安前，地区革委会负责人征求加西亚对访问的意见，加西亚提了两点希望。他说，延安是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地方，肩负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是接待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向他们介绍延安的革命历史和中国的革命经验；另一个是生产，别的地方发展了，延安怎能落后呢？延安自然条件差，水土流失严重，要下很大的力量做这方面的工作。“你们有许多事情要做，但这两件事十分重要。”

到了南昌，日程上没有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外交部陪同人

员提出能否加上。江西省革委会外事组负责人说，纪念馆现在不对公众开放。加西亚没有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外事组负责人对他解释说：“纪念馆正在整修。”

在井冈山，各处遗址都刻意渲染林彪。“黄洋界”的地名碑是林彪写的，龙源口大捷是林彪“直接指挥”的，毛泽东旧居旁是林彪的旧居，甚至有一处还展示了黄永胜的旧居，却没有一处提到参与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朱德、陈毅等人的名字。

在井冈山根据地革命历史纪念馆，悬挂着一幅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大油画。年轻的讲解员介绍说：“1928年春，林彪同志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在这里会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离开江西前夕，加西亚向江西外事组负责人提出建议说，在讲述中国革命时，应该介绍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这两段历史。不提这些历史事实，对中国人来讲可能容易理解，但外国人不容易理解。加西亚还特别提了一下江西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他说：“虽然是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但江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性胜利的根据地。讲历史事实不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反而能使人们加深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认识。”

他还告诉中方人员，古巴也有过类似的对历史的处理问题。有一次卡斯特罗出席一个纪念古巴革命英雄埃切维里亚的会议，会上古巴青年团的负责人重读了埃切维里亚在发动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武装起义时的一份声明。但卡斯特罗发现这个干部故意漏掉了宣言原文最后类似于“上帝保佑我们”这样的语句，于是他打断了那个干部，要他重读这句话，还说了一段大意是历史就是历史这样的话。

加西亚一行在杭州参观游览两天后回到上海。返京前夕，他和外交部陪同官员谈起这次访问的观感，说对这次访问很满意，各地接待热情友好，使他有机会接触地方干部和群众，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和感情。不过，他也批评中国外交部与驻京使团的接触太少，缺乏交流，“感觉不到中古人民间的友谊”。加西亚重复了在延安提的意见，特别

是在江西提的意见，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不仅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是“朱、毛会师”，是朱德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不是“林彪副主席”，《毛泽东选集》和斯诺《西行漫记》上都有记述。加西亚还拿出一本他随身带的英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的书，翻给他们看有关章节。他说，应该尊重历史事实，任意篡改会有损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加西亚在大学念书时就钦佩中国革命，敬仰毛泽东。

回北京后，陪同加西亚的外交部干部陶大剑向外交部有关领导口头汇报了访问情况和加西亚的反映，特别是在江西的情况和加西亚的批评意见。外交部有关领导让陶大剑把这些批评写入简报，向上反映。

经过两三天考虑，陶大剑写了一份 1000 多字的简报，题目是《古巴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前两节提到加西亚对“大兴水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蚂蚁啃骨头”的正面反映，三、四、五节反映加西亚在延安、井冈山和对外交部提的批评意见，重点在井冈山这一节。其中第四条写道：“四、(加西亚)向江西外事组同志建议，在介绍中国革命时应该提到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在参观井冈山时，讲解同志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加说，这两件事应该提，不提对中国人来讲可能容易理解，但外国人不容易理解。对历史事实不要不提，应该提，但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照耀下去正确评价。提这些历史事实不仅不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相反，人们会通过对当时的各种错误路线的了解，更加体会到毛主席路线的正确。尽管是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但江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性胜利的根据地。”

2月6日，外交部办公厅有关单位将这份“反映”编印成第29期《外事活动简报》，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军委办事组、中央涉外单位和新闻单位，以及外交部部、司领导。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章文晋部长助理看了简报，立即联名“推荐总理一阅”。

2月12日，周恩来将这份简报和另一份材料转呈毛泽东，并在《简报》上写到：

“两件即呈主席参阅。退周恩来。七一年二月十二日。”

很快,写有毛泽东批示的这期《简报》退回外交部。毛泽东在《简报》左侧边沿上批道:

“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毛泽东的批示在外交部各单位通报后,4月4日作为《外交部文件》印发,分送范围比《简报》扩大了许多,包括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外事组。文件的标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批示”。用套红、大字印刷,内容只是毛泽东批的那一句话:“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而《简报》全文则作为附件。

接着,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有外交部等外事部门和涉外单位、新闻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一次研究工作的会议上,特别提到了毛泽东的批示,赞扬加西亚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精神,并对南昌起义和井冈山会师作了简要的阐述。

中央宣传小组也将毛泽东的批示和《简报》作为宣传工作通报,发至全国各宣传部门。

4月23日晚,加西亚离任前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参加这次接见的中方人员还有外交部的凌青、韩叙、陶大剑和翻译沈允熬。他们提前一刻钟到达福建厅。

等了几分钟,周恩来走进来,同他们一一握手后,向中间靠右的沙发走去,同时问道:“加西亚明天就要走了吗?他在中国四年多,访问了哪些地方?”他坐下后又说:“这个代办很有头脑,他提的意见,毛主席批了。”

周恩来问韩叙:“是不是你陪加西亚去江西的?”

韩叙指着陶大剑回答说:“是陶大剑陪他去的。”

凌青和韩叙要陶大剑向周恩来汇报一下去江西的情况。陶大剑走到周恩来面前,刚说了半句:“总理,是我陪加西亚去的……”周恩来就打断了他的话,要他在自己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再说。

于是大家都坐了下来。陶大剑着重汇报了《简报》上没有直接反映出来的情况,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被红卫兵封了,井冈山纪念馆那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会师的油画,以及加西亚谈到全世界都知道“朱、毛会师”和不提朱德外国人不能理解等意见。

周恩来耐心地听着,还插话说:“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嘛!”他问韩叙

和凌青有没有将毛泽东的批示告诉加西亚。他们答：“没有，准备请总理接见时告诉他。”

20时30分，加西亚准时到达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在福建厅门口欢迎他，同他合影。

谈话开始后，周恩来对加西亚说：“你来中国四年两个月了。这段时间正是我们文革紧张的时候，差不多从头到尾你都知道了。”

加西亚说：“这是一种特权，是一个大学。在文革期间，当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时，我们不理会，因形势不正常，有些事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控制的。”

周恩来讲起了加西亚访问江西时提的意见。他说：“你提出，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应该把南昌起义后，朱德同志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这段历史展览出来，这个意见完全正确。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我把你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同志。他马上批回来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并且要我们告诉展览馆更正。”

接着，周恩来讲了“八一”军旗图案的来历。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图案就是‘八一’两个字。定军旗图案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就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就是一个图案了。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用‘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

周恩来进一步介绍说：“毛泽东同志参加‘八七会议’后，带领一部分农民武装和工人武装，还有没有赶上参加八一起义的警卫团，黄永胜就在这个团里，组成一支工农兵武装上了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站住了脚。时间在八一起义之后。八一起义虽然方向对，但政策错了。城市为主，依靠外援是两个根本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我犯的，南昌起义时我是前敌委书记。参加八一起义的有我们党初期的许多人，朱德、林彪、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叶挺、郭沫若、恽代英，董必武最老，也参加了。另外还有李立三、张国焘。当时党中央在武汉，我们把军队从武汉拉到南昌，高举反对国民党的旗帜，所以大多数中央委员

都参加了。这是党的一件大事，不能因为失败，就不纪念。”

周恩来还讲了朱德上井冈山的情况，并特别提到了林彪。他说：“南昌起义时有两支军队，一支是贺龙的，一支是叶挺的。叶挺在北伐战争时带领一个独立团把武汉打下来，那时林彪在这个团当排长。1927年，我们在汕头外围打仗时，留下朱德率领的一部分军队牵制国民党军队，林彪在团里当连长，陈毅同志在团里当支部书记。朱德的部队没有参加汕头作战，没有受到损失。朱德带领一部分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广东北部、湖南南部，最后在1928年春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会合。这就是两支部队的会师。朱德是军人出身，当师长，毛泽东做政治委员。所以从1928年后，中国反动报界总说‘朱毛’，把这两个名字一直连在一起。毛泽东同志说，不管这个同志后来犯过多少政治路线错误，他把一支部队带到井冈山，这是一个大功，保留了很多干部。所以写历史总是把这件事写上。”

周恩来说：“朱德同志年纪大，85岁了，身体不好，休息时间较多，没有参加这次运动。我们的红卫兵翻他的历史，说他犯过错误，反对过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南海里贴大字报，说他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来说话了，你们年轻人不懂得历史，这是不对的，朱德同志还是‘红司令’，虽然他犯过错误，但我们总还是一起战斗到现在。所以党的九大仍选他参加政治局。上井冈山是正确的，南昌起义失败了，犯了错误。两方面对照起来就更显得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路线正确。这是我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很欣赏你的意见，合乎他的思想。”

周恩来感谢加西亚帮助中国纠正了一个历史错误，并就他在机场被中方人员要求读《毛泽东语录》一事表示歉意，说当时中国的外交工作出现了无政府状况，外交部甚至一度失去了对密码的控制。周恩来介绍了文革中的国内情况，针对当时的军管情况，周恩来说，军队现在应该回到军营中去了。

而后，周恩来对加西亚说，请他把谈话内容转告古巴政府和卡斯特罗，并同意加西亚作记录。接着，他用了很长时间谈国际问题。周恩来说了美苏争夺世界霸权、越南抗美战争形势、美国内部的困难和矛盾、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等问题。

周恩来说，他4月14日接见应邀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打开了两

国人民友好来往的大门,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

周恩来强调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台湾而不是越南。他还告诉加西亚:中美很快就可能在最高层展开接触。

加西亚根据当时古巴官方的立场说尼克松政府是法西斯政权,尼克松英文名字中的 X 在古巴报纸上从来就是印成法西斯的那个符号(卌)。

周恩来纠正他说:尼克松不是法西斯,美国永远不会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他们还谈到了当时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独立出去,成立了现在的孟加拉国,这在当时引起了印巴战争和国际冲突。当时,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反对东巴独立,而印度和苏联支持东巴独立,中国认为这是苏联在南亚扩张势力并和印度地区扩张主义联手。

加西亚说他认为东巴要求独立是东巴民族主义问题,周恩来承认他的看法有道理,但说中国必须支持巴基斯坦,反对东巴独立。

这次接见一直持续到半夜 24 时才结束。加西亚几次提出“不愿使总理太劳累,”要起立告辞,都被周恩来留下。

周恩来借这次机会向加西亚详细阐述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向古巴暗示中美可能很快发生关系的信息,让古巴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周恩来接见加西亚的谈话记录于 5 月 1 日印发,分送范围比《外事活动简报》有所扩大,增加了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

第 1170 回：迎美使，钓鱼台仔细安排 盛情邀，江青为林彪照相

5月17日，贺龙专案组向康生、叶群、黄永胜、吴法宪等负责人报送《关于通敌分子、篡军夺权阴谋家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

5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给中国带回了口信表示：为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双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

尼克松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基辛格准备在6月15日以后到中国来。

5月22日，尼克松又补充了一个口信，说明美国总统在5月20日发表的关于美苏两国政府同意在今年内制订出一个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的协定，决不会影响美国总统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不签订任何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基辛格也准备把这个问题列入他将参加的预备会议的议程之中。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讨论中美关系和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会谈。

周恩来认为：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可一世，什么地方有事它都要过问，而现在却不同了。越战不得人心，迫使它不得不把军队往回撤。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政治地位更加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它要考虑，是继续在各方面出击呢，还是收缩一下？综观全局，它首先要解决印支问题，就不能不同中国接触，就要同中国打开关系，而我国利用这一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将有利于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

斗争。

会后,周恩来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5月30日报送毛泽东。《报告》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历程,对同基辛格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了充分估计,并拟出了各种相应的对策。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提出关于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即: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毛泽东批示:“同意。”

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给尼克松发回口信:“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6月15日到20日之间。”

5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

6月2日,当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把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基辛格后,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拿着用打字机打印了的口信兴冲冲地一路小跑去找尼克松。尼克松也眉开眼笑,他说: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说着,尼克松打破晚饭后不喝酒的惯例,斟了两杯白兰地,和基辛格兴冲冲地干杯以示庆贺。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灵机一动:“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

就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紧张准备基辛格的“波罗行动”时,周恩来亲

自掌握的一个工作小组住进了钓鱼台4号楼，专门负责基辛格这次访华的保障工作。这个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等。

为了保证基辛格的这次访华，工作小组对参加接待工作的人员做出严格规定：凡进驻钓鱼台国宾馆参与接待基辛格的人员，一个月内不许回家，对没有参加接待组的任何人都不许谈及此事，家人不能说，朋友不能说，参加这个接待工作期间，什么电话、地址都不能说。接待人员的管理也采用当年地下工作的方式：单线联系。

周恩来亲自带领接待人员到钓鱼台国宾馆，选定了靠北头、比较僻静的5号楼作为基辛格一行的下榻之处。中方接待班子就在邻近的4号楼办公。这个院子里还有个6号楼，当时空着。6号楼与外面由一座小桥连接，桥上安排了警卫站岗。这两座楼靠近北门，当时规定除参加此次接待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走北门。

周恩来就房间里的摆设和接待工作做了明确指示，要求一切本着有利于这次中美高级会晤的气氛出发。

文革期间，钓鱼台国宾馆几乎不接待外宾了，庭院荒芜，什么花草都没有。工作人员通过公园的一个老花匠，从他家里搬来了几十盆花，布置在台阶和前面大门的两边点缀一下，表示对外宾的欢迎。同时，还特别对5号楼进行了一次粉刷，沙发、窗帘和一些家具等全部换了新的，对空调等也做了全面检查，还在基辛格的客厅里增摆了酒台，放了中外名酒和香烟等。当时，钓鱼台各楼房间都摆着《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等，接待组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拿走了《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但没有想到，后来基辛格一行走时还特意向中方要了《毛泽东选集》。

另外，还有不少文革期间的工艺品，像红卫兵的瓷塑和墙上挂着的宣传画等，也都换成了文物、国画等。摆放的报刊杂志也作了挑选。在大厅摆放了明代的紫檀木条几，所有画作都换成清代名画，在基辛格的起居室陈设柜里，放了十多件名贵古玩，有明代的青花瓷器，清代的景泰蓝和玉器，还有殷商青铜器等。在基辛格住的房间里还摆了一个大花篮。

在客人的饮食方面也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那是国宾馆第一次

接待如此高级的美方官员。钓鱼台平日还没有准备“起司”(奶酪)，听说美国人爱吃，就专门从别处选购。又了解到美国人爱吃海味，就准备了鲍鱼、海参、鲜贝等。两天的菜谱都由周恩来亲自审定。他还特别提出，应该让基辛格他们有机会尝尝烤鸭。去烤鸭店不方便，接待组就请了北京烤鸭店的一位老厨师来钓鱼台，搞了个小烤炉。

为了准备即将来临的中美会谈，周恩来多次主持会议，反复讨论会谈方案，并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家庭生活，乃至爱好习惯都作了研究。

周恩来还特地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

6月3日上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姚文元、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及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最近打了一个乒乓球过去。”“我最近看布达佩斯报纸上一篇文章，它也赞成。你们赞成，我也未料到。”

他说：“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建立平等关系。比如圣马力诺，一万多人口，我们不胜荣幸之至，跟这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谈到中国的情况时，齐奥塞斯库说：“你们关心教育改革，使教育同生产、生活、社会主义建设更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一点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说：“想是这么想，在这里实验。对旧的资产阶级教授也还得用，不然我们没有啊。不过他们也应该听工人的话，听农民的话。这就要时间，慢慢来。已经21年了，过去也有一些进步，在教育方面不能讲完全不对。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一条，就是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在最近几年才开始。”

这次会见，林彪只参加了几分钟就退出接见大厅，一人在外面走廊的长椅上呆坐，一直到会见结束。

6月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读《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这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听取清华大学常委谢静宜汇报她准

备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谢静宜问毛泽东：对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应该如何估价？

毛泽东说：对十七年教育战线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可以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谢静宜汇报说：“现在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说个别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毛泽东说：“还是认的，自己的爹娘能不认吗？就是爱面子，当着人的面不好意思就是了。”“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毛泽东还说：教育革命要大胆实践，实践对了就干，实践错了就改。

6月8日下午，叶群带着她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搞到的鸡血石到钓鱼台10号楼给江青看，江青也拿出她拍摄的照片请叶群欣赏。叶群夸赞江青的摄影水平高，两人说也要给林彪照张相。

6月9日下午，林彪、叶群来到江青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江青的秘书杨银禄急忙到江青的办公室报告。江青放下手中的文件，快步走到楼厅。林彪从沙发上站起来，同江青握手。

江青说：“欢迎林副主席来我这里。看到林副主席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

叶群说：“今天林彪同志来这里，是请江青同志照相的，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你们两位一见面这样高兴，我也很高兴。”

这时，江青突然发现林彪没有刮胡子。她不客气地动员林彪刮胡子。林彪却说：“不用刮了。年纪大了，不要讲究了，有胡子没有关系。不想刮。”

叶群忙劝林彪：“江青同志亲自给你照相，胡子不刮不好，刮了显得年轻，精神焕发。”

林彪瞪了叶群一眼，没说什么。

江青又劝说：“你是党的副主席，解放军的副统帅，照的相应该有领袖气派。”

在两个干净利落的女人不停劝说下，林彪也就勉强同意了，说：“刮就刮吧。”

林彪刮胡子也和常人不一样,既不用热水湿一湿,也不用热毛巾敷一敷,更不用香皂、肥皂或剃须膏抹一抹,而是干刮。

林彪临时决定在江青住地刮胡子,可想而知,不太方便,没有带刮胡刀。他的警卫员李文普问江青的秘书杨银禄:“杨秘书,你有刮胡刀吗?”

杨银禄说:“有,就用我的吧。”

林彪的胡子是李文普帮他刮的。刮胡子时,林彪坐在一张带靠背的椅子上。由于是干刮,所以刮得刷刷作响,他既不说疼,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他刮完胡子,在江青、叶群陪同下,乘坐各自的汽车到17号楼,那里有谢富治专为江青布置的照相室。

进入照相室以后,江青拿着心爱的照相机,一边摆弄着照相用的灯具,一边对林彪说:

“广大党员、广大群众和广大的解放军指战员,都知道林副主席跟毛主席跟得最紧,对毛主席的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活,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

这时,林彪端坐着,一言不发,静静地等待着江青摁动相机快门。江青调整好焦距和灯光,准备摁动快门时,却突然对林彪说:“林副主席,请你把帽子摘掉好吗?我想给你照一张免冠相。因为我给你照相用的是顶逆侧光,你的帽檐遮挡了你的额头和眼睛的光线。”

林彪的头顶光秃秃的,平时出门总是戴着一顶帽子。江青叫他摘掉帽子,看样子他很不情愿。但是,在那种场合,他又不好说什么,于是不好意思地把帽子摘掉,递给了他的警卫员李文普。

江青等林彪摘掉帽子,第二次准备摁动快门前,突然又说:“我觉得这样照还是不够理想,没有林副主席的特点。林副主席最好是拿一本《毛泽东选集》,两手捧着,真的是在看书,因为你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孜孜不倦的。”

叶群夸奖说:“还是江青同志想得周到细致。”

江青立即叫杨秘书跑回10号楼,把他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拿来,交给林彪。

平时怕光、怕风、怕热的林彪,此时也只好听任江青摆布,被八盏大灯的强光烤得满头大汗。江青递给他一条毛巾,见他擦了头上、脸

上和脖颈上的汗水，重新摆好姿势后，终于摁动了快门。在一旁观看的叶群，鼓掌表示祝贺。

照完相，林彪和叶群准备离开钓鱼台时，江青说：“林副主席累了吧？明天如果你身体和精神都好的话，请林副主席再来一趟，咱们与这里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合一个影吧？”林彪点了点头，接受了邀请。

由于合影照相的人数较多，需要梯子。杨秘书请示汪东兴，安排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中负责办理。毛维中要了两辆军用大卡车，于当天下午，从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把专为照相用的梯子运到了钓鱼台17号楼，摆放好。晚上，江青到17号楼看电影之前，还亲自检查摆好的梯子，表示满意以后，才放心地去看电影。

6月10日下午14时左右，林彪和叶群又来到钓鱼台17号楼与大家合影。江青叫杨秘书请来了杜修贤为大家拍照。杜修贤指挥大家站队时，林彪操着他那浓重的湖北口音问：“前面蹲一排吗？”

江青6月9日为林彪照完相以后，将胶卷立即送给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冲洗。两天以后，送来了照片小样。江青在小样上亲自作了精心剪裁，又送回新华社放大成16寸彩色照片。

江青拿到放大的照片后，让杨秘书打电话叫姚文元和叶群到钓鱼台10号楼研究如何刊登的有关事宜。

姚文元说：“江青同志对摄影艺术有很高的造诣，甚至超过了专业摄影师的水平，把林副主席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通过这张照片完全表现出来了，这将极大地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我的意见，这张照片就叫《孜孜不倦》吧。刊登这张照片时，同时刊登主席的一幅照片。我叫《人民日报》发一条消息，我和他们一起措措辞。”

江青说：“我看文元同志的意见好。叶群同志，你看呢？”

叶群高兴地说：“好好好，我完全同意江青、文元同志的意见。江青同志还有什么作品，以后还可以陆续发表嘛。”

这件事就交由姚文元负责办理了。

第 1171 回：外交部，姚登山批斗逮捕 巧安排，基辛格悄悄进京

1971 年 6 月 11 日下午，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姚登山大会”。外事口及其他各方面共 13000 余人与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外文出版局、外国专家局等单位的 80 多位外宾也应邀参加大会。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也在主席台就座。会前，与会者参观了姚登山的部分罪证展览。

会上，外交部群众代表发言，揭发、控诉姚登山的“十大罪状”：

一、煽动“五一一”游行公开向中央示威。所谓“五一一”游行是指 1967 年 5 月 11 日中南海揪陈毅的示威游行。

二、破坏支港抗英斗争，进行“反军乱军”的罪恶活动。

三、紧密配合围困中南海，积极支持在外交部“安营扎寨”。

四、参与炮制“八七”大毒草，疯狂煽动反革命夺权。

五、篡改中央口号，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六、姚登山是砸外交部政治部的总指挥。

七、姚登山是篡夺中央外交大权的主谋。

八、参与策划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疯狂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九、猖狂破坏革命大联合，残酷镇压革命群众。

十、策划和指挥围攻总理、摧残总理健康。

大会进行过程中群情激昂。外交部群众强烈要求专政机关将姚登山逮捕法办。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代表当场接受群众要求，把他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予以逮捕。

最后，外交部副部长李耀文讲话，阐明党的政策，进一步动员外交部和外事口的全体同志团结起来，把清查“516”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后姚登山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早在 1970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8 日，外交部湖北省“五七干校”

就已经召开了 9 次大、中型会议批判姚登山。随后,他又被揪往位于湖南、江西和山西等省的外交部五七干校接受群众批判,并于 1970 年 12 月 16 日揪回北京。12 月 30 日外交部已召开大会批判姚登山。

6 月 21 日,周恩来会见并宴请在华访问的美国《纽约时报》、《每日新闻》、《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和夫人。

周恩来说:“我们要求美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中美关系,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就可以建立了。这是我们从一九五五年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十五年来的一贯主张,没有别的要求。”

6 月 28 日,周恩来会见日本公民党访华团。

日本公民党就中日关系问题发表五点主张: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论调;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四、美国武装力量必须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五、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

周恩来在会见中说:如果按照公民党主张的五点,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就可以恢复,战争状态就可以结束,中日关系可以得到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就有可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订立和平条约,并可以进一步考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6 月 30 日,美国白宫发言人、新闻秘书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例会上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派基辛格博士于 7 月 2 日至 5 日到越南南方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后将到巴黎和美国驻法国大使戴维·布鲁斯进行磋商。在基辛格赴巴黎途中,他将同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官员们会谈。”

基辛格于 7 月 1 日离开华盛顿,两天后到达西贡,同南越总统和美国大使晤谈,众多记者紧盯着基辛格的一举一动,《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了他的活动。

第二天基辛格到了泰国曼谷,记者不多,渲染也少些。

7 月 6 日基辛格抵印度新德里,反战示威者迫使他从边门溜出飞机场。

7 月 8 日基辛格抵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只有 3 个记者跟着,

他很高兴。按既定日程，他需要在巴基斯坦停留 48 小时。他先去总统府拜会叶海亚·汗总统，在美国大使馆同大使共进午餐，然后出席叶海亚·汗总统特意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

在宴会达到高潮时，基辛格突然手捧腹部，连叫难受。南亚地区那时流行德里痢疾，叶海亚·汗总统大声说：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基辛格恢复健康。他要基辛格到伊斯兰堡北边群山中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治疗和休养”。

基辛格正在迟疑不决，叶海亚·汗总统坚决而恳切地说：在一个穆斯林国家，要依主人而不是客人的意志作决定。

基辛格手下的一位特工，马上派他的一个同事到那里去打前站，了解情况。宴会结束，基辛格正在宾馆休息，打前站的特工打电话回来说，那里的别墅不宜于居住。基辛格只好请巴基斯坦把那位倒霉的美国特工扣留在山中，因为这只是一出戏，基辛格并不是要去那里，而是要去中国。

巴基斯坦叶海亚·汗总统对基辛格秘密访华事宜十分重视，对各个环节包括航行做了充分准备。7月6日中午，试航的巴基斯坦波音飞机抵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总参二部副部长熊向晖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等人去机场迎接。8日清晨，巴基斯坦专机返航，章文晋、王海容、翻译唐闻生和礼宾司接待处副处长唐龙彬随机去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一行。

他们在离京前，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领导和他们谈话，强调这次任务的重要性，要求他们要严格保密。周恩来说：“这是中美交往中断了20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这说明了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我们应该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工作。”

由于时间紧迫，更主要是考虑到这次行动的保密性，他们离京时护照签证和有关出国证件等也就全部免办。7月8日凌晨，天蒙蒙亮，他们4人带上最轻便的行装直奔南苑机场。当时南苑机场是内部军用机场，平日极少有外国飞机在这里起降，因此决定基辛格一行乘坐的飞机在这里降落。章文晋一行一进入机场，就看见那架涂有巴基斯

坦国际航空公司标志的波音 707 飞机。这是叶海亚总统的专机，机组均为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飞行人员组成。飞机上还有中国民航派出的徐柏龄大队长等两位领航员。

4个多小时后，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特别停机坪，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已在机场上等候。

晚上 20 时，张彤大使和章文晋一行应叶海亚总统的邀请赴总统府参加晚宴。这是总统举行的小型宴会，巴方除外交部外事秘书苏尔坦·汗一人作陪外，还有总统军事副官海军上尉在场照料。

席间，叶海亚总统简述了基辛格到巴基斯坦后的活动及他和基辛格会晤的情况，还告诉他们基辛格将装病，以避开外界注意，在装病期间赴中国作 48 小时的秘密访问。叶海亚说，他对这次能当中间人，对中美高级官员的重要会晤做出贡献感到十分荣幸。章文晋也代表中国政府对叶海亚总统的帮助和协作表示了诚挚的谢意。晚宴到 23 时才结束。

7月9日凌晨3时30分，章文晋一行乘车前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此时，整个伊斯兰堡市仿佛在沉睡之中，沿街没有行人和车辆，透过车窗只能看见灰暗的路灯在闪烁晃动。他们在预定起飞时间前 10 分钟到达机场，门口的警卫远远看见他们的汽车牌号，就挥手让他们进去。汽车直接开到停机坪，机场上一片漆黑，那架黑乎乎的波音 707 早已停在那里等候，前舱门放下一道舷梯。机舱内的窗户全部关闭。他们上机后就坐在机舱门附近的座位上，从舱门处紧张地注视着外面。那时正是当地凌晨 4 时 20 分。

几分钟后，两辆黑色轿车驶来，直接开到舷梯下，先是一个又瘦又高的身影从车中出来，那是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苏尔坦·汗先生，随后从另一面车门闪出了一个肥胖的身影，那就是基辛格，他戴着一副墨镜，一顶大沿帽。这种打扮对不大熟悉他的人来说，真是不大好辨认。

基辛格也是在伊斯兰堡的凌晨 3 时 30 分起床，吃早饭，4 时同他的随行人员乘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苏尔坦·汗驾驶的军用汽车去机场。此时，他快步跟上苏尔坦，登上舷梯，进入机舱，看到从中国来迎接他的章文晋、王海容、唐龙彬、唐闻生和 3 名中国领航员。苏尔坦·汗先生为双方作了介绍后就下了飞机。

美方也是一行4人，除基辛格外，还有他的政治事务助手温斯顿·洛德和约翰·霍尔德里奇，另外一个是叫迪克·迈斯泽，他是负责生活事务的。他们看上去好像很年轻，其实都已从事外交工作多年。另外还有两名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负责他们4人的安全。

双方相互握手致意，这是中美政府高级官员22年来的第一次握手。一边是笔挺的西服，另一边是严肃的中山装和女制服。

没想到的是，此时正在机场的一位巴基斯坦籍的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在基辛格上飞机时认出了基辛格，他问在场的巴基斯坦官员：“基辛格要去哪里？”

巴基斯坦官员回答说：“基辛格要去中国。”

这位记者连忙回到办公室，向伦敦报社发了一条报告这一重要消息的急电：“基辛格要去中国！”

伦敦《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看了这份急电，骂道：“他准是喝醉了，基辛格怎么会去中国？真荒唐！”随手“枪毙了”这条消息。

就因为这位值班编辑，伦敦《每日电讯报》错过了一次轰动全球的头条新闻的机会。

当地时间4时30分，这架波音707飞机准时起飞。当飞机越过中巴边界上空时，坐在专机的前列座位的基辛格的特别助理、32岁的洛德，此后常因他此时坐在飞机的最前边而自夸说：“我是中美22年隔绝后第一个进入中国的美国官员”。

其实洛德得此殊荣应归功于巴基斯坦人，座位是他们一手安排好的，具体来说是巴基斯坦外交部外事秘书苏尔坦·汗安排的。苏尔坦·汗把基辛格一行引上飞机，替中美双方人员做了介绍，安排大家就座后才离开飞机。基辛格作为贵宾坐在中间的一个特等舱内，这里有双人床；美方的洛德、霍尔德里奇、斯迈泽、迪克和两名特工坐在前舱右侧；中方官员作为主人坐在前舱左侧。而洛德正好在前舱右侧的最前方。

飞机起飞数分钟后，当飞机开始平稳地飞行时，大家便挪动到一张小桌旁，围坐在一起。开始时，双方都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对方，气氛很拘束紧张。两个特工更是如临大敌，他们都有手铐，把自己的手锁在黑色文件包的提手上。他们是在登机前一个多小时才知道这次

神秘之行的。

相互致意后，基辛格就对唐闻生说：“很高兴见到南西·唐。”他又接着开玩笑说，唐闻生可以竞选美国总统，而他不行。因为唐闻声出生在美国。大家都笑了起来。章文晋问起了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装病的情况，基辛格便讲了他怎么装作胃疼发作，到叶海亚总统在北部纳蒂亚加利地区的别墅休养，逗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连一直绷着脸的几位特工也放松起来。气氛很快轻松起来，大家也谈笑自如。

基辛格告诉章文晋，他此行的目的是宣告中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最好首先就整个形势取得一致看法。章文晋表示，周恩来总理准备就广泛的国际和双边问题与他交换意见。基辛格随后又问了一些有关北京的气候和风土人情的情况。

沿途天气晴朗，经过试航的驾驶员熟练平稳地驾驶着专机，经过4小时45分、2400英里的飞行，飞机按预定时间于北京时间中午12时15分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为安全起见，在飞机进入北京附近上空时，中国空军出动了两架战斗机护航。当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南苑机场跑道上时，基辛格一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烈鼓掌，中方人员也跟着鼓起掌来，祝贺平安抵达北京。当时洛德更是格外兴奋，因他坐在飞机前排，是第一个进入中国这个神秘国家的美国官员。但他们当时的心情却是很复杂的，对即将举行的会谈仍然是疑心重重。

透过机窗，可以看到叶剑英元帅正站在停机坪上等候。他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装，精神抖擞，与黄华、韩叙和冀朝铸交谈。他们身后停着3辆红旗牌轿车。

基辛格首先走下飞机，叶剑英迎上前去热情握手问候，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连声说：“欢迎你！欢迎你！”随后陪同基辛格坐进宽大的红旗轿车，直奔钓鱼台国宾馆，途中车队的车辆都把深色窗帘放下。

那时的北京，路宽车少人稀，根本不需要什么交通管制便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目的地。

从机场到钓鱼台的道路两边不时出现“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大幅标语。由黄华陪车的美国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基辛格助理霍尔德里奇问他：“路边标语写的是什么内容？”黄华如实给他翻译，他感到很不自在。

第 1172 回：开场白，逐字念长长讲稿 立场明，周恩来侃侃而谈

到达钓鱼台后，基辛格一行住进了 5 号楼。这个国宾馆完全是中国式的建筑风格，从里到外都充满了中国元素，在外国人眼里很是迷人。

章文晋通知美国客人：“周总理下午与你们会见。”

基辛格和洛德等立即到院子里散步，边走边商量问题。他们是担心中方会在他们住室内安装窃听设备。此后，他们始终采取这种方式商量问题，即使是晚上很晚，仍要在外散步。在室内偶尔交谈时，他们也要把收音机打开，以防有人窃听。有一次，基辛格等人散步到 6 号楼附近的小桥，被警卫挡了回来，他们不高兴，提出意见。中方外交部官员对他们说：“这是你们自己提出的要求，要绝对保密。”

基辛格的两个保卫人员似乎很不习惯这种秘密任务，常常显露出很紧张的样子，跟在基辛格后面寸步不离，连与周恩来举行的小范围会晤，他们也想千方百计“挤进去”。后因基辛格本人也不同意，他们只好在外面等候。

基辛格一行到达钓鱼台后，叶剑英设便宴迎接基辛格一行。基辛格在赴宴前才发现，离开巴基斯坦时走得匆忙，把衬衫忘在伊斯兰堡了，这时没有衣服换，十分着急。他先向洛德借用衬衣，但洛德长得太苗条，不适合基辛格发胖的身材，只得再求霍尔德里奇帮助。霍尔德里奇身材高大，对基辛格来说衬衣太长，总算凑合着可用，但突然发现印着“台湾制造”。基辛格此刻还不忘开玩笑：“真不吉利，我就是担心台湾问题会使会谈卡壳！”

这第一顿饭说是简便的欢迎宴会却显得相当隆重，令美国人吃得十分开心。钓鱼台的师傅大显身手，菜式多样，制作精美，国酒茅台尽供享用。基辛格一再称赞饭菜可口，说比白宫大厨师亨利·哈勒的饭菜好多了，无法相比。此后近两天内顿顿如此，且花样翻新，到基辛格

辞行时,他一再说,来中国才 48 小时,自己就吃胖了,体重增加了好几磅。他由衷地认同毛泽东关于“中国菜”是中国对人类一大贡献的说法。

基辛格就餐后顾不上休息,急于想见中国总理。因为,他称病“感冒”的时间只有两天,也就是说,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 48 小时。而且只有见到了中国的总理,他才能知道自己此行目的能否达到。

很快,基辛格被告知,周恩来总理正在前往国宾馆的路上,马上到他住的 5 号楼来举行会谈。

基辛格感到非常惊喜和突然,他们没有想到周恩来竟会亲自来他们住地见面。一般情况下,政府首脑是不会登门拜访来客的,尤其是一位不是政府首脑的客人。基辛格连忙招呼他的随员到客厅门口迎候。

基辛格一行提前 15 分钟就在楼下门厅内的屏风前排成一行,等候周恩来的到来。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在即将见到中国领袖人物之前显得紧张和拘束。

当周恩来、叶剑英在 4 号楼听完汇报,按时驱车到达 5 号楼时,基辛格未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即迎上前去伸出手,动作有点夸张。

周恩来会意地微笑了,他快步走到基辛格面前,用他那受过伤的右手与基辛格紧紧相握,并使劲抖动了几下,然后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很有分寸地点点头,并幽默地补充了一句:“遗憾的是这是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会震惊的。”

当周恩来和基辛格完成了历史性的握手后,基辛格便将自己的随员逐一介绍给周恩来。

基辛格指着身边的大高个子霍尔德里奇说:“约翰·霍尔德里奇。”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霍尔德里奇忙说,自己 50 年代初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有了提高中文的机会。其实,霍尔德里奇 1937 年还来旧中国旅游过,到过北

平、上海等地，此时他在基辛格亲自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与洛德一样，都是基辛格的得力助手。

“理查德·斯迈泽。”基辛格接着介绍。

周恩来一面和他握手一面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斯迈泽说，自己到过日本和南越，对中国了解不够。他是基辛格手下主管日本和越南事务的助手。

轮到洛德时，他没等基辛格介绍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吧。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是说洛德的妻子曾出版的《春月》一书。

洛德连声表示感谢和高兴。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

周恩来一露面，就给对方以深刻印象。基辛格一行的紧张、拘束很快就消失了。基辛格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绘：“他脸容瘦削，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细心观察就知道并不尽然。”

中方官员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也跟在周恩来后边，与美方人员握手后一同进入会议室。双方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坐下。基辛格身旁有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也在场，仍提着沉重的文件箱，但未入座。中方怕特工人员太累，把他们二人请到另一房间休息，终于离开了会议室。

周恩来同基辛格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9日下午16时25分持续到晚上23时30分。

基辛格首先表示感谢中方的热情招待，说：“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周恩来落落大方地说：“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

果然是名不虚传！答得自然得体，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基辛格神经再度绷紧。

宾主一坐下，基辛格的助理洛德马上将一本花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了基辛格的面前。基辛格发现周恩来注意到这个细节，就笑笑说：“没办法，都是些讲话提纲和有关文件，做参考，我不得不照着这个念。”

周恩来说：“会谈嘛，可以自由一些，放开一些，随便一些。”

看到基辛格和他的助手洛德、霍尔德里奇等都带着一大包文件，周恩来客气地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阁下已准备了一本本的东西，先听听你的意见。”

基辛格开始显得有些紧张，他打开面前那本厚厚的，足有7厘米厚的文件夹，十分谨慎而机械地念起他同尼克松一起起草的一篇很长的讲稿：

“对中美两国来说，这是第一次在平等的基础上举行会谈，也是打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今天是全球的形势发展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了一起。”

接着他提出了要会谈的七个问题，即：(1)台湾问题；(2)印支问题；(3)同其他国家关系问题；(4)南亚次大陆形势；(5)中美联系途径；(6)关于军备控制；(7)中方愿提出的其他问题。

基辛格照本宣读的讲话稿还说：“中国担心的是美国同别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其实美国永远不会这样做，中国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在没有考虑中国意见的情况下，美国不会采取任何涉及中国利益的重大步骤。”

基辛格的这个开场白是他与尼克松精心准备的，力图使中方了解美方战略意图，虽未提苏联，但矛头所向是明显的。

大家耐心地听基辛格念完开场白，周恩来说：“交谈嘛，何必照着稿子念呢？”

基辛格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

更跟不上了。”

他的幽默把大家都逗笑了，会谈的气氛也轻松了许多。在哈佛大学磨练过口才的基辛格自己，也感觉到这样照本宣科太枯燥。他硬着头皮把开场白念完，然后，索性丢开讲稿，要在周恩来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口才。他说：

“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这个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仔细阅读了美国《生活》杂志刊载的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尼克松总统有一个信念，强大的发展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的任何根本利益都不构成威胁。在没有同你们讨论和没有考虑你们意见的情况下，美国不会采取涉及你们利益的任何重大步骤。”

周恩来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来中国。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邀请你们的乒乓球队访华就是证明。”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访华进行预备性会谈。

基辛格向周恩来提出讨论台湾问题：“在我们交换信息期间，我们了解这是你们对双方关系主要关切的议题。总理先生，你已界定美国军队应撤出台湾及台湾海峡，我也准备好听听你的意见，并实际来讨论这个问题。”

周恩来：“第一个问题是台湾。基辛格博士已非常坦率地提出了看法，我们也会表达我们的意见。”

基辛格：“我说得不够清楚，但显然能和周总理沟通。”

周恩来：“你提到今天的会面是个历史性的场合。当然如果尼克松总统能到中国并和毛泽东主席会面，会是个更多的历史场合。如果我们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会是个历史性的场合。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开始创造气氛，因为你提到，我们两条分道扬镳的路又聚在一块儿。从另一方面说，我们想在平等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周恩来就台湾问题批评了美国政府，并就此问题阐述了中方的

立场。

基辛格说，台湾问题可分为两部分：

(一)关于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美国准备在印支战争结束后很快从台湾撤出三分之二的美军，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再削减其余部队。

(二)关于台湾的政治前途，美国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再讲“台湾地位未定”；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中美关系正常化要到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才能解决。

周恩来对此表示不满，他阐明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条约无效。要求美方加速解决台湾政治问题的速度。

在谈到印度支那问题时，基辛格说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的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

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坦率地说：“我们双方有不同的看法，用我们的话来说，世界观和立场都不同。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阁下所说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平等，换句话说就是对等，一切问题从对等出发。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而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我们邀请你们乒乓球队访华就是证明。”

周恩来特别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这才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之后，基辛格提出：“希望中方出于仁慈，提前释放仍在中国服刑的几名美国犯人。”

那时在中国服刑的美国犯人，既有朝鲜战争期间侵入我领空进行间谍活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唐尼和费克图，也有在越南战争期间侵入我领空的美军飞行员史密斯和费林。周恩来表示：根据中国的法律，表现好的罪犯可以缩短刑期。越南战争尚未结束，与此战争有关

的美国犯人无从考虑他们的释放。

除了就上述问题，中美双方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向，并有所交锋外，双方还讨论和解决了当时需要解决的两个具体问题：一是确定不再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建立新的直达双方最高层的秘密联系渠道：巴黎渠道，中方联系人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美方联系人是曾任尼克松翻译的驻法武官沃特斯。另一个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商定双方将同时发表尼克松将应邀访华的公告。

基辛格发言告一段落后，已到了晚餐的时间。周恩来提议先吃饭。

第 1173 回：会谈毕，即赴游泳池汇报 毛泽东，先与熊向晖漫谈

晚餐后，周恩来与基辛格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用简短的时间，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然后话锋一转，谈到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演说。

周恩来说：“我是大致赞成尼克松总统 7 月 6 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的。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

“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他只知道尼克松过去多次与他商量过中、美、苏三极即“大三角”的说法。他并不知道，7 月 6 日，当他在印度新德里时，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了一番关于“五极世界”的重要讲话。而且，基辛格怎么也没想到，在 7 月 7 日、8 日这两天还给他打过电讯的尼克松，竟忘了把这样一番重要讲话告知他。故此，基辛格对尼克松 7 月 6 日演说一事及其内容一无所知，倒是周恩来先提了出来，这下子使基辛格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基辛格的助手们也面面相觑。他们都在暗暗为基辛格着急。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堪萨斯城演说一无所知，他说：

“你们可能在路上没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只得尴尬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热情地为基辛格介绍尼克松的演说观点。他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境地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及他的助手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周恩来表示，中国在经济方面比较落后，不成

其为尼克松说的那种力量，我们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当天会谈后，基辛格向中方借阅尼克松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全文，外交部立即向新华社索要英文稿，新华社参编室以特急件送到钓鱼台时，上面写了“仅此一份，请用毕退还”。因美方索要甚急，中方立即将此稿交基辛格。后来美方人员在回忆录中就“仅此一份……”做了不少文章，说中方怎么连复印机也没有。他们以为“退还”的要求是中方代表团向美方提出的，其实这是新华社写给外交部的。

当晚23时20分会谈结束，周恩来带领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员走到钓鱼台另一座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泽东那里汇报。

王海容问：“都谁去？”

周恩来说：“你、唐闻生和我一起去。”

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周恩来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

周恩来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周恩来的轿车驶向中南海。此时已是午夜，街上静寂无人。周恩来默默沉思着，熊向晖则在心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他觉得，毛泽东找他去，一定是要了解这方面的国际形势。

轿车在中南海游泳池门口停下。周恩来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兼书房。这时，毛泽东身穿浴衣，已经站在屋子当中。

周恩来快步向前，握了握毛泽东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

毛泽东说：“我不困。”

熊向晖跟着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会客室中，7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毛泽东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周恩来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泽东沙发背后落地台灯下的一张椅子上。

周恩来告诉毛泽东，基辛格到了，接着准备汇报会谈的情况。不

想毛泽东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他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

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转向熊向晖，仍然是满面笑容地问道：“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

她又转向毛泽东说：“老熊是个烟鬼。”

“他怎么成了老熊了？”毛泽东问。

“我今年52岁了。”熊向晖说。

“哦，还不老嘛。”毛泽东边说边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泽东还继续“寒暄”：“你在总参二部当副部长？”

熊向晖答：“是。”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

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主席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泽东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熊向晖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泽东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泽东该听周恩来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此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同他“漫谈”：“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回答：“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做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

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毛泽东“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说:“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泽东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没有?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对此毫不知情。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熊向晖依然是回答:“没有。”

毛泽东转过身来,问周恩来:“‘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

周恩来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毛泽东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这当中有鬼,他们还

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恩来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做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泽东又问熊向晖：“你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不是亲自动手？”

熊向晖说：“没有。”

毛泽东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是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基辛格第一天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10日凌晨1时05分了。毛泽东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说，尼克松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毛泽东明确而坚决地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

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当周恩来说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泽东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听了美国要从印度支那撤军的汇报，毛泽东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

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

待周恩来等人离开毛泽东住地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恩来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周恩来事后了解到，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文件总参和军委系统一共发了 60 多份，可是军委办事处只下发了 7 份，传达范围非常窄。当时，毛泽东接到总参三部部长给他写的信，信中谈到总参批陈整风的情况。

10 日早晨，安排基辛格一行到故宫参观。这也是他们在京停留期间惟一的一项外出活动。按照美方的要求，中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对外关闭了部分景点，在参观沿线上只安排了几名便衣保卫人员。陪同参观的也只有黄华等少数人员。难怪基辛格在参观时说，今天的故宫显得格外幽静和宽敞，也看不到其他旅客。

7 月 10 日下午 16 时，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继续进行。这次会谈的地点换在人民大会堂。

寒暄之后，基辛格表示：“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绝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绝不会进行结盟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摆出自己的观点。由于分歧十分严重，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在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

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我们如不先去吃饭,烤鸭就要凉了。”

宴席上,周恩来把话题转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接着,周恩来和蔼地建议,尼克松总统可于1972年夏天来访。

基辛格说,1972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日子太近,可能引起误会。

周恩来充分体谅尼克松的难处,建议改在1972年春天。基辛格赞同这个日子。不过他说总统访问必须经过周密的准备,包括会谈议程、新闻和电视报道以及安全保卫工作。周恩来表示这些可以讨论。双方确定晚上10点以后再会晤,讨论关于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

当晚,周恩来、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向毛泽东汇报同基辛格第二天会谈的情况。这次,毛泽东谈笑风生,没有涉及庐山会议的问题。

第 1174 回：达共识，《中美公告》惊世界 “峻岭”谁，林彪在《孜孜不倦》

因周恩来在 7 月 10 日晚上另有重要活动，根据他的指示，黄华和章文晋先与基辛格就公告谈一轮。双方都提出了一个稿子。

中方的稿子比较简单，说基辛格来中国，双方进行了会谈，尼克松总统准备来中国访问。

美方的稿子渲染基辛格同中国的这次会谈，涉及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是以诚挚、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的；而尼克松的来华访问将有助于重建两国人民的联系，并对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双方对公告稿的争议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

关于尼克松的来访，中方拟定的原稿中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哪有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这不成了旅游者了。

美方的稿子强调是中国邀请。黄华说：这不大符合事实。

双方会谈暂停后，黄华根据周恩来事前的指示，直接去向毛泽东汇报。当毛泽东听说基辛格认为中方草案的意思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时，大笑着说：“要改，要改！”

当黄华他们告别毛泽东走出他的书房时，他回头看了看毛泽东，只见他仍坐在沙发椅上，躬身向前，两臂抱膝，双手几乎着地。

黄华问王海容：“主席这是什么意思？”

王海容说：“主席在向你们行大礼呢。”

黄华赶紧说：“不敢当，请主席保重。”

在周恩来提示下，黄华等人对中方草稿略加修改。

周恩来考虑如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不好看，于是建议改成“获悉”(Knowing Of)尼克松要来访，我们邀请，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

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基辛格不希望在公告里面提到台湾问题，周恩来就在原稿“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本身就包括了台湾问题，这样就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

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具体时间，因听说尼克松要访苏，周恩来曾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问过，是否定在1972年5月1日以后。基辛格表示，最好在3月或4月，而且是先来中国。因此，在措词上也改为“5月以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第二天，毛泽东起得很早，看了修改后的公告稿很满意，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样写好，不然好像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

关于访华日期，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尼克松将会在5月以前来中国时，毛泽东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早一点来也好嘛。”

7月11日上午，黄华等人拿着修改后的稿子再与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对修改稿也很满意，即刻取得了一致，同意发表。双方皆大欢喜。最后商定的公告全文是：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

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获悉(Knowing Of)两字是周恩来的杰作，避开了谁主动提出访华的问题，这使美方尤其感到适当和体面，基辛格因而在尼克松总统“接受了这一邀请”之前加上了“愉快地”这一副词，投桃报李。

公告不把尼克松的访华说成是将对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而是点明要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不只是像美方初稿所说的重建两国人民的联系。

双方商定于7月15日同时发布公告。

这是基辛格此次来华的最后一次会谈，从上午 8 时一直延续到 10 时多，早已超过预定时间。根据事先商定，基辛格等将于中午离京返回巴基斯坦，继续在巴进行访问。如推迟离开，定会引起外界的种种猜测。

3 个小时过去了，会议厅的门终于打开了。双方人员面带笑容走出大厅，基辛格陪周恩来来到大门外并帮助周恩来打开汽车后门，等车辆启动，挥手告别后才回楼里。

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后，叶剑英来宾馆，与基辛格一行进行其在华的最后一次午餐。两天来的紧张气氛一扫而空，醇香的茅台酒打开了，叶剑英风趣地对基辛格说：“这次很对不起啦，没能以正式公开的方式来欢迎你，以后再补上。下次来就不再躲在这里了，可以到烤鸭店品尝烤鸭，也可到东来顺吃涮羊肉，还可以给你们的家人买些纪念品。”

7 月 11 日吃完午饭后，基辛格一行按照预先的安排，于中午 12 时 20 分结束了在中国的“破冰之旅”，愉快地乘原机飞回巴基斯坦。叶剑英、黄华、韩叙和先遣组 4 人到机场送行。

基辛格对此次密访甚感满意，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秘密使命”。基辛格同中方达成了一份即将宣布尼克松访华的《公告》，是他此行的重大收获。

基辛格返回伊斯兰堡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华盛顿发出密码电报“我找到了”。这句短语的真实含义，就是北京之行取得成功。

基辛格走了，周恩来更忙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国民抱有浓厚的反美情绪，虽有 1970 年 10 月 1 日毛主席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出现，大家也知晓毛主席同斯诺 12 月 18 日的谈话内容，又有美国等五国乒乓球队访华，但一般人都把这些看作是改善中美关系漫长道路的开始，耐心地等待变化。但是尼克松访华公告的发表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一下子拉得很近，许多人对此思想准备不足，可能一时接受不了。兄弟国家更是这样。于是，周恩来紧急安排在公告发表前做国内干部和周边国家的工作。

7 月 12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 2000 多名中高级干

部大会,用了3个多小时讲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

7月13日下午,周恩来飞往河内。至14日,周恩来与黎笋、范文同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

7月15日,周恩来清晨出发,从北京飞往平壤,金日成亲自到机场迎接,并陪同送至大同江畔的国宾馆。周恩来没有休息,上午和下午,连续与金日成会晤,深入分析世界形势变化,通报中美会谈情况,并介绍中共党内批陈伯达的情况。金日成听后表示十分重要,朝鲜劳党中央要专门开会讨论。金日成设丰盛晚宴招待周总理,并挽留他住下休息一天,但周恩来予以婉谢,并于当晚飞回北京。

当晚,周恩来与叶剑英同往西哈努克和宾努住地,向他们通报中美会谈情况。

1971年7月15日,几乎在同一时刻,中美各自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公告。稍有不同的是,在美国,是由尼克松亲自在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向全国听众宣读公告,并作了阐释。而在中国,是通过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刊登了这一公告,但没任何阐述。

这个不足200字的公告一播发,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犹如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都震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世界的目光都转向中国和美国之间,翘首瞩目美国总统把手伸过太平洋的时刻。

同美国关系紧密的日本政府也仅是提前一小时才被通知此事。日本朝野生怕被再度甩在一边,开始认真考虑同中国恢复邦交之事。这个公告对一些国家在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的态度也有重要影响。

公告在中国国内和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美会谈后各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可能发生的变化,并对此做出部署。

7月17日,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谈中美关系。当天,周恩来在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说:“联合国只要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

尽管已经向越南共产党通报了与基辛格会谈的情况,7月中旬,越

南《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尼克松主义一定破产》，影射中美会谈，还是不满。

7月23日，周恩来收到李德生转来的一份关于云南傣族、苗族情况调查报告。这个报告谈到，在少数民族地区补划阶级成份时产生了副作用。周恩来当天致信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员：“边疆和少数民族区这类情形，极为严重”，我们“已觉察到这类问题在少数民族区和边疆的严重性”。提出，有关情况拟在政治局会议上“认真讨论一次”，并“派人到有关地区与当地党委和军队党委联合进行调查核实”。

7月24日，周恩来会见美国朋友韩丁一家和其他在京的美国朋友寒春、阳早、柯弗兰、柯如思、艾德勒、帕特、舒予章、史克、马海德、苏裕禄、阳和平，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等。谈话中，介绍了对中美会谈、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台湾等问题的看法，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7月16日，在广东翁源县居住的陶铸的妻子曾志致信周恩来，提出：一、要求将她调到北方；二、要求对她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和恢复组织生活。7月31日，周恩来就曾志来信批示：“（一）请函告曾志，她的信我已收到。她可去西北陶斯亮工作地方一看，如能留在那里休养或工作，都可同意。（二）如曾志确定去西北，也可将她女婿调至她女儿处一起工作。（三）四月到现在，工资应补发，其西北路费也可给帮助。（四）今后如工作，工资照发；如退休按月发退休金。（五）函告广东省委，速解决曾志的组织问题，有疑难可来信问中央。”

7月3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8月1日出版”。消息说：“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而此时，林彪已不在北京。7月17日，林彪、叶群离开北京去北戴河。临行前，叶群对林彪的警卫参谋李文普说：

“首长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如果黄、吴他们斗得不好，11楼来找首长反映情况不好办。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

们指挥的。”

叶群这里说的“首长”是指林彪，“黄、吴”是黄永胜和吴法宪，“11楼”则是指江青。因为江青在钓鱼台住11号楼。

那幅“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是空前的，因为林彪通常总是戴着军帽，这幅照片却是免冠的，显眼地暴露出那光光的秃头。这表明摄影者绝非普通的摄影师，足以叫林彪取下那顶长年不离的帽子。

照片题名《孜孜不倦》，摄影者的名字却是陌生的，曰“峻岭”。



《孜孜不倦》

“峻岭”何人？江青也！这张照片，就是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为林彪照的那张。

照片发表后，叶群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照的相

太好了。这张照片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如此看来,形象教育有时比文字教育更有影响力。林彪同志看了以后非常高兴。他特别感谢江青同志的辛勤劳动,也热烈祝贺江青同志的摄影作品公开发表。我们也希望江青同志的其他优秀作品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用以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江青看了叶群打来的电话记录以后,叫杨秘书立即回电话给叶群。她说:“谢谢林副主席对我的鼓励。摄影艺术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林副主席的形象好,同时又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最高的代表。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如果林副主席喜欢照相的话,我愿意给林副主席再照几张。”

8月5日,周恩来接见了有影响的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并与他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

周恩来详尽阐明了中国对于中美最高级会晤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要求。他赞扬尼克松敢于冲破偏见、承担风险、首先访问中国的勇气。他说:“尼克松这回决定要到中国来这一件事,别的党派也说别人是不敢的。从这一点上看,他还是有一点勇气的。”

会谈后,周恩来亲自审定了谈话记录,并同意在《纽约时报》发表。

正当尼克松派基辛格为准备总统访华作第二次中国之行时,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坚决反对这项计划。尼克松、基辛格权衡再三,没有改变初衷。

第 1175 回：黑龙江，潘复生撤职审查 赴青岛，开封清查“五一六”

8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的黑龙江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汪家道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光涛为第一副主任，傅奎清、张林池为副主任。

潘复生为什么会被撤职？这还要从1969年“九大”后说起。“九大”后，在黑龙江贯彻“九大”的全省党员干部会议上，潘复生责怪汪家道对他支持不够，开始查与汪家道有牵连的人和事，陈造反、阎立梅等一些与汪家道有牵连的人也遭受批判和冲击。这件事促使汪家道和黑龙江“捍联总”中的许多人开始对潘复生不满。

鉴于当时战备的需要及黑龙江的形势，中央派沈阳军区副政委刘光涛到黑龙江。根据刘光涛关于调整、加强省革委常委班子的建议，197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同意由潘复生、汪家道、刘光涛、于杰、刘思聪、郭强、袁俊、曹志、傅奎清9人组成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由潘复生任组长，汪家道、刘光涛任副组长。

1970年7月，周恩来接见一机部四十一厂学习班时就指出：“黑龙江省山上山下派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有的地方是一派掌权，总的根子就是派性没有消除，问题在下面，根子在潘复生那。”

1971年3月16日至6月6日，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召开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以整风的精神，对潘复生的错误进行了揭、摆、批。中共中央派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以及毛远新、江拥辉到会，具体指导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潘复生的错误被定为破坏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会后，经中央批准，对潘复生进行了隔离审查。到了8月6日，中央正式决定撤销潘复生的领导职务。

1971年4月12日，已在河南方城县农村下乡插队一年多的原开

封师院中文系学生、“824”勤务组成员黄泽生，被开封师院中文系军代表宣布为“516审查对象”，“经省市委批准”，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参加“五不准学习班”的决定，将黄泽生从南阳方城县押解回开封师院。当时，黄泽生正准备参加南阳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南阳日报》业已刊登了他的先进事迹。谁知，一夜之间，他的身份由红变黑，让许多人莫名其妙。

主办学习班的除了组长是军代表外，其余全是基层干部和教师，都不是原“824”的人。他们的任务是组织审查对象学习，促使审查对象交代揭发问题，监护审查对象的安全，不自杀不逃跑。“五不准”是审查对象必须遵守的纪律，即：不准回家、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串连、不准泄露学习班情况。因为黄泽生是重点审查对象，所以在“五不准”之外又加了一条要求：不准看报。

黄泽生住的房间四张床，除他以外，每晚都有三个人轮流值班监护他。窗户全部钉死，贴上报纸，密不透光。晚上睡觉前，把屋里放的铁铣、炉灶通条、砖石瓦块，甚至扫帚、鸡毛撋通通拿走。

学习班发了《毛选》四卷，但每天学习的内容都是这样“老三篇”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别了，司徒雷登》。上午学习，下午写检查交代。如果不写，就批判斗争。

黄泽生进住学习班的第一天下午18时，军代表从外边进来，站到他桌子前，严肃地看着他，一言不发。

黄泽生低头看《毛选》，也不搭理他。

军代表“咚、咚、咚”用力敲着黄泽生的桌子……

黄泽生抬头看着军代表，也一言不发。

“你写的检查！检查哩？”军代表向黄泽生伸出右手，突然咆哮起来。显然他看到桌子上的稿纸空无点墨。

“什么检查？”黄泽生问。

“你来这里干什么？”军代表反问。

“不知道。是你叫来的。”黄泽生平静地回答。

“我早知道你是顽固份子，实话告诉你，你是在省委王政委那儿挂上号的！”军代表指着黄泽生的鼻子说。然后回头对几个监督老师说：“晚上开会。”走了。

军代表走后，黄泽生问中文系监督他的两个老师：“王政委是谁？”

老师告诉他，就是 15 军政委、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省军区第二政委、河南省清查 516 领导小组组长王新。

晚上开会批判黄泽生，说他态度不端正。而黄泽生则是不管大家怎样讲，怎样批，他就是一言不发，只有在逼他表态时才问一句话：

“凭什么办我学习班？把我 516 罪证拿出来！”

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没有任何进展，学习班只有变着花样“打态度”：把读“老三篇”变成背“老三篇”，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批斗会不断上纲上线，时间越开越长，监控越来越紧。

两个月后的一天，监控老师让黄泽生站到院子门口看人遊街，原来是外语系原“824”成员宋怀珍被几十个人押着，脖子上挂着两个骷髅头骨，手里拿一面白旗，上写“杀人犯”。后来经法院审理，这是一起逼供信的错案，宋怀珍根本没有杀人。从这天起，学习班宣布了“开封市文革十件大事”：师院砸抢机要室、“二·八”冲军区、东大寺打死被俘伤员、“七·三一”武斗等等。军代表要求黄泽生交代揭发这十件大事上的错误及罪行。这让黄泽生突然觉得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借清查“516”整造反派，搞翻案呀！什么“十件大事”，这十件事在 1967 年中央主持的北京汇报会上早已澄清，中央也已明确定案，驻军写的检查，白纸黑字贴满开封大街小巷。为什么现在又重新翻出来“审查”？他联想到省、市革委会成立后的事情，认为几乎无不是对着造反派，如：群众组织“倒旗”，倒的是造反派，因为那时已没有保守组织了；反“多中心”，反的也是造反派；“清理阶级队伍”，清的是造反派；“一打三反”打的是造反派；这次“抓 516”，抓的还是造反派！革委会建立前，是走资派镇压造反派，革委会成立后，是谁打击造反派？为什么？

8 月 10 日上午，黄泽生去厕所，出了宿舍没走几步，忽然看见他爱人正向他走来，俩人几乎同时呼喊出对方的名字。这一下吓坏了跟在他后边监督他的老师，手忙脚乱地上前拦阻，连推带拉把二人隔离开来。黄泽生只听他爱人喊道：

“我来给你请假！”

黄泽生愕然，不知道什么意思？

第二天中午，来了两个军代表和学习班的监督老师在办公室谈

话，高一声低一声似乎很激烈。中文系一个老师提高嗓门说：“人家回家哭爹，我们跟去算什么！”

过一会儿，中文系军代表领一个院军代表进来对黄泽生说：

“你父亲去世了，组织上给你一天假期办丧事，今天下午送你回家，明天下午接你回来。”

黄泽生闻言勃然大怒：

“你们为什么不早通知我？为什么临终前不叫我见面？”

这时他才明白他爱人说请假的意思。

师院用吉普车把黄泽生送回家。全家人见面嚎啕大哭。

黄泽生父亲去世已两天，在他病重病危的最后一个月中，亲朋好友十几人几乎天天到市委，询问黄泽生的下落。原来家人一直不知道他就在开封师院办学习班。可怜他父亲重病在身，市里、公社还不断来人逼他揭发儿子黄泽生的“516”问题，黄泽生的爱人、弟弟、妹妹全家无不受连累。

黄泽生回到学习班后，连续几天控诉校方株连亲属的做法，除了军代表，大多数老师不再对黄泽生施加压力。

之后，学习班改变了策略，将调查的重点放在1967年7月31日开封人民会场发生的“731”武斗问题上。黄泽生以1967年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在北京的汇报会上，中央明确定性为“武汉720事件的重演”为由，质问他们：

“中央的表态还算不算数？”

中文系军代表说：“此一时彼一时，当时把陈再道、钟汉华定为敌我矛盾，是王戚这些小爬虫搞的，现在怎么样？中央早就说陈再道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谁攻击陈再道就是反党乱军！”

黄泽生再次质问他：“此一时彼一时就是翻案吗？”

军代表火冒三丈，站起来指着黄泽生的鼻子说：“实话告诉你，你们造反派吃香的时代过去了！王政委讲了，现在就是整顿造反派，就是要把造反派里的坏人统统抓出来，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没问题的也不能掌权！”

黄泽生问：“为什么？”

“小资产阶级掌权不是翻天了吗？我们工农兵就要吃二遍苦，受二

茬罪。”军代表理直气壮地回答。

黄泽生追问：“这也是王政委讲的？”

“当然么。我没这个水平。”军代表放缓语气说：“我不愿再给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磨蹭下去。‘731’死那么多人，不抓出坏人怎么交差？人家都说你和陈红兵是‘731’武斗现场的指挥，你不是坏人谁是坏人？你不说清楚，人家有揭发材料。”

军代表周的话提醒了黄泽生，他觉得有必要将“731”武斗事件说清楚，于是写了他在“731”现场的说明材料。谁知道，以后这份材料竟成了他“七·三一武斗八二四头头在现场的罪证。”

清查“516”在漫无边际地进行着。中国大陆大多数地方都抓出了不少“516”。在文化大革命中活跃过的人，从“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等人，到每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被宣布为“516”分子，接下去的便是写不完的交待，认不清的罪。不过100多人的北京东方歌舞团，一开始就抓出了“516”分子近60人，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清查运动，使各单住的群众心惊肉跳，觉得厄运随时有可能降临。派性冲突也在明中暗中加剧。清查“516”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1971年7月下旬，江青要到青岛休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王良恩指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和江青秘书杨银禄到青岛为她打前站，做好安排。7月29日，他们到达济南军区，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接见了他们。

在济南时，邬吉成和杨银禄听当地的负责人说，贺子珍也在青岛避暑疗养。他们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决定向周恩来请示报告。

周恩来听完杨银禄的汇报后说：“贺子珍同志在青岛休息是个问题，我的意见是这件事不能瞒着江青同志，必须叫她知道，她去不去她自己决定。此事你就不用管了，让我跟她说。”

江青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休息的消息后，对杨银禄说：“一个姓贺的在青岛怕什么？她休息她的，我休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偶然碰了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啰，尽量避开就是了，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能阻止我去想要去的地方。”

8月5日下午，江青乘火车抵达青岛，入住青岛市委接待处9号

楼。9号楼离浴场很近,下海十分方便。而贺子珍此时住11号楼。

第二天一早,江青提出要到鲁迅公园、栈桥和浴场游玩。工作人员再三劝说:她现在最好不要到这些地方去,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准备,万一出了安全问题,他们不好交代。

但是江青坚持要去。

到了鲁迅公园,游览的人不是很多,人们也没有发现江青。

但是到栈桥时,有几个群众发现了江青,高喊:

“向江青同志学习!”

“向江青同志致敬!”

“毛主席万岁!”

群众听到口号声,团团将江青围住。

江青很高兴,一会儿招手,一会儿问好,并拉着长长的声音回答说:

“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交通为之堵塞。青岛警备区赶紧调来解放军战士搭成人墙,这才使江青从人山人海之中出来。

回到住地,江青兴奋地问杨银禄:“今天这么多群众,是有组织的,还是自发的?”

杨银禄说:“今天你到栈桥,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群众可能是自发的吧。”

江青说:“那好,那好,今天我最高兴了,就喜欢这种场面,有两年多没有见到这样的场面了!

8月7日上午,江青在吴法宪、李作鹏的陪同下到海上照相。为了拍照军舰,她要舰艇排成各种队形,旗语兵忙得满头大汗,舰艇自然也在穿梭忙碌。吴法宪、李作鹏二人有劲使不上,当然也急得直冒汗珠。

照完相,江青十分感谢吴法宪、李作鹏的陪同,感谢舰艇上的官兵,并叫旗语手用旗语告诉参加今天拍照的全体指战员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中午,江青要求到薛家岛上去看看那里的民兵。于是他们乘两艘炮舰前往薛家岛要塞。

江青下了军舰,坐上吉普车爬山。路坎坷不平,弯弯曲曲,很难

走，她坐在车里东摇西晃，跟摇煤球一样。

杨银禄问她：“怎么样？能不能坚持？”

江青笑着说：“不要紧，挺好的。”

上岛以后，江青与那里的解放军官兵和民兵有说有笑，在岛上吃了西瓜、照了相。

在回来的路上，看见打石头的人和正在田地里劳动的人们，江青又叫他们一起来照相，有的群众拿着镰刀、锄头和锤子就跑过来了。江青看到这些汗淋淋满手泥土的农民们，和他们握手，问候，并为他们拍照。

这天，江青叫杨银禄打电话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请杨司令把济南军区的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叫来。

不到10分钟，济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部长来了，他向杨银禄自我介绍说：

“我叫晋国强，是济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部长，江青首长找我？”

杨银禄说：“是。”然后把他领进去后，就退了出来。

晋国强从江青那里出来后，小声对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和江青秘书杨银禄说：“江青同志叫我到她的老家山东诸城去看看，看样子她想回老家去看看，你们看怎么办呢？”

邬吉成说：“你先照她的意思办，去诸城了解一下情况，不要透露她要去的任何消息，然后，按你所了解的实际情况向她汇报就行了，别的不要说。去不去，由她自己决定。因为江青同志给你单独交代的任务，我们不好说什么。你也不要向江青同志透露我们知道这件事。”

然后，邬吉成又问杨银禄：“老杨，你说呢？你还有什么意见？”

杨银禄说：“老邬讲得好，就这样办。”

8日，江青坐在青岛海边沙滩的一块礁石上，往事涌上心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小的时候，家境不好，父亲是个木匠，脾气很坏，母亲和我都经常受他的气，挨他的打。后来，我到济南读书，离开济南后，就到了青岛，在青岛的时候，我经常来到这里，到这块礁石上玩。再后来，我又去了上海，就是从这里走的。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是我走向革命的发源地，我很喜欢这里，我这次来青岛是故地重游，所以，我很高兴。”

晋国强去诸城了解情况回来后,给江青带回了她家乡的两盒煎饼,并向江青作了汇报。

江青吃了一块晋国强带回的煎饼,说:“我又吃到家乡的美食啦。”她将其余的煎饼拿去给北京来的工作人员吃了。

第 1176 回：做体检，叶群回京日夜忙 毛泽东，武昌见鄂、豫领导

8月5日，叶群为检查乳腺癌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毛家湾。当天晚上，邱会作夫人胡敏陪叶群去了301医院。

第二天晚上，胡敏到毛家湾看望叶群，谈话到深夜。周恩来打电话问候叶群，听说叶群正在接待客人，问了是哪些客人。

此时，正陪江青在青岛活动的吴法宪，接到夫人陈绥沂的电话，说叶群回北京治病，要他回来看看叶群。8月6日晚23时15分，吴法宪从青岛给叶群打来电话。8月7日，吴法宪陪江青参观完北海舰队后，没有随同再去薛家岛要塞，当即赶回北京。下午15时，带夫人到毛家湾，与叶群见面，长谈。

8月8日下午，黄永胜与叶群长谈近3个小时。

8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他陪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期间中央日常工作的分工。23时，政治局会议结束，吴法宪、邱会作又来到毛家湾，以后胡敏也带着301医院的人到毛家湾看电影，叶群对给她看病的医护人员表示感谢。电影放映完，大家都走了，胡敏到会客厅看见叶群正与吴法宪、邱会作他们谈话，也留了下来，一直谈到8月9日凌晨3时，重点议论四届人大这一关怎么过？

叶群说：“这次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林彪，别人要端，要追问下去怎么办？”

“办法总会有，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了。不是只保林总的问题，林总和你们分不开，都要保，你们靠林总，林总也靠你们，就这么几个老战友，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失。”

她还说：“要端就端嘛，把林总端出来了就下台了，现在大家把问题好好想一想，看怎么过关，林总是关心大家的，只要林总没有事，锅里有饭，就不愁碗里空。”

同时,她依然不无担忧的说:“看来咱们是过不去了,主席要把首长往外拿了。把首长往外拿,咱们就都保不住了,得想个办法。”

吴法宪说:“只有斗争。”

邱会作说:“斗争还得有斗争的艺术,要取得胜利,就得给下面做工作。”

叶群说:“林总的身体和毛主席比较起来,差得远,怎么也拖不过毛主席。”

9日下午,叶群乘飞机回北戴河,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到机场送行。叶群到山海关机场后,林立果前去迎接。

8月9日,周恩来陪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临行前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海容转告。”

8月10日,叶群从北戴河给吴法宪打电话,嘱咐他“不要放炮”。

8月12日下午,周恩来飞回北京,立即到毛泽东那里面谈,请示四届人大的召开时间,毛泽东提出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设想。

当天,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大使转交恩维尔·霍查代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封信。这封信明确地表示反对中美谈判。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霍查的来信。会议同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安排在国庆节后。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于7月27日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由迟群起草,经过18次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最后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于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一套”。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句话后来被称为对17年教育战线的“两个基本估计”。

8月13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

昨晚开政治局会议,大家都同意国庆节后开四届人大的设想。从

八月下旬起就要开始准备报告。大家同意在两三天后,由周恩来、春桥、永胜、先念、登奎五人去北戴河向林副主席作一次报告。

毛泽东批示:“已阅。”

8月14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印发《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及改革临时工制度问题的报告》、《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草案)》、《国务院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草案)》和中央通知。报告提出:“从七月一日起为符合条件的一千三百四十万职工提高工资,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左右,一年约需增加工资总额十一亿元左右,同时将符合条件的六百多万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中央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召集若干企业的负责干部和工人同志对两个草案加以讨论,讨论情况于九月中旬报告中央,由国务院根据各地意见修改后,下达执行。

8月15日13时,毛泽东坐专列南下。这次,他仅仅带着汪东兴等少数工作人员。中央警卫团派出一个100余人的中队进行保卫,每人配置一支手枪,一支自动步枪,另还配置了轻机枪,做到了枪要够,弹要足,由汪东兴和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直接指挥。同时给部队配发了手榴弹、小铁锹和十字镐等野战作业方面的器械,做了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准备。对对付可能遇到的不测也制定了预案,多了几手准备。三个专列,前车,主车和尾车,主车两节车厢,进退自如。此次行程,毛泽东要求保密。

这天,正在青岛的江青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离京南下,让秘书打电话回北京询问:“什么时间能去见主席?”

毛泽东的秘书高碧岑的电话没有人接,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又打值班室的电话,值班员告诉他:“主席已经到外地去了。”

江青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这个东兴同志,主席这样大的行动也不告诉我一声,在他的眼睛里根本就没有我江青这个人啊!”

8月16日上午,周恩来、纪登奎、黄永胜、张春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他们一行人,被工作人员领进了会客室。

等候一段时间,只见林彪在叶群陪同下,出现在会客室门口,身上穿着几层厚厚的衣服,头上包着一块大围巾。而比林彪大5岁的周恩

来,可能是觉得室内温度太高了吧,此时是脱掉了外衣,只穿一件旧白衬衣。

寒暄后,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分别就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向林彪作了汇报。

当纪登奎汇报道:“军队现在冗员太多,一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一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团、营,一直到基层,也都是一个正职,好多个副职……林总,您是打过仗的人,军队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有了战争,还能打仗吗?”

林彪听了以后说:“就是啊,那怎么办呢?”

之后,周恩来请示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及毛泽东批示: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等事宜,并说:“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汇报工作进行了一个上午。林彪听大家讲完,也讲了话,然后说:“坚决拥护主席的指示。”

8月16日,江青从青岛回到北京。

就在周恩来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的同一天,8月16日,毛泽东抵达南巡第一站——武昌,随即在专列上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当晚,毛泽东住进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楼,又在这里召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开会。次日,8月17日,毛泽东与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汪东兴、刘丰也在场。

谈话刚开始,毛泽东就向刘丰问起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丰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

毛泽东说:“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

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说道:“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他继续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50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

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接着,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史,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敷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毛泽东提到井冈山时期的一些事情,他说:“陈毅当时到了上海,本来是告状的,但周恩来做了好事,批评陈毅不对,犯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还是要我‘复辟’。中央要我‘复辟’,我就‘复辟’了。”

他讲了李立三、王明的路线错误,说到遵义会议,又谈起长征路上与张国焘的斗争,一直讲到全国解放后与高岗、饶漱石的斗争。最后,把话题转到去年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他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诸人闻言,也纷纷检讨起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犯的错误。毛泽东并不想责怪他们,他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他接着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6年孔夫子,读7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25岁那一年,正是1918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毛泽东谈到庐山会议时的严厉表情,是刘丰等人从来没看到过的。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曾与刘丰谈过一次话,当时刘丰还不明就里,不可能有明确的态度。这次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他后来回忆说:只能以“心惊肉跳”来形容自己当时

的情景，他说只感到自己的心在扑扑乱跳。

接着谈到如何看待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毛泽东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性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

他又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7000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7000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

毛泽东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着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不知是谁回答说：“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其实，此时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正是他老婆项辉芳，是叶群亲自给办的。

毛泽东强调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 100 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 60 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 60 岁以下的、30 岁以上的人。”

“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调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开 99 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99 人会”是指 1971 年 4 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 99 人。

最后，毛泽东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 4 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随后，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已调到中央工作的，正在北京主持全国农业机械化等会议的华国锋立即赶到武汉，参加召见。

华国锋是 1970 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到中央工作的，同时还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1971 年 1 月，华国锋由毛泽东指定进入国务院业务组，出任副组长，主持领导农业工作。国务院业务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

8 月 18 日至 24 日，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闭门”不出。他特别叮嘱刘丰：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

刘丰遵守“纪律”，没有往“北京”报告。

第 1177 回：一元化，广州军区报《纪要》 《国际歌》，奴隶们创造历史

1971 年 7 月 15 日至 31 日，广州军区召开的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根据讨论精神写成《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上报中央。

《纪要》中说：广州军区现有 2 万多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其中担任省（区）、县和相当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有 3744 人，有 78% 的县以上党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队干部。

《纪要》反映：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骄傲跋扈、好大喜功、任人唯亲、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错误的思想作风；有些人存在着特权思想，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委。这些现象必须加以改正。

《纪要》提出：军队三支两军人员对地方党组织也应当尊重和支持，维护地方党委的威信，保证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的领导。

《纪要》规定：凡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的三支两军人员，必须接受地方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在地方各级党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别是担任一、二把手的军队干部，必须正确理解党的一元化方针，对三支两军人员实行军队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为主。

8 月 20 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在中央批语上增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要求引起重视。

毛泽东后来在南巡途中与各地负责人谈话时，再次就这个《纪要》所提出的问题说：“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8 月 25 日晚 22 至次日晨 1 时，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华国锋谈话，汪东兴参加。

毛泽东在与华国锋握手时间：“你来了。你们现在忙什么？”看到华国锋戴着毛主席像章，毛泽东说：“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厌，不要戴了。”

华国锋回答说：“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向毛主席作个汇报。”

华国锋汇报到正在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反映全国化肥生产情况不好时，毛泽东说：

“要抓化肥的生产建设。讲下放十几年了，下放不了，条条专政就是改不了，地方生产的钢也不分成，统统拿走，拖拉机也不让省里搞，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人，部里能管得了？条条专政害死人，我就主张靠省里管。天天叫下面报积肥数字，官僚主义。粮食产量，我历来赞成农民少报百分之十到二十。群众多留点粮食，无非是多吃一点，储备一点，卖出去一点，或拿来喂猪。”

华国锋汇报了农村多种经营、粮食征购等问题。毛泽东说：“我看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你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

接着，毛泽东又对华国锋简要叙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提到建国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毛泽东说：“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他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 23、24、25 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 6 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 7 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 1918 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毛泽东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六号简报》时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

接着他对华国锋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毛泽东又说到：“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38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24军、21军、38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38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毛泽东再次表扬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团的检讨。

最后，毛主席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说：“汪东兴、华国锋，你们明天和刘丰再议一下，汪、华可以先到湖南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先吹吹风，我也要和他们见一下。”

听了毛泽东的谈话，汪东兴感觉到气氛的严峻。下来后，他立即召集随行的警卫分队干部战士，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警卫部队要结合实际工作，提高警惕，做好警卫工作，“要随时有打仗的准备”。

8月27日14时，刘丰去看望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他：“怎么样？”

刘丰已感到了庐山会议上的事情没有完，也意识到了事情并不像他们当时想的那样简单。这几天，他想向汪东兴学习，忙着检讨。当听到毛泽东的问话后，他赶紧回答说：“这几天想得比较多，庐山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

沉重。”

毛泽东说：“你沉重什么？你们就是太急了，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

毛泽东又问起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方铭得了什么病？刘丰没有回答。

毛泽东再次向刘丰谈到党内的路线斗争，并明确说到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他总括说：“我们党 50 年，10 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

刘丰接着毛泽东的话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

谈到军队，毛泽东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

刘丰说：“主席还是管的。”

毛泽东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话题又转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

“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 8 个军，就有 5 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 66 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66 军就反对嘛！就是那两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

毛泽东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

“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

“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我讲的话，

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是天才。”

“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泽东还很生气地说：“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要开 200 来人的会议。”

毛泽东还对刘丰讲到，他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谈话结束，毛泽东问刘丰看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没有看到。毛泽东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泽东说：“到火车上再给他。”

接着，毛泽东满怀深情地说道：“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 25 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100 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 700 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

刘丰问毛泽东：“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刘丰等人送毛泽东到火车站上火车。刘丰扶毛泽东在车厢里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的歌词。正好吴旭君进来倒茶，毛泽东请她和张玉凤一起唱《国际歌》，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也随着她们的歌声轻声唱起来，并用手在茶几上打出明显的节奏。刘丰等人见状，也跟着一起唱。毛泽东情有所致，唱完一段，就讲解一段，最后，又讲起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他说：“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

“《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要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能实现。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

“要学习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 25 周年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

唱完《国际歌》后，毛泽东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对刘丰动情地说道：“歌里头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啊？”

8月27日下午14时30分，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驶离武汉火车站南下。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要刘丰等几个人陪同南下。

华国锋、汪东兴二人已于27日上午先行乘飞机到达长沙机场，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前往迎接。

卜占亚是1970年3月到湖南的。由于当时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央决定将驻湖南的47军调往兰州军区，加强西北防务。当时征求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的47军军长黎原的意见，是随部队赴西北，还是留在湖南任革委会主任？黎原表示，他还是习惯部队的工作，希望能随47军一起去兰州。于是，广州军区党委提名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卜占亚接替黎原，负责湖南的支左工作。当时卜占亚正在海南岛蹲点。

1970年3月19日，北京派来一架军用专机，先到广州接上丁盛和卜占亚，飞返北京途中在长沙降落，接上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和47军政委刘玲、副军长韩曙飞到北京。47军军长黎原此前已到北京。

当晚 19 时,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会议楼接见他们。黄永胜讲了 47 军的移防一事。吴法宪和李作鹏也简单讲了几句,主要说 47 军是原四野部队,到兰州后要注意保持和发扬四野优良作风,为林总争光。

移防的问题讲完后,黄永胜宣布:“47 军调走之后,湖南的‘支左’工作由省军区接过来;中央决定卜占亚同志去湖南,协助华国锋同志工作。”

接着,黄永胜又讲了一些到湖南工作应注意的问题。趁着黄永胜讲话的当儿,卜占亚拿过摆在他面前的便笺,写了几行字:“我喜欢部队工作,希望我在湖南工作一段时间后,仍让我回部队去。”

卜占亚把便笺递给坐在他右边的邱会作。邱会作是卜占亚的老上级,他看了卜占亚递给他的便笺,没有任何表示,便又传给他右手的黄永胜。黄永胜看后同样没有表态,又交给了吴法宪。吴法宪照着黄永胜的样儿,又传给李作鹏。李作鹏看后稍犹豫了一下,然后又给了邱会作。就这样,便笺在 4 个人手里转了一圈儿,谁也没有态度,甚至连个示意的眼神儿也没有。更让卜占亚想不到的是,只见邱会作拿起摆在他面前的火柴盒,擦着一根火柴,把便笺点着,很熟练地放进烟灰缸里烧掉了!整个接见过程约 1 个小时,卜占亚一言未发。

第二天,3 月 20 日晚,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政负责人,到场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周恩来代表政治局讲话。他说,为了加强“三北”地区战备,决定 47 军调往兰州军区。黎原随部队北调,但他的革委会主任职务不免,以防人事变动频繁,引起外界猜疑。黎走后由华国锋代理省革委会主任。为了不削弱省革委会领导力量,另调卜占亚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接见过程不过半个小时。

就这样,卜占亚来到了湖南。华国锋调中央后,卜占亚负责湖南的全面工作。

再说 1971 年 8 月 27 日,华国锋、汪东兴随卜占亚来到蓉城宾馆,坐定后,二人向卜占亚介绍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汪东兴还以毛泽东不高兴江青打扰他做事的例子特别嘱咐卜占亚,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不喜欢别人打扰,示意毛泽东的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非常

严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认真对待,“千万别在主席思考问题或谈话时打扰他”。汪东兴接着明确宣布,一会儿去迎接毛泽东专列,只需他自己、华国锋、卜占亚参加。因为当天,根据汪东兴的通知,广州军区还派值班飞机接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西区委书记兼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来长沙。届时,这3人也在长沙,但汪东兴没有让他们一起去接毛泽东。

第 1178 回：湘粤桂，众头脑齐集长沙 讲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8月27日晚21时，毛泽东专列到达长沙大铺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专门为毛泽东的专列停靠修建的，原是长沙市外的一个荒芜山头，后来修建成绿油油的果园，是汪东兴赞许过的全国三个较好的专列停车场之一。汪东兴等3人赶到车站迎候，但毛泽东却不急于下车，而是叫大家坐下。

卜占亚当时兼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泽东对他不太熟悉。他先问了卜占亚的简历，然后又问汪东兴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汪东兴回答说：“传达了。”

毛泽东说：“我明天要找他们谈话。”他接着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中。再次说到：“中国党有10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

毛泽东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

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我们一个师有两个团，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肖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

“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了北京，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没有原料，我们供给他们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比如你要织布，

你没有棉花，不准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我们供给你棉花，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要由国家收买。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这样做了几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官僚资本占 80%，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怕他们干什么？过了几年，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嘛？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心里是假的，假的好嘛。”

他接着问到：“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毛泽东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他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5·16’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泽东讲完这段话之后，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他说：“我们唱了 50 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 10 次分裂活动。这次不作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 10 次、20 次、30 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

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这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泽东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个人五音不全，各唱各的，汪东兴便把随行的医生、护士都叫来，参加合唱。

当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他风趣地说：“那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了。”

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泽东说：“这两条问题不大。”

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泽东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特别是当了营长，更不得了啦。我们说话要和气，不要耍骄傲。”

当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他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当唱到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

毛泽东又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

接着，他又谈到部队自林彪负责军委工作后开展的“四、五好运动”。他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

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6年土学堂，7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青年人有个脾气，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对这个问题老年人、中年人也得注意。”

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泽东要求大家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重唱一遍。重新唱完这句后，他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

毛泽东最后好像挺高兴似地说：“今天我们开了个六级干部会议。”他问旁边的医生：“一个月多少工资呀？”

“117元。”

“你这么多钱，会不会变修呀？”毛泽东很认真地问。

“不会，”医生笑着说：“还有比我钱多的呢。”

1个半小时后，22时30分，毛泽东乘坐专门从北京带来的吉斯轿车离开专列，入住湖南省委九所6号楼。毛泽东的内层保卫工作由随行的警卫部队负责，毛泽东卫士为一中队副中队长商来保，秘书是一中队副区队长高碧岑，保健工作由护士长吴旭君负责，张玉凤负责勤杂事务性事情。

27日一整天，长沙市各主要路口都加强了公安人员执勤，交警指挥也更加细致规范，但没有实施交通管制，更没有戒严，大街上与往日无异。

8月28日上午，毛泽东委托汪东兴、华国锋与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座谈，传达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晚上21时，毛泽东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谈话。

毛泽东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

我不怎么熟悉。”他又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国清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泽东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泽东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泽东问刘兴元是哪里人，刘兴元答是山东莒县。毛泽东笑着说：“噢，‘毋忘在莒’啊！”

问到丁盛，丁盛讲了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笑着对他说：“你可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哟。”他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

毛泽东接着说：“韦国清，你虽是红七军的，可也编到三军团了。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

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 50 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 50 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 10 次。”

他讲到陈独秀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提到了刘仁静、彭述之的名字。他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到瞿秋白反对他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又说到李立三、王明。“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 年 1 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

面讲的这 5 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泽东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 5 个常委瞒着 3 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泽东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 38 军的报告。他们整 38 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 24 军、整 21 军、整 69 军、整 38 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他又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 6 年孔夫子的书、7 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 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 8 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坑。我们 8 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 7 个人都

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泽东转向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国清回答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泽东问韦国清：“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接着，刘兴元做工作汇报，毛泽东听完后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10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毛泽东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丁盛说，他在延安整风中学过两本书，对他帮助很大，后来还参加过“七大”。

毛泽东听后说：“你参加过‘七大’，了不起呀！”他问刘兴元、韦国清、汪东兴：“你们有没有参加呀？”

汪东兴回答说：“我参加了。我是‘七大’的候补代表。”

毛泽东转向丁盛问：“你打过些什么仗？”

丁盛回答说：“打过锦州。”

毛泽东说：“打锦州时，有一个部队把蒋介石的增援部队挡住了，打得好。”

接着，他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到了北京，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说到这里，毛泽东沉思一会，把谈话内容转向“天才论”。他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章，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接着丁盛汇报他的战斗经历。当讲到冀东暴动的情况时，毛泽东说：“邓华这个人，跟着别人犯过错误，我对这个人寄予希望。杨勇被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钟赤兵这个人被敌人打掉了一条腿，是在娄山关被打掉的，你们不要歧视他。他是打娄山关负伤的。当时我看见一副担架抬着伤员，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钟赤兵，当团政委。这

个人似乎可以到你们广州军区，科委有人歧视他。”

毛泽东接着讲学习问题。他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30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边境作战时，有一个部队从生产的地方拉出来，上前线打仗，并且打得很好。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

你们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搞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第1179回：要学习，水至清则无鱼 聚“九所”，毛泽东再说庐山

29日上午，毛泽东找韦国清谈话，下午，汪东兴、华国锋、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6人座谈。晚上，汪东兴将座谈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边听边插话。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

汪东兴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

毛泽东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汪东兴回答说“主要是学习问题。”

毛泽东说：“对呀。我经常提到这个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你看，这一次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自己又不看马列主义的书，陈伯达搞的那一套就相信了，而且照着念，照着引用。”

汪东兴又讲起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要他打印称天才语录的事，毛泽东听后说：“这个没事。你是办公厅主任，你不是有意要打印陈伯达搞的语录。他是常委，他要你打印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以后也没有用上。总理让封存起来，你就封存了，没有扩散。这是对的。你发言被人利用，这是事实。在湖北检讨以后，我对你们比较放心了。你没有什么问题。”

汪东兴：“我还是有错误。”

毛泽东：“当然，你发了言嘛。”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学习问题，提倡读点历史、经济学、小说、哲学史。

他说：“《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这都是文学

作品,很重要的,是反映政治性的小说,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完美,写得很好,语言也很生动活泼。”

毛泽东嘱咐汪东兴把这些话向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传达,等有机会时,再向政治局传达。

毛泽东考问汪东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汪东兴回答说:“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毛泽东表示满意。他说:“《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文章写得好。那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比你年纪小。只有30岁左右。你看人家!”

“在党里为人也好,在社会上为人也好,个人为人处事也好,都要以团结为重,要辩证地看人,两点论地看人,变化性地看人。一分为二是辩证的嘛,二点论也是辩证的嘛。”

“为人不可太认真了,水至清则无鱼;不看书不懂文学,不做工作不懂事。你干事太认真。这样的话就好比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了。”

8月30日上午,毛泽东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汪东兴参加。毛泽东照例好似漫无边际地闲谈说笑好一阵子。

说到卜占亚,毛泽东说:“你的野心太大,你要占有整个亚洲呀?”他又问卜占亚是哪里人,卜占亚答是河北蔚县。毛泽东说:“我有个警卫员也是蔚县人。你们蔚县当年可是安禄山造反的根据地呀!”

轮到韦国清了,毛泽东说:“你这个人哪,面善心狠。当年打奠边府,要不是你下决心,奠边府是打不来的。”

寒暄过后,转入正题。毛泽东问:“你们座谈两天了吧?怎么样?”

大家各自简要地汇报了两天座谈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说:“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99人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做了总结讲话,发了5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回到北京我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来找我,我找他们。”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他说:“全党人多,我们党有两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

“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你们的组长是谁呀?”

在座的回答说:“我们中南组的召集人是曾思玉。”

毛泽东:“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38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

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光在报纸上登(指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谈到这里,毛泽东问刘兴元:“你会写文章吗?”

刘兴元说:“不会。”

毛泽东又问丁盛:“你呢?”

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

毛泽东说:“那怎么办啊?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毛泽东又谈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庐山这一次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做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不过,林彪同志固然不对,但主要还是他的老婆不好。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

众人纷纷回答说:“没有。”

毛泽东接着说:“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 1300 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讲到这里,毛泽东看了汪东兴一眼。汪东兴说:“我一共做了 3 次检查。”

毛泽东接着说:“少数人说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其中包括我的护士长、服务员、护士都说好。”

毛泽东又看了看大家说:“你们听了我这一吹,又是什么英明伟大

呀,又是英明领导呀,又是很多都是新东西呀,没听见过呀!”

韦国清接上话头说:“我们听了很受教育。”

毛泽东笑着说:“看,你又来这一套了吧。”

毛泽东说,他的这次谈话与在北京召开的 99 人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有所不同,他说:“我说的这些,超过了 99 个人会议总理做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泽东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话锋一转,毛泽东又提到了黄永胜。他问刘兴元、丁盛与黄永胜的关系如何?

刘兴元说:“我们还是儿女亲家咧!”

毛泽东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

吐吐。”

刘兴元回答：“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

毛泽东：“我这个人也急，要改。军人搞惯了，就是急。急不好。战士才不管你呢。对战士管得要合理，要有理，就是合乎事实，讲道理。”

接着，毛泽东“将”了刘兴元、丁盛一“军”：“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讲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桌子上的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又表示：“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泽东：“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99个人的会议，已

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贊成分裂。”

他最后说：“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接见结束时，几个被接见者几乎同时提出：讲话精神可否在一定范围内作传达？丁盛更是当面问毛泽东：“主席，您讲了这么多话，这么多重大的事，我们回去要不要传达呢？”

毛泽东说：“不！没有传达任务。但是你们可以吹一吹风。”

这次谈话长达3个小时。

第1180回：苏闽赣，三巨头会在南昌 说“路线”，许世友委实不安

8月31日，毛泽东决定去南昌。当天上午10点多钟，专列准备就绪。中午12时30分，汪东兴送毛泽东到长沙火车站，他让华国锋和卜占亚一同到火车站送行。

临别时，华国锋问毛泽东：“主席，我回到北京，别人问我，我怎么回答？”

毛泽东说：“你只跟总理一个人谈。”

专列不到下午13时就开走了。

汪东兴送走毛泽东的专列，又回到住地，收拾好文件，吃完中午饭，于下午13时30分，乘飞机提前赶往南昌。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时，已经让汪东兴通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到南昌谈话。下午14时，汪东兴到达南昌后，又让他乘坐的专机飞往南京去接许世友，韩先楚则坐福州军区的飞机从福州飞来南昌。

下午17时左右，许世友、韩先楚先后抵达南昌。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许世友、韩先楚和江西的程世清3人传达了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他们从下午17时30分开始，到19时30分结束，共传达了两个小时。

晚上21时，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南昌，汪东兴、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一起到专列停车处去接毛泽东。

专列停好后，他们上了车。毛泽东在车上与他们谈了几句后说：“车既然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住地去谈吧。”

他们送毛泽东住进南昌向塘机场附近的八二八招待所。这里原是空24师师部，后仿照武汉东湖和杭州刘庄改建成招待所，环境和设施很好。安顿好后，已是22时多了，毛泽东与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开始第一次谈话，汪东兴在场。

毛泽东开门见山：“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他转向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许世友赶快声明：“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

毛泽东摆了摆手，表示并没有把许世友划到张国焘一伙中去。其实，张国焘搞的伪中央的名单，中央早就知道了。

毛泽东接着说：“陈独秀搞分裂，有 81 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泽东说的《文告》是指 1929 年 12 月 10 日，陈独秀等 81 人公开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毛泽东问程世清：“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

程世清赶忙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毛泽东并未继续深问，他又问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

许世友马上说：“我与上海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保我，一直为我说话，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

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

许世友又补充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毛泽东接着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你对我的感情没有过去深了，我的话也听也不听。”

听到“刀下留人”的话后，许世友紧张了，他有些怕了，连忙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

关于浙江问题，中共中央曾于 1969 年 1 月 8 日至 29 日，在北京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包括许世友在内的南京军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等 10 位领导干部参加。名单是由许世友拟定，并经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准的。当时，毛泽东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

评对方。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浙江的武斗仍没有停止。

毛泽东问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有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当时，对舟山的问题，许世友和南萍总是谈不到一起，叶群也坐飞机去舟山调解过，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去过，都没有解决问题。

毛泽东转身向韩先楚问道：“你是湖北人吧？”

韩先楚的情绪比较轻松，他回答说：“我是湖北人。”

毛泽东：“湖北的人我认识得很多，也可以说是不少吧。有个李求实是湖北人，有项英是湖北人，有黄富生，有施洋，有董必武，还有恽代英，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名人嘛。这些都是湖北佬。”

韩先楚只是笑，没有说话。

毛泽东兴奋地说：“湖北出人才呀！”

他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他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

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二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转向许世友、韩先楚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其实，韩先楚、程世清随红25军长征，没有卷入张国焘的活动。但是许世友坐不住了，毛泽东屡屡提到张国焘，又提到“缔造”“指挥”，委实让他不安。许世友赶紧转移了话题，请示说：“主席呀，有‘516’分子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怎么又谈到‘516’啦？”

许世友说：“‘516’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516’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

毛泽东问：“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

许世友回答不上来。

毛泽东批评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做结论。”

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

王是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林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维先；鲍是指南京军区副政委鲍先志。

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

毛泽东反问：“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

许世友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

随后，毛泽东说起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并从理论上揭露了“天才史观”的唯心主义本质。他对许世友说：“你没读几本书也

好,现在是不读书的犯错误少,倒是那些自以为读了很多书、懂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人常犯错误。因为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主义,只会搬弄几句词汇吓唬人。”

他说:“庐山会议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回到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就去找他们。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对林还是要保。”

同时又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毛泽东提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讲到军队,毛泽东提了3点要求:军队要谨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他说:“我就不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军队造反!”

讲到路线斗争的重要性时,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就知道挖煤,光搞黑的,不搞红的,不抓路线。”

最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个口号,叫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已是子夜0时了,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先座谈一下。

许世友穿白汗衫和绿军裤,脚上穿一双用麻绳布条编织的“草鞋”,鞋面上还缀着一个红穗。望着许世友的装束,毛泽东突然问:“现在还打猎不打了?”许世友毫不犹豫地说:“打!”毛泽东哈哈大笑。

谈话结束后,程世清彻夜难眠,毛泽东的谈话极大地触动了他。第二天,9月1日下午,程世清找到汪东兴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由你转告主席。”接着,他便对汪东兴谈了他自己的问题和对林彪问题的看法。汪东兴听后说:“你说的这些,应当亲自去向主席讲,我不替你转达。我刚从主席那里来,他还没有休息,你现在就可以去。”

于是,程世清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本来就带着病,连日的奔波和谈话,加重了感

冒,9月1日下午,发烧38度多,晚上卧床休息。

这天晚餐时,汪东兴对陪餐的程世清等人说:“这里的条件不错,主席要在这里多住几天,你们多弄点野兔和斑鸠。”程世清等人听了很高兴,随即作了相应安排。

毛泽东到武汉时,曾思玉因肾结石手术正在大连疗养。9月1日,刘丰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并一再强调要绝对保密。

9月1日,留在长沙的韦国清、刘兴元、丁盛、华国锋、卜占亚5人一起去韶山滴水洞,在那里住了两天,共同回忆毛泽东几次接见时的讲话,由卜占亚执笔写出记录整理稿,共复写6份,5人每人一份,作为内部“吹风”的依据,另一份寄给汪东兴。

毛泽东在湖南的4次谈话,禁止一切秘书、工作人员参加。华国锋等人在滴水洞整理这些谈话记录时,也是严禁一切其他人员参加。

许世友和韩先楚都是“打猎迷”,两位好朋友碰到一起,9月1日下午开完座谈会,他们就高高兴兴打猎去了。第二天,9月2日早上,许世友又扛着猎枪到机场附近的草滩打野兔子。

9月2日上午8时,毛泽东起了床,可能是感觉好些了,他对汪东兴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

汪东兴知道此事自己是不能做主的,就说:“您看呢?”

毛泽东:“还是见他们一下吧。”

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等人,可是怎么也找不到许世友和韩先楚了。汪东兴那个急呀,心想:“这下糟糕了。”半个小时后,总算摸到他们的行踪,原来两人又打猎去了。好在跑得不远,就在机场附近,马上派人把他们“抓”了回来。

这一次谈话时间不长,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向你们传达我在路上的谈话,你们也谈了谈。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

韩先楚没有“包袱”,抢先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

说到庐山会议,许世友觉得他也有理直气壮的地方。在庐山,毛泽东让许世友摸他的手,说:“我的手凉,脚也凉,你回去做做工作,我

不能当国家主席。”许世友马上四处做工作：“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

许世友提起他与南萍的事，请示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

许世友问：“那我回去吗？”

毛泽东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40分钟就结束了。随后，民航江西省局政委王起元将毛泽东在南昌接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一事，写信告诉了民航上海管理局政委辛国良。辛国良又报告了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

第 1181 回：程世清，揭林彪再爆新事 西湖边，陈励耘手足无措

9月2日，毛泽东再次单独听取程世清汇报。据文革后参与林彪、四人帮“两案”审判工作的图们将军回忆：

9月1日、2日，毛泽东单独两次同程世清谈话。据程世清交代供述：

“向毛主席报告主要内容是：

1、庐山会议期间，8月24日晚12时，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向毛主席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要从林豆豆那里了解情况。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

2、周宇驰两次来南昌活动，这次来很神秘、鬼祟，把过去江西改装的一辆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怀疑他们要逃跑；

3、林豆豆几次来江西，有一次要豆豆同我的家属说：程政委心直口快，以后少同我们家谈，搞不好要杀头呀！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里的人是有矛盾的；

4、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的病是不是叶群搞的。林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闹得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

主席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你同我说的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

后来李意根采访程世清时，程世清讲述他两次单独向毛泽东汇报的主要内容，第一条最后一句是这样说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第二条是：“1970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

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第三条是:“1971年7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飞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8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第四条说的是林豆豆与他家属谈的情况。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

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让程世清“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这些情况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9月2日吃过中午饭,大家刚躺下睡午觉,突然传来命令:“主席现在就要走,立刻启动警卫和护路的工作。”不一会儿,毛泽东在汪东兴和程世清的陪同下,从一号楼的内室来到门厅,向大家招招手,登车而去。

此时,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正在南昌附近的进贤县五七干校,但一直到毛泽东离开南昌,也没有把见女儿的事情排上日程。

毛泽东的专列走了近13个小时,9月3日零时,到达杭州,停在笕桥专用线上。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浙江省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空5军政委陈励耘前去迎接。

走进车厢后,当工作人员介绍陈励耘时,毛泽东问他:“你在庐山犯了错误吗?”陈励耘顿时感到十分紧张。

坐下后,毛泽东问南萍:“你们省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南萍汇报了浙江天旱与抗旱的情况。

毛泽东听后说:“天不帮忙噢!”

接着,毛泽东把话题扯到九届二中全会上,他问南萍、陈励耘:“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不是说有8个人嘛?”

他看着陈励耘,又说:“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还

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8个中央委员嘛？”

陈励耘听了慌忙解释：“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

毛泽东听后顺着说：“是啊，说话不准确！”

接着陈励耘又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毛泽东：“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望着毛泽东发怔，没有回答。

毛泽东提到“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是指王维国。接着他又谈起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六号简报》，他说：“那份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在座的人都没做声。毛泽东接着谈如何正确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他说：“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比如说，我当班长，你们三个都是兵，我总是那么凶，抓着你们辫子不放，那么行吗？”

陈励耘赶紧说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接过他的话题说：“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

“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这是指林彪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接着又说：“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这是指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曾经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泽东，但是都被叶群阻止了。

毛泽东继续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100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

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谁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他再次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又提到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提出要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他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指毛主席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泽东又谈到军队问题：“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他又提到了北京军区的问题：“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

们先整了24军，又整了31军、69军，最后整了38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21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66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然后问南萍：“舟山还武斗不武斗啊？”

南萍回答说：“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组织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

毛泽东说：“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一下。”

毛泽东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接着又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他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今天谈到这里。有些在别的地方谈的，请汪东兴同志再同你们谈谈。”

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毛泽东说：“我打算在你们这里休息几天，你们欢迎不欢迎？”

陈励耘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请主席下去休息。”

毛泽东说：“你们欢迎，我就去吧。”

毛泽东离开专列到杭州住所，陈励耘等在门口迎接，毛泽东见到陈励耘，面露不悦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陈励耘赶紧解释说：“我，我分工管警卫。”说着很快躲开了。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64年升任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

9月4日、5日，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

9月4日，汪东兴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毛泽东8月16日至27日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稿专送周恩来。

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

毛泽东这次住在杭州，随着时间的延续，情绪越来越不安。他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有天上午，毛泽东出来散步，看见中央警卫团中队长陈长江正在给集合在礼堂门前一棵高大榕树下的部队讲注意事项。干部战士身着便服，在别的场合见到他们，你决不会以为他们是解放军；但现在是集体活动，每人坐一个小马扎，成排成列，整整齐齐，尽管天气很热，他们仍然服装整齐，聚精会神地听队长讲话。

毛泽东来到队前，大家热烈鼓掌，陈长江说：“主席，我们正在学习，讲你说的那个‘三要三不要’我讲得不好，请主席给大家讲一讲吧。”

毛泽东向大家摆了摆手，表示不讲了，说：“长江，你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吧。”

于是，陈长江开始指挥唱歌，大家越唱越来劲，不到50人唱歌，比100多人的连队唱得还响，他们一连唱了两遍。毛泽东很高兴，说：“唱得不错，再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就站在那里听他们唱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了陈长江问：“主席，你还有些什么指示？”

毛泽东挥了挥手说：“你们的歌唱得很响，不仅要会唱，还要照着去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嘛。”

华国锋、卜占亚他们从韶山回到长沙后，周恩来让华国锋继续留在长沙，接待朝鲜军事代表团。4日晚，华国锋出席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为朝鲜军事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在宴会上讲话。

9月1日，中央办公厅将林彪8月16日与周恩来等人在北戴河的谈话整理成文报毛泽东。9月5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接到中央办公厅9月1日报来的林彪8月16日讲话稿，圈阅同意。

9月5日，周恩来将林彪8月16日讲话审阅定稿后送毛泽东，并指示：“特急件，急送王良恩同志、印发政治局同志，给我四份。”

9月5日，华国锋和湖南省党、政、军领导，到机场为朝鲜军事代表

团离开长沙到武汉访问送行。9月6日,华国锋赶回北京。当天,他接到电话通知:晚22时30分,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周恩来召开的讨论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

当晚,华国锋准时来到东大厅,李先念、纪登奎轻声问他:“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

华国锋说:“主席谈了路线斗争。”然后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

会议一直开到次日旭日东升才结束。人们陆续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一本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在武汉的记录是别人整理的,在湖南的讲话是我们大家整理的。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毛泽东在南方视察的情况。然后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谈。”

9月5日、6日,卜占亚也在长沙分别向湖南省委、省军区党委部分常委“吹风”。8日,卜占亚再给参加省委读书班的地市主要负责人和在长沙地区的县团级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作“吹风”报告。当天,湖南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的通知,《湖南日报》按湖南省委指示,刊登列宁为《国际歌》词作者去世25周年写的文章及这两首歌曲,引起其他省市的高度关注。许多报社打电话来问《湖南日报》社,现在刊登这两篇革命歌曲有什么背景。《湖南日报》社回答各地报社,他们也不知道,是省委让登的。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临行前,9月4日,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丁盛和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丁盛、刘兴元回到广州后当天,立即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这在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一个圈子知道这些情况,甚至上了庐山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受骗上了当”,此时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广州军区的传达会议开了一个下午还没开完,晚上接着传达。

开会正式传达前,丁盛宣布纪律:第一,不准做记录;第二,不准向外泄露。为此还专门指定军区政治部一个副主任在现场监督检查。

第 1182 回：听反映，连夜安排移专列 离杭州，毛泽东突然抵沪

9月8日晚上，停留在杭州的毛泽东得到消息：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一位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时也反映：“有人说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毛泽东把汪东兴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汪东兴问毛泽东：“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

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汪东兴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

毛泽东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汪东兴从毛泽东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泽东在杭州警卫工作的空5军政委陈励耘。陈励耘的秘书接到电话后，马上跑到汪东兴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情请跟我讲吧。”

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

秘书肯定地回答说：“能。”

汪东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紧接着，汪东兴又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

汪东兴还对张耀祠说：“天气太热，专列转到新的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搭个防晒的棚子。”

张耀祠马上落实了。这些情况，汪东兴都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

毛泽东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9月9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了周恩来9月5日报来的林彪8月16日在北戴河讲话时谈到的关于当前战备工作的谈话记录。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他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四人于8月16日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时，林彪对战备工作谈了一些意见，经整理送

阅。如可用，拟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给各大军区、省军区、各总部和军兵种讨论实施。毛泽东批示：“同意。”

10日中午吃过午饭，毛泽东突然将汪东兴叫去，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了。”

汪东兴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泽东问：“为什么呀？”

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

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汪东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刚说到这里，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汪东兴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汪东兴一面通知南萍他们过来，一面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开始返回。

14时30分，南萍等人来到毛泽东这里。当毛泽东同白宗善握手时问到：“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

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

握过手，毛泽东首先谈起了“曹刿论战”的故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他接着说：“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

毛泽东再次谈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红军30万，到陕北剩下25000人，当时中央苏区8万，只剩8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

他带着警示的口气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

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

毛泽东对在座的人说：“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嘛！”

汪东兴说：“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

毛泽东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100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他进一步谈到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几个副词我圈掉过几次了，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毛泽东问：“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呀？”

陈励耘说：“我参加过。”

毛泽东说：“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

陈励耘回答说：“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

毛泽东又谈到陈毅。他说：“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意见。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

“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大家纷纷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泽东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不同。”

他又提到浙江和南京军区的关系：“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

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

他问南萍:“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这次还要谈。”

南萍说:“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

毛泽东:“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

南萍等人答复说:“受他的指挥,听的。”

毛泽东点点头。最后,他说:“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了。万岁,英文翻译为 Long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青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

14时50分,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杭州。

毛泽东同浙江省及军区负责人南萍、熊应堂、白宗善、陈励耘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却没有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走。

谈完话,汪东兴请南萍他们到自己的房间里休息,然后回到毛泽东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

毛泽东回答:“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汪东兴问:“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泽东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我要见他。”

因为此时南萍他们正在汪东兴的房子里,汪东兴就在毛泽东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同时告诉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越快越好,“客人”要同他们谈话。

9月10日这天,警卫团像往日一般,没有任何其他的安排。上午,他们与驻地警卫营举行篮球友谊赛,天太热,上场球员个个像水洗一样,中午又吃的是热面条,犹如火上浇油,战士们刚换上的衣裤马上湿淋淋的了。午饭后,大家都洗了衣服。中午刚过,突然说马上就走,刚洗的衣服还在往下滴水,他们赶紧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全部带

走。马上登车，所带东西包括厨具都装上了车。

毛泽东从汪庄出发，陈励耘坐引导车走在最前面，车上有他的秘书王明寇，还有个警卫干事孙世臣。中央警卫团中队长陈长江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乘一辆小车紧随其后。8341部队的前卫车和后卫车的分队人员已提前行动，因为前卫车要提前几分钟开，控制车站进出口和登车地点，留下30多人随中队长陈长江跟专列一起行动。毛泽东乘一辆小轿车，由汪东兴陪着，他们前面是一辆面包车，坐着8341部队的警卫战士，杭州警备区一个警卫排跟在后面。

引导车引导车队进贵宾室旁边一号门，直接进月台，警卫处副处长王英杰将毛泽东的座车一直引到车厢门口。

毛泽东上专列时，没有通知任何人来送。陈励耘下了引导车，不敢接近毛泽东，更不敢走过去同毛泽东握手，只是远远的地站着。他跟汪东兴握手时间：“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汪东兴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

16时，毛泽东的专列开出杭州。

专列开出后，陈励耘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9月10日下午，上海铁路局打电话向上海负责保卫工作的空4军政委王维国报告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到了浙江嘉兴，要到上海来。这时，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和空4军军长郑长华正在空4军开会，王维国接了上海铁路局的电话后进来告诉他们说：“毛主席从杭州到上海”，叫他们两个人留一个主持会议，另一个人和他去见毛泽东。

周建平让郑长华去，他主持继续开会。

9月10日18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到了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专门为专列修建的吴家花园支线上。这里的站台筑得比普通的站台要高一些，正好和停靠的车厢门口的踏步相平，这样，上了年纪的人登车就不太费力。

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泽东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在离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汪东兴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

专列到达上海，毛泽东没有下车。汪东兴下车去接王洪文和许世友，但只接到王洪文和王维国，许世友没到。汪东兴把王洪文、王维国引进车厢。

这是一辆用整节车厢改装而成的客厅。客厅里围放着一圈沙发，每个沙发旁边都安着小茶几，地上铺着地毯，车窗上挂着纱窗幔。客厅两壁的壁灯和车厢的顶灯，射出明亮而柔和的光线。

毛泽东坐在车厢顶端一头的沙发上，穿着白色的长睡袍，黑色的圆口布鞋，豆沙色的长袜，显得随便而有气度。

王洪文问候毛泽东最近身体可好。

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

王维国向毛泽东检讨，说自己在庐山犯了错误，没有听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看了王维国一眼，没有接茬，而是扭过头去对王洪文说：“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王洪文没有说话，王维国则大吃一惊。

毛泽东问王洪文：“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

王洪文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与他联系。”

毛泽东与王洪文、王维国和汪东兴一起谈话，提到了军委办事组在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的问题，说他们应该检讨，并说回北京后和他们“吹一吹”，即谈一谈的意思。谈到晚上20时左右，毛泽东说：“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吧。”

王洪文请毛泽东下车到“414”招待所去住，毛泽东挥挥手，让王洪文、王维国先走，表示他自己不想下车，要休息了。

王洪文告辞出来也没有走。当天晚上，他就住在专列旁边的房子里。王洪文很热情，还请汪东兴也搬到车下来住，汪东兴谢绝了。

在此期间，周建平开完会，给空4军军长郑长华打电话，问需不需要他去。郑长华说：“王维国还在毛主席专列上，没有下来。”

王洪文连夜布置和检查警卫工作。毛泽东在上海专列的外部警卫工作，是由王维国负责。而此时的王维国则坐立不安，他给远在北

京的林立果打去电话,告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

随毛泽东南巡的8341部队就在车上吃的晚饭,并住在火车上。晚上21时左右,汪东兴把几个秘书、卫士找到一起,拿个小本子,一页一页地翻着,有选择地向他们传达毛泽东与上海领导人的谈话内容。要求他们严密部署列车周围的警戒,重点部位要加设双哨,干部要加强值班。根据汪东兴的要求,8341部队一下加了五、六个哨,还增设了一个由3人组成的巡逻哨,并让哨兵佩带了冲锋枪。

23时,周建平被郑长华叫到虹桥机场休息室,他看见郑长华正在抽烟。周建平问他有事吗?郑长华说:“毛主席明天要接见上海市和三军负责人,已经派飞机去接许世友了。”

第 1183 回：不见人，上海等候许世友 饭局间，专列已北上离沪

9月10日，政治局修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当日晨4时，周恩来报送毛泽东，并报告说：“在四届人大召开前有几件事要请主席批示，方好着手准备。一、国庆节前，是否需先开一次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二、陈伯达可否在三中全会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三、三中全会上可否补选几名中委（如姬鹏飞）？”报告还说，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已写出初稿”，拟从11日起，由政治局确定几名成员以10天时间改好送审。

毛泽东批：“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

9月11日凌晨，华国锋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到国务院会议厅谈话。这次谈话，华国锋详细地向周恩来介绍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甚至包括谈话时的神态、情绪，记录是怎么整理的。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两人没有议论。这次谈话用了近一个半小时，一直到清晨4时30分结束。

也是在11日凌晨，南京，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被一号电话的铃声惊醒，据他后来回忆，他当时看了下表，正好两点钟，总机接转的是上海王洪文打来的电话，说“有客人要见许司令，要他上午赶到，来得越快越好。”

不过，据汪东兴回忆，上海王洪文在10日晚20时前毛泽东询问他时，就已经告知：许世友“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与他联系。”而空军军长在23时答复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的询问时说：郑长华说：“已经派飞机去接许世友了。”

而李文卿是8月31日随许世友去的南昌。因为毛泽东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等人的谈话记录稿要参加谈话的领导亲自抄写和保管，许世友便对汪东兴说：

“你还不知道我，字是认识不少，写字不行，要不你给我抄一份，要

不就让我的秘书抄。”

汪东兴同意,让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抄了一份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稿。抄好后,许世友一再嘱咐李文卿要保管好,要绝对保密,还说:“泄漏出去杀头!”

11日凌晨,李文卿听到上海的电话,猜到是毛泽东到上海了。他马上叫总机找许世友,但是总机说不知道许司令在哪里?

原来,许世友9月2日乘专机返回南京后,当天下午向军区和省的主要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后,就去扬州地区视察了。李文卿认为,是这次跟许世友去扬州的秘书缺乏经验,没让通信部门给许世友的住地架电话,所以一时间无法找到许世友。后来有人说,许世友此时正在打猎,所以找不到他。

听说找不到许司令,李文卿头上顿时急出了汗:“到哪里去找许司令呢?”他急中生智,又给扬州市委书记陈敬义打电话,托他转告:“家里有急事,请许司令速回。”

9月11日一大早,周建平就到机场安排专机去南京接许世友。但天气不好,飞机一直不能起飞。虽然空4军军长郑长华打电话通知说:“如果市委同志来了,请他们回去。”但是过一会儿,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上海市委领导还是来机场接许世友了。周建平对他们说:“天气不好,许司令可能不来了。”

上海没有派飞机来南京接许世友,南京的李文卿考虑,从南京坐汽车到上海要7、8个小时,再快也得下午才能赶到。乘火车呢?不知许世友几点钟回南京,能不能赶上车次也是问题。时间紧迫,他赶紧找作战部派值班飞机。值班飞机是总部派给各大军区使用的苏式伊尔-14型,由空军负责养护和驾驶。

11日上午9时15分,许世友回到南京中山陵八号,进门就问:“飞机到了没有?”

李文卿说没有飞机来接,是乘空军的值班飞机。

许世友一听就不高兴,说:“要汪东兴!”他亲自打电话要飞机来接,汪东兴告诉他说,飞机来不了。

许世友没有办法,只好乘空军的值班飞机去上海。他交代李文卿带好小型电话保密机,还有他的猎枪,随他一起去。

在乘车前往机场的路上,许世友责怪李文卿:“毛主席的谈话记录你也看到了,怎么还乘值班飞机?”

李文卿没说话,心里却反问:“你不是也没有要到专机吗?”

许世友不顾天气情况还是乘值班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汪东兴等人过来迎接。许世友一下飞机,汪东兴就接他坐车前往吴家花园火车站,汽车直接开进月台。

下了车,汪东兴招呼许世友和王洪文上专列,让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去车站会客室休息。

毛泽东的专列紧挨着车站会客室,车厢门口距离会客室门口不过10来米。李文卿手里提着电话保密机和许世友的猎枪,肩上挎着一个小旅行包,站在会客室门前,目送许世友、王洪文在汪东兴引导下走向车门。他看见一行人走了几步,汪东兴停下,对跟上来的王维国说:“你也去休息吧。”

王维国一下子站住了,过了几秒钟,转身朝着会客室晃悠过来。走进会客室,他往沙发上一躺,腿一跷,“哎”了一声。

车厢里,毛泽东见许世友他们进来,想起身迎接,一下没有站起。汪东兴就招呼许世友他们主动上前和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没有寒暄,待他们坐下便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

许世友说:“我去看农场,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他没敢说打猎去了。

毛泽东问:“去那么远了呀?”

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

毛泽东批评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

许世友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点多才回到南京,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打电话到上海。”

其实他是在11日上午9时多才回到南京。接着,许世友大概是

为了打消毛泽东的疑心，赶紧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

毛泽东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

许世友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游过苏北。”

毛泽东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

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

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

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毛泽东说：“那好。”

王洪文埋怨许世友：“主席等你快等了 15 个小时了……”

毛泽东马上打断：“不要这样，不要紧嘛。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一下，我们还是谈正事。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能解决了呀？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耐心地等待嘛。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

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问：“我有什么指示呀？”

许世友答：“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毛泽东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 5 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 24、25、26 日三天嘛。”

许世友坚定地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

毛泽东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

许世友哈哈笑起来。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那个指示吗？

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

王洪文看许世友没再说什么，就开始汇报。他说：上海的五、六位中央委员和市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现的问题座谈了一次。

毛泽东问：“你们座谈了一些什么呀？”

王洪文说：“突出的是讨论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

毛泽东问：“你们嘀咕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

王洪文说：“他是副主席讲话，但当时我们都很少发言。”

毛泽东又问：“那你们不是也都听了吗？你不是也听了录音嘛！那时你们华东、上海就一个拥护的字都没有说呀？”

王洪文回答说：“有。那个时候不拥护也不好。这次我们座谈时，也讲了一些意见，但有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发挥。当时庐山会议上，就是安排要讨论的，我们华东组除了有些人抢着发言外，我们也发了言，我也讲了几句。事后，听说林副主席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讲的，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

毛泽东：“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呀？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

王洪文接着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

毛泽东问：“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呢？”

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设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继续问王洪文：“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

王洪文说：“这个《简报》是有错误的，是错误的《简报》。当时我们几个人到了主席那里谈过了。”

毛泽东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

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先让本人看呢？”

他接着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毛泽东讲完这些后，对许世友、王洪文又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最后，他问许世友：“中央如果有人搞政变，你怎么办？”

“带兵北伐！”许世友毫不犹豫地大声回答。

11时多，毛泽东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我在这里等候你们。”

许世友热情地说：“汪主任，你也去。”

汪东兴说：“我不去了。”

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

汪东兴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满脸通红的站在车门口等着。

许世友本想去南京军区设在上海的延安饭店吃饭，王洪文说锦江饭店已经准备好了。这时，周建平和郑长华也在车站会客室，他们问：“我们去不去？”

王洪文说：“去吧去吧。”

于是，他们一起去了锦江饭店。

汪东兴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他们走了没有？”

汪东兴说：“走了。”

毛泽东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汪东兴说：“不通知他们了吧？”

毛泽东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汪东兴通知前卫车立即出发。13时12分，专列车也走了。

再说王洪文他们到了锦江饭店，上海市革委会的马天水、徐景贤、

王少庸、王秀珍和驻沪三军负责人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海军37501部队政委高志荣已经等在那里。37501部队是1969年10月，东海舰队迁驻浙江省宁波市后在上海组建的海军部队代号。

锦江饭店南楼中条顶层的小宴厅里，摆开了一张大圆桌。王洪文特地把饭店经理叫来，关照菜肴要搞得丰盛一些。

饭还没有做好，许世友一个劲嚷饿，王洪文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的秘书批了一顿。

12时30分，饭菜终于上桌。许世友善饮，大家轮流向他敬酒。

大约13时20分左右，王洪文忽然被叫出去接电话。他回来后，在许世友耳朵边悄悄地说：“主席走了，刚走。”

“哎呀！怎么走了？”许世友很惊讶地问。

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过了片刻，又有人叫王维国出去接电话。

许世友已经无心吃饭了，他呷了一口酒，大声说道：“结束吧，我还要赶回南京去呢！”

众人留许世友在上海住几天，许世友说什么也要回南京。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他们送许世友到机场。下午15时许，许世友乘坐伊尔—14飞机赶回南京。王洪文也如释重负，他已几天几夜没合眼了。

16时15分，许世友回到中山陵八号寓所，一进门就要李文卿整理好他学习《国家与革命》的心得体会和江苏省抓“516”的情况报告，跟他一起去南京火车站。

18点35分，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南京站。专车一停，陈长江就看见许世友已在站台迎候了。他问陈长江：“主席下不下车？”

这时正是大家吃晚饭的时间，陈长江走进毛泽东的车厢，见他仍在聚精会神看文件。陈长江说：“主席，许司令员在下边，他说要来看一看你。”

毛泽东已经一天一夜没有睡觉了，还在那里看文件。他说：“上午见过了，也都谈了，不见了，请他回去休息吧。”

汪东兴从车上走下来，告诉许世友：“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

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

汪东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

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

汪东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

许世友将带来的材料，一份读书心得，一份抓“红”的报告，也就是江苏抓“516”的报告，请汪东兴转呈毛泽东。显见许世友记着南昌谈话时毛泽东对他的批评，表明自己知错即改的诚意，让毛泽东放心。

许世友没有走，一直等在那里。专列在南京站完成加煤加水和检修任务之后，仅用了 15 分钟，便又启动了。许世友站在那里，向列车挥手告别。

9月12日整整一天，许世友待在中山陵8号，哪里也不去，交代秘书一定要听好电话，坚守岗位。他自己坐在屋里，不看文件，也不找人谈话，例行的散步也取消了，从早到晚一个人闭门沉思。傍晚时分，偌大一座宅院静得出奇。秘书想去看许世友，见他房门紧闭，遂止步。窗外落霞消退，夜色降临……

第 1184 回：不停留，一路疾驰奔天津 丰台歇，布兵南口欲为何

毛泽东的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 9 月 11 日 21 时 45 分，停车 5 分钟。

12 日零时 10 分到徐州，停车 10 分钟。

到兖州时是 2 时 45 分，没有停车。

到济南时是清晨 5 时，停车 50 分钟。毛泽东准备在济南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车一停，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中队长陈长江就下去迎接。得知杨司令员还在泰州检查工作，要五、六个小时以后才能赶回来，只来了一位副司令员，看有什么要办的事。此时毛泽东再也没有在上海等许世友的耐心了，说副司令就不见了，不久在北京开会时再见，请他们回去吧。这时往北京打电话安排下一站活动的张耀祠等人也已上了车，毛泽东交代立即发车。

专列跨过黄河，直奔天津。

7 时 40 分，专列到德州，停车 20 分。

11 时 15 分专列到天津西站，停车 15 分钟，加煤加水检修机车。

此时，毛泽东似乎不再着急，他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到丰台车站等候。

正在家中吃午饭的吴忠忽然接到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打来的电话，要他马上到吴德的家里来，说有要事相商。

吴忠赶到吴德家时，见吴德已从屋里出来。他对吴忠说：“我们马上走，具体情况车上谈。”

在飞奔的汽车上，吴德向吴忠介绍了情况：“主席已从南方回来了。中办要我们马上到丰台去，主席要和我们谈话。”

毛泽东国庆节前到外地巡视，返京都是有规律的，他一般都是夜

间回京，而且很少停靠丰台车站。吴忠听完吴德的介绍，心中一怔，小心地问：

“主席怎么突然在白天回京，还停靠在丰台车站，是不是有什么重大情况发生？丰台车站的安全保卫工作怎么办？”

吴德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中办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是汪东兴同志要我们马上到丰台，而且只通知你和我两人去，谈什么，哪些人参加，都没有说。既然没有通知卫戍区布设警戒，肯定是中央另有安排。等到了丰台见到主席，一切都清楚了。”

当他们的汽车驶入丰台车站时，只见站台上空无一人。过了一会儿，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和司令员李德生也先后乘车赶到这里。

李德生也是9月12日中午在家里接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要求他中午12时前到达丰台车站。他接到通知后，匆匆吃点东西，按时赶到丰台车站，看到中央警卫团已经在车站布置了警卫，纪登奎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已先后来到。

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驶进丰台站，缓缓停在专用车道上。只见汪东兴走下专列，同大家打过招呼后，请他们4位一起上了毛泽东所在的车厢。

毛泽东端坐在车厢中央的沙发上，手中拿着一支香烟，见到4人后，面带微笑站起来与大家一一握手，然后示意几个人坐下。

大家就座后，毛泽东点燃烟卷，不紧不忙地问李德生：“你这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怎么样啊？”

李德生于1971年8月14日至9月3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9月3日回到北京后，马上又参加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1日起，又参加修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政治局会议。因为准备在国庆节前召开党的三中全会，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时间已经很紧迫，各项准备工作安排得都很紧张。

这时，李德生向毛泽东汇报说：“他们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国内政治是稳定的，只是从市面上看，群众生活不是那么好。”

毛泽东又问：“你同他们谈尼克松将要访华，他们有什么反应？”

李德生如实说：“阿尔巴尼亚虽然没有直接说，但是他们讲了他们

自己对美国的态度，表示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从会谈中听得出来，他们对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是有保留的。”

毛泽东笑着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他们是怕美国从亚洲撤走，会增加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国拖住。他们（指东欧诸国）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不要美国撤军。”毛泽东补充说：“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他们的压力。”

大家也都笑起来，气氛一时显得轻松。

在大家的笑声中，毛泽东开始讲话，似乎是有所指，又似乎是漫无目的。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鱼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

毛泽东又讲了中国共产党在 50 年历史中的 10 次路线斗争。他说：“我们党 50 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 10 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

4 个人都在认真倾听，认真记录。

毛泽东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 个常委瞒着 3 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我还要下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都不如，可见这些人的风格之低！”

毛泽东又说：“庐山会议的《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吴德一听，神色紧张，赶紧检讨说：“主席，我还在《六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

毛泽东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

“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我说过，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毛泽东继续说：“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

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38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谈到这里，毛泽东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泽东又说到汪东兴的检讨：“他沾了一点边，在1000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汪东兴说：“正式地做检讨是3次。”

毛泽东：“只有7000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

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泽东问：“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毛泽东侃侃而谈，吴忠在旁越听越紧张。他不由地脱口而出：“主席，我们党内可能有坏人吧？”

毛泽东转头面对吴忠，凝视片刻，方点点头，满意地说：“讲得好，吴忠有忠！”

毛泽东吸口烟，又强调说：“你讲得对！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要看一看。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我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你黄永胜走！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参谋总长。解放军跟你黄永胜走，我就到井冈山找红军去！”

毛泽东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次谈话，连同毛泽东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等地的多次谈话记录，后来经过整理，经中央政治局1972年3月15日讨论修改，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于1972年3月17日发至全党，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作了传达。

有些话，当时没有引用。比如，在谈到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

人”时，毛泽东8月16日在武汉，同刘丰、刘建勋等谈话，9月10日在杭州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谈话，都曾谈到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张春桥、姚文元、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毛泽东还几次提到张春桥，称赞他和姚文元。

吴德想起谢富治生前曾经悄悄地告诉他：“毛主席要在国庆节之前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全会上将补选张春桥等人进常委和当副主席。”所以，吴德对毛泽东在火车上说的那些话，是心中有数的。

毛泽东的谈话到下午15点多钟方告结束。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站起来说：“不能留你们吃饭了。”然后和他们一一握手，示意李德生留下。毛泽东直到大家走出车厢后他才坐下。他单独交代李德生，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

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境，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

李德生立即会同纪登奎，驱车直奔西山北京军区机关驻地。

这一天是星期日，李德生让作战值班室立即通知军区陈先瑞政委等几位主要领导到作战值班室来，大家一起研究部署调动38军1个师进京的紧急任务。

离开北京军区后，李德生又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早已确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185 回：无声息，毛泽东悄然回京 北戴河，电话震惊周恩来

9月12日15时36分，李德生等人走后，毛泽东的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时5分到北京站。毛泽东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过去，毛泽东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从杭州动身到这时，他已经3天没有休息好。到了中南海，汪东兴对毛泽东说：“您睡吧。”

毛泽东也对他说：“你也睡一睡吧。”

汪东兴答道：“我也回去睡一睡。”

9月11日晚20时，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全会要补选中央委员，如姬鹏飞等。还要补选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陈伯达倒台了。开完政治局会议，已经是9月12日凌晨1时左右了，然后他又一直工作到上午11时才休息。

12日17时，周恩来起床。他今天休息的很好，睡够了6小时，所以特别精神。一直等候在这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跟着周恩来进了卫生间，向他报告：“毛主席回来了。”

周恩来感到很突然，问到：“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

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

周恩来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

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汪东兴离开游泳池后，即打电话给周恩来。已经起床的周恩来颇感诧异的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汪东兴回答说：“计划改了。有些情况见面再向您汇报。”

江青也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回到了北京。9月8日，叶群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说：“林彪同志向您致以热情的问候，他说很关心您的

身体。”

江青回答道：“谢谢林副主席，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叶群又说：“林彪同志让专人给江青同志送去几个最好的西瓜，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

江青说：“请林副主席放心。”

12日这天下午，江青特意带上林彪送给她的4个大西瓜到颐和园游玩。颐和园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见江青去了，立刻热情地围拢过来。这时，江青激动的提高嗓音对大家说：

“你们看，这几个大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让我们大家一起感谢林副主席！”

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研究修改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到会的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的相关部长。会议20时开始，进行到22时20分左右时，一名工作人员推门进来，走到周恩来身边悄声说：“张耀祠来电话，有紧急情况要直接报告总理。”

周恩来压低声音问：“一定要我去？”

工作人员点点头。本来福建厅有电话，但电话没有加密。周恩来站起身，做了一个表示歉意的手势，然后走出门，来到新疆厅，拿起红色的电话机话筒，里面传来了张耀祠的声音：

“总理，刚才接到张宏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林立衡来部队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副主席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

张宏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此时正在北戴河负责林彪的警卫工作。

“什么？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逃跑？是不是又闹什么矛盾了？”

周恩来听到张耀祠的报告大吃一惊！据他所知，林彪这两天有动身去大连的打算，为此他还特意带话过去，让林彪好好休息，在国庆节前返回北京。另外，周恩来对叶群和林立衡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早有耳闻，而且，林立衡的报告也让人觉得太危言耸听了，一个兵权在握、堂堂的副统帅怎么可能被自己的老婆和儿子所“劫持”呢？

但是，作为党的副主席，党章指定的毛泽东接班人，如果林彪真的被“劫持”，那可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如果不及时采取

措施,稍有延宕,将会酿成难以估量的灾难。可是,如果判断有误,匆忙采取措施,其后果同样非常严重……

这恐怕是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政治风浪的周恩来,碰到的最为棘手的政治事件之一。他的思维在高速地运转……他让汪东兴听电话。

汪东兴从张耀祠手中接过电话后,周恩来在电话中问他:“情况可靠吗?”

“可靠。”汪东兴回答。

“他们要去什么地方?部队同志怎么看?”周恩来继续问。

“还弄不清是真是假。”汪东兴说。

“请告诉张宏同志,派人密切注意动向,及时报告,不要鲁莽行动。”周恩来指示说。

“张耀祠在什么地方?”随即,周恩来又问。

“在中南海游泳池。”是张耀祠回答。

周恩来此话的用意是了解毛泽东在哪里。因为张耀祠是分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他总是在毛泽东身边。

汪东兴放下周恩来的电话后,立即给北戴河张宏打回电话,将周恩来的原话转告:“密切注意,不要鲁莽行动。”

这时,站在张宏旁边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赶紧请示说:“一旦发生意外情况怎么办?”

汪东兴在电话中说:“你们请示怎么办?我下不了决心,周总理也下不了决心,只能说让你们监视,了解情况,及时报告。情况复杂啊!复杂得很啊!”

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向汪东兴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三叉戟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汪东兴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让汪东兴不要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

汪东兴回答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

周恩来放下电话,回到福建厅,对与会者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政治局成员留下,其他的人可以回去。”

随后,他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北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开始全力

以赴处理北戴河的突发情况。他首先打电话找空军司令吴法宪了解飞机的情况。

此时,吴法宪和空军政委王辉球正在和空军文工团的6个指导员谈话,解决那里派性问题。这6个指导员是刚从部队调来的。谈话刚刚结束,红机子就响了。

吴法宪拿起电话,周恩来问:“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今天调飞机去山海关机场没有?”

吴法宪回答说:“没有。”

“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细心的周恩来进一步追问。

“我不知道。”吴法宪支支吾吾。

“还是要查一查。查清楚后,立即向我报告。”周恩来说。

“好。”吴法宪立即回答。

放下电话,吴法宪马上给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打电话询问。

时念堂刚刚从阿尔巴尼亚执行专机任务飞行回来。他送中央歌舞团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演出,9月9日回到北京,9月10日休息,9月11日飞行后讲评。9月12日晚,正准备到他正在蹲点的沙河机场去,空军总医院的医生来了。送走医生已经快熄灯了,时念堂决定明天再去沙河机场,他就睡了。此时,正在熟睡的时念堂被电话铃惊醒,拿起电话,里面传来吴法宪的询问声:“总理问三叉戟怎么到山海关了?”

时念堂莫名其妙,心里也突然一沉:“周总理怎么亲自过问起专机的事情来了?”

他想起专机师曹副师长曾向他提过,专机师准备执行林彪回北京过国庆节的任务。但据时念堂所知,并没有具体派遣林彪专机的行动。他是主管专机的,如此重要的专机活动,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当然,也可能是他刚从国外回来,还没接师里的工作吧。于是,时念堂如实地回答吴法宪说:“报告司令员,我不知道这件事。”

“你们机场的专机,你怎么不知道?飞机都飞走了!”吴法宪急了。

时念堂说:“我不能向司令员说假话,三叉戟的事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

“啪”,吴法宪没再说什么,挂断了电话。

对于吴法宪的突然发问,时念堂也没多想,以为只是关心中央首

长的飞行安全。他还是准备继续睡觉。谁知,只隔了几分钟,吴法宪第二次电话又来了:“三叉戟究竟是怎么飞到山海关的?”

这一回是质问的口气,相当严肃。时念堂还是如实说不知道,但他感到问题有些严重,补充了一句:“是不是胡副参谋长知道?”

吴法宪气哼哼地说:“那好吧,我找他。”

胡副参谋长就是胡萍,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从哈尔滨一航校第二期干部飞行班毕业,是为数极少的驾驶运输机成功的老干部之一,也是新中国专机的首飞者。1952年5月,由他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运输独立第三团,这是新中国第一支专机部队,他是第一任团长。后来独3团改成专机师,即34师后,他又是第一任师长,1955年授衔大校。

空军34师是空军司令部直属的一支飞行部队,也是空军最庞大的一个飞行师。它在北京有3个机场:西郊机场、沙河机场和南苑机场。有5个飞行团:100团、101团、102团、203团,并兼管海军第二独立团,三个场站,一个修理厂,共9个团的建制。

34师和空军12师是中国空军两支运输机师,所不同的是两师肩负的任务完全不同。12师负责空降、空运,以货机为主。34师则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专机师,以客机为主。

34师的5个飞行团,以装备的飞机不同区分:

100团拥有全师最大的飞机:“伊尔——18”、“安——12”、“杜——124”、“子爵”、“三叉戟”;

101团则囊括了全师最土的飞机:双翼的“运五”、头高尾低的“里二”;

102团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团,拥有“伊尔——14”、“安——24”、“安——26”三个机型,属中型运输机;

203团是直升机团,拥有三个大队的“直五”、“云雀”直升飞机;

海二团是为海军司令部服务的专机团,最好的飞机不过是一架“伊尔——14”。

100团在西郊机场,101团、203团、海二团在沙河机场,102团在南苑机场。

胡萍从事专机飞行20多年,圆满完成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访问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任务。1955年万隆会议，新中国还没有专机，他作为机长在印度飞机上为周恩来保驾。1957年，他作为毛泽东专机的机长，突遇雷雨，与地面失去联络40多分钟，在塔台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急得团团转。由于胡萍临危不乱，处置得当，化险为夷。

胡萍在34师有极高的威望。在34师，所有的普通战士都可以纠正老是爱背着手、猫着腰走路的胡萍师长的军姿；在全师的任何有普通官兵参加的大会上，胡萍师长都会双手抱拳向大家问好。相反，在师团级的干部会上，他又严厉的像一个凶神恶鬼。34师工程部有一名副局长平日嗓子眼里总像堵着口吐不出来的痰，咳起来没完没了。但是，只要胡萍在场，让他咳他都咳不出来。

胡萍升任空军副参谋长后，仍兼34师党委书记。此时，他正患左肾结核，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做切片检查。但是，吴法宪的电话却是在西郊机场候机室找到的胡萍。22时30分，正在西郊机场候机室的胡萍突然接到吴法宪的电话：

“今晚到山海关去的飞机是怎么回事？总理查问了，事情闹大了，你们怎么搞的！你知道不知道？”

胡萍赶紧解释说：“你不是说过要改装一架三叉戟给林副主席用嘛。这架三叉戟刚改装出来，要试飞一下。”

当时，中国从巴基斯坦买回4架二手三叉戟，作为中央领导的专机。本来林彪专机是254号三叉戟，这是巴基斯坦总统座机。但因为飞行时机头被小鸟撞过，有一个小坑，不适合再作一号专机，于是决定改装256号三叉戟作为林彪专机。

4架三叉戟进口时已经在巴基斯坦飞过好几年，一些机件老化，必要的备件买不到，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原则上把4架三叉戟上最好的零件换给256号三叉戟。西郊机场修理厂和林彪专机的机械师一起，开始大规模改装。除把普通客舱拆掉，隔出单间，设置卧室、办公室外，还按林彪怕风、怕光和喜欢绿颜色的习惯，精心布置机舱，整整改装了3个月，至7月份刚改装完毕。

8月，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开始试飞256号三叉戟，去过山海关，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6日，

256号三叉戟交付使用。9月11日,潘景寅再飞东北航线,经沈阳二台子机场,再到长春,接回在长春解放军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大女儿。有人看潘景寅情绪不好,询问他。潘景寅说:“飞机落地还是不理想。”

这次飞往山海关的就是这架256号。

此时的吴法宪在电话里还是不依不饶,继续追问胡萍:“试飞为什么飞山海关,不飞别的机场?事先也没有报告,捅了大乱子了!现在总理追查这架飞机是怎么调去的。”

胡萍说:“是训练吧。”

为了保密,专机以训练的名义派出,这在专机师是经常的事。

吴法宪还是追问:“训练为什么不回来?”

“那——那怎么办呢?”胡萍问。

吴法宪考虑了一下,回答说:“你待命,我要请示总理。”

胡萍放下吴法宪的电话后,立即用保密机给正在山海关的256号三叉戟驾驶员、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打电话,把吴法宪与他通话的情况告诉了潘景寅,并对潘景寅说:“吴法宪打电话给你,你就说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是你们自己安排训练的,我并不知道这个事,如果他再问你训练为什么现在还不回来,你就说飞机有毛病,所以还没有回来。”

接着他又从候机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给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打电话说:“吴法宪来电话说,总理正在追查去山海关的飞机,事情闹大了,看来事情麻烦了。你赶快给林立果通个气。”

周宇驰问:“是什么时候的事?”

胡萍说:“刚才一会儿。”

随后,胡萍又回到候机室,将正在这里值班的专机师服务队副队长孙福荣等几个人叫到一起说:“如果吴司令查问三叉戟256号去山海关机场是谁安排的,你们就说是潘景寅安排的。对其他几架飞机的事,只字不要提,你们要保守秘密。”

再说时念堂放下吴法宪的电话后,也通过总机在西郊机场候机室找到了胡萍,对他说:“吴司令来电话说,周总理问三叉戟飞机怎么到山海关的?”

胡萍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如果再有人问,你就说是训练

飞行。”

22时33分，吴法宪与胡萍通完电话，立即给周恩来打回电话，报告了他和胡萍通话的情况：“是有一架三叉戟飞到了山海关，是改装后训练飞行。”

吴法宪还说，他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你通知这架飞机回来时不准带任何人。”

22时36分，吴法宪又马上给胡萍打去电话，头一句话就问：“你在哪打电话？”

胡萍回答：“我在候机室打电话。”

吴法宪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这架飞机立即回北京，飞机上不准带任向人。”

胡萍答应说：“好的，我马上打电话叫飞机回来。”

胡萍放下吴法宪的电话，立即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如果吴法宪再追问你飞机到底有什么毛病时，你就说发动机有点故障。”

然后，胡萍马上给吴法宪回电话说：“飞机有故障，回不来。”

吴法宪立即报告周恩来：“胡萍说，这架飞机有故障，不能立即回来。”

“有故障？不能立即回来？”周恩来又以严肃的口气责令吴法宪：“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吴法宪又立即向胡萍转告了周恩来的这一指示。

周恩来又给汪东兴打电话，让他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查一下，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

北戴河张宏很快答复汪东兴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听说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理，周恩来又给海政委李作鹏打电话。

李作鹏接过秘书手中的电话，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手表：23时整。

这时，话筒里传出周恩来的声音：“是作鹏吗？”

李作鹏赶紧回答：“是，总理。”

周恩来说：“你查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李作鹏回答说：“好的。”

放下周恩来的电话，李作鹏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时间是 23 时 05 分。

李作鹏问：“你是谁？”

对方回答：“我叫李万香，是场站航行调度室值班主任。”

李作鹏继续问：“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军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

李万香回答：“是的，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

李作鹏：“什么时间落地的？”

答：“20 时 15 分。”

“飞机走了没有？”

“没有走。”

李作鹏说：“好了，就问这件事。”

他放下电话，立即要军委一号台总机接通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电话转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秘书的值班室，是周恩来的秘书纪东接的。李作鹏说：“请报告总理，是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此时大约是 23 时 10 分左右。

纪东立即通过 39 局电话总机找跟随周恩来去大会堂的卫士张树迎，结果接电话的却是周恩来，他问纪东：“什么事？”

纪东报告说：“刚才李作鹏同志来电话，说是有一架 256 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知道了。”周恩来只说了三个字，便放下了电话。

第 1186 回：查飞机，总理坐镇大会堂 电话惊，莲花峰一片混乱

北戴河联峰山莲花峰 96 楼，林彪住地。9月 12 日晚上 22 时 30 分，林彪的内勤张恒昌、陈占照正准备安排林彪休息，叶群来到林彪客厅，同林彪说话。于是陈占照先去吃夜餐，回来后再换张恒昌去吃夜餐，准备吃完夜餐后安排林彪休息。



北戴河林彪 96 号别墅

叶群从林彪客厅出来。林彪打铃找内勤，陈占照进到林彪的客厅，林彪让他去叫张恒昌。此时，张恒昌正在餐厅吃夜餐。他接到电话后，赶紧来到林彪客厅。林彪让他通知叶群：

“空军疗养院的两个护士不带了，让人把他们送回去。”

张恒昌去找叶群。林彪又对内勤陈占照说：

“马上去大连，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

再说张恒昌来到叶群住处，看见门外地上放着几个皮包，空军司

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守在门口。他拦住张恒昌，说叶群和林立果正在屋子里说话。

张恒昌把林彪的话写在纸条上，让刘沛丰转告，然后回到内勤值班室。陈占照对他说：“首长马上要走，赶快收拾东西。”并让张恒昌去报告林立衡。

这天晚上，莲花峰 96 号楼过厅里放电影，是为了庆祝林立衡订婚。但是张恒昌在 96 楼过厅没有找到林立衡。从 1185 回我们知道，此时林立衡应该正和张宏在一起，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

23 时不到，林立衡从外面回到 96 楼过厅，坐在原来的座位上，对旁边的未婚夫张清林说，她去 8341 部队向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等人报告了情况……

张清林对林立衡说，她走后，叶群和林立果几次在放电影的走廊里穿来穿去。林立果以送礼物为名，几次到张清林这里，打听林立衡到哪里去了。张清林按照他们预先约定的说法，回答说：“找钢笔去了。”“拿夜餐去了。”

二人正说着，叶群的内勤小王来找林立衡，对她说：“主任要你马上上去。”

林立衡对张清林说：“你还是不要动，稳住他们。要是我出不来了，你就和杨森跑到部队去报告。”

杨森是空军政治部保卫部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副处长。

林立衡走进叶群的房间，看见她正在整理卡片，刘沛丰坐在叶群旁边。

林立衡叫了叶群几声，她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明天早上带你们到大连去，首长在飞机上还要看看地形。你告诉张宁、张清林，收拾一下。”

林立衡问：“明天早上几点走？”

叶群高声地说：“你还管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几点走！你们早点睡觉，明天我派人来叫你们。你走吧！”

林立衡回到放电影的过厅，将叶群的话告诉张清林和林立果的女朋友张宁，让他们准备。

张宁问林立衡：“林立果送给我的大蛋糕带不带？”

林立衡说：“随你自己吧！”

叶群在林立衡出去后，又给邱会作的妻子胡敏打电话，说到林立衡的婚事，胡敏则说自己出生不久的孙女。叶群夸胡敏给自己孙女的名字起得好。

叶群放下胡敏电话 15 分钟左右，北京的周恩来与北戴河的叶群通了电话。据后来李德生回忆这段通话情况：

晚上 11 时半左右，周总理直接打电话给叶群，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专机的事。

周总理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一架专机。

一开始叶群撒谎，说她不知道。后来叶群又说：有，是我儿子坐过来的，林副主席说，如果明天天气好，想到天上转一下。

叶群的答话，更加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

周恩来又问叶群：是不是还准备到别的地方去？

叶群说：原来想到大连去。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说：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如果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

叶群一听周总理要去北戴河，更慌了。她怕周总理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破产。叶群再三劝周总理不要去北戴河。

而在叶群与周恩来通电话之前，叶群的电话始终占线，没有放下。因为叶群与胡敏通话后，又打电话找黄永胜。而此时黄永胜恰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修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因周恩来宣布休会，政治局委员留下，黄永胜就在那里边打扑克边等待。所以，叶群的电话打到黄永胜的办公室和他家里，都找不到人。就在这时，总机告诉叶群：“总理找叶主任。”

“接过来吧。”叶群说。

当听筒里传出叶群的声音，周恩来关心地问到：“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恩来又问：“北戴河有一架专机，你知道吗？”

叶群脱口而出：“不知道。”

稍微顿了一下后，她又改口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恩来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一听周恩来要来北戴河，叶群忙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而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后来对这段通话的回忆是这样的：

当晚23点30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恩来总理打了个电话，她说：

“林彪今天晚上想动一动。”

总理问：“是空中，还是地上？”

叶群说：“是空中。”

总理问：“有飞机吗？”

叶群含含糊糊地说：“没有，报告总理后再调。”

平时林彪用飞机，从不向总理报告，这一次报告总理，显然是为了遮掩林彪逃跑的阴谋企图。

总理讲道：“晚上飞行怕不安全吧！”

叶群说：“不要紧，林彪想看看夜景。”

周恩来贴身卫士高振普的回忆也是这样：

(晚)11时20分，叶群与总理通电话说：“首长(指林彪)想动一动。”

“是天上动，还是地上动？”总理仍沿用他多年的习惯。凡关系到领导人的重要活动，他都用对方可理解的语言讲话。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

“是天上动。”叶群答。

“你那里有飞机吗?”

“没有。”

叶群放下周恩来的电话后，又给吴法宪打去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

吴法宪说：“胡萍正在住院，还是让时念堂去吧？”

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

放下叶群的电话，吴法宪立即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并要求亲自到西郊机场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同意：“你立即到北京西郊机场去查明情况。”

而周恩来在与叶群通完话后，也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对他说：“林副主席那里可能要出事，他们可能要飞到广州去。你立即赶到空军指挥所，代替我在那里指挥，没有中央的指示，山海关的飞机不能起飞。”

李德生深为震惊。下午，他从丰台赶到北京军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38军部署完毕。晚上，直接从八大处北京军区来到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没想到这么快又发生了如此惊天的大事。他来不及多想，立即快步离开大会堂，乘车向空军大院驶去。

李德生走后，周恩来又叫来纪登奎，让他立即赶回北京军区，加强对北京部队的指挥。

周恩来要黄永胜留在自己身边，协助处理所发生的情况。然后又给李作鹏打电话，对他说：

“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北戴河那位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当李作鹏听到周恩来“第一……”时，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并用手势告诉他的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一起接听，同时记录。

李作鹏按照通常接受上级指示的习惯，也为了让董其采能够记录

准确,周恩来每说一句,他就按原话复述一遍。周恩来指示完毕后,李作鹏示意董其采,要过她做的纪录,再次向周恩来复述了他的四条指示。在复述时,将第一条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为了“林副主席”。

周恩来听完李作鹏的复述后说:“那就这样吧。”

李作鹏放下电话。

23时35分,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打去电话。他首先问了对方的姓名,依然是调度室值班员李万香。随后,李作鹏按照和周恩来核对过的董其采的记录稿传达说:“……告诉你们,它(指当时在机场的这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的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4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放它,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李作鹏要求李万香复述了一遍。

23时45分左右,周恩来又给李作鹏打电话询问三叉戟飞机号。李作鹏又立即打电话询问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机场值班员报告是256号。李作鹏将飞机号报告了周恩来。

几分钟后,机场调度室又来电话,将飞机号更正为252号。李作鹏又将更正后的情况再次报告了周恩来。这时已是23时55分左右。

吴法宪来到西郊机场候机室,看见胡萍正在和空34师参谋长龙振泉谈话。吴法宪刚坐下,便让人通知时念堂师长马上来。接着,他问起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

此时的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已无法安心睡了。空军司令员两次来电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虽然他还没有接师里的工作,但他毕竟是师长,放下吴法宪的电话后,他当即打电话问师机关几名经管航行的人员,询问专机飞山海关的事,都说不知道。咦?这是怎么回事?在一般情况下,周恩来不会命令空军查林彪专机的。而且以前吴法宪也从不过问专机。现在吴法宪为什么对三叉戟起飞如此强烈地不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此惊天动地?

面对这些反常现象,时念堂彻底糊涂了。他让总机将电话要到副政委、256专机机长潘景寅家,潘景寅家属平静地说:“老潘飞行去了。”

啊,原来是潘景寅驾驶走的三叉戟飞机。时念堂似乎放心许多。

十几分钟后，候机室来说话：“吴司令到候机室了，叫你马上过来。”时念堂赶紧摸黑骑自行车来到机场候机室。

候机室位于跑道东侧，是首长临时休息的地方，前面是登机坪，楼上是气象室和调度室，再上边是塔台。这里是机场的指挥中心，也是迎来送往的地方。

此时这里，除吴法宪和空军分管专机的副参谋长胡萍外，专机师政委马兰藻、参谋长龙振泉都在。时念堂像平常一样，先向吴法宪敬了一个礼。吴法宪脸吊得老长，起身便问：“256号三叉戟是谁派去山海关的？”

时念堂答：“不知道。”

吴法宪狠狠训斥说：“你当师长的，飞机都跑了，你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吃的？”

看吴法宪发这么大的火，再说什么也是多余，时念堂只好沉默。

接着，胡萍按照吴法宪的要求，进到候机室里的小电话间给潘景寅打电话。电话间是封闭的，胡萍在电话中究竟怎么对山海关说的，外边的人都听不到。只见他走出电话间后，对吴法宪报告说：“山海关三叉戟的油泵坏了，现在正在排除故障，飞机不能起飞。”

再看北戴河。叶群与周恩来、吴法宪通完电话后，慌不择路的去找林立果。

而此时，没有找到林立衡的林彪内勤张恒昌已回到林彪住处，他看见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一起来到林彪客厅。刘沛丰手里提着三、四个皮包，站在客厅门口，一言不发。叶群和林立果则匆匆走进林彪客厅，进到林彪卧室，叶群一边拽已经躺在床上的林彪，一边喊：

“快起来呀，他们要来抓你啦！”

林立果则催促内勤赶紧帮林彪穿衣服。

叶群找长期跟随林彪的警卫秘书、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将他带到林彪客厅，让他在门外等着，她自己进到林彪屋里，悄声说了几句后，才把李文普叫进去。这时林彪已经坐在沙发上，对李文普说：

“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也睡不着觉了，你准备一下东西，现在就走。”

叶群跟着李文普从林彪的屋里出来,对李文普说:“快调车,越快越好。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林立果也对李文普说:“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什么东西也别带。”

看到林立果和叶群的举动,李文普觉得反常。他按照林立果的吩咐,叫人去通知林彪的司机杨振刚赶快把车开上来,然后自己到值班室打电话问胡萍:

“首长马上要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林立果跟你讲过到哪里去吗?”

谁知他在电话里听到的是胡萍紧张地声音:“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往北京打电话了,要走你就赶快收拾收拾走吧!”说着胡萍就放下了电话。

林彪的内勤张恒昌匆匆跑到过厅对林立衡说:“他们现在就要走!”

这突然的消息让林立衡大吃一惊,赶快去值班室找李文普,看见他正在打电话,在场的还有总政治部保卫部负责林彪保卫工作、并在8341部队挂名警卫科副科长的刘吉纯。

李文普见林立衡进来,主动对她说:“首长现在就要走,不要刘吉纯去大连打前站了。我想给大连打个电话,没打通。”

林立衡说:“你现在还打什么电话!赶快拖住他们,就说今天太晚了,不能走。还可以叫张副团长来劝一下。”

李文普说:“现在还是要上飞机,不行再拼!”

林立衡问:“你们带枪没有?”

刘吉纯说带了,李文普说没有带。

林立衡说:“到这时候,你连枪都不带,还怎么拼!”

李文普去拿枪。林立衡说:“你们不拖住,我去叫部队阻拦!”

林立衡从值班室出来,正好碰上林立果,就问他:“现在怎么样?”

林立果说:“现在就走!……”边说边往林彪那里跑去。

林立衡回到放电影的地方。这时,电影《假少爷》快要演完了。她看到秘书李春生也在看电影,便告诉他,林彪、叶群今晚要跑,叫他注意点。随后又告诉了张清林和杨森,并要杨森在门口控制住汽车。

这时，叶群突然跑进放电影的过厅，大声叫喊道：

“快停演，今天晚上就到大连去。你们马上回去准备。杨森不去大连了，留下来看东西。”她一边叫喊，一边慌张地在走廊里来回乱窜。

林立衡故意上去问她：“张宁问，她的蛋糕还没吃，要不要带走？”

叶群发火说：“现在这时候还带什么蛋糕！你们快走吧！”说完，推了林立衡一把，她就走了。

林立衡连忙跑出来，看到 8341 部队的二大队姜大队长守在门口，和他握手后，便和张清林、张宁坐上杨森的车开往 56 楼。

第 1187 回： 难阻挡，“大红旗”冲过人墙 枪声响，李文普倒地受伤

此时，北戴河莲花峰上的 96 号楼里边已经乱了起来，只见叶群在走廊大喊：“快走！快走！”林立果也一迭声地说“快快快走”。他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叶群披头散发，林立果举着枪跑来跑去，从这屋窜到那屋，大声喊叫，十分着急的样子。

李文普让刘吉纯给大连打电话，通知做准备。刘吉纯赶快跑到秘书办公室，刚和大连的保卫部长说了一句话，林立果就突然进来，非常凶地质问：

“你干什么？”

刘吉纯说：“不是要去大连吗？让他们准备准备。”

林立果啪地把电话按下，恶狠狠地说：“哪儿也不准打！”接着，他将李文普拉到叶群的办公室说：“我给周宇驰打个电话，你在门外看一下。”

李文普在门外听到林立果在电话中对周宇驰说：“首长马上就走，北上，你们越快越好！”

林立果放下电话出来，就催李文普快去调车。接着叶群也来催促。

李文普回到秘书值班室给 58 楼 8341 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

张宏副团长刚问：“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进秘书值班室，问李文普：“是谁来的电话？”

李文普说：“是张副团长。”

林立果又伸手把电话按了，并大声喊：“谁都不要打电话，也不准接电话！”

刘吉纯看到林立果凶狠的样子，真怕他会用刀子捅自己，赶紧把枪揣在兜里，跑去找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告诉他，林彪马上要走。让

他赶快组织几个人先把机场看管起来。

张宏和姜作寿商量后,很快选好人,叫区队长黄树忠带队。刘吉纯不同意,他让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亲自带队去。张宏对于仁堂交代说:“要与机场取得联系,有问题请示中央后再定。”

23时45分左右,于仁堂带着8名战士,坐上大屁股中吉普去了山海关机场。

接着,姜作寿和6中队中队长肖奇明等几个干部紧急商议,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原固定岗增为两人,临时增加流动哨,3人一组,注意96楼的动静。

6中队战士紧急集合从被窝里被叫了起来,背上背包。他们不知道要执行什么紧急任务。

车库里,一辆大卡车,几辆吉普车正在发动。

人们的喊叫声,枪支的撞击声,汽车的马达声,在夜空中汇合在一起,使这个平日静寂的疗养地,出现了一种临战的气氛。

姜大队长作了简单动员和部署,部队立即开始行动。

位于联峰山上的96号楼,只有一条向南的马路。而在马路中部的东西两侧,分别是55号和56号等楼群,是警卫部队的住处。按照规定,在马路和楼区的适当位置,都有一个固定岗哨,现在增为两人,还临时增加了流动哨,3人一组,在防区内流动值勤,并随时与58号楼大队部联系。同时,在55号和56号楼之间设一个分队,顺马路向南200多米处再设一个分队,队员横排在大道上,分别形成了两道“人墙式”卡哨,以便拦截车辆。其他警卫战士,全部在楼房内,房内熄灯,但不脱衣,不睡觉,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行动。

再说林立衡他们到56楼后,林立衡让张清林留在56楼,自己和杨森又跑到58楼。

杨森把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找来,林立衡对他说:“他们现在就要跑!”

就在这时,张清林在56楼接到林彪内勤打来的电话:

“他们正在床上拽首长,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你们快,快呀!”

这应该是内勤在向林立衡报告之前的情况。

张清林顾不上听完电话便跑出楼去,只见门口到58楼门口都是

8341 部队的战士，背着背包，一个班挨一个班。他对司机说：“别动，我下去告诉一下再回来。”然后边喊边跑：“车快下来了，快堵住啊。车快下来了，都到公路上来堵住，快堵住啊……”

但是战士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谁也没动，依然背着背包站在那里。

张清林冲进 58 楼大队部，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张宏说：“情况万分火急！最多不超过 10 分钟，上面的汽车就要开跑了！部队为什么还没行动？为什么还不进行阻拦？”

张宏说：“我早已派先行车去机场了，有的部队还没调来，是不是汽车出故障了？”

23 时 50 分左右，96 楼。林立果寻找林立衡没找到，告诉内勤人员要林立衡坐叶群的车马上走。

这时，李文普已经拿着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 96 楼门外，边走边喊：“快把车开上来！”

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已经将林彪的“大红旗”开进了 96 楼车库，在车库门口停下。

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出来。林彪走在最后面，走到内勤值班室门口时，他问内勤陈占照：“东西都装车没有？”

陈占照说：“没装车。”

林彪再没说什么，也没停步，连帽子、大衣都没带，就钻进了汽车。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旁边。

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

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他抱着公文包坐在叶群的前面。

李文普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

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都没有说话。

58 楼，林立衡要求张宏立即给张耀祠挂电话。催促几次后，林立衡自己抓起电话筒说：“你不挂，那我就挂了！”

张宏与张耀祠接通了电话，报告说：“他们刚才说再过 10 分钟汽车就要开走了。”接着他频频点头，连声说：“是，是，是……”

96 楼值勤战士用电话不断地向大队部报告：“现在他（林彪）出了房门，向防空洞走去……现在，他在防空洞前上了红旗车……现在，汽车开出去了……”

张宏立即向张耀祠报告说：“他们出来了，刘沛丰手里提着四个皮包，先上车，林立果、叶群、林彪都上了车，李文普上车后汽车开走了。”

林彪的内勤陈占照打电话给姜作寿：“大队长，他们走了，都乘首长那辆车，连我也不让上车……”

姜作寿放下电话，向张宏报告后，便往楼下跑。因为从 96 楼乘车下来，必须经过大队部所在的 58 楼门前。姜作寿是想在 58 楼门前把林彪的坐车拦住问他们要去哪里？警卫部队怎么跟他们走？

山间伸手不见五指，姜作寿刚站到马路中央，就看见林彪那辆“大红旗”拐过了弯，开着大灯直射过来，照得他连眼都睁不开。他赶紧站在大队部门口的路中间，做出紧急停车的手势，大喊“停车，快停车！”

但“大红旗”鸣着短促的喇叭，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又是下坡，狂风一般冲来，姜作寿一看情况不妙，马上跳到一边，“大红旗”擦着他的衣服冲过去，好玄呀！

林立衡从张宏手里夺过话筒，说情况万分危急，要求马上下命令让部队进行拦截。

张耀祠在电话里“嗯，嗯，嗯”的答应着……

林立衡大哭起来，说：“你们再不采取措施，叶主任就要把首长带走了啊，他们还说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

张耀祠：“中央没有指示，我不好擅自抓人。总理已下令封锁机场，我只能命令警卫部队阻止他们出北戴河。”

与此同时，大队部的哨兵跑进值班室报告：“一辆红旗车已穿过 56 号楼至大队部之间的公路，正向大队部门前开过去！”

林立衡立即把这情况报告了张耀祠。张耀祠叫查一下是什么车。

这时，外边值勤的警卫战士也连声喊叫起来：“车下来了，快拦住！”

6 中队的中队长肖奇明带领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冲上公路，按照事先计划，10 多名战士排成一道人墙，挥着手臂，高喊道：

“停车！停车！”

汽车仍然没有减速，不断地按着喇叭加大油门向人墙冲去。人们本能的一闪，车冲过去了，随即又冲过第二道人墙，这里的战士也险些被风驰电掣的红旗车撞上。

中队长肖奇明是在第二道人墙阻拦，当红旗车冲过第二道人墙时，他横向朝红旗车开了枪，无奈这是一辆红旗防弹车，事后检查，这两枪打在了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上，只在玻璃上留下了两个小白点。后来，周恩来对这两枪提出批评，说是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

坐在车里的李文普，跟随林彪十几年，此刻，他突然喊了一声“停车！”

司机杨振刚本能的踩了一下刹车，李文普就势跳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喊道：“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李文普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他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呐！”

又响了一枪。李文普侧着身，手扬着，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李文普翻身滚到路旁。

肖奇明最先赶到李文普这里，姜作寿在他后面30米。他们看见李文普半躺在地上，捂着左大臂的负伤处，嘴里还在哇哇乱叫：“叛徒！叛徒！”

“谁是叛徒？”他们问李文普。

“叶群！林立果！”李文普答。

警卫人员飞快地向汽车跑去，车门尚未完全关上，汽车已飞速的向前驶去。

肖启明带着几名战士坐上一辆“吉姆”车追了上去。

一辆大卡车开过来了，姜作寿大声命令上车。近3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上了卡车，谁也顾不上负伤的李文普。

姜作寿站在驾驶台的踏板上，宣布：“首长被林立果、刘沛丰劫持跑了，我们去拦截……”

还没讲完，大卡车就开动了

虽然“吉姆”车司机开得很快，肖启明还是叫他再开快点。因为李文普半路下车，耽误了一会儿，“吉姆”车看见前面的“大红旗”了。

但是大卡车一路上也没有见到“大红旗”的影子。

听到外面枪声,张宏慌忙跑了出去。这期间,林立衡一直拿着话筒,没有中断与张耀祠的通话。她报告了红旗车从96号楼开下来,经过8341部队大队部门口,接着有人开枪的情况,哭着请求他立即命令部队阻拦!

听到这里,张耀祠说:“那就让部队快追吧,我马上再去请示。”

张宏很快跑回来,也向北京报告了情况:“林彪坐汽车跑了,没有拦住,李文普被打伤了!”然后对林立衡说:“现在不知跑到哪里了?我马上去追!”说着,气喘嘘嘘地带上枪走了。

林立衡又接过话筒,对着话筒不断地呼喊着,但毫无回音……这时她一边等着张耀祠的回复,一边用另一架电话给96楼打电话,叶群内勤孙忠堂接的电话,他说:“人都冲出去了,房子里没有几个人了。”

滚到路旁的李文普听到几辆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后,站起身来,提着枪,自己捂着流着血的伤臂走回到58楼二大队队部,二大队的卢医生见状马上拿出急救包给他包扎。他们要送李文普去空军疗养院。李文普想自己的女儿就在空军疗养院当兵,而且是刚刚办的入伍手续,便让人们把他送到北京军区疗养院281医院。在281检查的情况是: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骨折。

医生问李文普怎么受的伤,他说是自己“枪走火”。

再说刘吉纯从58楼二大队大队部赶回96楼。刚到楼前,就看见林彪的“大红旗”出来了。因为没看见叶群的车出来,他跑到秘书办公室,叫“林办”秘书李春生去看看叶群在不在。李春生回来说没看见,只有叶群的内勤守着一大堆行李在那里等着。内勤说,她看见叶群只拿了一个小包,以为她还要回来,便对李春生说:“叶群可能在卧室,你去看看。”

而叶群司机小穆赶到96楼,还没有下车,就听见叶群内勤喊:“主任让你到56楼接豆豆他们去机场。”

小穆马上开车去56楼,看见56楼一片黑暗,以为人已走,掉头又回到96楼,跳下车对叶群内勤孙忠堂说:“你告诉主任,56楼没有人,怎么办?”

孙忠堂慌乱地对小穆说:“他们早走了。”

小穆吓死了,他是叶群的专车司机,而且叶群要带走的东西全在

他的车后备箱里,迟到了叶群准要骂他。小穆转身上车开着空车向机场追去。

看见林彪的大红旗绝尘而去,林彪内勤小陈和小张懵了好一会儿,这才奔到院子里,边哭边说:“他们都走了,都走了……”

“林办”秘书宋德金问二人:“李处长呢?”

“跟着一起走了。”

李春生不信,进去看了一圈,跑出来大喊:“首长走了!”

96楼一片慌乱,“首长去哪儿了?”

“去大连。”

“去大连为什么不带上我们?”

宋德金说:“快快,快调值班车。”

刘吉纯一听更急了,恰巧院子里有8341部队的一辆“伏尔加”,正好宋德金出来,还叫上了李春生。考虑到只有刘吉纯一个人有枪,又叫了一名带长枪的战士,他们乘“伏尔加”直奔山海关机场而去。

“伏尔加”追上了叶群的司机小穆。小张要开枪打,宋德金说:“慢着,万一里面有林豆豆,打错了人怎么办?”

此时,8341部队的三部值班车也都追出来了。自从“大红旗”从北戴河开出后,8341部队先后组织了8辆车70多人,由张宏副团长亲自带队去追。

第 1188 回：接报告，林彪已离开住地 电掣般，“大红旗”冲过护栏

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接到了张耀祠的报告：“林副主席已经离开住地去山海关机场了。”

9月13日0时刚过，周恩来为了证实这一报告，他要林彪的电话。军委总机马健英接通了100号林彪的专线，没人接。200号叶群的专线，也没人接。这是不可能的呀？怎么可能没人呢？她以为线路坏了，中南海故障台检测后说，电话是好的，有正常的铃声。她纳闷，怎么工作人员也都不见了？

周恩来问张耀祠，警卫部队能否先赶到机场控制飞机？张耀祠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

周恩来再一次叫李作鹏下令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

周恩来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吴法宪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吴法宪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潘景寅。这时，吴法宪又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

时念堂接到吴法宪让他准备两架专机的指示，立即通知准备伊尔-18。专机师的战备做得很好，专机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很快机组人员带上飞行用具，跑步到候机室待命。时念堂对机组下达命令，只讲北京飞山海关和到山海关落地。因为吴法宪没讲任务的性质，他也没讲是谁去，只是让机组原地待命。

山海关机场的电话接通了，吴法宪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潘景

寅在电话里满口答应。

但是,当吴法宪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周恩来却告诉吴法宪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他要吴法宪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吴法宪问要不要准备飞机。周恩来说:“你准备一下吧。”

原来,23时54分左右,256号三叉戟驾驶员潘景寅,正在34师派驻山海关机场的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的调度室里。这时,北京保密机响了,是李海彬接的,找潘景寅。

潘景寅接过电话,“嗯嗯”两声,说:“好的,好的,明白。”放下电话,立即对李海彬说:“要油车。”

“加多少?”李海彬问。

“加两吨半。”潘景寅说。

“那要一个油车就够了。”李海彬说一句。

“你要两个吧。”潘景寅说。

23时55分,李海彬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要两个油车给三叉戟加油。与此同时,潘景寅出门,叫醒正在熟睡的256号机组机械师去加油。

23时56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员李万香告诉外场,调两个油车加油,化验员也到场。

0时03分,潘景寅通知机械师起床后,又回到李海彬调度室。这时,北戴河的保密电话响起,李海彬拿起电话,一个男声急促地说:“我是8341部队的宋定忠,有小轿车去山海关机场了,车到了别让它走,要卡住!”说完就挂了。

这个没头没脑的电话,让李海彬不知所措。他问潘景寅,潘景寅也不知道这个叫“宋定忠”的人,“卡住小轿车”?当时能坐小轿车的人只能是首长,“卡住”首长?谁如此胆大包天?李海彬搞不清楚,潘景寅也搞不清楚。他们一起敲开随林立果一起飞到山海关机场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一处秘书程洪珍房门,而睡意正浓的程洪珍也不认识这个宋定忠。

宋定忠是谁?8341部队二大队有两个中队在北戴河警卫林彪,六中队跟着二大队部,负责林彪别墅外围警卫。八中队是更外围的警

卫。可是 8341 部队二大队没有宋定忠这个人呀？！

电话里李海彬没有核实姓名，可能因为对方有口音，李海彬听错了。无论如何，宋定忠这个电话把程洪珍也吓住了。“卡住”林彪的车？为什么？程洪珍、潘景寅、李海彬都认为这个电话很严重，必须立即报告林立果。3 个人回到李海彬调度室，程洪珍用北戴河保密电话给林立果打电话，没有人接！程洪珍又用北京保密机通过空军一号台给周宇驰挂电话，周宇驰急促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康曼德’已经出发了。现在情况紧急，北京正在追查，你快跟他们跑吧！”

程洪珍不知怎么回事，急忙与潘景寅商量。这时，北京又来电话找潘景寅。

潘景寅放下北京的电话，对李海彬说：“谁要问这架飞机来干什么，就说是训练。问什么时候回北京？就说有故障。”

李海彬说：“空军调度室问了好几遍，这架飞机什么时候回北京？”

潘景寅气冲冲地说：“老问干什么呀？就说还没有走！”

潘景寅看了一下手表，说了一句“油加得差不多了，我去看一看”，就去了停机坪。此时离他要油车已过 20 分钟。

再看北京。0 时 06 分，李作鹏再次电话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李万香强调：“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

调度值班员李万香报告：“已经要了两个油车加油。”

大约 0 时 10 分，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等人来到调度室，值班员李万香报告李作鹏来过电话。当潘浩等人知道西郊机场派来的调度室主任李海彬已经为三叉戟要了两辆加油车，觉得情况紧急，必须再给李作鹏打个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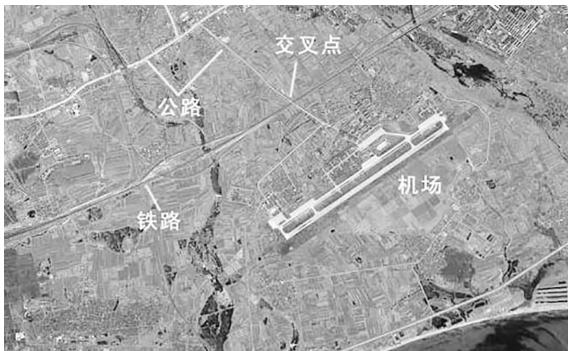
此时，林彪的“大红旗”早已经发疯似地冲上了公路。车速高达每小时 120 公里，把尾随它的卡车、吉普车都远远抛在了后面。

但是，在接近山海关机场时，它被先派出去的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那辆大屁股吉普车压住了。无论它怎么鸣喇叭，吉普车就是不让它超车。这样拖了几公里，前面已经可以看见机场的大铁门了。当他们正要横穿一道铁路线时，正巧有一列火车要通过。看到工人亮起红

灯，标志杆徐徐下落……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在标志杆前停住，而“大红旗”却一打车头，超过吉普车从标志杆下冲了过去，急驰的火车险些撞在它的车尾上。

叶群的司机小穆看见后面“林办”的车在追，他怕叶群骂，开得更快。通往山海关机场的路上有两道火车线，前面两个车刚开过去，一列货车来了，因为没有路灯，离铁路十几米司机才发现，因为车速太快，“伏尔加”司机转了个大弯，栽到草丛里，侥幸没撞上。

等长长的那列货车驶过，前边的“大红旗”已经跑得没影了。



山海关机场卫星图片。进机场的公路要经过一个铁路交叉点。

9月13日0时15分，山海关场站参谋长佟玉春步行去停机坪。这时，跑道还黑着，三叉戟附近亮着一盏聚光灯，这是警卫飞机的长明灯。两辆加油车正在加油。

0时18分，林彪的红旗轿车冲入山海关机场停机坪，直向三叉戟飞机驶去，在银白色的256号三叉戟专机左后方戛然而止。

“大红旗”冲进机场北门时，林立果冲着大门警卫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把大门锁上。”结果，后面跟上来的大屁股吉普车怎么按喇叭，门卫也不开门，装听不见。后来吉普车火了，命令跟上来的卡车硬把铁门撞开，门扇都给撞翘起来了。

佟玉春步行到距离林彪专机不到100米时，突然看见林彪“大红

旗”快速开来，戛然停在专机边上。

佟玉春见状赶紧往专机跟前跑。但见那辆“大红旗”还没停稳，叶群就披头散发跳下车，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现在有情况！”

林彪没戴帽子，第二个下车。

穿着白衬衣林立果挥舞着手枪也下了车，十分慌张地大声喊着：“快！快！快！飞机马上起飞！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保卫林副主席！”

刘沛丰下车后，顺着工作便梯爬上飞机，接着是叶群。林彪第三个，他的头顶到了叶群的脚。林彪下边是司机杨振刚，他托了林彪一把。

叶群进到机舱，这时飞机还没有发动，她向下边大喊：“油车快让开，我们要走！誓死捍卫林副主席！”

这时，冲进机场的8341部队的那辆大屁股吉普车在距离飞机200米处停下，8341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跳下车就往调度室跑，是想去告诉调度室阻止飞机起飞。车上的其他8名战士也下了车，只是呆呆地看着林彪上飞机。

正在翅膀上面加油的两个机械师，看到林彪的汽车一到，就赶紧从飞机上下来。正在飞机里的机械师邴起良看见林彪的汽车冲过来了，可是机组人员还正在睡觉，他赶紧下了飞机，拿起停机坪上的电话，对调度室的李海彬喊道：“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到？”

这时，潘景寅正向这边奔跑过来，他跑到飞机下边，二话没说，赶紧爬上飞机。正在机翼上加油的机务中队副队长李平，机械师张延奎，也都爬进了飞机。只有邴起良还在机下等待机组的其他成员。

拿着手枪林立果让邴起良赶快上飞机。自己则拿起专机旁停机坪上的电话打电话。

这时，机场参谋长佟玉春对邴起良大声喊：“没有周总理批准，飞机不能飞！”

邴起良愣愣地看了佟玉春一会儿，没说话。

林立果拿着手枪把邴起良推上飞机。上飞机时，邴起良还在扶梯上不住的回头观望……

林立果拉着正在现场的场站政委史岳龙和副站长赵雅辉的手，往

三叉戟上拽,说:“首长要接见你们”。

林彪上飞机的慌张,史岳龙和赵雅辉都看到了,再加上接到了不准起飞的命令,他们觉得不对头,两个人也懵了,不知道怎么就没上飞机。

佟玉春急了,他命令场站的油料科科长王学高和油料排长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开到滑行道出口 50 米处设障,无论如何不能让飞机起飞,然后向机场警卫连跑去。

再说调度室的李海彬接到邵起良的电话后,也急了,赶快跑到机组人员休息的房间,挨个砸门,同时高喊:“首长到机场了,快快起床!”

“嘭嘭嘭……”急促的砸门声让机组的其他 5 位成员几乎同时从睡梦中惊醒,他们从床上蹦起来。

飞行员有个习惯,睡觉时两只鞋尖一律朝外,蹬上就可以跑出去。这时,第二副驾驶康廷梓以极快的速度胡乱套上衣服,一只脚伸进皮鞋里,第二只脚还未来得及伸到第二只皮鞋里,就听见窗外“轰”的一声巨响,256 号三叉戟发动了!

“怎么会?”专机副驾驶康廷梓连鞋带也没系,衣服也没扣,就疯了一样冲出门。黑暗中,他看见机组的陈联炳和陈松鹤跑在他的前面。

0 时 23 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记录:“开车就走,来不及准备。通信员陈松鹤跑在最前面,后面跟着第一副驾驶陈联炳……”

叶群的司机小穆的车也紧跟着进了机场,但乱糟糟的场面让他停住了脚步。事后有人问:“如果叫你上,你上不上?”

小穆说:“当然跟着上。”

被机场乱糟糟的场面吓的停住脚步的还有林立果从北京带来的程洪珍,他是听见“大红旗”刺耳的刹车声后,从李海彬调度室跑出来的。李海彬调度室距离停机坪 100 米左右,因平房前面还有一座小楼挡着,在李海彬的调度室里看不见飞机和汽车。但是夜间声音传得很远,程洪珍和李海彬都听见了刺耳的汽车刹车声。程洪珍二话不说,起身就往外跑。李海彬没动,他的岗位在调度室,他要 24 小时守候电话。

当程洪珍绕过小楼,清楚地看见 256 三叉戟右机翼上站着两名机械师,正在加油。但是,他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他看见“大红旗”正往

三叉戟跟前开，速度非常快；他看见飞机前乱成一团，突然一股害怕涌上来。林立果交代是看好电话，安排好两个随机来的女兵，听他指令，第二天早上走。现在林立果半夜来了，没有给他指令，他是该上飞机呢，还是不该上？如果冒失跑上飞机，林立果还带来两个女兵交他负责，如果林立果问起那两个女兵呢？不是叫你守电话吗？谁叫你上飞机？程洪珍呆呆地望着正在快速移动的三叉戟，一动未动。

在此之前，0时20分，机场值班员给李作鹏打电话报告说：“李政委，场站领导要同你通话。”

李作鹏答：“好，请讲。”

顷刻对方说：“我是场站站长潘浩，李政委是不是给我们来过几次电话指示？”

“是的。”李作鹏又重复一遍。

“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

李作鹏拿着电话思索片刻，回答说：“可直接报告周总理。”因为李作鹏知道，山海关机场作为暑期保障中央首长的机场，可以要通中南海的总机。

潘站长又问：“中央首长的指示，是不是要给专机师的潘副政委传达？”

李作鹏回答：“可以告诉。”

潘站长放下电话，和场站史副政委一起，急忙去找潘景寅。当他们从场站调度室出来时，就看见了三叉戟身边的“大红旗”。他们迅速跑到潘景寅的房间，没有人。再跑到停机坪，只见机组穿皮夹克的细高个儿邵起良在拿着枪的林立果前面走，样子有点犹豫。

第 1189 回：仓皇间，三叉戟强行升空 周恩来，中南海见毛泽东

正在往调度室跑的 8341 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跑到半路，听见了飞机发动的巨大声音。他先到调度室南门，门不开，又往东绕到后门。刚进门，看见一位海军机场的人，他说：“快告诉调度室，这架飞机要控制，不能起飞。”

那位海军干部随即上楼。

于仁堂又转身跑向飞机。0 时 23 分，于仁堂在距离飞机 30 米时，看见 256 三叉戟滑动了。他又返回调度室，快到后门时，碰见机场参谋长佟玉春，他急急地说：“这架飞机情况不明，无论如何不能让它起飞，你要采取紧急措施。”

佟参谋长说：“我们刚才也接到了不能起飞的命令，可现在来不及了，飞机已经进跑道了。”

佟玉春是跑去调警卫连时，听见林彪专机的三台发动机发动起来的巨大声响，于是跑到调度室，向值班员借了一把手枪。此时他一边朝飞机方向跑，一边掏出手枪，冲天打了 3 枪，是在催警卫连快来。

值班员听到枪声，拉灭了停机坪惟一亮着的照明灯，机场顿时陷入黑暗中。

副站长赵雅辉站在调度室窗外冲里边喊：“快对空联系，把飞机喊回来！”

同时，8341 部队的人把停机坪上的另一架伊尔 14 专机包围住了。有些人还冲进调度室，一名干部问附近哪个机场有歼击机。

佟玉春的枪声没有阻止 256 号飞机继续滑行。他调去阻止飞机起飞的两辆加油车，只有一辆“勇敢”地驶向了跑道，但一看三叉戟“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车上的科长借故下了车，只剩一个山西新兵刘三儿。上边没有明确指示，干部跑了，新兵刘三儿哪有胆量去拦专机？不要说“拦”，就是碰坏了专机也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他只能尽量把

车往滑行道边上靠,可三叉戟机翼长,右机翼还是刮坏了加油车的罐口盖,机翼上的铝皮掉了,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也刮碎了,30米长的飞机右翼打弯了油车顶盖的铁棍,撞下来一堆碎片。

刘三儿当场吓“病”了。

256号三叉戟飞机凭着机头灯,在那道惟一的白光“照耀”下,“势不可挡”地滑向跑道。滑到东头,机头调转过来,发动机的声音增大,开始加速。也许是太着急,也许是黑,潘景寅差点儿撞到跑道边的一堆大石头,这堆大石头是修跑道剩下的,还没有来得及清走。潘景寅强扭了一个90度的大弯,因为动作太急促太猛烈,像个醉汉,还没有对正跑道就拐了弯,一个主轮偏出滑行道,开进了黄豆地。山海关白天刚下了大雨,地里全是泥。三叉戟将黄豆地轧出一尺多深的沟,割下来的黄豆都被吹跑了。幸亏三叉戟“马力”大,要不非“窝”在黄豆地里。三叉戟从黄豆地里“挣扎”出来,狂吼着从东向西进入了跑道,留下20多米长的一道泥沟,又轧坏了两个跑道灯。在正常情况下,大飞机应该从联络道开到跑道尽头才能起飞,而这次三叉戟在跑道头500米处就强行起飞了。

这时是1971年9月13日0时32分。林彪等人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

机场的灯全熄灭了,三叉戟也没有平时一样打开翼尖灯和机身上的闪光灯,很快被茫茫夜空“淹没”,黑暗中只有飞机的轰鸣声。

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停机坪奔跑的几个256号三叉戟飞机机组成员全傻了眼,一时怔在那里。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专机组都知道,准备飞机从来都是全机组一起准备的。飞机落地下来,首长走了,机组还不能走,还要查飞机,查得很细,每个地方都要检查。检查完了还要塞上各处的“眼”,盖上蒙布,才能回去休息。如果专机8点起飞,夜里3、4点全机组就要起床到机场,提前好几个小时准备。打开飞机蒙布,取出塞好的“眼”,然后发动机试车,每个部件检查到,良好了,才能放心。剩点时间还要里里外外地拿抹布和汽油擦飞机,做清洁工作。然后在机场待命,等待首长。飞机,尤其是专机,不像汽车,上了车就开。

可眼前是怎么回事？

专机上的服务员小魏因为要提暖水瓶打开水，动作稍慢了一步。她提着两个暖瓶，望着已经起飞的 256 号三叉戟，着急地说：“我开水还没打，他们怎么就起飞了？”

5 位垂头丧气的专机组“难友”顿时觉得自己失职了。

256 号三叉戟配备了专机师最强的技术力量从北京飞向山海关。然而专机组的所有人做梦都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三叉戟再次从山海关起飞时，机组作为一个集体已经永远不存在了。昨晚 23 时，机长潘景寅在机组准备第二天飞行的会上，安排得好好的，第二天一早起来到机场做准备，然后吃早饭，然后再回到机场待命。没想到才睡下两个小时，一切全变了。

是不是在梦中？不是，专机确实是起飞了，停机坪上空空的。这 5 个难兄难弟全都目瞪口呆，谁也不明白机组的部分成员还没上飞机，怎么飞机就起飞了呢？

当刘吉纯他们的“伏尔加”开到机场，只见机场一片黑暗。先看见林彪的“大红旗”停在那里，在他们前面赶到 8341 部队战士站在车旁。

刘吉纯问他们：“飞机呢？”

他们指着前方的跑道说：“在跑道上。”

但那不是三叉戟，而是另一架小飞机，周围站着拿枪的战士。

天很暗，看不见，刘吉纯们准备到前面看看。刚走几步，大飞机震耳欲聋地滑动了。

刘吉纯痛骂 8341 部队的战士：“你们都是死人，为什么不拦住？不是命令不准飞机起飞吗？你们等着挨整吧。”

他问：“于副大队长呢？”

战士说：“在那边，去调度室了。”

刘吉纯说：“赶快，上调度室。”

看见于仁堂，刘吉纯埋怨他怎么叫他们上了飞机？于仁堂说他的车慢，被后面的车超了过去，他们也是刚到不久。因为只是向干部讲了，战士都不知道林彪要跑，所以战士都站在那里不敢动。

刘吉纯想了一下，不应该埋怨他们，没有上面的命令，谁敢动林彪副主席？

这时机场大乱,枪声,喊叫声,车辆穿梭声,伴着飞机的轰鸣声,整个停机坪混乱到了极点。平时执行专机任务,庄严极了,隆重极了。机组先到机场准备飞机,再由先遣人员搬东西,欢送的人车水马龙,最后才是“姗姗来迟”的首长。怎么林彪专机就成了这样的“一锅粥”呢?

一辆满载全副武装战士的卡车冲进机场,在停机坪中央刹住。混乱中,有人喊开枪,有人喊不准开枪。一辆吉普车在距离第二副驾驶康廷梓几米远的地方停住,跳下一位40多岁的陆军干部,右手拿着手枪。他左手拉着康廷梓,右手举枪指着正在滑行的飞机,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你,你,快把飞机拦住!”

康廷梓想:“我连谁在飞机上都不知道,赤手空拳,怎么把飞机拦住?”他问:“是谁在飞机上?”

陆军军官并不回答康廷梓的问题,却一个劲儿地说:“这架飞机不能起飞,把它拦住!”

康廷梓急中生智,用手指着吉普车,“命令”陆军军官:“快,把吉普车开到跑道上,对准飞机,堵住它,它就不敢起飞了。”

陆军军官明白了康廷梓的意思,上了吉普车,但已经来不及了。

三叉戟第一副驾驶陈联炳问:“怎么办?”

李成昌是党小组长,潘景寅不在,他就是机组的头儿,他说:“上调度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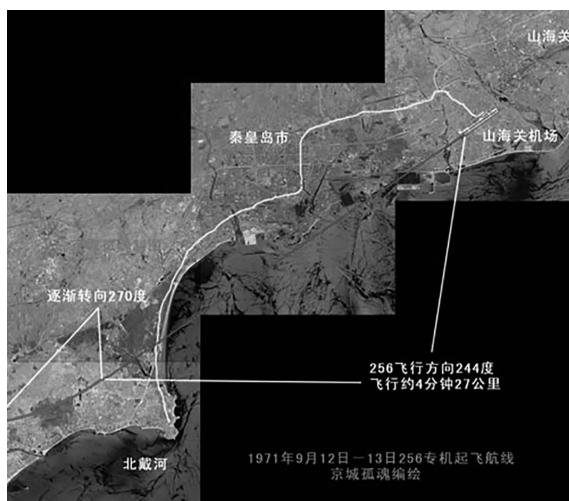
这几个被丢下的256号机组成员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调度室跑,看看飞机往哪里飞?

在调度室,他们更糊涂了:256起飞后,顺着山海关机场的244度向西南朝着天津的方向飞行了4分钟,然后,来到山海关西南40公里,林彪刚刚离开的北戴河上空,缓慢异常地转了一个大的出奇的弧度向西北310度飞去。开始是向右转弯,航向270度到280度。这个方向是北京,没错。接着,飞机又开始缓慢转弯,向北转弯,到310度,这段时间又是3、4分钟,飞行高度是3000米,以后再没有上升高度。最后机长把航向转到345度,后来又调整到325度。这过程中用了大约20分钟的时间。超出了正常时间的几十倍。这个时候飞机的实际位置已经偏向山海关机场到北京之间,也就是说在河北省迁安县的上

空,已经偏离了 130 公里,这在飞行历史上是很不正常的。

飞行图上,正北为零度,正东为 90 度,正南为 180 度,正西为 270 度。

本来只有 30 度的航向调整动作,对潘景寅这样的飞行员来说,只要几十秒就可以完成的,但是这次,256 号用了 3 至 4 分钟的时间。



黄线为林彪等人自北戴河乘车前往山海关的可能路线。红线为 256 起飞后的航线。

飞机这是要去哪里?目标 290 度、100 公里,目标 315 度、150 公里,250 公里……不久目标消失,5 名机组人员茫然回到招待所。但此时,被甩下的 5 为难兄难弟总算搞明白了一件事,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只有机长潘景寅和 3 个机械师。

三叉戟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给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打电话,说潘景寅一个人把飞机飞走了。

“什么?一个人?”尚登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慢点说,飞机上还有什么人?”

“除了潘景寅,还有三个机械师。”

“不可能！”尚登峨不相信，反复问了好几遍。他是飞行员出身，吃飞行这碗饭 20 多年，只有一名飞行员就飞上天，还从来没有先例。大型运输机不像歼击机，一个人就可以飞上天。大型军用运输机必须两个飞行员飞，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配合操作，就是本场训练，飞起落这样简单的科目，也应该全体人马都上，一个都不能少。更何况外场，又是夜间。林彪专机这次飞行配备了三名飞行员，多配了一名副驾驶。而潘景寅，不仅“丢”下了两名副驾驶，还“丢”下了领航员和通信员。

歼击机在空中飞行的时间短，没有那么长的航线，光凭地面导航就完全可以。运输机航线长，加上空中有风的影响，飞机可能会偏离航线。所以除了地面领航外，必须要有空中领航。尚登峨吓坏了，这是林彪的专机呀，怎么一个人就飞了？

“机组都有谁？现在你身边还有谁？”尚登峨急切地问道。

陈联柄告诉他：“潘景寅把机械师叫起来加油，等调度室老李叫我们起床时，飞机已经滑出，没来得及加油，也没有到调度室办手续，就起飞了。”

这时，空军参谋长梁璞过来了，尚登峨让陈联柄直接向参谋长报告……

李作鹏是在 0 时 28 分接到山海关机场赵雅辉副校长的电话报告：“飞机已强行滑出。”

李作鹏问：“飞机到了哪里？”

赵副校长回答：“快到跑道了！”

李作鹏说：“就这样吧！”

放下电话，李作鹏立即向周恩来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

周恩来“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

8341 部队的张宏他们没有拦住 255 号飞机，只好在机场上把林立果带到山海关的两个女兵拘留了。这两个女兵拿着枪不让 8341 部队的战士进屋。张宏对她们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是保卫林副主席的，你们怎么这个样子？”就在两个女兵愣怔之间，8341 部队的战士冲进去，把她们的枪缴了。

0时32分，汪东兴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接着，他也接到林立衡打来的电话：“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汪东兴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汪东兴放下林立衡的电话，立即给周恩来打电话报告，并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

然后，汪东兴叫着张耀祠和他一起去。张耀祠一直在汪东兴的办公室和他一起听电话，没敢离去。汪东兴对他说：“你要去主席那里接电话。”

周恩来对秘书说：“我去见主席，有事到那里找我。”就出了东大厅。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看见周恩出来，提起氧气箱正准备跟过去，有人叫住他，让他不要走。过一会儿，办公厅领导过来宣布了几条纪律：“工作人员都不要走，今晚就住在大会堂。具体住哪儿，等会儿听通知，不要往家里打电话！”

张佐良从1965年开始做周恩来的保健医生，跟他住过钓鱼台、玉泉山，就是没有住过大大会堂，今天怎么也要住大会堂呢？周恩来外出都用自己被褥，出国也如此，他的卫士长高振普叫西花厅将周恩来被褥抱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周恩来出了人民大会堂，乘车向中南海驶去。他和汪东兴几乎是同时到了毛泽东那里。周恩来匆匆下车后，与前来迎接他的汪东兴简单低语几句，便一起进了毛泽东的卧室。

中南海，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很认真地听取周恩来的报告。其间，周恩来几次去接电话，将最新情况报告毛泽东：

“零点32分，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

“零点43分，航向290度，飞机距机场55公里。”

“零点46分，航向310度，向西北方向飞去。”

.....

第 1190 回：“由他去”，毛泽东不让拦截 禁空令，周恩来紧急部署

此时，北京西郊机场。0时32分，256号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吴法宪大骂起来：“妈的，说不能起飞，怎么起飞了？”一连说了好几遍。在场的人都不知怎么回事，谁也不敢说话。

时念堂这时还不知道飞机上坐着谁。吴法宪让他打电话呼叫256，时念堂走进指挥所，通知有关人员打开所有的通信设备，同时叫标图员开始标图。他认为256号三叉戟是要飞回北京，又命令外场保障人员迅速打开跑道灯及一切夜间降落设备，导航台也打开，专机师整个行动起来了。

塔台灯打开了，机场跑道灯也打开了，西郊机场灯火辉煌。半个小时后，外场指挥车和各岗位都按照保证重要专机任务的规格各就各位。

北京距离山海关300公里，再有十来分钟，三叉戟就该到了。

34师指挥所不停地向256号飞机喊话，不过，直到这时，时念堂还不知道256号三叉戟已变成252号了。嗓子喊哑了，喊哑了，时念堂的呼叫一直没有回音。

飞机上无线电只要打开，肯定能听见。但是此时，却连起码的动静也没有。

秋天晴朗的夜空，静得让人心惊肉跳。平时音箱里总有很多声音，有本场飞行，也有远处不知什么地方的飞机，凡共用一个频道，在一定范围都能听到。但这天晚上很奇怪，音箱里没有一点声音。

再呼叫，还没有。

呼叫不到，吴法宪又骂。

大家都不眨眼地看着标图板，航向240多度。几分钟后，很快北京军区空军的跟踪雷达报告280度。时念堂放松了，正是山海关飞往北京的方向。

吴法宪将这些情况随时报告周恩来。

三叉戟飞了14分钟,120多公里,来到唐山北边迁安县上空,飞机突然转向340多度。

“航向多少?”时念堂的心咚咚直跳,“是自己听错了?”他简直不敢相信,那是通向西北的方向啊!这飞机是要上哪里去呢?

把守空中防线,这是空军各部队从组建就非常重视的大问题,这在平时飞行中,也是机组非常敏感的话题。难道是……叛逃?有人猜是不是机组出了问题?

“不可能!”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这可是在空军运输机部队中从未发生过的事件。

时念堂不知道机组有谁在飞机上,应该是潘景寅坐左机长,陈联炳坐右机长。机长潘景寅和第一副驾驶陈联炳都是航校七期学员,飞了十几年,时念堂同他们执行过多次专机任务,他们都是对党忠诚的老战士啊!

胡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严峻而沉闷的表情,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用右手掌在脖子上来回比划着,一看就知道是表示“杀头”的意思。看上去,胡萍的情绪已经沮丧到了可怕的程度。

李作鹏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向山海关机场查问256飞机的航向,回答是:“西北。”

0时55分,李作鹏将飞机航向报告了周恩来。

李德生也已经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夜深人静,红旗轿车风驰电掣,不过10多分钟,他就从大会堂来到了空军机关大院。正在值班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出来迎接,他们满腹狐疑,不知道总政治部主任半夜来到空军作战值班室做什么?

李德生对曹里怀说:“在北戴河海军机场,有一架空军的三叉戟飞机,可能要不经批准,突然起飞,中央命令我来直接掌握情况。”

值班室内,空军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部门的值班参谋人员,听到李德生的说明,都明白是出了大事。很快,各个地面雷达站的报告直接传来,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飞机已经强行起飞。标图板上,跟踪记录着三叉戟256号的航行轨迹。

司令部的工作由参谋长负责,此时空军参谋长梁璞正在天安门广

场指挥国庆阅兵的预演。李德生要值班室立即通知梁璞迅速返回司令部。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接到通知赶到作战值班室。

标图板上,256号三叉戟的航迹先向西,然后一直向北,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上空。李德生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位置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要求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

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拿起了电话,话筒里传出周恩来的声音,他问:“如果我们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说:“能听到。”

周恩来:“我要对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恩来:“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如不行,在锡盟降落也可以。”

调度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连呼三遍,得不到回答,只好如实报告周恩来:“他不回答。”

13日凌晨1时05分,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到在中南海的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说:“飞机的方向不对头,是向蒙古方向飞了,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

汪东兴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毛泽东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汪东兴跑步过去报告。

1时10分,毛泽东听了汪东兴的报告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不要阻拦,由他去吧!”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让汪东兴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汪东兴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吴法宪一句话:“不要派飞机阻拦。”

空军值班室里,只有李德生知道林彪在飞机上,他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方向。这时,刚从天安门阅兵排练现场赶回来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望着标图板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

李德生问:“有什么特点?”

梁璞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就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李德生坐在标图前，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等情况向周恩来报告。眼看飞机要出国了，他请示周恩来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恩来在电话中对李德生说：“在你之前，吴法宪已经请示过了。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恩来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梁璞又一次焦急地问：“怎么办？”

李德生说：“这架飞机不能打，不能拦截，让它飞，这是总理的指示。”

西郊机场，地面雷达还在交替跟踪……

周恩来来电话问：“飞机到什么地方了？”

吴法宪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 100 多公里，高度 3000 公尺。……飞出国境，雷达看不见了。”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 1 时 55 分，256 号飞机在中蒙边界 414 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

林彪叛国了！

周恩来接到吴法宪报告：“256 号飞机在雷达的荧光屏上消失了！”

在空军指挥所的李德生也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

周恩来给吴法宪打去电话：“从现在起，不准任何飞机飞进北京。如有飞机来，你我都要掉脑袋，你要用脑袋担保。”

吴法宪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

接着，周恩来向吴法宪下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如起飞，要毛主席、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 5 人的命令。”

放下电话，吴法宪立即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和沈阳空军司令员张雍耿打电话传达，要求他们打开所有的雷达，决不允许任何

飞机到北京来。并传达了周恩来的禁航命令。其它军区空军,他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向下传达。因为他此时更急于向空34师的时念堂当面交代:34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令。

空军作战值班室也接到周恩来传达政治局的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

这就是净空了,从此刻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空出现的任何飞行物那就是敌机了。空军参谋长梁璞命令两个作战参谋朱秉秀、徐心德同时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此令。很快,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禁空令”的书面指示就送到了空军值班室李德生手中。

雷达上目标消失,标图没有了。此时,西郊机场指挥所里,全屋人没有一个人言语,只是相互愣愣地对视,表情严峻,一时就像傻了一样,六神无主,只有吴法宪忙得不行,他不停地出进,这电话,那电话,搞得他胖胖的脸上大汗淋漓。看得出他是真急了,心急如焚,如坐针毡,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来回踱步,完全是束手无策的样子。后来电话越来越多,多得让人简直招架不住,就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

中南海,周恩来、汪东兴从毛泽东的卧室出来。汪东兴向周恩来请示说:“主席怎么办?他的安全问题……”

周恩来略加深思后说:“先转移到大会堂,那里条件好一些,以后看情况再定。”

凌晨2时,周恩来打电话问吴法宪在什么地方?吴法宪说:“在西郊机场。”

周恩来说:“我派警卫局杨德中去。”

吴法宪立刻就明白,这是监视他来了。

2时20分左右,周恩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禁空令”向全军、全国各机场和空军指挥所传达完毕。

这段时间,周恩来反复让李德生查清256号三叉戟从北京到西郊机场起飞时带了多少油?在山海关机场究竟有没有加油?根据飞机所携带的油量,究竟能飞多远的航程?

空军指挥所根据查实的数据计算，断定这架飞机肯定飞不到乌兰巴托，李德生将情况和空军指挥所的判断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从中南海回到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内有一个北小厅，宽大的办公桌上摆着军用电话和各种电话，旁边还有一张小床。这里是周恩来常来办公和休息的地方。在这里，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亲自下达了应对林彪叛国事件后的一系列紧急措施。

首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没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5人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

同时，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许任何飞机飞进北京。

这时，正在睡梦中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突然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是汪东兴亲自打来的：“中南海已经进入甲级战备，你负责立即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

邬吉成负责钓鱼台的警卫工作。

“我们这里战备到什么程度？”刚拿起电话的邬吉成睡意尚未全消。

“甲级，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

邬吉成一头雾水，这是怎么回事？搞演习的话，事先总应该有点前兆啊，难道真要打仗啦？邬吉成想再问问清楚，但听着电话另一端话语的简捷急切，似乎不容他有丝毫的延宕。他没再多问，放下电话，就去了驻守钓鱼台国宾馆的中央警卫团三大队，与大队长张云山、政委吴本海一起，按照上级的要求布置部队进入甲级战备。

三大队的一中队，除加强各楼的警卫外，其余的人员与二中队一起，在钓鱼台东大门到北门东面一线设防；部队在东门进门处，利用假山的自然掩体，架上几挺轻机枪，组成一个火力点；在北门内迅速挖好工事，组成一个火力点，用以阻止从大门实施的攻击。在钓鱼台院子里，部队在17号路桥头、8号路桥头设置了钉板路障，并阻断了各楼之间的路径，以阻滞进入院子的攻击者的车辆和抵抗集团冲锋。

留守北京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也突然接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的电话，问他：“林立果在吗？”

蒋廷贵回答说：“在。”

张耀祠又追了一句：“是在吗？”

蒋廷贵说：“是在啊，林立果下午4点左右打电话要洗澡，让值班室给他烧洗澡水。”

张耀祠说：“不对，你去看看。”

蒋廷贵没有立即回答，警卫部队怎么能随便到首长家里查看呢？他们平时都不到首长家中，更何况现在是深夜？张耀祠感觉出蒋廷贵有些犹豫，果断地说：“叫你去看你就去看，怕什么？快点！”

蒋廷贵回答：“是。”放下电话，来到值班室。值班员告诉他：“林立果回来洗完澡就出去了，一直没有回来。”

蒋廷贵立即将情况报告张耀祠。张耀祠说：“人家都跑了！我命令你，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占领制高点，特别要防止空袭。”

蒋廷贵一听脑子嗡地一声，当时头都要炸了，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时间紧迫，不容他多问，张耀祠也无暇解释。蒋廷贵立即回答：“是，坚决执行！”

放下电话，蒋廷贵立即按响值班室警报电铃，向部队发出紧急集合信号。训练有素的警卫部队虽然都在睡梦中，但也就几十秒钟，就集合完毕。蒋廷贵宣布了“有紧急情况，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并简短动员，然后部队按照早已拟定好的，并经过多次反复演练的作战方案，登墙上房，分头占领了制高点，并补充了弹药。

大约半小时后，蒋廷贵又接到张耀祠的第二个命令：“林彪办公室的秘书，现在在班上的，不准离开。不在班上的，明天就不再上班了。告诉他们在家听候通知。从现在起，不管什么地方送来的文件，秘书只准收，不准拆阅，也不准向外发送文件，保密室的钥匙要他们交出来，由你保管。你现在就去向值班秘书传达，并要求他们坚决执行，派一名干部带一名战士在现场监视。”

这天夜里，毛家湾林彪办公室的值班秘书是于运深。此时，他已经听到房上重重的脚步声。奇怪，谁敢上毛家湾的房顶？因为外面有层层警卫，而且毛家湾还有施工人员。他不能离开办公室，所以没有出去查看。说实话，也没有太当回事，他接着又睡了。

9月13日的早晨，天亮了。于运深去院子里收昨晚晾的衣服。中央警卫团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在值班室外，不让他出门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钓鱼台又在搞什么事端？于运深大发脾气，“林副主席办公

室的工作耽误了怎么办？”警卫战士仍不放他出门，说这是上边指示。于运深无可奈何，只好退回屋里，什么也不让他干。于运深想不出会出什么事情。当蒋廷贵向于运深传达张耀祠的指示时，于运深一时傻在那里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觉得实难接受这个事实。过了好一会儿，于运深才醒过神来，问蒋廷贵：

“这是谁说的？谁叫你们这样做的？副统帅的办公室连着全军，一天有多少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处理，耽误了你们能承担得起吗？”

蒋廷贵告诉他：“对不起，我是奉命行事，请你务必配合执行。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还得留两名同志在这里，希望你配合照办。”

于运深继续追问：“这是谁的命令？”

蒋廷贵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

于运深一听，也就不说什么了。因为张耀祠是毛泽东身边的人，这肯定是毛泽东的意思。以后几天，于运深配合得不错，警卫部队不让他出屋，他也不出去，连晾在院子里的衣服也由警卫团的人替他收回来，文件也是只收不发。

第 1191 回：直升机，周宇驰挟持北上 急召见，北京吴德和吴忠

9月13日凌晨1时多，正在西郊机场招待所值班的直升机三大队副大队长陈士印接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打来的电话，说有任务，让他准备好直升飞机。1时40分，陈士印被从床上叫起来，拽进汽车，拉着就走。当他见到周宇驰便问：“什么任务这么紧急？”

周宇驰给他看了一张纸条，说是林彪的“手令”，上边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然后对他说：“去北戴河向林副主席汇报。小陈，这次我们带的东西多，云雀飞机装不下，你得找一架直五型直升机。”

陈士印说：“我改装‘云雀’后没再飞过‘直五’，有些操纵数据都记不清了，恐怕……”

周宇驰打断他的话：“那你到沙河机场后，找一位技术过硬的直五型机长，你当副驾驶。这次任务非常紧急，而且要特别保密，你只找一个机长，其他人不要惊动。”

2时30分，陈士印随周宇驰他们来到了沙河机场，将车停在三大队飞行员宿舍楼下，陈士印跑步去叫直升机团八中队中队长陈修文，他是驾驶“直五”技术最好的飞行员。

陈修文是出生在1937年的安徽人，家里很穷，祖辈四代种地主的地。在他出生后第二年，黄河花园口被炸开，发大水，家乡成黄泛区，不久父亲被国民党拉夫拉走，靠母亲要饭度日。1956年陈修文参军，1959年选飞。

陈修文听说有任务，立即穿好衣服，抓起图囊，就往外走。这是6人合住的宿舍，别人都不在，只有陈修文和陈国栋两个人。陈修文出去后很快又回来，摸黑打开柜子，拿了两包香烟。

陈国栋问：“中队长，什么事？”

陈修文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说：“小陈，起床后帮我把被子叠好。”

早上陈国栋帮助陈修文叠被子时,发现陈修文的手表还在枕头底下,床前地下扔着两团从皮鞋里掏出的纸。

3685号直五飞机旁,陈修文很快做完飞行前检查,和陈士印进了驾驶舱。这时,周宇驰也进来了,坐在陈修文身后。汽车上另两个人,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于新野和空4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他们各自拎着两个沉甸甸的大皮箱进了后舱。

陈修文问陈士印:“紧急任务到哪?”

“北戴河。”

“干啥?”

“首长要去向林副主席汇报工作。”

陈修文起动发动机,并习惯地打开超短波电台的电门,准备请求调度室放飞。周宇驰从后面伸过手来关上了,说:“任务十分机密,不许与地面联络,也不许打开机外灯光。”

陈修文不认识周宇驰,正在疑惑,陈士印说:“大陈,这是空军党办周主任,这次任务由他空中指挥。”

9月13日3时15分,3685号直升飞机起飞。

警卫3685直升机的是203团警卫连战士何祖军。他看到有人要开飞机,却没有团领导在场,觉得有疑问,便借口上厕所溜走,于3时02分,给团值班室打了电话。

直升机大队所在的203团值班参谋马义德接到哨兵何祖军关于有人动用直升机的报告后,立即向团长刘景祥报告,刘景祥马上询问值班的政委杨庆升。杨庆升说:“刚接到师长时念堂传达的禁航令,不能让直升机起飞,快去堵截!”

203团警卫连王连长立即骑自行车奔向3685号直升机。在路上,他看见3685号已经冉冉的飞向空中。

10分钟后,空军指挥部接到沙河机场关于直升机起飞的报告,时念堂立即说:“不能叫它起飞,赶快叫它回来。”他放下电话,飞快地跑上三楼调度室,因为那里有一部直通沙河机场调度室的电话。他拿起电话就问:“是有飞机起飞吗?”

沙河机场调度室值班员小王说:“有,往西北方向飞了。”

时念堂问:“有多远?”

小王说：“200 多米。”

时念堂：“马上呼叫直升机回来！”

小王说：“飞得太远，呼不到。”

时念堂：“马上打一颗绿色信号弹！”

在机场，绿色信号弹是叫飞机着陆的信号。

信号弹升空，直升机的驾驶员看见没看见，不知道。但直升机没有返回来。时念堂无奈地放下电话，又跑下楼去向坐镇在这里的吴法宪和杨德中报告。

大飞机跑了一架，就够让人火冒三丈的了，小飞机又跑了一架，吴法宪又大骂起来，这是怎么搞的啊？吴法宪当即命令：“不准起飞，如果起飞就把它打下来！”

说完，吴法宪和杨德中进到小电话间，吴法宪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周恩来同意吴法宪的处理意见，同时要吴法宪查一查，飞机上的 3 个人究竟是谁，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

李德生也接到沙河机场又起飞了一架直升飞机的报告后，他叫梁璞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令后，还让飞机上天？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

地面电台这时向直升飞机呼叫返航，没有回音。

此时，毛泽东已搬到人民大会堂 118 厅。周恩来、汪东兴都在这里。他们接到李德生从空军司令部打来电话，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 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 5 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毛泽东和周恩来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周恩来补充说：“迫使它降落，不听就把它打下来，绝不能让它飞出去。”

不久，吴法宪报告周恩来说：“飞机飞向南口方向，我已经命令张家口的歼七飞机准备起飞拦截。如果直升飞机飞向国界，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当直升飞机飞越南口和怀来时，吴法宪又向周恩来报告了一次。

3 时 25 分，空军作战值班室，李德生、空军政委王辉球、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空军参谋长梁璞、副参谋长白云全部在场。李德生问了

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 8 架歼 5 甲战斗机拦截直升机！

再说周宇驰他们乘坐的直升机起飞后，很快进入正常爬升。周宇驰说：“航向 320 度，高度 2600 米。”

陈修文又疑惑了：“不是去北戴河吗？怎么 320 度？”

“任务机密，不能直飞，你们不要多问，按我给的航向飞。”周宇驰 1971 年 5 月住进沙河机场二号楼，专门学习驾驶从法国进口的轻型直升机“云雀”。3 个多月，飞了 66 个飞行日，75 场次，184 个小时，所以还算内行。

这时，陈修文耳机里响起地面机场的呼叫：“3685, 3685，你听到没有，请回答！”

陈修文刚要回话，周宇驰慌忙阻止，说：“任务机密，不要回答。”

飞机飞到张家口上空，张家口机场的灯光已经在望，按照过去的惯例，飞这条航线必须在张家口降落。但周宇驰指着地图命令向前飞，往张北以北飞。

陈修文想再往北，就出国境了。

被强烈震惊的陈修文，趁周宇驰往外观察时，按下送话按钮，大声说：“油量不够，要下去加油。”

张家口机场调度室的值班员清楚听到了陈修文的说话，并作了记录。

周宇驰大声说：“不能落地，落下去谁也别想活。国内有人要谋害林副主席，林副主席一家已经乘坐你们师的三叉戟飞到乌兰巴托了，我们要去那里与林副主席会合。”

陈士印、陈修文同时都瞪大了眼睛。

“飞出去！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不老实就崩了你们！”一支五四式手枪顶住了陈修文的后腰。

这时，起飞的 8 架歼 5 甲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因为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歼 5 甲飞机和直升飞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根本无法确定目标。

后来又起飞了 5 架次歼击机，并采取地面为歼击机导航，指示目

标位置。

有趣的是,这13架次飞行并没有5人联名命令,但是有李德生转达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各级部队不择不扣的执行了。

直升机上,李伟信问于新野:“我们今日将会是怎样的结果。”

于新野说:“不成功便成仁。”

天开始发亮,直升机可以看见头顶上有歼击机飞来飞去。正巧有一架歼击机从头顶飞过,陈修文大声喊:“有歼击机攻击我们。”

周宇驰连忙向外张望,陈修文乘机将磁罗盘的指针拨转180度。这时,歼击机开炮了,虽然没有打中,却给陈修文找到借口,他来回压杆蹬舵,飞机时左时右,扭起了“秧歌”。当飞机平飞时,虽然罗盘航向还是320度,而实际飞机已经朝北京方向飞了。

周宇驰问:“你为什么左右转弯?”

陈修文说:“避开歼击机,机动飞行,要不会被打下来。”

周宇驰看罗盘还是320度,就没有再怀疑。直升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飞回北京。周宇驰看见密集的灯光,忙问:“你怎么飞回来了?你骗了我们,你也甭想活,快,飞回去,要不我毙了你。”

陈修文说:“油不够了,飞不出去。”

“那就飞钓鱼台,快,飞钓鱼台。”

陈修文什么话也不说,继续向沙河机场飞去。

当直升飞机飞回到沙河上空时,吴法宪又向周恩来报告说:“看样子是要在西郊机场降落,但是万一飞向北京市里,我就把它打掉。”

周恩来也没有异议。

吴法宪放下电话,和杨德中一起走出候机室,来到室外。此时,天已蒙蒙亮。他们遥望天空,可以隐约地看到直升机了。

专机师师长时念堂也从候机室窗口看见一架直升机从颐和园的万寿山上空飞来,直升机正往下滑,看样子是要降落。他判定是逃跑的那架直升机,立即命令警卫连过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加强排到候机室。时念堂指着将要落地的直升机命令说:“只要飞机一降落就包围起来,劝他们投降,如果抵抗就击毙。但注意不要伤害飞行员。好啦,准备吧。”

但是,直升机下滑到距离机场一公里处,高度20多米,两次着陆

没有成功，直升机又拉起来往沙河方向飞去。时念堂立即打电话向沙河机场布置了同一套方案，叫他们的警卫连立即出动，将下来的直升机上的人员全部抓起来。

吴法宪向周恩来报告说：“我已经命令由空20师来接替空7师继续跟踪。”

周恩来：“好！”

直升机在沙河那边也试着落了两次，还是没落下来。时念堂及时向吴法宪作了报告。

直升机最终放弃着陆动作，向沙河以北的山里飞去了。

吴法宪打电话报告周恩来，说：“如果飞机向海外飞行，或者向大连方向飞行时，我就命令跟踪的歼击机把他打掉，主要是怕飞机飞往南朝鲜。”

周恩来都表示同意。

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召来。

吴德和吴忠12日下午参加完毛泽东丰台专列上的接见后，坐在同一辆车上，驱车回城，径直来到吴忠的家里。

吴忠关上房门，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他与吴德一起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逐句进行回忆，仔细研究毛泽东每句话的含义。

是否要向市委常委和卫戍区党委成员传达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两人犯了难。没有上边的指示，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是不妥的。如此令人震撼的谈话，不传达行吗？领袖对他们讲这些又是什么意思？子夜24时，吴德和吴忠各吃了碗面条权当晚饭。这时，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给吴忠打来电话，说：“总理问，预演什么时候结束？”

原来，当天晚上，天安门广场搞国庆节游行彩排，38军等部队搞分列式。

吴忠回答说：“两点钟差不多可以结束。”

杨德中说：“总理的意思可否提前结束？”

吴忠说：“可以，现在就可以结束。”

放下电话，吴德、吴忠俩人又谈起如何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一直讨论到9月13日凌晨1时多，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

最后，吴忠说：“要不看李德生、纪登奎他们怎么传达，我们就怎么传达。”

吴德说：“只好这样了。脑袋都昏了，干脆先睡觉，明天再说。”

凌晨2时30分，刚躺下不久的吴忠就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作战值班的专线电话里传出秘书李维赛急促的声音：“司令员，周总理要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有紧急任务。车子已在你楼下等候。”

很快，刚从睡梦中惊醒的吴忠就坐车到了人民大会堂。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已在门口等候，马上把吴忠带到了周恩来设在大会堂的办公室。

吴忠进屋后，发现吴德已经坐在沙发上，“二吴”刚刚分手还不到一个半小时，此时又在此相遇。两人点头示意，算是打了招呼。周恩来没在，吴忠走到靠墙的一张椅子坐下。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周恩来走了进来。只见他面色苍白，神情冷峻，似乎忽然苍老了许多。见吴德、吴忠坐在沙发上，周恩来没有寒暄，指着门说：“主席就在这里。”

他接着说：“刚才接到报告，从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飞机，朝北飞行。空军歼击机起飞拦截后，雷达显示，直升飞机在怀柔以西20公里的上空盘旋，可能要迫降。”

随后，周恩来对吴忠命令说：“卫戍区派部队包围山区，赶快把迫降的飞机找到。飞机上一定有党和国家的许多核心机密，一定要搞到手，不能毁掉。”

吴忠当即在人民大会堂给卫戍区警卫3师打电话，要求离怀柔最近的3师7团赶快出发，一定要找到那架迫降的飞机，不能让上面的东西毁掉，马上行动。

接着，他又打电话给卫戍区司令部，要求怀柔和平谷民兵出动，包围周围的山区，实施拉网式搜索飞机和飞机上的人，不能让跑掉。同时，派卫戍区副司令李刚到现场指挥，要求他以最高速度赶去，但不能翻车，并要通信部门拨一条专线，保持通话。

第 1192 回：定方案，卫戍区紧急动员 四川厅，召开政治局会议

吴忠打完电话回来，周恩来立即进入正题：“我们就不用打哑谜了，叫你们来，是要宣布一件重大而严重的事件：林彪跑了，带着老婆、儿子从北戴河乘飞机往北边跑了。他这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是叛国投敌的行为。现在已经可以断定，林彪出逃的目标是苏修。”

吴德和吴忠当时就震惊了，虽然昨天下午在丰台已经听了毛泽东的谈话，但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境地。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党的副主席外逃，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严重事件。国内外会有什么反应？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无法预料。但林彪的党羽、死党不少，要防止他们趁机作乱，同时也要防止国外反动势力趁火打劫。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做好了应付最坏情况发生的准备。”

周恩来布满血丝的眼睛紧紧盯着吴德和吴忠，神态变得异常严峻：“现在我宣布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由你们两人具体负责执行。你们要对毛主席、党中央负责！你们要绝对保证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

吴德、吴忠同时站了起来，情绪激动地表示：“请毛主席、党中央放心，我们决不辜负党的信任！”

周恩来示意他们坐下：“当务之急，是要确定首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实施方案。你们有什么想法，提出来一起讨论。吴忠同志，你是卫戍区司令，你先讲。”

这时，38 军 112 师正在赤峰拉练，还在行军途中。周恩来对吴忠说：“这个师就不到保定附近了，归你指挥。”

吴忠建议把 112 师放在昌平，周恩来同意。遂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决定 38 军及坦克 1 师、炮 6 师统归北京卫戍区指挥，卫戍区下属兵力由原有的 4 个师增加到 10 个师。防御区域重点是北至南

口,东到首都机场,南到河北保定以北。所有进入北京地区的部队,一律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

一番简短的讨论之后,周恩来在一张纸上归纳了吴德和吴忠所开列的措施,并当即向“二吴”下达了命令:

1、卫戍区部队立即协同首都民兵,严密搜索外逃的直升飞机,要人、机并获,并将搜缴物品直接报送中央。

2、卫戍区部队立即出动,严密封闭北京的所有机场,没有中央的命令,任何飞机不许起飞和降落。若有飞机不执行禁飞令,坚决予以击落。

3、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黑据点,并搜集罪证。

4、卫戍区立即向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附近地区增派部队,协助中央警卫团,确保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同时,加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电报大楼等要害单位的警卫力量。

5、首都所有驻军进入一级战备,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

周恩来最后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不能睡觉了,马上进入战备状态,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从现在起,你们只对我负责,向我直接报告。在发生突然情况和联系不上时,可以临机处置,先斩后奏。”

吴德和吴忠准备离开时,周恩来又说:“现在情况还不明朗,中央决定对林彪外逃事件严格保密。北京市的范围内,只限于你们两人知道,不允许向任何人泄露。”

吴忠略加思索后说:“总理,我建议增加杨俊生同志参加组织指挥工作。”

周恩来不动声色,问:“为什么?他可以信任吗?”

吴忠回答:“我向中央保证,杨俊生同志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他是卫戍区政委,有他参加,便于指挥部队执行任务。”

周恩来遂决定:“同意你们的建议,增加杨俊生参加首都紧急战备的组织指挥工作,同时可以向他说明事件真相。此事只准你们3人知道,不准扩大。”

周恩来、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周恩来 说:“林彪跑了,现在情况不明,北京军区立即进入一级战备。”

周恩来让纪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

同时,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反应,抓紧研究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所需的应对方案。

吴德和吴忠回到了卫戍区,紧急打电话叫来杨俊生,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随后,3人共同拟订了紧急战备状态的部署方案,决定:卫戍区机关和所属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紧急集合,汽车发动,枪不离手,就地待命,确保一声令下,迅即出动。

按照惯例,作战命令应该由军委办事组下达,但这次是周恩来直接下达了命令。吴忠根据周恩来指示,通知卫戍区作战值班室:

“从现在起,卫戍区机关及部队只执行来自周总理办公室和吴德、吴忠、杨俊生3人下达的命令。对来自中央军委和解放军三总部的所有电报、电话,只收听,不回复。卫戍区部队的任何部署和调动,一律不上报中央军委和解放军三总部。”

卫戍区部队动员以后,迅即向各自的作战目标集结。负责加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警卫任务的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并在外围地带布置了大批荷枪实弹的军人。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中央首长驻地附近,卫戍区派驻的岗哨和便衣流动哨密密匝匝,严密注视过往行人、车辆,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

负责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要害目标警卫任务的部队也迅速到位,干部亲自带哨,官兵荷枪实弹,同时在目标周围秘密安置了大批武装人员。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从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组成的搜查分队,秘密包围了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空军学院、东交民巷、沙河机场的5个据点,扣押这些据点的全部人员,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因为这5个据点都是军人把守,搜查分队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们动作迅速,还没等里面的人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冲了进去,5个据点里的留守人员基本未作抵抗。

担负封闭机场任务的卫戍区部队,携带各种重型装备,于13日凌晨进入北京附近的5个军用机场:西郊机场、南苑机场、沙河机场、良乡机场、东郊机场,迅速夺取了机场的控制塔台,在跑道上设置了障碍物,并封锁了机场周围的道路。吴忠向各机场负责人传达中央指示,要求密切配合卫戍区部队执行命令。机场地勤人员还算配合,未发生

大的冲突。

进驻机场的卫戍区部队接受的任务是：

第一，封锁机场各部位，控制塔台、机库、油库等重要目标。真枪实弹对准跑道，如有飞机强行起飞，可以开枪开炮，击毁。

第二，在机场跑道上设置木头等障碍物，还把大卡车横在跑道上，禁止一切飞机起飞和着陆。

第三，将机场停放的所有飞机上的油料全部抽掉，增派武装部队严密看守油库。

到13日东方发白时，卫戍区部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全部到达指定位置。

此时，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了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邬吉成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当一切都布置妥当后，东方已初露熹微。邬吉成刚进办公室，电话就响了起来。他拿起电话刚“喂”了一声，就听见电话里，汪东兴不容分说的一顿劈头盖脸的斥责：“我打了几次电话，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

“不是你通知要进入紧急战备吗？我布置到现在，才回到办公室。”邬吉成能感到那怒气从听筒弥漫出来，他解释说。

“哦……我忘了，已经通知过你了。对不起，对不起。”汪东兴口气马上缓和下来，挂了电话。邬吉成搁下电话一个劲犯嘀咕：“汪东兴这是怎么啦，他可不是个好忘事的人，居然也会前脚交代的事情，后脚就忘了？还动不动就发那么大的火？”

再说周恩来，一切应急措施安排完后，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召集政治局会议。

9月13日凌晨3时许，邱会作被公务员张军到卧室叫醒说：“刘秘书来电话说，总理通知，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开政治局会议，要你立即去。刘秘书一会儿就会送公文包来，小朱（警卫员）也起来了。”

邱会作马上起来。他刚吃了安眠药，脑袋晕晕忽忽的，就这样晃晃悠悠来到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看见江青、姚文元等人已经先到了。先到的人同平常一样，有的抽烟，有的像一尊菩萨一样，静坐在那里。

邱会作看到人还没有到齐，估计一下子还开不了会，就到四川厅外面活动、活动，清醒一下头脑，回来后又坐到原来的位置上。

四川厅是人大会堂一个比较大的厅，在大厅东南角摆了一圈沙发，成椭圆型。不久，张春桥也到了。同时，李作鹏也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进入会场。0时55分，他向周恩来报告了256飞机的航向后，就吃完安眠药睡下了，这才两个小时，起来后站不稳，所以晃悠悠的比邱会作还厉害。

李作鹏清醒一些后，向坐在旁边的江青打听到：“江青同志，今天开会是什么事呀？”

江青说：“等一会就知道了。”

邱会作也猜不出半夜召集紧急会议是为什么？他事先听说周恩来、黄永胜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修改政府工作报告，那也用不着半夜开会啊？会不会是倒霉的“庐山”又发作了？从北戴河那边的情况看，也不大像。几个小时前，叶群还从北戴河打电话来祝贺邱会作有了孙女，称赞他给孙女起的名字好，还说女儿豆豆订婚了，要邱会作的夫人胡敏打个电话给豆豆祝贺。看来，不会有什么麻烦事，要不，叶群哪有心思给女儿办婚事？……可是为什么半夜开紧急会议呢？狐疑的邱会作小声问李作鹏：“知道什么事吗？”

李作鹏已经知道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起飞的事，他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

邱会作想：“北戴河？能出什么事呢？”

并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华国锋也被一阵电话铃声从睡梦中唤醒，通知他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周恩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同样不是政治局委员的余秋里也被通知参加了这次会议。

5时左右，已经可以看到窗外的光线，天都快亮了，周恩来才走进四川厅，叶剑英、黄永胜、李先念等人跟在他后面，他们在大会堂参加修改《政府工作报告》，一宿也没有离开。

周恩来进来后坐在南面的正中间，习惯性地扫视了一下全场，然后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

江青毫无反应。接着，周恩来提高嗓门宣布：“林彪坐飞机走掉了，飞机出境到外蒙古了。”

在场的人瞬间僵在那里，有的张着嘴巴，有的竖起耳朵，但每个人的双眼都盯着周恩来。大厅里静到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的声音。此时，一根针掉在地毯上的声音仿佛都听得见。邱会作事后回忆说：当时“我的脑子都麻木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讲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时，周恩来合眼有两分钟，拿起茶杯喝口茶，然后开始叙述林彪出走的情况。他说：“林彪出走是突然的。在事件发生之前，不仅没有人想到，也是根本没有人敢想。”

他接着说：“12日晚上11点半的样子，叶群来电话说，101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

我问：什么时候起身？

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

我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三叉戟才进口，驾驶员还不熟悉。明天白天走，可以坐飞机。

叶群说：你知道，那个急性子（指林彪）很难说服得了。

我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

周恩来接着说：“11时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接着，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

“接到豆豆第三次电话，是11点多钟了。”

周恩来又说：“这个人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准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

“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之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

“林彪上了飞机之后，机组的人并没有到齐，飞机就发动了，林彪乘坐的飞机，是在没有机场放行命令的情况下，强行起飞的，起飞的时候可能是13日0时30分左右。”

“林彪的飞机强行起飞之后，是在京山航线飞行的，空军的雷达看得很清楚。但到了接近承德时飞机徐徐下降，到了承德上空雷达搜索

到一次，飞机调头向北去了。”

“13日零时左右，还得到住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林彪的老警卫员，现在的保卫处长李文普，从北戴河到山海关的途中被打伤了，又据说林豆豆的报告，昨晚林彪已服了安眠药，在北戴河上汽车都是两个人扶着上去的。这些情况都还有待查清楚。”

“他们上车后，不久李文普跳下车来，受了伤。”

他最后说：“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飞机是强行起飞的。”

周恩来刚讲完，江青把小毛巾向茶几上一摔边起身说：“林彪历来都是镇压我的。”然后向厕所走去。

没有人说话。

周恩来继续说：“目前此事要暂时绝对保密！请你们呆在这里，都不要离开四川厅。”说完，他起身走出四川厅，对厅外的环境作了进一步的安排，指定专人看守厅门，无关人员不准进入，所有随领导们进来的人员，一律原地休息，谁也不准靠近四川厅。

接着，周恩来叫黄永胜随他来到东大厅的北小厅，拿起保密电话，亲自逐一给全国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

第1193回：忙通报，周恩来分秒不停 难逃脱，周宇驰自杀身亡

当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接到北京总机的电话，说“周总理让许司令听电话”时，他急忙跑上楼去敲许世友的门。许世友一听是周恩来的电话，一骨碌爬起来，动作非常麻利。

李文卿先跑下楼请示周恩来要不要加密，周恩来说要加密。结果，原来好好的加密机怎么也加不上密。最后，周恩来说：“算了，不要加密了。”

许世友接过话筒：“总理吗？我是许世友。”

“庐山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跑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周恩来的声音清楚，因为没有加密，话讲得含蓄。怕许世友反应不过来，他又补了一句：“毛主席下面经常生病的那个‘老病号’跑了。”许世友马上就明白了。

“知道了。”许世友表情严肃，却无意外的惊愕。

“你们要看住所有军用、民用机场，码头，”周恩来说，“不要让飞机和舰艇跑了。发现可疑的人和飞机立即扣下来。可派陆军进驻机场。”

“请总理放心，我立即布置。”许世友放下电话，叫秘书立即通知南京军区参谋长肖永银速来中山陵8号。接着，又用保密机给上海王洪文打电话，对他说：

“刚才，总理给我打电话，要我通知你，你们那个姓王的上级的上级跑了！懂了吗？”

王洪文拿着电话一听，愣住了，没有反应过来，忙问：“你再说一遍。”

许世友大声说：“你们那里到庐山去开会的姓王的，知道吗？”

王洪文马上意识到这是指王维国，立即答道：“知道，知道。”

许世友又说：“他的上级的上级跑了，现在听懂了吗？”

王洪文想，王维国是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的上级是南京军区空军，南空的上级是在北京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吴法宪在庐山犯过错误，给毛主席写过检讨，开“批陈整风”会时，主席还严厉地批评过他。王洪文以为是吴法宪跑了。

许世友很急，在电话里不停地问：“你听懂了吗？你听懂了吗？”

王洪文回答：“懂了，听懂了。”

许世友挂了电话，然后缓步上楼，坐在餐桌旁等着。这张圆桌既是吃饭和请客的桌子，也是小范围谈工作的桌子。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永银很快赶到这里，许世友对他说：

“肖永银同志，刚才总理来电话说，林彪跑了。现在保密，只能你一个人知道。你通知南空，飞机一律不准起飞；通知东海舰队，舰艇一律不准出海。如果跑掉一架飞机、一艘舰艇，惟单位领导是问。舰艇好办，一个人开不跑。飞机的机动性大，一个人就可以开，如果冲上跑道，你拦都拦不住。总理指示让陆军进驻机场。我看每个机场派一个陆军营，乘大卡车进机场，就把卡车停在跑道上。”

肖永银说：“这个办法好。”

许世友让他先给南空和海军航空兵打个招呼，以免陆军进驻时发生误会：

“你马上回去部署，要加强值班，你要待在作战室，我今天也不外出。部队进机场后，立即向我报告。”

许世友送走肖永银，又嘱咐秘书不要离开电话机。

秘书李文卿有生以来从未经过这么严重的突发事件。方才一阵忙碌，这时仿佛刚刚清醒，只觉得背后汗津津的发凉，心脏仍在怦怦急跳，做了几次深呼吸，才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床头红色电话机的急促铃声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从睡梦中惊醒，他拿起电话，话筒里传出周恩来的声音：“是韩先楚同志吗？我是周恩来。”

“是我，总理。”韩先楚赶紧答道。

“‘老病号’跑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周恩来命令说。

“老病号？”韩先楚一时没明白周恩来说的“老病号”是谁，他以为

是徐海东，在他心里，他的老领导徐海东才是“老病号”。可徐海东不是去年已经去世了吗？怎么又跑了？韩先楚不明白，在电话中间：“是谁跑了？”

周恩来换了一个说法：“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

韩先楚还是不大明白。周恩来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我再说一遍……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经常生病的那个人，出问题了，听懂了没有？”

直到对方答“懂了”，他才放了心。

韩先楚终于明白了，是林彪跑了。他站在那儿愣了、懵了、傻了……怎么会呢？但确确实实，实实在在是周总理的声音，是从北京打过来的电话。

放下电话，韩先楚缓过神来，立即调动有关部队，架设战备通讯线路，控制要害部位。同时指示情报部长孙如奎加强情报工作，对于苏联军队及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军队有何动向，要随时向他报告。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接到周恩来的命令后，立即把副司令员李化民召来，具体负责武汉军区的指挥，李化民就住在了作战值班室。为了防止武汉军区管辖内的机场万一有飞机起飞，统一布置将汽车停在机场跑道上。汽车不够，他居然调来一部分拖拉机。另外通知陆军进驻机场。驻平顶山的坦克13师接到命令后，星夜急驰，首先开进鲁山机场。不明情况的空军人员还在大门口欢迎。当坦克在跑道中央停稳后，空军才发现不对头，问为什么？13师的人回答：命令坦克就停在这，我们觉的也不妥当，可还得执行命令。

周恩来给兰州军区政委洗恒汉打电话说：“那个经常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张达志同志商量部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紧急战备。”

这一圈电话打下来，周恩来的嗓子都喊哑了。

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大亮了。人民大会堂外面，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样。人们依旧是那么的平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该散步的散步。天安门广场上，首都民兵师的队伍还在演练队形，准备迎接国庆22周年的检阅。广播喇叭的新闻播音中还不时出现“林副主席”的字眼。外面的行人谁又能料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刚刚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

人民大会堂内，东大厅的北小厅，周恩来在办公桌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连卫士轻轻地把窗帘拉开和关灯的声音都没能把他惊动。周恩来从12日晚上19时30分吃过一顿饭后，到现在已连续紧张工作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也没休息。卫士担心他的身体，但此时此刻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在一旁静候。

沉思了好一阵子，周恩来起身走出北小厅，前往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往常，周恩来总是会问：“主席休息了没有？”但这次他没问，他知道毛泽东肯定没有休息。

在四川厅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一直等到天明，周恩来终于回到了四川厅。叶剑英对他说：“林彪不会去蒙古，有可能到苏联去了。我们要发表一个声明，在军事上后发制人，但在政治上要先发制人，我们的公开声明，主要是给苏联人看的。”

周恩来说：“可以发表一个声明，只有几句话就行了。”

黄永胜等人也表示同意。于是，叶剑英一边说，政治局作记录的秘书一边记，声明很快就写好了，只有100多个字，周恩来认真看后，派人去打电话问：

“主席睡了没有？”

很快得到报告说：“主席没有睡觉。”

声明稿送到毛泽东那里不久，周恩来就去接毛泽东的电话。他回来后说：“主席指示，声明现在不要发，看看情况再说，林彪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主席说，即便到苏联去了，他就能当他们的国防部长？就有指挥军队的权力？……”

大家听了之后，没有一个说话的。

接着，政治局研究防止苏联乘机从空中和地面突然进攻的问题，主要是黄永胜讲，综合起来有三点：

一、三北（东北、华北、西北）进入战备状态。三北的国境线上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二、各战略方向的二梯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统帅部的总预备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三北的空军部队的战备请总理亲自部署。

三、北京要对空进行战备。

黄永胜说完，周恩来指示他立即做出全军应急作战部署，并要求

中央所有领导人都要住在有防空设施的地方,以防苏联用原子弹突然袭击。为此,他做了如下安排:

一、周恩来、叶剑英、江青、黄永胜、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等人住人民大会堂,这里也是中央和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指挥所,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为战备值班室的总负责人。

二、李先念、李作鹏、邱会作、华国锋、余秋里住京西宾馆。

三、纪登奎住北京军区机关。

四、李德生住空军机关。

五、康生仍住玉泉山,暂时不要回钓鱼台。

最后,周恩来说:“毛主席的防空问题,由我向主席请示后再定。”

对山海关机场留下来的空军人员,周恩来指示:凡是到了山海关没有走的人,集中管理,这批人一律由海军李作鹏负责组织专门人进行审查,然后再处理。

同时,周恩来宣布:撤消三中全会的工作班子。这件事由邱会作负责处理。一、通知王良恩全会推迟进行,把工作班子一律撤消。二、把京西宾馆通往空军办公大楼地下室的防护门打开。一旦需要时,住京西宾馆的人可以进入地下室,经过空军地下室向外疏散。三、通知铁道兵在空军地下室通往地铁的出口处停一列火车。

周恩来派李先念和华国锋分别到总后勤部、海军司令部指导工作。邱会作负责京西宾馆的工作。

当他把所有紧急的问题都处理完了,最后郑重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全回到北京来了,并已进住中南海。”

江青说:“昨天下午,我已经到中南海把主席卧室的窗户打开了,换了空气。室内也做了卫生消毒处理。”

周恩来说:“啊!我是主席回到丰台以后,才知道这一情况的。”

李作鹏原定这天上午要到体委参加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乒乓球邀请赛领导小组会议,因为他是周恩来指定的组长。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他向周恩来请示:“是否还按计划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周恩来说:“一切按正常进行。”

李作鹏在大会堂吃了早饭后,离开会的时间还早,就坐在沙发上想睡一会儿,但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很乱,对周恩来刚才所说的一

切，他感到异常惊讶。首先对林彪的叛逃，太意外了。其次，“原来总理在12日夜早已知道林彪如此详细的情况，但是却没有向我透露任何蛛丝马迹，把我蒙在鼓里，茫然不知所措的处理机场问题。”李作鹏反复想着其中的缘由。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华国锋按照周恩来的安排，乘坐自己的红旗轿车缓缓驶进了海淀区西三环中路公主坟海军大院。海军司令部大楼里首长值班室里的值班首长是海军参谋长潘焱，已经得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他一边叫值班参谋以最快速度通知在家的其他几位海军首长到战备值班室，一边立即到大楼下迎接总理派来的全权代表华国锋。

在战备值班室里，华国锋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桌子上是能够直通周恩来的保密电话。华国锋面色沉静，默默的看着忙碌的参谋们，没有说话。

很快，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副司令员吴瑞林、周希汉、周仁杰，政治部主任张敬一等人都赶到海军战备值班室，个个面色凝重。

这时，我们再说周宇驰劫持的那架直升飞机，在怀柔沙峪的一个空地上空盘旋了5圈后，开始降落。当直升机降落到离地还有40米时，陈修文突然转身向周宇驰扑去，周宇驰连续向他开了两枪，把陈修文打死。

此时飞机完全失控，突然仰头，进入最危险的“尾冲”。陈士印试探性地向正前方推了两次驾驶杆，都没有将飞机改出来，第三次重复操纵，终于缓解了飞机的下降速度。但直升机最终还是尾部和右机轮先着地，陈士印迅速关闭发动机及点火开关。

6时47分，直升飞机歪歪扭扭地落在北京怀柔县沙峪公社景峪村荒草地上。于新野未待落稳，就从客舱中跳出，爬到前舱外面，将枪口紧贴窗口玻璃向陈士印开枪。陈士印凭感觉迅速躲了一下。于新野的子弹在陈士印的两件飞行服中穿了四个洞，击中周宇驰的手腕，鲜血溅到陈士印的脸上，他就势躺下装死。

一会儿，周宇驰浑身是血走下飞机，骂于新野为什么乱开枪，说：“那个飞行员故意制造罗盘故障，实际离北京没多远，我把他打死了！”

接着，李伟信也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3人

就往山上跑,一直到累得跑不动时才停下来。周宇驰说:“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他还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说完这些话,周宇驰就把带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撕碎。

于新野对周宇驰说:“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

当周宇驰喊过“一、二、三”后,“砰!砰!砰!”三声枪响,可是倒下的只有两个人,原来是李伟信把子弹射向了天空。看到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个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伟信收起了枪,用上衣裹好,走出玉米地,找到了附近干活的社员民兵……

9月13日这天早上,怀柔县军代表、革委会的副主任杨发勋刚刚起床,便接到县革委会值班室的电话,值班员说:“沙峪公社阎副书记打来电话,说一架飞机降落在渤海所村南和景峪村北处。”

杨发勋立即和县里的几位领导紧急商议,认为不是国内飞机出了意外事故,便可能是外敌的侦察飞机入侵,不论哪种可能,都要认真对待。当即决定:一是由杨发勋和武装部朱部长迅速赶赴现场,查明情况。二是迅速报告北京市委和卫戍区,并通知当地驻军。

杨发勋他们随即乘坐北京吉普车向渤海所村驰去。为了防止意外,他们带了一个警卫人员,并备了一支冲锋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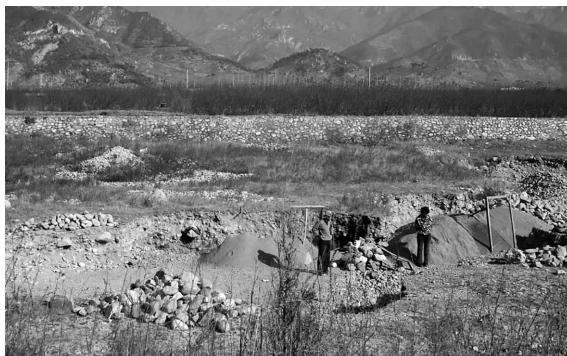
县城距出事地点并不太远,不大功夫,他们便来到了渤海所村头。这时村边已聚集了很多人。车子刚停下,便看到了好几个民兵手持镰刀和砍刀,押着一个30来岁的男子过来。这人上穿白色长袖衬衣,下着蓝裤子,右腋下夹着裹着手枪的绿色军上衣。一看外表,就知道此人是空军的一名干部。

不等杨发勋他们询问,他便主动自我介绍说:“我叫李伟信,是上海空军部队的一名干部……”并说这架坠落的飞机上共有5人,两个人在旁边玉米地自杀了。他们要叛国出逃……

杨发勋他们来不及细作审问,立即命令刚赶到的县公安局的人将他带往大队部,便向现场奔去。

渤海所村南和景峪村北有一条不大的小溪。此时一架标有军徽

的3685号直升机，坐南朝北，横骑在河床上，直升机的四周十几米外，守护着手持农具的民兵们。因为防止文革武斗，民兵们的武器已全部收入仓库。杨发勋和朱部长走近飞机，粗略地看了看。



怀柔渤海所，3685 直升机的迫降地

前舱一名年轻的驾驶员伏身在驾驶坐位上，胸部被子弹射穿，鲜血染红了衣服和座椅。右边是另一名驾驶员的位置，椅子的靠背上也有穿过的弹洞，看样子在此之前机上曾有一场激烈的拼杀。

民兵告诉他们，飞机上下来的人到南边景峪村去了。杨发勋

他们又赶到生产大队部。知道这人就是副驾驶员陈士印，他已经向沙河机场，他的上级机关打过电话。杨发勋他们问了问情况，陈士印说他是飞行大队副大队长，奉命执行任务，并说飞机是要叛国出逃，还说了一些其他事情。

民兵又告诉杨发勋，他们在玉米地里发现了两具尸体。于是杨发勋他们又赶到了发现尸体的玉米地里。

在飞机坠落处西北方向大约 500 米处，一块长得很茂盛即将成熟的玉米地里，躺着两个身着空军服的男子，他们并排头东脚西地躺着，每个人手边都有一支手枪，每人的太阳穴上都有射穿的洞，喷溅的血洒得满地都是。两个人中，一个较胖，且秃顶，年约 40 多岁；一个较瘦，年约 30 多岁。那个胖子右手腕出了一些血，用手帕裹着出血处，还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黑凉鞋。从他们身上带着的证件知道，那个胖的就是周宇驰，另一个是于新野。

很快，北京卫戍区警卫 3 师副师长胡世寿乘坐一辆嘎斯 69 吉普车来到现场。

第 1194 回：迫降场，拒其他部队进入 回家后，胡世寿夜难入寐

13 日早晨 5 时，警卫 3 师副师长胡世寿像往常一样到大操场，准备出操。师长张良友叫住他，说：

“刚接到吴忠司令员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电话，怀柔北部山区上空有一架直升机要迫降，要我们 3 师立即派人去处理。”

张师长还交代：“机上人员要是活的，不能让他死了；如果死了要看好了。对直升机上的东西，如文件、武器要看管好。”

胡世寿立即去办公楼，准备打电话通知 7 团派一个连去现场。途中，碰到司令部坦克科参谋杨景庭拿着腰带正准备出操，胡世寿立即叫住他跟自己一起去执行任务。当他们快走到办公楼时，又碰上副参谋长曹玉培，胡世寿当即叫他通知 7 团去一个武装连，紧急到怀柔北部山区。

胡世寿和参谋杨景庭随即坐上嘎斯 69 吉普车出发了，此时还不到 6 时。他俩都没有带武器。胡世寿命令司机时速 80 公里。怀柔地区的道路还算平整，只是窄一些，好在清晨没有什么车辆，他们很快到达怀柔西边的渤海所。

当他们赶到直升机迫降的河滩时，7 团的武装连还没有赶到。只见一块四面环山的小盆地里停着一架直升机，周围全是拿着锄头、铁锹、棍子的民兵和老百姓，人山人海，大声喊叫着抓特务。见到部队的首长来了，他们七嘴八舌的对胡世寿说，直升机是早晨来的，然后降落的，声音非常大，而且直升机在空中抖动不止。

胡世寿他们来到直升机现场，看见直升机上有一个飞行员歪倒在驾驶舱里，又查看了附近玉米地的两具死尸。胡世寿问村干部有没有活人？众人七嘴八舌地说：

“有两个活人，一个到了沙峪，一个在渤海所。”

胡世寿将现场交给民兵看守，嘱咐任何人都不能靠近直升机，然

后去了沙峪。他在大队部看到一个穿空军服装的人，正在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报告他们迫降在怀柔山区。

胡世寿简单问了他几句。那人说他叫李伟信，是空4军秘书处处长，在林立果身边工作，还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去乌兰巴托求援……”

胡世寿听了觉得是天大的玩笑，立即命令把李伟信捆起来，关进嘎斯车里，由杨参谋看管，不能让他胡说八道。然后他一人去了渤海所大队部，在民兵的帮助下，把另一个活着的飞行员陈士印也捆了起来。

这时，警卫3师7团副团长王德胜带着该团5连两个排赶来了。胡世寿首先向王副团长宣布事故性质严重，命令道：“你们任务也非常重，首先把两个犯人看管起来，不能让他们自杀，也不能让他们跑了。如果犯人逃跑，只能打断他的腿，决不能打死。”

接着，胡世寿派部队切断渤海所至怀柔的公路，切断沙峪至九渡河公路。然后迅速回到直升机现场，向老百姓宣布：“事情性质很严重，请大家远离，不要靠近直升机，保护好现场。”

这时，怀柔县革委会主任张满、副主任杨发勋、怀柔县公安局局长李军、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警卫3师7团团长张前进也都赶到。胡世寿召集他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一、事件是严重的，属于什么性质尚不清楚，但涉及国家机密；二、请召集大队干部，动员群众回去搞生产；三、不要传播谣言。这件事情关系国家大事，谁传谣就是造谣惑众的问题。现场由部队看管，别人都离开，决不能出任何问题。”

他同时向在场的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县公安局的干部，包括法医、记者宣布：“此次事件有关大局，是机密大事，问题尚不清楚，第一不得外泄，第二请将拍摄的胶卷交出来，待问题弄清楚了再还给你们，或者自己曝光。目前我们对总的情况没有接到上级通报，北京卫戍区规定我们执行具体任务，其他无可奉告。这是国家大事，请予合作。大家不要在现场停留，都请立即回去吧。”

9时左右，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刚来到渤海所，胡世寿向他报告了迫降直升机的大致情况，已出现的问题和处理情况，并带他察看了现场。

李刚指示：开设指挥所，对现场出现的新情况要及时上报。

根据刚的指示，胡世寿立即调用渤海所大队的电话，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通信处与北京市电话局、中南海电话局协调，将人民大会堂至渤海所的电话调为专线，沿途支线停止使用，保障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与渤海所的通信畅通无阻。并由县革委、县武装部和卫戍区当地驻军三方代表组成现场指挥小组，具体负责现场工作的指挥和调度，现场总指挥是李刚副司令员。

部队很快从民兵那里接管了现场的警卫，并封锁了该地区。

电话开通后，吴忠接到李刚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说迫降的直升机找到了，上面有一个死人。抓住了两个人，一个叫李伟信，一个叫陈士印。发现两具尸体，问李伟信，说是周宇驰和于新野，在高粱地里自杀了，正在继续清查。

这时，总政保卫部部长徐海涛坐着奔驰车来了，说是总政主任李德生要他来了解一下情况。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胡世寿告诉他：“我们是看管犯人，保护好现场，没有提审犯人的权利，无情况奉告。你要看可以隔200米，远距离观看，不可以进到现场。”

徐海涛看了看外部情况，提出要回去。胡世寿让五连副连长李友清把他送到团部休息，要团长热情接待，实际上把他“软禁”起来。因为在当时那么复杂的情况下，胡世寿搞不清这位保卫部徐部长是真是假。

空军沙河机场警卫连连长带全副武装的一个班也乘一辆大卡车来到此地，说奉首长命令来处理直升机事。

卫戍区李刚副司令不准他们接近飞机，同时向吴忠报告。

吴忠觉得不对：“总理布置任务时没说要空军配合啊？”他立即告诉李刚：

“一定要非常客气、非常礼貌，很好招待这支空军部队，请他们吃饭；第二条，请他们把武器放下来，否则混战一场，或者把材料毁掉了，怎么办？要是问谁的命令，就回答是卫戍区的上级。”

接着，吴忠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情况和他的处置。周恩来说：“好，就这样办。”

怀柔这边，李刚问那位空军连长：“知道卫戍区有规定，不经卫戍

区批准，部队行动不能携带武器吗？”

那位空军连长说：“不知道。”

胡世寿问他：“知道是什么事故吗？”

那位连长依然说：“不知道。”

胡世寿对那位空军连长说：“一、你不知道是什么事故；二、这个地区属于北京卫戍区的防区，友邻部队全副武装来，要事先联系或得到有关部门通知方可进入；三、你们莫名而来是不符合规定的。”

李刚让胡世寿收缴空军这些人的武器，并将他们带到当地卫戍区部队警卫3师的营房休息待命。

当胡世寿让空军这一个班人把武器放下时，其中一名空军战士说他枪里有子弹。胡世寿马上命令他们向后转，退子弹，枪放下，随后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但是，此时胡世寿身边已无部队可用，怎样将这空军的一班人送到警卫3师呢？恰在这时，3师7团卫生队军医马志军带救护车来到现场，胡世寿大声叫住他：

“马军医，把这个班送到你们营房，要团里安排他们休息吃饭。”

吴忠接到李刚第三次电话报告：“李德生主任打电话来，让把人、枪、文件等一切东西马上送到空军司令部。”

吴忠依然觉得不对，对李刚说：“不能送到那里，要派得力干部，足够数量的武装，绝对保证安全，马上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当面交给我！不能送空军大院！”

放下电话，吴忠马上报告周恩来：“李德生主任未经过我们，直接打电话给李刚要把抓的两个人、武器弹药和文件一起立即送到空军大院，因空军大院情况不明，我已告诉李刚派得力干部和足够数量武装，绝对保证安全，立即把人、枪、文件送到卫戍区交给我。”

周恩来说：“这样处理好。”并要求人一到，吴忠和杨俊生立即审讯李伟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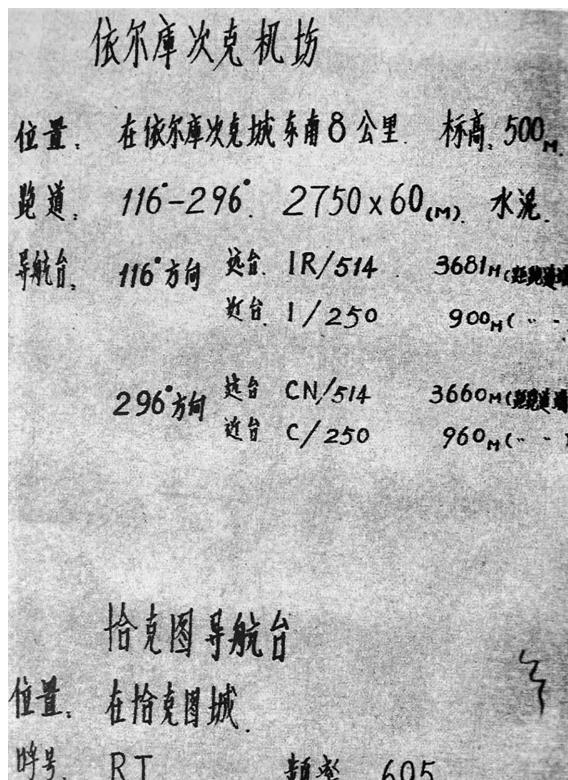
按照吴忠的指示，上午11时左右，警卫3师副师长胡世寿将7团长张前进、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请来，交代他们每人押送一人，直接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二楼，交给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两位首长。他说：

“你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中途不能停车，不能让空军把人抢走；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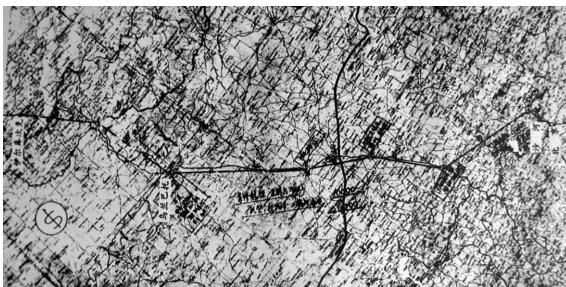
二、要绝对保证安全,如果犯人逃跑,可以打断腿,决不能打死,一定要把活人送到卫戍区;第三、送到后你们直接回部队,掌握部队,做好战备工作。”

与此同时,李刚指挥对直升机立即进行彻底的清查,并一一进行登记和拍照。

怀柔县革委会副主任杨发勋是第一个登上飞机的。在驾驶室里,他们搜出了一幅“北京——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茨克”的航行图,在周宇驰的座位上还发现了一张苏联伊尔库茨克机场导航资料和图表数据。



苏联伊尔库茨克机场导航资料和图表数据



“北京——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茨克”航行图

飞机的后舱，有几个军用背囊里面装满了中央和军队的各种绝密文件，还有小型录音机和一大笔美元。那时人们大都没有见过录音机，所以谁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乱拨乱按，结果弄响了。在场的李刚副司令员急忙叫关起来，可是谁也不会关录音机，老是在响。最后有人试图用急救包的绑带把它绑起来，无意中碰到开关，这才不再响了。

此外，在舱里还有一只木箱，装有一支冲锋枪和数百发子弹，整个飞机除在前舱玻璃和舱壁上有几个枪眼外，其他都是完好的。

驾驶员陈修文，没有穿飞行服，只是穿了一身普通的空军夏服，上衣兜只有一个空香烟盒，裤兜只有一条手帕。

周宇驰和于新野他们身上也没带什么东西，只是各带两支手枪。

这时，空军驻怀柔导弹师政委带着该师的陈参谋长也来了。他们途中与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相遇，朱部长简单介绍了情况，他们也看了两具尸体的现场，当他们准备走进直升机现场时被胡世寿拦阻，把他们让到生产大队的一间空房里，问他们是奉谁的命令来的？

他们说是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指示，让他们了解现场情况。

胡世寿又问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事故吗？”

他们说：“不知道。”

胡世寿说：“既然不知道，请两位坐下休息。”

他们提出要回去。胡世寿说：“不要急，待我报告后再作安排。”

过了20分钟，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指示，现场由北京卫戍区处理，让他们回去工作。

李伟信和陈士印被带到卫戍区后，吴忠和杨俊生带着秘书，叫上副政委邹平光立即对他们进行审讯。审讯中，李伟信提到了《“571”工程纪要》，吴忠以为是工程上的东西，于是拍着桌子骂李伟信说：

“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

吴德当时也在卫戍区，吴忠审完李伟信后对他说：“这小子他妈的不老实。”

审问陈士印也没审出什么。

下午14时，清理直升机现场的人员才去吃午饭。吃饭时，大家议论起周宇驰自杀的狼狈样子，只穿了一只鞋子。有人建议，应该马上把另一只丢失的鞋子找回来。几位领导也觉得，作为现场的物证材料，能够找回来当然更好。于是，由一位亲眼见到他们行走路线的民兵连长带路，几名战士便去寻找那只丢失的凉鞋。

因为周宇驰等人离开飞机也只跑了几百米，那只丢失的凉鞋很快便找到了。但是在找鞋的路上，大家发现了许多被撕得粉碎的纸片，几个有心的战士把凡是能找到的纸片，都一一地搜集回来，用信封装好，一并呈送北京卫戍区领导。

下午15时后，上级来电话指示，要求把现场3个死者送到警卫2师医院的太平间。

黄昏时分，吴忠报告周恩来：“正在搜查材料，对空军部队准备发还枪支，让他们回去。”

周恩来说：“加一条，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晚上19时，直升机现场交警卫3师7团副团长王德胜负责指挥，李刚等人把收缴的文件和武器弹药装上车，直接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二楼会议室。吴德和吴忠正在那里在等着他们汇报。

李刚让警卫3师副师长胡世寿汇报。于是，胡世寿从接到电话后，早上5时30分出发讲起，说到听李伟信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等去乌兰巴托求援”的话，予以制止，又讲了陆续处理公安系统来的人，以及沙河机场警卫连长，空军驻怀柔导弹师政委、参谋长，总政保卫部徐部长等一系列问题。

汇报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晚上 22 时,李刚副司令员请胡世寿到食堂吃晚饭,喝茅台酒。

饭后,胡世寿回到警卫 3 师办公楼,师长、政委和师其他领导此时都集中在作战室,等着他讲情况。因为吴德和吴忠特别强调:“你们没有传达任务,要保密。”司令员吴忠还特别对胡世寿说:“你回去抓部队战备工作。”所以胡世寿只说“一架直升机出政治事故,北京卫戍区领导要我们抓好战备工作”,没有多说。

回到家后,胡世寿怎么也睡不着,当天接触到的事情实在让他震惊。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章明确写着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犯人李伟信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去乌兰巴托求援?北京卫戍区领导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究竟是李伟信撒谎,还是确有其事?……

李伟信很快被押送到李德生这里。

“文件呢?”李德生问押送李伟信的卫戍区干部。

“直升飞机上有大批绝密文件,有北京至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次克的航行图,有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台资料,还有大批 100 元、50 元面额的美元,都已由专人保管。”押送的卫戍区的干部回答。

“在死者的尸体上,有没有发现什么文件?”李德生问。

“都已搜查过,有文字的东西,全部收拢在一起。”来人回答。

李德生、纪登奎立即对李伟信突击讯问,首先了解沙河机场所说的“林彪手令”一事。

李伟信说:“我是负责保管箱子的,那个‘手令’,一直由周宇驰收藏,确实不在我手里。”

可是,在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文件中没有发现林彪的手令,只有警卫 3 师的战士在找周宇驰另外一只鞋时收集的那些纸片。

周恩来得到李德生、纪登奎的报告后,要求北京卫戍区组织民兵,在直升机迫降的现场和周宇驰自杀的周围进行拉网式的寻找,一定要把散落在田野里的碎纸片,统统收集起来,全部上缴。

9 月 14 日上午,卫戍区警卫 3 师副师长胡世寿又带着五连一排再去直升机迫降现场查找碎纸片。不巧 9 月 13 日夜里下了雨,增加了

寻找的难度。秋季的田野，庄稼还没有完全收割，沟沟垄垄，坑凹不平。在包围直升飞机时，又经过多次践踏，找大大小小的纸片，确实很难。民兵们分工负责，一小块一小块地“过筛子”，陆续把散落在地表的、踩到土里的，大大小小几十块碎纸片，收集起来。

第 1195 回：飞机场，全部被陆军占领 召总长，部署战备诸事宜

9月13日清晨，时念堂给吴法宪打电话报告说：“毛主席那里的警卫部队，要派人进机场，给毛主席打野兔子吃。”

吴法宪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都什么时候了，只好叫他们去打一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吴法宪把周恩来的指示向时念堂作了传达。

不久，周恩来又打来电话告诉吴法宪：“已经决定对空军的机场、海军的码头各进驻陆军一个营，以保证安全，防止外逃。”

吴法宪表示同意，并说：希望立即这样做。

9月13日5时许，专机师34师各团全体官兵被“紧急集合”声唤醒。集合后，他们在一名陆军干部的陪同下，听到了以下命令：

- 一、从今天起，所有飞机禁止升空；
- 二、任何人不准跨入机场；
- 三、全体人员禁止外出；
- 四、离开宿舍楼必须3人以上结队，任何人不得在营区私自走动；
- 五、禁止使用电话、电报、通信等方式和外界联络；
-

34师的官兵一下被禁闭在自己的宿舍楼里，连吃饭从宿舍到饭堂的路上都在陆军弟兄们的监控之中。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异常；所有的人都知道34师出了大事了；但出了什么事？没有一个人说的清楚，包括34师那么多的高干子弟，也迷茫的不知所以……

不能进机场，飞机不能修，也不能飞，所有的官兵一起床就学习，读《毛选》、学《马列》，从9月13日起，之后的一个多月里，34师的官兵就是在这种近似俘虏营的日子中渡过的。

按照空军的规则，飞机是要定期进行检修、保养、运转的。“不怕

动,就怕停”。任何型号的飞机最长在一周之内要启动发动机运行一下。否则,发动机上润滑系统就会干涸,操作的关节部位就会生锈,甚至于抱死,一个多月时间,飞机纹丝不动,34师的飞机就有全部报废的危险!

34师的师级干部全部被隔离,从陆军来了一个政委、一个副政委主持34师的工作,但他们对飞行一窍不通。

34师各团机务处、师工程部向空军司令部主持工作的李德生打报告要求对所有飞机进行机械日维护。李德生不敢做主,请示周恩来。周恩来亲自批准,允许34师机务人员进入机场,对飞机进行检修。

一进机场,地勤人员都开了眼界,南苑机场哪里还像个机场?简直是陆军的现代化阵地,到处是陆军的军车,机场美丽的草坪被挖了无数个散兵坑机枪掩体,像一座座坟包从地面鼓起。所有的枪口都对着飞机。原先在机场负责警卫的机场警卫连战士一个也不见了,手持冲锋枪、自动步枪的陆军士兵密密匝匝地机场游弋。可怜一排排的飞机,活像被看押的一个个俘虏……

按照惯例,地勤兵解下了蒙布,插上了地面电瓶,用轮挡将飞机挡好,搬动螺旋桨,准备试车。就在这时,对面的掩体中一下子冲出来十几个陆军战士,端着上了刺刀的自动步枪向他们扑了过来,一个个用刺刀逼着他们喝到:“不许动,再动我们就开枪了”。

“怎么了?”莫名其妙的地勤人员问这些愣头青似的陆军士兵。

“这么大的飞机,开起来跑了怎么办”陆军战士中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

“跑不了,你看,每个轮子前都有轮挡着呢。”地勤人员赶忙解释。

这个干部低头看了看轮挡说:“这么小个东西能挡住这么大的飞机?笑话,骗鬼去吧!”

“你说,怎么样你才放心。”地勤人员问道。

“捆起来绑紧就跑不了。”那位陆军干部说。

无奈,只好找来一捆麻绳,将飞机捆绑了一番。

这十几个陆军战士左看、右看还是放心不下,最后将维修飞机使用的方梯,一个个摆在飞机的前面,才让他们试车。随着发动机的起动,一帮士兵端着枪,掩体里的机枪瞄准驾驶舱,直到试车完毕,这

帮陆军兄弟们才将紧绷的神经松开,放下了武器……

9月13日早上7时30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将电话打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秘书钱嘉东接的电话。丁盛在电话里说:“请报告总理,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听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周恩来的秘书将丁盛的电话内容电话报告了周恩来。不一会儿,正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卫士张树迎打回电话:“总理让纪东带上丁盛的电话记录,立即到大会堂去。”

上午8时左右,纪东来到人民大会堂,直奔周恩来所在的东大厅东侧北端小厅,看见周恩来正在打电话。纪东把丁盛的电话记录递上去,周恩来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对纪东说:“你不要回去了,从现在开始,你跟着我处理事情。”

这时,卫士张树迎提醒纪东说:“不要给家里(西花厅)打电话。总理召见人,你在他身边时,机灵一点。”

256三叉戟在雷达屏幕上消失后,周恩来命令三北地区、总参三部的所有技术侦查部队全部开机侦听。根据空军、总参等有关部门报来的情报,在林彪乘坐256三叉戟出境的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两边的地域内,蒙军的雷达联络频繁,情况异常。周恩来让秘书纪东通知空军、通信兵和总参有关部门带相关资料和地图到大会堂东大厅汇报。

周恩来秘书纪按照周恩来卫士张树迎的要求,破例参加这个汇报会,他心里有些紧张。与会人员他都不认识,而且是周恩来一个人听取汇报,里面也只有纪东一个工作人员。他按照周恩来卫士张树迎的提醒,打破常规,坐在周恩来身后离他最近的位子上。周恩来看地图时,他也站在他的身边。一是担心周恩来身体万一支撑不住,他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反应;二是怕有心怀叵测的人有什么动作。后来知道,那天参加汇报的人员中,还真有空军的一人与林立果有关系。

上午9时左右,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周恩来吃了一碗面条和一个包子。随即又召集政治局委员、军委和总参作战部的人到大会堂东大厅开会,分析由于林彪外逃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制定紧急方案,调整部队部署,重点是应付外国势力的入侵,并拟定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

上午9时，南京军区作战部向许世友报告：陆军部队已进驻机场，卡车按规定在跑道上排好。有的机场干部欢迎陆军进驻，还给安排了房子；有的有点抵触情绪，问“陆军为什么来控制我们机场？”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可疑情况。许世友叫秘书马上接通北京的电话，他要直接报告周恩来，同时还想了解一点林彪逃跑的具体情况。电话没有找到周恩来，许世友又让秘书找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总机很快把电话接到空军作战值班室，许世友对李德生说：

“请你报告总理，我们已按他的指示部署下去了。陆军开到机场，大卡车停在跑道上，万无一失。”接着，他又一字一句说道：“李德生同志，你一定要好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林彪外逃，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9月13日早上7时多，李德生从空军大院来到了西郊机场。在候机室小电话间，他同吴法宪、杨德中谈了两个多小时后，又回到空军党委会议室，和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曹里怀等人在一起，回顾这几个小时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

李德生说：“请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三叉戟飞机不经过正常手续，居然能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北戴河；总理追查的时候，竟然没有人知道？”

李德生首先问曹里怀副：“你是值班首长，你知道吗？”

曹里怀连声说：“我24小时在指挥室，确实没有接到任何报告。”

李德生又问大家：“这么大的事，谁能够有权放飞？”

大家分析了几个人：

1、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他可以直接向西郊机场发命令；

2、副参谋长胡萍，他兼专机师34师党委书记，专机师的飞行任务一般都是由他具体向下布置的，他可以直接向34师下令；

3、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林彪。因为这架飞机是林彪专用的，他也可以直接给这架飞机下任务。

李德生确定，要从这几个方面的线索，一个一个地查下去，特别是胡萍那里，无论是吴法宪，还是林彪，派飞机的时候，要避开胡萍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指定可靠的人负责，既要迅速，又要保密。

中午12时，吴法宪向周恩来请示：“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周恩来说：“你在西郊机场再待一会，我派李德生到西郊机场来协

助你，回头我再通知你怎么办。”

不久，李德生又来到了西郊机场。

12时30分，周恩来通知吴法宪和李德生、杨德中一起到人民大会堂。离开西郊机场之前，吴法宪跟李德生、杨德中商量，是否让胡萍先回301医院？李德生同意。

在候机室，吴法宪拍着胡萍的肩膀说：“没有你的事了，你回医院休息吧。”于是叫秘书用吴法宪的汽车把胡萍送回医院。

这天，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因为这几个人手握军中大权。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看他们10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这时，中南海、钓鱼台已经都是枕戈待旦了。院子里面的车道上，都是钉满钉子的大板子、铁丝网、路障。这浓浓火药味，和院子外面群众准备迎接“十一”的喜庆氛围，截然霄泥。

下午13时过后，吴法宪、李德生、杨德中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张春桥已经先到了，他们两人同吴法宪、李德生紧紧握手后，周恩来对吴法宪和李德生说：

“政治局准备集体办公，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在人大会堂，李先念、李德生、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康生、江青在家里，汪东兴保卫毛主席。”

这本来是9月13日当天清晨政治局会上确定的，当时吴法宪和李德生正在空军，没有前来参加会议，周恩来这时是告知他们。

接着，江青和黄永胜走了进来，他们和吴法宪、李德生握手后，江青拿出一副扑克，要张春桥、黄永胜和吴法宪一起打牌。

吴法宪很奇怪：“都什么时候了，还打牌！是想试一试我们的心情吗？反正我心里没有鬼，打就打！”

就这样，他们四个人一起打牌，结果吴法宪和黄永胜一头赢了。打完牌，江青就出去了。

不久，周恩来进来，要黄永胜准备一下全军的作战部署，同时要吴法宪准备一下空军的战备资料，准备晚上开会研究，并让黄永胜和吴

法宪通知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员也一起来参加研究。

13日下午，李德生又和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曹里怀商量，在个别调查的同时，必须发动群众展开清查工作。李德生认为，空军出了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一点消息不走漏，与其让小道消息传播，不如向群众讲清可以讲明的事情，这就有可能揭发出更多的线索。周恩来同意了他的意见。

李德生立即召开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大部门负责人会议，宣布空军有两架飞机出了大事，空军机关处于紧急战备状态，所有人员到办公室待命，不得外出，不经请示不得对外联系。加强各级党组织的作用，以部门为单位，实行部门首长集体负责制，组织学习。同时按级负责，弄清这几天每个人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要求大家有什么重要情况和问题，可以在正式会议上反映，也可以个别汇报。李德生在普遍布置的同时，重点掌握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作战部等几个要害部门的动态。

当天下午，空军参谋长梁璞打电话召空军司令部警卫营营长田广林马上过来。

田广林，1956年兵，参军就在空军司令部警卫连，军事技术超一流。以后警卫连扩大到警卫营。1970年，田广林从警卫营一连连长直接提升为警卫营营长。他是空军司令部党委委员，也是警卫营党委书记。此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组织警卫营军事集训，他放下梁璞打来的电话，立即要了车，来到空军大院指挥所。

梁璞一见田广林，劈头第一句话就说：“跑飞机了。”

田广林心想：“跑飞机与我有什么关系？”

是啊，他只是个警卫营营长。梁璞大概猜到田广林的心理活动，第二句话说：“林彪跑了！”

田广林这才吓了一大跳，第一个感觉是不相信，他小心地说：“首长，你是不是听错了？”

梁璞严肃地说：“这是周总理亲口告诉我的，不会错！你们警卫营有没有问题？你威信怎么样？”

田广林说：“警卫营没问题！”

“你敢保证？”

“我敢保证！我向周总理保证！”

“出了问题要你脑袋！一定要绝对保证！”

田广林回到营部，按照梁璞的交代，立即召集警卫营排以上干部开会传达。所有的排长、连长都像田广林一样，不相信，可能吗？全都迷惑了。田广林说：“我讲的这些不要传达，大家心里知道就行了。现在是非常时期，各连进入一等战备。干部要把情况掌握好，我们警卫营要保证绝对不能出问题。”

虽然是一等战备，但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空军大院门口仍像平常一样，还是双岗。在北京所有的军队大院里，空军大院的警卫最严格。不仅进门要证件，出门也要证件，否则你根本出不去。

9月13日下午，周恩来让秘书纪东通知总参的5位副总长彭绍辉、王新亭、张才千、陈继德、阎仲川到大会堂新疆厅参加政治局召开的作战会议。当总参5位副总长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就感到气氛异常。周恩来面带倦容，但表情严肃，坐在沙发上。见到他们5人，周恩来免除了平时不可少的寒暄，对他们一耸肩，两手向外一摊，突然说了一句：“哼！副统帅，跑了。”

5位副总长一下都愣了。周恩来突然用烁人的眼光望着阎仲川，直呼其名：“阎仲川，林彪逃跑以前你听到点什么风声没有？”

当阎仲川刚听到周恩来说“副统帅，跑了”时，脑袋已经轰的一声，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此时听到周恩来问到自己头上，他反而冷静下来，简单地摇了摇头说：“没有。”

周恩来没有再问下去。他通报了林彪叛逃的情况，并拟定了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对北京地区的军队部署、京郊机场的军管及机动兵力的安排也作了布置。他要求5位副总长：坚守岗位，加强值班，着重要求切实掌握主要敌对国家的政治、军事动向，严格掌握部队，保证不出乱子。他严肃郑重地说：“我现在考虑的第一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还是打仗！”

第 1196 回：问电话，李作鹏修改记录 侦听到，蒙古有飞机坠毁

9月13日下午，山海关机场报告：“从沈阳方向，有一架飞机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是否可以？”

李作鹏立即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回答：“不可以，关闭山海关机场。”

李作鹏将周恩来的指示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令其立即关闭山海关机场，不允许任何飞机起降。

下午15时，周恩来在大会堂再次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他宣布：军委办事组暂时离开西山办公。

周恩来问黄永胜：“林彪去过西山你们办公地点没有？”

黄永胜回答：“去过。”

周恩来说：“为防止苏修导弹袭击，军委办事组人员分散一下，黄永胜、吴法宪在大会堂同我一起处理军队日常问题，办事组其他人员回家办公。”

周恩来说的“回家办公”，即回各自单位。

16时多，会议结束。

散会后，李作鹏回到西山。一下车，他就通知刘秘书：“准备一下，下山办公。”就是回海军大院办公。

虽然一天一夜只睡了两个小时，李作鹏很疲倦，但此时的他一点睡意都没有。他妻子董其采给他沏了一杯茶，李作鹏一边喝茶，一边小声告诉老伴：“出大事了，昨晚林彪、叶群乘空军飞机外逃啦！”

他们一边谈论林彪外逃的事，一边清理昨晚与周恩来、与机场前前后后通话的过程。

17时左右，李作鹏的秘书刘继祥拿着一份报告进到办公室，是海航5师整理的《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海航5师是用电话报告的，刘继祥秘书做了电话记录。

此时,李作鹏夫妻正在回顾清理昨晚的情况,正好可以参照一下山海关机场的报告。于是李作鹏就让刘秘书念他记录的报告。

当刘秘书念到:“23时35分,李政委向机场调度室值班员传达总理指示,并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时,李作鹏点头说:“对!”

当刘秘书又念到报告中记录着:“0时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要负责任。”时,李作鹏立即打断刘秘书的话,说:“不对!这次电话记录不对。”

李作鹏告诉刘秘书:“这次我打电话,强调的是要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起飞。”

念完报告后,李作鹏对刘秘书说:“你与他们再核实一下我的讲话,不要记录错了。”

李作鹏的秘书刘继祥打电话找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李万香更正李作鹏的电话内容,他说:“李政委说的是4个首长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不是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他要李万香好好想一想。

李万香回答:“两次电话从未说到联名指示的问题,我是这样听的,也是这样记录的。”

晚饭后,李作鹏在海军407楼办公室中看文件,刘继祥秘书拿着海航5师的那份报告进了办公室,对他说:“我已打电话与机场核实了,你0点06分的那次电话指示,机场值班员根本没有听清楚。他们说没有听清楚首长指示的原因,一是当时调度值班室人很多,电话也很多,很嘈杂;二是首长的口音重,听不太清楚。他们就把你23点35分的电话指示又重复的追记了一遍。”

刘秘书又说:“这个报告,是航5师张师长今天上午从锦西师部赶到山海关机场,听完汇报后整理的,张师长对昨晚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李作鹏让刘秘书把报告放在办公桌上,准备再看一遍。

他看到报告中记录的原文是:“0点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要负责任。”

李作鹏将报告中他讲的这段话作了修改。修改后全文是：“0点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

修改之后，李作鹏立即让刘继祥秘书用电话同山海关机场再校对一下。经双方再次校对后，刘继祥秘书报告李作鹏说：“校对结果同你修改的完全一致。”

刘继祥秘书将报告重新誊抄后送李作鹏。李作鹏重又阅读了一遍，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就在这个文件头上写上：“呈总理批示”。

几天后，周恩来在李作鹏的这份报告上划了圈，一字未改，在一次政治局会议后退回给李作鹏。李作鹏将这个文件交给刘继祥秘书存档保存。

13日下午18时，邱会作去京西宾馆处理周恩来交代的几件具体工作。一、交代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撤消三中全会的工作班子；二、交代总参管理局副政委安排李先念、李作鹏、华国锋、余秋里等人的住宿；三、打开京西宾馆地下室通往空军地下室的大门。邱会作是京西宾馆的防空总指挥，他亲自走了一遍，预先察看了路线。

当晚21时，邱会作又从总后大院来到京西宾馆，检查了李先念等人的住宿。此时，他们都睡下了，邱会作只在每人房门口同他们说了一句话。最后敲李作鹏门时，他还没有睡，邱会作约他到会议厅的休息室聊天。

邱会作问：“林彪真的叛国投敌了吗？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事呀！”

李作鹏说：“从现在看，走掉了已经是事实了！今后在这件事上的性质，也是要看怎么说了，是方是圆都由人说了。”

邱会作同意李作鹏的看法，他说：“如果他自己决心要走，临走的时候，下几道命令，在短时间之内也会大乱的呀！林彪走的原因，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以我的估计，还是高明夫人脑子想歪了，把林彪搞走的，真是糊涂透顶了。”

李作鹏说：“这个问题，我也这样想过，但现在还无法自圆其说。”

邱会作：“关于林彪的问题，我们是否要向主席、中央写个报告？”

李作鹏：“报告是要写的，但写什么就是难题了，我们什么事也没

有。要说有事，也就是得罪了江青。这样写，别人会相信吗？看看再写吧。”

邱会作：“江青他们几个的鼻子要长到脑门上了，他们真神气！”

李作鹏：“事实上，他们不光对我们神气，对总理和其他人照样神气。”

邱会作：“他们神气，我们受气。”

两人一直聊到次日凌晨3时。

13日晚上21时，周恩来召集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一起开会，先听取阎仲川的汇报，然后又听了吴法宪的汇报。听完汇报，黄永胜提出，南口方向没有部署部队，这是一个空隙，应该立即调一个师去加强南口的防御。

会议开完，已经是9月14日凌晨3时30分左右了。周恩来要黄永胜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住在西大厅，要吴法宪和他一起住在东大厅。

9月13日晚上，原来看管陈伯达的几个警卫，突然被换了岗。到了深夜，又有几个没穿军装的彪形大汉闯进陈伯达住的房间，不容分说，架起他就走。门口早有一辆汽车等着，他们把陈伯达推上了汽车，汽车就开了。停下后，陈伯达下了车才看清，这里是秦城监狱！就在陈伯达被架进关押他的牢房里时，他突然挣扎着高叫道：

“你们要转告毛主席，转告党中央，我陈伯达在阜平时，是做过一件好事的！我不是国民党特务！”

原来，陈伯达看到，这是一间没有窗子，条件特别差的小牢房，屋里没有床，没有桌子和椅子，地上只有一个旧草垫子，陈伯达只能躺在平地上。他想，把他一个堂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关在这样的牢房中，那是必死无疑了。

刚被关进秦城监狱时，陈伯达吃的是粗粮和菜汤。可是没过几天，他的待遇就大大改善了。监狱方面安排他一个人住到三楼的一间大屋子里。这间屋子里各种设备一应俱全，窗子敞亮，可以看到很远的景色。而且，整个三楼只住他一个人，他可以在三楼内自由走动。这里每天有各种报纸供他阅读，还允许他通过警卫人员从家里拿来一些书籍阅读。他吃的伙食，三餐都是四菜一汤，每天都不重样，比他当

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在家里吃的还要好。医生每隔几天，就给他检查一次身体。

原来，1948年，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住在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时，遇到过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那天，一直平静的城南庄的上空，突然响起了飞机声。不一会儿，国民党的几架轰炸机出现在城南庄上空。毛泽东正在屋子里批复电文，没当一回事。陈伯达听到飞机声后，立即感到大事不好，急忙往毛泽东住的屋子里跑，高声喊道：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主席快走！”

毛泽东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陈伯达叫几个战士架着毛泽东赶快撤。毛泽东刚走出院门，敌机扔下的炸弹就落在院子里。

毛泽东是个念旧的人，对这件事是不会忘记的。陈伯达被架进秦城监狱牢房时的那声喊叫改善了他的待遇，也等于是救了他的命。

9月13日晚，执行北京地区紧急战备任务的各部队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并向北京卫戍区报到。首都北京已经处于十几万大军的严密控制之下。

当时，驻扎在大同执行侦听任务的北京军区空军第8技术勤务团，简称“技侦8团”，他们的一台侦测车前出到距离中蒙边境100多公里的地方。上机侦听员宫子越，截获到多处蒙古地面观察哨用无线电向上级报告的内容：

“一架大型目标入侵”，“一架大型目标空中起火。”

“大型目标起火。”

“大型目标坠落在XX地区。方位XX,XX”

.....

技侦8团将截获到的情报上传到空军情报部西山情报分析中心。经过进一步校核，形成正式情报上报。开始是用电话报告到空军情报部值班室，后来直接报到地下指挥所，由当时在地下指挥所值班的情报处处长王玉林接听、抄录后，交给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贺德全审核无误后，将电话记录上报在空军指挥所坐镇的李德生。

当李德生拿到“一架大型目标空中起火”的情报时，不敢相信，先问在场的空军副参谋长白云：跑出去的“飞机有没有可能空中起火？”

白云肯定地回答：“不可能！那可是专机啊！”

将信将疑的李德生转身打电话给总参三部部长胡备文，向三部要情报。

不久，胡备文来电话，称三部得到的情报是：一架大型目标在边境地区移动。

李德生告诉胡备文空军截获的情报，让胡备文尽快落实。

胡备文打电话给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了解空军截获的情报，提出拉条专用电话线，让技侦8团把情报直接报三部的要求。贺德全回答：“哎呀，这涉及到两个军兵种的关系。我要请示一下吴司令”。

13日晚22时15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技侦八团侦听到蒙方通话：九月十三日十八时零四分，蒙古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作战飞机在温都尔汗东北方向六十公里处着火掉下来了，按照国防部长命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

周恩来接到立刻报告毛泽东，并就紧急战备部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空军司令部的这份报告。信中说：“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及张才千、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五位副总长和我，请主席审批。现与各大军区通电话几次（如沈阳、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其它也都作了布置，通了电话。江青参加了第一次会谈，现已入睡。先念、国锋、作鹏、会作分别到京西宾馆、海司、总后工作。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

9月14日上午，外交部在代部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党组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研究林彪出逃后可能出现的国际事态及各种对外应对方案。中南海也在不安地等待着出逃后的林彪，会用什么方式向世界发表声明。

时过中午，外交部的党组会议还没有结束，突然，一位值班秘书拿着一份手抄的电话记录，门也没敲就闯了进来，直奔姬鹏飞身边，姬鹏飞看着这封特急手抄电报，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了一句话：“机毁人亡，绝妙下场！”

就在9月13日凌晨1时53分至55分，蒙古边防总队的哨兵发现一架大飞机自中国方向414号界碑入侵，声音非常大，没有灯光，飞向苏赫巴托省那伦县。2时，肯特省贝尔赫萤石矿的警卫也发现了从东

北向西南飞去的这架大飞机。不久听见巨响,看见火光。

火光发生在在贝尔赫矿西南 14.8 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是这架大飞机坠毁时产生的。时间是 2 时 27 分,

贝赫尔萤石矿的职工敦吉达玛那天晚上值班,她在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约 2 时 30 分左右,听见空中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很快,她看到一架飞机,机后拖着火苗向下坠落。从她所在的地方可以跟随飞机一直看到它坠毁在地面上,距离她大约十几公里以外。

9 月 13 日凌晨 2 时许,居住在温都尔汗坠机现场附近的拉哈玛大婶也被一阵“嗡嗡”的声音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只见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抬头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又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不到 20 分钟,就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只见现场大火连天。

蒙古肯特省公安厅驻贝尔赫矿小组代表珠尔默德等人接到报告后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坠机现场燃起大火,面积有一平方公里左右。他们首先把火扑灭,保护现场。

接着,他们在飞机坠落地点向南 500 米的地方看到第一具尸体,接着又发现了 7 具,他们立即给这 8 具尸体拍照。后来发现了第 9 具尸体。9 具尸体散布面积为 50 米 × 20 米,尸体之间相隔 3 米至 15 米。烧伤程度 1 至 2 度。

他们用白布单将现场的 9 具尸体盖住,没有挪动,然后搜集没有烧毁的文件、物品,并派人骑摩托车到省会报告。

蒙古肯特省公安厅厅长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正在休养所休养。9 月 12 日晚上他去参加舞会,13 日凌晨 2 时多他听到飞机的声音,并不知道是什么飞机。

9 月 13 日一大早,县政府叫他快到省会去,中午,省里派了一架双翼小飞机将他送到温都尔汗苏布尔古盆地坠机现场。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先在空中绕着坠机现场飞了两圈,然后用电话向蒙古公安部长德吉德少将汇报了看到的坠机现场的情况。

不久,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登比列格、公安部长德吉德、情报局

局长德钦将军,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坐伊尔-14飞机也来到现场视察。

蒙古的调查人员在现场看到一些文件和物品:

8支手枪,有的枪上了膛,有的保险关着。还有一支微型冲锋枪,两把匕首。

人民币65元,一张5元,六张10元。

李平出入证,3726部队营门出入证。

林立果证件,002003号。

一张合影照片。

其他物品:钢笔、铅笔、罐头、糖、梳子、餐具。

还有烧坏的一只白色女鞋;烧坏的一只灰白手提包,里面有一件绿色军上衣;还有三件旧蓝布裤、胶鞋、白背心、手帕等。

物品记录本、燃油记录本、手电、轮胎压力表、逆光镜等。

飞行员包一个。

3726部队第三中队邵起良的空勤工作记录。

布票,飞行员须知,飞行专业课本。

便携式录音机一台,三盘录音带,录有《毛主席语录》歌曲。

手表5块,一块上海牌,表针指在2时27分。

还有一块黑盘表没停,17时30分,与乌兰巴托时间相符。此表可能是林立果的,它确定了蒙古政府官员到达坠机现场的时间。

另外还有飞机交接记录本,新疆地区飞行图,泰山机场图,油本,低空技术说明书,使用细则,华东地图,飞行时刻表,译文4页,报务制度,航空简语。

机内发现一张标出航线的航图,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

9月14日零时,正在坠机现场的蒙古公安部部长德吉德接到中央电话,让去现场的人员立即返回乌兰巴托,向以泽登巴尔为首的政治局汇报。可是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正一筹莫展时,蒙古人民军空军司令朝克将军责成机场,准备一批小铁桶,隔100米放一个,装上木块,浇上汽油,点上火,以此充当跑道灯。

第 1197 回：急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指示到，派大使亲临现场

9月14日早晨8时，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电话通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半个小时后，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受政府委托，紧急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

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是于1971年8月20日，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刚到任才20多天，因馆务繁忙，许文益还没有拜会蒙古的这位外交部副部长。

正常情况没有拜会不能约见，而且事先也没有预约，显然事情又重要又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很吃惊，纷纷猜测，很多的猜测。

许大使到了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的办公室。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对仓促约见表示歉意，说：

“这件事我们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一些。因为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们知道得也比较晚，有关部门也是到上午才知道。”

然后话锋一转说：“我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机上共9名乘客，其中8男1女，不幸全部遇难。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接着他加重语气说：“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我国国境，我们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交涉的权利。”

许文益大使是老外交官了，外交经验丰富，处理过很多重大事件，他思索该如何回答。

额尔敦比列格放缓了口气，说：“我第一次与您正式见面，很遗憾提出这样的问题。希望大使转告中国政府，并希望你们近期内就中国

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给予正式解释。”

许文益感谢他的通知，说：“正当中蒙关系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了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为什么误入蒙古境内的？对于副部长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今天我与副部长第一次见面，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我们两国关系的改善。”

他接着问道：“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尔敦比列格作了一些解释后说：“飞机失事近两天了，但只发现九名乘员的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现在天气还热，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需要以某种方式掩埋。大使提出派人到现场，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你们的正式要求？”

许文益大使说：“可以这样理解。”

额尔敦比列格说：“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做出努力，使中国政府近期做出解答。希望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9月14日9时30分，许文益回到大使馆，决定立即向国内报告。

当时大使馆没有电台，只能通过蒙古电报局。但蒙古电报局说，线路不好，最快也要4个小时以后。

急中生智，许大使想到大使馆有一条直通北京的专线，那是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高频电话线，北京和乌兰巴托也顺便安装了一部。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专线电话也就关闭了。

半个小时后，电话要通了北京，但北京电话局说外交部的机器坏了。许大使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通知外交部有重要情况报告，要求启用专线电话。

11时50分，蒙古外交部来电话，同意中国大使馆派三个人去现场。并说专机已经准备好，下午即可动身。可是这时还没有给国内打通电话，到失事现场事关重大，没得到国内指示前，不能冒昧行动。于是大使馆借口尚未准备好，请求推迟起飞时间。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又来电话催，说专机已经准备好，13时左右出发。

大使馆还是请求推迟。

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9月14日中午12时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大使许文益，通过已封闭两年多的乌兰巴托直通北京的高频专线电话，向中国外交部报告关于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

此时，外交部的党组会议还没有结束，情急之中的值班秘书门也没敲就闯进会议室，直奔姬鹏飞身边，将这封特急手抄电话记录交给姬鹏飞。姬鹏飞向大家说了一句话：“机毁人亡，绝妙下场！”随后让王海容立即将这一情况打电话报告周恩来，但电话那边说：“总理刚刚服了安眠药入睡，按习惯要至少4个小时才能醒来。”

外交部党组决定，立即派人把这份电话记录送往中南海，直接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连续忙碌了50多个小时的周恩来是在上午11时左右躺下的。他当时看上去显得格外疲倦，是在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他才服了安眠药，在北小厅躺下休息。在休息前，他嘱咐卫士：有什么情况随时叫醒他。连续高度的紧张和劳累使周恩来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退出小厅。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纪东四个人把褥子铺在厅外的地毯上，和衣而卧，但谁也没睡觉，谁也不说话，或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或闭目养神……是紧张？是责任？还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楚，其实几个人心里想的都差不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高振普事后回忆说：“林彪是副统帅，怎么能这样干呢？庐山会议后的批陈整风，虽说林彪有错误，没点他的名，是有意保护了他，当然也是警告他。怎么能跑呢？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出过张国焘，那是在战争年代。在执政二十几年的今天又出了个林彪！局面会怎么样呢？国家会乱吗？难说。除去已跟林彪跑的，还有谁呢？周总理向各大军区下达的命令，说明毛主席、周总理在直接指挥，军权在中央，不会出大乱子……”

下午14时，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叫周恩来的工作人员接电话，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去了。

电话是外交部王海容打来的,她说:“外交部收到一份我驻蒙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送总理。”

纪东说:“总理已经50多个小时没休息了,刚吃完安眠药睡下,请你请示一下鹏飞同志,要不要叫起来?”

不一会儿,王海容又来说:“姬部长说,马上叫醒总理。”

纪东回答道:“那好,我去叫总理起来。你现在就到大会堂北门来。”

纪东回来对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说:“外交部有紧急报告,要叫总理起床。”

大家感到事态重大,赶紧将周恩来叫醒,报告了王海容电话的内容。周恩来叫王海容马上来大会堂,并让卫士高振普到门口等王海容。

不一会儿,王海容到了大会堂北门。高振普看见她手持密封牛皮纸大信封从汽车上下来,急急忙忙的走进大会堂,边走边着急地问高振普:“总理在哪里?”

高振普说:“先进去吧。总理在卫生间。”

秘书纪东接过王海容手中的牛皮纸大信封,请她进来休息一会儿。

王海容说:“不用了,要马上回部里。”

纪东拿着这份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的报告急奔北小厅。周恩来这时已经起床,穿着睡衣正在卫生间洗脸。看见纪东进来,他马上甩了甩双手上的水珠,用毛巾擦了擦手。

这时,纪东已把信封内的报告掏了出来,递到周恩来手上。只见周恩来开始眉头紧皱,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紧张神情逐渐舒展开来,拿着报告的双手也在微微颤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纪东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然后将报告递给纪东,对他说:“我要到主席那里去报告,你也跟着我。”说完,换了衣服,带着卫士高振普和秘书纪东向118厅毛泽东住处走去。

当穿越一道走廊,到了一个小门时,周恩来对纪东说:“小纪,你留在这里等我,我回来一起回去。”

原来,周恩来心细如发。此时,在大会堂只有他和纪东知道蒙古

有一架中国飞机机毁人亡。他担心纪东在他还没向毛泽东报告之前就把这一消息散布出去，于是，让纪东在这里等他。

纪东看了看，这个走廊很长、很高，一个人也没有。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想了一下，问：“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在场的汪东兴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泽东又问：“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汪东兴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周恩来随即给外交部打去电话：

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三号铅字打印 18 份，下午 6 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央办公厅王良恩副主任；

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

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约 20 多分钟后，周恩来步履轻松的从 118 厅出来了。

9 月 14 日上午，邱会作一个人坐在家中办公室苦思，脑子里好像装满了杂货的箱子一样，越想越不是滋味。下午，他把林彪出逃事，同妻子胡敏和儿子邱路光说了，他们都震惊不已……

邱会作在当天的《三部要报》中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通报，昨凌晨一时许，中国一架大型运输机入侵，在肯特省温都尔汗坠毁……”

他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很好。我已知道了。”

下午 15 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和吴法宪研究全国、全军的情况。研究以后，由周恩来亲自通过电话，将研究决定的部署传达到各个大军区。

9 月 14 日下午，蒙古外交部再次催问中国大使馆人员何时动身？许文益大使只好不断地向蒙方解释说：“国内没有指示”。就这样一直等到 14 日下午 18 时，许文益终于等来了国内的指示，是周恩来代外

交部起草的致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特急电文,要求许大使“携随员亲赴现场”,查清飞机型号,遇难9人的身份,还要从各个角度拍摄下飞机、现场和9人的照片,特别是死者的照片要从不同角度拍特写,详细观察飞机失事的原因。如有尸骨应要求带回,没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中方,写明清单和收条,并注明如有蒙方取走的物品和文件,也希望查出交还中方。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原先给蒙古外交部报送的赴飞机失事现场人员名单,只是二秘孙一先带两名翻译。而下午国内来的指示却是要“许大使亲赴现场”,这让许文益感到事情比预想的还要严重。如果是一般的失事飞机,使馆工作人员去看一看就行了,没有必要“惊动”大使。所以,虽然接到国内的指示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许文益还是决定打破常规,紧急约见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

额尔敦比列格晚上有外事活动,会见安排在当晚20时。见面后,许文益大使说:

“奉政府之命,失事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并指派领事司长陪我们到现场视察,表示感谢。我将亲自率有关人员前往现场,请蒙方给予帮助。”

额尔敦比列格马上问:“误入之说,是否是正式答复?”

许文益大使说:“可以这样认为。”

“这是否是最后答复?”额尔敦比列格继续追问。

许文益也警觉起来。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使馆的第一次报告后给我的指示,是正式答复,但我理解不是最后的答复。”

额尔敦比列格问:“失事飞机是从哪里到哪里?朝哪个方向飞?是怎样迷失的方向,误入我国领土的?”

许文益大使坦率地说:“目前为止无法答复。”并反问,“蒙古方面是否有飞机失事的进一步材料提供给我们?”

额尔敦比列格也非常谨慎,说:“暂时没有。”

许文益大使表示明天上午动身,额尔敦比列格同意,让中国人作好明天赴现场的准备。他对中方未能及时派人赶赴现场有点抱怨,

说：“飞机失事两天了，等你们到现场大概要 60 多个小时了，天这么热，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希望你们不会提出更多的问题。”

许文益大使马上将约见情况报告国内，翌日凌晨得到国内指示：“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有困难，可拍照取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把遗骨运回国内。”

现在轮到中方催促蒙方了。蒙古人似乎不那么着急了，借故一推再推。

9月14日这天，恰巧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位干部回国休假。他路过中蒙边境时，向中国边防站站长讲了中国有一架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人员全部死亡的事情。边防站站长把这一消息逐级上报到军区。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将这个边防站站长隔离起来，并限令军区采取措施，让已知道这一消息的 26 个人谁也不许扩散。

第 1198 回：见鲁珉，竟揭出惊天阴谋 李德生，再查空军江腾蛟

李德生坐镇空军，在空军机关引起很大的震动。李德生的动员，传达到各个部门，大家都知道空军出了大事，纷纷开始回忆这些日子的大事小情，以便提供组织上参考。有些人更是惶惶不安。

9月14日中午，李德生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刚到京西宾馆的办公室，准备小憩片刻。突然，军委一号台电话铃响起，秘书接到总机话务员的电话说，空军作战部长有急事找首长。

李德生觉得奇怪：在空军作战值班室30多个小时，始终没有见到作战部长，他怎么现在出现了？他让秘书立即与作战部长通话。那边传过来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哭腔：“我有非常紧急的情况，要向首长报告。”

李德生让秘书答复鲁珉，立即到京西宾馆来。

鲁珉到了京西宾馆9楼，一见到李德生，就放声大哭：“首长，我犯了滔天大罪啊，我犯了杀头之罪啊。我参与了阴谋杀害毛主席，我犯了罪，全国人民都不会饶恕我的。”

此时鲁珉不断地流着眼泪，而且眼睛已经红肿得几乎睁不开了。他的话更是让李德生很是吃惊。大量可疑事实表明，林彪北飞叛逃定有重大隐情。沙河机场还说了一个“林副主席手令”，此时还弄不清这个“命令”究竟是什么内容？

李德生的秘书扶鲁珉在会客室沙发上坐下，给他倒一杯水，对他说：“你先喝点水，冷静一点，慢慢讲。”

鲁珉喝了几口水，稍稍平静后说：

“9月11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等几个人在西郊机场策划在南方谋害毛泽东。后来我参加了。”

李德生说：“你讲具体一点，不要急。”

鲁珉接着说：“他们的方案是，乘毛主席在外地巡视的机会，在上

海由空4军政委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时下手行刺。此计不成，让联合舰队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100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的专列。如果这个计划还不成功，第三个方案是在苏州硕放桥埋放炸药，炸毁专列。实在不行，第四个方案是用轰炸机炸毁毛主席的专列。”

而轰炸专列的任务，就是选飞行员出身的作战部长鲁珉亲自担任。11日当晚，江腾蛟派车拉上鲁珉到西郊机场，由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4人向鲁珉交代任务，派他驾驶飞机发射火箭，攻打专列。

那天晚上，鲁珉回到家里，心情紧张复杂。林立果交代了任务，背后当然是林彪。鲁珉想：“轰炸毛主席专列，自己将成为千古罪人。如果炸不成，林彪、林立果同样不会放过我。”他越想越害怕，连夜同妻子商量怎样才能躲过这场灾难。

鲁珉的妻子是空军门诊部医生，她用食盐水揉鲁珉的眼睛，把他的眼睛揉得通红，这样肯定就不能开飞机了。天一亮，鲁珉就住进了医院。12日下午，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林立果又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当晚，由王飞、于新野等人召集开会，确定13日清晨，护送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拟定了飞机和20多个随行人员的分组名单。这个会，鲁珉又参加了，并且上了分组名单。

第一次听到由当事人亲口讲出的如此骇人听闻，难以置信的大事！李德生内心的惊讶可想而知，但他克制住自己，不漏声色，继续问：“你为什么隔了一天多才来揭发交代呢？”

鲁珉说，当他得知13日清晨原先约定的车辆没有开出，也没有人通知他到西郊机场，他不知是逃过去了，还是没有逃过去？妻子告诉他，发现机关办公大楼岗哨增多，司令部通知各部组织学习。他估计情况有变化，更是惊恐万状，想尽快向中央报告。

当时，鲁珉首先想到了毛泽东的亲家，毛岸英、毛岸青的岳母张文秋老太太。因为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后来嫁给了空军学院教员杨茂之，而杨茂之调到空四军32师任副政委后，当时正在南空任职的鲁珉与张文秋一家有来往。鲁珉让妻子武杠桥打电话找张老太太，说“鲁珉要见毛主席，有重要情况要当面报告。”

张文秋问：“什么重要情况？”

武杠桥答：“必须当面报告，情况紧急，越快越好。”

张文秋说：“要见主席得通过秘书安排，来来回回要好几天。如果事情很急，怕要耽误了。”

鲁珉觉得此路不通，又想到了周恩来总理，决定找当年山东大学的老同学、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鲁瑛帮忙。

鲁珉14日一早就从医院出来，直奔鲁瑛家，把他堵在被窝里，对他说：

“快起来，我有急事要当面向总理报告！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鲁瑛支支吾吾的说：“找总理也不那么容易，我也很难办呀，我们送稿子都是通过办公室联系的……”

鲁瑛让鲁珉直接到人民大会堂或中南海西门。

鲁珉只好又回到医院。怎么办？突然，他想到了李德生。李德生不是正在空军指挥所吗？他立即通过一号台接线员：“找总政李主任通话”。

当然，鲁珉向李德生叙述这一过程时没有讲与张文秋老太太联系的那一段。

鲁珉的交代，断断续续，归纳起来：一是林彪要谋害毛泽东；二是林彪要携带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李德生听完，让鲁珉在记录上签了名，然后对他说：“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我立即向总理和主席报告。你先回去待命。”

随后，李德生立即让秘书将鲁珉的揭发交代记录报送周恩来。

不到一个小时，周恩来打来电话说：“德生同志，鲁珉的揭发交代太重要了，一是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尽管控制很严，但也不是铁板一块；二是说明林彪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极其凶残的反革命两面派。鲁珉的交代，是对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一个重大突破！清查工作要抓紧，要继续深入下去。”

李德生当即决定，在空军机关，将直接放走256号飞机的副参谋长胡萍、主持制定南逃广州行动实施计划的副参谋长王飞等人收审。

李德生请示中央批准，从总政治部机关调出得力干部组成工作组，到空军机关、西郊机场、沙河机场、空军学院等林立果经常活动的

地方,展开清查工作。这天,李德生把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叫到京西宾馆,对他说:

“林彪的事情,党中央已经向全军各大单位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过招呼了。看来空军的几个单位问题很多,也很复杂。中央同意由总政治部派出几个工作组,进入空军学院、空军34师、西郊机场、沙河机场、空军招待所等几个地方,那里有林立果设立的秘密据点。他们逃跑很仓促,很多东西没有来得及带走,也会有一些同他们搞坏事的人留下来了。工作组去,要依靠那里的干部战士,迅速稳住局面,特别要把他们的据点严格控制好,不能丢失一份罪证材料。还要有一个组到空军机关,帮助我掌握情况。”

田维新回到总政治部机关,立即分别找几位部长、处长,组成5个组,一个一个地分别交待任务。此时,林彪叛逃的消息还是严格保密的。“林副主席”的字样还会不时出现在报纸上。这也是为了防止社会上出现大的波动和混乱,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

李德生送走鲁珉后,注意到他交代中谈到的江腾蛟。

江腾蛟原是空4军政委,文革初期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文革中支持南京空军机关干部反对许世友,后被免职,长期住在北京。林彪曾经提议他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被毛泽东否定。此时他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却是空军党委委员、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和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

当天下午,李德生派秘书将江腾蛟召到空军办公大楼的党委会议室。李德生对他说:“空军昨天跑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是西郊机场的。而你11日在西郊机场开会,你现在在空军没有职务,到西郊机场干什么呢?”

江腾蛟满头是汗,他还不知道林彪已出逃,不愿意回答。

李德生说:“我可以告诉你,这架飞机已经在逃出国境后,摔下来了。”

江腾蛟听到这里,脸色陡变。

这时,中央办公厅通知李德生,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会议,让他晚上20时到达。李德生要求江腾蛟:“你要端正态度,认真写出交代。”当晚,江腾蛟被送到亚洲疗养院,在一个单间住下。

这天傍晚，李德生的秘书把鲁珉接到北京军区招待所。纪登奎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代表中央来听取鲁珉的报告。鲁珉又向纪登奎讲述了一遍。纪登奎要鲁珉把情况写一份简明扼要的书面报告。

考虑到鲁珉的处境和安全，没有再让鲁珉回家，就让他在招待所住下。

当晚 20 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通报了两件事情：

一是 14 日下午，我国驻蒙古使馆就获得了我一架大型客机于 13 日凌晨 2 时半，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坠毁。我情报侦听部门也从蒙方通信中证实这一点。后又接到蒙古外交部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有一架中国民航飞机，侵犯蒙古领空，在温都尔汗坠毁。随后，我驻蒙古大使馆，向我外交部来电报告：有一架中国民航飞机在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

周恩来在会上分发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

二是 13 日凌晨 3 点左右，空军一架直升飞机从北京的沙河机场起飞，机上除正副驾驶员外，还有三名空军的干部。飞机一直向北飞行。中央命令拦截此飞机。该机之后在怀柔某地降落，已查明该机驾驶员死亡，三名空军的干部中两人自杀死亡，一人被俘。

会议向政治局报告了防空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部署，以及派陆军部队进驻空军、海军机场和码头的决定。政治局一致表示同意。

会议还确定了全军新的作战部署，其中决定，海军各舰队就近归大军区领导。海、空军的机场派陆军部队进驻。

吴法宪在会上提出：“应当向全军发一个电报，说明派陆军部队进驻机场、码头，是为了协助空、海军和民航保卫机场、基地，各部队不要发生误会，不要认为陆军是去监视空、海军的，以免增加矛盾，引起不愉快。空、海军的同志应当欢迎陆军的进驻，陆军也应同空、海军多商量办事，双方要很好地协作，共同完成保卫机场和码头的任务。”

周恩来和黄永胜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黄永胜当场找来总参的一名干部草拟电报，交周恩来审改后，交中央政治局的全体传阅，然后送毛泽东批发。

毛泽东当即批发了这个电报。

政治局会议大约在9月15日凌晨2时结束。政治局仍然分住两处休息，大家都沒有回家。

接着，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分批向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主要领导人通报林彪事件的经过。这次通报，到15日下午16时才结束。

山海关机场，被256专机甩下的那5个人在飞机升空后谁也没睡。他们首先是想向领导详细报告，大家一起分析，飞机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争取给上边处理这件事多一点参考。可是没有人听他们汇报，是不愿意？还是顾不上？不知道，反正没有人听汇报。

9月13日上午，这5位“难兄难弟”还在讨论，到底是怎么回事把他们给扔下了？直到这时，他们谁也没想到给家里打电话。很快，中午就不让他们到食堂吃饭了，一份一份地送来。还没等这5个人弄清是怎么回事，下午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囚犯，包括专机师临时调到山海关机场的调度室的李海彬主任，都被海军严格看管起来。

14日下午，李作鹏接到山海关机场电话报告说：“未来得及上空军256号专机的剩余机组人员还停留在山海关机场，他们是：西郊机场调度室李主任、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空军党委办公室于秘书和两位飞机上的女服务员。”又说：“他们现在的要求是，不要送他们回空军，怕空军杀人灭口，他们愿到海军接受审查。”

李作鹏将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第一、由海军负责，将未上256号飞机的机组和有关人员接到北京，海军负责安排住处，要注意安全，要注意保密；第二、海军负责对他们进行审查，并将材料直接送我。”

李作鹏将处理滞留在山海关机场空军256机组剩余人员的任务交给海军政治部保卫部负责，他对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肖云交待了三点：

一、驻地要加强警卫，不能让任何人自杀，不能让任何人逃跑，不能让外面歹徒抢走了；

二、要他们写揭发交待材料，也可以面谈，你们派人前往记录，他们说什么，你们记录什么，他们说多少，你们记录多少，不准搞逼、供、信；

三、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一元。

几天后，海军政治部保卫部提出意见，觉得每人一天一元的伙食标准太高了，经李作鹏批准，改为中灶标准。

14日下午，256机组没上飞机的5位成员被山海关机场的海军战士两个架一个，押上开往北京的专列。是海军保卫部告山海关机场，将滞留在山海关机场的空军剩余人员送往北京。他们的待遇倒不错，高干待遇，一人一间软卧。可惜有两个形影不离的海军军人不错眼珠地看着。

他们到北京已是9月14日晚上，立即被关进公主坟海军大院西侧的平房招待所。这可不是住店的客人，而是犯人。招待所也不再是招待所了，改成临时监狱。还莫名其妙的5个人这才彻底明白，他们已经变成敌我矛盾了。专案组桌子一拍，身上一搜，钥匙手表都收走了，说是怕自杀。机组人员觉得很好笑，为什么要自杀？

有的说：“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自杀，最起码我得对家对孩子负责，除非你把我打死。”

有的说：“我们又没干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海军的保卫部门也好奇，所以也问256机组成员在山海关都看到了什么了？

几天后，时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的纪登奎开始审问三叉戟机组人员。对机组人员来说，他们知道的就那么点事，问完了，再没什么说的，再问，再从头说一遍。说的人没烦，听的人早就烦了。审问者觉得真是问完了，就两个人一间，再不问了。不过，还是高干待遇，有警卫战士坐在屋门口警卫。

第 1199 回：进“亚疗”，武健华赴北戴河 许大使，到坠机现场勘察

15日凌晨2时政治局会议散会后，邱会作又到京西宾馆去找李作鹏。谈话间，李作鹏的秘书送来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发回来他们对扣押在山海关机场人员的审问记录。李作鹏一页一页地看，并一页一页的递给邱会作。记录稿很长。在一张记录稿上有两点：一是被审查的人要求不要把他们交回空军，以免被杀人灭口；二是被审的人交待：他们听林立果说，在空军学院开过一次会，会上决定李作鹏、邱会作的任务是解决钓鱼台，要抓住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务。

邱会作看完这页记录后，李作鹏问他：“你害怕不？”

邱会作说：“说得越邪乎就越好，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现在不是害怕的问题，是主席怎样对待我们的问题了。”

他又说：“我们现在是在下地狱的口子上，可以下去，也可以不去。以我的估计是非下去不可的！”

大约一星期后，三叉戟机组人员又被秘密押送到西山的亚洲疗养院。

亚洲疗养院位于北京西郊北京军区机关附近，本来是接待来自亚洲各国友好人士休息疗养的。文革开始后一直空着，于是，中央专案组把空军的，陆军的，包括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凡是与“913事件”沾边的都“请”到这里，一人一间，门口坐着北京军区的战士，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当时那气氛，当事人后来回忆说：只能用“恐怖”二字来形容。

9月15日，鲁珉也住进“亚疗”，单独一间房子，不派专人看管，可以在房子外面自由活动。第二天，9月16日，鲁珉爱人武杠桥也被“保护”进“亚疗”，和鲁珉同住，并让她把孩子和东西带上。以后，鲁珉爱人、孩子被放回来，在空军大院外另给了两小间房子居住。

鲁珉后来进了监狱。他在监狱还一直以为，他没有什么问题。毛

主席说：鲁珉是个好同志，将来继续为党工作。毛主席都说了，他还能有什么问题？没想到毛泽东 1976 年逝世，他仍然被关押。李德生也说：鲁珉是个好同志。但李德生后来也自身难保，被“对调”到沈阳军区。

1978 年，鲁珉的问题升了级，被关进北京军区看守所。一个多月后，移到秦城监狱。1980 年审判“两案”，鲁珉因为级别不够，被交由空军审判。1980 年 5 月 9 日，空军军事法庭以涉嫌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判处鲁珉有期徒刑 10 年，剥夺政治权利 2 年。一直以为会无罪释放的鲁珉没等宣判完，精神就不正常了，冲着探监的儿子叫大哥。审判者说他是装病，还是把他移交到山东监狱，一个月后释放。安置在哪里？鲁珉的爱人和儿子在北京，但北京不能去，老家不能去，青岛也不能去，最后安置到女儿所在的洛阳。每月生活费 70 元，并给了一间小房子。

鲁珉申诉无果，但中纪委批准鲁珉可以住在北京。这样，鲁珉退了洛阳的房子，回到北京。每天到八一湖锻炼，生活平静。有一天，同在八一湖锻炼的原空军司令员王海告诉他，有一本书写鲁珉“叛国投敌，自杀身亡”。鲁珉和家人因此打了官司，官司赢了，判付几千元。但此官司不公开审判，而那本书却到处发行。鲁珉心中郁闷，2000 年他在爱人武杠桥的陪同下，回杭州老部队空 12 师看望。看到以前的老同事，老部下，再看自己，心中更加郁闷。到了上海就病了，尿非常黄，全身黄疸，回到北京，住进医院，诊断胰腺癌晚期。

没上飞机的 5 位专机组成员还算运气不错，他们在 1972 年春节被收回空军，直接拉到空军学院。待遇又提升了，变成一人一屋，当然紧箍咒还箍着，还是审查，不过总算降了格。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接受审问外，就是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这可把笔杆子练出来了，他们一辈子也没写过这么多的字。经过所在专机师专案组的一年半到两年的隔离审查后，他们陆续被放了出来。专机组的 5 个人“待遇”不一样，服务员小魏放得最早，1972 年 8、9 月就走了，第二副驾驶康廷梓到 1973 年 6、7 月出来，也算放得早的。那三个老一点的到 1973 年底才放出来，关了足足两年。

9 月 13 日上班时间，毛家湾林彪办公室的保密员李根清来了。警

卫拦住不让他进,他急了,硬闯了进来。按照上级规定,中央警卫团还是动员他回家。

李根清一看毛家湾被“军管”了,悄悄把保密室的钥匙藏起来了。后来在中央警卫团反复动员下,他才极不情愿地从家中的小收音机后盖里取出钥匙,交给中央警卫团。

3天后,中央派人把留在毛家湾的林办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向他们传达了“913事件”,并派工作组接管了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以后让他们集中学习中央文件,检举揭发。又过了一段时间,北戴河的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也被遣送回来,集中在毛家湾。一个月后,把他们都送到“亚疗”。

9月14日下午17时多,8341部队副政委武健华正在中南海参与紧急战备值班,忽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去一趟。见面后,汪东兴对武健华说:“林彪他们已在内蒙古摔死了,总理交代要保护好林立衡的安全,防止林立果的余党乘机搞暗害等报复活动。安全措施要注意隐蔽一点,做到内紧外松。目前先住在北戴河,以后有什么变动听通知,你现在就收拾一下速去北戴河。”

遵照周恩来的嘱咐,汪东兴还要求武健华到北戴河后,将林彪住地的文件清查整理带回,并负责清查毛家湾林彪住地的材料。

当晚,武健华带着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赖奎处长、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王歆秘书,他们3人乘火车于15日凌晨3时左右到达北戴河车站。8341部队二大队姜作寿大队长派车把他们接到紧挨着林彪住地的57号楼。林立衡住在56号楼,相距不远。

住下来后,武健华把中央领导交代的任务告诉了姜作寿。武健华首先和姜作寿一起分析了情况,研究如何不动声色地保护好林立衡在北戴河的安全措施。把林立衡的生活、活动置于原林彪活动的警戒范围内,不与外来人员接触,一切照常。

接着,姜作寿带武健华一行3人来到林彪住地96号楼的。此时,林彪的工作人员已集中到另外的地方学习,武健华他们没有与他们见面。

当武健华他们一行进入96号楼后,仔细察看了卧室、起居室、会客室、值班室等处,看到有些地方相当凌乱,门窗橱柜有的半开半关,

书、报、杂志、信件等到处堆放，有些纸张、办公用品散落在地毯上、墙角边。可以想象，当时林彪他们在出逃时是多么慌乱。

面对这样杂乱的情况，武健华他们确定，以秘书值班室为中心，逐屋先搜罗集中与文件有关的物品。他们从林彪、叶群的卧室、起居室、书房到会客室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用房，一间一间地清理，桌子、橱柜、枕边、床下，片纸只字都不放过。

将这些物品集中以后，他们又仔细进行梳理，分清急缓予以处置。

第二天，9月16日，他们在96号楼看见一张32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着：“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八。”。

他们觉得这份材料非常重要，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

接着，他们又把北戴河值班电话记录和近期对外来往的书信函件以及与现实斗争有关的材料，一批批送回北京。

十几天后，林彪在北戴河的文件材料全部清查完毕，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派人全部接回北京保管。

9月15日早上8时，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每半个小时就向蒙古外交部催问一次什么时候到坠机现场。蒙方先说不知道，后来又说温都尔汗天气不好，不能接受飞机降落。其实天空非常晴朗，万里无云。就这样一直拖到下午13时30分，蒙古外交部终于说，专机14时30分以后可以起飞。

原来，9月14日这一天，蒙古人民军空军司令朝克将军到坠机现场。一批苏联军事人员也从俄罗斯赤塔州后贝加尔军区乘坐米格-8直升机到了。朝克将军和苏联人在现场会晤。

9月15日上午，苏联大直升机拉走了一台发动机，把坠毁飞机的黑匣子也取走了。黑匣子里记录着飞机的工作情况和人员谈话，蒙古肯特省公安厅厅长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认为不能让苏联人拿走黑匣子，但是蒙古人民军空军司令朝克将军还是把黑匣子给了苏联人。但苏联人一直没有对蒙古讲过黑匣子里有什么内容。

为了不让他们同中国人“撞车”。所以蒙方一拖再拖，直到苏联人在现场“折腾”够了，中国人才被允许前往。

蒙方也组织起一个庞大的视察班子，有边防内务军事管理局处

长桑加上校，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外交部二司专员古尔斯德，国防部副处长大木丁上校，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等官员，还有航空、法律、法医等方面的专家，法律专家达希泽伯格，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法医莫尤，卫生组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卓乃大夫，肯特省检察长乌尔金道尔吉，以及报纸和蒙古通讯社的记者，以及电影摄制组等等，足有几十人。

9月15日下午13时3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带着二秘孙一先、翻译沈庆沂和王中远前往坠机现场。他们和蒙古的庞大班子乘坐一架伊尔-14飞机，于14时45分起飞，航程300公里。15时46分，他们到达温都尔汗“土机场”，然后乘坐嘎斯69，沿东北方向的沙土公路和克鲁伦河，直奔坠机现场。行驶一个小时，转向东北，进入丘陵草原。一路上荒无人烟，除断续的馒头形土包外，还有二、三十米高的石头山，汽车在丘陵间颠簸，常被高高弹起。向东北方向走了不到一小时，离开沙土公路，拐入正北一条草丛小路。这里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胎压得枯草吱吱直响。小道左边是一连串较高的山丘，右边是一片向上的漫坡，只见坡顶是烧焦的草地。

近18时，许文益大使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到达位于温都尔汗西北的坠机现场。

爬上漫坡，首先进入眼中的是倒梯形的焦黑草地。

站在高处望去，他们看到那架坠毁的飞机。

飞机是由北向南迫降，着陆点正好在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南部。飞行员对迫降的地点有选择，飞机从低向上走，以此增加一定的阻力。

这是一块被牧民称作苏布拉嘎的不太规则的长方形盆地，除了西边是向下的漫坡，其它三面都是起伏的土丘。盆地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平坦得就像人工铺成。到处是9月没膝的干枯茅草，草根盘结，脚踩到沙土上有种软绵绵的感觉。

飞机已摔得粉碎，一大片野草被烧焦，遍地是飞机的残骸，右机翼擦地留下了一道几米长的沟痕，一只飞机轮胎飞出数百米远。现场发现9具尸体，8男1女，都被抛离飞机残骸十多米，横七竖八地躺在荒野里。盖着白布的尸体格外显眼，周围一片草原，远处有蒙古的哨兵

在游动着，令人顿生凄凉悲惨之感。

飞机早已解体，机尾上有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标志和“256”字样，断裂的翅膀上有“民航”二字，不用说，肯定是中国飞机。

许文益问：“是否知道飞机失事的具体情况和原因？”

蒙方说，飞机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在蒙方撰写的《现场调查纪要》中，说该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此发生爆炸而失事。

蒙古警察图瓦尼·久米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他说看见三处大火。他不知道哪一处先起火。当他从车中下来后，没走两步，几乎被什么绊倒，地上是一具背朝上的尸体。黎明时的现场是一幅可怕的场景，9具尸体散成一线，大火几乎烧光了他们身上的衣服，只剩下手枪皮套和腰带，当天从200英里外的首都乌兰巴托赶来的蒙古外交部副部长杜格瑟仁金·额德毕力格说，几乎不可能辨认出飞机上任何一个人。但飞机印记、毛泽东的像章、笔记本等，都表明这是中国人的飞机。

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进一步解释说，凌晨2时30分左右，贝尔赫萤石矿的夜班工人听到一声很响的爆炸，随即发现东南方一片火光。连忙叫人，分乘两辆卡车到现场灭火。蒙古政府有规定，草场着火，必须马上扑灭，否则要受罚。工人到达现场，火势还很猛，透过火墙看到失事的飞机。他们一面扑火，一面向温都尔汗当局报告。伊德尔莫格县的牧民也赶来了，一齐把火扑灭，这才看见9具尸体。等省里来人，天已经快亮了，他们调公安部队看守，并报告乌兰巴托。

第 1220 回： 法新社，报道林彪已出事 拼字条，惊现林彪俩“手令”

许大使他们仔细查看了坠机现场，从盆地中央开始，由北向南，呈倒梯形，约 800 米，宽 30 至 200 米的草地全部烧焦，散落一块块飞机残骸，靠近焦土的南部，是散落的尸体。盆地中央，有一道由北向南的 S 型擦痕，飞机着陆点以南约 30 米长的草皮被机腹压实，说明飞机是肚皮擦地着陆。飞机弹跳了 30 多米，才开始进入大片焦土。机身似乎失去平衡，倾斜触地。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 20 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积越来越广。最北头飞机翅膀擦地的痕迹很重。飞机肚子擦地平衡，翅膀擦地产生高温，就产生爆炸，速度很快，一个翅膀擦地翻滚爆炸。标有“256”字样的翼尖断成两半，一个断机翼上写有“中国”两个大字。

最显眼的是机头西北 60 米处斜卧的机尾，有三层楼房那么高，是从中发动机的进气口处炸断的，只剩一段发动机外壳与尾部连结。再往前，逐渐看到机身的较大碎片，机身的蒙皮，发动机底部的包皮，很大的弧形机身，连着摔碎的舷窗，炸瘪的发动机尾端喷口，一扇门从合页连接处炸开……

孙一先注意到一个炸掉大部分外壳露出内腔的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机尾没有着火，末端断裂处露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杂乱电线，有的电线露出铜丝，有一条粗电缆连着一个碎片。机尾垂直舵没有损伤，右水平舵尖卷曲，左水平舵插在泥沙里，支撑斜卧的整个机尾。垂直舵前竖板上是喷涂的五星红旗，旗下方是机号“二五六”。



飞机残骸 2



256 坠毁现场

机头灰烬前方 80 米处,烧焦的草地头,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起落架上完好的轮胎,滚到南边 200 米处。它的后面朝北偏西的一条弧线上,散布着三堆尸体,机尾被远远甩到机头的右后方,靠近烧焦的草地边。看来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机身炸开的一瞬间甩开了的。但它们并不在一条直线上,令人有些不解。机尾离机头大约 60 米,最远一具尸体离机头大约 50 米,说明飞机爆炸的猛烈。从机头到机尾这条东南到西北的斜线上,与三堆尸体朝北偏西那条弧线,大约成 30 至 40 度的夹角,全是飞机上的残片。

许文益叫多拍些照片,仔细观察失事原因,以便送回国内研究鉴定。

二秘孙一先爱好摄影,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他抓紧黄昏前的光线拍了好多卷。回国汇报时没带全部照片,只是挑了一些好的,剩下大量的底片留在大使馆。

现场共有 9 具尸体分成三堆,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岔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难以辨认,衣服被烧光,躯体完整,只有骨折和皮肉挫伤。由于时间过去已有 60 多个小时,个个肿胀得亮晶晶的像个蜡人。每具尸体都没戴手表,没有鞋子,像是飞机迫降前作了准备。

孙一先根据从北到南,距主机的顺序,把现场的三堆尸体编成 1 至 9 号,从各个角度拍下来。这些尸体分别是:

1号尸体：衣服里的语录本里，夹着纸条，上面记着毛家湾、汽车保养后以及三座汽车班的电话号码，这应该是林彪的汽车司机杨振刚。

2号尸体：个子较高，腰系手枪，面部有摔伤后流血形成的血痕，附近有填写着林立果姓名、年龄的工作证。显然，这是林立果。

3号尸体：体形较矮胖，牙不齐，有虎牙，身上带有一串钥匙。这是刘沛丰。

中间的一堆尸体，4号尸体：个子较高，根据身上的皮夹克及耳朵的形状判明，他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

5号尸体：体瘦，秃顶，有额纹，左腿摔断。这无疑是林彪了。

6号尸体：长方脸，穿布质飞行服，可以判明是机械师张延奎。

7号尸体：体矮，个子小，他是空勤机械师李平。

他们的位置似乎是在位于前舱的高级房间里。

8号尸体：唯一的女尸，左臂摔断，她当然是叶群了。

9号尸体：个子高大，离机头残骸最近，他就是驾驶飞机的潘景寅。

1至3号尸体，生前是坐在机舱后部联装座椅上，死后他们距离最近一组座位架只有30米；4至7号尸体，生前像是位于前舱的高级房间里，三个机械师同林彪摔在一起，表明飞机迫降前他们似乎担负了“保护首长”的任务。说来也巧，9具尸体，林彪处于中央，死后仍然“以我为中心”。8、9号尸体，叶群死后靠近潘景寅，很可能她生前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挥飞机降落，而潘景寅烧灼最重，估计是由于他握住驾驶杆，在熊熊烈火中坚持到最后一刻。

他们发现飞机翅膀上有个大洞，当时是军事对峙状态，孙一先立刻就想到是否有导弹袭击的可能？

孙一先在现场拣到一张英文注意事项，写明飞机型号 Trident - IE，即三叉戟 IE。再往前走孙一先看到一条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 PIA，这是巴基斯坦国际民航缩写。

沈庆沂在坠机现场发现一个红色塑料皮的小册子，64开。红塑料皮大部分烧焦，看不出书名，里面的文字只烧掉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结尾是“长时间热烈鼓掌”。里面讲了空军的发展，其中讲到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国际水平，还有型号和数据。孙一先用照相机把这几页拍了下来。

其实,这是林立果在空军的讲用报告。据胡萍回忆:林立果把这个讲用报告放在上衣口袋里,里面夹着一张横写的“林彪手令”。1971年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到西郊机场,下飞机时他曾出示给胡萍看,以后林立果又给林办老秘书关光烈看过。

但是,沈庆沂和孙一先在坠机现场翻看这本小册子时,没有看到里面夹着“林彪手令”。当他们准备把这本小册子拿走时,被现场看守的蒙古人制止了。

沈庆沂注意到两堆尸体中间,有一堆物品,明显是蒙古人堆集起来的。其中有两个飞行员图囊,一个烧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孙一先打开图囊,里面只有几只黑铅笔和红蓝铅笔。他问航图哪去了,蒙方陪同人员摇头不语。

图囊旁边是一堆手枪,大多完好,有几只枪的枪把烧焦,露出空子弹梭子。孙一先数了数,子弹43发,没有空弹壳。还有两个手枪套和几个空弹夹。沈庆沂看到手枪有6支,一支苏制AK型,5支写有“59SHI”。蒙方问“59SHI”是什么意思,孙一先回答:“是手枪型号,1959年中国制造。”

坠毁飞机上有一块手表,定格在2时27分

孙一先和王中远在2号尸体的确良军装兜底下看见有一张底片,看出是在颐和园的冰上,看不出是谁。还有一个出入证,没有贴照片,编号0002号,空军大院林立果,男,24岁,干部。

王中远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知道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但当时没多想。

孙一先把这个出入证拍了下来。

孙一先和沈庆沂还见到一本《法兰西内战》,一个巴掌大的白纸本,用铅笔写一些零散的字,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红塑料皮空白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

他们在现场看到两只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完好。

许大使将自己带来的相机交给翻译沈庆沂用,二秘孙一先自己带了莱卡相机,这样两个人就分别拍照。他们不知道飞机上是什么人,

还以为是美国或者台湾的侦察飞机涂上中国飞机的徽号,借以挑起中苏、中蒙之间的争端。但是到了现场一看,明明白白是中国飞机,9个人全部死亡。侦察机上哪能有那么多人?孙一先开始和沈庆沂边走边拍照。他们拍了一些之后,天就黑了。第二天他们又去拍了一些,尸体照片都是第二天,16日拍的。

因为9月还比较热,蒙古方面建议就地安葬。

许文益对现场的初步看法是,一、蒙古方面基本保持了飞机失事现场,他们用白布覆盖了尸体,并承认有些文件已经搜集保管起来。草地上还拾到九块手表等,个别烧坏,有的还很名贵,已单独保管起来。二、飞机是由不明原因紧急着陆,机上人员都作了紧急降落准备,但飞机着地时失去平稳,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三、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记“PIA”,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但不知机上是何人,为何在蒙古失事?现场的情景使许文益感到问题重大复杂。视察完毕,天已经黑透,蒙方一再提出蒙古没有火化习惯,尸体只能土葬,提出马上选择墓地,连夜挖墓穴,明天安葬。

许文益表示同意。

坟场是王中远选的。小山包上,向东,面朝祖国。在场的中国大使馆人员心情沉重,毕竟是中国同胞,很可能是高级首长。在现场草图上,王中远用红铅笔标出墓地,写着中国烈士

9月15日,大使许文益等从坠机现场回到温都尔汗已经是22时多了。吃饭时,蒙古司长高陶布说:“我们都已经看了现场,应该写个正式文件。”

9月15日,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要求同李德生谈话。

程洪珍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年轻的秘书,办事认真,有头有尾。9月13日,他发现自己的领导和指挥他的人突然都不见了,再加上听了传达李德生9月13日下午的动员后,察觉到空军出了大事情,终于鼓起勇气来找李德生,谈了林立果让他办的许多事,还交出了他的工作笔记。

程洪珍的交代,特别是他的笔记本保存了许多原始记录,提供了很多事情的准确时间、地点等重要线索和证据。比如:

9月9日早晨,周宇驰交代他描绘北京市钓鱼台地图。他绘好后

下午交给了周宇驰。这张地图后来在于新野的保险柜里查获，并且得到证实。

9月11日，林立果、王飞、江腾蛟、于新野曾经到钓鱼台周围实地看地形。另外，周宇驰交代他，向王飞的秘书孙水森要一份国防科委和空军司令部科研部研制的关于化学武器或炸药的文件，程洪珍找孙水森要到后，也交给了周宇驰。

9月15日这天，法新社驻北京记者第一个报导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危机，危机的挑起人可能是林彪。”这一消息引起苏、蒙方面的重视。

原来，法新社驻北京记者感到了北京的紧张和神秘，于是就在新华社门口、外交部、钓鱼台、中南海的外面转悠，发现新华社门口墙皮上白底黑字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给涂掉了。

他想起6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时，林彪在场。但《人民日报》却分别发表毛泽东和林彪接见外宾的照片，好像分别接见似的。

确实，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和林彪公开露面。但是摄影记者拍有毛泽东和外宾握手时林彪在毛泽东身后的照片。不过周恩来在挑选照片见报时，却用了毛泽东和林彪分别与外宾握手的照片。

法新社驻北京记者马上猜测林彪出了事。

9月15日下午14时3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周恩来谈话。

当晚，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经情报证实，三叉戟飞机确实坠毁并起火燃烧。林彪、叶群、林立果全部烧死。”“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明天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处理这个问题。”

当晚19时左右，周恩来带上卫士和秘书纪东到天安门广场四周转了一圈，回到西花厅。

9月16日，周恩来给许世友打电话，让他采取措施，控制住上海的王维国和杭州的陈励耘。

下午15时，周恩来起床后，吴法宪向他汇报了自13日以来空军贯彻执行命令的情况，以及陆军部队进入空军机场的情况。周恩来听了以后，表示满意。

周恩来又问了民航的情况，吴法宪说：“民航的主要负责人之间不团结，有意见分歧，但是我现在无能为力，我说的话他们不会听的。”

周恩来说：“是不是请李德生同志去了解一下情况，同民航的负责人先谈一谈，然后再召开会议解决？”

吴法宪表示“一切听从总理的安排。”

再说9月14日上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北京卫戍区在怀柔直升飞机迫降现场收集的碎纸片，分批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那里，基本是拣一片送一片。卫戍区委杨俊生开始拼对这些碎片，但是怎么也对不上。周恩来知道后，通知公安部部长李震，让公安部的专家到卫戍区去参加拼对。结果，不到两小时就对好交给吴忠，分别是两张十六开的白纸，上面有红铅笔写的字。

一张上写着“盼照……宇驰同……的命……林……九月八日”。

另一张是：“永生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

吴忠立即到大会堂将这两张纸条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叫来李德生、纪登奎，和吴忠一起，审看这两张碎片拼起来的纸片。周恩来端着放大镜逐一仔细查看。

当晚，周恩来叫李震、吴忠和政治局委员等十几人来到福建厅。只见大厅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搪磁盘子，里面放着一个大黑本子，本子上有两页白纸，是贴着很多碎纸片拼起来的有数行字的两张条子，就是9月13日在迫降的直升飞机现场捡回的碎纸片拼接出来的纸条。

当场有人提出：“这是手迹吗？”

周恩来让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这两张纸条。吴法宪看了后说：“空军没有‘永生’这个人。”

邱会作走近桌子看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表示怀疑。当他一抬头，看见周恩来就在旁边。

邱会作和李作鹏也说不知道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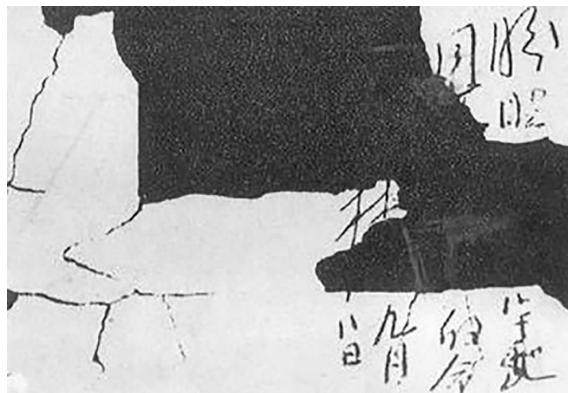
黄永胜看了后一下就坐下去了，气得一言不发，情绪很不好。

吴忠介绍了这两张纸条是动用了大量民兵收集起来的事情经过。

然后，由吴法宪介绍了那架直升机企图出逃和迫降的经过。

随后，李震详细地介绍了直升机上的情况，及直升机迫降后周宇驰、于新野自杀和李伟信还活着等事情。

又过了两天，在坠机现场又找到了“月”字边的碎片，对上了是“永胜”。周恩来拿去给毛泽东看了。



这两个“手令”起到什么作用呢？李德生后来通过多次在亚洲疗养院讯问收审人员和学习班人员，逐步弄清了详细情况。

第一张“手令”，即“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是9月8日晚，林立果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后，于西郊机场，先给前来迎接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看了，随即命令他准备两架飞机，林彪要用。然后他回到毛家湾，又给林办秘书于运深看了林彪的这张“手令”。于秘书记得，上面是用红铅笔竖着写的，没有章。

当晚，林立果、周宇驰向江腾蛟出示了这一“手令”。9月9日，又在空军学院给王飞看了。9月10日晚，林立果给关光烈看了林彪的“手令”。9月11日晚，周宇驰向鲁珉再次出示了这一“手令”。直到9月13日凌晨3时15分，党中央已经下了禁空令，周宇驰还是靠这个“手令”，骗取了直升飞机。

第二张“手令”是写给黄永胜的，“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于是它从王飞手里两进两出。第一次交给王飞是9月10日下午，刘沛丰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后，林立果让王飞适时递交黄永胜，并由王飞作黄永胜与林立果之间的联系人。可是11日夜，得知毛泽东离开上

海后，林立果下令“解除任务”，于 12 日上午，林立果派刘沛丰把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从王飞手里收了回去。到了 12 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布置王飞组织南逃广州，由于新野再次把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交给王飞，以便向黄永胜出示，安排黄、吴、李、邱 13 日凌晨乘飞机南逃。12 日夜，周宇驰接到林立果的电话，说是去广州的计划肯定不行了，连忙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这一“手令”又由王飞交回到于新野手里，于新野交给周宇驰，带上了直升飞机。

这个“手令”最终没有到黄永胜的手里。

第1201回：拟《通知》，政治局举杯相庆 葬林彪，丁盛汇报“李必达”

9月16日晚上20时，中央政治局在福建厅等待。一直到21时，周恩来才从毛泽东那里回来。他说：“已经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很快要发一个文件，把‘913事件’通知到全党。”他提出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文件，大家同意。

在讨论这个《通知》的传达范围时，张春桥提出：“《通知》只传达省、市、自治区的常委，范围是否太小了，各地的中委和候补中央委员也应当传达。”

叶剑英说：“为了保密，目前还只能传达到省、市、自治区的常委，不能扩大。”

姚文元反驳说：“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跑了，为什么不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传达？我们作为政治局委员，有责任提出这样的问题。”

接着，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人，都表示同意姚文元的意见。叶剑英坐在那里半张着嘴，一句话也不说了。

最后，周恩来也表示同意姚文元的意见。

周恩来提出：在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时，《通知》要强调治病救人，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他还特别提到，文件上要表扬一下林立衡，因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来、汪东兴报告林彪有可能出走的消息。大家也一致表示同意。

接下来，周恩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和他二人共同回忆的林彪曾经犯过的十六条错误。大概是：

一、林彪在井冈山时，就怀疑红旗究竟打多久，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封长信，就是针对林彪的。

二、1934年，在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期间，林彪拥护王明路线，

写文章赞扬李德的“短促突击”。

三、遵义会议后，反对毛泽东的作战计划，说什么“现在是走‘弓背路’，不走直路，弄得部队非常疲劳”。

四、长征部队到达贵州以后，林彪主张在土城同敌人一次决战。土城战役没有打好，部队向云南转移的时候，林彪不愿意去。

五、在土城战役之后的不利情况下，林彪又主张在贵州的鲁班场同国民党打一个决战。

六、红军过金沙江以后，林彪在会理会议上提出，不要毛泽东和朱德指挥队伍，要彭德怀来指挥，并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彭德怀出来。

七、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林彪拥护张国焘的主张，所以张国焘的伪中央选了林彪当中央委员。

八、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林彪不愿意留在陕北，要求毛泽东给他两千人、枪，他要带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九、林彪不愿意当红军大学校长，认为这样就是贬低了他。

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林彪又执行了王明的路线，主张同国民党合作，不搞共产党的独立自主。

十一、陕西洛川会议上，林彪主张扩大规模运动战，不主张搞游击战。

十二、平型关战斗以后，毛泽东指示以营为单位进行游击战，而林彪主张以团为单位开展运动战。

十三、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居功自傲。

十四、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单人独马地闯到阎锡山的部队里，被阎锡山的部队开枪打伤。

十五、林彪在负伤以后，要求到苏联去养伤。当他从苏联养伤回来以后，中央派他到重庆当谈判代表时，他有“右倾”情绪。

十六、一九四八年的辽沈战役中，林彪在东北不愿意执行毛泽东和中央的先打锦州的指示，主张先打长春。

会议最后，周恩来说：“明天政治局的同志都回家住，不用住在人大礼堂和京西宾馆了。吴法宪在政治局的活动多，空军的指挥暂时由曹里怀、王辉球、邝任农、薛少卿、梁璞组成五人小组负责指挥，李德生

协助吴法宪处理空军的一些问题。”说完，周恩来问吴法宪：“是不是同意？”

吴法宪表示：“坚决照办。”

周恩来还在会上宣布：“军委办事组也回西山办公。”

临散会，周恩来十分高兴地说：“今晚由张春桥做东，买一瓶茅台酒。”

张春桥马上说：“好。”随即叫服务员拿来一瓶茅台酒，给每人倒了一杯，并说：“我们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好工作。”

大家碰杯喝干后，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说：“大家回去休息。”

黄永胜站起来就往外走，周恩来立即让秘书纪东把他叫回来。

纪东在大会堂北门下台阶处追上了黄永胜。

周恩来和黄永胜又谈了约20分钟。

留在大会堂的工作人员，都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可以回去和家人团聚了。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大家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

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这是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万幸的周恩来！只见他面对墙壁，双肩在剧烈的颤抖……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不管是外交上的剑拔弩张，还是党内错综复杂的局面，他永远应付自如，有用不完的智慧和精力。而且，他仿佛是专为克服困难来到这个世界的，往往越是困难、艰险，他越有力量和办法，仿佛世界上没有难得住他的事情。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纪登奎，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是在重复着周恩来刚才讲的话。

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

再说黄永胜回到家里，他的大儿子黄春光问他：“爸，听说林彪他们跑到国外摔死了？”

黄永胜问：“你们都知道了？”

黄春光说：“知道了。”

黄永胜气恼的大声喊：“跑什么跑，害死人！”

黄春光问：“他们为什么跑？到底什么事儿？”

黄永胜生气的说：“我哪知道啊？”

黄春光说：“他跑了，这么大的事，你是不是给主席写一个检讨？”

黄永胜说：“我检讨什么？他跑，我不知道。九届二中会我没上山，也检讨了。现在，我也没犯新错误，我检讨什么？！”

黄春光说：“最起码，你对林的事情做一个表态。”

黄永胜说：“我怎么表态？现在中央都没态度，我表什么态？”他对儿子说：“表态和不表态是一样的。”

黄春光说：“那我不上班了，咱们准备回老家吧。”

黄永胜说：“不用，你去上班吧。”

黄春光说：“我不上班了，在家陪你吧。”

黄永胜说：“不用，你还是上班，看看再说。”

9月16日晚上，广州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研究几天来的应变工作情况。会间休息时，丁盛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忽然，他拿起了保密电话机，要通了周恩来，汇报军区清查工作情况。他特别提到黄永胜有个叫李必达的秘书，关押在军区政治部管训队，请示该怎么办？周恩来当即表示：“这件事我知道了。把李必达关押起来是错误的。当然，秘书偷听首长的电话也是不对的。这个人先不要放，对他的处理稍后再通知你们。”

李必达入伍前是武汉大学学生，入伍后分配到第41军锻炼，1966年在该军121师362团4连代理副指导员。此时362团政委是曾任黄永胜秘书多年的于贯文，他对李必达产生了良好印象。1967年12月底，军区机关从41军为黄永胜选调秘书，此时已升任121师政治部主任的于贯文举荐李必达中选，于1968年开始给黄永胜当秘书的。

初任秘书的李必达干劲十足，黄永胜夫妇都很满意。

于贯文于1968年初被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工作，黄永胜到北京工作后，他与黄永胜夫妇常有接触。作为李必达的举荐人，他自然关心李必达的表现，曾向“黄永胜办公室”主任、黄永胜夫人项辉方了解李必达的情况。项辉方说李必达“表现很好，人老实，能写东西，文字水平超过语言表达能力，首长很满意”。项辉方对李必达关爱备至，光是为他找对象就费尽心机，多次亲自出马。

1968年底，“黄办”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学习。这期间，李必达因为一件小事引起“黄办”主任、党支部书记项辉方的不满，发动“黄办”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帮助。李必达多次检讨都未过关。入伍后一帆风顺的他难以承受这意外挫折，自感前途渺茫，内心痛苦之极，多次找老领导于贯文倾诉。一次，于贯文当着李必达的面给项辉方打电话，委婉地指出对李必达的问题是否看得太重了？建议不要抓住不放，“好聚好散，实在不行，叫他回广州算了”。但是，项辉方一下子来了原则性，坚持要把问题查个水落石出。

李必达感到自己被逼到了绝境。他曾向项辉方汇报过，一次黄永胜在与叶群通电话时，大骂江青“想当清朝那个女人”。这可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行为。李必达当时反映这个情况，还是出于对首长的关心，因为黄永胜住地小翔凤胡同是居民区，他讲话一向是高嗓门儿，李必达是怕隔墙有耳，造成不良后果。

1969年4月，李必达与他的恋爱对象王瑞华商量后，决定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揭发黄永胜等人的反党罪行。当时，他们认为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温玉成在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时与黄永胜有矛盾，此时他又负责“样板团”，能经常见到江青，便于4月27日深夜，将揭发信交给了温玉成，请他转呈江青。

温玉成收到李必达的揭发信后，考虑再三，还是把信交给了林彪。

叶群看到李必成的信后，立即于4月29日在京西宾馆一楼会议室与黄、吴、李、邱开会决定，将李必达秘密逮捕。

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前几天还在给叶群写信反映黄永胜的作风问题，此时也立即加入了帮助丈夫的活动中。军委办事组几位要员要项辉芳做到3条：一、快把写信的李必达找到；二、在党支部宣布李必达偷听电话、窃密、造谣、挑拨关系等罪名，但要绝对保密；三、搜查李

的所有东西,凡是犯罪证据,谁搜出来的谁签名,支部书记(即项本人)要签名。

4月30日,被密捕的李必达由吴法宪派飞机送往广州军区监狱关押。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李必达在《毛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纸上写下:“因为我揭发反革命集团罪行,所以被害,要求革命同志帮助我向毛主席报告。”机组人员在飞机上拾到语录本,交给吴法宪,吴法宪交给叶群,叶群又把黄永胜和项辉芳叫到毛家湾研究此事。她让项辉芳给黄、吴、叶、李、邱写报告,给李必达罗列盗窃机密、企图谋害总长、散布流言蜚语、行动诡秘等罪名。5月下旬,项辉芳又专程到广州了解对李必达的审查情况,给看守人员讲话:“这个案件很重要,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案件,办事组首长亲自抓。”此后,加紧了对李必达的看管和审讯。

“913事件”后,经周恩来批准,将李必达从广州接回北京,恢复自由。这时,江青才知道温玉成将李必达揭发黄永胜骂江青的信抓交给黄永胜了,气的大叫要把温玉成枪毙,周恩来压下了这份报告。

1971年10月28日夜,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接总理办公室通知,就地隔离审查温玉成。

9月16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官员第二次来到坠机现场。

孙一先注意到,与第一天相比,现场多了一支微型冲锋枪和一支手枪,还有两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一个是工具包,装着扳手、钳子等,还有一个机关人员的文件包,也是工具,但里面还有一支手枪。

蒙古司长高陶布问许文益大使,法医是否可以开始工作?

许文益大使认为死因十分明显,死者是由于飞机失事而死亡是清楚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解剖,不必再折腾了。

因此双方商定不进行法医解剖而埋葬。

蒙方士兵已连夜挖了大坑,长15米,宽3米。并赶做了九口白茬棺材,蒙古士兵将每具尸体都用白布包裹,由北向南编为1至9号,按编号入棺。9号尸体(潘景寅)身躯高大,爆炸瞬间两手上升,僵硬了。棺材很小,勉强装进去,却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看看许文益大使。许文益大使痛苦地点点头,只听咯吱咯吱的骨折声。

之后蒙古士兵钉上棺盖,用汽车拉到墓坑边,按编号逐一下葬。

按蒙古习惯,死者应覆盖红边的长条黑布,然后盖棺。但是来不及了,只好在九具棺木上覆盖整幅红布,上面再覆盖稍窄的黑布。高陶布对此表示歉意。

11时,9名死者被安葬在距失事地点西边1.1公里的无名高地的东坡,东经 $111^{\circ}17'40''$,北纬 $47^{\circ}41'20''$ 。

棺材在墓坑里排成一排,每人一锹土。许文益大使和高陶布、桑加上校分别执锹填土。接着孙一先和王中远、沈庆沂也填了土,最后由蒙古士兵填埋,堆起略高出地面的坟头。每具棺木的头顶都竖立一块高出地面的木牌,涂着红色的阿拉伯数字。写上“中国九同志之墓”,因为不知道姓名。

大火后仅存一份林立果个人证件,被蒙古人拿走了。

许文益大使问:“昨夜提出的关于墓碑和放纪念物的问题是怎样考虑的?”

蒙古司长高陶布说:“墓碑暂不定,纪念物可以从飞机残骸中选一个,不写字。”

沈庆沂出主意,把写“中国民航”的两段机翼放在上面,蒙方说太大,不容易搬动。王中远说不如把机尾炸掉的那个发动机进气环搬来。高陶布和桑加互相交换了眼色,表示同意。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拉来放在坟头上面。

蒙方要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提供飞机乘员名单,中国方面没有正式答复。蒙方认为:如果真是民航飞机,蒙方的要求中方是可以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蒙古政府认为,要确定这架飞机坠毁和人员死亡的原因,必须要有一个调查报告。

9月16日,许文益他们回到温都尔汗已经是17时多了。当晚22时左右,蒙方送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要求连夜会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沈庆沂和王中远马上翻译,等文件翻译出来已经是9月17日凌晨1时。

蒙方的《现场调查纪要》一口咬定是军用飞机,抓住出入证、手枪、军服这些军人物品死死不放。死者的脸形虽然分辨不清,但从烧毁衣

服的特征、周围的武器、某些死者身上没烧毁而留下的手枪套、子弹带和从失事地点找到某些证件来看,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在失事地点有手枪7支,自动枪1支(实际上是2支),有的已经烧毁,子弹43发,枪套8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5元一张,10元6张,共65元,烧了一半和完整留下的军服、床上用品、椅套、书籍本子、手表等东西。其中有些东西由地方有关部门保管着。这些迹象证明,失事飞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

这时,蒙方不再使用“侵犯”和“入侵”,改用“进入”,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

9月17日凌晨4时25分,中蒙双方在旅馆正式会谈。

中国大使许文益首先发言,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各种方便条件和蒙方人员的友好合作,表示感谢。接着提出十条修改意见。主要三点,提议把“进入”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不能光讲中国国旗和256号,要加上“民航”二字。机上有“军事人员”,也有“非军事人员”。对于蒙方提交的《安葬纪要》,许文益提议,将序言部分改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9名人员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

许文益发言后,蒙方建议休会10分钟。但蒙方并没有复会,而是到邮局发了电报,一直拖到9月17日上午10时15分才复会。

在等待时,许文益收听到外电报导,称中国关闭了所有的机场,禁止所有的飞机起飞。这是不是与失事飞机有关?许文益考虑形势紧迫,不宜久拖,要赶快向国内报告现场视察和谈判的情况,听取国内指示。

实际上,国内也很焦急。怎么大使许文益到现场视察还没回来?国内急需知道现场的情况,毕竟眼见为实呀。

9月16日23时30分,就在许大使他们还在温度尔汗等待蒙方《现场调查纪要》的翻译结果时,一份催问视察情况的电报从国内发到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并询问为什么在现场滞留?许文益感觉到国内的焦急,复会后,向蒙方提出“鉴于我国庆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在乌兰巴托继续会谈。如果蒙方一定要在这

里谈，我方则由孙一先代表大使继续商谈。”

蒙方听说大使要走，有些意外。说“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了解和分析现场，双方都有尽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大使工作很忙，大使也了解我们的工作也很忙。关于大使要回乌兰巴托，我们已经报告上级，上级通知，希望尽快把《安葬纪要》完成，我们一起回去。”

双方在温度尔汗又谈到9月17日下午，蒙方对中方的修改方案逐一驳回。不同意写上中国民航因为“迷失方向”，认为蒙方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没有必要，也没有根据这样写。也不同意加上“民航”。会谈有些僵了。

到第三轮会谈，已经是15时20分。蒙方看《现场调查纪要》达不成协议，转而讨论《安葬纪要》，争论的焦点还在是“军”是“民”上。

前后进行了五轮谈判，为避免搞僵，许文益建议大家不要着急，回乌兰巴托继续谈。《现场调查纪要》通过了，《安葬纪要》自然就解决了，事情可以圆满结束。

蒙方高陶布拒绝，表示他们马上要单方面签字。

许文益表示遗憾，最后一轮会谈不欢而散。

第 1202 回：检讨难，黄、邱二人抱头痛哭 谢静宜，受委托看望总理

再说上海这边，9月13日，王洪文放下许世友的电话后，立即跑到康平路找与他共同主持上海工作的徐景贤，向他详细地叙述了许世友的电话内容，两人又仔细地分析了半天，结论还是：“吴法宪跑了！”

徐景贤说：“空军司令调一架飞机很容易的，可能他飞走了。不过，他究竟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

王洪文也想不通：“国内不像，总是朝国外跑。”

正当王洪文与徐景贤密谈的时候，市委机要室送来一份绝密电报：《毛泽东摄影画册》暂不发行，特别提到第几号、第几号照片要删掉。

《毛泽东摄影画册》正式出版的消息是9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的，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而编辑出版的，报道说：“这套照片中，有几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使人亲切地感到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这本画册是在上海制版印刷。此时，徐景贤马上拿出早先收到的画册目录，一幅幅对照，一看，这些指令删掉的照片竟然全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也就是说凡是有林彪出现的照片都要删掉。王洪文和徐景贤心里都大吃一惊，但谁也没说。

禁空令下达后，正好有一个朝鲜高级新闻代表团在上海，下一站要飞往韶山。怎么向他们解释呢？外交部也说不出理由，就说改道走吧。徐景贤没有办法，只好让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安排他们改乘火车去韶山。

9月15日，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从智利回到上海，只见机场的客人聚集很多，飞机几天不准起飞。正在这时，管外事的人说：“周总理

特许青年代表团一行乘一架载送重要外宾的客机回北京。”

到了北京，中联部的领导先让代表团在北京饭店写出国访问的总结报告。代表团团长、8341 部队机要员、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的谢静宜打电话问 8341 部队杨德中政委，询问“主席、总理在哪里？”

杨德中说：“小谢，两位老人家都好，你放心吧！”

两天后，谢静宜见到了毛泽东，老人家跟她谈了“913”事件的经过后，让她去看望周恩来。毛泽东说：“总理这一段特别辛苦，‘913’发生后，他一直吃住在大会堂指挥工作，紧张得很呀。现在没事了，让他睡几个好觉。”

另外，他还让谢静宜转告周恩来一件事：“远新来电话，想回来看看我，他说不看到我，总有点不放心。这事得请示总理一下，远新是军人，现在能不能离开岗位回来几天？请总理定。”

谢静宜来到西花厅，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对她谈了“913”事件发生后的紧张情景以及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我时刻观察着飞机的动向，命令全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和立即采取的一切措施。把几员大将叫到大会堂来，一是为了好控制他们，二是为了面对面同他们谈话，问清林彪这次逃跑与他们的关系，他们几位是否知道……直到弄清林彪座机坠毁后才松了一口气。”

9月17日上午，依然住在大会堂的吴法宪起床以后去找周恩来，向他请示说：“我准备回空军了，看总理有什么交代。”

周恩来说：“你回去吧。回去后可以在空司开会，揭发批判‘913事件’。要注意稳定空军和民航，弄清问题，防止人、机外逃。为了帮助你工作，我准备派杨德中到空军去参加你们的会议。”

吴法宪回空军大院以后，参加李德生召集空军司令部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议。见到李德生，他连连表白说：“主任啊，我们空军犯了大错啦，我有罪啊！”会上，吴法宪首先作了检查，表示空军的问题，“首先自己要负主要责任。”

会议上发言很踊跃，大家纷纷起来揭发问题，并对“913事件”表示愤慨。会后，李德生将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等4个人留下谈话。

9月17日，周恩来听取李德生、纪登奎汇报亚洲疗养院收审人员

情况后，对李德生说：“你去和他们4个人分别接触一下，看看他们有什么揭发交代，看看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周恩来说的这4个人是黄永胜、吴法宪、李左鹏、邱会作。因为这几天他们虽然天天在人民大会堂和周恩来见面，却没有向中央反映任何情况。

当天下午16时，周恩来给黄永胜打电话，他没在，理发去了。周恩来又给邱会作打电话。

听说是“总理的电话”，邱会作赶紧拿起话筒，他儿子邱路光和他妻子也都凑到电话旁边听。

电话里，周恩来对邱会作说：“刚才，我同黄总长打电话，他理发去了。现在，我把要同他说的话，先同你说一下，等会儿你到山上去同他说一下，我现在就去睡觉了。”

现在有好多迹象表明，三北边防是有些情况的，值得重视，你告诉黄总长今晚召开一次各总部、军兵种首长会议，把三北情况很好研究一下，并要尽快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具体化，战备工作还是由黄总长负责。告诉黄总长可不许撂挑子呀！”

邱会作回答说：“总理的指示精神我懂了。我很快就上山去向黄总长报告。”

周恩来又问：“你现在干什么？”

邱会作答：“我在想问题，准备写报告。”

据邱会作讲，他从16日就开始在总后的家中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报告。但写了一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他觉得在当时那种严峻的情况下，自己间接知道的不能乱说，很多事情也无法说清楚。关于“庐山会议”一事的检讨，毛泽东那里已经通过，这之后他只在周恩来带领下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过工作，没有单独谈话。“五一”节在天安门上向林彪敬了个礼，也没有和林彪单独谈话。除此他与林彪没再见过面，也没有通过电话，他觉得没有什么新问题，报告一直没有写成。

周恩来听说邱会作在准备写报告，就对他说：“想问题就很好。对历史上的事，不想是回忆不起来的。会作呀，你的水平怎么这么低呀。你怎么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

邱会作说：“总理呀，我不只是水平低，我的觉悟也很低。对现在

发生的事，我想不通，也说不清楚，更是写不清楚。”说完，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心想：“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我不和他搞在一起，还能和谁搞在一起？！”

电话这边，周恩来“啊？！”了一声，有些吃惊地说：“你还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是不对的，你的事没有多少，黄，吴麻烦一点，黄总长是横竖看不起江青。你过去同我说过的那些问题，现在证明你说的是对的，对那些问题，我是不会忘记的。最近两、三天内，我会抽时间来找你谈，你的情况我还会同毛主席谈。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你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是保你的。一会你见到黄，也要给他做工作，尽快向主席表示态度。”

邱会作说：“这个时候做黄的工作有难度。”

周恩来说：“你去做工作嘛！批陈整风会上，黄不肯检讨，说他在庐山没有发言，还跟我们讲党性原则。后来，你做了工作，他才肯检讨，我相信你能做通工作。”

“好，照总理的指示办。”邱会作答到。

放下周恩来的电话，邱会作感到轻松很多。他对在场的妻子胡敏和儿子邱路光说：“这下好了，总理保我了。快搞饭吃，我们上山。”

吃完饭，邱会作就和胡敏、邱路光上了西山。

到了山上邱会作的住处西山3号，邱会作叫儿子先到黄永胜家看看他理发回来没有。黄永胜住在西山最高处的9号，9号下面就是庞大的地下工事，那是军委前指的所在地。

一会儿，邱路光回来说：“黄伯伯回来了，请你去呢。”

邱会作问儿子：“你黄伯伯在干什么？”

邱路光说：“他在批文件，并对我说，他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然后他放下笔，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相框给我看。他说，路光呀，这是我在井冈山当排长时照的，像不像我？”

邱路光还没有讲完，邱会作就起身去黄永胜那里了。

大约18时30分左右，邱会作在西山9号见到黄永胜。两人坐下来后，一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反而沉寂片刻。最后还是黄永胜先开了口。他说：

“老邱啊，我们以后谈话的机会不会多了。”

邱会作何尝不是如此感觉……他对黄永胜说：“总理保我们了。”他讲了周恩来说来电话的情况。

黄永胜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总理做不了这个主，江青不会罢休的。我们过去上了汪的当，他利用我们看不惯江青的霸道啊，看不惯江青对老干部没有感情，她到处出口伤人啊，看不惯江青在政治局颐指气使，为难总理啊，汪东兴老鼓动我们去反江青，说主席讨厌江青。那次我和胖子去反映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才知道主席对江青根本不是汪说的那么回事，其实主席很在意江青。”

黄永胜说的“那次”是指1970年5月17日他和吴法宪到毛泽东那里反映江青私自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一事。

黄永胜接着说：“我看最多把我和胖子抓起来，总不能都抓起来，难道都不要了吗？党有政策嘛。你放心，把我抓起来，我什么都不会说。江青会算老账，要算老账也还是那些，没有什么可怕的。”

邱会作说：“就是没有什么可怕，才难办呢！问题就难在这里。”

黄永胜：“我们也有嘴嘛！我们反江青、张春桥，有道理嘛！不顶住他们那一套，不行嘛！支持总理工作有什么不对！？过去主席是不会出面管这些的，现在不同了，他们会骑在我们头上做林彪是‘反革命’的文章。”

他说到这里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走到有一幅巨大的三北地图的墙前，大声疾呼：“你跑什么跑，害死人呀！”

随后坐下来又说：“庐山会议以后，我们还没有吃够苦头？我看，林彪的下场就是反江青的结果，现在该轮到我们头上了。”

黄永胜说着、说着有些不耐烦了，突然说：“说这些王八蛋干什么，算了，不说这些了。”

他问邱会作：“老邱呀，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邱会作：“我在江西苏区就知道你，我刚参军时，你就当团长了。”

黄永胜：“打张辉瓒时，我就当师长喽。”

他问邱会作：“你们家穷不穷呀？”

邱会作：“穷的就差光屁股了。我们家穷是穷，不过，从辛亥革命时就是老根子了，革命党人常逃到我家歇脚，江西苏维埃时期，我爷

爷,我父亲、母亲都一齐上阵搞革命。红军撤离苏区后,敌人把我们家的房子都烧了,全家躲在山洞里。1949年方强他们南下时,一个团部指挥所就设在我们家。”

俩人你一言我一语,从江西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路上、延安、热河、东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广西剿匪、十五兵团、华南军区、中南军区……说着说着,都开始流泪,边说边流,黄永胜后来更是大哭起来。

参加战备会议的人陆续来了,他们的谈话也就结束了。

会后,黄永胜还是把周恩来给邱会作打电话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家人。

当晚20时3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周恩来谈话,审阅了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批示:“照发。”

这份《通知》说:“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

“通知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

对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通知》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阶级敌人分裂我党我军的阴谋总归是要失败的。中央相信,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必将使全党全军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我们全党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份《通知》第二天传达到省、军级。

17日21时多,周恩来打电话问吴法宪,说空军司令部有6个人跑

到了广州,问他知不知道?

吴法宪说:“不知道。”

周恩来让吴法宪查一下,原来是空军司令部汽车队的王琢、雷达兵部的许秀绪、情报部的王永奎等人跑到了广州。吴法宪当即通知广州军区空军政委焦红光查明情况。

过了一个小时,焦红光给吴法宪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这6个人。他们先是到白云山雷达站,以后又到了9师沙堤机场,最后向北走了,现在已经到了韶关附近的雷达站。”

吴法宪命令焦红光立即把这几个人抓起来。

焦红光说:“已经要求广州军区协助我们办理此事。”

随后,吴法宪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晚上23时,周恩来给吴法宪打来电话说,据广州军区报告,这6个人已经抓到。他让吴法宪要注意加强对空军领导机关的管理,强调纪律,所有人员不经过请假批准,不准外出。

吴法宪向周恩来表示坚决照办,同时将周恩来的指示转告曹里怀、王辉球、曾国华等人,要他们一起进行布置。

处理完这些事情,已经是深夜。吴法宪回到家。这是9月12日晚上去大会堂开会后,他第一次跨进家门。见到妻子陈绥圻,吴法宪告诉了她这几天的情况。他说:“我对‘913事件’以前确实毫无所知,如果我知道了,我绝对会报告中央,绝不会去投靠苏联。我15岁参加革命,全家六、七口人被国民党迫害光了,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人,我绝不会离开党,离开人民和祖国。你不用担心,我在‘913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准备向中央写检讨。”

陈绥圻说:“见到你真高兴。今天张叔良告诉我,在查抄于新野的宿舍时,查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对你和‘吴办’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地记录,连秘书张云龙是什么时候走的,接替他的秘书是谁,是什么时候来的,都有记录。”

“张叔良说,王飞已经通过空军党委下命令,任命他为空军党办的处长。我们都不知道。”

第 1203 回：许世友，王洪文进京开会 审江、王，巨大冰山渐显现

9月17日20时3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国内报告，大使等人已于19时回到乌兰巴托，并简要报告了他们在坠机现场勘察的情况和延长时间的原因。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告中国驻蒙古使馆：速派专人送回256号飞机坠毁现场照片、资料等，并面报详细情况。

9月18日凌晨1时，大使馆向国内报告，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孙一先连夜整理出三个报告：《视察坠机现场概况》、《飞机与尸体状况》、《安葬死难者情况》。又赶写两个《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精心绘制现场测量示意图，死难者尸体位置的放大图，在蒙古全图上标绘了现场位置图。还整理抄清了五次会谈记录，以及蒙方提出的两个《纪要》等。

向国内发去这四个报告后，许文益大使请示：“如果蒙方人员有意无意把中国民航飞机在蒙古坠毁之事散布到外国使团中去，有人问有无此事，我馆如何回答？”

几个小时后，周恩来亲自批准的外交部复电指示，就说“国内正在查实，暂时无可奉告”。

大使馆在关于《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中说：“我们初步估计，由于双方存在分歧，制定文件可能不了了之，当然可能还要继续谈。我们准备同他们谈，继续交涉要求归还遗物。”

9月19日上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收到国内遵周恩来嘱咐发来的电报：“关于两个《纪要》问题，你馆暂不主动找蒙方继续会谈，等派人回国汇报研究后再说。”

国内还有一个指示，要求注意观察蒙方和驻蒙苏军有无战备动作。

于是，孙一先到乌兰巴托市周围走马观“花”，总的印象是蒙军和驻蒙苏军都有异常。乌市西区陶拉盖图的北山沟，蒙军的导弹发射架

都装上了防空导弹,探测和搜索雷达一直在旋转。市区苏军的军用汽车比往常增加,铁路两旁的苏军基地也格外繁忙。距乌兰巴托市50多公里的大型后勤基地,载重汽车进进出出。几十个战备油罐群,都被铁丝网圈了起来,还站上了岗。距乌兰巴托市100公里的巴彦机场,停在滑行道边的歼击机都脱掉了“衣服”。飞机不断起落,却不是平常训练。乔依尔车站以北20多公里有苏联空军的一个大型机场,在密闭的列车里都能感觉到轰鸣的刺耳。

9月19日晚,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外交部报告,孙一先于20日乘4次列车离开乌兰巴托回国。

9月17日,许世友奉命进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特别嘱咐:不要乘飞机,要乘火车,顺便带着上海的王洪文同车同来。军交部准备了公务车,加挂在特快列车后面。这节车厢备有单人房1间、双人房1间、4人房两间,还有伙房和卫生间。单人间内置大床1张、写字台1个,浴室和厕所是专用的。车尾是会议室兼餐厅,很宽敞,十几个人开会、吃饭不显得拥挤。周围有玻璃窗,外面的景色尽收眼底,所以又叫望车。

王洪文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马上乘火车去南京,和许世友一起到北京开会。他和徐景贤分析:“这次去一定跟有人跑了有关系,可能涉及到庐山会议,最好不要让王维国知道。”同时,他们还认为:王洪文到北京去这件事要保密,尽量不告诉其他的市委常委。所以,二人商量,此事只有徐景贤一人知道,也由徐景贤一人去送王洪文。

当时康平路大院的警卫是由空四军的处长李松亭负责,警卫员也都穿空军制服。假如李松亭和警卫员们看到王洪文上北京去了,也会向王维国报告的。于是王洪文叫秘书小廖把警卫员支开,然后让从工厂调来的司机小常开了一辆北京吉普,停在王洪文家门口,徐景贤和王洪文两人悄悄地上车去了上海北站。

谁知道他们刚刚进站,还没登上火车,就碰到市委警卫处的空军干部,是送到上海探亲的家属回乡,到火车站送行的。

徐景贤和王洪文很紧张,以为又暴露了王洪文外出的行踪。王洪文对徐景贤说:“这样吧,你回去后索性开一个市委常委会议,名义是

讨论别的工作，会上你宣布我到上海小三线安徽去了，理由是中央布置一级战备，王洪文到小三线检查战备去了。”

于是，送走王洪文后，徐景贤就在康平路召开市委常委会，宣布王洪文的去向。

王维国也是市委常委，但那天他请假没来，说是病了。徐景贤给王维国打电话，王维国说：“我身体不太好，正在家里休息。”

徐景贤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

王维国推辞说：“你很忙，不要来了。”

徐景贤说：“我很快就过来。”

王维国家住空四军江湾军部大院对面的家属宿舍。9月13日早上，王维国正在北京的儿子王大璋坐火车于14日回到上海。王维国问儿子王大璋，在北京遇到什么事情？并反复问：“李伟信讲谁要离开北京？”

王大璋说：“林立果。”

王维国又问：“据他们说，有一架飞机要过来，可是到现在还没有过来。而且讲丢了一架飞机，他们会到哪里去呢？”

王大璋也不知道。

王维国给北京打了几个电话，谁都联系不上，这些人怎么全都“蒸发”了？他意识到可能出事了，于是叫人带两瓶感冒药坐火车到北京，给江腾蛟送去。

9月15日，江腾蛟老婆李燕平到车站见了王维国从上海派来的送药的人，叫他赶快回上海，并托他带回一张纸条：“周、于已自亡，李被他家接去，家当都卖光了，我们也没办法。”

看到纸条，王维国才知道真的出大事了，于是抱病在床，没有参加徐景贤17日召集的常委会。

王维国的妻子杜贵珍听说徐景贤要来，就在家门口迎接，将徐景贤送到二楼寝室，只见王维国躺在床上，见了徐景贤，欠着身子，很热情地握手。

徐景贤问他：“维国同志，你的病情怎么样？”

王维国说：“肝脏不好，正在请中医治疗。吃了几帖中药，还不见好转。医生说我的肝脏里面有毒素，规定我吃中药时要忌口，什么荤

腥都不能吃，每天只能喝一点白粥，解除肝里的毒性。”

这时，杜贵珍端来一碗白粥给他喝。

说了一阵病情后，他们把话题转到形势方面。

徐景贤说：“9月13日，中央下达禁飞令，现在中央军委部署全国军队进入一级战备，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洪文同志接到中央一级战备命令后，到小三线检查去了。你那里情况怎么样？听到些什么消息？”

王维国说：“没有啊。我们的机场现在给陆军接管了，飞机也停飞了，我打电话问北京空军司令部，根本打听不到任何消息，我们很纳闷，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他们谈了一阵子，徐景贤说：“你好好养病吧。”就告辞了。

王洪文当过兵，所在部队的前身是华野九纵，许世友正好是华野九纵第一任司令员。在去往北京的火车上，王洪文主动对许世友说：“上海的王维国，我老早就发现他不正常。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却反对上海警备区和大军区！哪有解放军反解放军的？我是军队转业干部，至今对解放军还很有感情。”

王洪文还说：“王维国在市公检法‘支左’，好多事都鬼鬼祟祟，也不向我们报告。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你，他总想往专列上钻，幸亏被汪主任挡住了。”

9月18日下午15时，周恩来给邱会作打电话，询问昨天晚上战备会议的情况。邱会作向周恩来简要报告了一下，周恩来表示满意，没有再说什么，转问黄永胜的情况：“黄总长的情绪怎样？”

“怎么好得起来，总的来说是悲观的，还做了最坏的打算。”邱会作回答说。

“主要是什么问题？”周恩来又问。

“最主要的是，他说只知道难受，不知道‘病’在哪里？林彪给他的那封信，也是他负担很重的问题。”邱会作说。

“你同黄总长再谈一下：一、光难受不行，还是要好好想想；二、要相信毛主席、中央；三、林彪给他的信，是林写给他的，并且又未收到。这些问题，我早就注意到了。”周恩来说。

周恩来和邱会作在这里提到林彪给黄永胜的信，就是那封从直升

机坠机现场找到的信。

这天晚上,周恩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修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中央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当天下发中发[1971]57号文件。

当晚22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许世友、王洪文等与会人员开会,要许世友、王洪文把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带回去,解决空4军、空5军的问题。他再次讲了党内的10次路线斗争,讲了林彪的历史。并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地球照常转动。”接着又讲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还交给许世友10本《天体运行》,让他转送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接见后,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继续开会,研究了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责成许世友逮捕上海的王维国和杭州的陈励耘,王洪文协助。

会上,许世友让王洪文负责控制上海的王维国,他自己亲自给杭州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20军军长熊应堂打电话,要他控制陈励耘。许世友在电话中说:“你要保证陈励耘不出事。否则,找你算账。”

会议气氛非常活跃。叶剑英说:“陈老总得知林彪摔死,随口吟出自居易的《放言诗》:‘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更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倘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有人又念了一首乔冠华改动的唐人诗,原诗是:

月黑雁飞高,

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

大雪满弓刀。

乔冠华改为:

月黑雁飞高,

林彪夜遁逃。

无需轻骑逐,

大火自焚烧。

会上，周恩来讲了逮捕林彪死党和战备问题。不觉子时已过，与会者仍兴奋不已。夜餐上了酒，众人频频举杯，庆幸林彪的自我爆炸。

散会以后，吴法宪回到空军办公楼，继续参加那里已经进行了一天的揭批“913事件”的空军二级部长以上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发言都比较积极，但也有少数几个人默不作声，其中有空司气象部的副部长，他表示不相信林彪会叛逃，说“这是不可能的。”会后，吴法宪和王辉球、邝任农、梁璞等人一起找那位气象部副部长谈话，他仍然不相信。吴法宪要他好好想一想，就让他走了。

李德生再次找已经收审在亚洲疗养院的江腾蛟谈话，追问鲁珉揭发的那些情况。

江腾蛟回避要害问题，只是说：“那是林立果要我找鲁珉的。”

李德生说：“你是参加革命军队 40 多年的老同志，怎么能够听一个二十几岁娃娃的话，说不过去吧。你在那个会上说了些什么？你又要在上海干些什么？你应当好好想想，毫不隐瞒地向党交代清楚。”

江腾蛟说：“那次会，是林副主席布置林立果召开的，我没有掺进自己的意见，在上海主要是王维国执行林副主席的指示。”

李德生见江腾蛟毫无交代之意，再次告诫他：“我告诉你两个情况：第一，林彪乘飞机外逃，飞机坠毁了，林彪、叶群已经摔死；第二，鲁珉等许多人已经陆续交代了不少重要情况，包括你的事情。我希望你‘竹筒倒豆子’，彻底讲清楚。”

江腾蛟听到这里，头上再次冒汗，答应仔细想想。不久，他终于交代了 9 月 8 日、11 日林立果曾召开策划谋害毛泽东的会议情况，其中包括关于谋害毛泽东的几个方案，如放火烧停放专列的机场油库，乘救火之机下手；用日本人制造皇姑屯事件的办法，炸毁铁路。

在这些事情中，空军副参谋长王飞是个重要人物，李德生立即将王飞收审，并亲自对他宣布：“在这场斗争中，你的问题很严重，组织上决定对你停职审查。”

王飞开始什么都不说。李德生严肃批评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你这个态度，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呢？”

王飞说：“我是副参谋长兼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林立果、周宇驰虽然是办公室副主任，可是他们好多事情是背着我搞的。主任，你不知

道，我在司令部办公室是受排挤的。”

李德生问：“组织谋害主席、另立中央的会议，你参加了，怎么没有被‘排挤’啊？！”

王飞无言以对，又说：“我是受蒙蔽的，他们好多事情是背着我搞的，我并不知道。”

没过多久，王飞也开始交代问题。至此，一座巨大的冰山逐渐显现出来：

事情要从毛泽东南巡说起。

虽然毛泽东在武汉期间，刘丰一直遵守“纪律”，没有往“北京”报告，但是却在8月23日，把毛泽东谈话中关于“不要让自己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办公室主任”的内容，透露给林育英之子、林彪侄子、时任葛洲坝工程指挥部参谋长的林汉雄。

8月28日，林立果从北京打电话给林彪的警卫参谋李文普，说“北京这里形势对她（叶群）不妙”，“老李你作点准备，首长（林彪）准备在9月18日左右去广州，不要跟别人讲”。

8月底，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军委办事组给她在总参政治部或军委办公厅安排一个工作，她不当林彪办公室主任了，要吴法宪同黄永胜商量。

9月3日上午，林立果在毛家湾对“林办”工作人员王淑媛说：“宁可逃跑也不像刘少奇那样被抓住坐牢，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

9月5日，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参加完毛泽东长沙召见后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他们立即召开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主要内容。会议不准记录，但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还是偷偷往香烟壳上记了几笔。回家后，他顾不上吃晚饭，立即给北京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打电话，讲了“吹风”会的情况。周宇驰听说广州军区负责人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便说：“你们听完后也向我们传达。”

因为晚上还要接着传达，他们约定传达完后再打电话。当晚23时35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于新野处长给顾同舟来电话，听顾同舟讲了一个多小时，了解到毛泽东谈话内容，并作了15页记录。要点是十

次路线斗争，三项基本原则，三条方针，强调干部多读一点书并且加强路线斗争的教育，不要老婆当秘书，不要搞吹捧，对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军队要防止骄傲，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周宇驰原定在第二天，即9月6日去广西桂林的，此刻立即改变计划，于9月6日凌晨，打电话向正在北戴河的林立果报告了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吹风会的情况，并于当天下午15时，亲自驾直升机，和于新野一起带着15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交给叶群和林立果。

9月6日下午，正在遵化蹲点的空军办公室主任王飞，接到林立果的电话，匆忙从遵化赶回北京。

9月6日晚上，周宇驰从北戴河给顾同舟打电话表示感谢，他说：“昨天晚上于新野的记录我们都看过了，林副部长也看过了，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功。这说明你的路线觉悟高。”“林副部长要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

第五部上卷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148 回；第 1149 回；第 1162 回；第 1163 回；第 1168 回；
第 1175 回；第 1184 回；第 1191 回；第 1192 回；第 1193 回；
第 1194 回；第 1220 回；

军委办事组、中央军委：

第 1148 回；第 1149 回；第 1150 回；第 1151 回；第 1152 回；
第 1160 回；第 1163 回；第 1166 回；第 1167 回；第 1170 回；
第 1173 回；第 1174 回；第 1176 回；第 1177 回；第 1178 回；
第 1179 回；第 1180 回；第 1181 回；第 1182 回；第 1184 回；
第 1192 回；第 1193 回；第 1195 回；第 1196 回；第 1197 回；
第 1199 回；第 1220 回；

外事口、陈毅：

第 1148 回；第 1149 回；第 1150 回；第 1151 回；第 1155 回；
第 1164 回；第 1165 回；第 1166 回；第 1167 回；第 1169 回；
第 1170 回；第 1171 回；第 1172 回；第 1173 回；第 1174 回；
第 1176 回；第 1196 回；第 1197 回；第 1198 回；第 1199 回；
第 1220 回；

印度支那：

第 1149 回；第 1174 回；

中美关系：

第 1149 回；第 1155 回；第 1160 回；第 1166 回；第 1170 回；

第 1171 回;第 1172 回;第 1173 回;第 1174 回;

五一六:

第 1150 回;第 1151 回;第 1155 回;第 1162 回;第 1163 回;

第 1164 回;第 1165 回;第 1171 回;第 1175 回;第 1178 回;

清华大学:

第 1150 回;第 1151 回;第 1170 回;

北京航空学院:

第 1151 回;第 1162 回;第 1163 回;

农口、谭震林:

第 1151 回;

国防科委、聂荣臻:

第 1158 回;第 1178 回;第 1179 回;

北京大学:

第 1164 回;

北京地质学院:

第 1164 回;

贺龙:

第 1170 回;

教育革命:

第 1170 回;第 1176 回;

中苏冲突:

第 1167 回;

四届人大:

第 1176 回;第 1181 回;第 1183 回;第 1184 回;第 1185 回;

空军:

第 1180 回;第 1185 回;第 1186 回;第 1188 回;第 1189 回;

第 1190 回;第 1191 回;第 1193 回;第 1194 回;第 1195 回;
第 1198 回;第 1199 回;第 1220 回;

海军:

第 1185 回;第 1186 回;第 1188 回;第 1189 回;第 1190 回;
第 1193 回;第 1195 回;第 1196 回;第 1198 回;第 1199 回;

五七一工程纪要:

第 1194 回;第 1198 回;

上海:

第 1165 回;第 1182 回;第 1183 回;第 1193 回;第 1220 回;

天津:

第 1177 回;

华北地区:

第 1156 回;第 1157 回;第 1158 回;第 1159 回;第 1160 回;
第 1161 回;

河北:

第 1148 回;第 1152 回;第 1157 回;

内蒙:

第 1148 回;

东北地区:

黑龙江:

第 1175 回;

西北地区：

甘肃：

第 1193 回；

西南地区：

云南：

第 1152 回；第 1153 回；第 1154 回；第 1174 回；

中南地区：

河南：

第 1175 回(开封)；第 1176 回；

湖北：

第 1148 回；第 1176 回；第 1177 回；第 1180 回；第 1193 回；

湖南：

第 1148 回；第 1177 回；第 1178 回；第 1179 回；第 1180 回；

第 1181 回；

广东：

第 1177 回；第 1178 回；第 1179 回；第 1180 回；第 1181 回；

第 1195 回；

广西：

第 1177 回；第 1178 回；第 1179 回；第 1180 回；

华东地区：

山东：

第 1160 回；第 1175 回；

江苏：

第 1162 回；第 1180 回；第 1181 回；第 1182 回；第 1183 回；
第 1193 回；第 1195 回；

浙江：

第 1160 回；第 1180 回；第 1181 回；第 1182 回；

江西：

第 1180 回；第 1181 回；

福建：

第 1180 回；第 1193 回；

文革史话

之

第五部

折戟沉沙

下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文革史话之第五部折戟沉沙 / 刘朝驹著. --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21.9

ISBN 978 - 988 - 15988 - 4 - 4

I. ①文… II. ①刘…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书 名	文革史话之第五部折戟沉沙
作 者	刘朝驹
出 版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行部(00852 - 21962638)
总社地址	香港九龙弥敦道 208 - 212 号四海大厦
经 销	香港九龙书店
总 编 审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出版策划	宋艳丽
印 刷	北京云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988 - 15988 - 4 - 4
定 价	6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zgwh.cn/>

目 录

◇上 卷◇

第 1204 回:李作鹏,武汉闻“南巡讲话” 叶群慌,林立衡到北戴河	423
第 1205 回:林立果,准备上海搞暗杀 于新野,杭州去见陈励耘	432
第 1206 回:回北京,再传看“林彪手令” 怎么办? 林立果提出三条	439
第 1207 回:议未决,搞政变如同儿戏 叫暂停,关光烈来到北京	447
第 1208 回:说“不行”,叶群电话“抽鞭子” 仍未决,专列已过硕放站	455
第 1209 回:如雷轰,林立果痛哭流涕 急部署,忙执行南下方案	464
第 1210 回:“教导队”,还有个“上海小组” 周宇驰,安排飞广州计划	471

第 1211 回:林立果,三叉戟飞山海关 空司忙,王飞定南下名单	479
第 1212 回:门外听,广州不行去香港 林立衡,忙找李文普商议	486
第 1213 回:告张宏,调部队采取措施 查飞机,南下计划又泡汤	493
第 1214 回:赶紧撤,周宇驰调直升机 返上海,细筹划诱捕计划	501
第 1215 回:看文件,锦江饭店抓王、陈 又揭出,林立果上海“选美”	509
第 1216 回:搞对象,手段多层次出不穷 难置信,用权力无法无天	516
第 1217 回:关光烈,按通知护送到京 李德生,登门见黄、吴、李、邱	523
第 1218 回:外交部,厅级主任接二秘 听汇报,查飞机坠毁原因	531
第 1219 回:等十天,决定抓黄吴李邱 写检讨,吴法宪彻夜未眠	539
第 1220 回:都隔离,叶剑英主持军委 九二六,开“老同志座谈会”	545
第 1221 回:细安排,护送林立衡回京 国庆节,奉命进驻毛家湾	553
第 1222 回:王兰义,将军楼里笔记本 李伟信,又供出惊天阴谋	562

第 1223 回:江腾蛟,效忠信追随林家 林立果,搞“舰队”活动频繁	573
第 1224 回:议形势,做武装起义准备 写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581
第 1225 回:空四军,开“三国四方会议” “很重要”,此《纪要》“必须下发”	590
第 1226 回:撑病体,毛泽东见塞拉西 基辛格,第二次来到中国	597
第 1227 回:未曾想,公报草案分歧大 格式新,双方初步达共识	604
第 1228 回:喜讯到,中国进入联合国 代表团,赴美出席联大会	611
第 1229 回:周恩来,与韩丁一家交谈 从文革,到党内十次斗争	618
第 1230 回:找薛明,周恩来亲自安排 四川省,梁兴初隔离审查	628
第 1231 回:查武汉,刘丰自杀未死成 邓小平,江西致信毛泽东	634
第 1232 回:组班子,接待黑格先遣组 毛泽东,不再讲“二月逆流”	641
第 1233 回:病情重,一月六陈毅逝世 周恩来,态度明答复黑格	648
第 1234 回: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 政治局,在解决新疆问题	655

第 1235 回：年事高，毛泽东身患肺炎 性执拗，一月内两次昏迷	664
第 1236 回：历史性，尼克松总统访华 没想到，毛泽东当天接见	671
第 1237 回：书如海，基辛格由衷感慨 说哲学，尼克松赞叹万分	678
第 1238 回：欢迎宴，美国总统“争朝夕” 漫天雪，急动员连夜清扫	686
第 1239 回：游长城，尼克松自称“好汉” 到沪杭，《公报》稿基本就绪	693
第 1240 回：送熊猫，中国外交新局面 为吃药，江青那里又出事	700
第 1241 回：看宁夏，西海固回民叛乱 张国华，心脏病逝世成都	709
第 1242 回：再解决，两广、川、浙、赣与湘 下通知，杜绝招生“走后门”	716
第 1243 回：检查出，周恩来身患癌症 汇报会，中央发六个文件	723
第 1244 回：江青谈，毛泽东的那封信 周恩来，再说明“伍豪事件”	730
第 1245 回：枪响处，军政委妻子被杀 余洪信，麦田中自杀身亡	739
第 1246 回：为治安，决定开全国会议 放汉生，恩来谈基础理论	748

第 1247 回:换内阁,日中邦交正常化 震动大,西德施罗德访华	757
第 1248 回:说新疆,一份内参震天津 问“伍豪”,全军掀起退房潮	765
第 1249 回:邓小平,长信再致毛泽东 维特克,要求采访见江青	772
第 1250 回:忆往事,两位女人侃侃谈 说戏剧,共同观看《红灯记》	780
第 1251 回:归专案,周恩来见林立衡 赴广州,调总参测绘局长	788
第 1252 回:说战争,维特克再见江青 忆往事,饭桌上滔滔不绝,	798
第 1253 回:谈身世,从孩提到抗美援朝 回北京,要整理会谈记录	807
第 1254 回:抓保卫,召开全国座谈会 说贵州,王洪文进京学习	814
第 1255 回:“言必信”,中日、中德建邦交 批极“左”,《文汇报》提出质疑	822
第 1256 回:再商议,整理江青记录稿 湖南省,解决卜占亚问题	830
第 1257 回:要交代,如何连接北西东 谈问题,概括为“三专一通”	838
第 1258 回:批王新,王若水上书被批 毛泽东,逐步解放老干部	847

第 1259 回：杨易辰，批极右思想不通 议青岛，三司令致信林彪	855
第五部下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866

第1204回：李作鹏，武汉闻“南巡讲话” 叶群慌，林立衡到北戴河

同样是在9月6日，李作鹏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期间，也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那里得知了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的谈话内容。

朝鲜人民军代表团是9月4日到长沙，5日到武汉。6日早晨起床后，刘丰去看李作鹏，将8月毛泽东在武汉与他们谈话的重要内容向李作鹏透露了。

李作鹏听后震惊不已。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是没事了嘛，怎么又‘兜’出来了？而且‘纲’上得更高了。”

毛泽东南巡前，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都有批示，除了吴法宪，几个大将都过了关。毛泽东当时还问邱会作：“你这个检讨是你自己写的吗？”

邱会作说：“是。”

毛泽东说：“我死了以后，你就当国家主席吧。”

从毛泽东当时的口气中听不出讽刺，倒像有一种赞赏。他还亲口对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就为止了。”几个人非常高兴，为此专门到京西宾馆一起吃了一顿饭，表示庆祝。这之后，除了吴法宪和叶群的日子还难过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一身轻松，以为他们的检讨真过了关。可是，毛泽东这次南巡为什么又说得这么重？

李作鹏后来说：他听到刘丰对他讲的毛泽东谈话内容后，“有三个想法：一、感到庐山会议的问题还没有完。二、感觉‘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庐山会议讲的是路线问题，现在讲的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仅仅是路线问题。三、感觉是对着林彪的。因为主席有一句话，就是不同意让老婆当办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当了办公室主任的。我想，这几条的矛头是对着林彪的。我这样想了以后，有些紧张，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严重。”

李作鹏于当天，9月6日上午，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从武汉返回北京。下午他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一起与朝鲜军事代表团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把中央批准的对朝鲜的援助项目、数目宣布后，会谈就结束了。

送走外宾，黄永胜他们又回到大会堂北京厅，等候出席当晚朝鲜大使馆举行的宴会。此时，离宴会还有一个小时。李作鹏把黄永胜拉到北京厅会谈桌的西北角，悄悄地将刘丰同他谈的情况告诉了黄永胜。

吴法宪看到李作鹏和黄永胜在角落说“悄悄话”，也凑过去问：“你们嘀咕什么呢？”

李作鹏支吾说：“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

这半年来，吴法宪因在庐山上“冲锋在前”，日子越来越难过。他心急火燎，当然想知道毛泽东南巡讲了些什么？于是对李作鹏说：“这么重要的情况，你给我们一起讲讲嘛。”

但庐山会议后，李作鹏他们对吴法宪都不太“放心”，怕他再“放炮”，便搪塞说：“你知道了也没什么好处，反而增加负担。”

吴法宪不得不走开。

李作鹏特别提醒黄永胜，不要把刘丰谈的内容告诉叶群和吴法宪。

邱会作也很想知道李作鹏和黄永胜嘀咕了什么内容，在去参加朝鲜大使馆晚宴的路上，他挤进李作鹏的车，和李作鹏咬了一路耳朵。

而此时北戴河，据林彪秘书于运深回忆，9月6日晚20时30分，叶群给邱会作夫人胡敏打电话，要胡敏动员林立衡的对象张清林、林立果的对象张宁来北戴河。

张清林是黄永胜夫人项辉方介绍给林立衡的对象，湖南邵阳小镇的农家子弟，广州军区某医院外科医生，高大帅气，也很朴实。

随后，叶群亲自打电话给林立衡，让她带张清林马上到北戴河来，说“陪首长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回北京。”

林立衡说身体不好，过几天再去。叶群发了火，对她说：

“你这么大架子，爸爸请你，你都不来。现在他病得快死了，还没有见过张清林。见到你们的事定下来了，他的病就会好了。”

林立衡只好同意了。

叶群还让林立衡把林立果的对象张宁及解放军总医院放射科高主任也带去，并问林立衡能否瞒过邱会作的老婆胡敏，还说吴法宪夫妇都不知道林立衡这次去，叫她不要告诉空军。

晚上 21 时许，叶群让李文普通知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安排飞机送林立衡等人去北戴河。

按胡萍的说法，叶群使用专机就像使用专车一样，招之即来，来之即走。可是飞机怎么能是汽车？不要说专机，就是普通飞机，起飞之前也要有相当的准备时间，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汽车。汽车在地上跑，随时可以停下来，飞机在空中飞，万一准备不好是要机毁人亡的。因为专机夜航不安全，当晚没有安排。

再说 9 月 6 日当晚，朝鲜大使馆的晚宴结束后，黄永胜回到西山就给叶群打电话。而此时的叶群，因为已经从顾同舟那里得到消息，正与林立果、周宇驰在一起商议，所以不接黄永胜的电话。黄永胜急了，27 分钟连要三次，最后说有重要事情，这才接通了叶群，通话时间长达 58 分钟。之后，叶群又过去与林彪谈了一个多小时。

吴法宪不知道李作鹏和黄永胜“嘀咕”了些什么？一肚子气，回去后也给叶群打电话，说李作鹏有事情不向他说。叶群安慰他：“你不要误会，也不要再打听了，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实际上，此时的她比吴法宪紧张一百倍。

9 月 7 日，叶群、黄永胜、李作鹏之间进行了频繁的电话联系。

9 月 7 日上午，留守北京的林彪秘书于运深按叶群的要求，把林立衡、张清林、张宁送到西郊机场。但是 9 时 50 分左右，叶群又叫内勤孙忠堂通知秘书李春生，立即给毛家湾打电话，把《俄华词典》、《英华词典》，以及俄语、英语会话等几本工具书，让送林立衡的飞机带到北戴河来。并叫“林办”保密员李根清把 1969 年总参为林彪特制的那个“三北”地图也带到北戴河。但是，这份地图太大，小车里根本放不进去，请示叶群后，她说算了。飞机也因此推迟了一个小时起飞，于上午 10 时 50 分才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11 时 20 分左右到山海关机场。

中午时分，林立衡和张清林、张宁及杨森一起到了北戴河。林立衡、张宁他们 3 人被安排在距林彪住的 96 楼 400 米的一幢黄色小楼

里，警卫编号 56 楼。林立果住的 57 楼在 50 米外的小柏油路对面。

林立衡刚到北戴河，林立果就迫不及待的在中央警卫团二大队的 58 楼前拦住她，用车将她接到自己住的 57 楼。让刘沛丰守在门口，然后当着周宇驰的面对她说：

“现在情况很紧急。昨晚主任要乘三叉戟飞机逃到苏修去，首长不肯跑，被主任逼得同意了。他们硬要我调飞机，我借口来不及调，推迟了一天，今天早上把周宇驰从北京找来商量怎么办。首长见了周宇驰，抱着他哭，说：我一家老小都交你了。”

据林立衡回忆说，当时在场的周宇驰也对她说有此事。

林立果还说：

“我们过去是盟军，这种时候，我不能忘了你，就让主任把你骗来了。”

“这件事只有首长、主任、我和周宇驰知道，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张清林。如果不是我告诉你这件事，你今天坐的三叉戟把你带到苏修了，你还不知道呢！”

林立衡大吃一惊，问为什么要逃跑？林立果说：

“主任干了许多坏事，怕把她抓起来”。

他还要林立衡在林彪面前帮他说话，说如果情况紧急，她也得跟着跑。

这些是林立衡 1971 年 10 月在《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中所述。

本来，9 月 5 日，林立衡在空军报社党委会上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其中说到：

“生活在我们周围就要准备迎接风浪，最有意思的是迎风浪。我自己每天准备着迎接阶级斗争风浪。”

“我到空军来，天天摔跟头。我的名字可以改为‘斗斗’，也可以改为‘逗逗’，要乐观。这几年长了不少知识，长了身体。首长看见我的身体不大好时，就赶我到报社来说：‘去去去，快到报社去’”，说“你一到报社，你的身体就好了。”

“首长身体很好，以前作战时负了伤，内部有四颗子弹，不是要害，内脏很好，但睡觉不好，有时精神很痛苦。他那么大的年纪，但他有坚

强的毅力,看了很令人感动,他比一般没有病的老人内脏还要好。……有这样的身体也不容易。首长强调乐观,给我题字‘要乐观,坚持到底’。”

“去年这时正开庐山会议,我们想不到,就是跟不上,今年再跟不上就不行了。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别的要求没有,还是那次提的,就是要把住关,对内对外把住关。将来的路途不会那样平坦,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使报社不要转向。”

“将来的形势可能不是以前的形势,总是要革命,革命就是革脑袋嘛,不要怕掉脑袋。反正一条,横下一条心,什么都不怕……但战术上要稳扎稳打。……现在还是抓紧时间学习,缓和时学,紧张时就干,赶快吃饱,不然到时就没劲。弯弓待发,现在是弯弓的时候。……我们永远战斗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

没想到,9月7日她到北戴河后,却听到了林立果的这么一段话。

就在林立果与林立衡说话之时,李文普过来找他们,是林彪、叶群要见林立衡,让他过来叫。据李文普的回忆:“我去57楼,周宇驰挡在门口,不让我进。我告诉他‘是首长要见豆豆’,周宇驰才让我进去通报。”

张宁回忆当时的情况是:

我刚把随行东西放好,林立果便闯进门来,他见有小王护士在侧,腼腆地悄声问我:“你身体好不好?”我点头作答。乍一见面,无话可说,便陪着我们一起上去见叶群。李处长从九十六号楼出来领我们去见林、叶。

林立衡他们先去见叶群。叶群对他们说:

“过几天,首长要到大连去住一段时间。把首长身体搞好,国庆节回北京去天安门讲话。你们也陪首长去大连。”

叶群带他们去看林彪。她问林彪对张宁和张青林满意不满意?林彪连连点头说:“满意,我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很好!”

9月7日下午,林立果又把林立衡拉到57楼他房间里单独谈话。林立衡在1971年10月《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中是这样写的:

林立果讲：主席最近在南方各地找各大军区头头打招呼，要开三中全会批判叶群“夫人专政”，还要把军委办事组叶、黄、吴、李、邱都整掉。

批叶群肯定要批到首长身上。他很怕像刘少奇、陈伯达那样坐牢。

首长身体关在监狱里能活几天，就连我们也会像刘少奇、贺龙、罗瑞卿的孩子一样关在监牢里。

主席这样做也够冒险的，这么大把年纪，为了搞掉自己树起来的接班人，跑到全国打招呼，也不怕军队起来造反，全世界的政治家都不敢这样干。

现在，黄、吴、李、邱一个个急的在家里哭。总理现在也跟江青一边了，来告急说要保副，怕保不住了。

叶群要跑到苏联去当寓公。

林立果还说，主席利用完了军队，现在重用文人整军队。中国现在的政体是世界上最封建的，搞的是专制集权。现在主席活着，谁也不敢讲话，主席一不在，谁讲话也不管用了。将来肯定要打内战的。

主席一贯好政治冒险，58年搞大跃进惨败，文化大革命全国大武斗，不是靠了军队，差点亡国。现在又和美国拉关系。

林立果吹牛说：“主席身边也有我的人”。现在不止空军听他的，陆军也掌握了不少部队。他在空军有个敢死队。还有一套班子在东山秘密机场，可以掌握全国情况。

林立果还说：跑出去有把握，他能控制住34师（专机师），可以瞒着吴法宪要胡萍调动飞机。可以跑广州，广州都是四野的部队，都会保护首长的，不行了随时跑香港。也可以跑苏修。三叉戟从这里起飞，只要40分钟就能到苏修，已派人到苏修联系，有三万美金存在国外。他已经计划好航线，沿线都没有高炮和雷达。

林立果还说：

我一跑，我那些精锐力量就要损失大部，我也不甘心，我是主张不跑的，先看一看再说，可以先离开这个地方。如果不跑，最好的结果就是像苏联那样，形成三驾马车的局面，就是江青、总理和我们。

林立果说这几天他都没睡觉，像做梦一样。还试探地问我是否要

跑，并说，实在要跑，你也得走。

林立果还说：

现在就是我下不了这个决心，听听你的意见，到底跑不跑？

.....

我已经再三劝她，她和首长还是非要跑不可，现在就看你态度，你要不同意，我就不调飞机，还可以再拖几天。

而在此时，吃完午饭的刘吉纯刚躺下休息，8341 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就来到他的房间，对他说：“张清林和杨森有事找你。”

刘吉纯随姜作寿来到大队值班室，看见张清林、杨森已在那。刘吉纯问有什么事，张清林慌慌张张的说：“不知豆豆（林立衡）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里去了，你快去把主任（叶群）、老虎抓起来吧。”

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刘吉纯大吃一惊：什么事这么严重？况且他自己就是负责保卫叶群他们安全的，怎么反过来倒把保护对象抓起来了？他哪敢呀！刘吉纯赶紧宽慰他们说：“先别着急，去看看再说。”

原来，林立衡已经将林立果与她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张清林。午饭后，林立衡又去林立果那里，张清林担心林立衡会有不测，便去找负责林立衡警卫工作的杨森，接着俩人又去找姜作寿，姜作寿又找到刘吉纯。

刘吉纯很快赶到林立果住处外面，看到他的车停在那里。于是又到 96 楼找“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李文普。

李文普也在睡觉，刘吉纯把他叫到外面，将张清林的话对他说了一遍。李文普也不相信：“怎么会有这种事？”他对刘吉纯说：“你别听他们的，没有这回事！”

回到房间，刘吉纯翻来覆去地想，到底出了什么事？由于事关重大，他也不敢同别人讲。

当天下午，林立果在北戴河空军疗养院对空军司令部一处秘书程洪珍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秘书陈伦和说，“我们马上返航，回北京……现在‘舰队’进入一等战备……”

晚饭前，林立果又找到林立衡说：“我们研究决定今天不跑了。跑不跑，这一个礼拜是关键。”

张宁回忆那天接下来的晚餐情景：

用晚餐时，五十六楼餐厅只有林立衡、张青霖和我。林立果给小王护士留下话，晚上夜泳不回来吃饭。

林立衡坐餐桌首位，一下午没见，像生了一场大病，蔫乎乎的吃几口便停筷，吞下一大把药。我吓一跳，我自幼体弱，也是个药篓子，可从没见这么吃药的，当饭吃呢！

立衡要回卧室休息，问她哪里不舒服，她摇头不语，一副无精打采懒得说话的样子。心下疑惑，是不是与青霖闹别扭了？看看青霖，他也是一脸猜疑。

当晚，林立衡将刘吉纯叫到她那里，问他：“他们对你说了些什什么？”

刘吉纯将张清林、杨森讲的情况告诉了她。

林立衡又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

刘吉纯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而是反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林立衡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面知道了，怕整他们，在北京待不住了，要劫持首长到外地去，你知道不知道？”

刘吉纯说：“不知道。”接着问：“那怎么办，是不是去报告？”他又自问自答地说：“向谁报告？只有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他们。”

林立衡马上说：“汪东兴在庐山上也受了批评，也有问题……现在谁也不要给他们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

最后他们商议，林立衡在里面，刘吉纯在外面，观察一下再说。

21时30分，总参二部的参谋倪煜照例给叶群讲课，按原来计划是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或美国电影《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

大约23时过后，卫生员兼叶群的游泳教练吕学文正陪叶群在室内游泳池游泳，林立果突然闯了进来，脸色十分难看，情绪非常紧张，站在池旁说有急事。叶群一见儿子“破常规”地闯进来，显得有些吃惊，她马上问吕学文：

“小吕，你懂不懂俄语？”

吕学文立即回答：“我什么语也不懂——不！俄语、英语我都不懂。”

于是，叶群母子二人开始用俄语咿哩哇啦的对话，谈了大约一、二十分钟。

吕学文听不懂他们对话的内容，但从他们那声调、表情和不断挥手的动作看，二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争论很大、很激烈。或许是事情特别重大，两人都对那件事情十分恼火。最后，林立果愤怒地扭身离去，叶群也中断了游泳，并冷冷地对吕学文说：

“最近几天，我不游泳了，你也不用准备了。”

第 1205 回：林立果，准备上海搞暗杀 于新野，杭州去见陈励耘

9月7日下午，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来到江腾蛟家中，给江腾蛟看了顾同舟整理的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讲话记录。

江腾蛟看后问：“可靠吗？”

周宇驰说：“还有更厉害的没有传达呢！看起来他们要动手了，如果他们这些人上了台，我们就完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先下手为强。很快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首长就要被架空，说不定被搞垮台。就算首长能过关，黄吴李邱被搞下去了，我们再组织力量就困难多了。现在一组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回北京过国庆，我们看在经过上海的时候，就可以在上海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蛋，你首先完。”

江腾蛟说：“要动手就叫王维国干吧。”

王维国时任驻沪空军第4军政委，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可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周宇驰的反对，他说：“王维国不行，王维国太粗糙，这个人大粗。”

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江腾蛟说：“那好，只有我去吧。”

周宇驰忙说：“要去赶快去。”

江腾蛟认为：“杭州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毛主席9月25日前不会回来。”

周宇驰说：“现在我们不干，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江腾蛟与周宇驰密谈之后，又于9月7日晚上和8日下午，分别和民航总局政委刘锦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进行了联系。并在9月8日上午9时，找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尚登峨，要他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9月8日早晨，北戴河，小王护士陪着张宁在外边散步。6时，她

们看见林彪的红旗轿车从 96 楼驶出，从她们身旁擦过驶向莲花峰外，司机杨振钢旁边坐着李文普，林彪端坐在后座中间位置上。这是林彪去海边转车。

9 时，张宁去看林立衡，她正在客厅里做理疗，感冒嗓子痛。俩人正聊着，小朱护士领着一名战士抱着两个装在玻璃盒里的大蛋糕走进来，又返身再从停在院中的汽车里抱进四个新疆运来的无籽西瓜，堆在门边。小朱说道：

“这是主任让我们送来的。两个蛋糕，立衡、青霖一个，张宁、立果一个；四个西瓜一边两个。主任交代要你们好好休息，需要什么告诉她，想吃什么叫厨房做。”

林立衡淡淡地对小朱说：“噢，主任这么有心。你去替我们谢谢她。”

也就是在这天，叶群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说：“林彪同志向您致以热情的问候，他说很关心您的身体。”

江青：“谢谢林副主席，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叶群：“林彪同志让专人给江青同志送去几个最好的西瓜，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

江青：“请林副主席放心。”

9 月 8 日，叶群对李文普说：“老虎要回北京看牙，这件事不要对首长说。”然后，她又打电话给毛家湾，告诉秘书于运深：“老虎回北京治牙，要严格保密。”并叫于运深联系 301 医院口腔科。

据林立衡回忆，这天，她问李文普关于北戴河情况。李告：叶群这两天非常紧张，与林立果常去林彪处。

9 月 8 日 11 时左右到 13 时半，叶群到林彪的客厅里谈话。内勤听到叶群说：有人搞她的材料，说她是特务，她主任也当不成了，要林彪救救她。还说，她想要两个小孩马上结婚。

下午 14 时，叶群带张宁一个人去见林彪。林彪问张宁吃饭、睡觉好不好？叶群都替张宁作了回答。

林彪又问张宁：“你学舞蹈，芭蕾舞与古典舞有什么区别？”

张宁一时答不上来。因为她虽然学过舞蹈，却从未研究过舞蹈，只能尴尬害羞地望着林彪，不知该怎么回答。

叶群马上说：“你跳几个动作给首长看看。”

林彪微笑地看着张宁。于是张宁鼓起勇气走向客厅中间，跳一段芭蕾组合，再跳一段民族舞片段，然后羞怯怯地站在原地望着林彪。

张宁在回忆中写道：

这时，林彪高兴地动了动身子，叶群赶忙扶住他。他侧脸望望叶群，那神态好像刚发现她的存在，靠得还那么近，身子又动了动，像是嫌叶群碰触了他。场面很僵，刚泛起的一点轻松气氛立即消失，我傻愣在原处不知所措。

叶群自找台阶下，对林彪温言细语道：“你休息吧，我们走了。”嘴里虽如此说，屁股仍坐在沙发上没有移动，目光一直注视着林彪。

我见林彪木然地垂下眼皮，望着自己的脚，对叶群的话没有任何表示。

走在长廊上，叶群驼着背低着头，神情很阴郁，说道：“首长身体不好，我也不敢多劳累他。多去打扰他不好，你闲着没事好好休息，让小王陪你玩玩吧。”

她们回到叶群办公室，叶群一进门就揿铃叫小克传林立果上来。不一会儿，林立果气喘吁吁跑进来，静立一旁不说话。叶群叫林立果坐到张宁旁边，问他：

“吃过没有？”

林立果摇摇头，木然没表情。

叶群传饭上来，边吃边说起林立果他们的婚事：

“以后你们办婚事，要讲勤俭节约。全国都响应毛主席号召，破四旧立四新，移风易俗。副统帅家办喜事，别人都看着呢，要做个好榜样带个头，做个表率，不办喜宴，不请客送礼。新房布置要革命化，不搞花花绿绿，床上铺张白床单，放两床军被就行啦。你们同意不同意呀？”

见张宁和林立果都不吭声，她又笑道：“就这样吧，我跟首长说过了，他也同意。”

叶群吃饱了，兴致很好，站起身叫张宁和林立果陪她到海边转车消食。

在车里，长时间没人说话，气氛很沉闷。

“回去吧，不转了！”叶群情绪陡然变得烦躁，命令司机小慕回去。

然后将张宁和林立果跟留在她的办公室，自己走进卧室，“嘭”地一声摔上门。

办公室里只剩下张宁和林立果。林立果不时眼瞟叶群卧室门，等了一会儿没见动静，便拉张宁坐到长沙发上，小声问道：“你吃饭睡觉都好吗？”

张宁点点头。

林立果又说：“主任在这里，我不好照顾你，你多跟姐姐在一起，缺什么跟小王说，她会替你办。”

张宁又点点头。

林立果问：“今晚我要回北京，你刚来我又要走，你不会有意见吧？”

张宁说：“你回去看牙齿，还有什么事？几天回来？我一个星期以后就得回北京，学校开学不去上课影响不好。”

林立果犹豫着不答话，只盯着张宁看。

“你怎么了，犯啥呆？”张宁问。

林立果眼神晃了晃，支吾着低下头，又抬头犹豫地望住她，欲言又止，复而垂下头沉思。当他再次抬起头时，神情似乎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说道：

“我四天就回来。你在这里休息，什么也别想，我回来就来看你。我看牙齿，顺便办点事。最近中央斗争激烈尖锐，主任的政治地位可能会下降。我回去了解一下情况。”

张宁吃了一惊，茫然地望着林立果。

林立果看出张宁的神情，缓了口气安慰她：“不过，事情还未发展到那么严重，我只是回去看看，几天就回来，陪你玩，好吗？”神情口气显得很轻松。

林立果见张宁缓过神来，又问：“你带的衣服够不够？我看你穿得太单薄，你体质差，要多穿点衣服，把房间钥匙给我，我给你带点衣服回来。”

“不就是到大连嘛。北戴河和大连气候差不多，国庆节之前回北京不会冷到哪里去。不要麻烦了。”张宁说。

林立果仍顺着自己的意思说：“那我从天窗爬进去替你拿。”

张宁望着林立果再次摇头，却发现他神情诡异，又想说什么而开不了口。“你今天怎么了？”张宁询问他。

林立果低头默思，双手揉搓，好一会儿才抬头专注地望着张宁说：“万一北京被占领了，你留在家里的那些东西不要可不可以？”

张宁真的被吓住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张嘴问到：“毛主席知道吗？”

林立果犹疑了一下，说：“知道一点。”

张宁说：“只要主席知道了，任何人想搞政变都不会成功的！”

林立果神情大变，愣神好一会儿，长时间不再说话，也不看张宁。

叶群的文书小孙进来，传林立果到林彪办公室去。林立果叫张宁等他，说马上就回来，起身随小孙出门。

大约 10 分钟，林立果返回，见张宁立在南墙下看地图，便走上前，正遇张宁听到声音回头，他突张双臂紧紧拥抱住张宁，在她脸上头发上狂吻，又紧紧吻住她的唇，令张宁透不过气。

张宁惊慌失措地挣脱林立果的拥抱，跑回沙发上坐下，下意识地赶紧理头发整衣服，生怕叶群此时出来撞见。

林立果走到张宁身旁，动作有些急促地脱下军帽和军上衣，甩到沙发背上，挨着她坐下，捧起她一双手，长长出口气，语气不连贯地说：

“万一……出了事……我不连累你……你什么都不要说，听我的话。”

张宁越听越糊涂，着急地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哇！”

林立果凝望着张宁，终于摇摇头，安慰道：“没什么。我走以后，你好好休息。跟你说的事不要对一般工作人员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主任问你什么，你也不要告诉她。什么都不要想，等我回来。”

叶群卧室里传出动静，林立果立即站起身离开张宁。

叶群从卧室出来后对张宁：“你回去吧。立果今晚回北京，你得给他一点准备时间，我还有事交代他。”

于是张宁离开叶群办公室，回到 56 楼，已是下午 17 时，看见林立衡迎候在 56 楼门口，见到张宁便问：“你上去的时间挺长，主任和立果跟你谈些什么？”

张宁支支吾吾没有说。

据林立衡在1971年10月《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中记述，这天下午15时30分，林立果来到56楼找林立衡，对她说：

“已说服首长不跑了，现在还要说服主任。我们又决定了一个新的方案：现在主席在上海一带，在我们空四军的地盘手里，只要我批准，江腾蛟就出动，干掉他！”

林立衡吓了一跳：“江腾蛟不怕死吗？”

“江腾蛟对毛主席有仇。他自己已得了癌症，反正活不了几天了。”

林立衡说：“主席威望这么高，你可万万不能干这种事，这会在全世界遭到反对！”

林立果：“那没关系。暗杀后就借主席名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地点未定，也可能就在北京毛家湾。把我的敢死队埋伏在里边，把政治局委员一个个骗来，把江青、毛远新、张春桥、姚文元都扣起来，然后说是张、姚暗害主席。不服从的就干掉。反正那时我们掌权，专案组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怎么说就怎么说。”

林立衡说：“这个方案失败了呢？”

林立果说：“那我们就逃到苏修去。现在就这么两条路，要么逃跑，要么搞政变，或者两个方案同时进行。如果政变失败就逃跑，如果政变成功，就再飞回来。你说，难道还能有第三条路？万一不行，还可以打内战去。国家要乱了，就是我们不下手，别人也要下手。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

林立衡说：“这两条路都不能走。就算你夺了政权，也掌握不住。愿意跟你干的，都是有野心的人。将来还会用同样的手段干掉你。”

林立果说：“我也不敢保险。但什么事都得冒险。”

他还说：他是这两天得到主席要秘密开会的情报后，才准备行动的。

林立衡又问：“首长也知道暗杀主席吗？”

林立果迟疑了一下说：“他也同意。他现在不想活了，什么都听我的。但我也没有下决心。我回北京好好想一想，再摸摸情况。‘十一’前做好准备，一切都看过了‘十一’。”

晚上，林立果回北京。在去飞机场前，他又到56楼找林立衡单独

谈。据张宁后来说：

据林立衡后来对我说，这次谈话是林立衡要求的，并要林立果瞒着叶群。但林立果直到出发，叶群始终寸步不离地跟着，林立果只有中途停车去见林立衡。

林立衡在1971年10月《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是这样记述林立果在去机场前对她说的话：

已说服主任了，我现在马上就走。情况有变化，主席已经离开了，原来的行动计划都要改变。我们准备在“十一”后行动。就看主席整我们到哪一步了。他要是老实点，我们就不升级。不过迟早总有一场斗的。

张宁后来说：

院外停着林立果的专车、叶群的专车、中南海值班警卫车。叶群在车内命司机小慕不断地按喇叭催，林立果一直在屋内不理叶群的催促。叶群又派警卫员小徐上门催，说是快到八点了，飞机要起飞，叶主任等急了。林立果这才从屋内匆匆跑向院外上车去机场。

林立果与刘沛丰、陈伦和一起乘潘景寅试飞的256号三叉戟专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

9月8日晚上，毛泽东在杭州调走专列，汪东兴找陈励耘不见。陈励耘8日晚上有什么事，连毛泽东的“大总管”汪东兴找他都不能来？原来，那天空军办公室处长于新野从北京来到杭州。他是奉周宇驰之命，于9月8日上午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恰巧碰上被召回北京的空4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于新野匆匆对他说：“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先给王维国打个招呼，下午要去杭州找陈励耘商量，了解B-52在杭州的情况。”

于新野和王维国见面后，在空4军军务处处长蒋国璋陪同下，察看了毛泽东专列到上海预定的停车地点，询问空4军有没有火焰喷射器等武器，又在9月8日18时乘车从上海赶到杭州，21时多在医院见到陈励耘，询问毛泽东到杭州后又讲了一些什么。

在于新野住的房间挂着一张毛泽东的像，陈励耘看着那张像说：“哎，我一看到毛主席的像就发愁。”

原来，9月8日晚，汪东兴找陈励耘时，他正和于新野在一起。怪不得到处找不到他。

第 1206 回：回北京，再传看“林彪手令” 怎么办？林立果提出三条

9月8日晚21时40分，林立果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机场上冷冷清清，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空军第34师党委书记胡萍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在机场迎接林立果。

林立果一下飞机，就对胡萍说：“现在上面斗争情况很复杂，林副主席为了安全，要离开北戴河。”说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包，从里面拿出一张16开的白纸，递给胡萍说：“这是首长的亲笔手令，事关重大，要特别注意保密。”

胡萍看到上边横着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

林立果收起林彪的手令，当即命令胡萍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机组人员要求挑选对林彪“感情深的”人，选好后报个名单。

胡萍听了林立果的交待后，立即找来34师副政委潘景寅等人，研究了使用的飞机和机组人员，确定林彪机组名单：

34师副政委潘景寅担任机长；

100团副参谋长陈联柄任第一副驾驶；

三叉戟中队长康廷梓任第二副驾驶；

团领航主任李成昌任领航员；

团通信副主任陈松鹤任通信员；

机务分队中队长李平和机械师张延奎任机械师；

特设分队副中队长邴起良任特设师；

还配了34师服务大队副队长魏秀玲作为空中服务员。

机组人员都是挑全师技术最好的，而且还多配了一名飞行员和一名机械师。

胡萍让潘景寅把名单报给周宇驰。

林立果从西郊机场出来后，由周宇驰陪着先回了一趟毛家湾。

在走廊里，林立果从白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 16 开白纸让于运深看。

于运深边走边看，只见上面用红油笔竖着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没有章。

这是写给谁的？按什么“命令”办？为什么只有一句很含糊的话？于运深没有问。他在“林办”7 年，对林彪写这样的纸条早就习以为常了。林彪写字喜欢用军委办公厅服务处发的那种白纸，没有天地，用铅笔写，后来用红油笔了，字的大小一样，没头没尾，一大张纸就写几个字，只有一句话，例如“文革”初期林彪写的：“立即放出邱会作”。于运深没有把林立果让他看的这张纸当成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没有琢磨这个纸条的含义，以为是林立果和叶群又闹什么矛盾了，所以林彪才写这样的纸条。

但是于运深事后一想，文革后林彪几乎很少动笔，文件圈阅也常常由秘书代笔，这次竟然亲笔写了 20 字？而且，林彪口述一般都非常具体，而林立果给他看的这个纸条太含糊，没有确定性。“盼”照“什么”办？不知道。而且用了个“盼”字，不像林彪一贯下命令的口气。于运深觉得，林彪一生中从来没当过副职，下命令从来是死命令，坚决果断。

林立果在毛家湾给北戴河打电话报了平安，李文普接的电话，他报告了林彪和叶群，林彪点点头说：“好。”

林立果对于运深说，他第二天去 301 医院看牙。于运深告诉他，已经与 301 医院口腔科联系好了。林立果说他的牙还在痛，于运深关心地询问了几句。

林立果从自己的房间里拿了东西就走了，没有住在毛家湾。于运深一直陪着林立果，并跟他去了他的房间。林立果对于运深说，如果有他的电话，就找空军一号台。

22 时许，周宇驰打电话给已到北京的空 4 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让他立即去空军学院，顺道先接江腾蛟到西郊机场。李伟信开车来到江腾蛟家，说是林立果马上要见他，然后将江腾蛟接到林立果设在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通常称为“工字房”的一座平房内等候。

晚上 23 时 30 分,林立果、周宇驰来到“工字房”,见到了已等候在那里的江腾蛟、李伟信等人。

林立果对江腾蛟说:“哎呀!老政委,情况很严重啦!”说着,他拿出林彪的手令,对江腾蛟说:“先给你看个东西。”

江腾蛟看完后,林立果问:“怎么样?”

江腾蛟很干脆地表态说:“干吧!”

林立果拿出“司令官”的派头,传达命令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要什么人,要什么东西,都满足你。你有把握吗?”

江腾蛟说:“那就看有什么办法。”

林立果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40 火箭筒打 B - 52 的火车;二是用 100 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在 B - 52 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

B - 52 是林立果给毛泽东起的代号。

周宇驰接上说:“还是 7 号晚上我跟着你说的,要去就快去。为了保密,坐火车去,到苏州下车,上海来车接你。你的代号是‘歼七’。”

江腾蛟听得直出冷汗,但他依然表示:“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

林立果又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

周宇驰对江腾蛟说:“你如能完成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

江腾蛟提出:“空军没有火焰喷射器,就是有,我们也不会用。另外,谁敢下令打毛主席的专列?要教导队去冲火车打毛主席,他们也不一定干。”

林立果说:“那个头不是给你当过秘书吗?”

江腾蛟回答:“要他们干这种事,就不一定听,还会把下命令的人捆起来。”

林立果:“火焰喷射器我给你调,战士不干可以骗他们说车上有人

搞阴谋，要害毛主席，叫他们去救。”

江腾蛟：“向主席专列调高射炮，一动就会被发现。再说专列是防弹玻璃，步枪、机枪子弹打不进去。车上警卫只要抵抗半小时，附近的部队就会赶来。”

关于第三条办法，要王维国动手，江腾蛟说：“这件事也没跟王维国说，部队是他的，具体事情还是要靠他做，部队不一定听我指挥。他愿意不愿意还不知道。即使他愿意，枪要是带不上去又怎么办？专列上可能有仪器，一照就照出来了。”

大家又议了一会儿，最后，林立果又问江腾蛟：“你看我们的三条办法行不行？有没有把握？”

江腾蛟答道：“如果都用上了，可能有六、七分把握。”

周宇驰像下赌注一样坚定地说：“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打仗就是有七分把握三分冒险。”

江腾蛟说：“打仗有七分把握就干，可这和打仗不一样，必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林立果说：“你再想想更好的办法，你是第一线指挥员，听你的。”

周宇驰问：“杭州到上海有没有铁路桥？搞‘皇姑屯’方式。”

1928年日军暗杀东北大帅张作霖，就是在皇姑屯炸火车达到的目的。

江腾蛟说：“桥倒是有几座，都有陆军把守。”

又是一阵沉默，林立果说：“如果陈励耘有胆量，在嘉兴车站动手最好。”

一直出进倒水的李伟信还兼着放哨，此时他插话说：“在杭州干好，让陈励耘干。”

几个人又像捞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兴奋起来，纷纷说：“这个办法好，把陈励耘的家属孩子都弄走，保护起来，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向他说明厉害，逼着他干。”

谁去说服陈励耘？周宇驰说：“江政委带于新野去。”

江腾蛟说：“还是让于新野一个人去吧。”

林立果说：“于新野就在杭州，等明天他从杭州回来，看看是什么情况再说。”

林立果在屋子里转，周宇驰一根接一根抽烟。

突然周宇驰跳起来：“机场附近不是有油库吗？油库能不能爆炸？”

江腾蛟说：“油库是有，但能不能爆炸，我不懂，烧着总可以吧？虹桥机场曾发生过一次油库燃烧事件。”

周宇驰说：“我们可以把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乱把‘一组’抢走。”他要江腾蛟把油库和专列的位置画下来。

江腾蛟一边画一边说：“这是个好办法。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人带车都报销了。”画好后，他交给周宇驰，周宇驰给了林立果。林立果也高兴起来，说：“这是个好办法。”

周宇驰说：“明天我找人了解一下，油库能不能爆炸。现在，主席在杭州已经住了几天，要快一点，他一走就错过机会了。”

这时江腾蛟又泼了一盆凉水：“汪东兴不会让任何人接近专列，上海小组的人也不一定干。专列进入机场后，附近油库的警卫全换干部担任，一般人接近有困难。而且专列挂两个车头，可进可退，油库烧着了，专列马上会开走。”

研究半天，想了一大堆办法，都觉得不行，3个人全耷拉了脑袋。过了好一阵，周宇驰看表，已经是9日凌晨1时了，说：“今天先到这里算了，明天找王飞再研究。”

“好吧，”林立果说，“先谈到这里，以后再研究。首长说了，谁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这个事可千万不能漏出去，漏出去你们都完了，我的脑袋也没有了。”

周宇驰说：“要特别注意防叛徒。”

林立果说：“谁叛变，就杀他全家。”

他们最后约好第二天，其实就是当天，9月9日22时，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开会。

林立果走到另一间房间，看见有一个灵芝草，就拿出来送给江腾蛟，并对他说：“好好保重身体。”

也是在9月8日这天晚上，叶群多次与黄永胜、吴法宪通电话。叶群要吴法宪给林彪准备5架飞机。吴法宪第二天，9月9日便转告胡萍：

“叶主任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为林彪准备 5 架飞机，胡萍并不觉得突然。因为过去都是这样，林彪一出动就是 5 架飞机，一架林彪坐，一架随行人员，一架拉电影机和电影片子，一架拉警卫人员，一架拉汽车。

9 月 9 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就在此时，北京，林立果又从北京西郊机场匆匆赶到空军学院东北角那两幢编号 13 和 14 的两层小楼，这里原是空军学院院领导的住宅，人称“将军楼”。1971 年 4 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又一处“秘密据点”。空军学院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小组，保障这两幢小楼的生活和后勤，由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王兰义负责。

林立果他们几次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都是说来就来，事先并不通知。有时连续六、七天在里边，有时十多天。通常是上午 10 时左右来，晚上 22 时离开。只有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能进到楼里，但对楼里的活动要绝对保密。为副统帅的儿子服务嘛，神圣光荣。准备伙食，老王都是亲自到食堂监厨，亲自送去，晚上人走楼空，才能进去打扫卫生，由空军学院行政处小牛负责打扫卫生。

8 月底，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给王兰义打电话，说要准备一个星期吃的用的东西，卫生先别打扫了。程洪珍还强调：“报纸放到门口，有事打电话找你，没事就别来了。”

报纸过去都是送进去的。这时候，正好学院刚来好多学员，而且快到国庆了，老王还要组织国庆游行，非常忙，就交代小牛把东西准备好，每天的报纸由老王下班骑自行车路过小楼，顺手放在台阶上。这时，来的人比过去多，而且有 3 个没见过的女兵。不仅白天来，夜里也住在里边，分外紧张忙碌，车辆也来往频繁。并且不许接待小组进楼了，送饭送报，事先打电话通知，送到门口，由几个女兵拿进去。

9 月 9 日，林立果和李伟信到了那里，对等候在那里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等人说：

“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当前是要用我们的时候了。本来想多抓点部队，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要全力以赴，一个顶几个或十几个用，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

林立果拿出林彪的手令给刘世英、刘沛丰、程洪珍、李伟信看，江腾蛟又看了一遍。看后，林立果要李伟信保存。而后问道：“你们看怎么样？”

几个人连连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

“保卫林副主席！”

“保卫林副局长！”

林立果又解释说：现在他们正在做黄永胜的工作，攻下了黄永胜，就要搞首长。政治局开会，如果要摊牌，黄李邱首先会开枪。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准备在国庆节前解决问题。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王飞和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把空军的工作抓起来，刘沛丰、程洪珍负责联络，李伟信负责生活。现在就是靠少壮派起家，搞成了论功行赏，王飞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可以当副司令，李伟信当外贸部长，其他人都要重用。成败在此一举。

程洪珍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林立果说：“败了也不是寇，搞成了一切都好，失败了就打游击，坚决干到底！现在形势很紧张，直接对着首长，火药味已经很浓了，我们要誓死捍卫。所以要搞‘571’，现在首长委托我来处理这件事。”

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现在，我宣布一下舰队成员的代号：林立果——老康，周宇驰——金钟，刘沛丰——老崔，王飞——阿飞，江腾蛟——歼七，于新野——越野……”

林立果对江腾蛟说：“现在请你当总指挥，任务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

江腾蛟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和你的指示办！”

周宇驰让程洪珍把办公室墙上挂的北京市地图上有钓鱼台的地方描下来，上午交给他。

这天上午，周宇驰布置空军雷达兵部技术处副处长许秀绪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

这天，于新野从杭州回到上海，给王维国看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纪录。

北戴河。9月9日上午8时许，林彪把叶群召去，谈到11时。叶

群、林彪告诉林立衡：林立果回北京了，要她不要走，过几天要带他们去大连。

上午11时30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林办”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来。

下午，林立衡找林彪内勤张恒昌、陈占照，对二人说：“主任的政治地位可能要下降，现在情况很反常，你们要注意一点，提高警惕，有什么情况要报告。”

内勤说：林彪前些日子身体不好，这几天不知有什么大事，与叶群、林立果谈得很多，精神倒好了。

林立衡找李文普了解北戴河的情况。李文普讲：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反常现象，要她放心。

林立衡找刘吉纯了解情况。刘吉纯说：林彪要他去大连看房子，叶群不同意。叶群要北京捎布料、皮鞋和冬衣等东西来。还说周宇驰从来没有到过林彪处。林立衡意识到，林立果7日与她的谈话是骗她的，于是将林立果走前讲的情况告诉了刘吉纯，要他提高警惕。

晚上，叶群和北戴河的工作人员一起看电影。

第1207回：议未决，搞政变如同儿戏 叫暂停，关光烈来到北京

9月9日下午，林立果、江腾蛟、周宇驰再次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

周宇驰还在想如何炸铁路桥，他问江腾蛟：“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如果有，炸铁路的办法最好。”

江腾蛟答道：“桥有好几座，但都有陆军看守。”又建议：“要炸铁路，硕放那一段比较合适。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它部队。”

周宇驰接着说道，车一炸坏，就发动附近机场的部队以抢救B-52为名冲上去，在混乱中“解决问题”。

周宇驰曾打电话给广州军区空军管理处长陈伯羽，让他经过长沙时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活动情况，要详细。陈伯羽到长沙后住进湖南宾馆，通过熟人打听到毛泽东在长沙上下车的地点、住处、安全保卫情况和谈话内容。周宇驰对专列的保卫很感兴趣，问有没有扫雷车？陈伯羽也不知道，就说没有。

周宇驰问：“主席的车到长沙前是什么车压路？”

“客车。”

“两列车相距多远？”

“3个小时。”

经过一夜考虑，还是炸油库或炸铁路桥这两条办法。江腾蛟也认为炸油库的方式可行。如果专列停在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油库，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

林立果拿不定主意。

江腾蛟还提出两条建议：“如果一组到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果离开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

周宇驰对江腾蛟说：“你如果到上海去的话，于新野跟你去。”

这次他们的讨论过程由李伟信作了记录。开始说东南方向搞成了,就说王维国病好转,暂不来北京。之后又说有几种情况:打成了,打而不成,不打等。这些用病危、病重等代替。后来又说用无线还是有线联系,最后说具体方案还没定,密语先等一等。

林立果:“有电线、无线电同时使用。无线电发报时,就发王飞转空军党委,以这样的办法发,有电线借故有重要事情,把线路占用,不让别人用。”

林立果交给空军司令部情报技侦处副处长王永奎两个任务,一是研究在无人驾驶飞机里装上遥控爆炸装置,用电脑制导,带上炸弹,直接引爆。另一个任务研究一下汽油在什么条件下着火,怎样使油库燃烧爆炸。

周宇驰说:“导弹的战斗部不能用炸药,要用化学的,有一种毒气,一公斤就能杀伤一大片。”

林立果:“不能用毒气,毒气不能进房间,持续时间也不长。”他问王永奎,“用火焰喷射器烧火车怎么样?”

王永奎说:“不如火炮。”

林立果说:“这两天讨论来讨论去,方案提了好几个,但没有一样保险。”他转身问李伟信:“能不能进口一个小型原子弹?发射完了开汽车就走。”

李伟信听得直摇头,连忙说:“那怎么行?要是进口一颗小炸弹,那还差不多。”

下午,程洪珍将描好钓鱼台的北京市地图交给了周宇驰。周宇驰用铅笔标了方位,然后又说程洪珍描得不行,要他到办公室取原来的地图。

这天下午,于新野飞回北京,立即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汇报。

下午,空军司令部航行局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给他送来苏联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资料等材料。

当天,叶群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用保密电话进行了频繁的对话。

晚上,林立果、周宇驰又来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将王飞叫来。

王飞是1969年提升为空军副参谋长的。他非常谨慎,空军指挥学院的“秘密据点”楼下有车库,小车可以直接开进楼里,而王飞不怕

“麻烦”，每次都要在稍远的地方下车，徒步走过去，他是怕别人抄去车号。林立果他们的车老换车牌，而他的车牌是固定的，太显眼。9月9日下班时，周宇驰对王飞简单讲了几句，说“战友要找你谈谈。”于是，王飞来到空军学院，林立果一见他就问：

“闻到‘火药味’了吗？”

王飞说：“没有闻到，我感冒了，鼻子不通气。”

周宇驰给王飞看林彪“手令”，还通报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说：“我们逼到这时，非动手不可。”

王飞很惊讶，也很紧张。此时，他还不知道林立果的那“三个方案”，马上表示：“坚决保卫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

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简要介绍了林立果提出的三条行动方案。

林立果说：“现在情况紧张”，“火药味已经很浓了”，“要坚决把反对林副主席的人除掉。有一咤在南方，有一咤在北京，要同时干掉，南边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由王飞和周宇驰负责”，“现在决定武装起义”，“从现在起，王飞就是空军司令”。

“南线指挥是江腾蛟，北线指挥是王飞，主要是攻打钓鱼台。”

这时，刚刚从遵化回到北京的王飞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打钓鱼台有些困难。”

林立果说：“在南线先把一组抓起来。”

王飞说：“这不行，还是先礼后兵好。是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开会谈判几条，”他提出：第一条，老百姓饿死了，一块打江山的元帅、大将整死了，刘少奇整死了。文革中空军支持抓‘联动’，‘516’本来抓走资派，又说‘516’是反革命分子。让他们承认，口头承认也好。第二条，九届二中全会要谈。双方都让步，林副主席没法征求意见了。三个副词，毛泽东坚决反对，干脆撤掉不提。毛主席把《我的一点意见》去掉。‘反革命简报’收回去。口头答应也好，争取签字，这就没有什么公开矛盾了。第三条，提出‘民富国强’是总路线，这是九大以前林副主席提出来的，陈伯达在他起草的九大报告中的思想。停止文革。”

周宇驰还是坚持炸铁路桥。

21时，周宇驰布置空军司令部情报技侦处副处长王永奎搞一份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22时，林立果与叶群通电话。出来后，他问王飞：“你想出什么好办法没有？”

王飞说：“除了开会我没有什么好办法。”

林立果：“我就不信搞不成。”

林立果把程洪珍手绘的钓鱼台图拿来，说：“我看就坐上大卡车，从这两个门同时猛冲进去。枪一响，里面就乱了套。”

王飞说：“‘蓝裤子’怎么冲？即使冲进去，那么高的墙，很快会被包围。进去的人想跑也跑不出来，而且不一定能抓到要抓的人。”

周宇驰说：“硬冲不行，可以小股隐蔽进入。晚上到门口把哨兵一抓，就进去了。”

王飞说：“那得情况非常熟悉才行。”

林立果说：“老周对那里熟，他带你进去，你准备好人。”

王飞说：“问题是部队不好动员，再说晚上铁门关着，里面有哨兵、游动哨……”

林立果不高兴地说：“总能想出办法。江腾蛟提议把关光烈叫来，从他那个部队调火焰喷射连到上海去，再调一些部队到北京来协助你们攻打钓鱼台。”

他们一直说到9月10日凌晨1点多，还是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最后，林立果拿出个大纸袋，是叶群带给黄永胜的东西。他交给王飞，让王飞送交黄永胜。大家回去睡觉。

这天深夜，周宇驰给关光烈打电话，说：“林立果多时没有见你了，很想见见你，请你立即来北京一趟。”关光烈当天就上了火车。

关光烈，原林彪的秘书，1965年调43军127师任副政委，1968年12月任政委，师长是张万年。

顾同舟按照周宇驰6日晚的电话要求，于7日借来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的笔记，用了两天时间，又整理出长达50页的详细材料，并于8日夜，给周宇驰写了一封关于广州军区广州军区这次师以上干部大会的信，在9月9日下午17时，让妻子张亚青带着孩子，以治病为名，乘坐34师的飞机将材料和信送到北京。

当晚，刘沛丰对顾同舟的妻子张亚青说：“有几句话，请你回去告诉参谋长。不要记：感谢送来的东西，同意你的看法。要保重身体，注

意安全，抓好部队，注意观察一周内的情况。”

刘沛丰重复了两遍，然后说：“我们很想来广州，什么时候来还说不好。”

同时，周宇驰也在电话里对顾同舟说：“最近几天，我们可能来广州，飞机可能在沙堤机场降落。要给你讲的事，都给你夫人讲了，请她回去转告。”

张亚青怕忘记，等刘沛丰走后，还是将他说的话追记在本子上。她本想在北京多呆几天，看看熟人，毕竟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刘沛丰不同意，当晚就把她送上了回广州的飞机。

9日当晚23时多钟，周宇驰再次给顾同舟打电话说，林立果他们看过材料和信了，询问了顾同舟对吹风会的看法，还说最近不去广州了。

顾同舟对张亚青带回的话认真看了两遍，估计要发生重大事情，可又搞不清，决定再让广州空军管理处处长陈伯羽到北京探听。

本来周宇驰计划9月6日驾“云雀”到长沙，然后去桂林的。当时顾同舟叫陈伯羽陪同，于是陈伯羽到长沙等候。谁知周宇驰因顾同舟的报告改变了计划，陈伯羽在长沙等了一天多，于9月7日接到顾同舟的电话，说周宇驰不来了，他便返回广州。没想到才回到广州，顾同舟又让他马上乘16次特快去北京。

9月10日，北戴河。上午，张清林、张宁到秦皇岛、山海关游玩。林立衡因身体不好没有去，到林彪处谈话。林彪说要全家一起去大连，时间要等林立果回来后再定。

9时许，林立衡找到林彪内勤陈占照、张恒昌，明确对他们说了叶群、林立果“要害首长，可能要逃跑”，要他俩提高警惕，想法偷听他们的谈话，告诉她。

陈占照、张恒昌说，林立果、叶群和林彪谈话的情况很秘密。并对林立衡说：周宇驰来北戴河肯定没有见过林彪。

林立衡在《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中这样写道：“九月十日，林彪的卫生员小陈（陈占照同志）对我说他前两天听见叶群对林彪说她想跑，林彪凶了她，喝斥她（从林彪的房子里）‘出去！’并且不准叶群见他。”

上午11时左右，叶群在听李春生报14名副军以上干部的任免报

告时,要李春生打电话给毛家湾,把副军以上的干部名册送来,还让把部队部署情况的登记表也一起拿来,说:“首长要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后来叶群又要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文件。

早上7时58分,刘沛丰带着北京市地图和许多文件从北京飞往北戴河。到北戴河时已近中午。李文普让北戴河食堂给他准备了午饭。刘沛丰没有吃饭,直接去见了叶群,谈了约20分钟,又急急忙忙坐飞机走了。食堂为他准备的午饭也没有吃。

下午,林立衡带张清林、张宁、杨森乘吉姆车去山海关、秦皇岛游玩。他们在秦皇岛海员俱乐部买了一些送给林彪、叶群的小礼品。林立衡买的是一个机械玩具兵,准备送给林彪。张宁买了一只黄鹂鸟标本,准备送给叶群。

17时,他们回到北戴河,走进叶群办公室,见她手上拿一份文件正要去林彪办公室。那份文件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议程。

林彪到北戴河以后,从未亲自接听北京方面的任何一个电话,也没有打电话给北京方面的任何一个人,却非常关心中美关系的进展,指示秘书一有消息就直接报来,如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间所有口信来往,中央工作会议发的文件,总理同基辛格会谈的简报,以及总参三部编的国际问题资料。他还几次提出要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当林彪看见叶群领着林立衡他们走进来时,脸上绽出笑容。

“首长呀,孩子们出去玩,还给我们带了礼物,你看看吧。”叶群温言细语地说着,招呼大家近前。

茶几上放着小鸟和机械兵。林彪伏身看一眼小鸟,抬眼望张宁笑笑,便盯住那机械兵再也不动。林立衡忙给机械兵上足发条,小兵便做起扛枪、匍匐、瞄准射击动作。林彪微笑着,很开心。

发条松了,林彪托起机械兵左瞧右看,问林立衡:“他怎么动的?”

林立衡在他身旁蹲下做示范给他看。当机械兵再次爬动时,林彪弯下腰兴致勃勃地观赏着。

叶群见他高兴,趁机问道:“感觉好些吗?”

林彪面无表情地坐下了。

李文普从起居室的那扇门探出头,被叶群看见,忙叫住他:“你去

拿相机,给我们照张相。”

叶群布置秘书们商量林立衡、张清林结婚的事情。晚上,叶群继续让放电影。

北京。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拿个单子”给他。中午,王飞将叶群“带交黄总长亲收”的大信袋送交黄永胜。据后来黄永胜讲,里面就是一袋菠萝糖和一件尼龙背心。

王飞向黄永胜转达了叶群、林立果问候的话,还向他转达周宇驰得到的关于毛泽东同某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谁知王飞刚开了个头,黄永胜马上说:“我知道了,我们政治局传达了。”黄永胜表示了对叶群、林立果感谢。

这天,林立果一直睡到上午11时才起。然后一个人开车离开空军学院,回到毛家湾。

当天下午,林立果、周宇驰、王飞3人再次商议。王飞提出一系列困难,最后说:“虽然这事很重要,面对这些无法解决的难题,主席的出行情况又搞不清,搞不好是身家性命的事情。”

周宇驰这时也说:“看来,还要从正反两方面再考虑考虑,究竟搞不搞?”

林立果说:“现在不搞,还能收得住吗?”

王飞赶紧说:“没问题,收得住。”

林立果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先不搞吧。我给北戴河打个电话,反正搞不搞还得我这个前线司令来确定,这次就算一次思想拉练吧!不过得绝对保密。”

下午16时许,刘沛丰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林立果、周宇驰把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交给王飞,说是刘沛丰刚从北戴河带来的,要王飞适时送交黄永胜,并由王飞作黄永胜与林立果之间的联系人。

这天,叶群和黄永胜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

这天晚上,关光烈乘10次特快列车从部队驻地洛阳赶到北京,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当晚22时许,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李伟信到空军招待所去看关光烈,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关光烈身上。林立果

对他说：“现在上头斗争很激烈，要开人大了，开人大之前要开三中全会，找你来是请你调部队解决钓鱼台问题。”他给关光烈看了放在塑料夹子中的林彪“手令”。然后提出由关光烈从 127 师调两个营到北京攻打钓鱼台，调一个喷火连到上海。

关光烈感到非常突然，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林立果问：“火焰喷射器有多大威力？打火车行吗？”

关光烈说：“只要能喷进去，里面的人就统统烧死。不过它本身连这个木头门也烧不透。如果火车的门关严了，就要先用别的武器把目标打穿，再从洞口往里喷射。”

周宇驰问：“如果先用 40 火箭筒把车厢打穿，再用火焰喷射器，能行吗？”

关光烈：“那得配合好才行。”

林立果问：“从你们那里调一个喷火连到上海不行吗？”

关光烈说：“别说一个连，一个排也不行。个人无权调动部队，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部队手续很多，一级一级上报，申请火车皮，由军运部门调拨，才能坐上火车。”

林立果一听傻了眼，冒充军委下令呢？呼号频率不一样，还要配密语，更不好办。他说：“黄永胜再过几天也没权了，我们都不敢找他。”

看来确实不行了，于是林立果的决定，让李伟信立即给江腾蛟打电话，传达林立果的一句话：“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了。”

9月10日晚23时，毛泽东的专列早已到了上海。

北戴河，23时许，叶群给胡萍打电话，询问病情。此时，胡萍正患左肾结核，正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做切片检查。

叶群问胡萍：“那位小将都给你谈了吧，谈的好吧？”

胡萍说：“谈的很好。”

叶群说：“要你准备飞机是不是还有难处？”叶接着又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都说好了，用不着想的太多。再说立果和胖司令也都作了安排的，你要抓紧准备。”

9月11日凌晨，林立果收到王维国报来的“王维国因病住院了”的消息，得知毛泽东已到上海。1时，林立果从北京给叶群打来电话，告知已停止一切行动。

第 1208 回：说“不行”，叶群电话“抽鞭子” 仍未决，专列已过硕放站

9月11日，叶群情绪明显反常。上午10时过后，她叫张宁过去。张宁进屋时，看见叶群焦虑不安地来回走动，一会儿拿起文件，一会儿又放下，拿起笔又放下，再拿茶杯，好一会儿才发现张宁站在一边，二话不说，拉着她往外走，说：

“去看看首长，他老一人坐着寂寞，你去陪陪他吧。”

她们走到林彪办公室门口，叶群轻声叫张宁推门，张宁依言轻轻推开办公室门，突然听到林彪颤抖抖的长腔：“谁呀？！”

张宁吓了一跳，浑身一哆嗦，忙回头望叶群。

叶群抢上一步推开门，快步上前轻声细语地说：“是我是我，张宁来看你啦。”

叶群叫张宁坐在林彪右边，她坐在林彪左边，然后对张宁说：

“你说几句英语给首长听听。”

张宁用英语说了“毛主席万岁，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并用中文解释出来。

林彪从沉寂中发出一声哑笑，又吓了张宁一跳。叶群忙解释：

“在外面说说不要紧，那是政治需要，在家里不要这样讲，首长很谦虚，不喜欢人家这样讲。”

林彪缓缓抬头，低声清楚地说：“人吃五谷杂粮，哪里来永远健康。”说完，见张宁不解的样子，微笑着对叶群说：“这孩子老实，不爱说话。”

叶群忙对张宁说：“你先回我办公室去，我跟首长还有些事。”

大约30分钟后，工作人员看见叶群闷着头阴着脸出来。据内勤说，张宁走后，叶群一直在林彪身边坐着，看内勤端上一碗杂面粥，叶群说烹斑鸠好吃，林彪没理她，吃几口就让端走了。内勤听叶群对林

彪说去大连的事,说把几个孩子都带上。林彪没有一句应答,坐了一会儿,起身进了卧室。叶群跟着,看着内勤给林彪脱衣,躺下,静立一边看他入睡,始终没说一句话。

李文普后来回忆说,11时左右,叶群又让他给毛家湾打电话,要副军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

这天,叶群对李文普说,想去广州。

李文普说:“现在天气这样热,去广州干什么?”

叶群没有再说话。

当时,李文普和刘吉纯的女儿都想当兵,叶群突然问李文普:“你的女儿多大啦?”

李文普告诉她:“在上中学。”

叶群又问了刘吉纯女儿情况,然后说:“让她俩去空疗学护士吧!”

晚18时左右,林立衡又找林彪内勤陈占照,说林立果阴谋暗害毛主席。要他提高警惕,不要害怕,发现情况,立即告诉她。陈占照对她说,他偷听到叶群哭着对林彪说:“现在人家说我是特务,我要逃走”。林彪说:“我有什么办法,你走就走吧!”

11日上午,叶群给林立果打电话:“立果,托你办的事,应该抓紧办来,形势逼人,不搞不行!江腾蛟去的那里,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到了我们的根据地时,不能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

11时许,周宇驰给王飞打电话时就说:“情况有变化,前天晚上我们研究的不行,通不过,叶主任来电话,发火了。你赶快研究一下。先到空军学院礼堂前面,我派人来接你。”

接着,林立果也给王飞来电话:“主任刚打电话给我们抽鞭子,她还要给你打电话,少不了也得‘抽’几下,先给你说一下,好有个思想准备。现在势在必行,不能再动摇了。”

王飞还没放下话筒,叶群的电话就来了。一开口,她便佯装关切地说:“我们对你们是很关心的。你们的每一点我们都为你们考虑。林副主席对你们很信任。托你们办的事应该抓紧办。”

接着,叶群语调严厉地说:“我们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给你们了。听说你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

我们是为了革命利益，形势逼人，不能不这样搞。”

王飞忙解释说：“不是怕，我参加革命时还没有想到活到快 50 岁呢！是不好搞，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

叶群见状，马上缓和下来说：“林副主席历来说话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不会亏待你们的，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你们忙活了这几天，现在就是不搞也不好了，人家也不会饶过你们的。你们也跑不了。只有同生死，共命运，不能把我们当‘省油灯’！”

王飞忙说：“我考虑的是困难，怕连累你们，不是别的。”

叶群生怕王飞往后缩，赶忙给他打气：“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嘛！哪有不困难的事？你们想想办法嘛！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去了我们根据地里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

王飞马上说：“我马上去找他们研究，尽力去办。”

叶群又问：“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吗？”“钱够不够用？”“你的小孩多，带不过来，我帮她。”她又说：“我们的一切都托给你们了，赶快研究一下，6 点给我一个回话。”

王飞与叶群通话后，立即坐上车赶到空军学院礼堂，在那里又换上一辆车，向西郊机场急驰而去。当他走进“工字房”时，林立果、周宇驰和江腾蛟都已经在那里了。王飞听他们在议论代号，给他的代号叫“阿飞”，便插上去说：“我不叫阿飞，我还叫原来的名字。”

林立果说：“还是有一个代号方便。”

王飞推托说：“你在普通电话里讲了，不能用了。”

林立果说：“那就改为叫‘黄翔’；老周叫‘金钟’。”

商定了各人的代号后，林立果说：“首长决心已定，先搞‘南线’，接着北京，要坚决搞，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

他们还规定了暗语：

“王维国病重”表示打响了；

“王维国病愈”代表“打成功了”；

“王维国病危”表示“打坏了”。

在谈到“南线”的问题时，他们把关光烈接到“工字房”，于是在他

们中间又有了个“绿裤子”。林立果把关光烈介绍给大家以后，然后问他：“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

江腾蛟说：“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

林立果便对关光烈说：“把你们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去，听江政委指挥。再调个营到北京来，协助王飞率领的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

关光烈还是表示不能调动部队。

江腾蛟问：“一个喷火连有多少人？”

“几十个人。”

“把使用武器的人调去，好比几个人有事出差，这总行吧？”

林立果兴奋了：“只要调一部分火焰喷射器，一部分火箭筒，到上海归江政委指挥。坐火车太慢，坐飞机，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关光烈说：“我们部队附近没有机场，再说……”

林立果问：“你们离郑州有多远？先到郑州，我派飞机接。”

关光烈还是说不行。

王飞也说：“这样恐怕不行，动作太大了，容易暴露。”

林立果：“那打钓鱼台就算了。现在不搞是不行了，昨天讲的不算数，等于没有说。现在要抓紧研究怎么搞，江政委、王副参谋长都来了，你们讲讲，有什么想法。”

江腾蛟、王飞都皱着眉头没吭声。

林立果说：“还是要搞，主任抽鞭子了。老实说，主任一抽鞭子就坏事。她搞拉拉扯扯可以，办正事不行。庐山会议坏了事，固然吴胖子是个草包，没有用。庐山上那么多大将，还有陈伯达，要不是她瞎指挥，还不会输得那么惨，搞得首长很被动，简直把首长气坏了。这回好了，她在那里干着急，整天睡不着觉，又哭又闹，又要上吊，还在电话里唠唠叨叨，一讲没个完。”

听着林立果骂他妈妈，一时间大家谁也没吭声。后来还是江腾蛟开了口：“干这种事光抽鞭子不行。”

王飞说：“不是我们不干，我是说，干这种事要慎重，干不成，不光

我们完蛋，统统完蛋。”

客厅里沉默了。一看气氛不对，林立果赶快打气说：“这次不一样，是首长下的决心，首长的决心不会有错。现在决心已定，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这几天接连研究了几次，一直定不下来，我看问题的关键是没有最后决断的勇气。这次要下孤注一掷的死决心，不能再拖下去了！”

周宇驰插话：“优柔寡断要误大事。”

林立果一拍沙发把手，大声说：“还是两边都要搞，南线先搞，北京接着搞，双管齐下！”

大家七嘴八舌，虽然又想出一些新办法，但还是都没把握。

林立果不高兴了，说：“现在不研究了，等会再说。别太紧张了，趁天还没黑，出去散散心，领你们逛逛玉渊潭公园。”

王飞心里明白，什么逛公园，那是到钓鱼台看地形去了。玉渊潭与钓鱼台就一墙之隔。

到了钓鱼台，林立果说门这里可以安一挺机枪，那里可以如何、如何……

王飞没有表示。

18时左右，看完地形回来，几个人又在研究北京怎么搞。林立果说：“我们要搞的人都在钓鱼台，好搞。只要顺利地把钓鱼台拿下来，问题就解决了。”然后确定用空军司令部警卫营冒充陆军，让关光烈调200条绿裤子，用大卡车从钓鱼台两个大门同时往里冲。

江腾蛟认为不行，卡车的威力有限，不一定顺利。

林立果和周宇驰又提出用坦克冲，周宇驰和于新野7、8月在北京附近的某坦克部队学过开坦克。还提出用火箭炮轰，用轰炸机炸，但是都不行，因为目标太大。只要与钓鱼台警卫一交火，里面要抓的人听到消息，就会从地道里跑掉。

林立果又提出利用接待外宾时在机场动手，也不行，有国际影响。最后江腾蛟提出，要林彪召集会议，在会上搞。林立果不同意，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由首长出面。”周宇驰在一边帮腔：“由首长出面，即使搞成了，政治上损失太大，不合算。”

研究半天,没有一个可行的办法。沉默很久,林立果说:“这样吧,实在没办法,钓鱼台留给黄永胜他们去搞,只好让他‘摘桃子’了。”

周宇驰也同意:“北线我们可以不管了,集中力量研究南线。”

江腾蛟认为南线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炸油库。如果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炸火车,让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去执行,晚上把鲁部长找来研究。

王飞让林立果将他们说的这些向叶群汇报,林立果让王飞汇报,说怕叶群在电话里说起来没完。王飞想推,刘沛丰已经把电话要通,王飞只好接过来说:“叶主任,立果同志要我向你汇报一下,今天下午,立果同志同周宇驰、江腾蛟和我一起研究了一下钓鱼台的问题,又领我们几个到钓鱼台周围看了一下……”

不知是谁漏了一句,关光烈也来了。叶群马上质问道:“什么?关光烈?谁叫你们找关光烈?你们为什么要找他?”

这天下午,叶群情绪更反常。以往每天下午叶群都要当“学生”,听文史教员老张讲历史,马列教员老萧讲哲学,军事情报官老倪讲国际形势。但她这天取消了所有的课,要内勤整理去大连的衣物。

9月8日,于新野给正在部队检查工作的鲁珉打去电话,是鲁珉秘书接的。于新野说:“通知鲁部长,立即回北京。”

当秘书告诉鲁珉时,飞机票都已经买好了。

鲁珉是四届人大代表,他以为是开四届人大。9月9日,他回到北京空军机关,见到空军副参谋长王飞,问为什么这么急叫他回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王飞说:“现在空气比较紧张。”没有多说。

9月10日午睡后,江腾蛟叫鲁珉去他家,怕房子里有窃听,他们在院子里边走边谈。江腾蛟对鲁珉说:“马上要开四届人大了,之前恐怕要开中央全会,可能要整到副统帅头上了。到那时你站在谁一边?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哟。”

鲁珉本来对江青印象就不好,特别是江青在批陈整风中指挥一帮人在京西宾馆揪叶群和吴法宪,毛主席已经批了过关,他们还抓住不放,没完没了。鲁珉想党章都定了接班人,江青还这样,太过分了!就说:“我当然站在林副主席一边。”

江腾蛟说：“可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毛主席直接支持他们。”

“那我也站在林副主席一边，反正不投江青的票。”鲁珉态度很明确。说完后他后悔了，应该说“站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边。”但他一想，也没什么，自己是特级战斗英雄，大不了回家种地，还能有什么。

9月11日20时左右，江腾蛟又来找鲁珉，说林立果有事找他。二人一起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

“我们的英雄来啦，”林立果一见面就说，“现在要进攻啦，”鲁珉莫名其妙，林立果接着说：“要拼个鱼死网破，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别人不敢反，我就反！副统帅下了命令，老周，你把首长的‘手令’拿给鲁部长看看！”

周宇驰拿出那张白纸红字的林彪“手令”。鲁珉急急忙忙看了一眼，甚至没注意“手令”上的日子。是啊，他只见过墙上的林彪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手令”到底是谁写的他哪里知道？

屋里只有林立果、周宇驰和江腾蛟、鲁珉4人。于新野和李伟信一会儿进来送水，一会儿进来递苹果、递毛巾，热情得不得了。屋里很热，他们都穿着衬衣，鲁珉明显看出其他人腰上都别着“家伙”。

林立果谈起毛泽东南巡，说：“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开三中全会，再开四届人大，会一开林副主席就不占优势了。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搞掉……江政委，你这个‘歼7’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那个地方的第二次攻击了。再不成，让陈励耘派强击机轰炸。”

林立果指着江腾蛟对鲁珉说：“你到上海去是他点的将。我们决定派你到上海去，先和王维国政委研究一下，你就到硕放去组织指挥炸铁路。把火车炸坏了以后，就带着部队冲上去动手。”

当鲁珉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只觉脑袋嗡一下炸了，心里那个气呀：“怎么能让我搞暗杀呢？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怎么能去干这种事？绝对不干！”

但他又不敢发作。这时没有一个人说话。大约静了十几分钟，江腾蛟还是让鲁珉表态。鲁珉只得说：“不行，我当兵后一直在空军干，空战次数不少，但没在陆军干过，从来没弄过炸药，炸药什么样我都没

见过，怎么能响我也不知道，我干不了。”

林立果说：“那就派个懂行的一起去。贺德全干过陆军，带他去。”

这又出了难题，鲁珉知道，文革中周宇驰当群众组织的队长，贺德全当副队长，关系相当好。看来，这事是“粘”上了。

林立果说：“以检查为名，到那里去，就说有些坏人坐着主席的火车到处搞阴谋活动，对硕放就这么讲。”

江腾蛟插了一句：“如果这样讲的话，李世英真可能干。”

李世英是当时驻硕放的空15师师长。

林立果听后对鲁珉说：“到那个地方去主要是炸铁路桥，硕放有的是炸药，往铁路上一摆，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如果你完成这个任务后，你就升官喽！”

江腾蛟插了一句：“那你就不是空军的作战部长了。”

林立果说：“搞成功了我在北京组织50万人大会欢迎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到那个时候，北京军区的政委不是你江腾蛟，我还不放心哪。”

江腾蛟说：“我当政委，老鲁当司令。”

鲁珉心想：“你糊弄谁呢？作战部长当司令，我又不是三岁孩子。”

周宇驰说：“完成了任务，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由他挑选。”

.....

鲁珉还是不说话，愣在那里。其实脑子里在飞快地转着：“这件事不好收场，你说不干，你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秘密，如果走漏了风声，他们不会饶过你，怎么办？”

鲁珉换了个角度说：“不行，铁路上保卫工作很严密，主席的列车出来，沿途都要派警卫，根本没办法接近，送不上去炸药。”

林立果说：“那就换上工人衣服进去，把铁路上的工人干掉。”

鲁珉还是说：“不行，就算你进去了，炸药怎么点燃？你怎么计算得准爆炸时间？”

林立果也觉得不行，转而商量派飞机炸，还是逼鲁珉表态。鲁珉推脱说，歼击机根本不可以，轰炸机才行。他知道杭州那里根本就没有轰炸机。

此时已是 22 时,正无法收场,于新野冲进来说:“上海电话。”

林立果出去接电话,周宇驰也跟了出来。

电话是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告诉他们: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

其实,毛泽东的专列早在 11 日中午就离开了上海。王维国送走许世友后,回到办公室,马上向警卫处了解毛泽东离开的确切情况,一直到 17 时过后才回家。因为太疲劳了,回到家中倒头就睡。等一觉醒来已经是 22 时多了。他忽然想起于新野说过,“毛主席到上海可能有些指示,”要他早点给他们打个招呼。王维国就给北京打了个电话,告诉周宇驰:“主席只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走了!”

当林立果他们还在策划炸硕放铁路桥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已经平稳地驶过硕放……

第1209回：如雷轰，林立果痛哭流涕 急部署，忙执行南下方案

林立果一听到毛泽东专列已离开上海的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一切都懵懂了。刚才那种嚣张气焰瞬间被神色茫然所代替。他和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几个人目光滞呆，半天不语。当林立果似乎明白过来的时候，突然嚎啕大哭，痛哭流涕地说道：“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周宇驰大吼道：“现在难过也没用，也没有其它办法，只有等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又说：“直升飞机要两个人，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儿去？”

等了好一阵子，于新野说：“我可以去。”刘沛丰也表示可以去。李伟信也表示可以去。

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

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周宇驰回到会议室，对江腾蛟、鲁珉说：“情况有变化，到此为止，刚才讲的全部作废，就当没有讲过。你们回去什么也不能说，这话要传出去，不但我们要杀头，老婆孩子都要杀头的。”他接着挨个通知任务解除，要严守秘密，消灭痕迹，谁暴露机密，按叛徒处理……

江腾蛟问：“‘老头’在上海停了没有？”

周宇驰气恼地说：“现在问这个还有什么用？”

鲁珉回到家已近9月12日零时，情绪很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在西郊机场“工字房”时，他不敢公开反抗。回到家后，就对爱人武杠桥说：

“你赶快拿把刀来把我的手剁掉吧！我这辈子完了，将来两个孩子就全靠你啦！你无论如何把他们拉扯大。我对这个家庭再也没有

能力尽责了。”

鲁珉爱人武杠桥见状吓坏了，忙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鲁珉简单讲了事情的经过。

武杠桥是空军司令部门诊部的军医，此时她镇定了一些，说：“剁了手你将来怎么生活呢？”她想了想说：“把眼睛弄红不就行了吗？”

于是，武杠桥用盐水为往鲁珉眼里揉，鲁珉自己也将眼药膏往眼里挤，把眼睛搞得通红。天一亮，他们就要了个车到空军总医院。医生给他查视力，他明明看得见，也说看不见，于是住进了医院。

听说鲁部长眼睛坏了，一会儿周宇驰来电话，一会儿于新野来电话，一次两次地问。

毛泽东的突然北上彻底打乱了北京林立果的计划，他赶紧与周宇驰商量南下广州。

说来也巧，9月11日上午，程洪珍把乘16次特快到北京的广州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陈伯羽也接到西郊机场。真没想到这个“特使”派来得太及时了。

陈伯羽到西郊机场后，只见这里不断有人出进。9月11日夜，江腾蛟、鲁珉走后，“工字房”的客厅里只有周宇驰、刘沛丰和陈伯羽在谈话。陈伯羽只觉得，一会儿是周宇驰在说，一会儿是刘沛丰在说，他也搞不清哪句话是哪个人说的了，只记得他们对陈伯羽说：

你们广州形势很好，现在北京形势很紧张，有人要陷害首长。首长、主任、副部长、黄总长、吴、李、邱副总长，还有空军一些人，决定最近一两天去广州，还要把上海一些人拉到广州去。回去告诉你们参谋长，做好我们到广州的准备。主要是保证我们飞机安全落下来。因为飞机较多，正在研究批次和航线，完了就报给你们。请你们参谋长亲自到指挥所，掌握航行预报时间。要掌握电报和指挥系统，凡是对于我们不利的电报和命令，都扣下来，保证首长的安全。你要把白云山的房子准备好，告诉米加农，准备宾馆……

于是，12日上午8时左右，陈伯羽按照周宇驰他们的安排，离开北京飞回广州，向顾同舟报告。

9月12日17时多，顾同舟要求广州空军指挥所明天安排他值班。

指挥所的纪参谋很奇怪，顾同舟到司令部两年多，从未主动要求过值班，有时轮到他，还借故推托，这次为什么主动要求值班？而且9月13日不该顾同舟值班的，本来已经通知李副司令值班了，现在只好再告诉李副司令不值了。

19时多，顾同舟打电话告诉周宇驰，明天他到指挥所值班。他又交代陈伯羽，明天上白云山准备房子，要控制一下汽车，安排好警卫。

再看上海。9月11日晚，王维国跟周宇驰通完电话，又和妻子杜贵珍说起此事，总觉得有些话在电话里不便说，决定派自己的儿子王大章亲自飞往北京，当面向林立果汇报。9月12日早上7时，王维国把正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儿子叫起来，让他到北京去一趟。

王维国说：“拿本子记一下，用几个字表示就可以了。‘关于庐山批评的问题……’”

“什么庐山批评？”王大章不解的问。

王维国：“你不要问了，对林立果、周宇驰一讲，他们就知道了。‘可能三中全会上要重提一下。总理来了一个电话，马上要开三中全会，接着开四届人大。三中全会开成扩大的，每个军都要有代表参加。主席讲：看来他们一是有点害怕，二是有点要硬干，没有认真的检讨。黄永胜我以前不认识，是在他当了总长以后才跟他谈过。……这些是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检讨一下就可以了，跟陈伯达不一样。因为主席说，陈伯达就不让他检讨了。告诉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这样好些。’你一说他们就知道。”

12日一早，王大章化名王严，搭乘头班飞机飞往北京……

9月12日的北戴河。上午，林彪向秘书询问尼克松访华日程方面的进展。又说，他要见尼克松。他让李文普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

大连是林彪常去的地方，中央首长一般都住棒槌岛宾馆。棒槌岛靠海边，林彪怕见水，不愿住，住过黑石礁铁路招待所。那里房间小，空气不好，后来看中一座原大连市副市长住过的二层小楼，经过改建，成了林彪去大连居住的寓所。

李文普按惯例给大连市交际处打电话，要他们检查一下房间，调

控好林彪住房的温度……他又收拾了林彪随身带的东西。

12日上午,林立果和北戴河通了电话,派刘沛丰去王飞那里,把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从王飞手里收了回来。

中午12时左右,叶群让李文普通知秘书李春生,给毛家湾打电话,说“主任要家里把文件分好类给她送来。”

毛家湾是秘书于运深接的电话。他没有午休,立即将近日送来的文件打包,准备托飞机送到北戴河。其中有:副军以上的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文件。

午饭后,叶群将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叫到她的办公室,李文普也在那里。叶群问刘吉纯:“现在部队情况怎样?”

刘吉纯说:“很好。”

叶群接着说:“没什么,随便问问。”

刘吉纯见叶群一脸严肃地看着他,心里有些毛,就问:“没有事,我可以走了吗?”

叶群点点头,刘吉纯赶紧就出来了。

9月12日是个星期天,北京空军学院停水停电。上午10时左右,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王兰义接到电话,让他给将军楼送些开水和冷水。老王骑三轮跑了两趟,送去一大桶凉水和七八瓶开水,都放在门口。送完后,当他转身要走时,楼门开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处秘书陈伦和叫住他,让他赶快准备11个人的午饭,3位首长的送到这里,另外8人到食堂吃,要争取12时30分吃上饭。这时已经是12时10分,哪里来得及?13时多,午饭好了,老王先给将军楼打了电话,把3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交给等候在门口的3个女兵,然后带其他人去食堂吃饭。

14时多,王兰义陪来食堂的陈伦和等人吃完饭,把他们送回将军楼。不久陈伦和打电话要王兰义给李伟信派车,说进城买东西。

王兰义骑自行车到将军楼,告诉陈伦和:“车派好了,停在马路边。”

陈伦和说:“你回去吧,李伟信自己会去开车。”

王兰义还没走出几步,将军楼车库突然开出一辆伏尔加,开的很

快。王兰义赶快让路，他清楚地看见司机周宇驰，副驾驶位置坐着于新野，林立果坐在后面。伏尔加飞驰而去，周宇驰还回头甩了一句：“啊，老王。”

王兰义又走了约 200 米，看见程洪珍驾驶另一辆伏尔加迎面过来。

林立果他们 3 人从空军学院出来，驱车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9月 12 日 15 时 10 分左右，林立果得知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在西郊机场“工字房”，林立果与北戴河的叶群通了电话，得知毛泽东已于 9 月 12 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确切消息。

放下电话，林立果连说糟糕。他在惊恐之余，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林立果又打电话将王飞叫到空军学院。

9 月 12 日 15 时，上海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到了首都机场，李伟信开了一辆苏制嘎斯 69 去接他。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西郊机场“工字房”，只有于新野在那里，正在下面条。

16 时 30 分，汽车响，林立果和周宇驰回来了。他们听了王大璋讲述的情况，林立果动情地对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你爸爸还派你来给我们讲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我们感情很深，对林副主席感情很深，……我们今天所以能得到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王政委采取的策略很好，隐蔽得很好。”

他们大约谈了半个小时，王大璋被于新野送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

北戴河，叶群突然要林立衡、张清林当天结婚。林立衡强烈反对，遂改为订婚仪式。15 时多，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来到林彪面前，说：

“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

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

叶群把李文普叫进来，给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林照了合影，又拉着林立衡、张清林接吻，拍照，然后让他们二人出去同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

16时，李文普正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过来找他，对他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林立衡的这番话让李文普感到突然，他不相信。因为：林彪是让他准备去大连，并没说去广州。另外，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众所周知。林立衡曾因为对象问题以死抗争，吃了一大瓶安眠药，幸亏公务员王淑媛及时发现，送到301医院抢救，才免于一死。除此之外，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叶群到处散布林立衡有精神病，现在她突然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阴谋”来，李文普怎么敢相信？他除了吓一大跳，首先想到的是林家儿女又闹矛盾了，心想：“你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负不起这个责任。”于是李文普问林立衡：

“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

林立衡见状，没有再说下去。

李文普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也遇多了，所以，尽管他很吃惊，但还是没太当回事，然后就到空军疗养院找院长、政委办孩子当兵的事了。他向院长、政委说明这是叶群的意见，傍晚又送孩子到空军疗养院办理了入伍手续。

17时，叶群从林彪的客厅里出来，看见林彪内勤张恒昌，对他说：“明天早晨6、7点钟我们去大连，时间可能还要提前，走的早一些，天气不热。你们准备一下东西。”

林立衡离开李文普后，又去找“林办”其他工作人员谈话，叫他们注意观察叶群的动向，联峰山上林彪住地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李文普从空军疗养院回到96楼，遇到几个人问他：“你到哪里去了？我们认为有人把你害了呢！”

近18时，叶群把李文普叫到林彪客厅。林彪对李文普说：“准备

明天早上 6 点去大连，省得太阳出来天热，你给大连打个电话。”又回头对叶群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

走出客厅，叶群却对李文普说：“你先不要调飞机，也不要给警卫部队打招呼，等林立果回来再商量一下。”

晚饭后，叶群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订婚仪式。在 96 楼过厅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和《假少爷》，以示庆祝。

本来，负责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公务员是不能离开内勤值班室看电影的。这天 20 时许，叶群却让内勤都去过厅看电影，她自己则在林彪房间关上门密谈。

第 1210 回：“教导队”，还有个“上海小组” 周宇驰，安排飞广州计划

北京。9月12日16时30分左右，周宇驰打电话给正在空军总医院住院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叫他到西郊机场来。胡萍放下周宇驰的电话，十几分钟后就坐车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客厅。

周宇驰开门见山，对胡萍说：“现在形势不好，首长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戟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准备一架依尔—18，13日7时起飞，我们俩坐上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256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依尔—18拉上部队到上海落个地，接上上海小组人员，再飞去广州。再准备一架多座三叉戟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告诉机长，这架飞机听王副参谋长（王飞）指挥。还调一架安—12飞机运上两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去。另外，派一架安—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好给首长到小机场时使用。把其它的大飞机也准备一下，以备首长用时再电话通知。”

周宇驰是空军司令部的办公室副主任，他怎么能给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他的领导下命令呢？这不是颠倒上下级关系了吗？其实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周宇驰是吴法宪派去辅佐林立果的“师傅”，不离林立果左右。所以周宇驰的命令并不是周宇驰个人的，而是林立果甚至林彪的命令，胡萍能不言听计从吗？

接着，周宇驰又对李伟信说：“马上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维国，通知他9月13日早上有一架伊尔—18飞机在上海着陆，把警卫团二中队换下来，让王维国的空4军教导队和上海小组成员做好准备，搭乘这架飞机去广州。”

周宇驰提到的空4军“上海教导队”是1971年3月下旬，王维国按照林立果的指示，在上海江湾大柏树新华一村内亲自组建的，下设3个区队，9个班，每班12人，由空四军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蒋国璋和政治

部组织处处长龚着显具体负责。

“教导队”成立的那一天，用集体名义给林立果写了一份决心书，在会上进行了宣读：

我们一定要人人想着您，步步紧跟您，一切听您的领导，一切服从您的指挥，紧跟您，顶逆风，战恶浪，风吹浪打不回头……

为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最高统帅的地位，为誓死捍卫您——我们的领导，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行动，您指向那里，我们就冲向那里！

1971年4月9日，林立果来到上海，“上海教导大队”正式成立。队员都是精心挑选的。除了政治条件外，身体要求也很严，身高1米7上下。为了保密，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入伍的，高干子弟或与高干子弟有联系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律不要。并规定，正副班长、区队长和队干部，都要审批。武器装备也非一般，每人配一长一短，步枪或冲锋枪和手枪，每班一挺机枪，每个区队一辆卡车，另外还配了两辆吉普车和三辆摩托车，供训练用，准备逐步装备一个摩托车队。这个教导队不仅进行一般的战术技术训练，还要求会驾驶各种车辆，学会登高，打巷战，并秘密进行了格斗、捕获训练。这些训练一般都是在江湾机场进行。

王维国还按林立果的要求，在新华一村大院内建造一所秘密据点。林立果提出：这顶工程“要绝对保密，房子不要引人注目，要修地下室，门窗要装防弹玻璃，院墙要开暗门”。

根据林立果的要求，王维国亲自找设计人员绘制了图纸，成立了专门的修建班子，专门从浙江调来一批对情况完全陌生的民工，日夜秘密施工。王维国要求：“房子一定要在国庆节前完工！”他还要求在新华一村院内搞一个直升飞机场。

林立果还布置王维国制造一种672毫米的轻型冲锋枪。王维国把这项绝密任务交给上海某军械厂。经过多次试制，最终造出8支。这些轻型冲锋枪非常轻便和小巧玲珑，可以拆卸成几节，装在一个扁扁的长方形小黑箱子里，箱子的一边有一个提手，可以拎起就走，好像提着一只装了黑管或长笛的乐器箱一样。但其杀伤力几乎和其它冲锋枪一样，在较近的距离内具有极大的威慑作用。王维国把两支质量

最好的轻型冲锋枪送给林立果，林立果收到后十分喜欢，就装入黑箱子，放在他乘坐的汽车后座里。

周宇驰提到的那个“上海小组”则是1969年6月底，上海空4军根据叶群、江腾蛟的指示，成立的一个专门为林立果挑选对象的“找人小组”，对外叫“专案组”，开始由蒋国璋、裘著显等8人组成，所以也叫“八人小组”，受林立果直接领导。

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将“找人小组”改为“上海小组”，还专门为“上海小组”题了字，制作了精致的组标。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枪，并亲自到上海主持授枪仪式。

后来，“上海小组”又扩大成员，发展到20多人，都会打枪，会摄影，会驾驶汽车。

“上海小组”制订了“入组须知”：

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因此，每个成员必须具有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敬爱的林副主席、忠于叶主任、忠于林副部长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为完成这些光荣任务和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安全过程中，应不惜牺牲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还必须做到：

一、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林副主席的指示；
二、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命令。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三、经常如实地回报情况。应根据任务的性质向有关领导勤回报多请示。在必要时，小组成员可以直接向林副部长报告情况；

四、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要注意自我革命，处理好“跟上、靠下、正确对待自己”的关系；

五、严守机密。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时，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凡是参加“上海小组”的人，都要举行“小组宣誓”，宣誓的内容除了“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以外，还要“忠于林副部长”，为“林副部长赴汤蹈火”，“绝对保守林副部长的机密”。“上海小组”的成员要认真学习《入组须知》。

后来,王维国也参与领导这个“上海小组”,他说:“小组的每一件工作行动,都要有助于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长”。

9月12日17时左右,胡萍从周宇驰那里接受任务后,立即通知潘景寅执行去山海关的飞行任务。可是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找到潘景寅。怎么回事?潘景寅在西郊机场的生活向来是两点一线:办公室——家。虽说是星期日,潘景寅也不常在家里呆着,他嫌孩子闹,总是到办公室看书学习,也练练字。可是胡萍打到潘景寅的办公室,没有人。打到潘景寅家里,老潘家属孙祥凝说老潘拿着一堆书报出门了。师值班室也不知道潘副政委去了哪里?

胡萍有些生气,明明说好待命,怎么人也找不到了?原来,此时潘景寅恰巧在机场的理发室理发,没想到就在这时,飞行任务来了!

胡萍找到潘景寅后,通知他:立即做好飞行准备,19时送林立果去北戴河。

潘景寅接受任务,匆匆回家,顾不上吃饭,拿起飞行包就往外走。临出门时,告诉爱人说:“今晚可能回来。”

对于飞机来说,北京到山海关太近了,飞一趟也就40分钟,专机一般都是“卸下”首长就返回,不在山海关过夜。

此时已是晚饭时间,100团三大队值班员通知林彪机组立即到候机室。李成昌接到命令,放下饭碗跑步到飞行员宿舍,换飞行服。床上乱七八糟,李成昌也顾不上收拾。哪知这一去,就与飞行员宿舍永远再见了。

18时,康廷梓到空勤灶吃晚饭。他打上蒸饺,还没有吃,大队值班员就来通知他,有紧急任务。康廷梓放下饭碗就往宿舍跑,迎面碰上机械师李平。李平说:“康中队长,潘副政委让加16吨油。”因为胡萍告诉潘景寅,第二天一早飞广州,所以潘景寅要求李平加16吨油。

可是康廷梓想,加这么多油干什么?这个油量可以从北京飞到广州。我们不是去山海关吗?接林彪回北京过国庆节,来回12吨油就够了。

康廷梓跑进飞行员宿舍,换上皮鞋,拿上飞行包,还多拿了一条棉毛裤。然后跑到100团值班室。

第一副驾驶陈联柄、领航员李成昌、通信员陈松鹤都已经到了。

康廷梓把加 16 吨油的疑问告诉了第一副驾驶陈联柄。

潘景寅夹着小包也进来了，说：“你们上值班室要车上机场，三叉戟 256 号的飞行任务要准备好，任务要保密，使用 252 飞机的代号。”

康廷梓提醒他：“今天的飞行手续还没有办。”

潘景寅肯定地说：“不办了。”

因为重要的专机任务保密严格，机组人员谁也没有再提疑问，大家坐上汽车到了停机坪。

机械师李平迎上来，对潘景寅说：“油车没油了，只加到 15 吨。”

陈联柄问：“加这么多油干什么？”

潘景寅没有说话，也没有要求再加油。

胡萍向潘景寅交代完任务，又用电话通知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三叉戟 252 号今晚 19 点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要亲自掌握。”又嘱：“对值班的就不要讲了”。

256 是专机，252 是普通多座客机，发训练预报故意不报专机号，主要是为了首长安全，这在专机飞行中是常见的。

18 时多，胡萍又通知派驻海军山海关机场的空军 34 师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今晚 19 点起飞到你那里去的 252 号飞机，实际是 256 号，但要用 252 号的称号，你知道就行了。”

18 时 22 分，山海关机场的值班员李万香接北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暑期专门到北戴河负责专机调度工作的李海滨电话：“19 点，来一架 252 号三叉戟。”

晚上，胡萍又将周宇驰交代的其余要用的飞机配备了机组人员名单，以训练名义，申请了航线和起飞时间。

18 时许，空军副参谋长王飞来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看到的是一片混乱的景象。在林立果指挥下，几个男女正在紧张地收拾行装。大大小小的箱子，东一堆，西一件，横七竖八；散乱的文件、书本，乱七八糟地丢弃在桌子上、沙发上、地面上；厨房里烟熏火燎，纸灰飞扬……林立果对王飞说：“‘B - 52’回来了，我要马上回北戴河，向首长汇报一下。南线不行，你拉个名单，准备飞广州。”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处秘书陈伦和走进来，林立果对他说：“我走了，明天你和周宇驰走，一定要走！不走的话，人家要杀掉你。”

陈伦和吓了一跳，林立果接着说：“最近有人要搞鬼，反对首长。我坐飞机先走，到沙堤去，你们第二批走，听周宇驰的安排。你们家属也一起走，今天晚上就领到这里来等着。你们要带杆枪，家属也要带枪。”

看到陈伦和表情紧张，林立果赶快说：“明天飞机上有林副主席。”又狠狠地补了一句：“8341 部队操蛋就跟他干！飞机上左派一定要占多数。”

临出门，林立果又说：“我们要搞一个中国的（印尼）九三〇事件，把他们的政变阴谋掐死。”

这时林立果又想起一件事，把许秀绪、李伟信和他的弟弟李伟军叫到面前，交代他们到毛家湾去取三样东西：菲利普盒式播放机，德律风牌立体声扩音机，还有三个喇叭的音箱。因为林彪很喜欢听音乐，林立果曾让程洪珍擦洗过一大批旧唱片，说是要给首长听。最后林立果说：“到广州后，叫李伟信到香港去，然后绕道日本到苏联，叫苏联从北极星潜艇上发射导弹，叫他们尝尝山姆大叔的滋味。”他扮了个鬼脸，说：“反正是从公海发射，也弄不清是谁干的。”林立果看了看表问：“老周，飞机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你今天晚上到北戴河坐三叉戟去……”周宇驰回答说。

“好，”林立果打断周宇驰的话，“情况紧急，两个小时后我就到北戴河去。北京由老周总指挥，”他看了众人一眼，“具体部署由老周跟你们谈吧。”说完，就走进里屋收拾行装去了。

林立果匆匆走后，周宇驰召集开会。他说：

“现在情况紧张，刚才从上海得到消息，‘B - 52’在上海说，‘这几年我犯了个错误，过去军队被彭黄抓去了，现在被林黄抓去了。’看样子，‘B - 52’回到北京，就要召开三中全会，就要对我们动手了。首长决定，现在转入第二方案，立即转移到广州去，要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明天到广州。”

.....

“到那里以后，首长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朝局势。”

“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消息，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

“我们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可以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江腾蛟和王飞两个人都没说话，周宇驰对他俩说：

“现在时间很紧，你们两位马上回空军大院，把机关里的左派骨干集中在一起开一个会，把人员编编组，你们的任务就是保证黄、吴、李、邱安全上飞机，飞机直飞广州沙堤机场着陆，我已经通知顾同舟那里安排好车辆和房子。王副参谋长、于新野负责组织人员保护黄、吴、李、邱，江政委负责警卫，保证他们安全到达广州。”

看他们两个还在发愣，周宇驰有些发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叫做燃眉之急嘛，咱们总不能在这儿等着送死吧！你们先通知家属，让他们马上坐火车先到广州去，以绝后顾之忧。”

周宇驰按了一下电铃，对进来的于新野说：“你让李伟信给上海方面打个电话，通知他们明早有一架伊尔-18从北京飞到上海，让他们把飞机上的8341部队的人全部接下来，换上教导队和‘上海小组’的人，然后直飞广州沙堤机场。通知王维国到机场，如果他愿意走，就随机走，如果不走，也可以留在上海。明天早上8点，首长从北戴河直飞广州沙堤机场，就坐林副部长回山海关的这架飞机。一部分工作人员包括你们的家属，明天早上7点从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王副参谋长、江政委、于新野，明天早晨6点以前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由王副参谋长通知黄、吴、李、邱到机场。”

王飞说：“我通知不行，还是你通知吧。”

周宇驰说：“那好办，我通知。可以先通知黄总长，说是林彪在某地要开一个会议，他到机场后，再要他通知另外三人。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如果不走，就要通长途电话，由林副主席直接同他们谈。如个别人不愿去，要两个人‘招呼’一个，一块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广州沙堤机场。”

周宇驰问江腾蛟：“飞机上的警卫你管行不行？”

江腾蛟说：“好嘛。”

周宇驰：“你就是‘警卫营长’，指挥人看住他们就行了。你不要出

面,由王副参谋长出面跟几位老总摊牌。你们的飞机如果到了,林副主席的飞机没到沙堤之前,你们不要先下飞机,等他到了以后你们再下飞机。这架飞机明天早7点最迟8点起飞。听明白了吗?另外李伟信去上海,负责把上海那里的人都拉走,具体安排这里就不讲了。”

周宇驰最后宣布:“这是命令,大家要坚决执行。现在时间很紧,要抓紧。机关哪些人去广州,如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办公室处长)等都没有问题,还有什么人,今晚由王副参谋长、于新野把名单定下来,找他们开个会。你们先去准备,我随后就来。”

散会时于新野说:“去的人都要带手枪。”

周宇驰补了一句:“还要带些冲锋枪,直接给军务部打个电话,让他们马上准备20支手枪和3支冲锋枪,多准备点子弹。”

周宇驰让于新野到空军大院协助王飞组织人员。最后,周宇驰对江腾蛟、王飞说:“胜败在此一搏,开始行动吧。”

于新野在会议中间,把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又交给了王飞。

会后,李伟信根据周宇驰的指示,电话通知“上海小组”的负责人蒋国璋。这是李伟信的日记上记载的这个电话通知的提纲:

立即告 W

1、明日有一架伊尔-18,下列人员随机出发:小组全体,教导队全体。全部武装,卢、张、所有能来的种子,如刘、刘、戚、曹、卢、林。

2、告 w 明日上机场,有话告他。

3、准备 80-90 人住宿,……人员隐蔽,80-90 人撤后上机就走。

4、带一套军装(过把款今晚送家)带些钱、粮票、布票。

5、保密!! 全局。

告蒋请蒋告 w

对这种行动意味什么,电话不好讲,请他自己考虑。

“W”是指王维国。”“80-90 人住宿”是说飞机上 80 至 90 名 8341 部队的警卫人员下来后,给他们找到住处,换上“上海小组”和“教导队”的人一同去广州。

随后,江腾蛟对王飞说:“你们去研究名单吧,我不去了。”他直接回了家,安排家属去广州。

第 1211 回：林立果，三叉戟飞山海关 空司令忙，王飞定南下名单

9月12日19时，西郊机场的256三叉戟并没有起飞。机组9人在机场等候，潘景寅叫空勤灶把饭送到候机室。大家吃完饭，又等了好一会儿，才突然看到一辆蓝色伏尔加从256三叉戟飞机左翅膀下飞快钻出来，吓了康廷梓一大跳。原来是陈伦和开车走错了路。刘沛丰下车后，从车上卸下一堆箱包，留在原地看守。伏尔加开走了。

很快，蓝色伏尔加又回来了，林立果下车，戴眼镜的白面书生、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一处秘书程洪珍带两个十八、九岁的女兵也下了车，两个女兵的新军衣显得有些肥大。

陈伦和又卸下一堆箱包。大大小小20多个。

林立果向陈伦和交代一番，让他把蓝色伏尔加开走了。

34师100团政委安治梁和团参谋长李克修前来送行。按规定，专机起飞时100团领导必须到场。100团长陈晋忠此时到苏联接飞机去了，因此没有前来。政委安治梁和参谋长李克修就因为这次送行，“913事件”后也被送进“亚疗”，安治梁被审查了整整8年。

潘景寅任100团团长时，与政委安治梁搭档，彼此配合很愉快。他对前来送行的安治梁说：“老安，我吃了三片安眠药，原想抓紧睡一觉，没想到有任务。”

安治梁嘱咐陈联柄，在必要时关照一下。

256号三叉戟专机服务员、专机师服务队副队长孙福荣正准备登机，在场的胡萍将她叫住，说：“你把自己的皮箱取下来，明天再去。”于是，孙福荣临时安排服务员魏秀玲随机出发了。

19时30分，林立果等人上了256三叉戟。

19时40分，256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飞往山海关机场。这是256三叉戟改装后第一次正式飞行。

潘景寅驾驶飞机，起飞时倾斜度大了些。飞机抖动不已，桌上茶

杯滑下来,摔碎了一两个。两个女兵很少坐飞机,以为要摔了,吓得够呛。康廷梓说摔茶杯是服务员魏秀玲没有固定好,“飞行后讲评小魏作检讨。”

到山海关是短途飞行,始终是潘景寅驾驶飞机。潘景寅并没有对陈联柄说他吃了安眠药。但陈联柄有政委安治梁的嘱托,坐在副座上眼睛一眨不眨。

驾驶室没有康廷梓的位置,他坐在机舱里东张西望。林立果非常敏感,他正与刘沛丰说话,发现康廷梓注意他,立即不说话了。康廷梓感觉林立果表情沉重。

20时,北戴河,莲花峰96楼正在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滨从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打电话给在这里执行警卫任务的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

“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

天都黑了,还有谁来?姜作寿说:“不清楚呀。”

李海滨急了:“你们到底接不接?飞机15分钟后就落地了。”

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寿说了算,他便说:“我了解一下。”然后马上打电话找李文普询问。

李文普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听说谁要来。”

姜作寿问:“那我们去不去车接?”

李文普说:“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姜作寿放下电话才3、4分钟,李文普的电话就追来了,急急地说:“老虎回来了,快派吉姆车去接。”

原来李文普刚放下姜作寿的电话,叶群的内线电话就打过来了。她告诉李文普:“立果听说豆豆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

吃过晚饭,叶群给工作人员散发喜糖。刘吉纯和“林办”秘书李春生等人在平台上边乘凉,边聊天,边吃糖。忽然,他们听见天上大飞机的声音。一会儿叶群来电话,要刘吉纯“赶快派车去接老虎”。

此时,姜作寿正在向司机小宁交代任务,一架大型飞机轰轰吼着,从西南向东北飞来。已经降低了高度,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

小宁着急地说：

“接不到了，50 公里路，没有 40 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啊。”

姜作寿说：“快动身吧，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

刘吉纯带了两个司机，开了辆吉姆车出发了。他对司机小宁说：“不要跑快，就在中间跑。”

256 三叉戟快到山海关机场时，林立果在飞机上对程洪珍交代说：“明天早晨 7 点，首长要和‘协和号’通电话，你要把机场的保密机准备好。电话保证不好，你要负责！”

“协和号”是林立果他们给黄永胜起的代号。林立果的口气有些威胁，他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说过话，程洪珍吓得连连点头。

林立果又说：“下飞机后，要了解一下飞机维护、加油、警卫等情况，这些你当秘书应当懂得。还有给小张、小袁每人一支手枪，找个没人的地方教她俩使用一下，明天让她们上北京来的伊尔 -18 飞机，也可能上这架三叉戟。你和她们把我的行李归拢一下，免得明天和‘子爵号’的东西弄混了。现在一切行动要听我指挥。”

小张、小袁是随林立果一起上飞机的两个女兵，“子爵号”是叶群的代号。程洪珍的工作是保管文件，对外联络。上飞机前他一直忙着给林立果收拾行李，连自己的牙具都忘了带，也没有和对象告个别。26 岁的林立果没有当过“首长”，27 岁的程洪珍也没有当过“秘书”，两人关系有些微妙。有时林立果把程洪珍骂得狗血喷头，而有时又很亲热，亲自给程洪珍介绍对象，单在上海就给他介绍了 12 个，程洪珍一个也没有看上，说我是“康曼德”身边的人，找个对象不像样，怎么说得过去？这不是丢“康曼德”的脸吗？最后林立果把别人给他选的 4 个最好的对象其中之一介绍给程洪珍，程洪珍这才热恋起来。这次匆忙去北戴河，光忙林立果的事了，也没有打电话和对象说一声。程洪珍有些丧气，但在林立果面前不敢有半句怨言。

“康曼德”是英文司令官的音译，林立果在空军的小圈子里常以“康曼德”自诩。

刘沛丰避开机组人员，塞给程洪珍两把手枪。

20 时 15 分，256 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落地。李海滨嘱咐值班员李万香：“对外只讲 252，不准讲 256。”

林立果走进驾驶舱，与机组每个人握手，说：“明天首长也要坐这架飞机。人民解放军战士要听林副主席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我代表首长谢谢大家。”

刘沛丰提着4个包，和林立果下了飞机。其他东西都放在了飞机上。机场没人接，林立果等不及与北戴河联系，从机场借了一辆吉普车，带着刘沛丰开回北戴河。同时让机场通知“林办”派车去接。

于是，山海关机场又给“林办”打电话。

林立果和刘沛丰走后，程洪珍和两个女兵把林立果的20多个箱包归挪到一起后，也下了飞机。因为第二天还要坐飞机，两个女兵没有拿军用挎包。后来程洪珍发枪，两个女兵没有地方放，又返回飞机拿军用挎包。

这时，机组9人还在做飞行后例行检查。康廷梓帮助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加润滑油。他听见潘景寅对李平说：“待会儿把油加到17吨。”

康廷梓原以为首长明天飞回北京，现在又加这么多油，不一定是回北京了。他就插了一句话：“加这么多油，明天到哪里？”

潘景寅所答非所问：“一会儿我们研究一下航线。”

李平去安排加油。因为三叉戟1970年从巴基斯坦引进中国，从来没有在山海关机场加过油，油嘴不配套，不能用先进的压力加油，只能由机械师爬到机翼上，把管线拉到机翼上部的加油口去实行重力加油，这样折腾就又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且加油速度很慢。潘景寅看天色已经很晚了，而且机组是在吃晚饭时被召来执行紧急任务，晚饭都没吃好。机场餐厅已准备好了夜餐，所以潘景寅没有再坚持，说：“那就不加了，明早再说。”

21时多，机组9人塞好了飞机的“眼”，最后由机械师锁上飞机，将飞机交给山海关机场的警卫人员，然后一起到空勤灶吃饭。食堂里，程洪珍身边放着一个精致的手提皮箱，此时，他和两个女兵已经快吃完饭了。

吃完饭，中队长康廷梓分配房间。潘景寅是师级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服务员小魏和那两个女兵住在一起。剩下机组7人住在机场的一栋平房里。

平房最东边一间是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住。那里既是他临时宿舍，也是调度室，里面有三部电话，除了机场内部电话，还有两台专线保密机，一台通北京，一台通北戴河96号楼。每年暑期，为保证中央首长专机，西郊机场调度室都要派一名主任或副主任，到山海关机场单独设立调度室。本来是应该调度室李副主任来的，因他要回西安搬家，调度室主任李海彬就来了。

程洪珍住在平房东边第二间；第三间分给三个机械师：李平、邴起良和张延奎；第四间是第二副驾驶康廷梓与领航员李成昌；第五间是第一副驾驶陈联炳和通信员陈松鹤。

康廷梓问领航员李成昌：“研究了航线没有？”

李成昌说，“只是估计了几条航线，有重庆、大连、广州等，没有说准到什么地方去。反正我的领航记录纸都已经备份好了。领航记录纸上面可以提前填好所飞航线的基本数据。”

程洪珍吃完夜餐，先到两个女兵的宿舍，准备教她们使用手枪。两个女兵说陈伦和已经教过她们。程洪珍向她们传达了林立果的指示：“明天还有一架飞机来这里，是周（宇驰）副主任坐的伊尔-18。明早上走时，你们可能上那架飞机，也可能上这架三叉戟。如果上三叉戟，听李伟信指挥。今天听我指挥。”

然后，程洪珍来到李海彬的调度室，看见潘景寅正和李海彬一起研究全国气象图。

程洪珍用李海彬屋里的保密机分别和北京、北戴河进行了通话试验，声音清晰，一切正常，他放下心来。然后问潘景寅：“飞机维护好了吗？”

潘景寅肯定地说：“维护好了，不会有问题是。”

程洪珍又问：“飞机警卫好了吗？”

潘景寅笑着说：“这个你放心，机场的人可聪明了，看到什么飞机来了，就知道派什么人警卫。”

程洪珍跟着林立果有好几天没怎么睡觉了。看一切都安排好了，再没有事情，就去睡觉了。

按惯例，机组在飞行后要开一个总结会。潘景寅来到机械师房间召集机组进行飞行后讲评。

康廷梓问：“到现在航线还不知道，明天怎么看天气？”

潘景寅说：“咱们不用管，空军航行局都掌握，听他们的。”

此时，22时已过，潘景寅召开例行的机组讲评会。他首先把北京到山海关一段的飞行情况做了简要的讲评，接着说：“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

康庭梓理解潘景寅说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指当时空军部分单位盛传的“吴反林”，即空军司令吴法宪等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流言。

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潘景寅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我们听胡萍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

关于第二天的时间安排，潘景寅说：“明天早上6点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进行准备。现在时间不早了，抓紧时间睡觉吧。”

康庭梓看看手表，时间指在22时40分。

23时多，机组8人都关灯休息了，只有潘景寅一人没有睡，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只待了不足5分钟，一个人又返回调度室，躺在李海彬的床上，和李海彬闲聊。

潘景寅不走，李海彬也不能睡觉，陪他坐着。潘景寅是个话极少的人，而李海彬在自己的上级面前，也不会有更多的话题。这期间，北京不断有电话过来查问三叉戟的事情。潘景寅接电话时，李海彬听不见电话机里说的什么，从潘景寅的只言片语里，也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北京反复查问256三叉戟，李海彬感觉到了异常。

北京这边。王飞从周宇驰那里出来后，没顾上吃晚饭，就直奔空军司令部。司令部办公室人来人往，副司令员邝任农出差了，他的办公室在西三楼南侧最西头，很安静。王飞决定在邝副司令的办公室开会。21时多，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党委办公室二处处长朱铁铮、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处长郑兴和陆续到了，只有鲁珉还没来。王飞说：

“时间很紧，不等了，先开会。主席的身体现在很不好，有人企图借机捣鬼，要把林副主席、黄总长等人打成林黄反党集团，所以林副主席有命令，要黄、吴、李、邱出去一下。明天在广州召集他们谈话，还要召集师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黄、吴、李、邱要人护送，光我们几个人

不够,要从机关各单位选一些人,拟个名单。明天早晨7点到8点起飞,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他们安全到达广州。”

他说:“林副部长已经回北戴河了,要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13日由西郊乘飞机去广州。”

他在会上宣布江腾蛟为“总指挥”,鲁珉、贺德全为“副总指挥”。

刘世英负责记录并抄写。他们刚刚提出一份名单,于新野就到了。他看了一下名单马上就说:“这是去广州的第一批人员,要精干,接着还要组织第二批人员去广州,并且带家属去。”他特别强调:“第一批人员除了空司的人员以外,还要把江腾蛟和随他一块儿去的张发云、朱铁笙也写到第一批名单里去……”

21时30分,正在住院的鲁珉来了。

第1212回：门外听，广州不行去香港 林立衡，忙找李文晋商议

鲁珉是在9月12日晚上21时多，接到空军党委办公室二处处长朱铁铮的电话，让他去邝任农的办公室，说有重要文件要传达。

鲁珉怕杀人灭口，带上手枪叫爱人武杠桥跟他一起去。到了空军司令部，鲁珉叫妻子和驾驶员留在楼下，交代说：“听到楼上有什么动静，立即到吴司令宿舍去报告，或者到汽车队值班室去喊人。”

此时的鲁珉相当紧张，也下了决心，只要他们要杀他，他也掏枪干。鲁珉上去一看，王飞、刘世英、于新野、贺德全、朱铁铮、郑兴和都在，在，却不见林立果。

鲁珉问：“有什么重要文件？”

这时南下广州的名单已经弄好了，王飞给他看。名单上，作战部除了鲁珉，还有傅英豪夫妇和赵桢等。王飞把鲁珉拉到一边的大沙发上，对他说：

“副统帅决定黄、吴、李、邱都到广州去，让我们组织一个班子保证他们安全到达广州。副统帅也去，造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划江割据，以后再创造条件谈判。”

王飞掏出手枪，说：“你有没有这个？”

鲁珉说：“我有。”

王飞说，每个人都装备手枪，让黄、吴、李、邱到西郊机场，飞机都准备好了。去的办法由叶群通知黄永胜到西郊机场，再由黄永胜通知吴、李、邱。

鲁珉问：“黄永胜不走怎么办？”

“不走也得走。”

王飞让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专门负责黄永胜，要确保他上飞机。

贺德全问：“他是总长，如果不听我的怎么办？”

王飞：“用绳子捆起来，架上飞机！”

贺德全说：“那不是绑架吗？”

王飞不回答，而是让人找来几条背包绳。

经过研究，确定了 25 人的名单，编为 6 个小组，然后研究了分别随同黄、吴、李、邱上飞机的分组名单，研究了通知南飞广州人员的方法，去机场车辆的安排，集中地点。指定贺德全负责到机场后的现场指挥，鲁珉负责掌握飞机的航向，朱铁铮负责了解机关去的人的思想情况，军务部装备处处长郑兴和安排车辆，还确定了通知办法和车辆安排，集合地点等。还研究了如何处置黄、吴、李、邱的司机、秘书和警卫的方法，即：到机场后，不让司机下汽车，秘书和警卫带到不同的地方，由专人分别负责给这些人“做工作”。着重研究了对付警卫员的办法：先下他们的枪，再“动员”上飞机。王飞强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在机场不能开枪。于新野掏出一把匕首，交给负责警卫的贺德全。会议中间，王飞叫郑兴和到警卫营仓库取 59 式手枪 30 支，子弹 2000 发。冲锋枪 2 支，子弹 200 发。为行动隐蔽，除特殊情况，坐一辆大轿车去，由空军司令部管理局副处长兼汽车队队长王琢驾驶。早晨 5 时在 2 号楼西南角马路上集合，一起上车。

王飞还提出，会议结束后，他要带几个人去西郊机场，实地察看一下人员集中的地点和上飞机的位置。并计划在第二天凌晨人员集中后，由他进行简单“动员”后，由郑兴和向大家发枪。

与王飞在空军司令部安排南下广州事宜的同时，21 时 30 分，胡萍也在西郊机场把航空兵 34 师 100 团政委安治梁和团参谋长李克修叫到候机室，布置周宇驰交代的任务：以“训练”为名，调动几架飞机，一是伊尔 -18—902 号飞机，训练航线是长春、沈阳，实际上是去山海关；三叉戟 254 号飞机，训练航线是上海、武汉，实际上是去广州。以上两架飞机明天早上 8 点左右起飞。另外，安 -12—231 号飞机，明天试飞一个空域，然后落到沙河机场，装上两架云雀直升机，航线经当阳、长沙，落广州白云机场。卸下直升机后，马上飞山海关，为首长拉两辆汽车送到广州。试飞申请西郊，实际上落沙河。转场也申请西郊起飞。

胡萍准备同周宇驰一起，明天早上乘 902 号飞机去山海关，然后同林彪一起南下广州。所以当晚 256 号三叉戟专机准备送林立果去

山海关时,胡萍特地把专机师服务队副队长孙福荣留下,就是要安排她临时到902号飞机上当服务员。

22时左右,胡萍打电话叫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到西郊机场,对他说:“明天252号(实际256号)从山海关起飞到广州,可是航行局向外发航线时,把航线发到西安,也可以多发几条到其他地方的航线,林彪要动,注意保密。”

这段时间,北戴河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20时35分,从北戴河联峰山上下来的司机小宁和刘吉纯正急急忙忙赶往山海关去接林立果。刚过秦皇岛不远,突然发现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目中无人般地“站”在马路中间。他们连忙停车,正是林立果。刘吉纯和小宁表示歉意,林立果说:“不怨你们,事情急。”说着,刘沛丰从吉普车上搬下两只手提箱,换乘了吉姆车,林立果他们扬长而去。司机和刘吉纯上了林立果丢下的吉普车,一路追吉姆也没追上。

叶群从20时许进到林彪房间已有一段时间了。正在看电影的林立衡听说林立果快要回来了,跑到林彪房门口偷听。里边谈话声音很低,听不清,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这时候广州还给豆豆和张清林送皮鞋、……许世友也是那边的啦。……主席在世界上威信也不高……”

21时左右,林立果到了莲花峰96号楼。在放电影的过厅,他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只说了一句:“祝贺你们!我马上要到首长那里去。”就和叶群一起去了林彪的房间。

林立衡立即找到林彪的内勤卫生员陈占照和张恒昌,逼着他们到林彪的房间去偷听叶群、林立果都和林彪说了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张恒昌出来告诉林立衡,刚才在卫生间里,他隔着门隐约地听到林彪客厅里的两句话:一句是“主任跟首长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

张恒昌说:“我始终没听见首长答话”。

林立衡站起来离开放电影的过厅,在走廊正巧碰见林立果,便拉住他问明天到底去哪里?林立果匆匆说:“去广州,军阀混战。”说着便

快步走了。

刘吉纯回到林彪住地后，没看到林立果。他见到李文普，便问：“怎么看不到老虎，他的房子准备好了没有？”

“走，我们看看去。”李文普说着，便和刘吉纯一同下山，到 57 楼看过林立果的房间，然后回到 96 楼院子里。

刘吉纯见李文普一直不说话，便问他：“我觉得老虎回来有点不对劲，是不是要出事呀？”

李文普说：“等上飞机后再说。”

刘吉纯说：“上了飞机可就晚了，工作人员中就咱俩有枪，是不是从部队挑选几个人上去？”

李文普没有吭声。

21 时多，叶群给秘书办公室打电话，叫刘吉纯过去，对他说，要派他去大连看房子。以前去大连，也都是刘吉纯打前站。

刘吉纯问：“怎么去？”

叶群说：“坐火车去。”

刘吉纯一听不对劲，便说：“夜里没有开往大连的火车。”

叶群也觉得说错了，马上改口说：“机场不是有架小飞机吗？”

刘吉纯想了一下说：“可能你们到了我还没到呢。”

叶群也没有勉强，说：“不去就算了。”

刘吉纯感到很蹊跷，因为夜间乘火车去大连，第二天晚上才能到达，而他们第二天上午乘飞机，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大连了。

接着，叶群给北京毛家湾打电话，是值班秘书于运深接的，说了十多分钟，主要是谈林立衡的婚事。又说修小厨房和到大连做衣服。叶群说先到大连，然后回北京过国庆。叫毛家湾收拾卫生。还说到上海做的尼龙外套破了一个洞，让上海空 4 军管理处处长过全找人织补一下。最后，毛家湾的童显华管理员让于运深问叶群，别人送的那几只王八，养了好多天，怕死了，请示主任看怎么处理？叶群当时没有答复。过一会儿，叶群第二次给于运深打电话，说：“明天把这些乌龟送到钓鱼台，请江青同志吃。”叶群又详细交代要怎么样怎么样……

再说林立衡听林立果说要去广州，立即去找李文普。她将李文普和刘吉纯叫到屋后面 96 号楼院子里一个僻静的小厕所里，告诉他

们说：

“是小张刚听来的，他们要走，要到广州去，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这不是要外逃吗？”

刘吉纯大吃一惊。

林立衡问李文普：“首长是否知道老虎对我说的事？”

李文普说：“首长哪会知道这些，首长肯定不知道。我一直守在首长身边，这我还不清楚？”

他还说：“主任叫我明早6点去广州，要我先不要通知8341部队。我去问首长，首长说广州太热，不利于他治病，不去广州，坚持要去大连。主任问我广州的房子有没有冷气设备，我说有。主任又去劝首长，说广州的住处有冷气不热，首长便把我找去，对我说去广州也行。首长只知道换个环境去广州养病。”

林立衡说：“既然如此，你能调动大队部的人保证首长安全吗？”

李文普说：“没问题，我能保证。”

李文普又说：“汪东兴和张耀祠在‘九大’后让我兼任8341部队副团长的职务，首长、主任没有同意。他们又在党委会上做出决定，规定我有权为首长的安全调动8341部队。”

林立衡对李文普说：“我对你谈了几天了，要提高警惕，不能麻痹，一定要防止今晚出事，你能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吗？”

李文普：“能保证，你放心好了。”

林立衡：“你有把握吗？”

李文普：“这不成问题，我们有这么多人，林立果要是真的要跑，我们就是拼了，也不能让他把首长弄走。”

林立衡对李文普说：“你跟8341部队经常打交道，有工作关系，又很熟；我常年不在家，不认识他们。找8341部队，我去不合适，还是你亲自去大队部吧，你有这个职权。”

刘吉纯也叫李文普一起去，李文普说：“现在‘林办’与8341部队的关系不太好，也还搞不清情况。主任说是去广州，林立果说的也是去广州，要是真的是去广州没发生什么事，那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了，那可不得了！”

林立衡说：“首长身体长期不好，你身体也不好，你辛辛苦苦，一直

带病坚持在首长身边守护了20年。大家都知道，首长那样信任你，你为首长的病和他那样被骗，掉了不少眼泪，吃了不少苦头。你对首长是忠诚的。你对工作人员经常说要忠诚保护首长，现在是保卫首长安全的关键时刻，你要是没负起责任，那你20年不都白守护了吗？你平时口口声声要忠诚首长，到这时候，你怎么又犹豫起来了？你过去帮助欺骗首长那么多年，那也是不得已，怪不了你。你本质上还是同情和忠诚首长的。可是，我早就对你们说过，首长被骗，总有一天要被揭穿的。在这个时候，难道你还帮助骗首长？骗到底吗？”

林立衡还说：“你再不去就晚了，主任把你女儿送到空军去当兵，你可不要因此被主任拉过去啊。你也许怕主任，但怕也没用，如果首长的安全出了事，你逃脱不了责任，因为你是这里工作人员的负责人。到时候，你怎么向中央交待？你要是跟着走，那你就是叛徒。你要是没保护好首长安全，就是你没走，你也要为一切严重后果承担责任！”

李文普说：“关键问题是我现在搞不清情况呀！这些情况都是你从林立果那儿听来的，如果到时候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还可以在飞机上采取措施，反正我们人多，我对工作人员已经布置好了。”

林立衡干脆对李文普说：“你不去，我去！”

李文普马上表示赞同，说：“那好，你去吧，我在上面守着，你见到张宏就说是我同意你去找他的，是我派刘吉纯陪你一块儿去的，你叫张宏马上和我联系。”他接着向刘吉纯交待任务，让他出面对张宏说明情况。

林立衡问：“现在负责警卫部队的是谁？”

李文普回答：“是张宏，他是老红军，是军级干部，职务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负责整个北戴河地区的中央首长安全。”

林立衡又问：“这个人怎么样，我找他行不行？”

李文普说：“张宏是这个地区的头，现在调动部队不需要经过他，你可以找姜大队长，这个人比较精干。”

林立衡：“姜大队长通常呆在哪里？”

“在二大队大队部。”李文普说，接着他又对刘吉纯说：

“你先去找姜大队长，接着找张宏说一下情况，然后再让立衡和张宏他们谈。”

林立衡：“我找张宏谈了之后，由你负责与他联系，因为你有权代表首长调动和指挥部队。”

李文普说：“那好，就这样吧。”

林立衡：“我叫张宏带部队上来，由他们出面阻拦。在部队没有上来之前，你无论如何要尽一切努力保证首长不被弄上汽车，不然就麻烦了。”

李文普说：“那当然啦，我会尽量拖延时间。司机老杨听我的，这不成问题。”

林立衡：“你知道林立果和刘沛丰是很会开车的。”

李文普说：“这我知道。就按你说的办，在张宏没带部队上来之前，我一定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

林立衡又问：“你带枪没有？”

李文普说：“没有。”

林立衡埋怨说：“你们平时都带枪，到这时候为什么不带枪？”

李文普说：“枪放在宿舍里，马上就带。”

这时已是晚上 21 时 50 分了，刘吉纯领着林立衡顺着黑森森的小路跑到位于 58 楼的 8341 部队二大队队部外边。他先让林立衡在小树林里等着，自己进去联系。

此时，部队已经休息，大队部里只有大队长姜作寿和卫生员小陆正在下象棋。刘吉纯把姜作寿叫出来，对他说：“林立衡有重要事情向中央报告，你快去。”

说着，刘吉纯把姜作寿带进小树林后说：“你们谈吧，我回去看看动静。”

刘吉纯害怕林立衡出事，又对姜作寿说：“把立衡留在你们这里，别再上去了。”说完，他就赶回 96 楼了。

北戴河每天晚上 22 时都要吃夜餐。但此时的刘吉纯已没有心情去吃夜餐了，他只是呆在 96 楼门口，心情非常的紧张，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生怕报告错了要杀头。他就这样一直坐在院子里不敢动，一个人焦急等待着可能到来的指示。

第 1213 回：告张宏，调部队采取措施 查飞机，南下计划又泡汤

姜作寿也感到今天有些反常。已经 22 时了，林彪住的 96 楼一反往常，仍是灯火通明，大家都在看电影。二大队的 5 部警卫车，被调走了 4 部，说是为林立衡订婚出出进进。林彪的“大红旗”和叶群的“卡迪拉克”都停在各自的门前，看来是随时准备出发。可是他这个负责警卫带队的人却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他打电话问李文普：“是不是要行动？”

李文普说：“现在没有，有事会通知你。”

“是不是给我们下来几辆车？”姜作寿又提出要求，但是被李文普拒绝了。

姜作寿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他去查哨，在 96 楼门前，林彪内勤陈占照告诉他，刘沛丰把守着林彪卧室的门，连他也不让进。平时小陈是随时可以出入林彪的房间的。接着他又碰见林彪秘书宋德金，他对姜作寿说：“听说明早 6 点走。”

姜作寿检查了哨位后回到大队部，已经是 22 时多，他叫着卫生员下棋，这时刘吉纯来了，领着姜作寿到小树林见到林立衡。

林立衡一见到姜作寿就对他说：“是李文普叫我们来找的。”接着她说：“大事不好了，叶群、林立果要带首长逃走，先到广州，再到香港。”

和李文普、刘吉纯一样，姜作寿闻言也是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谁敢相信党的副主席会跟着老婆孩子到香港呢？这不如同天方夜谭一般吗？他随口问道：“你说的这些可靠吗？”

林立衡说：“可靠。”

姜作寿问：“这事首长自己知道吗？”

林立衡说：“他们骗他，他哪里知道。”

接着林立衡简单说了林立果对她说的话和林彪内勤当晚告诉她

的情况，说：“今晚林立果回来，‘林办’谁也不知道，送林立果的飞机现在还停在机场。”

姜作寿说：“林立果回来我们知道，是‘林办’叫我们派车去接他的，但没有接到，我们看见他坐车回来了。”

林立衡说：“我是提着脑袋来找你们的，你们相信不相信？你们要是不信，就问问刘科长，问问李文普。”

姜作寿点头说：“我们相信，相信，刘科长已经给我们说过了，你放心，不要着急。”

林立衡请求他们调动部队，采取紧急措施，包围 57 楼和 96 楼。

姜作寿让她向主持北戴河警卫工作的副团长张宏报告，并带她去见张宏。

“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一见张宏，就急切地问。

她还向张宏讲了林立果对她说的“封建割据”那些话，及林彪的两个内勤卫生员今晚告诉她的情况，并说：“9月7号首长对我说是要去大连，叶群为了不让首长去大连，就让李文普和刘吉纯骗首长，说大连的水，首长不能喝。9月8日林立果去北京是瞒着首长的。今天晚上8点多，林立果和刘沛丰乘飞机在山海关降落后，机场曾打电话向‘林办’问，首长和我以及所有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林立果已经回来了，叶群可能也不知道林立果什么时候回来，以至没有事先派车去接他，林立果是开机场的车回来的，现在那架飞机还停在山海关机场。李文普、刘吉纯他们不让我把林立果对我讲的话告诉首长……”

张宏：“这些就不要向林副主席讲了，我们都知道林副主席身体不好，免得惊动林副主席。这件事由我们来处理就行了。”

林立衡请张宏立即采取措施，调动部队包围林立果、刘沛丰住的 57 楼，同时将林彪、叶群及工作人员住的 96 楼也包围起来，必要的话先把林立果、刘沛丰扣起来再说。

张宏说：“这些都需要好好安排一下，需要研究具体的措施和步骤。反正一定会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一点你尽管放心，现在的问题是要马上请示中央。”

说着，他就要向汪东兴报告。

林立衡不放心地问：“向他报告行吗？”因为她知道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也是犯错误的。

张宏说：“那先向周总理报告。”

林立衡：“北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向总理报告，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你们是专门负责这里警卫的，要绝对保护首长安全，立刻调动部队、采取主动措施。”

张宏说：“我一边请示报告，一边调动部队，采取措施。”

姜作寿也提出要向北京的张耀祠和汪东兴报告。

林立衡问：“他们靠得住吗？”

姜作寿说：“他们都在毛主席那里工作，不向他们报告，向谁报告？”

张宏也说：“我还得向汪主任报告，他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汪主任会向上报告的，我一边报告一边马上采取具体措施就是了。”

林立衡迟疑片刻，说：“那好吧，你赶快报告吧。”

她又反复问张宏：“你们能保证首长安全吗？能保证首长不被弄上汽车吗？”

张宏说：“我们能保证！我们驻在这里就是这个任务嘛，你放心，到时我们都到 96 号楼停车的地方去，在那里守着就是了，这还不保险吗？”

林立衡又问：“你们有多少人？”

张宏说：“这一片都是我们的部队，有二中队、四中队、六中队，还有机动部队，我还可以迅速从附近调部队来。”

林立衡：“林立果讲他在东山有个秘密机场，可以监听全国的电话，包括这里通往北京的电话。这里和北京只有一条专线，你和北京一通话，他会不会马上知道？”

张宏说：“嗨，什么秘密机场，我们都知道那个修建了一下的土机场，那儿也属于我们的警卫范围，我们经常看见林立果去那个机场。我们部队这条电话专线是可靠的，这点请你放心。”

林立衡还不放心，问：“要是事情提前发生你们怎么办？”

张宏说：“到时候我们就上去问问，我们是专门在这里负责警卫的，比李处长、刘科长和你去问还合适些。我们装作不知道你讲的事，

只去问叶群和林立果，你们这么晚到哪去？为了保证安全，请他们等我们布置好安全工作后再走。”

林立衡：“如果林立果硬要走你们怎么办？”

张宏说：“为了保证林副主席的安全，到时候我们对他就不能那么客气了，就是拼了也要保证林副主席的安全。”

林立衡：“你们要注意，林立果、刘沛丰身上有手枪。”

张宏说：“我们也有枪啊，到时候我们多带些人不就行了。”

林立衡：“尽量不要开枪。”

张宏说：“我们不会开枪，也没有必要开枪，开枪保证不了林副主席的安全，打伤了谁也不是小事。到时候，我们几个人对付一个……”张宏一边说一边做了一个擒拿的反绑姿势说：“就这样，两个人从后面上去把胳膊一架就行了。”

林立衡：“李处长叫你马上跟他联系。”

张宏说：“那我直接和他联系。”

林立衡离开大队部，先到 56 楼找到杨森，叫他到部队找辆车，然后一起开车上到 96 楼。林立衡让杨森在外面等着，自己回到 96 楼正在放电影的走廊，又坐到原来的座位上，将见张宏的情况对坐在旁边的未婚夫张清林说了。之后就发生了 1186 回讲的情况。

再说张宏这边。林立衡走后，张宏立即给张耀祠打电话，说明了情况。张耀祠让张宏报告林副主席，张宏拔腿要走，姜作寿阻止了他，说：“现在情况复杂，我们还不完全清楚。他老婆孩子骗他走，林立果和刘沛丰都在上边，平日里他家我们是不去的，这个时候去不好吧。”

张宏还是坚持要一个人“深入虎穴”。他说：“胡闹，让他走不成！我带两个人把林立果和叶群抓起来。”

“不行。”姜作寿坚持。

“你说怎么办？”张宏问。

“听上边的，反正你不能去。你回不来，我去不去找你？我去了，也回不来，部队怎么办？”姜作寿说。

姜作寿决定自己上去摸摸情况。他在林彪住的 96 楼前，遇见林办秘书宋德金。宋德金对姜作寿说：“看来今晚就要走了，小陈正在收拾行李呢。”

姜作寿一看，果然林彪房间亮着灯，往常 22 点多林彪就上床休息了。姜作寿马上把这个新动向报告北京。北京指示：“林副主席上飞机，你们警卫部队就跟上去。”

姜作寿他们商量：“如果林副主席要走，就由我带 6 名战士上飞机。如果不让上，就以搬动行李为由，上去了，就不再下来。”

此时早已经吹过熄灯号了，战士都睡了。于是有了“紧急集合”，姜作寿又把战士们叫起来打背包，准备随时出发。

再说北京，张耀祠放下北戴河的电话，立即报告了汪东兴，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

汪东兴说：“我马上打电话找总理。”

接着就有了 1185 回所讲的 9 月 12 日晚，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中断《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会的一幕。



林彪内勤陈占照（左）和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右）在飞机上

再看此时的北京，我们还不知道的情况。9 月 12 日晚，吴法宪来到西郊机场候机厅后，胡萍匆忙找到正在候机厅值班的专机师服务队副队长孙福荣，将叠好的一个纸条递给她，让她去空勤灶旁的“工字房”，随便将纸条交给谁都行。

孙福荣说：“天这么晚了，那里能有人吗？”

胡萍说：“肯定有。”

漆黑的夜晚，孙福荣吓得一路小跑来到“工字房”，只见里面灯光很暗，门口的车库里停着一辆伏尔加。正当她要敲门时，恰好周宇驰走了出来，她将纸条交给了周宇驰。

孙福荣悄悄地回到候机室，向胡萍点了点头。这时她见胡萍已是满头大汗，脸上呈现出沮丧的样子。

一会儿，胡萍又找到孙福荣，对她说：“你再去‘工字房’，叫周宇驰给我写个条，告诉我怎么办？我现在打电话不方便，快去快回！”

孙福荣急忙跑向“工字房”。但是，当她这次再来到“工字房”时，屋里已没有灯光，那辆伏尔加车也不在了。

她又急忙跑回来对胡萍说了情况。胡萍听后，长叹一声说：“快把准备好的东西都撤了，全部撤了，明天飞机不飞了。”

周宇驰哪去了？9月12日傍晚，周宇驰送走王飞他们，离开空军学院“秘密据点”，于21时左右开车回到空军大院家中，对妻子王圣兰说：

“明天早上7时30分到西郊机场坐飞机去广州。林立果照顾我，让我带家属走，你赶快收拾东西，带上随身的衣服和孩子准备跟我走。”

随后，周宇驰带着妻子王圣兰和两个儿子直奔西郊机场，来到“工字房”，指挥安排第二天去广州的飞机，并与已经到了北戴河的林立果联系。23时后，他得知吴法宪到了西郊机场，赶紧给林立果打电话。稍后叶群也接到周恩来查问三叉戟的电话。两边情况一凑，林立果和周宇驰在电话里商量立即中止去广州的准备。接着周宇驰打电话告诉正在开会的王飞说：

“暴露了，不搞了。”

随后，他又打电话到空军学院，通知李伟信“暴露了”。李伟信马上告诉旁边的王永奎、王琢等人，“这个据点暴露了，”让在这里的6人撤到清河原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据点。

接着，周宇驰开车拉着妻儿回到空军大院的家中。所以胡萍派人第二次再找他时，没有找到。

23时54分，周宇驰回家后，又接到林立果打来的电话。因为天热，窗户开着，周宇驰妻子王圣兰听见从窗户那里飘过一些声音，周宇

驰在大声问，“去哪？去哪？北上？北上啊！”

周宇驰放下林立果的电话，立即给潘景寅打电话通知他：“马上走，林立果已经出发了。”这就是潘景寅在山海关机场加油前接到的电话。

周宇驰出来后，王圣兰问他：“北上是去哪儿呀？”

周宇驰说：“上蒙古，到那儿找林立果去，从那儿看情况再去苏联。”

很快，周宇驰在家中又接到山海关程洪珍的电话，报告 8341 部队的宋某某打电话给机场，要卡住从北戴河来的小车不让它走等情况。周宇驰急促地说：

“知道了，知道了，康曼德已经出发了。现在情况紧急，北京正在追查，你快跟他们走吧！”

再说北京空军司令部，王飞召开南飞广州的工作会议还在进行。鲁珉找个借口跑到楼下，对爱人说：“你先回去，不管哪儿的电话让走，都不要走，就在家。”

鲁珉再上楼，情况发生了变化。

周宇驰在西郊机场放下林立果的电话时，王飞、于新野部署南下广州的会议也快要结束了，这时电话突然响起，于新野拿起电话，是周宇驰打过来的，他在电话中说：

“总理查问飞机了，北戴河来电话，暴露了，不搞了，任务取消。刚才讲的全作废，就当今天什么也没有讲过，各自回家，赶紧把名单毁掉。”

王飞立即在会上宣布去广州计划作废，并告知大家：“明天不走了，就当没有这回事”，“有人问今晚我们干什么，就说是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分工问题”。

贺德全要烧名单，王飞说别烧，到处是灰，撕碎从马桶冲下去。却忘了于新野那里还有一份名单。因为名单全凭脑子想，想一个写一个，太乱，于新野又抄了一份，放在口袋里。这就是在直升飞机的迫降现场找到的那份名单。

王飞回到家，已是 9 月 13 日 1 时 30 分，他的秘书孙水森来电话说：“航行局尚局长说林副主席要回来，三叉戟从山海关起飞了。”

王飞心想，不是“作废”了吗？怎么又起飞了？他立即给尚登峨打电话，得知“三叉戟正向西北飞，可能偏航了。”王飞心里明白，这不是偏航。

他又问：“现在谁在调度室？”

“梁参谋长来了，吴司令到西郊机场去了。”尚登峨答道。

一会儿，尚登峨又来电话：“三叉戟快要飞出国境了。”

王飞放下电话就往指挥所跑，看见李德生在值班室。

“李德生怎么来了？”他非常奇怪。

这时，周宇驰妻子王圣兰打电话给江腾蛟问：“吴司令员的张秘书问周宇驰这几天白天晚上都在哪里，我说不知道，我这样回答行不行？”

江腾蛟说：“可以。”

放下电话，江腾蛟怀疑起来，吴法宪为什么突然查问周宇驰？周宇驰老婆为什么又来通报情况？是不是暗示不要暴露周宇驰的行踪？江腾蛟想问问周宇驰到底怎么回事，可是往西郊机场“工字房”要了好几次电话，始终没人接。家里没有，“秘密据点”也没有，周宇驰究竟到哪里去了？实在没办法，江腾蛟通过总机找到王飞。王飞压低声音急急地说：“我在指挥所！我在指挥所！我在指挥所！”连讲了三句，意思是说话不方便，不让他讲话。

江腾蛟彻底迷惑了，又打电话问正在医院住院的鲁珉：“今天是王飞值班吗？”

“不是。”

“那他怎么在指挥所？”

鲁珉说：“我也不知道。”

这时江腾蛟更加怀疑，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但他再不敢乱打电话，提心吊胆窝了一夜。

第 1214 回：赶紧撤，周宇驰调直升机 返上海，细筹划诱捕计划

13 日零时过后，鲁珉刚回到医院，接到值班参谋的电话，256 号三叉戟从北戴河起飞，向北京方向飞来了。过一会儿又报告，飞机没有在北京降落，向西北方向飞去，刚刚飞出国境，谁坐在里面还不知道。此时，李德生已经奉周恩来之命来到指挥所，值班参谋问鲁珉来不来？鲁珉心想：“坏了，无事不登三宝殿。”他回答说：“不去了，让郝副部长去。”因为平时鲁珉不去指挥所，指挥所由作战部副部长在那里当所长，轮流值班。

鲁珉心想这事闹大了。此时他已经恨死了江腾蛟。要不是江腾蛟出主意，让他去炸毛泽东的专列，他怎么会被卷进这个大阴谋中呢？

空军司令部的人散了以后，于新野开车直奔空军学院“秘密据点”。

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前，停着一辆卡车。林立果临走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带走的就烧掉。9 月 12 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将信和港刊等统统都烧了，甚至李伟信还把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到下水道里。收拾差不多了，22 时多，李伟信开着嘎斯 69 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在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伸张正义。”

王大璋非常惊讶，不知何出此言。

23 时，他们来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看见房子里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有辆卡车，已经装了大半车的箱子，还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

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王琢忙着把器材往车上装，准备13日早5时以前运到西郊机场，再运到广州。23时多，快要装车完毕，李伟信接到电话说：“这个点暴露了，飞机不能起飞了，你们立即转移到二高专，在那里待命。”

在场的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不知如何是好。王永奎提出，这么多人不安全。需要分散一下，有几个去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于新野表示同意，说李伟信和他留下，其余的人王永奎、许秀绪、陈伦和、王琢和陈伦和的对象小郁、鲁珉的女儿小鲁6人一起到二高专去。李伟信对王永奎说：

“你们到二高专后打个电话，把那里的电话告诉我。如果天亮时还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就是出事了，你们就自己行动吧。”

许秀绪摸摸口袋，说：“我没带钱。”

李伟信掏出20元给他，看看王琢、小郁和小鲁，又给他们每人20元。

王永奎带着装上卡车的大批器材，走了。

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隔壁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干净。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一直到9月13日凌晨0时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

不久，于新野来了，他喘了半天气才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可能暴露了，那就没有飞机了，快，快找周宇驰。”

送走了李伟军他们，于新野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找到周宇驰。此时的周宇驰忙着安排家事。存款早取出来了，此时他正开车把母亲、弟弟和儿子送上去渭南老家的火车，然后把妻子王圣兰又送回空军大院家中。他没下车就急急走了，临走喊了一句，王圣兰也没听清楚，猜是不用等他。

凌晨1时多，于新野正着急，周宇驰自己闯来了，脸色阴得吓人，

急急地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

周宇驰喘了半天粗气，接着说：“立果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他们争取北上，叫我们也尽量多组织一些人走。咱们只能用直升机北上了。”

他看了一下凌乱的房间，问：“许秀绪他们呢？”

于新野说：“他们刚走，到二高专待命去了。”

周宇驰说：“来不及叫他们一起走了，我们坐直升机走。”

李伟信试探地说：“这么远，颠簸中直升机能跑得出去吗？”

于新野也犹豫了，就是跑成了，老婆孩子怎么办？周宇驰安排了“后事”，而李伟信和于新野都没有。两个人统一了思想，把周宇驰请上楼来，要周宇驰再考虑考虑。周宇驰早考虑好了，脸阴了一下，过一会儿，才垂头丧气地说：“不走就要坐牢，坐牢的滋味就好受呀？”

接着一阵沉默。于新野鼓起勇气说：“不要走，先等等，看看情况……”

“那可不行，错过机会，要走就走不成了。平时忠于忠于的，关键时刻不听指挥可不行。”周宇驰说。

于新野说：“那先和北戴河联系一下。”

周宇驰厉声说：“不用了，立果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走吧，快走！”

周宇驰对于新野说：“你立即到西郊机场去把陈士印接来，我现在去不得，我在这里给他打个电话，叫他在门口马路上等你。”

于新野和李伟信带上装有3万多美元和许多机密文件的手提包，上了车。

这时王永奎从二高专打来电话，周宇驰粗暴地说：“没事别来电话。”就扔了话筒。周宇驰打电话给直升机大队长陈士印，他曾给周宇驰和林立果当过云雀直升飞机的教员。当晚他住在西郊机场招待所，9月13日凌晨1时多接到周宇驰的电话，随后就有了1191回所说的直升机强行起飞，迫降，自杀等一幕幕大剧。

9月13日清晨，陈伦和在空军二高专7号楼被马达声惊醒，见天上飞着一架直升机。他告诉了情报部技术处副处长王永奎。到天亮，还没有电话，他们估计林立果他们已经去了广州。

王永奎决定到广州去找林立果，他通过情报部搞来通行证和火车票，于9月13日17时，由王琢开中吉普到北京火车站，6个人上了开

往广州的15次特快列车。

上车前，王永奎打电话叫妻子于秀芬把孩子送回东北老家后也去广州找他。15日早上7时，他们到达广州。但是到沙堤机场扑了个空，根本没听说北京有人要来。几个人沮丧地又开车回广州，陈伯羽不在，顾同舟情绪沉闷，也没摸到确切消息。

当他们6人好不容易找到陈伯羽后，陈伯羽压低声音说，前一两天中央发了两个命令，第一个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签发的，第二个是主席和总理签发的，主要讲战备。空军指挥所原来是吴法宪、曹里怀，现在是李德生。还有国内一切飞机停飞3天了，今天又有飞机飞，大军区叫广空听他指挥。这是怎么回事？王永奎决定：今天先住下。他们本来想住广州空军第二招待所的，但是9月15日当天，广州军区空军向广州军区报告，从北京空军司令部跑来几个人。广州军区命令坚决扣留。13时下了通缉令。王永奎6人听说广空司令部要扣他们，就住到了外面。当天20时35分，周恩来电话，必须将北京来的几个人找到。9月1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向全省公安系统发出了通缉令。

许秀绪、陈伦和家在上海，提出回上海。他们向熟人借了300元钱和粮票，冒充到上海学习的技术人员，带着空白介绍信和假证明，改道去了上海。9月17日凌晨，他们在广州北的小站源潭上车时被抓获。

再说许世友从北京返宁途中，与王洪文连夜在火车上商定了逮捕王维国、陈励耘的行动方案：以看中央文件为由，先在上海诱捕王维国，然后把陈励耘“请”到上海抓起来。因陈励耘是浙江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南萍，看文件“请二”不“请一”不合惯例，为避免打草惊蛇，干脆两人都“请”，委屈南萍“陪绑”一遭。

到南京时，天刚透亮。许世友一进门，就把参谋长肖永银和保卫部部长李书和找来，向他们交代了任务。许世友特别嘱咐道：“此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你们带的人越少越好，回来由上海警备区派车，让好八连护送。”并让肖永银通知驻在苏州的某师监视硕放机场，通知上海警备区监视相关的敏感部位。

肖永银回去安排妥当，和南京军区保卫部李部长带上几名随员与

王洪文一起赶往上海,住进上海延安饭店。

9月20日上午,徐景贤办公室的红机子电话响了,是王洪文的声音:“老徐,你赶快到常德路警备司令部来一下。”

徐景贤奇怪的问:“啊?你怎么已经回上海了?”

王洪文说:“快来,来了再说。”

徐景贤感到十分惊讶:王洪文回上海,连康平路市委大院也不进,直奔上海警备区司令部,肯定有重要事情。他赶到常德路上海警备司令部,大院深处有一幢小楼,过去是陈毅的办公室,现在是警备区司令部办公楼。当他走进二楼的司令办公室时,就看见王洪文神色兴奋,跟他边握手边说:

“我这次到北京去,许司令也一起去的,这里还有一位肖参谋长。”说着,王洪文向徐景贤介绍身边与他同来的南京军区参谋长肖永银,接着说:“我和肖参谋长一起从南京赶回上海。”

大家坐下后,王洪文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徐景贤说:“你先看看。

徐景贤接过来一看,是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央红头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1971.09.18;中发[1971]57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徐景贤赶紧认真地阅读文件: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二、.....

徐景贤读完文件，十分震惊，连声说：“想不到啊！想不到啊！”

王洪文说：“这次到北京，主席下命令，要把王维国和陈励耘抓起来。许司令与我商量，请肖参谋长到上海与我们一起执行这个任务。”

肖永银首先提议说：“先抓王维国，再抓陈励耘，怎么样？怎么抓法，我们商量一下。”

王洪文说：“怎么抓，一定要稳妥，不能出事情。最近王维国情况怎么样？”他问徐景贤。

“我刚刚去看过他，他说有病，正躺在家里休息。但是我看他没有什么大病。我告诉他，你到小三线抓战备去了。”徐景贤回答。

肖永银说：“我从南京军区保卫部只带了六个人来，这次行动主要靠上海警备区的力量。但是我们不宜到空4军军部直接抓王维国，他在那里有大量的兵力，很难动。”

王洪文说：“这样吧，今天下午叫他到市委看重要的中央文件，然后抓他。他既然知道我到小三线去了，老徐，还是你打电话给他，比较自然。”

徐景贤问：“究竟是通知他到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呢，还是哪里呢？”

王洪文说：“还是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吧。那个地方环境比较隐蔽，便于埋伏力量。肖参谋长，你看怎么样？”

肖永银说：“好，我叫警备区董副司令安排兵力。我要警备区派一个连，占领延安饭店的制高点，同时要控制南京路、淮海路、外滩等主要街道，防止王维国调动空四军进攻。至于锦江饭店那边，我会作全面部署的。”

徐景贤说：“那我打电话了，让他下午两点到锦江饭店小礼堂看文件，时间安排来得及吗？”

大家看看手表，此时是上午11时。

肖永银说：“抓紧布置，来得及的。”

接着，他们讨论了具体的抓捕方案。

锦江饭店是一家高级饭店，专门接待高规格的内宾和外宾，上海市革委会的重要活动也常在这里举行。这里的小礼堂有两个门，靠近小花园的前门是平时领导下车进会场的地方。他们让王洪文的秘书小廖和徐景贤的秘书小张两人守在小礼堂前门，王维国的车来了，就让王维国进小礼堂，但是不让他的司机、警卫员下车。

小礼堂有个后门，靠东边的马路有个通道口，后门边上悄悄地停两辆军用吉普，抓捕到王维国后，就把他架到军用吉普上开走。小礼堂外面和锦江饭店大门口不设任何武装人员，免得引起王维国的随从和警卫员的怀疑。

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等人埋伏在小礼堂服务员的房间里，等王洪文向王维国等人宣布了中央的命令，就冲出来实施抓捕。

上海警备区董副司令带人埋伏在锦江饭店外围和饭店大门边上的小楼里，严密警戒，以防不测。

部队部署好后，徐景贤当着王洪文和肖永银的面，拿起电话打给江湾空4军军部，直接找王维国。

尽管当时徐景贤心里很紧张，但还是尽可能用平静的声音对王维国说：

“维国同志吗？这几天身体好点了吗？今天中央来了一份绝密文件，规定由市委常委阅读，下午我把文件带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去，下午两点请你来看文件，可以吗？”

王维国急忙回答：“可以，可以。”

徐景贤说：“那好吧，下午两点，锦江小礼堂见。”就把电话挂上了。

接着，王洪文、肖永银、徐景贤又开始商量抓捕浙江空5军政委陈励耘的办法。仍然是由徐景贤打电话给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驻浙江20军政委南萍，通知他今天和陈励耘一起来上海看中央重要文件，而且说整个华东地区只有一份文件，规定由省委主要负责人到上海亲自阅读，要他们立即赶到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来。

南萍在电话里回答说：“好，叫上陈励耘，尽快出发。”他还说：“我们走海边的一条公路比较近，大概5个小时后到上海。”

两个电话打完后，王洪文和肖永银兵分两路：一路肖永银留在警

备区司令部指挥部队；王洪文和徐景贤两人则赶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和抓捕对象直接见面，实施抓捕。

时近中午，他们匆匆吃了点饭，就赶到锦江饭店，还不到13时，饭店大院里特别沉静。北楼附近马路上有些人在走动，南楼和小礼堂前面的花园里根本没有人影。其实此时，周边的小楼上已经隐藏着许多双眼睛，正在注视着小礼堂附近的一举一动。按照事先商量的方案，秘书小张、小廖等候在小礼堂前门迎接王维国，驾驶员和警卫员都留在车上。

看到一切布置就绪，徐景贤和王洪文进入锦江小礼堂。

第1215回：看文件，锦江饭店抓王、陈 又揭出，林立果上海“选美”

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铺着红地毯，两面都是落地长窗，垂着半透明的绢丝窗帘。礼堂深处是一个舞台，小礼堂内的桌子、椅子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移动。此时，桌子、椅子都撤走了，只留下六张沙发，三张沙发向外朝着门口，三张沙发向里朝着舞台。三张沙发中间的一张是双人沙发，两边各放一张单人沙发，沙发前各放一只茶几，茶几上放了几个玻璃烟缸。两组沙发之间的距离只有两三公尺。王洪文和徐景贤坐在面朝门口的双人沙发上，整个小礼堂里就他们两人，静静地等候王维国的到来。

王洪文点了一支烟，对徐景贤说：“毛主席除了下命令对王维国、陈励耘进行隔离审查外，还谈了今后要抓紧抓好华东地区林彪事件的专案工作。周总理在确切知道林彪机毁人亡以后，在人民大会堂大叫拿酒来，跟中央的其他领导干了好几杯茅台酒。”

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临近14时，他们便不再说话，空气好像凝固了似的。王洪文指了指茶几上的烟缸说：“等一下王维国要是拔枪的话，我们就用这东西砸他。”

听他这么一说，徐景贤的心情更加紧张。

下午14时，王维国的车准时到达锦江小礼堂，秘书把他引进小礼堂的头道门。王洪文和徐景贤坐在小礼堂里，面朝着二道门，门上挂着丝绒的门帘。丝绒门帘撩开后，身穿空军军装的王维国走了进来，看见王洪文，显得很意外，走上前来一面跟王洪文握手，一面说：“洪文同志，回来啦。”

王洪文说：“是啊，是啊。”顺势请他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然后说：“这次我不是到小三线去的，我是到北京去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因为要保密，所以对外说我到小三线去了。现在我带回来一份中央文件，你先看一下。”说完，王洪文把文件递给王维国。

王维国把手伸进上衣的口袋里，徐景贤以为他要拿什么东西，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时，王维国从上衣口袋摸出一个眼镜盒，戴上老花眼镜。

礼堂里的空气显得异常紧张，王洪文和徐景贤两人盯着王维国，看他有什么反应。

王维国拿起文件，刚看第一页，脸色就由黄变灰，两条眉毛紧紧地蹙起来，神色紧张，手拿着这几页薄薄的文件，微微颤抖，看完一遍，还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又翻回第一页看第二遍。

王洪文估计时间差不多了，问他：“看好了吧？”

王维国说：“嗯。”把文件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这时，王洪文很严肃地说：“王维国，现在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你要很好地交代自己的问题。”

话音刚落，王维国身后的丝绒门帘又撩开了，悄悄走进三个人，是南京军区保卫部李部长3人，他们走到王维国的身后。

听完王洪文的宣布，王维国没有显出特别惊慌，好像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他站起来，南京军区的两个干部一边一个抓住他的手臂，另外一个搜他的身，看看有没有武器。

王维国一言不发，任凭他们检查。检查完毕，几个军人用手一夹，推着他朝舞台旁的后门走去。在后门外的马路上停着的军用吉普，将王维国转移到一所事先准备好的地下室，没有惊动小礼堂前面的人。

此时，王维国的司机和警卫员还在小礼堂前说说笑笑。他们随后被安排到其他地方。

王维国的问题解决了，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松了口气，再给浙江省委打电话，问南萍和陈励耘他们出来没有。省委办公厅说，南萍、陈励耘早在中午12点多就乘小轿车从浙江杭州出发，估计17时多可以到上海。

肖永银担心半道生变，假装从南京给20军军长熊应堂打电话问：“听说上海有个中央重要文件，请南萍去看，是否确有其事？”

“有，是南萍和陈励耘去。”

“走了多久？还有什么人？”

“各人带着秘书，南萍还带着爱人到上海看病，走了快两个小时了。”

肖永银放下电话说：“南萍挺有心眼。带着老婆绝不是看病，是准备通风报信的。”

下午三、四点钟，王秀珍到锦江饭店北楼接待外宾，看见洪文和徐景贤的车都在，就到小礼堂找他们。因为她也是上海市委书记之一，王洪文就告诉她自己到北京开会的情况，同时给她看了中央文件，并对她说：“我们已经把王维国抓起来了。等一下还要抓陈励耘。”

王秀珍一听，非常好奇，又很紧张，说：“我留下来看看，好吗？”

王洪文说：“好吧，好吧，你就留着吧。”

于是，在小礼堂里等候陈励耘的就变成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三个人了。他们在小礼堂里一面聊天一面等人，一直等到傍晚18时，还不见杭州的车来。

“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或是抓王维国的消息插到杭州去了？”他们要秘书一再打电话给浙江省委，那边回话说，也没有任何消息。王洪文担心出问题，就叫市委警卫处派人开车沿着沪杭公路去找。一直等啊等啊，等到晚上19时多，只听外面嚷嚷起来：“来啦！来啦！”

王洪文的秘书赶紧出去，看见南萍和陈励耘从车上下来。他过去跟南萍握了握手，但当陈励耘伸出手去时，他却把手缩回了。陈励耘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笼上心头。王洪文的秘书宣布：随行人员，都不要进内，到别的地方休息。接着将陈励耘和南萍领进饭店。他们刚跨进二门，王秀珍也出来了，她跟南萍、陈励耘一一握手，陈励耘悬着的心又稍稍放下了一些。

王秀珍领他们进到礼堂，看见在座的有王洪文、徐景贤。高头大马穿空军服装的陈励耘一面跟王洪文他们握手，一面大叫：“今天倒了霉了，车掉到海里了！”只见他提着蓝色的裤管，裤腿上沾着泥浆水，水淋淋地往下滴着。

南萍说话文绉绉的，忙着解释：“我们想赶路，车开得太快，从杭州到上海的沿海公路，有一处地方是急转弯，路旁有标志，但司机没有看清楚，没打急转弯，车子就开到海边的泥塘里去了。”

陈励耘说：“今天真是不顺利，欲速则不达！后来我们没有办法，

从泥浆里爬出来，让农民来拖车。拖了半天也拖不上来。又跑到公社去，派出几辆拖拉机才把汽车拖上来。”

王洪文说：“怪不得，多等了你们两个钟点。请坐，请坐。”

南萍、陈励耘两人就在对面的大沙发上坐下，显得很累。陈励耘点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把腿伸直了。

王洪文对他们讲了最近到北京去开会的事，说：“中央有个文件，不发下去了，请你们来看一看”。说着，把文件递了过去。

据当时在场的徐景贤回忆：

中央文件递给南萍，南萍在看的时候，陈励耘把头也凑过去，两人合看一份文件。突然，陈励耘拿烟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手指夹着香烟的烟灰烧得很长都不察觉。文件的内容，对他来说确实是惊人的消息。等他们看完文件，还未吭声，王洪文就宣布：“陈励耘，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现在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与此同时，南京军区的几个干部也走到他身后。陈励耘有个特别的动作，当他听到毛主席的命令，就把两只手举起来，做了一个投降的姿势，神态非常沮丧，站起来就随着南京军区的干部从小礼堂后门走了。

陈励耘的回忆，文件是递给陈励耘，并对南萍说：“你就不用看了吧”。

陈励耘接过来一看，是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他只觉得自己浑身的血好像快要凝固了，双手微微发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当然，在当时，不要说是陈励耘，任何一个中国人看到这份文件都会紧张的出汗。

陈励耘刚放下文件，就听见王洪文用略带嘲讽的口吻说：“看完了吧？现正式宣布：根据毛主席指示，逮捕你。”与此同时，南京军区的几个干部也走到他身后。

陈励耘脑袋“轰”地一声炸了，当即说：“是主席的命令我服从。”

旁边过来两名南京军区的干部，将陈励耘的两手向上一举，顺势摸了一下他的腰，见没有手枪，便一边一个捉住他的手。

王洪文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王洪文是没有权力逮捕你的。”

陈励耘定了定神，站直了，苦笑了一下，没有吭声，随着南京军区的干部来到礼堂舞台后面一间地下室。

地下室中间放着床，没有床架，直接搁在地上，床上有被子，床头有一只马桶。陈励耘痛苦到了极点，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这样被抓，他以为这一切南萍是早已知道的，有些恨起南萍。

此时已是晚上20时多了，肖永银立即向南京方面报告：“许司令，你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两东西都弄到手了，很顺利。”又说，王洪文要请他们吃晚饭，吃过饭他们就回南京。

再说南京许世友在肖永银他们走后，即忙着召开军区和省委常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央通知精神，研究贯彻意见。接着找军区下属大单位的主要领导谈话，有的请来谈，有的在电话上谈，向他们通报林彪逃跑的情况，要他们认真学习中央通知，抓紧做好清查工作。当肖永银向他报告王维国、陈励耘已经抓捕完毕，王洪文要留他们吃饭时，许世友眉头皱了起来，用命令的口气对着话筒说：

“肖永银同志，你们立即返回南京！你懂我的意思吗？回来时你们走北路，从嘉定、常熟、沙洲、江阴、镇江回南京。我让张明带部队走南路，从溧水、溧阳、宜兴、无锡、苏州返回，造声势策应你们。”

“是，我们立即返回。”肖永银马上领会了许司令的意图，“上海警备区董常云副司令带‘好八连’护送我们，保证把那两个东西弄回南京，请许司令放心。”

随后，许世友向周恩来复命：“王维国、陈励耘已被抓起来了，正在押送南京的路上。”

肖永银走了，王洪文请南萍到锦江饭店北楼吃饭，徐景贤和王秀珍两人作陪。吃饭时，王洪文告诉南萍：“这次我们接到命令抓王维国和陈励耘，你要把浙江的工作稳定下来，至于空5军的工作，叫白军长主持。”

正在说话的时候，上海警备区董副司令来报告说：“王维国和陈励耘两人已被安全押离上海。为了安全起见，路上给他们头上盖了一条军毯。”

陈励耘回忆说，他是被两名看守叫起来的，他们用一件军用雨衣蒙住陈励耘的头，把他往一辆卡车上搬。陈励耘从雨衣露出的一条缝隙看到车上全是兵，还架着两挺机枪。前面还有一辆卡车，也站满了兵。

车子一直开到南京军区通讯兵学校。陈励耘被关进了一间面积约 8 平方米的小房子。

第二天，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吴大胜来见陈励耘，他指指身后两位中年干部说：“这是中央来的温副处长，这是南京军区保卫部长，你的案子由他们负责。”从此，陈励耘进入了频繁的受审阶段。每星期可以洗一个澡，关了两个多月，大约 12 月初，押往北京。

王维国被逮捕后，周恩来指示王洪文在上海设立一个王维国项目组，每天要把清查的进展情况直接报告给周恩来。据当年“王维国专案组”负责人戴立清后来回忆，应该是在 10 月 3 日后，王洪文根据周恩来指示，成立了一个清查上海与林彪事件有关系的人和事的小组，对外叫“市委材料组”，设在余庆路转弯处，“康办”大院内西北角的一幢独立小洋楼里，两层楼。楼下是部队，楼上办公。小楼北面沿马路，所以门口武装警卫双岗。连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不能进来。该组由王洪文直接领导，对口中央办公厅材料组，即中央专案组。

王洪文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空 4 军军长郑长华商定，将空 4 军认为与林立果、王维国有关系的 40 多人秘密的集中在大场的“南京路上好八连”隔离审查，他们有：驻江湾空军 26 师、驻盐城空 32 师、驻硕放空 15 师的大部分师长和政委、空 4 军军部机关的处以上干部、如蒋国璋、裘著显、宴剑峰等等；王维国的妻子和儿子王大章、女儿王伏凤等。而空 4 军军机关的干部则全部集中到五角场的空军政治学校，在这里办半封闭的学习班。空 4 军在上海的支左人员，则全部集中在华东化工学院办学习班。

“王维国专案组”在审查过程中，根据一些人员交代，发现了林立果等人在上海“选美”的事情。此时，“上海小组”成员也都被集中在“南京路上好八连”隔离审查。

根据相关人员的交代，“王维国专案组”找到了许多林立果“选美”的原始材料，包括笔记本、照相册以及伪装的照相机等等。

林立果在上海“选美”，就是为林立果找对象，开始还只是小规模偷偷地进行。1969 年“九大”以后，叶群通过军委办事组，从北京派了

一个干部，拿着李作鹏的介绍信，为她的儿子林立果到上海“挑选对象”。那个干部到上海后找到东海舰队高志荣副司令员，说是要在上海物色几个女青年，调到海军系统的高干招待所当服务员。高志荣当时兼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就给叶群派来的那个干部开了一张上海市革会某部门的介绍信，让他到基层去自己选拔。

但是这个干部行动非常诡秘，一会儿穿海军军装，一会儿穿陆军军装，今天去学校，明天下工厂，东打听，西盘问，专找漂亮的女青年。这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向上级领导作了反映。上级领导派人查问此事，那个干部见情况不妙，就回了北京。

后来，林立果在上海空4军成立了“八人小组”，主要任务也是“选美”。当时空4军政委王维国对他的心腹说：“这是为天才人物选助手，是有伟大深远的意义的。”

“八人小组”扩大成员后，由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按照林立果的规定，关于他的任何活动，是不准留下任何文字痕迹的。但是“上海小组”成员陶某还是把林立果在上海的每一次活动，按照时间的先后作了详细的记录，他的这本记录本后来成了林立果的重要罪证。

第1216回：搞对象，手段多层出不穷 难置信，用权力无法无天

林立果每次到上海活动，都住在巨鹿路空4军招待所大院内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里。这里原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文革开始后被占用了。花园洋房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汽车从巨鹿路穿过一条长弄堂，可以驶进大铁门一直开到客厅前面的草坪旁边另一扇小铁门，又可以直通空4军招待所大院。这个地点既隐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这里直接指挥“上海小组”的“选美”。

“上海小组”的成员也集中在招待所里，基本上是两人一档，共同行动。而林立果自己往往也参加其中的一挡。

“上海小组”找人的方式很多，第一种是“盯梢”。就是看见漂亮的女子，就紧盯在人家后面。一般都是开轿车出行。左边握着方向盘开车的是“上海小组”的一个成员，右边前座上坐着穿军装的林立果。轿车沿着马路边的人行道，缓缓地行驶，时间一般选择在工厂、学校、机关，商店上班的时刻，马路上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发现了长得漂亮的年轻姑娘，会马上命令左边的驾驶员跟上，轿车就慢速前进，紧紧尾随着被“盯”的姑娘，一直要盯到那个姑娘走进某个工厂或者学校为止。随即他们下车，跟着那个姑娘进门，认准她的具体去向。然后回过头去找这个单位的人事部门，拿出部队的证件和介绍信，说是来招部队文工团团员或是部队医务人员等等，向人事部门调阅有关档案，了解那个姑娘的姓名、年龄、婚姻史、家庭情况等。那些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出于对解放军的信任和热爱、又看到他们随带的证件齐全，手续齐备，对他们的要求决不会拒绝。

书面档案摘录好以后，林立果等又当场提出要和被物色的本人作一次谈话。于是，这个年轻的姑娘就被找到单位人事部门的办公室，与两位军人谈话。其中一人和她随便聊开了天，先是说明来意，然后问她想不想当演员或是医生，有哪些爱好和特长等等。另外一个穿军

装的人偶尔也在旁边插上一两句话，但是更多的时间却在摆弄一只草绿色的军用背包。这只军军用背包普普通通，半新不旧，和任何一个解放军战士用的并无二致。这只背包放在桌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可是，谁曾想到，就在这只毫不显眼的背包里，却隐藏着一架高级照相机。背包内层，四周用硬衬衬好，使它立在桌上而不会卧倒，背包的一侧，挖了一个小洞，里面的硬衬上也相应地挖了一个小孔。照相机被固定在背包内壁上，它的镜头，正好嵌在硬衬的小孔里。通过背包上的小孔，照相机可以对准任何需要拍摄的对象。背包的另一侧，拖出一根线头，那便是照相机的快门按钮。当那位年轻的姑娘进来、坐下、谈话及出去的过程中，她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全身像、半身像、正面像、侧面像、说话（露齿）像，微笑像……统统都已经被摄入了镜头。

林立果他们“选美”活动的第二种方式，就是“相面”，这是从第一种方式发展而来的。因为“盯梢”虽有收获，但是费时费力，而且有一次差点发生严重事故。那次，林立果和旁边开车的“上海小组”成员，同时盯着马路上的女人看，结果驾驶员手里的方向盘没有把稳，伏尔加轿车撞到了马路边的电线杆上。亏得车速较慢，林立果没有受伤，但是车撞坏了。林立果气得连声骂娘，从此以后，“选美”的方式就较多地采用直接“相面”了。“上海小组”的20来人，分成两人一组，分片包干直接到工厂、学校……，通过各个单位的领导，一个一个车间，一个一个教室，挨着看过去。“重点”单位如剧团等文艺团体，则由林立果亲自去看演员排演，练功等，直接进行“相面”。那些正在工作、上课或是排戏的年轻女孩子，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是来“相面”选人的。凡是被“选美”小组选中的人，就和第一种方式所讲过的一样，被叫到本单位的办公室谈话，然后被偷偷拍照……这些照片经过比较对照，进行复选。凡复选被选中的相片，就正式编号，粘贴进照相册。

有了这些照相册，林立果就可以按图索骥，实行“点名”了。接下去，“上海小组”的成员动员被点中的女青年参军、入伍。

入伍后先进学习班，重点学习“林副部长”的“讲用报告”。这种学习班很特别，有时候只有一、两个人也办班。等到她们稍稍熟悉了部队生活，“林副部长”就找她们个别“谈话”了，地点就在巨鹿路林立

果住的那幢花园洋房里。

花园洋房的楼下是客厅和餐厅，大客厅的四壁都用古老的英国式雕花墙板镶嵌着，很有气派。

林立果的“谈话”地点是二楼的一个大套间，外间是会客室，浅色面料的沙发套扶手上，覆盖着白色的花边，沙发背上放着织锦缎的软垫。会客室的一隅放着小桌子和软椅子，桌上铺着白色的台布。

“谈话”都在晚上进行，谈到半夜23时左右，招待所的厨师就会做好饭菜、夜点心，由值班的“上海小组”成员送上楼。

套间的里面是林立果的卧室，靠墙安放着一张席梦思的大床，床上铺着当时罕见的电热毯。大床的两侧，摆着两只长条形的进口立体声音箱。床边的柜子里，放着一架立体声收录机和当时一般人从未见过的大量盒式录音带。

关于林立果在上海找人“谈话”的详细情况，在“上海小组”一位姓陶的记录本和一些人的交代揭发材料中都有记载。一旦林立果选中哪个已经入伍的年轻女性，就由“上海小组”的成员开车去把她单独接来，时间都在晚上七、八点钟以后。然后，“上海小组”的人就退到楼下大会客厅里等候，这叫做“值班”。“值班”必须值到“谈话”结束为止，不得中途离开或擅自上楼。如果林立果临时按铃吩咐要办什么事，也只能由指定的人员上楼。

等到陪同上来的人员退去以后，在二樓会客室的沙发上，林立果的“谈话”就开始了：“你请坐，叫什么名字呀？原来在什么单位工作？有些什么爱好呀？……”

等到女青年的忸怩、紧张的心态开始转变，“谈话”进入一个比较松弛的气氛时，林立果就逐步转入了主题：“你知道我是谁吗？”

“刚才带我来的那位同志不是介绍过了？你是林副部长……”

“不要叫职务嘛，可以叫我的名字。知道我的名字吗？”

“知道……人伍以后，听过您的讲用报告了……”

“噢，那只是一些学习体会，请多提意见……不过，这个报告的录音放给我爸爸听过，他还是赞成的……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不知道……”她确实是不知道，因为事先作过布置，不让“上海小组”的成员把底细告诉女孩子。

“你猜猜看……”

“那怎么猜得到呢?”

“先猜我爸爸是什么样的干部?”

“您都是副部长了,您的父亲肯定是个高级干部……”

“什么样的高级干部?”

“是将军吧?”

“哈哈,那太小了……”

“啊……”比将军还要大,莫不是元帅吧,可是不敢说出来。

“再猜猜,我爸爸在中央担任什么职务?”

“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吧?”

“哈哈!那还太小……”

“哦……”简直不敢想象,面前坐着的竟是“接班人”的儿子。

“哈哈哈哈……没有想到吧……”看着姑娘惊愕的,简直难以置信的神情,林立果得意非凡,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谈话”到了这个时候,收到了他预期的出奇制胜的效果。林立果一般会有进一步的行为。但是,这些女孩子中也不乏刚烈之士,她们不是那么容易被欺侮,被凌辱的,因此,当林立果一旦越出“谈话”的轨道,有的姑娘严词拒绝,有的姑娘誓死不从。从陶某的记录本上看来:

“x年x月x日,副部长找xxx谈话,至晚上九时半结束,送回。”

“x年x月x日,副部长找xx谈话,谈至晚上十时,不理想。”

凡是这类记录,都蕴含着一段曲折而又激烈的斗争。接着,“上海小组”会通知有关部门,把这个姑娘放到部队下属单位的某个偏僻的地方去当女兵,过着几年与世隔绝的生活,为的是怕她到处乱讲,泄漏“机密”。

至于一些没能逃脱魔爪的女青年,在记录本上也记下了她们的命运:

“x年x月x日,副部长找xx谈话,晚十一时进夜餐,至凌晨三时结束后送回。”

“x年x月x日,副部长找xx谈话,晚十二时进夜餐,直至天明。副部长早晨说‘昨天晚上犯了路线错误’”

看来,凡是进夜餐的,往往是林立果可以得手的信号。至于“犯路

“路线错误”的说法，在本子里有过多次记录。林立果所谓的犯一次“路线错误”，似乎就意味着一个清白的女孩子被糟蹋，被凌辱了。

有一天，“上海小组”的成员在淮海中路上开车“兜风”寻人，发现一个姑娘长得漂亮，暗暗尾随，跟踪进了某弄某号，然后马上找派出所支左的空4军代表了解情况，得知这家小家碧玉名叫李勤贞，不到20岁，典型的上海姑娘。家住上海幽静的西区，距离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并不太远。

李勤贞的父亲过去是个小资本家，很早就和妻子离异，李勤贞的祖籍是天津，外婆家在石家庄，她自己从小跟着母亲住在上海，中学毕业后在家中待业。姑娘面容俏丽，身材匀称，有着一股上海姑娘所特有的灵秀、妩媚之气，还有那种天真烂漫的“嗲劲”，非常讨人喜欢。

于是，李勤贞的个人经历，家庭情况等调查材料，以及从各种角度给她偷拍的脸部，半身，全身的照片等，统统都被送到了林立果手中。林立果表示十分满意，立即批准“入伍”。空4军政委王维国下令给李勤贞办了人伍手续，并给她改名为李云。

李勤贞穿上新军装，回到家里见了母亲，母女俩当然欢喜不迭。

她被分到上海西郊哈密路的空军第三医院，以学习医务知识、熟悉护理业务为名，日夜住在医院里，以便林立果随时召见。

不久，林立果来到上海，果然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的召见了李勤贞。

这天晚上，林立果和李勤贞“谈话”，还是用“路线交底”的办法，开始时装得一本正经，渐渐地，用隐晦的语言进行暗示，最后亮出自己的身份——副统帅的儿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在女方吃惊和害怕的情况下，林立果图穷匕见，刻意求欢。

当天晚上李勤贞毫无思想准备，她毕竟是个纯真无邪的青年姑娘，万万意想不到这个道貌岸然的穿军装的年轻“首长”，居然会向她提出这种卑鄙无耻的要求，所以哭着拒绝与林立果发生两性关系。

林立果也没有勉强。

第一次“路线交底”的失败，使王维国和“上海小组”的成员大伤脑筋，于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做李云的工作，甚至连空军第三医院个别领导也直接过问起这件事情来，派了一个女干部专门找李云谈话，

规劝说服,软硬兼施,晓以利害。

在进行“思想工作”的同时,还采取“组织措施”——提前把李云提拔为上海空军第三医院的正式护士,享受排级待遇,从拿战士津贴一下子变为领取部队的干部工资。

林立果再次来上海,接二连二地“召见”李云,此时的李云,也没法不崇拜林副部长一家的显赫地位,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他们家庭的成员。这样,她的脆弱的防线崩溃,林立果终于得手。一天晚上,李云在林立果的甜言蜜语下,成为“林副部长”最宠爱的秘而不宣的“上海夫人”。

林立果将李云藏在巨鹿路招待所,不让她去医院上班了。两个人厮混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一天,林立果单独飞回北京,留下李云一个人,在上海守着空房,苦苦地等待着林立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毫无消息。她向“上海小组”提出,要到北京去当面见见“林副部长”。“上海小组”向王维国请示,答复是“副部长”在北京的地址是保密的,为了“副部长”全家的安全,不同意李云去北京,要她继续耐心“待命”。

李云左等右等,没有回音,一气之下,离开上海出走,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下子王维国和整个“上海小组”都慌了手脚,他们一怕李云跑到什么地方去告状;二怕李云一时想不通,自寻绝路,“上海小组”不好交代。王维国一声令下,“上海小组”几乎全部出动,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李云。可是找不到下落,只查到李云过去有一个男朋友,住在虹口区。王维国立刻命令他所控制的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军管组,把李云的男朋友拘捕起来,单独关押,由“上海小组”直接审讯,旁敲侧击地逼问李云的去向,一连逼问了两个星期,毫无所得。

王维国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索性把李云的母亲也直接抓起来,要她交代李云的可能去处。李云的母亲身陷囹圄,又惊又怕,被迫说出了一连串亲戚朋友的家庭地址。“上海小组”立即按图索骥,追踪寻找,还是毫无所得。最后,李云的母亲说她可能去石家庄看望外婆去了。“上海小组”成员连夜乘飞机赶往石家庄,总算找到李云,把她带回上海,这才使王维国等松了一口气。

李云回上海以后,依然闹着要见“副部长”。“上海小组”不敢得

罪这位林立果的“上海夫人”，又担心她到处乱跑，更忌讳她和母亲搅在一起。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李云的母亲送到江苏北部海边的一个劳改农场——大丰农场去劳动改造。

李云过去的男朋友，被莫名其妙地关押了一段时期。“上海小组”勒令他今后切断和李云的一切联系，在得到他的承诺以后，把他放了。

对李云本人，王维国等人让她暂时转移到外地的一个空4军军管单位，客客气气地要李云在那里小住一个时期，生活条件、日常伙食等尽量搞得优裕一些，实质上是把她软禁了起来。

过了一个时期，林立果又问起李云的情况，王维国想了个办法，让自己的女儿和江腾蛟的女儿一起，陪着李云去广州中山医学院上学。这个三人“读书小组”，由上海空军第三医院的一名护士长亲自带队。林立果在广州白云机场有一个秘密住所，他经常飞到那里去。林立果十分欣赏王维国的安排，他一到广州，就把李云接到豪华的白云山招待所同居。这位“上海夫人”和林立果久别重逢，当然倍受宠爱。王维国还派空4军政治部文化处的副处长李伟信随侍在林立果的左右。每当林立果召见李云，都要由李副处长取出他亲自去香港采购来的避孕药片，当面交给李云两片，亲眼看着她吞下以后再送走。

李云原来梦想跟着林立果可以飞黄腾达，哪里想得到从此长期被软禁在广州，而且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早已被押送到江苏大丰农场去劳改了。直到林彪葬身异域以后，广州军区和上海联系，这对母女才得以返回上海团聚，李云也进了工厂工作。

第 1217 回：许世友，大骂田普收礼物 李德生，登门见黄、吴、李、邱

根据“上海小组”负责人蒋国璋和王维国驾驶员的交待，李伟信曾乘坐王维国的轿车，到上海友谊商店购买了许多高档次的食品、化妆品和日用品，足足放满伏尔加轿车后备箱。然后由王维国驾驶员开车，送李伟信秘密去南京。但是汽车过无锡后发生故障，不得不让无锡硕放机场空 15 师派车拉回，另换一辆车开到南京，天已黑透。他们“开到中山陵边上一条路，门口有警卫站岗，和里面联系后，车子放进去，开到一幢小楼门口，从里面出来个子不高的中年女同志，很客气的接待了李伟信，”驾驶员和李伟信把车上的东西都搬进了楼内……

上海“市委材料组”让王维国的驾驶员到南京实地指认李伟信送东西的地方，没想到竟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家，而当时出来接待的“中年女同志”原来是许世友夫人田普。上海“市委材料组”迅速将材料加印上报中央。因为许世友是华东地区审查林彪事件材料组的负责人，所以材料也送许世友一份。许世友大发雷霆，大骂田普不该背着他与王维国接触，更不该收他们的东西。

1971 年 10 月，毛泽东大儿子毛岸英的遗孀刘松林也被抓到了上海。

毛岸英牺牲后，在毛泽东的劝说和亲自关心下，经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推荐，刘松林又与当时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结婚。1971 年，杨茂之任驻盐城空 4 军 32 师副政委。“913 事件”后，有材料反映王维国利用刘松林的特殊身份，向她打听毛泽东的家庭情况；还有材料揭发说她平时对江青有不满言论。空 4 军的清查组向王洪文报告，说已经对刘松林“保护性隔离”。考虑到关在空 4 军不方便，将她从空 4 军军部转到上海“市委材料组”，即位于大场的警备团“南京路上好八连”处。刘松林的丈夫杨茂之也被送到这里。

刘松林被送到上海大场的当天，王洪文和他的秘书廖祖康很快就从市区赶来了，与已在这里的“王维国专案组”，即上海“市委材料组”负责人戴立清一起，来到关押刘松林的房间。戴立清、廖祖康和女看守站在外面，王洪文进到房间。约半小时不到，王洪文叫戴立清进去，戴立清看见刘松林穿着军装，人很胖，哭得很伤心。

王洪文对刘松林介绍说：“这是专案材料组的负责人，你写好的材料封起来，交给他。”

刘松林抬头看了戴立清一眼。王洪文继续对她说：“你不要哭，自己要好好的想想，把一些事情说清楚，有什么事找他，不要找其他人，他姓戴，跟哨兵说一下。”然后对戴立清说：“专案组的其他人不许接触她。她写好材料之后，直接交给我。”

后来，刘松林在一个星期内交给戴立清两次材料。第一次是厚厚的一信封，让戴立清交给王洪文。戴立清立即交到王洪文手上，然后通过机要处快件密封送中央办公厅，交汪东兴收转。第二次是刘松林对戴立清说，她写了一封家信，给母亲讲小孩子事和家庭事的内容。戴立清也把信转给王洪文，并经王洪文同意寄到了北京。

没过几天，王洪文对戴立清说，“刘松林的事情，汪东兴报告主席了，汪传达毛主席指示：一些娃娃们不要关他们。”

于是上海“市委材料组”立即通知空4军党委，让刘松林回去。空4军后来向上海“市委材料组”报告，刘松林回到空4军的当天，就回北京了。

这期间，林彪的原秘书、时任127师政治委员的关光烈，也被武汉军区按通知护送到京，李德生亲自与他谈话，首先向关光烈指出：

“过去给林彪当秘书，是组织上的安排。但是你参加林立果企图谋害毛主席的活动，就不是组织上的安排了。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揭发，不报告，这是犯了不能宽容的错误。你受党的教育多年，应当懂得这个道理。”

关光烈交代了他到北京后的经过，同时分辩说：“他们要我调防化连来，我说，不要说一个连，就是调一个班到北京也进不来。”

李德生认为这是实情，按照部队的规定，调部队进京，必须有军委的命令，关光烈没有这个权力。

李德生把同重点人员谈话的情况,都随时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以后指出:林彪搞阴谋活动,有的人不愿干,有的人不敢干,真正死心塌地跟着林彪干坏事的死党,不会超过100人。他是副统帅嘛,有些人是跟着犯了错误的。

9月19日,李德生在京西宾馆召开空军常委会,叫民航政委刘锦平参加。

刘锦平是空军常委,“913事件”前他就因病住院,不知林彪已摔死在温度尔汗。在那个常委会上,李德生递给他一个条子,说吴法宪揭发他三条,其中最主要一条就是他和林彪关系密切。

9月19日下午15时,周恩来通知吴法宪和曹里怀、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3人,到人民大会堂谈民航的问题。

下午16时,吴法宪和曹里怀、邝任农3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告诉他们,北京卫戍区从周宇驰和于新野乘坐的直升飞机上,查出了一部分材料,其中有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给林立果的信,密告毛泽东的南巡讲话,说毛泽东已经在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另外还有一个名单,周恩来要吴法宪辨认一下。

这个名单里的大部分人吴法宪是认识的,但也有少数几个人他不认识。于是周恩来要他同李德生一起,到空军司令部去查清楚。同时他还决定,由李德生负责,把名单上的人都送到亚疗监管起来。

散会以后,吴法宪到西山参加黄永胜召集的军委办事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周恩来指示由黄永胜代表中央传达了中央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国外的通知》。传达完文件,黄永胜又要求各部门回去立即组织传达,并开展揭发批判林彪等人的运动,运动的情况要向中央写出报告。

当晚,周恩来告诉吴法宪,空军传达中央《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国外的通知》的工作由他和李德生两人共同负责。

从9月19日起,李德生利用晚上的时间,按照周恩来9月17日对他的交代,准备分别去登门看望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特意叮嘱:“德生同志,你得注意安全,这些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的。”

李德生知道他是好意，笑着说：“他们能把我吃掉？”

第一天晚上，李德生按事先约定的时间，乘车到了西山，黄永胜的住地门口，黄永胜的秘书和妻子都出来迎接。李德生一人下车，进入客厅，警卫人员留在外边车上。

李德生在客厅落座后，黄永胜的妻子和工作人员都先后退了出去。

“913”事件后，黄永胜的心情非常不好。凭他跟林彪的关系，他知道自己肯定是在劫难逃了。于是，开始把过去自己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有关的文件、字迹都烧了。据反映，这几天，黄永胜为了烧材料，把一个大瓷缸都烧炸裂了。他的小儿子要过来帮忙，也被他轰跑了。

面对李德生来访，黄永胜当然也不愿意谈什么，显得有点尴尬。

李德生有备而来，先是客气地问候黄永胜这几天睡眠可好？

黄永胜答道：“还好，还好。”

李德生说：“林彪的飞机已经在温都尔汗摔下来了，这个情况总长是知道的。后来，我们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报回来材料和图片，证实了摔的那架飞机就是256号，飞机上9个人的尸体，大使馆拍了照片，有的人依稀可以辨认，已经在政治局传阅了。林彪采取这样一个背叛祖国、背叛党的决然行动，许多人都没有想到。我们也没有想到。总长怎么看呐？”

黄永胜说：“林彪这个行动确实是背叛行为，我也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的嘛。”

李德生加重语气说：“为了查清林彪事件的全部真相，中央最近很忙，查出不少新的材料。总理让我来看看你，希望你早点做出检查和揭发，向中央有个好的交待。”

黄永胜说：“我和林彪虽然是老上下级关系，但是，他干的许多事，我并不知道，他也不可能让我知道。有的事情，他是有心，我是无意。”

李德生知道，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两次到王飞手里，是要在谋害毛泽东、准备南逃的关键时刻给黄永胜出示的，但是都没有给成，没有证据证明黄永胜看到这个“手令”。他对黄永胜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他干的事情是不是都告诉你，是很难说的。但是，你知道的呢，是都讲了，还是有什么没有讲呢？”

黄永胜说：“这些日子我是在想。为了向党负责，我不能把表面的、零碎的现象作为事实去揭发吧。请你向中央转达，我会向中央做出交待的。”

李德生最后说：“我觉得中央是很慎重的，也希望总长能够郑重地作好检查和揭发，并且希望要抓紧一点。主席、总理都说，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他们都寄予希望。请你珍重中央的这个态度。”

谈到这里，李德生觉得实在也谈不下去了，便告辞了黄永胜。

9月20日凌晨1时，李德生找吴法宪一起同唐山空6军军长吉士堂、政委司中峰谈话，追查王飞9月到空6军遵化检查工作的情况，看王飞他是不是借检查工作的名义秘密到了北戴河。谈完话，李德生让吴法宪他们先回去，准备第二天再找王飞谈话。

凌晨3时，李德生又找吴法宪和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辨认周宇驰带的那份名单，结果梁璞全部认得，名单上的人都是空军司令部的。李德生决定，他自己立即去亚非疗养院准备地方，同时由吴法宪和梁璞负责，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名单上的人全部送到亚非疗养院监管起来。李德生让梁璞具体承办这件事。天亮时，名单上的人已全部送到亚疗。

20日上午，空军直属机关师以上干部在办公楼开会，由李德生传达中共中央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接着，吴法宪补充传达了周恩来在9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的林彪十六条历史错误。李德生在讲话中还说：“吴司令多次向我主动作自我批评，并承担责任，我都报告了周总理。”

李德生在空军召开座谈会时，听到空军政治部有人揭发说，林立果在1970年空军“三代会”期间，作了一个讲用报告。当时搞得很神秘，对外封锁，这个材料一直不让总政治部知道，会议简报也控制得很严密。吴法宪在会上讲话，极力吹捧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个政治卫星”，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林立果在空军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力？李德生为此追问吴法宪，他连声说：“我们丧失了原则，我们不讲唯物论，我们犯了唯心论和先验论的错误。”

李德生要求查看党委会记录。总政治部工作组查到一年前，1970年7月的一次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确实有“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

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的决定。

为了弄清林彪、林立果等人在空军的情况,同时,又要弄清空军其他领导人在这场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和应当吸取的教训,李德生建议召开空军常委会。

20日下午,在李德生、杨德中的参加下,吴法宪召集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吴法宪检查说:“我是引狼入室,认贼作父。”但他辩解说:“‘三代会’报告后,我讲话说‘放了卫星’,以后就被他们抓住了,大肆宣传。今年在9师开了现场会,又要传达我的讲话,被我压住了。但他们就以广州军区将我们的军。(广州)大军区发到团以上。我是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采取拖的办法,打算等11月开师以上干部会来解决。”

李德生责问吴法宪:“你说只是讲放了卫星,虽然没发文件,但现场会是开了,影响是出去了。这个会,是以空军的名义召开的,你是以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身份讲话的,它的恶劣影响已经形成了。这个会,准备了一年多了,你们党委是有责任的。而且去的人越来越多,你们还计划召开全空军师以上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如果说那些是严重的政治问题,那么,1970年8月党委的这个决定,就是个严重的组织问题了,是关乎空军的领导权、指挥权的大是大非问题。无论从组织上、政治上看,你们背着党中央,把我们党领导的空军大权,交给林立果。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难道不应当好好想一想吗?”

吴法宪支支吾吾,难以回答。

当天晚上。李德生又来到西山吴法宪家中。他开门见山,对吴法宪说:

“林彪在庐山的错误,由于他的外逃,性质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从空军机关揭发的事实,也都说明他的这个行为,是早有预谋的。你领导空军党委做出的‘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的决定,也就不能再以犯了唯心论、先验论的错误来解释了。你在常委会上的检讨是避重就轻的啊。中央给你们时间,希望你能够珍惜这个时间,尽快做出一个好的坦白交代。现在,总理让我来,再次转达中央的期望。”

吴法宪连说:“我犯了大错误,我听命于林彪,让林立果掌握空军

大权,我有罪啊!”

李德生说:“不要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嘛。你应当把错误的具体事实交代清楚,还应当把你知道的林彪罪行,揭发彻底。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吴法宪应道:“主任说的是,主任说的是。主任啊,我有罪啊,我们空军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作为司令员、党委书记,确实是罪不容赦。毛主席在我的书面检讨上批示,‘要敢于反潮流’,批评我‘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批评得好,批评得对。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问题,我要检讨,我要深刻检讨的。”

李德生问:“你原来的书面检讨是林彪外逃以前的事了,现在林彪的问题性质已经起了变化,你还有什么新的检查交代没有?对于林彪,你有什么要揭发的吗?”

吴法宪说:“我正在准备,正在准备,一定要深刻地检讨。”

李德生说:“已经一个星期过去了。只要是想交代问题,并不见得要拖很长时间的。希望你抓紧啊!”

从吴法宪家里出来后,李德生又来到李作鹏家。

李作鹏接到通知,早已在家等候。他戴着墨镜,李德生很难看出他的表情。

李作鹏长期做参谋、机关工作,是比较有能力的。他感恩于林彪,曾经表示,“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现在林彪死了,他还活着,还要揭发林彪,思想弯子够大的。

李德生坐定后,询问李作鹏这几天的思考情况。李作鹏断然否认自己与林彪的阴谋有牵连。李德生问:“那么,山海关机场的命令为什么错传呢?”

李作鹏回答:“那是他们记录错误。”

李德生把中央的意见郑重的向李作鹏转达,希望他抓紧时间,认真地作一个像样的检查和揭发。

同邱会作的谈话,是在总后勤部大院邱会作的家里。李德生遇到几乎同样的情况。邱会作只讲正在回忆思考,但是不谈自己的具体错误。李德生说:“已经几天过去了,这些天查获了林彪的大批罪证,党中央希望你们能够有所揭发,帮助中央弄清林彪的问题。你们自己的

错误,现在更应当检讨得彻底一些好。”

邱会作默默无语。

李德生将他同黄、吴、李、邱接触的情况和看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9月20日,周恩来召集空军、民航总局负责人开会,谈民航工作问题。他当面责问吴法宪:为什么把林立果捧得那么高,甚至把空军兵权都交给他?吴法宪无言以对。

第 1218 回：外交部，厅级主任接二秘 听汇报，查飞机坠毁原因

9月20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奉国内指示，派使馆二秘孙一先送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照片及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为了安全，又让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的蒙语翻译贺喜陪同他一起回国。他们俩坐在包厢里，由于那时中蒙两国交流少，整个软卧车厢里只有他们俩人。他们透过车窗，可以看见火车外，苏联军队比以往更多了。到了二连浩特，中国的军人也比平时增加了许多，干部都佩戴着枪。边防站的王站长告诉孙一先，现在是一级战备！到了集宁，那里停靠的一列车用列车正往下卸军车和重型武器。孙一先想，难道真与那架失事飞机有联系吗？

9月21日，国际列车到了北京站，孙一先看见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和他的秘书王万慧在站台上。孙一先刚下车，就被符浩拉到一边低声说：“我就是接你来的！”

孙一先暗暗诧异，颇有些受宠若惊，心中暗想：“我一个二等秘书，用得着大主任来接？”

更让他弄不懂的是，他被直接送到外交部招待所住下，并被告知：“不许与外界联系，不许与家人联系，见了熟人就说是送文件来的，马上就走。”

原来，是周恩来专门指示符浩去车站接车。

孙一先把带来的胶卷交给外交部的孙秀娟，自己洗洗澡就睡了。谁知刚躺下没多久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王海容！她可是外交部司长里惟一的部党组成员。“这样的大人物夜里来见我？”这又让孙一先吃惊不小。

还没等孙一先缓过神来，王海容已对他说：“跟我走，去人民大会堂汇报。”这时已经是半夜，孙一先坐在汽车里，随王海容来到了大会堂。他一进大厅，看见周恩来正在那里向什么人交代工作，这让他又

一次感到意外：“原来是总理见我？！”

随周恩来听取孙一先汇报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外交部的姬鹏飞、韩念龙、符浩，公安部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等。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看到只来了孙一先一人，当即警觉地问孙一先：“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

孙一先一时被周恩来严峻的神色弄得不知怎么回事，忐忑不安地回答说：“他回家了。”

周恩来脸色一沉眉头顿蹙，严厉地责问：“谁让他回家的？”

在一旁的符浩回答说：“是我让他回家的。因为他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

周恩来有点火了：“那也不行，飞机坠毁他总知道吧，立即派人把他找回来！”

随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符浩：“你当过兵没有？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

两个小时后，那位翻译贺喜被人从酣睡中叫醒，送进了警卫森严的外交部招待所。此后，孙一先和贺喜二人就这样被“隔离”了半个来月，直到他们听了有关林彪事件的传达后，才恍然大悟，恢复了自由。

此时，周恩来对孙一先说：“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

孙一先把自己标的现场位置图拿出来。

周恩来问：“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直线距离 700 多公里。”

“山海关在什么地方？多伦呢？贝勒庙呢？”周恩来从山海关到温都尔汗，用力一划，微微点了点头。

这时已经是 9 月 22 日凌晨 1 时，李德生、吴法宪和空军副司令员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也都来了。周恩来只介绍了李德生，然后让孙一先继续汇报，按提纲讲。孙一先谈到飞机残骸时，周恩来没多大兴趣，甚至还闭着眼睛打了个盹儿。孙一先想：“总理太累了。”

但看尸体照片时周恩来却来了精神。孙一先带去的照片大概有 200 多张。周恩来对许文益大使等人向死者默哀的照片显得不屑一顾，扔到一边。其它的照片却都非常仔细地看，尤其是 5 号尸体。

听完孙一先的汇报，周恩来指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主持研究飞机是怎样坠毁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也参加。他们拿着照片到东大厅，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公安部长李震等一起分析研究。

李际泰不是飞行员出身，但是从1957年起就在北京军区空军担任领导职务。他仔细看过照片和现场示意图后，认为飞机可能是因为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着陆，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肚皮与沙土摩擦，骤然升温，引起油箱着火，从而导致整机爆炸。从当时的情况看，飞行员驾驶技术很好，选择了惟一的处理办法，虽然不排除机件失灵，或被地面防空武器击伤而紧急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从死者的遗体上看，都取下了手表等易于擦伤身体的物品，说明迫降是事先作了准备的。

在场的都是外行，一致认为李际泰说得有道理。

杨德中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的飞机，并与驾驶员及有关地勤研究一下。符浩建议，看飞机时，应该把到过坠机现场的孙一先带上。

再说孙一先汇报完后，又到外交部和孙秀娟一起洗照片，整整一个星期，都在洗照片。一批一批地洗，写说明。10月3日，他接到电话：去外交部礼堂听报告。当他听韩念龙副部长念到：“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时，脑袋嗡的一下大了，怎么会是他呢？！那几具尸体的照片在孙一先眼前晃来晃去。

10月1日凌晨2时，杨德中一行人去西郊机场看252号三叉戟。

空军参谋长梁璞听说飞机是擦地皮着陆起火爆炸，有点意外，说在夜里能找到这么一大块平地难度相当大。潘景寅的驾驶技术还是比较高。1970年从巴基斯坦飞回这批三叉戟，是他带队飞回来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国内写的飞机失事报告，分析周围无高大目标，迫降场的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烧伤不重，无高空摔折等，看来飞机不像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梁璞认为迫降时速度可能很快，肚皮和右翼尖同时着地，猛一擦地可能“飘”起来。

根据李际泰等人的纸上谈“机”，中央确认256号三叉戟是“自行

坠毁”。

而当时苏、蒙的调查结论则是由于飞行员操作失误所致。蒙古政府组成由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为首的政府委员会，成员以去过现场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主。应蒙方邀请前来的苏联有关部门高级专家协助该委员会调查。

1971年10月12日，在蒙古国防部、总参谋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苏军驻蒙古司令官克里夫达中将介绍了苏方对坠毁飞机调查的看法。他说：

“坠毁的中国飞机隶属驻扎在北京郊区的第34师，中方说该机民用。我们很容易证明，这架飞机属于军用，机上人员穿着军衣，这是否认不了的。还有所有人都带了手枪，还有自动枪、飞行地图、呼号，从这些来看，完全表明这架飞机是军用的。找到的枪大部分是有子弹的，有一支上了膛。是什么原因要子弹上膛？是用于野外降落，被俘时自己使用？除此没有别的目的。估计飞机的平均时速670公里，说迷航没根据，这架飞机装备现代化，不可能不知道飞到哪里。如果说迷航，飞机应该发出求救信号，但没有这样做。”

克里夫达强调“雷达是看不见的，当地人看见这架飞机飞得非常低，声音很响。”

克里夫达认为，至于燃料用尽完全是谎言。剩多少油？还能继续飞多长？通过仪表就能知道。从着火情况看，证明这架飞机有足够的燃料。

蒙古专家认为，当时飞机翅膀灯没有打开，根本没有考虑照明，也没有放下起落架。按一般迫降应该是尾部先着地，但林彪专机不是这样，飞机头部先着地。证据就是所有仪表在着地一刹那都已经碎了，降落时发动机没有熄火。飞机落地后又第二次跳起来，再着地，飞机就解体燃烧了。不过发动机没有完全烧毁。

中国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林彪专机是以较大速度尾部接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先后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

苏军克里夫达说：“飞机弹起又第二次着地时，机上的人还活着。为什么？因为尸体主要是在机舱左边，说明有准备，企图通过舱门下

飞机。

从 9 具尸体都没有戴手表和穿鞋看,他们是做了迫降准备的。

如果我们到现场早一些,也可能有轻伤员被活捉。从 9 具尸体的最后动作看,至少飞行员和他旁边的那位在被飞机甩出时还活着。因为他们的表情痛苦,似在火中挣扎过。”

苏联克格勃任命侦察员扎格沃茨丁将军和病理学家托米林组成鉴定小组,10 月中旬来到蒙古温都尔汗坠机现场。蒙古公安部司长姜仓巴拉桑上校、国家保安总局四处化学鉴定专家班兹拉格奇少校,陪他们一块去现场。

苏联来的人员中,还有苏联国防部法医局局长、克格勃侦察局长和根据头骨恢复原貌专家。1971 年 10 月 19 日,鉴定小组在坠机现场打开坟墓,看到两具尸体镶着金牙,怀疑是林彪和叶群。他们把尸体挖出来,割下那个年龄较大的和女尸的头颅,在锅里煮掉皮毛后,取走了这两人的头骨,带回莫斯科。11 月中旬,苏联克格勃侦察员扎格沃茨丁将军和病理学家托米林两人又冒风雪赴蒙古,将林彪无头的尸体再挖出来,查看肺部是否有结核病症。托米林用双筒显微镜找到林彪尸骨的右肺有钙化点。

蒙古政府委员会于 11 月 20 日写出《查明飞机坠毁原因的报告书》。其结论如下:“有民航标记的 256 号飞机是军用飞机,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需要。多数座位被拆除,用于特种的军事需要。中国 256 号飞机由于飞行员犯下了飞机驾驶错误而坠毁,不是因为某种迫降原因而降落的。”

在林彪座机右机翼根部有一圆洞,后来很多人说那是被导弹打的。

是中国的导弹打的吗?中国那时最先进的的是 60 年代后期生产的仿萨姆 2 的红旗 -2 号(HQ -2)中高空、中近程地空导弹。该导弹的最大射程只有 35 公里。温都尔汗早已超出了中国导弹的射程范围。



萨姆 -2 导弹

会不会是飞机迫降时引起燃烧?

三叉戟机翼内侧油箱与机腹几乎是在一个平面上,以机腹擦地着陆,机翼油箱不可避免地要摩擦到地面,油箱里的剩油肯定会因为摩擦起火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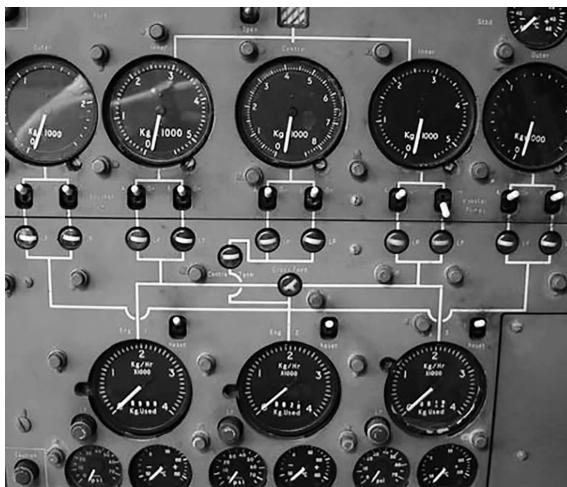


图为民航退役的三叉戟。注意机翼与机腹几乎在一个平面上,在野外不用起落架迫降,不可避免的要使机翼摩擦到地面,从而引燃机翼内的剩余燃油。

256 坠机时已经飞行了约两个小时,机上至少仍有约 2.5 吨的燃油。256 上的 5 块油量表都是在大约沿着圆周 330 度范围内均匀的以公斤为刻度做出标示的。每 100 公斤一个小刻度,每千公斤一个带有数字的大刻度。5 块表的满刻度分别是:中央油箱 8500 公斤,内组油箱 5500 公斤,外组油箱 2500 公斤。

燃油使用顺序是先耗用中央油箱,然后机翼外侧油箱,最后机翼内侧油箱。飞机驾驶员可以控制连通机翼内外组油箱的活门的开关。

当 256 只剩下 2.5 吨燃油时,中央油箱早已耗完,而机翼油箱组的外组油箱也已耗空,全部燃油都已经集中到机翼的两个内组油箱里面。也就是说每个油箱还有约 1.3 吨燃油。



图为三叉戟燃油表

潘景寅为什么没有利用这仅剩的 2.5 吨燃油寻找最近的机场进行降落。尽管就在附近几十公里范围内就有温都尔汗飞机场。但是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潘景寅夜间驾机,就是飞到温都尔汗机场上空,也不可能发现简陋的红土跑道。

大约半个小时航程外还有乌兰巴托机场可以谋求安全着陆。但

是 256 号没有这样做,也没有在最终迫降之前尽量用尽机上燃油,而是选择了机翼内侧油箱还带着 2.5 吨燃油时,以机腹擦地方式在野外实行迫降!

第 1219 回：等十天，决定抓黄吴李邱 写检讨，吴法宪彻夜未眠

9月20日，军委办公厅通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干部于21日上午到三座门会议室开会。

21日这天，黄永胜一改常态，变得特别客气和随和，亲自在门口迎接老帅们，向他们表示欢迎。并说，今后要在老帅们领导下工作。

会议由黄永胜传达文件，主要是关于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的“913”事件。

从9月21日0时起，吴法宪开始写检查，一直写到凌晨4时才睡觉。

晨2时3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这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拟同意汪东兴的报告，在中央政治局下设一专案工作小组，掌管和整理有关林彪、陈伯达全部案件材料，分类择要送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审阅。该专案工作小组以纪登奎为主，汪东兴为副领导工作。毛泽东阅批：“同意。”

9月21日后，邱会作基本上就是赋闲在家。他告诉妻子胡敏和儿子邱路光，把桌子上玻璃板下面的有关林彪、叶群的照片都取出来，烧掉。同时让秘书们把办公室的资料、材料中，有关林彪的内容也整理出来烧掉，但文件登记本上有登记的都不要动。他还对胡敏说：“给豆豆介绍对象的事今后肯定要问到你头上，你要有思想准备。”

邱会作对邱路光说：“我练字写的那些东西，整一下都烧掉。”

过了一会儿，邱路光拿着陈伯达送邱会作的字：“天地驰驱客，英雄清净身。留心千古事，不厌一粒尘。”和叶群的诗：“繁霜冷雨仍从容，晚节尤能爱此功。宁愿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问：“烧不烧？”邱会作说：“统统烧掉。”

9月23日，毛泽东给黄、吴、李、邱的10天期限已到，他把汪东兴找来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

汪东兴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恩来汇报说：“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

周恩来让汪东兴等一下，等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泽东。

这天，周恩来到机场迎接访问中国西北地区后回到北京的柬埔寨亲王和英·萨利特使等。之后，在机场召集北京市及民航系统干部开会，了解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后的反应。强调在清查林彪一伙罪行时，要防止扩大化，指出：“死心塌地跟着林彪走的，只是少数人、个别人。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会上，他还就尽快恢复正常通航秩序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晚23时30分左右，周恩来和汪东兴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向毛泽东汇报黄永胜他们在拼命烧材料。

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周恩来对汪东兴说：“你不能离开中南海了。要严加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有事时可以找张耀祠、杨德中，必要时找你。”

当晚，周恩来驱车到人民大会堂，先是在新疆厅开了个会。会后，他叫来杨德中进行部署。杨德中离开新疆厅时对周恩来卫士高振普说：“今晚有重要行动，你要提高警惕，多个心眼，再从警卫处调两个人协助你。”说完就走了。

晚23时左右，杨德中回来了。高振普急忙上前问他：“怎么样？”

杨德中说：“一切就绪。”就进去向周恩来报告。

几分钟后，周恩来把高振普叫进去说：“咱们回家。”

高振普答应着接过文件包跟在周恩来身后。他想：“不是有行动吗，怎么又要回家？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周恩来到家后，杨德中告诉高振普，今晚的行动改在明天上午，仍在大会堂。

原来，9月24日早上，李先念率团去越南访问，去机场送行的领导

人中有邱会作。机场送行人员名单早就排出来了。因为林彪出逃的消息还被紧紧地捂着,对黄、吴、李、邱采取措施也不能对外透露风声,如果按日程要到场的邱会作不出现,就可能引起各种猜测,所以周恩来临时改变了计划,等送走李先念后再动手。

9月23日下午14时,空军继续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吴法宪再一次做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检查。

晚上22时左右,吴法宪接到中央办公厅王良恩转达的周恩来指示,要他把空军的实力,以及部队、学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战的部署制成表格,并附上地图送给周恩来。吴法宪交代给参谋长梁璞和作战部的人员,要他们立即制作表格和写好报告。

这天晚上,邱会作也在给毛泽东写检讨报告,他的秘书进来向他报告了第二天的活动安排,第一件是:早6时去东郊机场送李先念出访越南;第二件是:下午有外事活动,主要是谈军事援助问题;第三件是:早8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时,邱会作稍微愣了一下:“按惯例政治局会议都是晚上开,为什么改在早上开?”

9月24日凌晨4时,吴法宪的秘书张叔良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要吴法宪上午8时到大会堂福建厅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

接到通知后,吴法宪问黄永胜开什么会?黄永胜说他也不知道。吴法宪估计很可能就是要处理他们的问题了。他赶紧催空军参谋长梁璞立即整理出周恩来所要的空军全部实力的报告,即刻上送。

随后,整个晚上都在修改自己在23日下午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检查的吴法宪,据此作为他的检讨,让秘书张叔良修改后重新抄录一遍,由他签名后立即发出。他还在检讨后面附上了揭发材料。

接到吴法宪的催促后,空军参谋长梁璞带着作战部的参谋天亮即将表格和报告作好,吴法宪拉着空军政委王辉球一起审阅以后,签署上报。

由于这些文件牵涉到空军的整个情况,属于核心机密,因此在送走之前,吴法宪亲自给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要他自己到西华门去接。打完电话,他又派司空作战部副部长吕秋振亲自送这些文件到西华门,并交代一定要亲自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打收条。

待检讨报告送出,吕秋振也把空军实力报告的收条拿回来以后,

吴法宪这才放心。此时，天已经大亮。

早上6时，吴法宪叫警卫员薛帮喜帮他打一点早饭，并要秘书张叔良叫他的妻子陈绥圻到他的办公室。

陈绥圻来了以后，吴法宪说：“这么多天了，我一直在办公室没有回家，主要是怕下面的部队出事。我马上要到大会堂开会，现在有几件事情要交待一下。第一、我的皮包里存放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你统统带回去保存一下。第二、我去开会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我已经请求中央对我进行审查，我相信自己是经得起审查的，我自己了解自己。第三、今后孩子要靠你抚养照顾，我可能见不到他们了。”

陈绥圻说：“你的问题我最清楚。我相信你。千万要活着！”

吴法宪对陈绥圻说：“我整晚都没有睡觉，很疲劳，你先回去吧。”

陈绥圻拿着皮包走了。吴法宪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一直看着她走回家中。然后嘱咐张叔良把9月12日晚上的记录整理好。他认为这个记录可以清楚地说明他在9月12日晚上到9月13日都做了什么。

9月24日一早，邱会作按时来到东郊机场。他走进机场贵宾厅，看见来的人还不多，于是找了一个他觉得适当的位置坐下。服务员送过茶来，茶几上有烟，可以随便抽。他一边喝茶，一边抽烟，看到一切，都还和过去是一样。

一会儿，李德生过来了，他挨着邱会作坐下，主动与邱会作搭讪：

“你们总后的常委会开得很好嘛，中央的第一号简报就登的你们的会议情况。”

“第一号，第几号还不都一样，号数不起任何作用！”邱会作说道，可以听出其中的情绪。

李德生说：“这也可以看出你对毛主席、中央的态度嘛！”

邱会作“嗯”了一声，随后说道：“我准备发动总后的常委对我搞揭发。”

李德生问：“能搞起来吗？即使搞起来了，也只能说些柴米油盐的事，这有什么用？”

稍停片刻，李德生又问：“你们总后常委是怎样分工的？你哪有多

少时间管总后的事，日常工作是谁管？”

邱会作说：“家里的工作由张池明政委抓总。”

这时，周恩来进来了，他又是一夜没有睡觉。走进候机室后，和往常一样，周恩来与大家相互握手，然后就坐。

起飞时间就要到了。临去机坪前，李先念不无担忧地对周恩来说：“我很担心主席和总理的安全。”

周恩来听到这个话，顺手把他的手放到坐在旁边的邱会作的手上，一边拍着邱会作的手，一边对李先念说：

“你放心去，一会政治局要开会，研究今后的工作。”

他们一同步入停机坪，气氛平静。高振普紧随在周恩来的身边警惕着周围的动静。在停机坪上，邱会作和周恩来并排站在一起，记者拍了不少的镜头。

飞机滑动了。周恩来转身对纪登奎、邱会作说：

“8点钟福建厅有会，知道吗？传达主席的指示。”

邱会作回答说：“知道。”

其实纪登奎知道开会的内容，邱会作也接到了开会的通知，但他却不知道今天的会对他是是个什么结果。

周恩来又说：“我就直接去大会堂了。”他问邱会作：“你还回家不回家？”

邱会作回答说：“那我也不回家了。”

周恩来：“你不回家，还不给胡敏打个电话。”

邱会作笑着对周恩来说：“给她打电话干什么，不用。”

周恩来说：“那好吧，到大会堂，我们先谈一谈。”

邱会作的小车开出机场不远，他的司机告诉他：“后面有随车。”

邱会作说：“让开，让他先走。”

过了一会，司机又说：“停了，不走。”

就这样边走边停了三次，随车还是跟在后面。因为中央办公厅有规定，政治局委员都要有随车，邱会作也没有多想。

人民大会堂是内外两重门，门与门之间有个短过道。邱会作走进北门外面的一道门后，过道上就有警卫干部一把将他拉到旁边的小房子里去了。邱会作还以为是有紧急电话，没想到一进小房子就搜摸全

身。他还来不及说话，检查他的人就说：“今天要检查一下。”

当邱会作走进到里面的第二道门时，看到有两个人正将他的警卫员小朱连拉带拽地向西走去，他只看见小朱的后影。邱会作一下都明白了！然后两个人把他押进了福建厅。

跟随邱会作多年的老司机张自贵也被扣押在人大会堂地下室，他又气又纳闷地对警卫员小朱说：“还敢扣押我们，准是反革命政变了！”

邱会作一进福建厅，就发现一切都变了。厅内过去的布置是东西一圈椭圆形布置的沙发，对着门是敞口，离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扇屏风。这天的布置是：东边只有两张单人的沙发，南边四张沙发，北边还有两排若干张沙发。厅内沙发后面有若干警卫人员面无表情地站立在那里，每个人都手扶着腰上的手枪。

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还有公安部革委会主任李震等人在北面的沙发外站着。他们好像都没有看见邱会作，邱会作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在厅内走来走去。

邱会作被指定坐在南面的四张沙发靠东面的最后一个位置上。刚坐下，周恩来的警卫员高振普进来对他说：

“总理叫邱副总长到河北厅去谈话。”

邱会作刚起身，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立即对高振普说：“现在不谈了，等会一起谈。我给总理解释。”

过了一会，高振普又来喊邱会作。杨德中有些不高兴地说：“告诉你不谈了，怎么又来喊？一会我跟总理解释！”

高振普边走边嘟囔说：“是总理叫我来的。”

原来，从机场到大会堂的路上，杨德中坐在周恩来的车上。周恩来对杨德中说：

“咱们把车开快一点，先一步到大会堂，再与邱会作谈一谈，争取他多交代一些问题。”他们的车速加快了，后边的车速也跟着加快。因为都是红旗车，性能一样，不可能甩掉它。车上原有的通讯设备，也因为要反窃听，全部拆掉了。现在只好干着急，只好到大会堂再说了。

到了大会堂北门，杨德中虽是抢先一步下车，已来不及了，邱会作已经进了福建厅。

第 1220 回：都隔离，叶剑英主持军委 九二六，开“老同志座谈会”

7时30分，吴法宪动身前往人民大会堂。汽车一到北门，就有中央警卫团的人员下来拿走了警卫员薛帮喜手中的皮包。进了第一道门后，吴法宪也被带到门房，说：“毛主席有命令，今天开会不准带枪。”接着搜身，并拿走了他身上的眼镜和钢笔。

吴法宪走进福建厅，警卫让他坐在第一排的沙发上，后面站着一名警卫战士。吴法宪心里想：“文革开始后，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这几个了！”

这天早晨6时30分，住在西山的李作鹏正在卫生间内一边解便，一边批阅文件。忽然，秘书刘继祥进来告诉他：“中央办公厅通知，上午8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政治局会议。”

李作鹏迅速把紧要的文件批完后，即刷牙洗脸，吃完早点。这时还不到7点半钟，他同老伴董其采到室外散步，对老伴说：“过去政治局开会都是下午或晚上，而今天则是上午8点，这个会议很特殊，可能凶多吉少。”

董其采说：“林彪叛国后，把我们搞的日夜不安，活人不如死人干净。”

李作鹏说：“死不得，死了就说不清楚了，自己做的事，自己心里有数，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董其采：“现在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谈了一会儿，时间到了，李作鹏上车进城，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下车，一停车就感觉与往常不同，8341部队两个干部站在他的车旁边，一个从他的警卫员手里接过公文包，陪他进入大会堂。另一个带着他的警卫员和汽车向东开去。

李作鹏进了大会堂北门，跟着他的那个8341部队干部用力将他推进北门内的卫兵室。他见到两个人正对先到的铁道兵司令员刘贤

权进行搜身，就大喊一声：“这是干什么？”那里的人立即高声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参加今天会议的人，都要进行检查。”

李作鹏顿时什么都明白了。这时，黄永胜也被推进来了。他们衣服口袋内的香烟、火柴、眼镜、语录本、剪指甲小刀、擦汗手帕、卫生纸等等，全部扣下，包括公文包。

检查完毕后，由两个军人将他们带到福建厅。他们看到，吴法宪、邱会作已经坐在那里，李作鹏紧挨着吴法宪左边坐下。

福建厅里没有烟灰缸、茶杯，因为考虑到黄、吴、李、邱都是军人，担心他们会有过激的举动，会前已全部收走。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在杨德中的陪同下，和叶剑英、纪登奎一起走进福建厅。大家从沙发上站起来，周恩来等人和黄、吴、李、邱4人一一握手。

就坐后，杨德中坐在周恩来和黄、吴、李、邱之间。

周恩来先喝了一口茶，并扫了黄、吴、李、邱4人一眼，然后开口说：

“主席对你们的问题有决定。这几天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电报，你们都看了。上海、陕西、天津的意见很尖锐，政治局内部的意见也很尖锐，这样就只好先对你们采取一些措施了。党内发生过许多重大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处理得很好。这次对你们的问题会处理得更好。”

说到这里，他又喝了一口茶，并略微思考了一下，开始说：

“出事都10天了，你们几个人同林彪的关系至今都没有交代，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不知是什么原因？林彪叛国，造成很大的被动，上了党章嘛，几乎要毁掉我们50年的党。纪登奎曾说，这是十次路线冲击最严重的一次。中央等了你们10天，你们现在不能指挥部队了。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你们暂时离开工作的岗位，给你们每个人找了一个地方，你们暂时离开工作几天，到那里去好好睡个觉，好好地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你们不交代怎么行呢？林彪还准备了一架飞机，准备把你们带走，不走就绑架你们。”

此时，吴法宪支吾地说：“我昨天晚上向主席、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凌晨5时送出去的。”

周恩来对吴法宪的话没有做任何表示。他接着说：“不知你们在想什么？‘九大’时该照顾的都照顾到了，还有什么想法嘛！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力量，是好事，这有什么不好嘛！”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政治局的产生，你黄永胜是参与其事的。”

周恩来歇了一会又说：“过去有人在病中说了几句话就怀恨在心，那些问题都可以说清楚嘛！”

“有人在病中”，邱会作认为是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九大之前，江青有一次对林彪发脾气说：“蒋介石搞了一个党国，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军党、军国。”在庐山会议之后，江青自己在政治局会议上主动说：“我在患病的时候，说过一些话，可能欠妥，但那是病人说的话呀。”周恩来当时就批评她：“话不能这样说，不能把说了不适当的话都推到病的问题上去。”

此时，周恩来继续说：“主席说过，出事之前，什么都听不到，现在情况像雪片一样飞来了。有的雪片可以打死人。你不信吧，人家又说得出来；完全听吧，又实在触目惊心。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让你们几个离开工作岗位一段时间，专门反省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你们要相信主席，相信中央。”他接着又重复说：“主席说等了你们 10 天，不能再等了。10 天的时间，你们怎么一个字都没有给主席写？”

黄、吴、李、邱 4 人都默默无语。

周恩来最后说：“你们的家属子女，我们会照顾的，绝不会像杨成武对叶副主席子女那样。关于军委的工作，以后由叶剑英主持，他也是政治局委员嘛。党仍对你们寄予希望，不要辜负毛主席。”

至此，周恩来停了好久没有说话。他几次拿起茶缸子喝水，一边喝水，一边在想什么。他对着叶剑英和其他在座的军委办事组的人说：“大家都说说嘛，只我一个人说？”

叶剑英张了一下嘴，但一句话也没有说。

纪登奎说：“今天总理多说一点，我们以后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有呢！”

随后，周恩来先问了黄永胜几件事，主要还是那封在直升飞机现场搜到的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黄永胜当然是完全否认，态度也很强硬。

周恩来又问起李必达的事，黄永胜有些激动，生气地大声说：“总理啊，我们对江青同志是有自由主义，但是你清楚，在座的也清楚，这是因为工作中和江青同志有矛盾给逼出来的。如果是主席批评我，我接受批评。总理您想想，一个秘书有意偷听首长的电话，这样的人能要吗？你们在座的能容忍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周恩来从座位上边站起来边说：“你先走吧。”一边走过去和黄永胜握手，叶剑英、李德生也过去和黄永胜握手。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将黄永胜带走。

黄永胜快走到门口时，周恩来又说：“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用手在自己的胸脯拍了一下。

接下来，周恩来又问吴法宪：“林立果大学没有毕业，就当了什么副部长，林彪的子女都在你们空军工作。空军搞得很乱，你们空军已被人家在下面挖空了。你吴法宪是有责任的。你把空军搞得一塌糊涂！”

吴法宪闻言立即站起来说：“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们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同志，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

这时，李作鹏突然大声说：“吴法宪胡说八道！是他自己讨好林彪、叶群。”李作鹏是对吴法宪说“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不满，此时，他激动得不能自己。

周恩来没有理会李作鹏，对吴法宪说：“你也走吧。”他和叶剑英、李德生三人与吴法宪握手。北京卫戍区委杨俊生将吴法宪带出去了。

周恩来又坐下来对李作鹏说：“不要急，有充分的时间让你们考虑问题。”他接着问：“张学思是怎么死的呀？”

李作鹏说，张学思的案子是中央专案组直接负责的，和海军没有关系，海军也没有插手。

周恩来没再往下问，转而问道：“听说海军层层站队搞得很厉害？作鹏，你应很好检查海军层层站队的问题。”

李作鹏说：“总理的批评是正确的。海军不团结，基本上就是一个派性问题，是有些扩大化，没有控制住。我有责任，我检讨。”

李作鹏走时，周恩来3人也过去与他握手。

最后是邱会作，周恩来有些生气地说：“你怎么也搞进去了？”

邱会作没有吭声，也没有正视周恩来。接着，周恩来把胡敏给林立衡、林立果找对象的事说了。

周恩来接着说：“你们抓了李必达，连李必达的未婚妻都搞得不知下落了。王瑞华同志搞到哪里去了嘛。”

王瑞华是李必达的未婚妻，在301医院高干病房任护士长，工作表现很好。李必达事件发生后，301医院没有马上处理她，因为她是“九大”代表，把她送到四医大学习去了。

邱会作走前与周恩来握手时，含着泪对他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

周恩来看了邱会作很久说：“好。”

此时的邱会作十分激动，他双手握着周恩来的手吐出一句话：“希望再见到总理！”

周恩来又盯住邱会作看了一眼，用很低沉的口气说：“到那里去，好好住下！”

随即，周恩来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四人的决定。之后，起草中央《关于黄永胜等离职反省的通知》：

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军委日常工作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9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此《通知》发至大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

9月24日下午，张才千副总长召开总参会议，传达周恩来当天上午同几位副总长的谈话和毛泽东的决定：由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军委和总参的工作，黄、吴、李、邱“隔离反省”。

叶剑英回到家后对秘书说：“以前我不想再穿军装，不再管军队了，现在看来还要管啊！你去把各大军区的名单要来。”

秘书还不知道中央已经要叶剑英管军队，顾虑地说：“我连各单位

的电话都没有,怎么要到名单?”

“你给军委打电话,现在会给你了。”

秘书马上明白了叶剑英的意思,不一会儿,各个方面的情况就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叶剑英的案前。

9月24日,随李先念任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越南访问的成员中还有总参的副总长阎仲川,他是早已确定的代表团成员,并已通知越方,仍随团出访。他原定的任务是赴越南南方考察越南军民抗美救国斗争情况。但到9月28日代表团回国前,突然通知他任务有变,要他与代表团一起回国。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等到机场迎接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下飞机后没有各自回家,却被引导到贵宾室。大家刚刚坐下,周恩来便态度严肃地对阎仲川说:

“阎仲川同志,中央已经决定黄永胜离职反省。你是黄永胜的得力助手,你要好好揭发他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生活方面的!”

然后他向叶剑英等人点了点头,独自先行离去。阎仲川思想抵触,心想:“要我当黄永胜的助手,是组织的安排,当助手而‘得力’,有什么错?”

叶剑英先讲话了:“你还年轻,又有水平,只要好好揭发交代,还有前途嘛!”

李先念只说了一句:“好好揭发交代咯!”

接下来是纪登奎和李德生讲话。他俩介绍了半个月的清查工作,希望阎仲川认清形势,与林彪、黄永胜等人划清界限,积极揭发他们的罪恶活动。

9月26日,叶剑英邀请乔冠华、章文晋和熊向晖到他家中谈话。叶剑英说:“林彪乘飞机叛逃,本来可以用导弹打下来,但是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

他还说:“如果打下来,解释不清楚;如果叛逃成功,也会增加麻烦。机毁人亡的结果最理想。”

他兴致勃勃地给大家念了董必武在政治局讨论林彪叛逃事件时写的一首诗:

铁鸟南飞叛未成,

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

地下应慚汉李陵。

熊向晖当时笔录了这首诗，并注云：“董必武同志作于1971年9月16日晨3时（在政治局讨论林彪叛逃时）。叶帅转告。”但此诗后来未见于《董必武诗选》，而载于叶剑英的《远望集》，并冠以《斥林彪》的标题。

9月26日至10月15日，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富春连续主持召开“部分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批判林彪一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

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里，王震第一个抢先发言，陈毅打断了王震的发言，说：“王胡子，还是让我来讲，算我们两个人的！”

正在住院的陈毅，拿出他在医院里写的几行提纲，满腔义愤，慷慨激昂，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周恩来提出给发言人录音的建议，陈毅坚决赞成：“我希望把录音保存下来，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都可以参考……口说无凭，录音为证。”陈毅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个癌症患者，再次作了3万字的发言，整整讲了一个上午。话刚讲毕，一股殷红的鲜血从鼻腔里涌了出来。从此，他就再也没有下过床。

9月27日，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开完会特意把将要去巴黎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留了下来，郑重地对他说：“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周恩来顿了一下，又说：“还有，中央已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

周恩来还叮嘱说：“只告诉黄镇一个人。”

周恩来此举，意在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交个底，让他知道林彪叛逃，不会影响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这样，当美国驻法国使馆武官沃尔特斯与他联系时，他心中就有底了。

事情完全如周恩来所料。9月中旬以来，汇集到尼克松和基辛格面前的各种情报表明，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后，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公开露面，所有的机场都关闭了，军队也似乎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尼克松和

基辛格都在担心会不会由于中国国内政局的震荡而影响中美关系，他们早就怀疑中共高层领导在对美政策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直至接到沃尔特斯报告，说他和黄镇大使接触，黄镇的态度照样爽快，中国对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事没有中断，尼克松和基辛格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来。

第 1221 回： 细安排，护送林立衡回京 国庆节，奉命进驻毛家湾

9月27日，北戴河的武健华接到汪东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把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一起妥善地护送到北京玉泉山。

武健华立即和姜作寿一起研究了他们回京路上的安全保障问题，决定：用一节公务车，在沿途加强对公务车的警戒，最大限度减少与路人的接触。在北戴河站上车时，汽车要开到站台，人员直接进入公务车；在北京站下车时，汽车也要开到站台，人员直接离开公务车。姜作寿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携带速射武器及手榴弹等，严防路上发生袭击事件。从北京火车站到玉泉山，林立衡、张清林乘防弹保险车，前后有警备车随行。

9月28日，武健华同林立衡等人按警戒方案离开北戴河。并于当天晚饭前，顺利到达北京西郊玉泉山。武健华向林立衡介绍了玉泉山的情况，告诉她，中央安排她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有事可找中央警卫局主管玉泉山工作的李钊副局长。林立衡和张清林分别住进玉泉山5号楼的两套客房，在小餐厅吃饭。

将林立衡安顿停当，武健华立即用电话向汪东兴报告：“林立衡已安全抵达玉泉山。”

汪东兴让武健华同林立衡谈谈。武健华提出：“如果能有个女同志同她交谈更方便些。”

汪东兴说：“好吧，我叫谢静宜去。”

谢静宜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对谢静宜说：“这事我知道了，是总理交给你的任务，总理给我说过了，我同意。你见了林豆豆，代我向她问好。她和她的父母是有区别的。父母是父母，子女是子女，父母的问题不应该由子女来承担。父母革命，不见得子女就革命，父母是反革命，不见得子女就是反革命。何况林豆豆是在她父母逃走之前，就向中央报告了。她是有功的。”

9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扩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决定将林彪事件传达到县、区、乡。

9月29日,中共中央下发周恩来起草的《关于黄永胜等人离职反省的通知》。

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初步总结“913事件”以来各项工作。会议商定:

(一)逐步扩大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的传达范围。

(二)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十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

(三)军委三总部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

(四)提议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

(五)派刘西尧等人去国防科委主持工作。

(六)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

会议还研究了有关外事工作。

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催问蒙古政府,要求运回“913”坠机死者的遗体,催要死者遗物,蒙古的态度又强硬起来。9月22日15点30分,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紧急约见中国大使,说:“奉政府之命,要求中国政府在9月25日前就失事飞机越境侵入蒙古领空一事,做出正式解释。”

许文益说:“9月14日已经奉命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作了正式解释。”

二司司长说:“那不够,要求你们9月25日前用书面形式给以正式解释。”

9月25日,蒙古外交部二司策伦朝达勒司长说:“今天已经是25日,中国政府还未就中国飞机侵入蒙古领土一事做出正式解释,对此只能表示遗憾。既然遇难人员的身份已经清楚,死者亲属是有具体人的,因而机上人员究竟是谁也就清楚了。希望中方将他们的姓名、年

龄、职务和照片提供蒙方。蒙古政府只有在研究中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后，才能考虑对中国政府的要求予以答复，如果你们拖延答复，会不会产生不适宜的情况，我对此表示担忧。”

9月29日下午15时30分，蒙古再次以要事约见中国大使许文益，对中国政府未就飞机失事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表示遗憾。并称此事已在蒙古人民中间引起各种传说和议论，所以蒙古决定发表一条简短消息，以说明事实真相。

许文益说：“对蒙古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及时作了两次说明，希望在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不要做出与此相违背的事情。”

蒙方强调不是发表政府声明，只是发表一条一般的消息。

两个小时后，蒙古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关于中国飞机失事》的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喷气式飞机一架，今年9月13日凌晨1点50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2点30分在肯特省依德尔默格，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9人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的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到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做出正式解释。”

9月30日，蒙古各报纸和外语广播都报导了这一消息。蒙古《真理报》将这条消息登在四版很不显著的位置。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将这则消息录音翻译出来汇报国内：“中国飞机侵入蒙古上空”。

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蒙古国防部外事处处长大使馆工作人员问王中远：“林彪还活着吗？”

当时王中远并不知道林彪已死，他按国内指示回答“一切照旧。”

蒙古国防部外事处处长很会意地点点头，走了。

国庆节前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奉命停止向蒙方交涉。中国没有坚持要回尸骨，现场所有物品也都没有移交中国。以后蒙方也没有再

提及失事飞机。

10月1日,和往年不同,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代替它的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首都各大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共度佳节”。这是建国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庆祝国庆。

国庆节,武健华没有休息,又赶到毛家湾林家大院。



林彪旧居毛家湾一号

林家大院位于北京西城区平安里东南,中南海西北,皇城根附近的两条小巷,南巷称前毛家湾,北巷称后毛家湾。这里是明代大学士毛纪的故居,胡同也因此得名“毛家湾”。

五十年代初期,这里曾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的家,林彪当上国防部长以后,搬了进去,并且划进了平安里医院的一部分,加以扩建,这条胡同的两头都有警卫战士站岗。

沿西皇城根北街的一条胡同,有一道高高的灰色围墙,南墙上有两扇大大的铁门,门里是一个占地面积1.9万多平方米的大院子,建筑物的面积为1.1万平方米。这里就是林彪在北京的住地:毛家湾一号院。

前毛家湾一号门是工作人员的宿舍门，三号门是警卫中队驻地门，七号门是林彪办公室秘书室。后毛家湾有一道不常开的大门通向林彪、叶群住宅后院，另一道小门通向林办秘书室。

进了毛家湾大门，可以看到东、西两院。西院是林彪、叶群的住宅，东院是林办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东院有一幢三层楼房，文件、图书都在楼上。楼内有几间办公室，文件集中放在二层楼的一个大房间内，按照文件保管的要求，登记、分类、编号，有序地分存在橱柜中。武健华他们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的文件以及各部委、各单位印送参阅的各种文件基本上未动，只在日常办理的现行文件、材料、案件中查询异常的问题。对这样的材料，他们都是一件件筛过的。因为工作量大，要求急，他们不仅不能休息，还得加班加点，每天搞到午夜前后，在警卫部队食堂吃点挂面、馒头片、咸菜等，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武健华他们将拣选出来的文件，开始是一件件地送到林彪专案组，后来改成一批三五件地送给他们，其中不少是党内高层干部人际关系方面的材料。

“913”事件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曾带人从毛家湾查抄到林彪 1971 年 5 月 23 日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毛主席：

5 月 20 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为了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按:口述如此,似应为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据林彪的秘书于运深回忆,这封信的内容,是林彪把他叫去口授的。主要内容“四不一要”,即:

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

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

当时林彪边想边说,于运深拿一张白纸记录。记录后,林彪并没有让形成信。过了三天,林彪决定不送了。这封完整的信是何时整理完成的?于运深也不清楚。

这年春天,叶群也曾在毛家湾的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口授一封林彪的信,由秘书王焕礼记录。信的大意是:

我(林彪)对部队要求不严,脾气不好,今后应该加强对部队的约束,听党和毛主席的话。

叶群说这是林彪的意思。但是叶群口授的林彪这封检讨信,也没有送给毛泽东,被压了下来。

吴忠向周恩来汇报了这封信。周恩来说他知道此事,林彪和他说过。他当时问林彪:“有这个必要吗?”

毛家湾的工作人员听起来不算多:秘书有6人,林彪贴身警卫人员2人,医生2人,林彪内勤2人,叶群内勤3人,加上通信员、管理员、司机、厨师、锅炉工等勤杂人员,一共20来人。但实际上,叶群常调人来“帮工”,看书的、写字的、做诗及修改诗词的、抄写的、裱糊字画的、照相的、做文章的、“找人”(选美)的、收集图书的、抄录整理卡片的、绘制图表的,加起来比正式的工作人员多得多。

毛家湾两个月紧张而忙碌的清查工作到1971年底结束。林彪处的全部文件都收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搬到中南海西楼去了。

1971年10月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广州、南京等地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系人和事的问题,决定派李先念、华国锋、张春桥前往帮助和检查工作。

当天,毛泽东同意,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等分别主持军委总政、总后、总参三总部的工作。

3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同时发出两个《通知》。

一个是：“为彻底审查、弄清林一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一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另一个是：“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

10月4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军委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的情况和军委今后工作设想。他在信中最后说：

“这次主席令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又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误了大事。”因此，他一方面表示自己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毛主席、周总理及政治局各同志能经常对军委工作做出指示，提出意见，以便使工作少出差错。”最后，他请求毛主席“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

当天，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的信，立即叫来周恩来，共同召集叶剑英和军委办公会议的人谈话。

毛泽东从历史上谈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接着说：“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他们反党，大的事情多得很，小的事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夺权。”

“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

“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军队政治教育，主要是搞路线方面的教育。”

“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

“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

一是靠平时训练。”“我提了五条，他（按指林彪）提了三条。三条不讲马列主义，不讲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讲团结大多数，不讲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应该怎样工作，毛泽东说：“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

毛泽东说：“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

同一天，毛泽东看到空军报社一封来信，揭发南方某地领导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批示给周恩来：“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

10月6日，曾山、邓子恢揭发林彪。

10月10日，陈毅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

10月22日，朱德给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信，揭发林彪。

第 1222 回：王兰义，将军楼里笔记本 李伟信，又供出惊天阴谋

1971 年 10 月，李德生收到驻空军总政工作组送来的一个笔记本，
第一页写着：

“571 工程纪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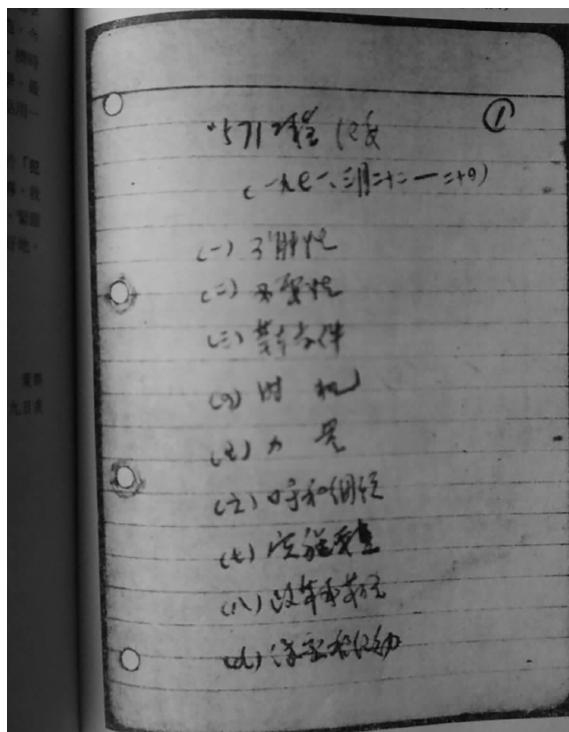
下面用括号写着：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李德生当即想到，这个日子恰好是在他随周恩来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批陈整风汇报会”情况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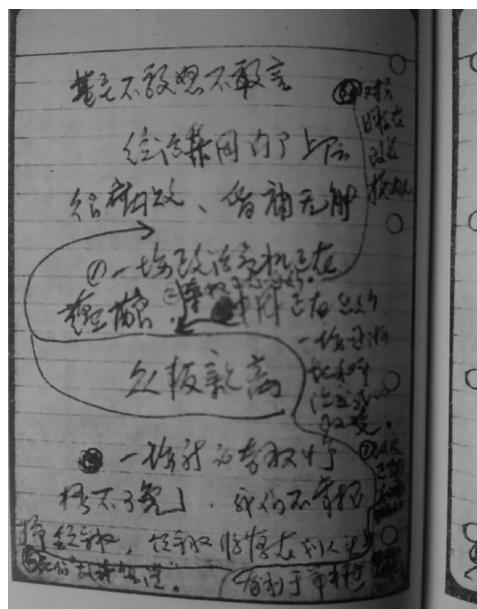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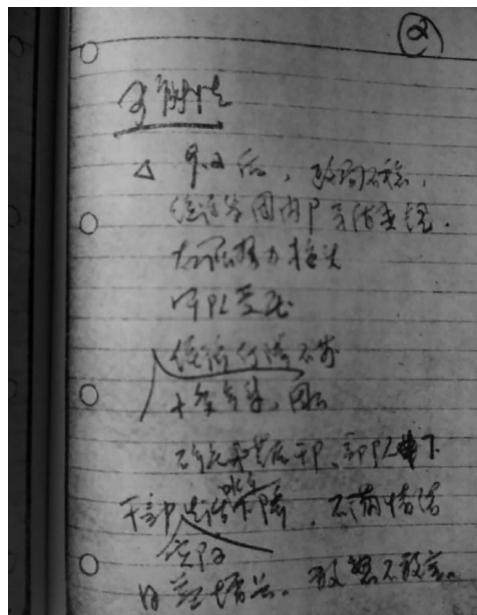
他接着往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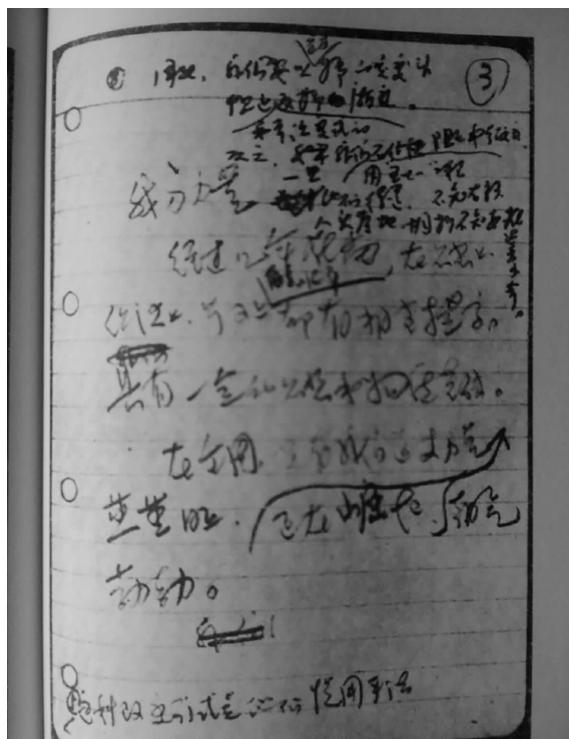
- (一) 可能性；
- (二) 必要性；
- (三) 基本条件；
- (四) 时机；
- (五) 力量；
- (六) 口号和纲领；
- (七) 实施要点；
- (八) 政策和策略；
- (九) 保密和纪律。



翻到第二页，才知道第一页是目录，每一行写的是小标题。看到正文中每个小标题下都画上粗粗的黑线或双线。然后一段一个意思，有的有一句，有的几句，是一种提纲式的写法。

这种写法，当时在空军机关很时兴，叫做“拉条式”，无论是给领导人准备讲话稿，对上写报告，或是对下发指示，先不写成正式文章，而是提纲挈领地写成纲目式的要点，便于审读。通过了，再写成文件。显然，这是空军机关人员写的。





笔记本一共写了 23 页。中间缺第 8 页，可能是编页码出了错。有的地方删去了一些词句，有的地方还有错别字；但是条文分明，意思清楚。

李德生粗粗一翻，从标题看，是一份完整的计划书，往后翻，发现有的话看不懂，有的话特别反动，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工程”？“571”代号是什么意思？李德生不由得又从头仔细看过。

再看一遍，李德生虽然还有很多地方琢磨不透，但已经感到，这是一份杀气腾腾、充满法西斯气味的文件。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批评林彪，是批评他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那还是党内的矛盾。而这个笔记本里所写的内容，却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笔记本是怎么被发现的？这还要从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王兰义说起。

9月13日下午，王兰义按照吩咐，将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空军学院将军楼门口台阶上。

9月14日19时30分，王兰义再去送报纸时，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的，楼门露出一条缝，不知9月13日那天是不是也这样虚掩着，是不是人走了？他又去看车库门，也没锁。他轻轻拉开车库门，里面的救护车不见了，外面却停着几辆小汽车，车钥匙还在车上插着。万一什么人闯进来怎么办？他围着将军楼转了两圈，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保守秘密最重要。他把楼门锁上，然后回到办公室。晚上22时，他从办公室回家，又到将军楼转了一圈，里面还是无声无息。

9月15日19时30分，王兰义又按时去送报纸，看到小楼的一切仍同昨晚的一样：门还是他昨晚锁上的，一切都是昨天的场景。

楼里已两天没人了。王兰义考虑再三，于是决定进去看看。

拉开门，恶臭扑面而来。王兰义十分紧张，心想是不是死了人了？他经历过洛阳解放，那时死人成堆，来不及掩埋，所以他闻过那种令人难忘的死人味。他赶紧打开灯，先找臭味出自哪里？

屋里乱糟糟，食品架上放着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旁边还用红笔写着纸条：“请勿动。”正是大热天，鱼上面已经长了一两寸的毛，满屋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靠近门口，有几张零星的没有字的白纸。还堆着一些纸箱，里面装满水果和糖果，像是准备运走。

再往里走，原来厨房烧过纸，锅台上一堆纸灰，一边还散乱放着一些没有烧尽的空白笔记本。

他又到第二栋楼里，里边的纸灰更多，不仅伙房间的锅台上下堆满了纸灰，整个墙都黑了，其他房间也满地纸灰，纸灰堆里还扔着三个没有烧掉的避孕套……整个楼里像是被抢劫过一样，这种状况可是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过去人走楼空，屋里干干净净，这回搞什么名堂？

他再次回到前边的将军楼。一进门看见那个小厅中间的茶几上有几个本子，他第一次进来时就注意到了。当时因为只顾寻找臭味，

没有翻看。这回他拿起来小心打开,只见第一页写着:“‘五七一工程纪要”。目录一直写到页底,背面还有。字很正规,用黑墨水写的。他再翻,没了,白纸,还是白纸,其实这是活页,后面还有正文。王兰义认为这是军事战略工程、技术革新一类的记录。

在这个红色拉链本旁边,是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旁边还放着一个开着口的大包,像是要把这些本子装走。

王兰义立即锁上门回到办公室,向学院副政委王治松做了汇报,因为王治松和院政治处主任高文勇负责将军楼。王治松对王兰义说:

“我正在开会,你马上回去,叫接待小组去整理房间。”

王兰义领着接待小组来到将军楼,察看了一遍后刚开始打扫,王治松和高文勇就来了。王兰义又带着他们看了一圈,然后继续去收拾房间。

王治松和高文勇坐在客厅茶几周围一圈的沙发上,好奇地翻看茶几上的那个拉链本。王兰义回来,也坐到沙发上,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应该打个电话给空军司令部问问情况。于是他们打电话先找于新野,不在。又找程洪珍,还是不在。怎么谁也找不到了?最后他们终于找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他冷冷地说:“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王治松把红色拉链本放回原处,想想不妥:“丢了怎么办?”又将这个拉链本和报纸放在一起。他们将小汽车上的车钥匙拔了下来,放在茶几上,然后离开。此时,已经是半夜1时了。

天快亮时,王治松给王兰义打电话,叫他到将军楼去,把车钥匙放回车上,然后把这个拉链本子拿出来。

王兰义对王治松副政委说:“上级交代接待任务时曾说,空军司令部的人不在,小楼里面的东西不准动。”

这些情况,王治松副政委不知道。他听王兰义这么一说,也就没有再坚持,王兰义只是去把车钥匙又放回车上,没拿那个本子。

9月16日晚上,王兰义去空军司令部参加行政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以前开会,会前都是有说有笑,而这次谁都不吭声,熟人见面也不打招呼。原来,此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913事件”。这次会议规定,

派车要经过单位行政领导批准,要严格请假外出。

在空军学院办公大楼门口,王兰义看见政治处主任高文勇正在那里等他,一见面就对他说:“给你说个事,现在马上叫小牛把本子拿出来放起来。”

王兰义以为领导研究过了,所以没有再顶。高文勇特别强调:“你别去拿,叫小牛去,别开灯,让他拿来交给你。”

王兰义打电话让行政处的小牛去将军楼,将那个本子拿回来后交给他。并嘱咐,如果他不在,就交给处长张凡。王兰义和张凡“文革”中都是一派,关系比较好。

当王兰义回到办公室,张凡对他说:“小牛给你一袋东西。”

王兰义说:“我知道,你放在文件柜里吧。”然后就回家了。

当天晚上,张凡总值班,他给王兰义打电话:“北京卫戍区来了一个副司令员,带一个师长和一部分卫戍区部队,在我这,总理派他们来的,要看看小楼,怎么办?”

王兰义一听是周总理派来的人,就说:“去看吧,钥匙在小牛那里,叫小牛送去。”

卫戍区部队当天没有走,就住在将军楼前面的9号楼,两座将军楼开始由他们负责警卫。

10月1日国庆节那天,轮到王兰义总值班,张凡来电话说:“最近我老在想一个事,我看了一下那个本子,里面写的‘571’,是不是‘武装起义’?”

王兰义马上说:“你瞎说什么呀。”

张凡说:“王治松讲,谁让把本子拿出来的?谁拿谁负责。”

王兰义说:“怎么这么说?谁让拿?就是他最早让拿的,有什么了不起。”

接着,政治处主任高文勇也给王兰义打电话,叫他到办公室来一趟。

王兰义去后,高文勇对他说:“我考虑最大的事是那个‘本子’,那个‘本子’要出事。”

王兰义觉得没什么。

高文勇说:“我想,如果将来有人查问‘本子’,你就说你要拿的。

也别说我叫你拿的，也别说小牛进去拿的，也别说张凡保存过。”

高文勇又问：“现在本子在哪？”

王兰义说：“在张处长那里保管。”

高文勇说：“你去拿回来，就说你去拿，你保管。他们问，你一口咬定是你拿的，他们也没办法。”

王兰义很不高兴，嘴上说：“好吧。”但心里想：“怎么这样？到时再说。”

他去找张凡要那个本子，张凡也有点紧张，赶快给了他。王兰义原封不动地放在办公室的文件柜里。后来想想，文件柜没有锁，他的办公室战士都可以进，不保险。于是，把“本子”拿到他家，锁进皮箱里。

10月5日晚，李德生到空军学院传达中央5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国外的通知》，与会人员无不震惊，目瞪口呆……

“叛国”？“谋害”？“南逃”？王兰义懵了，哎呀，糟了！第一个感觉是半辈子没犯错误，这回陷进去了。听完报告，空军政委王辉球把处以上干部留下，点了王治松、高文勇等3人，让他们主动揭发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活动，没提到王兰义。

会后，王兰义马上向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详细汇报了接触将军楼以及拿那个拉链“本子”的过程。他从家里把本子取来交给殷古风，希望马上报告中央。

10月7日半夜，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和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叫王兰义到办公楼。小车就停在他家门口，直接把他送到空军大院。

10月8日19时30分，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叛国分子林立果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

接着，李德生收到驻空军总政工作组送来的这个笔记本。他看了王兰义交上来的笔记本后，为了弄清内情，立即派人提审李伟信，亲自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纪要》是怎么形成的？有哪些人参加策划？是干什么用的？

李伟信看了笔记本后交代说：

1971年2月12日,林彪、叶群带林立果来到苏州。

2月20日,林立果从苏州来到上海。第二天,2月21日,在于新野的陪同下,他们驱车直奔杭州。空5军政委陈励耘带着秘书处处长王明鑫,在几十里外的瓶窑迎接他们。随后,陈励耘在家中设宴欢迎林立果。饭后将林立果送到专为林彪修建的花家山别墅住宿。

此时,花家山别墅已初具规模,但尚未完工。陈励耘陪同林立果视察了建筑情况。那设计之精巧,用料之讲究,设备之先进,自不待言。因为林彪怕光、怕风、怕冷,还专门设计了室内大院,搞了彩色装饰,安装了新式空调。林立果感谢说:“全靠陈政委费心了!”

3月上旬,周宇驰从广州、江西转了一圈后来到杭州,在花家山别墅与陈励耘、林立果见面。

3月15日,林立果准备离开杭州,陈励耘把空5军各师干部和机关部分处长约20余人召集到花家山同林立果见面,并请林立果讲话。林立果夸赞了陈励耘一通后离开了会场。

3月18日下午13时,林立果离开花家山,陈励耘赶来送行,林立果指定于新野作为他与陈励耘的联络员。然后,林立果带着于新野、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副处长许秀绪从杭州来到上海。王维国派空4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接待。

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

“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周宇驰立即从北京来上海商议,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

“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子爵号”是一种英国飞机名称,这是林立果给叶群起的代号。

3月19日,林立果在上海约见江腾蛟。

江腾蛟是3月14日晚上,乘坐吴法宪派的安-24飞机到上海治病。他原任广州军区防空军政委。1957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他调到空4军当政委,降了半级。当时的空军司令刘亚楼对江腾蛟说:“不要看空4军只是一个军,它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实力比一些军区空军还大。”于是,江腾蛟高高兴兴去了空4军。

1964年,叶群在江苏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江腾蛟经常带着礼物去看望叶群。1965年1月,正在上海治病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让时任空4军政委的江腾蛟给林彪送材料,叶群领着他见了林彪。同年冬,林彪、叶群把女儿林立衡送到上海治病,托江腾蛟照顾。

1965年5月,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余立金升任空军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一职空缺。由于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人反对,江腾蛟没能当上南空政委。直到1967年,江腾蛟才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随后他就支持江苏反许世友的一派。

1967年许世友回到南京后,给毛泽东和军委写信,直言江腾蛟是南京地区反军乱军势力的“黑后台”和“黑手”。

1967年11月,江腾蛟到北京参加空军党委“三代会”,住在反帝路空军招待所。会议期间,林立果对他说,想要他当空军司令。

1968年2月,江腾蛟送材料到北京,在不到10天时间里,两次到毛家湾与林彪、叶群见面。并分别请林立果和叶群去吃涮羊肉。请叶群时,黄永胜夫妇也在座。叶群当着江腾蛟、黄永胜的面说:“谁要抓你们,赶快直接打电话给我,我马上派飞机接你们到北京来……”

江腾蛟到北京后,许世友的揭发材料也接二连三地到了北京。

1968年3月,南京空军机关一派群众提出要江腾蛟回南京接受群众批判。江腾蛟向叶群告急,叶群立即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没有林彪的命令,不准江腾蛟离开北京。”

1968年4月29日,中央军委改组了南京空军党委,免去江腾蛟南空政委的职务。聂凤智也免去了南空司令员,关押到广西鹿寨农场进行审查。

中央任命空军昆指的刘懋功为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此时刘懋功正在北京空军总医院住院治腿。他得了“血栓闭塞性静脉脉管炎”。

4月下旬的一天,吴法宪来到空军总医院亲自找刘懋功谈话,说南京空军党委班子垮掉了,政委江腾蛟、副政委王绍渊、政治部副主任高浩平都被抓起来了,司令员聂凤智已被打倒。现在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空领导班子,任命刘懋功为南京空军司令员兼党委书记,要他赶快到南京去把工作抓起来。

刘懋功说:“我现在腿还不行呀。”

吴法宪说：“到那里再治嘛。你只要去，哪怕在医院里指挥他们工作也行！”

吴法宪告诉刘懋功，到南京后，既要批江、王、高，又要批聂凤智。

空军总医院闻听刘懋功要出院，认为不妥，写了报告说明理由，要求空军党委让刘懋功继续治疗。但是，吴法宪没有批准这份报告。

就这样，刘懋功由空军总医院派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陪同他坐飞机到了南京。

刘懋功一到南京，才知道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地方的群众组织已经占领了南空机关，在机关院子里到处贴满了打倒江、王、高的大字报、大标语、漫画。南空机关工作已陷于半瘫痪状态。南京的军用机场也受到了影响，部队已不能进行飞行训练和作战值班了。

看到这种情况，刘懋功心里当然着急。他干脆也不住医院了，就住在机关招待所里。第二天，就去向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报到并请示工作。

许世友不了解刘懋功，听说他曾在韩先楚领导下工作过，就去问韩先楚。韩司令员向他简单介绍了刘懋功的情况。

许司令员跟刘懋功说了江腾蛟、王绍渊、高浩平在南京组织“倒许”情况。他说：“这三个家伙太坏了，他们到哪里，哪里就乱，一定要把他们从军队弄出去！”

不久，空9军政委于应龙调来南空任副政委。

第 1223 回：江腾蛟，效忠信追随林家 林立果，搞“舰队”活动频繁

1968 年 5 月，吴法宪想让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知道后明确指出：此人不能重用。空军只好任命江腾蛟为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党内职务可以不经毛泽东批准。

在此期间，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要他转告江腾蛟，问江腾蛟现在欠多少账，她可以拿出些钱来帮助江腾蛟还账。江腾蛟当然知道，这是叶群故作姿态，表示对他的继续支持。

1968 年 7 月，林立果通过亲信给江腾蛟传话：“告诉江政委，要他放心，不要怕，照常吃饭、睡觉。他们有嘴，我们也有嘴，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

江腾蛟立即于 7 月 2 日给林立果写了回信。他在信中写道：“立果同志，主任和你力主正义帮我多方讲公道话，极力保护，因此心里很扎（踏）实，这些是能够支持我生活和斗争的惟一力量，没有这一条就很难设想了。这是我对我们全家永生不能忘的大恩。……我对首长、对主任是忠实的，对你也是忠实的。过去、现在、将来也永远是忠实的。立果同志，苦思数日，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出我感激首长、主任和你的心，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教导我的，指点我的，保护我的是谁呢？是首长、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吗？能不天天念吗？”

1968 年 9 月，林立果叫周宇驰给江腾蛟送去人民币 300 元，说：“宁可我们苦一点，也要把他养起来。”

1968 年以后，江腾蛟给林家先后写了 20 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写道：“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没有别的，只有一条誓言，不管任何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

到 1969 年上半年，江腾蛟还是个闲人。1969 年 6 月 19 日，林彪

在家中接见了江腾蛟和他的妻子、孩子。林彪问了他妻子和孩子们的情况后，又问：“你现在干什么呀？”

江腾蛟赶快回答：“我现在还没有职务。在空军政治部帮助工作。”

“有职务没有职务一样干革命，不要看这个委员，那个委员，那是现象，将来还会变化的。”

这次接见时，叶群让江腾蛟帮林立果找对象。

1969年底，吴法宪向江腾蛟透露，要派他到西南地区抓航空工业，江腾蛟认为这是变相流放，非常着急，打电话到上海找林立果。林立果立即飞回北京。1970年1月初，林立果、王飞和江腾蛟一起在江腾蛟家商量对策，决定由江腾蛟给吴法宪写信，提出不能去西南的理由，要吴法宪将信转给林彪，然后由叶群出来给江腾蛟说话。叶群对吴法宪说：“江腾蛟身体不好，他不能去就别去了，让他休养治病吧。”

1970年3月，由林立果通过广州空军安排，江腾蛟全家到广州休养。江腾蛟在广州对广空参谋长顾同舟说：“我们都坐在一条船上，掌舵的是林立果，什么风浪都不怕。”

此时，正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林彪准备在大会上讲话。正在苏州的林彪，让随行的秘书于运深给留守北京的秘书张云生打电话，为他准备讲话的“条子”。于运深立即电话通知张云生：

“首长说，让你和李春生两个秘书和老虎组成一个调查研究小组，这个调研小组由张秘书牵头。研究的题目就是怎样搞好抓革命、促生产。首长强调拉条子前必须搞搞调查研究。要抓紧时间，争取早些搞出一个题目来。”

张云生问：“首长这个指示，主任知道吗？”

于运深说：“还没有报主任。”

张云生说：“不要报了。我可以和春生一起搞调研，但不要再牵上老虎，他愿意搞什么调研，那是他的事，如果再报主任，那是自找麻烦。如果主任再插手，我怎么应付？如果老虎不听我的，我怎么办？我能领导这只老虎吗？”

于运深说：“首长叫搞抓革命促生产的调研，总得报主任吧？”

“这个当然可以报，看主任怎么说。”

毛家湾内部人际关系复杂，名义上林彪至高无上，但实际上林彪“大撒手”，权利都在叶群手里。换句话说，林彪办公室是叶群当家。现在又多了个“老虎”，更难办了。于运深理解张云生的难处，也理解他想“保持一定距离”的想法。

张云生向正在北京的林立果通报了林彪指示，只说林彪让成立调查研究小组。林立果很快在空军党办成立了调研小组。

1970年5月2日晚，叶群特意安排林彪接见江腾蛟三个大孩子。当天晚上，林立果打电话给江腾蛟的孩子，并要他们把林彪接见他们的情况告诉他们的父亲。

江腾蛟听了孩子的电话，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

1970年6月30日，刚回到北京的江腾蛟和空4军政委王维国一起，与林立果、周宇驰游览八达岭。在长城上，年过半百的江腾蛟与王维国一边一个，架着只有26岁的林立果的胳膊，一步一步地往烽火台爬。年轻力壮的林立果在他俩的扶持下，昂首挺步，俨然一幅“头子”的派头。

从长城下来，他们又驱车去十三陵。途中，江腾蛟得意地说：“我们这也可以说是‘车上四结义’！”

1970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将3月成立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称之为“联合舰队”。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他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而周宇驰则是“舰队”的“总管”。林立果对他们的同伙说：“我们也是‘联合舰队’，大伙要有‘江田岛精神’。”每到外地活动，他就说这是“联合舰队”出航，进入一等战备。他自称是“旗舰”，称骨干分子是“主力舰”，许秀绪等人则称自己是“快艇”，“小驳船”。

“联合舰队”还分别在上海、广州建立“分舰队”，下属还设有小组。并以北京为基点，上海、广州、杭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

1970年12月，南京军区向中央写报告，要抓江腾蛟的“516”。江腾蛟很紧张，先是躲到湖南大托铺，在那里给林立果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信，叫秘书送往北京。新年时又躲到桂林，称自己政治上打倒，身

体也垮了，已经是无所作为的人了。直到1971年1月中旬，他才接到家属电话，转告林立果的话，说抓他“516”那件事，经过林立果做工作，已经没有问题了。江腾蛟这才离开桂林到了广州。

1970年4月，林立果曾让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从情报部和部队挑人成立“技术小组”，说是要“革新技术装备”。7月，林立果批示成立一个研究所，所里再成立一个小组，情报部技术侦察处副处长王永奎任组长。

王永奎是大学生出身，懂技术，为林立果修车，修录像机。雷达兵部技术勤务处副处长许秀绪也比较精干，技术不错，黄永胜、吴法宪经常叫他去修电器。林立果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等贵重电器都由他保管。林立果手里，进口的高级照相机就有十几架，其中有美国阿波罗登月用的同型号相机，有可变焦镜头，有体积小得可以戴在手上的台西婀牌微型照相机，有瑞典的哈沙背相机，有日本的尼康小型相机，勃朗尼卡反光相机，雅西卡电子快门相机，西德的莱兹反光相机等。有的不止一架。电视机五部，三部彩色，两部黑白。磁带录像机四部，立体声扩音机十多部，还有电热水器、电子防盗器、电动牙刷、电动刮胡刀等。

除了这一大堆电器的使用和修理，8月以后，林立果先后给王永奎下达了十几项技术任务。其中有：

研制超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直接文字显示，不用报务员，也不用翻译，可以防止泄密。这一技术成果受到林立果的高度重视，后来被列为“571工程”中的01工程。

研制电话保密机，林立果从日本进口一种“蜘蛛”（电话窃听器），只要靠近电话线，就能旁听通话内容。他把“蜘蛛”安放在叶群床下，窃听了叶群大量的生活隐秘。电话上还搞了增音机、录音机、喇叭以及自动拨号、自动问答等。

研制废纸处理机，因为就是烧掉，用照相的方法仍可以鉴别。

研制汽车晶体管点火装置、汽车防撞雷达装置、汽车自动喇叭等。

这些都是林立果从国外杂志上看到后布置的。

1970年7、8月间，林立果提出订阅国外技术情报资料，订了20多种，包括香港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9月，将空军办公室外事

秘书陈伦和调来，专门负责翻译。

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站岗放哨”，窃听、暗中监视等收集情报，想方设法探听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并大量搜集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913”后，从北京、广州等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的手抄情报。

1971年2月8日下午，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当时的会议记录如下：

舰队会议。

周（宇驰）：

一、讲报情况、掌握情况的问题：

1. 情报的重要性
2. 重要情况与非重要情报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
3. 死情况与和（活）情况，要活情况重要
4. 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不满足于等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
5. 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二、报情况：

简明、扼要，一语道破

随后，2月20日，林立果从苏州来到上海。21日去杭州。3月18日从杭州又回到上海。当晚交代于新野和李伟信“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3月19日，约见江腾蛟。

3月19日下午，江腾蛟来到林立果在上海的住处。林立果让他谈一谈对王维国、陈励耘和周建平的看法。

江腾蛟说：“王维国性格单纯、直爽，他除了你们，没有别的后台，这样的人最可靠。”

林立果认为江腾蛟看得比较透。

江腾蛟继续说：“周建平呢？他组织能力比王维国强，但思想有些右倾，在关键时刻容易摇摆。陈励耘与我个人私人关系不错，也有能力，但本质不如王维国好，在政治上与王维国也不一样，既可以坐你这条船，也可以坐上别人的船。”

林立果说：“江政委不愧为老领导，知人至深，不过，我们要多做陈励耘的工作。”

林立果知道陈励耘和王维国的关系很紧张。那是因为1971年春，陈励耘在杭州空军453医院住院，曾派医生到上海请专家会诊，并要10支白蛋白。当时白蛋白这种药只有上海市委常委一级的才有资格用。空军上海455医院政委答应给陈励耘白蛋白，但贵重药品需要王维国最后批准。

王维国没有批，并为此批评455医院政委说：“谁叫你答应的？”

结果，陈励耘派人来取药时，被王维国婉言推拒了，陈励耘对此当然是极为不满。于是在空5军，对王维国大兴“亲不亲，线上分”的讨伐。有一次，空4军党办秘书处处长袭著显和保卫处副处长唐剑鸣到杭州，陈励耘在刘庄接见他们时说：“你们回去对王维国讲：他拉拢南萍搞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你们就这么转告他！”

此时，林立果对江腾蛟说，他自己在杭州已经跟陈励耘做了他应该做的工作。并问江腾蛟：“你现在到上海来养病，趁这个机会也给他们做做工作，可不可以？”

江腾蛟说：“可以嘛。周建平那里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关键是陈励耘，最好用你的名义去请他，这样他就不好推了。对他的接待要高一些，要格外热情。”

其实，江腾蛟和王维国也有矛盾。过去叶群买一些进口药，江腾蛟都主动由空4军开支。王维国接任空4军政委后，空4军没有办法搞到买进口药需要的外汇，就将此事暂停了。江腾蛟让王维国到上海市革委会要外汇，王维国很为难。以前空4军对江腾蛟的一些补助也被王维国卡掉了，江腾蛟很有意见。而江腾蛟遥控空4军的那些处长，王维国也很不高兴。后来江腾蛟抓空4军的“选人小组”，不许王维国过问，王维国更不高兴。后来经过林立果解释，王维国才解开疙瘩。

江腾蛟、陈励耘、王维国和周建平也有矛盾。周建平原是空4军军长，1969年秋调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党委副书记。周建平上任后抓空4军、空5军。对此，王维国还无所谓，毕竟是老军长。陈励耘就不同了，他比较霸道，不乐意别人插手。而其中最不高兴的是江腾蛟，他说周建平到南空后向“右”靠了，认为周建平来到南空，自己说话就不灵了。于是他告诉空4军、空5军：“部队不能让周建平抓到手。”

南空以政治部主任胡立信、副参谋长牛润五为首的南空机关“左派”，自恃有江腾蛟为后台，攻击周建平“与刘、于靠得紧”，不支持“左派”。胡立信说：“我与他（周），在路线上有很大分歧，今后要同他斗争到底。”

“刘”是指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环。“于”是南空副政委于应龙。

而从新疆调来的南空副政委于应龙对周建平也不满意，在背后说：“周与我们貌合神离。”于应龙还在党委会上公开指责周建平：支持机关“左派”，拆他们的台。

周建平在南空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在空4军方面，空4军政委王维国为了消除周建平在空4军长期工作的影响，在上海巨鹿路，专门举办机关处以上干部的骨干学习班，公开要求大家旗帜鲜明地和周建平划清界限。江腾蛟的秘书张发云，在会上动员与会者，揭发周建平的问题。

1970年5月，林立果在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接见“骨干”，进行“路线交底”。王维国对军党委的人说：“周就是把林副部长当小孩子看待”。

军长郑长华说：“周手伸得太长，谁反对林副部长都不答应”。

王维国的妻子等人，则利用下部队宣讲“路线斗争”的机会，攻击周建平，“到南京后就变了，与刘、于靠得很紧，许世友还请他吃饭、喝酒”等等。

杭州空5军的陈励耘，则以空5军党委的名义，给南空和空军党委正式发电报，要周建平作出检讨。

到了7月，南空“左派”散布周建平是可用不可信的人。江腾蛟调几个人写材料，和牛润五一起给林立果写信，告周建平的状。说“周是假‘左派’，真‘右派’，不可信任”，周建平给许世友拜年了等等。林立果在材料上批了几句，“很有政治、很有策略、很有水平，我完全同意。”“完全同意江政委和左派同志们的意見”。

江腾蛟拿着林立果的批示作为“尚方宝剑”到上海发动揭发周建平。他对“上海小组”成员说：与周“生活上可以来往，政治上只能分道扬镳了”。

在此情况下,周建平不得不直接向空军党委表示:要求查清事实,做出组织结论,否则,无法工作。1970年夏,周建平到上海空军第三医院住院,治疗耳疾,时间长达数月之久。王维国派人盯着,看谁去看望周建平,每个人都要报告。

与此同时,南空机关派性斗争,还由于陈励耘通过胡立信;王维国通过牛润五的插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这时,正好已调北京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鲁珉回上海休假,林立果让他买些东西,代他去看周建平。鲁珉叫上王维国等一起吃了一顿饭,他们之间的矛盾才算有所解决。

第 1224 回：议形势，做武装起义准备 写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再说 1971 年 3 月 20 日，接到林立果通知的周宇驰来到上海。当天晚上，与林立果两人密谈，后来又把于新野叫去。第二天，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继续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商议，李伟信除中间有事离开过几次，一直守在门口，时而进去为他们添加开水，断断续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内容。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分析了形势。

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首长”是林立果他们对林彪的称谓。

研究了形势后，他们认为：“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林立果还说：“主席一贯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用这样的办法玩弄平衡。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

对于林彪接班问题，他们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二是被人抢班，三是提前抢班。

对和平过渡，周宇驰说：“5、6 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

林立果问：“5、6 年还接不上班呢？B-52 的身体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呢。即使 5、6 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

对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 3 年以后。”

林立果说：“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

于新野说：“那首长是主席自己树起来的。”

林立果说：“刘少奇不也是他立的。”

接着他们谈了上海《文汇报》3 月 16 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

《文汇报》3月16日刊登的文章题目是《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这篇文章确实是有所指的。两个多月前，1月6日早晨，上海兴国招待所，张春桥、姚文元准备吃早餐，看到餐桌上放着一份当天《文汇报》的大样，张春桥拿起来浏览了一遍，看到其中一篇题目为《路线、政权和世界观》的文章，署名是蔡康成，便和姚文元议了一下，觉得既然谈路线、政权、世界观，为什么不讲“九大”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呢？正好姚文元的秘书胡鼎君当时也在场。下午，张春桥、姚文元在中苏友谊厅开会商议上海市四届党代会的事情，胡鼎君把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写作组的王知常找去见姚文元，姚文元要王知常设法了解这篇文章的背景。

王知常回到办公室以后，找到一位原在空4军服役，复员后被分配到《文汇报》评论部工作的一位姓吴的工作人员，让他摸一下这篇文章的情况。此人服役期间曾参加过驻沪空军写作组，即空4军“卫东鹰写作组”。在此之前，他也曾从空4军拿到过林立果的那份《讲用报告》。这份报告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看到，只是听说有这回事，王知常让此人从空4军弄来了一份报告的油印稿上报给姚文元。这次让他去了解《路线、政权和世界观》一文的背景，他回来依然报告说，这篇文章与“卫东鹰”有关，是反映林立果讲用报告的精神。结果上海方面做出反应，徐景贤奉命指示《文汇报》用同样的版面和篇幅刊登批评文章。

其实，《路线、政权和世界观》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上海采程工程机械厂的工人程继尧，与林立果和“卫东鹰”没有任何关系。

3月16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方岩梁的文章《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批评《路线、政权和世界观》那篇文章。笔名方岩梁，是由毛泽东《和柳亚子先生》诗中的一句“风物长宜放眼量”最后3个字的谐音过来的。这个笔名是上海写作组文学组常用的，执笔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高义龙。

因为写作过程在写作组内部是公开的，结果那位《文汇报》评论部姓吴的工作人员又把与方岩梁文章有关的写作背景情况，捅给了空4军“卫东鹰”，于是就有了林立果3月21日与周宇驰、于新野分析形势时说的以上那一番话。

接着，林立果他们提出两个办法：一是把张春桥等这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二是直接对毛泽东动手，但是又考虑毛泽东的影响、威信这样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觉得尽可能不这样干。

周宇驰说：“当然一定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把张春桥叫去，把他们搞掉，就说他们与王、关、戚有关系，谋害主席，或者搞几个犯人替死。到那个时候，反正首长掌权，事后处理，首长是可以出来说话的。但是这样干，首长在政治上要付出很大代价。”

他们研究，“争取和平过渡，但是做好武装起义准备”。准备工作分两个方面，一是要有个计划，计划的代号想了好久，最后由林立果确定，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定名为“571工程”计划。二是要有个组织，即以培养干部为名，在空4军建立教导队。

林立果说：“让‘上海小组’带着教导队先把张、姚干掉，可由王维国请张、姚来，或叫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带领去张春桥家。”

林立果问李伟信：“张家是否是你们警卫处管？”

李伟信答：“不知道。”

林立果让他打听一下。后来，李伟信问过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得知张春桥家是由他们派人警卫和送日常用品，李伟信将情况告诉了林立果。

林立果又说：“干掉张、姚后，让王维国、陈励耘，必要时抽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形成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

林立果还说：“这些问题，这次去杭州与陈励耘商量了一下。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写。”

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

当天，3月21日，周宇驰去看江腾蛟，下午回北京。

于新野按照林立果的意图和他们商量的内容，于22日至24日写

出了《“571 工程”纪要》。《纪要》把当时的政局称之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 B - 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口号和纲领，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计划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手段“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准备“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3月24日晚上，林立果他们在上海巨鹿路空4军招待所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集会。林立果、周宇驰接见了以空4军政委王维国为首的“上海小组”的骨干。在接见时，周宇驰说：

“王政委的意见，有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一定要信任他。要做到王政委说白的，就是白的，说黑的，就是黑的，就是王政委说太阳从西边起来，也要相信！”

3月25日晚上，王维国和江腾蛟去看林立果，江腾蛟提出：“趁我们都在上海，把周建平、陈励耘都找来谈谈。”

恰在第二天，3月26日，周建平回上海搬家，他并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第二天，3月27日晚上，天很黑了，于新野来到他家，对他说：

“过去大家对你有不少意见，副部长知道了，他正在做工作。本来想先来看看你，但是不方便。准备同你谈谈，谈时希望你不要把大家对你的意见都端出来，事情过去了，就不谈了。”

从于新野的话中，周建平知道林立果来到上海，以为是来解决团结问题的。

3月28日晚，王维国拉着周建平去看林立果，江腾蛟也在场。

林立果说：“有人向中央告状，材料很多，要把江政委等人打成‘516’分子。当然要打倒江政委也不容易，但你们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假如江政委被打倒，南空的状况就要大翻个，可能出现‘杨余傅事件’以后那样的反复，甚至更加困难。”

江腾蛟说：“我打成‘516’，你周建平也不好过。”

3月31日下午，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按照林立果的吩咐，来到杭州453空军医院看望正在这里住院的陈励耘，对他说：“江政委在上海，想请你到上海去玩玩。”

陈励耘不想去，他在庐山会议上放了“炮”，沾了一身屎，不想再同

这些人打交道了，更不想去上海。于新野又搬出林立果，说：“林副部长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见了，大家谈谈。”

陈励耘还是不想去，推说有病去不了。

到了下午 15 时，于新野又来了，说：“政委该走了吧。他们都在等你啦。”

到这份儿上，陈励耘不好再推辞，只好准备启程。

下午快 17 时了。陈励耘带着秘书王明寇，同于新野坐着司机张金富开的车去上海。走到距上海还有 30 公里的闵行附近一条原来空军用的公路上，老远看到一堆人站在那里。驶近一看，竟是王维国夫妇二人和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岷的妻子武虹桥，及于新野的秘书和空 4 军的两个处长带着三辆车在此迎接。他们一看见陈励耘，热情得不得了。

王维国说：“我们是特地来接你的。”

说着就拉陈励耘上了他的车，一直开到上海岳阳路一栋僻静的小楼，这里原先是上海少年科技站，此时是空 4 军上海警卫处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招待所。这天招待所小楼门口加了双岗，戒备森严。当他们前呼后拥进了招待所，已是近晚上 21 时了。

王维国的态度怎么变了呢？原来是江腾蛟、李伟信他们分别做王维国的工作，对他说：“从杭州把陈励耘找来，解决一下你和陈的团结问题”，“陈来上海时，给他个好房子住，招待规格高一点，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

王维国知道他们转达的是林立果的意思，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做了安排。

23 时左右，王维国和陈励耘他们在餐厅用完晚饭后，有人说：“林副部长、江政委都来了。”

王维国随即领陈励耘上楼，只见江腾蛟、林立果两个人已在楼梯口迎接他们。大家在二楼会客室里坐下，江腾蛟首先说：“老陈，我们简直把你想死了，你怎么现在才来？”

陈励耘说：“我生病，来一次也难。”然后又说了些闲话，陈励耘接着就讲了“704 工程”，说：“这房子明年可基本完工，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去住都可以。”

林立果说：“陈政委，谢谢你。你们浙江办了这么件事情。本来林副主席在无锡有一幢房子，但是不能住，这是个黑窝。”意思是说这房子归上海警卫处管，是张春桥手下。接着，又问了许多房子的事情，设备、备战坑道、指挥所等方面的情况。

704工程是1970年4月在杭州为林彪修建的地下指挥所，位于西湖之西，现在龙井路与三台山路之间的丛林中，即现在的浙江宾馆内，地势比较隐蔽。整个工程分为地面、地下两部分。



704工程参观入口

地面部分主要由四幢别墅组成，散落于绿树之中，占地面积为307亩。



地面建筑图

一号楼供林彪使用,属面积最大的一座建筑,12000多平方米。



一号楼

二号楼为室内游泳池,其设施在当时居世界一流,装有大型空调和吸音板,以及自动循环过滤系统和自动出水控制系统,自动恒温装置等。

三号、四号楼为随从使用。

四栋楼的总面积为28452平方米。

以后704工程改扩建为浙江宾馆。

704工程的主体建筑在地下,它坐落在南北高峰之间,是一个独立的坑道式建筑。内有作战指挥室、通讯室、地下议事厅、储藏室、配电房等设施,其通道与出口的门都是由重达500公斤的各型防弹、防毒、防水钢门组成的,还设有一部专用电梯,直通林彪卧室,一旦遇有紧急情况,林彪可直接乘电梯快速进入地下室。

为防范有人进入地下室,在地下室通往林彪卧室的通道内,建了一段特殊的回音通道,一旦有外人进入这一通道,监听者可通过脚步回音马上发现来人。总而言之,这就是一个被喻为原子弹都无法摧毁的,当时比较先进的坑道形地下军事指挥所。



地下工程图



上左、上中：防爆门和防火门；上右：
配电间；下右：通风设施

接着，陈励耘又汇报了飞机改装的事情。他说：“飞机报废的炮改装后可以防空，可以平射，效果很好，我们已改装了一门。”

遂后，他又讲了空5军为应对空降、机降研究的几个方案，组织了战备营等等。

扯了一阵子后，有人说到了庐山会议。林立果说：“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双方阵营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陈励耘说：“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

林立果说：“现在军队的日子不好过，黄总长他们日子也不好过。”

陈励耘：“我无非讲了张春桥几句，现在跑不掉了。”

林立果：“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

陈励耘接过林立果的话说：“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要想这样搞也不敢。”

林立果说：“将来主席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

这时，江腾蛟一拍大腿说：“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

林立果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是武装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形式。”

林立果突然冒出来这句话让陈励耘感到吃惊，不敢再往下接，生怕再踩“地雷”。

此时已近次日凌晨1时，江腾蛟忽然提出：“是不是把周建平找来？”

第1225回：空四军，开“三国四方会议” “很重要”，此《纪要》“必须下发”

3月31日晚上，周建平接到电话，叫他不要出去，林立果要找他谈一谈。到0点时分，他看还没人来找，就睡了。4月1日凌晨2时，有人来接他，是空4军军务处处长蒋国璋。他刚学的开车，技术不行，黑灯瞎火还走错了路。直到凌晨3时多，才将周建平从远在江湾的空4军军部接到徐家汇附近的上海少年科技站。

周建平走进二楼的客厅，只见屋里烟雾缭绕，瓜子壳和果皮满地都是，临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面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林立果、王维国，背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江腾蛟和陈励耘，陈励耘嘴里还含着一块糖。

寒暄之后，林立果对大家说：“我有点事情回去一下，办完了再来，你们先谈谈情况吧。”他让周建平介绍一下南京军区空军贯彻空军为解决南空问题办学习班的情况，即下楼去了。

由于当时南空两派闹得厉害，吴法宪就在北京为南空办学习班，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周建平跟大家说了南空机关在北京办学习班的情况，并说学习班后，两派矛盾并没有解决，对立情绪远没有缓和。他还介绍了南京市地方清查“5.16”的情况。

谈了一个来小时，林立果还没回来。江腾蛟就说：“‘南空党代会’的事不是要谈一谈吗？”

周建平又讲了南空党代会筹备情况。空4军、空5军是重头，这两个军的代表团至关重要，如果他们的观点不一致，党代会肯定开不下去。周建平希望他们能够顾全大局，搞好团结，开好党代会，并让陈励耘、王维国讲讲他们的意见。

陈励耘首先讲了五点意见：一、要高举团结大旗，不能让对立面把这个旗子拿走；二、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把要说的话讲完；三、上届党委所做的工作报告要通过；四、上届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与常委都要

选上,不能落选;五、要保证会议开完,不能中途夭折。

王维国表示同意陈励耘的意见。

江腾蛟说:“有什么事情不要乱来,在上海听老王的,在杭州听老陈的,在南京听老周的。”

林立果回来时已经快天亮了,他一进来就问:“你们在干什么?”

江腾蛟说:“谈‘南空党代会’。我们谈完了,请副部长指示。”

林立果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抓好部队;第二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可以允许有不同的做法;第三团结。

最后谈了空4军准备成立教导队的事情,王维国说按照林立果提出的条件,挑选的学员基本上选齐了。

团结问题似乎都谈开了,也解决了。这时,王维国下楼去看早餐准备得怎么样了,并且看看给陈励耘准备的酒怎么样,因为陈励耘和王维国见面后向他要酒喝。从伙房出来,他又去餐厅看看,在那里碰上了李伟信。李伟信对他说了吃饭时座位的安排情况:林立果坐在桌子对准门的正面,江腾蛟坐在林立果左边,陈励耘坐在林立果右边,王维国和周建平坐在林立果对面。

凌晨4时,大家围到了餐桌旁。餐厅不断传来嘈杂的碰杯声和祝酒声:

“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江腾蛟乘着酒兴大声说道:“我们都是属羊,头上长角的!”

林立果掀开衣服,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

5时许,他们离开酒席。快分手了,江腾蛟忽然说:

“今天我们也是开了一个‘三国四方会议’。”

陈励耘没明白,忙问:“什么‘三国四方会议’?”

江腾蛟说:“周是南空,你是5军,王是4军,我们也是一方嘛。”

这时林立果说:“大家就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来了,就负责南京左派吧。王政委就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还有你们的老政委在这儿,他来拉总协调,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多找老政委商量。”

江腾蛟说:“我只能当当参谋。”

林立果首先离开餐厅。临走时,他对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等人的挥手说:

“再见，祝胜利会师！”

空4军军务处处长蒋国璋看见王维国出来时低着个脑袋，就问李伟信：“王政委怎么好像不高兴？”

李伟信说：“副部长批评他了。要开‘南空党代会’了，如果在会上大家意见不统一，斗起来，就不好办了，所以把他们找来。”

对这次上海少年科技站的见面，程洪珍在日记上作了记载：

会谈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

团结的气氛比较好，介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认识。

(1) 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

(2) 加速我们的准备

(3) 组织上明确了：

三点，每点的头都

上海——王

杭州——陈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进行定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没授于指挥权

4月10日，林立果离开上海回北京。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立果天天召集开会，研究对策。他估计会议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一般地谈一下，出不了大问题；整倒军委办事组；整倒首长（林彪）。我们希望是第一种情况，但要做好第三种情况的准备。”

他说：“首长和主任同意我的看法。”

从直升机上缴获的于新野工作日记记载，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在4月23日晚上开会，对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形势进行分析：“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

4月26日，于新野到上海，对“上海小组”强调绝对保密，失密牵动大局，牵动整个斗争形势，把保密作为对林立果态度的实际表现。

7月下旬，林立果和刘沛丰乘专机到北戴河。接着带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等人到广东深圳、尖沙嘴一带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察看了九龙的地形。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航测了香港及周围的地形。周宇驰拿到了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林立果说：

“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遥控指挥。”

7月30日,林立果等人回到北京。31日,由王飞出面布置,在空直机关一些单位搞了纪念林立果“讲用报告”一周年活动。

8月1日凌晨零点至两点,在北京西郊机场“工字房”秘密据点里,召开了“联合舰队”成员会议。林立果总结了一年来的情况。周宇驰在会上吹捧林立果是“党和国家最好的接班人”,是“领袖”,要大家“进一步抓好部队”。周宇驰强调要注意隐蔽,不要暴露,不当叛徒,准备流血牺牲。

8月1日上午,林立果又和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人乘云雀直升机来到天津河西区尖山路10号,原《河北日报》所在地,此时这里是北京军区空军高炮2师师部,老百姓习惯把它叫做“天津空军大院”。

直升飞机的到来轰动了“天津空军大院”周围的市民。因为只有战争年代或是救灾的非常时期,城区才可能见到直升飞机。这次是从哪儿来的飞机?来干什么?这里的居民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与“空军大院”一墙之隔的是天津警备区。此时,警备区已经有不少人聚在楼上,观看飞机的降落。他们感到好奇和疑惑,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呀。

陆军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空军的人同样也不知道。直升机的到来只有炮2师的几位领导知道。几天前,他们被告知:中央领导要来。可中央领导是谁?他们也不知道,这种严格的纪律,是谁也不能问的。但在领导层里,有一个人知道这次来的领导是林立果。这个人就是师政委张彪,原空4军文化处处长,1966年10月9日上海那次“神秘抄家”的带队人。

飞机仍在盘旋,越来越低,声音也越来越大。往日喧闹的空军大院篮球场此时空无一人,直升机稳稳地停在了球场上,张彪率领全师领导已一字列队迎候了。

舱门打开,从直升机里走下来几个人。大家一看,并不是中央领导,而是与大家一样穿绿衣篮裤空军的人。张彪迈着跛腿,一拐一拐地迎上前去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

林立果等人被迎进办公楼会议室,师部专门从卫生队调来4位漂亮的医生和护士当女招待,端上龙井茶。林立果他们没有喝,而是叫

人从飞机上搬来了北冰洋牌汽水。

张彪向大家介绍了林立果等人后，林立果简单地问了问了部队的近况，包括训练，思想，战备，有哪些问题。

会议室的气氛显得严肃而特别，或许，在这个特殊人物面前，谁也不好多说什么。唯有张彪显得轻松自如，他开玩笑说：

“立果同志，我们离得这么近，你可是第一次来呵。要是再不来，我都不认识你长什么样了。”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瞧你说的”。林立果一边笑，一边顺手拿过一瓶北冰洋汽水喝了一口。

张彪见气氛有些轻松起来，接着又说：“这一次，我的保密工作可是做到了最后一分钟呵。不信你问问大家，是不是谁也不知道来的是哪位神仙啊？”

场上又是一阵笑声。

玩笑过后，切入正题。张彪把空2师的主要情况，言简意赅地向林立果他们作了汇报，林立果不住地点头。

张彪汇报完，林立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对该师的工作表示满意，也表扬了在座的各位。接着特别强调了四个一定：一定要加强战备观念。一定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定要听招呼，一定要在关键时刻拉得出，过得硬，打得赢。

林立果说完，张彪看看表说：“也快要到饭点了，立果同志刚到，很辛苦，还是稍事休息，今天就到这里。”

林立果用手示意。大家也就起立，分别一一握手离去。

师领导一干人走后，张彪把林立果几个人请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又谈了半个小时。吃完饭，林立果他们就离开了天津。

8月4日上午，周宇驰驾驶云雀761号飞机去了北戴河，在那里检查了直升飞机机场，就是第1213回林立衡向张宏提到的那个“东山秘密机场”，张宏说的“土机场”。8月4日下午，周宇驰返回北京。

8月5日，于新野派人去北戴河，送给林立果一套电话机、增音机、保密机，作为北戴河林彪住宅与北京“联合舰队”的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的“值班电话”。

8月8日上午，程洪珍和空军司令部汽车队队长王琢乘“安2-

12”型飞机，将两辆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在海里进行驾驶训练。

8月26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前一天，林立果召集小“联合舰队”开了一次“整风”会议。会议记录如下：

成绩很大。

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

由明争转入暗斗

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

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

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

“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

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

过双重组织生活

学习问题，搞政治的要学一点技术，搞技术的也要学政治

不能搞私心杂念，不能搞个人主义。要有共产主义思想、精神、风格，“舰队”是战无不胜的，但“舰队”成员是不是能一直跟着前进。不能吃老本，不断立新功。

要有“欠帐感”。

要很严肃、很朴实、

这份记录，是于新野手记，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至此，林立果和他的“联合舰队”在“913事件”前的活动基本轮廓都出来了。

李伟信的这些交代证实了《“571工程”纪要》确实是林彪策划反革命政变的纲领。后来又通过程洪珍、刘世英识别，并同于新野的其他笔迹对照，可以肯定，空军学院王兰义发现的那个笔记本就是于新野的原稿。

李德生立即将《“571工程”纪要》和李伟信的交代，以“特急绝密件”报送周恩来。

周恩来看了李德生送来的《“571工程”纪要》和李伟信的交代，当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立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阅”。当

时,纪登奎认为《571 工程纪要》里面很多是骂毛泽东的,不能印发。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很快,空军学院接到指示:“要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空军“五人小组”找王兰义谈话,说:“总理打电话来,总理看到了那个‘本子’,叫我们找你谈一谈。相信你,叫你放心,不要有顾虑。交上来是个好事,你马上写个材料,怎么发现的,怎么保存的。”

空军政委王辉球问王兰义什么职务,王兰义说:“我是行政处副处长。”

王辉球说:“什么行政处?他们自己搞的。”

王兰义没有反驳,但心里很不满意,“怎么是‘自己搞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宣布的嘛。”

空军“五人小组”让王兰义马上回去写。

王兰义回到办公室已是凌晨 2 时了,他没有回家,就在办公室一直写到清晨 8 时。

10 月,关押在上海“材料组”的空 4 军军务处处长蒋国璋也主动写出了他们曾经计划谋害毛主席,搞政变,另立中央的材料,有十几页。负责“材料组”工作的上海革委会常委戴立清听了汇报大吃一惊,不太相信会有这样的事,问负责审查蒋国璋的老干部成波:“你们会不会是搞逼供信或者诱供啦?”

成波说:“绝对没有,只是对他们讲政策。我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

戴立清看了蒋国璋写的交代材料,非常吃惊,马上原封向上报送:一份由中央机要直送周恩来;一份由汪洋直送王洪文;一份由机要直送许世友。

第 1226 回：支撑病体，毛泽东见塞拉西基辛格，第二次来到中国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离日趋衰老的自然规律。1970 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就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睡眠很不好，经常出现低烧和咳嗽，浑身乏力和小便减少等病情，这也是从前不曾有过的。经过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毛泽东是染上了肺炎，但仍需用 X 光透视检查，方可最后确诊。

毕竟年事日高。“913 事件”对毛泽东是一个沉重打击，半个月中，他一下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尽管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持了，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9 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出现缺氧昏迷。

10 月 6 日，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来华访问。

10 月 8 日下午，毛泽东勉强支撑病体，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周恩来、姬鹏飞、吴德、萧劲光等在座。谈到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合作前景时，毛泽东说：

“非洲国家中，除了少数跟着帝国主义跑的国家，多数国家都可以往来，都可以合作，可以做朋友。”

塞拉西希望毛泽东能到埃塞俄比亚访问，毛泽东说：

“这一点恐怕有困难，会让你失望。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了，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

毛泽东说：“非洲朋友我见了不少。我感觉在跟各国人民往来中间，政府领导人还是非洲人比较好谈一点。非洲人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不那么骄傲。西方人、俄国人可是了不起了。接触你们，不要警戒。”

毛泽东说：“美国有两个党，共和党比较好一点，其好处之一就是反共，而且公开地反，不留余地。为什么比较好呢？教育世界人民嘛！民主党跟我们谈了十来年不接触实质问题，而共和党只有两年就接触了实质问题。”

“我欢迎尼克松来。尼克松来，我要跟他说：这个帝国主义就是不好，应该打倒。至于打，你们国家如果有帝国主义，由你们那里的人民打，别的国家的帝国主义，由别的国家的人民去打。”

12日，周恩来陪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去广州，派李先念和华国锋先行，做准备工作。他们二人到了广州，自知责任重大，凡是周恩来要去的地方，他们都到现场一一检查，同时督促、帮助广州军区进行清查，凡是林彪集团活动的据点，他们都实地查看。为此，二人专门到白云机场看了为林立果修的别墅。

别墅伪装得很好，建在绿荫深处，从远处看不出此地有房屋。门口有个踏板，只要一踏上踏板，报警器就会发出警报。楼里有可以接收香港电视的天线。林立果将电器设备放在地下室。现场没有破坏，都已拍照。民航局的宾馆也是林立果的据点。

周恩来12日到广州，和李先念、华国锋一起住在东山小岛。奉周恩来之命，李先念和华国锋召开了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会议扩大到军级干部。

12日、13日两天，周恩来在广州两次听取广州军区负责人关于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汇报。

周恩来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谈了林彪叛逃后的一些情况，并允许与会者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递条子。

周恩来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打乱了林彪一伙的政变部署。在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他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说：‘要注意林彪坐飞机离开北京，不要让他走。现在他手里的王牌就是空军，空军的整个指挥权不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撤换吴法宪。今后，空军的调动要直接由你和吴法宪、黄永胜联合下令，并报告我知道。’听了这话，我就知道毛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这天晚上，我得到了林彪已经在山海关机场调动了一架256专机。我分别向吴法宪、李作鹏和黄永胜了解此事，他们都证实有这回事，但是不知道林彪调用这架专机的用途。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事件，我请示了毛主席，决定启动这架飞机必须要有我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联合同意下令，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行。这就是说：毛主席决定要对林彪动手了。这点，林彪的估计是不错的。但是怎样动手是另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把他抓起

来。林彪、叶群他们早安排好了，一旦需要的时候就组织力量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这些人接到指定的地点，进行政变。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等。林立果、刘沛丰等还串到广东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他们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查看了九龙的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了，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但是，我没有想到李作鹏竟然对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传达命令时，篡改了我的指示内容，把四人联合下令改为四人中的任何一人下令都可放行。这就说明了他是有准备的，他不知道林彪的反革命计划才有鬼呢！特别是当林彪逃跑的时候，李作鹏已经得到了林彪一伙逃跑的报告，他不去采取任何的措施，反而让机场的人直接向我报告，这不等于故意放虎归山吗？毛主席得到了李作鹏的这些表现后，对我说：‘看来这个李作鹏也是不可救药了，他和那几个大将是一模一样的人，你们要注意和警惕呀！’这样，他就把自己和林彪完全、彻底地捆到一起了！”

当周恩来讲到林彪座机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时，有的干部怀疑“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

周恩来看完条子后，非常严肃认真地说：“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座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写上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嘛！”

周恩来说的很激动，很合情理，台下先是鸦雀无声，继而是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表示信服。

稍停了一会儿，周恩来又继续说：“当然，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是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

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要致林彪于死地呢?”

他自责地说:“‘萧何月夜追韩信’还追回来了,可惜啊,我周恩来没能把林彪追回来……”

13日晚,周恩来离开广州回北京。华国锋、李先念搬到南湖宾馆,继续召开广州军区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是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第二是表态。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和李先念按计划坐火车北上。华国锋回湖南,李先念去湖北,分别向两个省的党政军干部传达“913”事件经过及中央的精神。传达完毕,两人如约在郑州会合,向河南省党政军干部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传达中央决定。

1971年7月基辛格首次访华时,还没有考虑为尼克松访华发表公报的事。当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了他第一次访华情况后,两人得出共识,需要发表一个“联合公报”,以显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

10月16日,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基辛格坐上了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主要任务是与中方共同起草公报稿,同时具体讨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事项,包括访华时间、在华行程安排、双方磋商谈判等问题。基辛格自定这次访华行动的代号为“波罗二号”。他已不再像上次访华是秘密的,这次是公开的、大摇大摆的,随行人员相当于尼克松访华的全部人马。飞行路线按照总统访问预定的路线试飞,中途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这样可以使总统一行在到达中国时不致由于时差和高速飞行的不适而过分疲劳。

虽说基辛格与周恩来已有过17个小时的会谈经历,中国对他也不再“神秘”。但是,当“空军一号”即将进入中国境内的时候,基辛格内心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预感。

10月17日,周恩来召集中国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拟出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接待方案,安排中美双方的对口会谈和活动计划。并将方案报毛泽东审阅。

10月19日,毛泽东对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接待方案做出批示:“基本同意,某些地方可能要在会谈中临时修改。”

10月20日上午,基辛格一行飞抵上海。在机场迎接的只有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等4人和上海外办的两位代表。在上海稍事停

留，当天中午，基辛格飞抵北京机场。迎接他的还是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几位高级官员，只增加了姬鹏飞代理外长。基辛格等人感到有些受到了冷遇。这次访问已公开宣布，但欢迎场面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热烈。

基辛格坐上大红旗轿车，直驶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

透过车窗，基辛格发现，沿途断绝了交通，布满了警卫，还有几处写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标语。

尽管这次访问是公开宣布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的安排”，但是，接待人员与来欢迎的官员基本上与上次一样。基辛格仍然住在钓鱼台的5号楼。

当他们进入国宾馆5号楼的住房时，每个房间里都放有一份英文的电讯稿，上面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

基辛格感到非常不快和担心，他甚至怀疑起沃尔特斯从巴黎渠道传过来的消息是否准确。但基辛格毕竟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他当即令人把所有房间的英文电讯稿收集起来，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助理霍尔德里奇拿着一叠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找到了接待组负责联络的人员，指着英文电讯稿封面上的印的“毛主席语录”，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联络人员一看，那段语录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霍尔德里奇说：“这是从我们个人的住房里搜集到的，这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些房间里的。我们希望这些新闻稿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房间里。”

周恩来听到摆放英文电讯稿一事，非常生气。他当即查问外交部礼宾司的负责人：“为什么摆放这样的东西？”

礼宾司负责人说：“这是新华社历来的规矩。”

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他们不也是天天在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也算是在空对空吧。”

后来，周恩来明确交代，以后所有报刊、杂志均放在走廊，由外宾自愿选择提取。

当天下午 16 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一行全体人员，在会议室门口合影留念，请大家坐下来喝绿茶，并且对美方每一个人都说几句欢迎的话。

周恩来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就像老朋友似的说出基辛格的随员各自的学历和经历，并谈笑风生地赞扬他们的来访增进了两国友谊。轮到国务院詹金斯时，周恩来对他说：“你 22 年前就在中国居住过，对中国很了解，是中国的老朋友了。”詹金斯听后非常感动。

随后双方顺利地就会谈议程和方式作了满意的商定。

周恩来给基辛格谈起了“放空炮”的比喻。基辛格开初还不太懂“放空炮”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有些宣传口号是“放空炮”，而没有实际行动。应该注意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言辞。“当然，也不是什么事都放空炮，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基辛格对中国的这种奥妙的宣传辩证法还是似懂非懂。

会见后，周恩来设宴招待全体来宾，并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他说：

“中美两国关系中断 22 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页。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

接着，周恩来很自然风趣地引出了基辛格上次说中国是“神秘的国土”这句话，并赞扬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的“神秘的国土”，是件了不起的事。

周恩来笑着说：“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听到这里，基辛格不好意思地笑了。

周恩来接着说：“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取得积极的成果。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

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

周恩来这番祝酒词不是一个正式的发言，完全是即兴的。基辛格一行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宴会快要结束时，周恩来潇洒地端着酒杯，特地绕宴会厅一周，同每位客人，包括秘书、警卫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碰杯。至此，基辛格等人刚下飞机时受到的冷遇感烟消云散。

晚上 22 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等开会。当大家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一见到熊向晖，就笑眯眯地问他：

“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

熊向晖也笑着说：“主席问我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呀！”

毛泽东打趣地问：“现在知道了吧？”

熊向晖说：“现在当然知道了。”

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什么也没嗅出来，是不是伤风了，感冒了？”

他又连连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还念了唐朝杜牧的诗：

“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老人家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当时正在召开的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而这届联大涉及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的问题。毛泽东问：

“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什么尼克松让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北京？”

叶剑英说：“大概他认为美国的两个提案稳操胜券。”

毛泽东说：“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第 1227 回：未曾想，公报草案分歧大 格式新，双方初步达共识

10月21日晚，基辛格一行来到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出席专门为招待他们举行的文艺晚会。以好客著称的中国观众并没有像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宾那样，起立鼓掌表示欢迎。美国人的确想象不到，小礼堂里的看客总共500人，除了他们以外，所有的人都经过选择的。其中来自外交部的人员150名，来自中央警卫团的警卫人员100名，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50名，有关单位人员100余人。除了美国人以外，没有其他国家的外宾。

所有看节目的中国人，在基辛格等到华前一天就被打了招呼，21日出席文艺晚会的美国人，有别于以往意义上的国宾，他们入场时，不起立、不鼓掌，只在中间休息和最后谢幕时，给演出者鼓掌；在看演出的过程中，不得交头接耳、唧唧喳喳。

10月21日、22日，周恩来等人同基辛格进行了三次会谈。

会谈一开始，为活跃气氛，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来华初次会谈时念稿子的窘态，风趣地说：“按照惯例，我还是请你先说。我准备听你讲写出来的这么一大堆材料。”

基辛格自谦地说：“当时我自己感到很惭愧，很别扭……”

未等基辛格说完，周恩来就摇了摇手制止说：“不，不，你头一次来嘛，必须要有一个准备好的看法嘛！”

基辛格说：“总理没笔记讲话，比我有笔记讲话更流畅。”

周恩来客气地笑了笑：“不见得，不要夸奖喽。”

接着，基辛格提出尼克松访华日期在1972年2月21日或3月16日均可。周恩来选定了2月21日。

10月23日，基辛格一行人轻松地在主人陪同下，去尼克松将要参观的地方游览，上午去长城和十三陵，下午去颐和园。

当晚21时，周恩来等同基辛格进行会谈。22时20分，毛泽东在

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基辛格没有料到,这次访问北京最富戏剧化的就是讨论公报草案了。他在来华之前,早已和助手们绞尽脑汁准备了一份中美联合公报草案,经过尼克松审阅和批准。

这份公报草案包括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等四个部分,是按国际惯例起草的,长约3000字。他们非常得意自己的这份“杰作”。

谁知周恩来看了美方起草的草案后,很不满意,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他指示外交部章文晋和总参二部的熊向晖另外起草草案,并提议:参照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草案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将中美双方的观点并列。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各说各的好。

10月24日10时40分,周恩来来到钓鱼台,与基辛格讨论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报。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表示:在“基本原则”部分,美方同意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这一部分是十分可取的,中方赞同。

在“对世界形势的看法”部分,虽然内容多取自周恩来与基辛格7月会谈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和观点,但美方把一些重大分歧一带而过,主要是讲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点”。对此,周恩来表示反对,他说:

“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没有马上说话,与助手们交换了眼光,显出不悦。他本来想用一种轻松谈笑的口气开始这次谈判的,遇到周恩来口气坚定的表态,他的口气也转向坚定:“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并不退让:“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

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霍尔德里奇很不服气：“我方拟的公报初稿，难道就一无是处？”

周恩来严肃而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斯迈泽说：“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

周恩来说：“我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

此时，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20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周恩来微笑着扫了大家一眼，说，“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

中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完全打破了老一套格调，十分新奇。在草案的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情况。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中国方面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美方部分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自己写。第二部分吸取双方共同点明确了建立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第四部分写明改善双边关系的某些具体建议。

吃完烤鸭，又一轮会谈开始。周恩来让姬鹏飞代外长念了中方起草的公报草案。然后笑着说：

“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了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听了中方的公报草案，大吃一惊。他代表美国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跟苏联人、越南人的谈判，还没有碰到过周恩来这样的对手，也从未遇到过这样一种谈判方式。

此时，基辛格的助手们都面面相觑。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交出的公报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十分鲜明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是寸步不让的。

基辛格沉默了一会，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

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在美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结束之时,列举双方这么多的不同观点,这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

周恩来指出:“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众所周知,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既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

基辛格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意义?”

周恩来坚持说:“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基辛格脑筋转得很快,口气有所松动:“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周恩来敏锐抓住基辛格的话头,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么?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好吗?”

休会的时候,基辛格和助手们来到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离开住房说话当然是为了保密。

“按中国人的方案,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双方在公报上一一列举那些严重的分歧。”斯迈泽说。

“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霍尔德里奇说,“观点是那么针锋相对,总统来访还有什么意义?”

洛德说:“从周恩来的口气来看,中国人是不会再后退了。”

他们都骤然感到心情沉重。

沉默,沉重的沉默。秋虫的鸣叫听得特别清晰。远处似乎传来蒸汽火车头长鸣的汽笛声。

洛德有些沮丧:“我们花了多少心血搞的初稿,等于扔进了垃圾堆。”

大家都望着基辛格。基辛格时而低垂脑袋,时而仰望深远的天空,来回地踱着步子。去停在北京机场的“空军一号”座机上用电讯请示尼克松总统么?不。他想着又摇摇头。总统已经授权他在北京可

以拍板。他的思路善于逆转。他转而一想，禁不住随着思路脱口而出：

“公开地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与朋友放心么？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

年轻的洛德也马上开窍了：“对了，正因为我们公开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那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可信。”

基辛格嘴角露出了笑容：“也许用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能够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妙的地方。”

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方愿意接受他的初稿的基本做法。在接受中方提的初稿基础上，基辛格提出了一些补充，说：

“公报中表述不同观点的文字必须互相适应。我觉得，中国的某些提法表达方式过于僵硬，而难以接受，对于你们报纸上常用的那种火药味很浓的提法，那种好像是审判我们或是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总统是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

他一再说：“美国总统跑 16 万英里到中国来，不是为了共同发表一些高调谴责自己的词句。”

周恩来很高兴地说：“我们所用的词句中确有令人为难之处。我们不是在做交易，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须改得叫我同意。”

基辛格答应第二天，也就是 25 日上午提出美方的草案。

10 月 24 日下午 17 时 30 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夜已经相当深了，基辛格和洛德没有休息。先由洛德马不停蹄地改写中方的草案，基辛格先睡觉。然后洛德把基辛格叫醒，接着进行修改。洛德去睡一会儿觉。他们觉得表明中国立场的那部分文字过于僵化，想努力修改得温和一些；他们也特别选择温和的措词来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刚刚动笔修改了一会儿，天就已经亮了。

公报的特殊格式确定后，双方进入实质内容的谈判。

台湾问题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1971 年 7 月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曾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几项重要承诺，包括美国今后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运动，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印支战争

结束后先从台湾撤走三分之二美军，随后再撤出其余美军。但是美方不愿把这些口头承诺写进公报里。基辛格表示，“不是我们说过的问题都能写出来”。在美方起草的公报里，美方只说要“逐步减少”在台湾的美军，而且还要以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为条件。

周恩来明确告诉基辛格，美方必须声明四点：1、只有一个中国；2、鼓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一内政问题；3、美国不进行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4、要全部撤走美国军事力量，美军撤走可分步骤进行，不一定马上都撤，但上述四点立场必须表明出来。

由于美方未能满足这一要求，台湾问题未达成协议，双方商定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继续讨论。

10月25日下午14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同基辛格谈判情况的报告以及美方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和中方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16时，报送同基辛格谈判进展情况报告和中方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第二稿。周恩来还说：“请主席审阅后约我们一谈，以便再同美方见面。”毛泽东圈阅。

从10月20日下午16时30分开始到26日上午8时许，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博士的会谈举行了10次，共计23小时40分。周恩来与基辛格第10次会谈是26日清晨5时30分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开始的。他们之间的这最后一次会谈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至上午8时才告结束，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使命也告结束。

周恩来与基辛格告别。送到宾馆门口时，周恩来第一次用英语对基辛格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周恩来走后，叶剑英、熊向晖与基辛格一行共进早餐，然后分乘汽车送基辛格一行到首都机场。

基辛格离开钓鱼台时，将放在那里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电讯都拿走了，拿了一大堆。没多久，北京很多地方又换了名字，“反帝医院”在后来尼克松参观时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地安门大街。

基辛格乘坐的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先到上海，然后从上海返回美国。飞机起飞不久，机场报告叶剑英说：外交部值班室来电话，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

叶剑英说：“刚才基辛格在汽车里还对我讲，美国的两个提案肯定能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等一年。美国总统专机配备最先进的通讯器材，基辛格这时也一定会知道这个消息，不知他作何感想？”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刚刚起飞，电传打字机就传来消息：他们在联合国保持台湾席位的那场战斗打输了。

新华社 10 月 26 日报道：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的基辛格博士一行 14 人结束了同中国政府的会谈，于今天离开北京途经上海回国。到机场送行的有叶剑英、姬鹏飞、于桑、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陈楚、马仁辉、张瑞霭、刘澄清、王笑一、钱大镛、冀朝铸、唐闻生、沈若芸、章含之等。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韩叙陪同前往上海。

第 1228 回：喜讯到，中国进入联合国 代表团，赴美出席联大会

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前往上海的途中，北京时间 1971 年 10 月 26 日中午 11 时 25 分，美国纽约时间为 10 月 25 日深夜 11 时 25 分，联合国第 26 届大会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简称“两阿提案”。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这届大会要进行表决的提案共有 3 个：

第一个是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驱逐出去的提案（“两阿提案”）。23 国明确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是既维护《联合国宣言》也有利于联合国的事业。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同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的代表驱逐出去。

第二个是由美国、日本等 22 国提出的“变化的重要问题提案”。这个提案规定要从联合国取消“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的任何建议，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就是所谓的“变化的重要问题案”。

第三个是由美国、日本等 19 国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但“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

1971 年 10 月 23 日是星期六，周末，美、日、蒋积极活动拉票，几乎废寝忘食。24 日是星期日，他们的代表碰头对 130 国的投票意向进行估算。美方最乐观，认为是 58 比 57,15 票弃权；日方认为是 57 比 60,7

票弃权,7票动向不明;台湾是58比60,12票弃权。美国认为,他们的两个提案肯定可以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大陆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年。

10月25日,星期一上午、下午和晚上,在此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立克主持下,大会辩论和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三个提案。这天在联合国历史上是辩论最漫长的一天,也是举世瞩目的一天。

辩论一直持续到傍晚18时许,当即将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时,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代表要求大会暂停24小时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希望能为美国再争取一天时间去说服一些仍在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提案。沙特阿拉伯代表同时还建议考虑沙特阿拉伯的一项新提案,称“台湾保持在联合国的席位,直至台湾人民能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复决或公民投票,以决定未来将成为一中立的独立国家,或与中国大陆组成邦联”。沙特阿拉伯的提议以53票赞成、56票反对、19票弃权被大会否决。

美国随即动议要求先表决他们22国的所谓“变化的重要问题提案”。经过一番辩论至将近20时,大会主席裁定先就美国的程序性动议付诸表决。结果61比53,15票弃权,获得通过。对立双方又继续辩论到21时48分,大会主席马立克宣布表决美国、日本等22国提出的所谓“变化的重要问题提案”。此时会场气氛极为紧张。出人意料,投票结果是59票反对、55赞成、15票弃权。美国、日本等22国提案被否决。当表决结果在会议大厅主席台两侧庞大电子计票牌显示出来时,会议厅里顿时欢呼起来,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此时“两阿提案”的23国代表们看到胜利在望,热烈鼓掌欢呼。坦桑尼亚常驻代表则离开代表席位尽情地跳起舞来,出现了联合国从1945年创立以来少见的欢乐场面。

等到热烈欢呼声稍停,阿尔巴尼亚代表要求马上表决“两阿提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布什要求发言,作最后的挣扎。他快步走上主席台,对着全体成员国说:美国代表团建议从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决议草案中删去“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一段。

他话声一落,从非洲等许多代表团的席位上发出一片又一片反对声,“No!”、“No!”声响彻大厅。

经过又一轮冗长的辩论。在代表们的反对声中,大会主席马立克裁定,这项建议不议议事规则。此时已是深夜23时15分,台湾当局代表团团长周书楷见到所有可以抵制“两阿提案”的办法均已用尽。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为了挽回一点面子,他马上在大会主席将“两阿提案”提付表决前,即以程序问题为由跑到讲坛上要求发言。他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不再参加本届大会”。随即率领他的属下黯然退出了会场,并在会场外过道上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事先准备好的一项声明,“宣布退出联合国”。

接着大会表决“两阿提案”。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绝对优势通过了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和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议案。大会主席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在主席台案桌上重重的敲了一下,宣布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通过。接着,马立克宣布美国、日本等国所提的“双重代表权案”成为废案,不再付诸表决。此时是纽约时间1971年10月25日深夜23时25分。大会主席随即宣布散会。会议大厅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两分钟之久。

坦桑尼亚代表首先离开座位,在主席台前再次跳起舞来。提案国的代表纷纷起立相互拥抱,拍打桌子,热烈鼓掌,全场一片欢腾,“中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厅。

当天,26届联大通过第2758号决议后,吴丹秘书长代表联合国立即致电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正式通知联合国大会已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的第2758号决议,要求中国政府尽快派出代表团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工作。

周恩来于26日早上送走基辛格,晚上1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问题,主要是讨论是否派人出席?在当时大陆一般的中国人眼里,联合国大会就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不可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和受压迫人民讲话。所以,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

回一个电报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感谢他的邀请。

讨论尚未结束，毛泽东就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

“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乔老爷”是大家对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戏称。

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参加讨论的外交部党组人员一起来他的住处。

大家来到毛泽东住的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依然穿着睡衣，很高兴地同大家逐一握手，然后说：

“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是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席位。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到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蒙古，折戟沉沙。”

说着，他又笑望着熊向晖问：“那个‘参谋总长’呢？那个‘副统帅’上哪里去了？”

室内顿时充满了笑声。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泽东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10月29日，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通知中国政府将在近期内派团出席本届联大。在此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又多次来电邀请中国政府派团出席本届联大。

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

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写完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他的内心是激动的。1950年，乔冠华曾经与伍修权一起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那是因为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美国侵略台湾案”，要求安理会公开谴责并严厉制裁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

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10月2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正式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

当时尽管中国政府早已任命张闻天为常驻联合国代表，但是在美控制和影响下的联合国，正式席位依然被台湾蒋介石中华民国的代表占据着，张闻天一直未能赴任。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派出代表到联合国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意义重大，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伍修权作为特派代表，政务院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冠华任顾问，龚普生、安东、陈翹（即陈忠经）、浦山、周砚、孙彪和王乃静为代表团成员前往联合国。

1950年12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等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伍修权当场率领代表团离开会场。

随后，大会于12月15日决定：联合国无限期休会。

1950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决定，宣告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也无限期休会。

面对美国操纵联合国无限期休会的情况，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伍修权将军及其随员已无留下的必要，故已命令伍修权将军等于本月十九日启程回国。”伍修权和乔冠华的这次联合国之行，就这样结束在12月7日愤然离席的那一刻。



中国政府特别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图为伍修权（左一）乔冠华（左二）、龚普生在联合国。

事隔 20 年，乔冠华又去联大了，这次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面对全世界发言。他的声音代表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1971 年 11 月 1 日，周恩来同刚抵北京的金日成会谈。

11 月 2 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

11 月 6 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为出席第 26 届联大代表团送行计划报告上的批语：“规格似宜高一点，今晚可谈一下。”

11 月 8 日，毛泽东接见出席联合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谈话时，毛泽东兴致很高，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

第二天，代表团启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送行规格“宜高一点”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等在京政治局委员全都前往机场送行。

中国代表团于 1971 年 11 月 15 日抵达纽约联合国总部，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会场，坐在了自己国

家的席位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高兴地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已经变成现实，中国加入到联合国之后，可以促进联合国更好地解决国际问题，最终会促进一些国际争端问题的解决。”

57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致欢迎词，整整持续了六个小时。不少非洲国家十分热情，向中国代表团介绍情况，帮助中国代表团熟悉联合国议程和工作。中国代表团同非洲国家的合作和情谊进一步全面深化。

中国参加联合国，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由于中国长期贯彻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反对霸权，维护正义，紧紧地团结了第三世界的众多朋友。

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要将联大会议上各国代表的发言全文刊登在国内报纸上，不要只登摘要。”

第 1229 回：周恩来，与韩丁一家交谈 从文革，到党内十次斗争

1971 年 11 月 13 日、15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第一任主席、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顾问韩丁及他的全家：韩丁的母亲卡玛丽达·辛顿夫人、韩丁的妻子雷州安、韩丁的妹妹寒春、寒春的丈夫阳早、韩丁的女儿卡玛、卡玛的母亲史克、阳早和寒春的儿子阳和平。

1937 年春天，韩丁作为水手，曾随船由旧金山驶向日本。在东京做了 5 个月记者后，经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来到苏联，后辗转欧洲，再度做水手，返回美国。

1945 年，韩丁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的身份来到中国。重庆谈判期间，他结识了国共双方很多要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在同毛泽东等人的多次谈话中，他对中共革命及其前途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1947 年，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捐赠一批拖拉机给中国，并且招收志愿工人使用这些农机，韩丁应召作为拖拉机技师第三次来到中国，被派到东北工作。因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又自愿来到共产党所领导的河北解放区。随即在晋冀鲁豫边区冀南地区负责一项发展计划。同年秋天，联合国在全世界结束了农机救援的工作，把志愿工人解散送回美国。韩丁决定留在中国，一如既往地为培训中国第一代农机人员倾心竭力地工作。并在此期间，参加了解放区的土改。

1953 年，韩丁将太太史克、女儿卡玛留在北京，自己漂洋过海返回美国，结果被美国当时的麦卡锡主义冠以“叛国者”的罪名，扣压了他所带回资料，对他实施严密监视，行踪被记录，电话被偷听，活动受限制。整整 16 年，他因护照被吊销而不能再回到中国。直到 1971 年，中美关系和缓，他才应周恩来之邀得以重返中国。

根据阳和平的中文原始记录，在 1971 年 11 月 14 日那天的交谈

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和韩丁他们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当谈到公与私的关系时,周恩来说:

“资产阶级骂我们只有集体,没有个人是不对的。是资产阶级走极端,资本主义只有个人,没有集体,造成无政府状态。如公害问题,在资本主义下不可能解决。你们参观的东方红炼油厂解决了污染问题,把污水变得可以养鱼,可以浇地。我们还不满足,再高的要求就是还可以喝。”

美国在这方面就不行了。几个大湖和沿海的鱼死光了,所以到秘鲁沿海抢鱼。为了自卫,秘鲁和邻国一起说二百海里是领海,我们支持,作为建交的条件。垄断资本不光是污染自己的领海,还要掠夺别国领海的财富。

日本的公害也厉害。有个东京都市长和横滨市长来中国和我谈。东京都市长是个非党派的进步人士,横滨市长是社会党。他们到炼油厂参观了。我问他们公害怎样办?他说日本制度下,他毫无办法。幸亏东京都的工业多是老的和小的,污水不多,还没问题,也没大的炼油厂,但是汽车很多,废气很多,东京都的居民毫无办法。东京都市长羡慕北京市的自行车,但他说毫无办法。垄断财团要卖车,为了利润他们要大的市场,要人们几年得换新车。

横滨不行了。大炼油厂污水很多,近海鱼全死了。个人主义发展到高峰成了公害。每个企业增加投资,减少产量,才能制止公害,还有赔钱的危险,谁干?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是不顾环境破坏的,也不人道。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是要把公私安排好,而不是“大公无私”。社会主义不可能改造的只有集体利益,没有个人利益。我们要的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是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和谐。

在大寨,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你们保卫大寨我支持,毛主席号召学大寨,我不反对吧。大寨还是有缺点。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是第二位的,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先进落后的斗争是将来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样,方向性可知,时间性不可知。到那时还有左中右。阶级思想的痕迹要逐步下去。这有几千年的影响。我讲的是中国的斗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

我回到‘公与私’的问题。我们不是取消私光有公，而是私服从公，把私和公一致起来。

大寨是公私结合好的，没有自留地了，住的集中了，行动一致了，早上大家一起起床。但也不能人人如此，病人、小孩、老人，刚上完夜班的还不能一样起床，这是私的差别。只不过原则是先为公，再为私。”

“大寨是个‘先公后私’的好的典型。文革时，人们对此争议很大，我们说的先公后私，有极‘左’思潮的人，说陈永贵是大公无私，所以大寨人一时很骄傲起来了。另一些人说大寨人吹，背后其实也是为自己。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到大寨后反对两种观点，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大寨人不满意，谢振华说的时间地点是不对。陈永贵到北京，我说先公后私是中央说的，是有道理的。秋收后，先把公粮拿出来，再把种子拿出来，再把集体储备留下来，再把卖给国家的粮拿出来，然后第五才分口粮。口粮每年增加一些，这就了不起了。在全国做了模范，先公后私，全国公社都像你们这样，工作就好做多了。所以别人学得到的做榜样，学不到的怎么做榜样？”

“陈永贵接受了先公后私。”

韩丁问：“那自力更生呢？能走极端吗？”

周恩来：“大寨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力更生为主，国家帮助为辅。”

“虽然大寨是先进的，不能说大寨没缺点。大寨还是有缺点的。”

“大寨是大队核算。80多户，450来人。但是河北平原很多小队都这么多人。在那里也变成大队核算就不好了，那就是平调了，生产多的倒不如生产少的了。农民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

有些地方正好相反。如西南部的山区，有些大队只有几户到十几户。如果把这些小的核算单位像大寨那样合到一起，天天为了记工分山上山下的来回跑也不好。云南山很高，山上山下是一个大队。山上冷，山下热，上下差别很大。虽是一个山，还是分成两个小队好。

大寨的核算制度，大寨的石窑洞不要机械地照搬。大寨人原来住的也是土窑洞，一场大洪水把多数的冲垮了。陈永贵就带领大家建造了一排一排的石窑洞。这样一来家前的小菜园没有了，也无法各自养

猪了。如果其他的村子也这样办，那就糟了。大多数地方群众的觉悟还达不到取消自留地，取消自家养猪的地步。

所以我们要学不是大寨的核算单位或居住方式那些具体内容，而是要学大寨人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如何切实地把他贯彻到自己的日常实践中去。我们要学的是大寨先公后私，以自力更生为主的精神。

完美无缺的榜样和典型是没有的，沙石峪也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张庄、沙石峪、西沟都有优点。我们要每个县，每个省，每个市都要建造自己的大寨。各地有各自的大寨，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要都从千里外来学大寨。

我都讲的是你们碰到的事。我讲些别的。卡玛与韩丁回美国。青年人是希望。卡玛你比我强。我犯过路线错误，你没犯过路线错误。”

韩丁问：“斯诺文章里讲毛泽东说他是‘和尚打伞’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说：“斯诺走后写了很多文章，你们看了《生活》杂志里刊登的和毛主席的谈话吗？里边说的基本上是毛主席说的，有的是斯诺理解错了，如他说什么孤独的和尚打着漏雨的伞。

主席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是个歇后语。和尚剃光头所以没有头发，和尚打伞就遮住了天。发指的是法律，天指的是皇上，就是像孙悟空那样无法无天。

那是去年 12 月 18 日毛主席接见的斯诺，当时的情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群众发动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政治工作领导一切，毛泽东思想武装了群众，全国都在备战备荒，这是好的，但几年来有些副作用。

第一，毛主席最不满意的是把一切都说绝对了，如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给四个伟大。毛主席最不满意，这是陈伯达搞的。他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在 1970 年 8 月的九届二中全会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

第二，毛主席说要一个教员就行了，扭转时很费劲。扭转这个用很长时间，按主席的意思，伟大两字也不要了，但群众不同意，只要导师不行，亿万群众天天讲，不容易改。

如‘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口号，完全错了。怎会有绝对权威呢？毛主席在这方面有权威，但有些事不是他管的，那他怎么能是权威呢？而且这也有时间性，还有考虑将来。你今天是权威，你明天也是权威吗？如果你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绝对权威，那还有发展的吗？说绝对权威是社会停滞论，是不对的，是消极的。

再说权威是群众承认和支持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它只能是在群众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怎能是树起来的？所有树权威的观念都是不对的。

第三，到处挂毛主席的肖像，摆主席的雕像，也不分时间，地点，这是不对的，好事做到反面了，太多了，毛主席看了讨厌，这样不真实，也不尊重。所以主席和斯诺说笑话，‘外面的像风吹雨打，多可怜’，斯诺回答说，‘我也想不通你为什么一个人在那里顶着风，太可怜了。’

在北京饭店一进门的柜台两边有两个主席像，我看了后说，‘主席还给你们看柜台！’饭店的电梯里也有主席像，我问：‘你们还让主席给你们看电梯？’这样过分了，是有害的。这些都要取消。你们可以看到，大礼堂里面也取消了。”

韩丁说：“现在还是可以到处都看到它的。”

周恩来：“是的，雕像里的太多了，要取消。一开始，说不服群众，就只有下令取消。

当然，在对待领袖这件事上，主席和修正主义是不同的。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说过阶级有他的群众、政党和领袖。无论那个阶级的群众，都需要有自己的领袖，但是这个被赫鲁晓夫否定了。他把所有的问题都统统认为是个人崇拜，他的目的是想否定斯大林的影响。虽然斯大林犯过错误，但是他功大于过。我和赖斯顿（James Roston,）谈过这个问题。当然他是不赞同斯大林的，我问赖斯顿，如果希特勒进攻苏联时，没有斯大林行吗？没有斯大林这样的领袖，苏联人民能联合起来吗？赖斯顿无法否定这些。

斯大林之所以能起这一作用是因为在列宁去世后，他批判了很多错误的倾向，他建设了社会主义，使党有了力量，进行了反法西斯战争。当然斯大林思想上的领导作风都有错误，但功大过少。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有个人野心的。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先说斯大林是他父

亲，死后‘二十大’又做秘密报告，结果被美国公布了。抛开党性就从个人的品德来讲这都是很差的。

不能因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我们就也反对。不崇拜一个领袖是不对的，问题是看他值不值得崇拜，是不是群众公认的，还是树起来的，美国内战时期，华盛顿是个领袖，这个无法否认，没有他，你们美国人能在1976年庆祝美国独立了200周年吗？尼克松要当美国独立200周年时的总统，如果华盛顿没有活着过，他能吗？要说个人崇拜，美国多了，市名、州名都叫华盛顿。这不能否定是涌现出来的，是自然发展出来的，就是以后美国革命胜利了，也不能否定华盛顿所起的作用。如法国1789年大革命的罗伯斯庇尔，他后来被杀了，但他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也不能否定他。

主席说的对个人崇拜就是要事实就是，讲的就是这话，领导人要谦虚，谦虚就是事实就是。

党的50年每个历史关头都是主席纠正了错误路线，先后大致有十次。”

接着周恩来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上的十次路线斗争。谈到解放后的路线斗争时，周恩来说：

“全国解放，基本上结束了民主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国内矛盾转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没有斗争。刘少奇就是总代表，但也分阶段。”

周恩来谈了中国共产党内反对高饶集团、反对彭德怀的斗争后，谈到了八届十中全会，说：“其实是文革的先导，实际上批评了刘少奇，但没有点名。随后，在1963年毛主席为社教运动制定了前十条。当刘少奇抛出他的后十条，主席在1965年又发布了二十三条。同时，江青提倡京剧改革，造就了今天的样板戏，文艺革命开始。1965年冬，姚文元写的批判海瑞罢官发表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文化革命才正式开始。这一系列都是反对刘少奇路线的斗争。这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斗争，是长期的，当然严重的，激烈的是在1966年8月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动了亿万群众。这个路线斗争一直继续还没结束，斗批改还在深入。”

这时，周恩来谈到了“516”：“‘五一六’集团就是最大的阴谋集团。‘五一六’是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公开发表是在1967年5月16日。阴谋家利用这日子，组织了‘五一六’集团。美国的进步劳动党下面也有个‘五一六兵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是个阴谋集团，他们搞修正主义，不搞马列主义，有意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不必要的地步，大树特树权威，是唯心主义的，奴隶创造历史。大讲天才。他们就造谣，分裂党，表面上拥护毛主席，支持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分裂党，分裂军，分裂政府，这样阴谋破坏，这事，卡玛、和平都知道一些。

人民大会堂是很少的几个红卫兵没有冲击过的地方。当然我们经过邀请他们来。我是说他们没有强行进来过。1967年8月11日，外事口开大会批判陈毅，史克也在大会上，我都上当了。”

周恩来详细叙述了1967年8月11日大会的情况，接着说：

“今年五一，当陈毅出现在天安门的城楼上，美国的情报机构大吃一惊。陈毅有病，他是从医院去的天安门，他是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不光是美国的CIA摸不清，蒋介石的情报组织也摸不清。当蒋介石得知陈毅上了天安门，他把他的情报组织大骂了一通。

据说，造反派里还有人企图抓我，我不信。他们连陈毅都没抓成，还想抓我？当然不行，那里解放军很多。这可能是吹牛，瞎说罢了。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不敢露头。只有在夜里，在无人之处，他们才会搞阴谋。外文出版社就有这种事情发生。去年才发现有几个好的同志被暗杀了。

8月7日王力大放厥词，支部书记要当外交部长，姚登山要当外长，王力要当总理或副总理，因为他后面有人要当总理。这事一直发展下来，主席发现了这事。姚文元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指出他们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军内虽然有坏人，但不能乱军，那就不好了。

军队是个集体力量，党领导军队，进行抗日战争，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在文化革命中，军队保卫文化革命，不管那些错误，但是保卫了文化革命。军队的“五不”就是从三大纪律八大注意里来的，有纪律的军队，说不打就不打，人家骂就骂，还有被打死的，这样还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军队在世界上还找不出第二个，当然希望有

第二个,第三个。”

周恩来说:“武斗也是阴谋集团挑起的,正确路线是斗党内走资派,不是群众,但是修正主义份子要分裂党,就挑起群众斗群众。”

“他们反对主席的外交路线,他们烧英代办,砸印尼、印度使馆,这样的事以后也有,但常常被发现了。文化革命中的秩序很好,坏人要破坏就得用一些口号,坏人从两面挑,文化革命总的是路线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对于走资派要惩前毖后,如不改就要打倒。”

“武斗基本上是路线斗争,把群众分裂起来,群众都是革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但两派都说自己的革命的。主席在南方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你们去的山西是最杂的地方。山西我没去过,我只到武汉去了两次。不怕乱,乱是乱了敌人,整个文化革命还是个路线斗争,头头里有坏人,或者一边有坏人,或是两边都有坏人。把群众说成是右派是错误的,有的保守一点,稍微一讲就觉悟了,是头子里有坏人。”

以后大家谈了美国青年团的情况。

韩丁说:“先把这事放放一边,不要让他们占了过多的时间。我有个问题,当然我没有权利让总理回答,但如果可能的话,谈谈林彪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周恩来:“这个问题提得很突然,我要说几句,把几个问题说清楚,把路线讲清楚,我们要对世界革命做出贡献。

路线是我党的生命。我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说明了路线对了就会胜利,即便是像我们的党1921年成立时那样人数不多,我们的党也会成长壮大。我们当时只有几个人,没有军队,什么也没有。但是,只要党的路线对了,我们可以吸纳党员,建立军队,争取胜利。路线斗争一直要继续,路线错了,有党,党要垮,有军队,也要失败,王明路线就是说明。

不管你有多大的一个军队,你的路线错了,你的军队就没了。长征以前我们有30万红军,但是到了陕北,我们只有3万人,路线是根本。除了王明路线以外,还有过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路线。当张国焘和我们会师时他有10万人,是我们党领导下的最大的一支队伍。但是以后他分裂党,带领一部分人西征到黄河以西去,结果他是大失败,军

队也没了，领带军队的人路线错了，本人要跨。

朝鲜战争中，彭德怀不是英雄吗？其实每个命令都是主席发出的。有几个命令他没执行，结果打了败仗。但是他还是基本上执行了主席的指示，我们支持他。他从朝鲜回来后还是国防部长，但是他后来反对大跃进，当了右派。如果你改正后错误，主席的办法是治病救人，还可以当党的领导，人总是犯错误，只要不坚持错误就行。

卡玛要回国了，青年人有希望，犯错误就要勇于改正错误。我都犯过路线错误，但还当总理。”

周恩来说到：“山西这五年变化很大。刘格平起来联系群众，在张日清的支持下，打倒了走资派卫恒，所以，他们成立革委会，中央批准。但这两个同志马列主义不多，群众起来不是拥护他们两个，而是拥护文化革命。个人是渺小的，人民是伟大的。群众总要找一个正确路线来得到胜利。

但刘格平，张日清两个人有了权，野心就发作了，结果把群众分成两派，发生武斗，钻进了坏人。刘格平下面有坏人，张日清下面也有坏人，只是刘格平的坏人多些。”

周恩来说到山西的杨成效：“他是个伪警察的儿子。刘格平让这个人当头头，搞武斗。中央找来批评，他们成了两面派，当面说不打，背后还打。如果张日清执行正确路线就好了，而他不是那样，而是打。

在晋东南刘格平支持程首创。陈永贵支持刘格平是因为他是主任，是中央委员。陈永贵也没有武斗，张日清就是派人到昔阳县搞武斗。我们告诉陈永贵两派都是错误的，他接受了。我们把刘格平，张日清撤职了。谢振华任主任，陈永贵，李顺达和一个旧省委的干部解放了的，叫王谦。他在解放初期反对刘少奇，在省里搞了几个初级社试点。刘少奇没和主席讲，就写了个批示，批评了初级社的试点，说是一种危险、空想的社会主义，但王谦顶住了，以后主席纠正了。”

周恩来说：“大同‘支左’的军队搞得很好。昔阳陈永贵搞得很好，离昔阳很近的阳泉是刘格平的人搞得不好，换了人就好了。老工人王体，反对两派，搞大联合。大同煤矿有个书记叫韩英，到处执行正确路线，群众跟他。

在晋东南专区，支持程首创的军队就犯了错误，换了就好了。派

性是头子，群众没有。但也不是头子都坏了，张日清那边的谢振华站出来了，刘格平这边的陈永贵出来了，李顺达是张日清一边的，也站出来了。派性都是头头搞的。

整个文化革命是路线斗争，全国的许多问题在主席路线下解决了。陈伯达是个唯心主义者，自称小小老百姓。

请你们相信，我们党错误路线总是要失败的，正确路线总是占上风的。张国焘反党最后只有一个人，连警卫员都不跟他了，都跟着主席了。因为他逃跑了，只有他一人。后来，我们把他老婆送去了，他在党内只有 17 年，我党已有 50 年了。他在加拿大，拿美国的津贴。他能做的事不多。王明是在解放后到苏联。他在党内工作不到 20 年，他只好做个卖国贼，一个是军队里的，一个是和国际上有联系的，但路线错了，全完了。

请美国的同志相信，我党要一直高举马列主义。尼克松来华是因为他是总统。我们不拿原则做交易。美国在联合国的提案是有两个中国。我们坚决反对。结果美国总统都要来中国，别国就不能和中国和好了？从加拿大和中国建交以来，一系列国家和我们建交。联合国里 59 票反对美国的提案，这里有 10 个是没和中国建交的，这是美国没料到的，但投弃权票的有 8 个是建交的，这可能是因为美国的压力太大，像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半数就好了。

这次表决出乎美国的预料，也出乎我们的预料，美国提案失败了。亚非拉人民很高兴。联合国里没有鼓，但可以跳舞，有的人就在会场上跳起来了。表决提案时，形势就大变了，76 票对 35 票，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原来 59 票的支持派没变，又加了 17 票。其中过去弃权票里有 12 个变了，支持这个提案。原来支持美国提案的也转过来 5 个支持这个提案，包括以色列、葡萄牙等。我们对这一些国家没有怎么注意，他们却投了我们的票。这就是大势所趋，不可违抗。我们都不想理的，亚非拉人们要我们去，我们匆忙地组织了个代表团，有的人还劝我们不去。这次胜利是大的，但以后的贡献有限。我们绝不做超级大国。”

卡玛继续问周恩来关于林彪的事情。周恩来说：

“卡玛，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纪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纪律。”

第 1230 回：找薛明，周恩来亲自安排 四川省，梁兴初隔离审查

“913”事件后，周恩来派人找薛明。1969 年 11 月下旬，薛明从陆军转到空军，疏散到贵州磊庄空军机场附近的军队干校，要求改名换姓。

知道薛明的下落后，周恩来立即派齐英武、徐心坦二人飞往贵州看望她，并带去 6 份关于林彪罪行的文件。他们向薛明详细地询问了贺龙的情况，对她说：“后一段时间，中央和贺龙失去联系，只有你一个人在身边。”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1 年 10 月薛明回到北京，周恩来把她安排在西城二里沟新疆办事处住了下来，并委托国务院科教组照管她，派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刘西尧看望她，让他们一家人团聚，薛明这才见到失散 5 年的孩子们。后来，邓颖超也去看望薛明，转达周恩来的问候。

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决定，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

10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揭发批判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会议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中央给以帮助。

根据周恩来会前与毛泽东商定的设想，在京召开武汉、成都两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座谈会，学习文件，深入批林。

10 月 27 日，中央召集张国华、梁兴初等人到北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汇报四川的工作？

10 月 29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讨论意见，提出中央帮助解决问题的总的方针是：“遵照主席指示，治病救人，以利团结和工作。”

在北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汇报时，梁兴初如实讲了自己在庐山会议西南组的发言情况：

1970年8月24日,吴法宪在西南组作了发言后,当晚把梁兴初和成都军区第三政委谢家祥找到他的住处,对他们说:“我们是老同志,一定要发言表明态度,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梁兴初等人第二天按照吴法宪的布置,在西南组会上发了言,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吴法宪1970年8月24日晚找梁兴初和谢家祥的事情,在这次汇报前,梁兴初一直没有与别人谈起过。

汇报时,梁兴初还报告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次到毛家湾的详细情况:“第一次是和张国华一起去的。林彪说,四川我们不放心,你们两人去了,就放心了,然后留我们喝了茶,第二次是请我们去看电影,这次人很多,林彪只和我握了握手,什么也没说就开始放电影了,林彪搞政变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他跑了以后10天才从中央文件上知道了详细情况。”

的确是这样,1971年9月14日,张国华电话告诉梁兴初:“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人,带着老婆逃跑了。军区接到通知要加强战备。”

梁兴初完全没有听明白,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是林彪,他不知道怎么记成了陈伯达。可是陈伯达已经被关起来了,怎么可能带老婆逃跑呢?那是康生?可康生逃跑用加强战备吗?梁兴初越想越糊涂,他拿起电话问黄永胜:“听说庐山上第一个讲话的人带着老婆跑了?”

黄永胜说:“是。”就放下了电话。

梁兴初又打电话问铁道兵政委宋维轼。宋维轼说:“我刚吃了安眠药,吃得有点多了,头痛得很。”

梁兴初到底没有搞清楚是谁跑了,直到10天后传达中央57号文件,才知道是林彪跑了。

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局开会,听取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关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情况汇报。会上,对有关人员进行了批评,要求他们回川之后,继续揭批林彪一伙,并敢于接受批评,加强领导,搞好团结。

11月13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报告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政委陈仁麒的检讨。报告说:

十二日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的负责人关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情况汇报，并对成都地区有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帮助，要求他们回四川之后，继续揭批林彪一伙，并敢于接受批评，加强领导，搞好团结。他们拟明后日回川，主席能否在今明两日见他们一次，给以教育和鼓励。

毛泽东当天批示：“待议。”

11月13日，叶剑英办公室通知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14日晚，毛主席要接见军区领导？”

11月14日晚，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陈仁麒等人，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参加。

毛泽东说：“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周恩来：“武汉检讨还没有写出来。”

这时，叶剑英进来了，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516’，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恩来：“后来杨成武大树特树绝对权威。”

毛泽东：“那是树他自己的。”

周恩来：“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更厉害了，简直说得不象话了。”

毛泽东：“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516’，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刷，我说，你不要讲了。”

周恩来：“万人大会斗陈毅，外事口的一些外国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搞不清楚。斗完后要把陈毅抓走，大会堂的服务员不让抓走。问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抓？服务员说主席叫保我们就保。”

毛泽东：“斗他的时候，向前向后三鞠躬，上汽车后又推翻了，又不

承认了，说是你们逼我讲的。”

毛泽东又问：“杨勇是怎么一回事？”

叶剑英答：“当时我也不清楚。”

毛泽东又问：“廖汉生为什么要抓？”

周恩来回答：“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对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

毛泽东说道：“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谈到林彪集团时，毛泽东说：“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

“你们如果有时间，鲁迅的有一本书是值得看看的。《准风月谈》的后记里，有曹聚仁写的一篇《文艺座谈遥领记》。曾今可要开文艺座谈会，请了曹聚仁没去，报上登出来，他成了发起人。曹就问龙榆生，那天的会是怎么开的，龙说：就是吃点点心、喝喝茶。曹聚仁说：‘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啦！’这件事，可见那时斗争的复杂。现在，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我看不一定。今天你们吃了我的茶，就是我的人吗？不一定。总理、康老都喝过他们的茶嘛！吃了他的茶，就是他的人，不要党，不要中央了吗？”

《我的一点意见》写好后，第二天早晨总理、康老去找林彪，看了以后，他说同意了。《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

叶剑英：“主席很忙，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写出来。”

毛泽东：“和大家吹一吹就是了。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过，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他们看形势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

‘红造’并不都是‘516’。整理的黑材料，有一条国民党报上的消息，说红军长征了，叶在江西投降敌人。他是跟着长征了嘛，你们这些

老同志都是长征的，哪有那个事呢？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他指着张国华说：“你就是王佐部队的一个兵。”

周恩来：“后来是司号长。”

毛泽东：“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了嘛！哪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冀登同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你把解方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

周恩来：“那个王实味也可以不杀。”

毛泽东：“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毛泽东说：“许多现象和本质不同。林彪的现象是拥护我，其实大树特树他自己。”

周恩来问：“《‘五一工程’纪要》是否可印发大军区和省委常委？”

毛泽东同意，并说：“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

谈到成都地区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的事，我也有责任，没有找你们谈。当然，东北、西北也没有谈，他们没有出事。广州陷得深，我和他们谈了，他们很主动，回去后马上就开会，把我同他们谈的问题都讲了。你们那里也是个别同志嘛，冲一下也必要，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要分清。我看你们比武汉爽快，武汉的报告还未写出来，他们有点顶牛。顶牛也好，不做墙头草。林的事发生已经两个多月了。你们开了半个月的会，我看你们的报告不错，写得好，不拖泥带水。回去开开会，继续做工作。没有什么问题了，错了改了就好。”

叶剑英说：“你们的报告，中央看过了，都同意，回去要把问题查清楚。”又接着讲：“有人说梁兴初到成都是去夺权的，这不对，梁兴初到成都，是我向毛主席建议的，是毛主席点的将。”

毛泽东说：“我也没想到会出现林彪事件。党章上写了的接班人，中央要负责，大家都举了手，不要把举手的人都当成林彪的人。鲁迅说曹聚仁‘喝了他家的茶，就是他家的人。’”他指着梁兴初说：“你喝了林彪的茶，不是林彪的人嘛。”

当天,11月14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通知》。

梁兴初对毛泽东说的鲁迅说曹聚仁“喝茶”这段典故不甚明了,但说自己“不是林彪的人”几个字,却听得十分真切。回去后,他高兴地对秘书岳广运说:“毛主席说我‘喝了林彪的茶,不是林彪的人’,是什么意思?”

岳广运也很激动:“这是明摆着的,毛主席帮你开脱了!”

11月15日,张国华、梁兴初一行从北京回到成都。次日,他们到金牛坝开会。

金牛坝是四川省委高干招待所,位于成都西门外5公里处。据传,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欲伐蜀而不知道路,于是叫工匠雕了五头石牛,把很多金子放在牛屁股后,说这是牛拉出来的。并说这些石牛都是会拉金子的天牛,要送给蜀王。蜀王信以为真,即派五个力士拖石牛到蜀国。结果,秦军随着石牛拖出的道路达到了攻打蜀国的目的。成都金牛坝路即为当年石牛入蜀的遗迹。1958年成都会议召开于此,为“大跃进”运动策源地之一。

这次召开的四川省委常委扩大会,很快发展成党委扩大会,要解决“梁兴初问题”。

会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要求梁兴初交代怎样“上了林彪的贼船”?九届二中全会上是怎么“搞串联”的?吴法宪如何窜到西南组?“913”前为什么“捂盖子,保林彪”?为什么一直没有揭发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串连活动?梁兴初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时,违犯党的纪律,私自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那个动员讲话抄了一份,带回成都后,进行过一些扩散……意欲何为?怎样参加“林彪反革命政变”?为什么调走警卫营,给新警卫营配新式武器?为什么林彪摔死后还给黄永胜打电话?等等。

11月19日,成都军区政治部通知梁兴初的妻子任桂兰,到金牛坝去敦促梁兴初交代问题。第二天,梁兴初被隔离审查,门口站上了岗。从此,梁兴初夫妇离开了工作岗位。

第 1231 回：查武汉，刘丰自杀未死成 邓小平，江西致信毛泽东

中央决定武汉军区的曾思玉、刘丰、张体学及河南省委的刘建勋、张树芝等人到北京京西宾馆开会，检讨“913”事件。

会上，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非常紧张。他检讨说：“我犯了严重错误，把毛主席南巡时向我们吹风的话都透露给了李作鹏，李作鹏很快就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又告诉了叶群，结果促使叶群、林立果调飞机与林彪仓皇出逃。”

11月15日，会议继续召开。作为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在会上批评刘丰的同时，也作了自我检讨。周恩来在会上说：“曾思玉同志要与刘丰划清界限。”

11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约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了解对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情况。

回去后，刘丰服药自杀，被送进了医院，抢救过来。

11月18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报告：

武汉地区的会不如成都地区开得好，但后期大有进展。

刘丰会后自杀未遂。

从现在情况看，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不宜再拖下来。

建议主席近期接见一次参加该地区座谈会的负责人。

毛泽东阅批：“同意。”

11月19日继续开会，对曾思玉和方铭展开了批评。有人用责问的语调批评曾思玉：“你给林彪当过‘高参’，50年代你又写文章歌颂林彪，解放战争时期你是四野的，又是林彪的部下，你还在武汉给林彪维修别墅……你能说你没有问题吗？你能说你没上林彪的贼船吗？你能说你不是林彪的‘死党’？”

曾思玉忍不住与其顶了起来：“我是写过《随同林彪军团长踏雪访黄河》的文章。红军时，我是红一军团的；抗战时，我是一一五师的，但后来，我到晋冀鲁豫工作了；解放战争时是华野的，后来又隶属一野呢。你们开口闭口说我是四野的，硬要往林彪山头上推，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四野出了林彪，难道四野的其他同志就不行啦？我倒要问问大家，林彪当上国防部长、副统帅，让我们做些事情谁能不做？我承认，包括（给林彪）调秘书，招驸马，选妃子，这些事，有的我责成人做过，这些我都承认，我不能推脱责任，与执行的人无关；我也承认，由于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低，没有执行毛主席讲的要跟党、跟路线、不能跟人，因此犯了严重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我也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交了书面检讨。非要说我是林彪贼船上的人，那咱们到毛主席那里去讲。”

上午的会议把曾思玉的心情弄得极糟。散会前，曾思玉向李先念请假，要求下午休息。

11月20日，李先念向周恩来和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说：“看来曾思玉有一股情绪，晚上叫他们来，一起谈一谈。”

当天晚上，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开始“谈一谈”。参加“谈一谈”的人，除曾思玉、刘建勋等人外，还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以及刚刚从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调任武汉军区政委的王六生。

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曾思玉：“我上次到湖北没有见到你，问题解决了吗？”

曾思玉一听，马上读已上交的检讨书。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要说了，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犯过错误的人也有好有坏，你是好人犯错误。共产党是大党，不是小派别了，管他哪个山头啊。……现在有一些同志犯错误，别的同志要采取宽容的态度，不要揪住不放。你犯了错误，从此就不信任了，我看不好。”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

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8341在毛家湾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

周恩来插话：“粉身碎骨。”

毛泽东：“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再次提到鲁迅。他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临了，毛泽东说：“湖北问题，我赞成你们的方针，赞成你们的检讨，武汉军区，包括湖北、河南两省的。曾思玉同志讲的比较清楚明白，方铭不会写文章，写了好几遍，这样也可以。”

方铭说：“我检讨不深刻。”

毛泽东说：“可以通过。曾思玉，你回去开个扩大会，要讲一遍，无非是北京这一遍。检讨我看可以了，允许人家讲。你身负重责，两个省1亿人口，要注意政策。还是宽大为怀嘛。整人要少，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大。只要坚持这个，倒不了的。中央帮你的忙，大家帮你的忙。有大风大浪来了，我去一次湖北，你说可以不可以？”

“欢迎！欢迎！”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后，曾思玉立即表态：“请主席放心，我回去以后，一定按照主席指示，向湖北、河南两个省委和武汉军区做出检讨，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把武汉军区和省委的工作搞好，抓出成效。”

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一封邓小平从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县写来的信。此时的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根一起，依然住在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那个小院的一幢两层红砖小楼里。

每天上午,他和卓琳一起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每当黄昏来临,他总是在小院子里散步。

1971年11月6日,邓小平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工人坐在一起,听完中共中央有关“913”事件的文件传达。文件整整念了两个多小时,全场人大气不出地听了两个多小时。回到家里,邓小平一改往日的严肃和沉静,显得兴奋和激动。但只说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11月8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彪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彪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解决,真是值得庆贺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高兴呵!”

在信中,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自己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此后,邓小平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邓小平又写道:“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小女儿)分配到陕北农村已三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

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小儿子）在山西插队已三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份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学医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的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他在信中提到：“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因我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

信的最后，他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

汪东兴并不知道不让邓小平再写信的事，他向毛泽东答道：“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管着的。”

毛泽东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毛泽东的意思也十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是要汪东兴来管。在邓小平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东兴办一下。”

第二年，邓小平在农村插队的两个孩子都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上大学了。

1971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完成了计划的104%，比上年增长12.2%。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98.4%，增长3.1%，工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7%，增长14.9%。财政收入完成计划的105.6%，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计划的97.5%。

但是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积累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1969年为23.2%，1970年上升为32.9%，1971年更上升为34.1%。

第二、职工人数急剧增多。随着基建规模和重工业生产急剧膨

胀。1970年、1971年，原计划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了983万人。到1971年年底，职工总数达到5318万人。

第三、工资总额和粮食销量控制不住。由于职工人数猛增，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大大超过计划。原计划1971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为296亿元，实际支出320亿元，原计划1971年销粮794亿斤，实际销出855亿斤。

这样一来，1971年年底出现了“四个突破”：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货币发行也突破了。周恩来说：“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这“四个突破”，表明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危险的倾向。

1972年1月1日，沈阳军区潘复生专案组于向中央报告：

潘复生原名刘开浚，1931年入党，1932年在济南被捕叛变。专案组提供的影印件说明，潘复生在反动刊物《南针》上发表了悔过书。潘复生被捕前是中共济南市少共部长，也是当时济南市一个青年进步组织“读书会”的负责人之一。对于读书会，他在悔过书里说，这是反动组织，作反动宣传，因我一时思想错误，误入歧途，今恍然悟前思想之荒谬，愿将过去的错误纠正。他在供认中，表示悔过：说共产党陷害青年，认识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今后决心悔过自新，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他在狱中，做敌人的“耳目”和“腿子”，充当“跑号”，积极向敌人告密，协助敌人破坏党的斗争。

1972年，中共黑龙江省委转发沈阳军区专案组关于潘复生罪行的调查报告和罪证影印件。潘复生被定为叛徒、内奸、国民党反共分子。

1972年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中央接见中央专案一、二、三办全体人员。接见时，江青提到杨成武的问题，她说：“‘二办’饶漱石这个专案是我负责的，而杨成武却对我封锁，还给我立了一个专案。让陈虹、王育民、朱铁铮三个人整我的材料。能有什么材料？只不过是我过去的一封公开信。杨成武这么干，我才下决心找我的这封公开信，还是春桥同志帮我找到的。这封公开信，很是说明我的问题：第一，我是坚决抗日的；第二，我是抵制国民党特务的……他们还提审扬帆搞黑调查。”

周恩来当即问道：“王育民来了没有？是怎么回事？”

饶漱石专案组副组长王育民站起来据实回答说：“审扬帆还是杨成武管‘二办’那个时期，是吴法宪参加布置的。”

王育民如实报告了第 949 回提到的 1967 年 11 月，杨成武传达江青关于提审扬帆 1939 年向中央发电报的指示情况。江青听后，立即否认说：“我怎么能叫你们去审问呢？”

会后，王育民被撤销了“二办”总支委员、支部书记和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回空军转业。

第 1232 回：组班子，接待黑格先遣组 毛泽东，不再讲“二月逆流”

1972 年 1 月 3 日，负责尼克松访华后勤工作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准将，率领一个 18 人组成的先遣小组来到中国，与中方商讨尼克松访华期间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等所有具体问题。

中国方面也组成了一个相应的小组来接待他们，并对口与他们商谈。

首先出现的分歧是尼克松的专机。美方坚持，尼克松在华期间，包括将要去访问的上海、杭州两个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这既是安全考虑，也是他们的惯例。美方解释说：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唯一有权在 24 小时内发布战争令的人，所以总统无论跑到哪里都要和白宫保持联系，他乘坐的专机也随身带有核武器密码，坐中国飞机是不能保证这一点的。

而中方则认为，中美双方尚未建交，尼克松可以坐自己的专机到中国，但在中国境内则必须乘坐中国方面提供的飞机。因为中国很强调自己的领空权，不能允许未建交的国家从自己的领空飞过。而中国方面提供尼克松在中国访问期间乘坐的专机——伊尔 18 飞机，是周恩来出访时乘坐的，安全绝无问题。

为此，双方僵持了很久，最后周恩来亲自出面说：“中国有句俗话，客随主便。尼克松总统既然访问中国，应该乘做中国人驾驶的专机。你们说美国总统过去没有乘坐过外国飞机，这次到中国来坐一坐，体会一下也很好嘛！我们飞行员的技术也不错。你们尽管放心。如果你们觉得不放心，我陪总统先生一起乘坐。”

美方做了让步，最后双方达成这样的协议：总统专机先飞到上海，上海飞往北京时，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但是中方要派先遣小组带领一名领航员登机。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访问——由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则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 18 飞机。

为“空军一号”做领航任务的，正是上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巴基斯坦飞行员担任领航的飞行大队长徐柏龄。

美国人一直强调的通讯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尼克松带两个通讯人员上中方的飞机，他们的“空军一号”跟在伊尔18专机后面飞，这样总统的信息随时可以通过通讯人员传到后面的飞机上。从技术手段上保证了总统的特殊使命。后来中方才知道，美国总统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乘坐“空军一号”，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确是破了例。

空中交通问题解决了，地面交通工具又成了第二个分歧。美方一定要将自己的运防弹车过来，中方坚决不同意，因为不知道美国的防弹汽车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中方又不好检查。所以坚持尼克松到中国后，要坐中国方面提供的汽车。美方最后也让步，同意乘坐中方为尼克松准备的两辆防弹车。

第一次会谈后，还有两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美国记者来采访的人数和接待，另一个是通讯问题。

本来觉得采访记者人数比较容易解决，所以第二次会谈先解决这个问题。美方提出：500名美国记者随尼克松总统来访，另外还准备邀请其他西方记者，如英法等欧洲国家的记者100名。

这让中方大吃一惊：“哪里有这样庞大的记者团？”中方原来以为最多也就有三、四十名记者，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其次，当时的北京，能接待外宾的酒店屈指可数，而能提供的设备更无从谈起。

双方差距实在太大。美国人再三解释，尼克松访美在美国新闻界是大事情，必须要报道，请中方能理解。而且美国媒体众多，对这次采访机会，大家争得一塌糊涂，美国政府都得应付讨好那些媒体，也不敢擅自拒绝、得罪他们。

中方工作人员认为：固然中美关系解冻是件大事，但也不能因此为美国宣传造势，还要顾及第三世界人民的感受呀。而且接待如此庞大的记者团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也实在难以承担。为此双方争议半天，没有结果。

报告打到周恩来那里，他的批复是尽量让他们来。周恩来说：“他们已经骂我们骂够了，他到这儿来总得报道尼克松访问、总得报道怎么谈判，他非得客观不可。他怎么报道回去也比他以前对中国的印象

要好一些，所以尽量让他们来。”

几经协商，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文字记者和报纸、广播、通讯社的记者 80 多人；电视系统，包括记者、摄像、灯光师、制片人等，100 多人，一共 180 多人，由新闻司和广电总局负责接待。最终来访美国记者者 288 人。

美国来了这么多人，房子怎么解决呢？中央一句话：民族饭店腾空！于是从 1972 年 1 月起，民族饭店就腾空专留给记者。美国的其他工作人员，钓鱼台住不下的也全部安排在这儿。

还要组织中方的接待人员。外交部新闻司的英文工作人员不够，就决定从学校、文化部、体委、友协等，凡是有涉外工作的单位借调工作人员，组织了近 100 人的接待队伍。

还有一个通讯问题，就是如何把美国记者的新闻片传回去。在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期间，是和民航总局达成协议：每天由民航负责把美国电视台的电视片空运到广州机场，广东省外办派人在机场等候，拿到片子后朝深圳口岸赶。飞机到了广州已是下午，他们连夜开着车，过 3 条摆渡，到了罗湖桥边也是第二天下午了。香港那边，美国电视媒体从总部派人到香港，在罗湖口岸对面接下片子再从香港转播。

乒乓外交可以这么处理，毕竟来的记者少，尼克松访华可是比那重要几倍的大事情，因此美国方面提出：必须得有地面卫星站，一是为了美国总统随时可以与国内联系，解决美国内的问题，同时外国记者也可以通过卫星站把访问的有关消息快速传送到世界各地，他们要求在机场附近放置地面站，只要中方同意并指定地方安放设备就可以，其他事情完全由他们与中国广电部副部长刘澄清具体商议。

美国先遣小组的齐格勒还说：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很多人想看到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这个也很重视。

但这件事在当时中国的外事活动中还从未遇过，关系重大，所以中方小组提议暂时休会，等研究后再讨论。

熊向晖召集中方小组讨论此事，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说：“我们绝对不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首长

也是这个意见。”

“首长”毫无疑问是指江青。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不好说什么了。

中方谈判小组全体商议，即刻向周恩来汇报并请示。很快，他们和周恩来见面，把情况详细报告了。

当晚22时，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1月4日凌晨4时，周恩来会见黑格。

黑格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美方在口信中谈及印巴冲突、越南问题、苏联在欧亚的动作后得出了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论。由于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Ability to live)表示怀疑，所以美国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黑格的意思是：中国很弱，当苏联进攻中国时，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所以我们愿意和你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

黑格的言外之意是，中国需要美国来保护。

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辱中国的尊严。中美谈判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绝不是中国需要美国来保护。对此，周恩来毫不客气地批驳了黑格的这种态度。他说：“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黑格起初还狡辩，说他没有这个意思。周恩来亲自查了许多外文资料，找了一些英文翻译，搞准了“Ability to live”的准确涵义，有理有据地驳斥了黑格的狡辩。最后，黑格不得不表示：他收回“Ability to live”的说法。

黑格对周恩来的批评还是心服口服的。他回到下榻饭店后对中方陪同人员说：“你们的总理真了不起。我对他早已久闻大名，今天一番话真是佩服之至。”

会见时，周恩来表示：中美两国接近，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对中

美两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都有利。

会见后，周恩来嘱熊向晖主持起草《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

当天上午，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会见黑格情况。

毛泽东得知黑格口信后，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

1月4日，周恩来召集与黑格一行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研究美方提出的尼克松访华期间的若干技术问题。

关于地面卫星站，周恩来稍作思考后，对国务院电信总局领导小组成员、副政委刘澄清和总理助理熊向晖说：“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美国把通讯卫星安放在我国境内，这涉及主权问题，必须要妥善解决。你们谈判时必须申明立场，美国卫星站不能设立，尤其是不能由他们来主持和运作。”

周恩来又沉思一会，想出一个方法说：“你们下次谈判时，首先要阐明立场，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严肃事情，然后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考虑买下美方的设备，由我们来主持，只需要他们传授一些技术给我方人员就可以了。”

在第二次谈判时，中方小组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提出这一立场和要求，齐格勒十分惊讶，当即回答：“你们要买下这套设备价格非常昂贵，需要数千万美元，而且你们在天空也没有通讯卫星，地面站用不上啊，你们再考虑吧。”

会谈休息空隙，熊向晖立即给总理办公室通电话呈报情况。周恩来指示：“目前买地面站可能有困难，可以提出租用，这就是和美方做买卖，他们没有理由拒绝。租用期间主权属于我方，运作也属于我方，租期15天（其中包括安装和拆卸）。会后你们再具体研究。”

于是熊向晖提出租用方案，否则就不安装了。

齐格勒说：“我没有经手租用过通讯卫星，但我想租金肯定很贵。尼克松总统访问8天，8天的租金可能要100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我们已经准备了卫星终端站，只要求中国方面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工程，费用由我国承担。”

熊向晖一听，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既然美国作了这方面的准

备,我们何苦去花 100 万美金呢? 100 万美金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因此,熊向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只是说:“在中国修建地面工程的费用由中国负担,美国方面只要在技术上提供协助就可以了。”

1月5日,周恩来召集与黑格一行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当他听了熊向晖汇报没有反对齐格勒的意见时,严厉批评说:“这哪能行呢?让你商谈租用,你一听 100 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

周恩来这么一点,熊向晖恍然大悟,羞愧难当,后悔当初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主权的问题。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你去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卫星终端站,租用期是北京时间 1972 年 2 月 21 日 13 时至 2 月 28 日 24 时;第二,在租用期间,卫星终端站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费用;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熊向晖把周恩来的三点意见对齐格勒说了。齐格勒服了。他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合理。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相互关联的。我现在提不出具体数目,但我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将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并告诉我的同事和亲友。”

齐格勒还对熊向晖说:“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6 日中午 12 时 10 分至下午 14 时 10 分,周恩来和叶剑英到毛泽东处商谈外事工作。周恩来将《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说:“好,我看可以给他讲。讲了以后,无非是吹了。他 22 年都没有来,再等 100 年嘛!你不顶他一下,他就舒服。总而言之,无非是吹了。我看啊,过不了几年他还是要来的。”

周恩来问：“联合公报草案，除台湾问题外，美方没提，是不是就不动了？”

毛泽东说：“就不动，要动就动一点，把人民要进步改成人民要革命。他们就是怕革命，他们愈怕，我们愈要提。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当然写进去也不好喽！”

谈完外事后，毛泽东又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叶剑英即赶往301医院向陈毅传达毛泽东的意见。

第 1233 回：病情重，一月六陈毅逝世 周恩来，态度明答复黑格

1971 年 11 月初，陈毅开始呕吐。此后病情急剧恶化，不几天功夫，他已经完全不能进食了。

周恩来亲自批示，将陈毅转到北京日坛医院，并批准日坛医院给陈毅做了胃肠短路手术，以期解决进食的问题。

12 月 3 日，北京日坛医院按预定计划，给陈毅做了胃肠短路吻合手术。手术是成功的。但是，日坛医院吴恒兴院长和给陈毅做手术的主刀医生们，内心却异常沉重。因为他们在手术过程中发现，陈毅内脏的癌细胞已有广泛转移，胃肠吻合手术只能救一时之急，与阻止癌细胞转移毫不相干。

一天清晨，夜色尚未褪尽。做完胃肠短路吻合手术 20 天的陈毅，突然用微弱的声音对陪在床边的女儿珊珊说：“我要吃面条！”

珊珊心细，揉揉睡眼惺忪的双眼，证实是父亲在对她说话，随即回答：“爸爸您等会，我就去端来！”

珊珊好不高兴，多少天来，爸爸吃什么都没有滋味，今天主动提出想吃面条，难道不是一个好征兆？一碗热汤面端来了，陈毅眼里闪动着欣喜的光芒。

珊珊搀扶父亲半坐起来，用筷子一根一根地喂着。

她看见父亲的食欲并不好，吞咽困难，但终究还是吞下了好几根面条，心里比蜜还甜。

这天医生查房时，陈毅眼里放着光，吃力地对医生说：“今天是 12 月 26 日，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我要争取年底下床走一走！”

所有在场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珊珊这才明白，“爸爸是为给毛主席吃寿面才吃面条。”

更使她难以理解的，父亲卧床两个多月，病房里既没有挂历，也没

有人提醒他,他是怎么知道这天就是 12 月 26 日呢? 这说明他在心里一天天地计算着日子,无须人提醒。

其实,这天是 12 月 24 日。

可是谁都不忍心纠正他,权当他提前为毛主席吃寿面吧! 珊珊看见父亲病成这样,还想着为毛主席吃寿面,一时无法控制自己,泪水顿时模糊了视线。

陈毅病危的消息不胫而走……

周恩来不声不响地走进病房,搬把木椅紧靠陈毅坐下,像亲兄长似地款款细语。

眼睛失明的刘伯承由人搀扶着走进病房,用手抚摸着陈毅的脸和手,互相说着勉励的话。

朱德夫妇、聂荣臻夫妇、李富春夫妇都来了。

王震怕陈毅在病房寂寞,经常带着小孙女一起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叶剑英几乎天天都来。他怕陈毅说话多了吃不消,总是稍坐一会儿便退出来,一趟又一趟地在病房外来回踱步,久久不肯离去。

“珊珊,几点了?”

这是陈毅第三次问时间了。

他的病情还在加重,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出现了呼吸困难。

珊珊知道,这是父亲等着会见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完联合国大会的乔冠华,刚刚来了电话,说一会儿就到。

当乔冠华准时出现在陈毅的病房时,陈毅拾起身子,伸出双手表示欢迎,显得格外激动,连声说:“伟大的胜利,伟大的胜利啊!”

乔冠华泪光闪闪,久久握着陈毅伸出的手,动情地说:“在联合国遇到许多外国朋友,他们都让我转达对您的问候。他们都十分想念您。好几位非洲国家的外长,都请您病愈后再去访问。”

他还说,美国总统国家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带先遣组来到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前站,中美两国关系将翻开新的一页。

陈毅难得这样长时间处于清醒和兴奋状态,脸上出现少有的红晕,多次听到他说“谢谢”,“很好”。

1972 年元旦刚过,1 月 2 日午后,陈毅醒来额头上、身上热得烫

手,一量体温又发烧了。

这天下午 15 时,李先念来到病房。

陈毅的耳朵还好使,听到老战友到来,他费力地睁开眼睛,缓慢、艰难地说:“谢谢你了,老同志了……我不能多讲话。”

在陈毅的病床前,李先念默默地停立良久,当他离开病房时,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是流着眼泪走的。

这天深夜,陈毅总算缓慢退烧,神志少有的清醒。

几天前,周恩来特地关照过日坛医院:陈毅神志清楚时,须随时向他报告。

当天夜里,周恩来接到医生的报告,立即从人民大会堂坐车赶往日坛医院,直奔陈毅病房。两人久久地闭门长谈。

以后几天,陈毅又几度昏迷。

一天,陈毅从昏迷中苏醒,认出身边有大儿昊苏、女儿珊珊,嘴里说着什么,好不容易辨别出几个不连贯的句子:“红军……毛主席……路线斗争,坚持原则……”1月4日,极度虚弱的陈毅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张茜领着儿女们守候在丈夫身旁,默默地祝愿丈夫平安,祝愿他尽快从死神的魔掌中挣脱出来,早日康复。

或许是精诚所至吧,陈毅的眼睛动了一下,一会儿慢慢睁开了,嘴唇嗫嚅着,喃喃有声。

他认出了守候在病床边的妻子和4个儿女,显得颇为动情。

珊珊眼尖,知道父亲有话要说,赶快把耳朵伸到父亲嘴边,终于听明白了:“……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陈毅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1月6日,毛泽东让周恩来、叶剑英向陈毅传达他对“二月逆流”的态度后,叶剑英即匆匆赶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弥留之际的陈毅。然而,此时的陈毅已经不省人事。叶剑英对陈毅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要你安心养病,会好起来的。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指示,让珊珊念给你听。”

叶剑英递给珊珊一页纸。珊珊弯下腰,在陈毅的耳边大声读道:“现在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当时是‘516’、王关戚,还有陈伯达打

击一大片,包括你(指周恩来)在内。当时那个情况有些同志要讲一些话,是应该的,是公开讲的。在党的会议上为什么不可以讲?有些事情看来过了几年就清楚了。”读完后,看到父亲已不能说话,但神智尚清楚,她就对父亲说:“您要是听清楚了,就闭闭眼吧。”陈毅闭了闭眼。珊珊又念了一遍,再问父亲听清楚了吗,陈毅已没有任何反应。几个小时后便与世长辞了。

1月6日当晚23时30分,周恩来同黑格第二次会谈,答复4日黑格转达的尼克松的口信,要点是:

一、随着中美领导人会谈的临近,某些敌对势力加紧破坏,中国对此已有准备。

二、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后,苏联在欧亚的动作更暴露出它扩张主义的面目,次大陆也将从此动荡不已。

三、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对于总统访华也带来不利因素。

四、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绝不能靠外力维持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国的保护国和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五、中美两国关系并未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将以应有的礼仪接待尼克松总统,并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做出自己的努力。

六、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在公报草案中已尽力照顾到美方的困难。中国人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的。如果美方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在中美关系的这个关键问题采取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

中方的答复相当强硬,同时又留有余地。答复稿中说:“……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当中方把答复稿念给黑格后,黑格只得说: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总统的意思。基于此,在接待尼克松的问题上,中方低调处理。外电评论说,“是朴素而严肃

的”。

在会晤，周恩来还对黑格当天转达的基辛格口信作了评论。他说：中美两国关系没有正常化，贸易发展是有限度的，必然是缓慢的；但中美双方总要向远处看，中美关系总要走向正常化。

1月7日，黑格一行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杭州等地。因为黑格是打前站的，尼克松访华要去的城市，他都要事先去实地看一遍。

在黑格到达上海的第一天晚上，上海设宴招待黑格。徐景贤在讲话祝酒时，黑格没有站起来致答词。这使得徐景贤等人大为恼火，认为黑格看不起上海领导人。加上第二天美国政府发表了一篇对中国不太友好的讲话，徐景贤他们越发认为黑格的态度是有来头的。于是，他们找黑格辩论，向他提出抗议，把他训了一阵。黑格应该是没有经历过如此的外交场面，吓得大气不敢出。因为他的使命是来打前站的，如果当地领导人不配合，他完不成任务，回去交不了差。

上海方面还打电话到杭州，说黑格完全是帝国主义的态度，很坏，要求杭州方面接待要“降温”。结果，黑格一行到杭州后，受到冷遇。在安排黑格游西湖时，本来游船上摆好了吃的糖果和点心，后来都临时撤走了。陪同的领导也都一个个板着面孔冷冰冰的，不搭理黑格。

黑格一行莫名其妙，惶恐不安。他们心想是不是因为在同周恩来会谈时说错了“生存能力”的问题得罪了周恩来？

外交部陪同黑格的干部看到上海、杭州的做法后，心里也很不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让黑格产生误会。如果让黑格产生中国改变了态度的误会，对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不利。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把这个情况向北京作了汇报。

周恩来得知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亲自打电话，严厉批评上海的做法完全是不顾大局。他说：

“主席授权我批评你们这种不顾中美关系大局的做法。黑格回到上海后，接待要‘加温’。主席指示，美国人爱吃糖，给黑格他们每人送10斤糖。”

原来，在基辛格一行第一次来中国，住在钓鱼台。按照总理指示，在客房中放的烟、茶、糖果等每天要换。第一天，放在他们房中的东西他们都没有动。第二天，发现放在他们房中的烟和糖少了许多。待他

们走后,给他们放在室内的糖果竟一扫而光了。大家笑着议论,客人是来时摸不清底细,不敢乱动;走时心情轻松愉快,行动也就随便了。

陈毅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听后很长时间面无表情,无言无语。他望着窗外,零零星星的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落在窗户上,渐渐融去。雪花就这么落下,融去,再落下,再融去……

是啊,扳着指头数数,那些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元帅们,活着还有5位……

1月7日上午8时多,三座门军委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对大家说:“陈毅同志于昨晚11点55分因病去世了,因为陈毅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军委,所以中央决定陈毅同志的治丧工作由军委牵头办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协助。周总理征求了几位老帅对陈毅同志治丧的意见,总的精神是,由李德生同志牵头成立一个治丧小组,负责治丧的具体事宜。治丧程序与李天佑同志相同,规格略高。今天到会同志们的任务有三件:一是拟定新华社的新闻报导方案,由新华社的同志负责;二是为中央军委起草一个向党中央关于治丧问题的请示稿,由军委办公厅的同志负责;三是草拟一个悼词稿子,由总政治部的同志负责。现在就在会议室内开始工作,晚饭前完成稿子送审。”

在会议室负责组织工作的,除了吴庆彤外,还有军委办公厅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任金涛和总政治部秘书长王迪康。做具体工作的人员,新华社有3位,军委办公厅有两位,总政治部去了干部部第二任免处的干事刘岩。于是,撰写陈毅悼词的任务就落在了刘岩身上。

刘岩在机关里虽然经常参加起草公文之类的工作,但从来没有写过悼词,特别是陈毅这样一位在“文革”中颇有争议的人物,悼词中对他怎么评价?他心中无数。因此,再三面陈在场的几位领导,请他们讲一讲,哪怕是几句话也好,但谁也不愿意发表意见,不给定个基本调子。开始,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亲自打电话或让王良恩打电话给吴庆彤,对新闻报导和追悼会安排方面的问题不断作补充指示,但却没有悼词方面的具体指示。

最后,王迪康秘书长对刘岩说:“总理不是讲了吗,规格略高于李天佑同志,你就按略高于的精神先拟个草稿出来再研究吧。”

于是,刘岩只好下决心“自作主张”了

“规格略高于李天佑”是陈毅同志治丧的总原则,因此李天佑悼词理所当然就成为刘岩心目中的“参照物”了。但李天佑1955年授的上将军衔,而陈老总授的是元帅军衔,李天佑1970年9月逝世时是副总参谋长,而陈老总逝世时是军委副主席,无论两人的军衔还是军职均相差两级,所以刘岩考虑应当参考一下已经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的悼词。在陈毅之前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有4人,其中彭德怀、林彪、贺龙当时都没有悼词,唯独1963年12月逝世的罗荣桓有悼词。于是,经请示王迪康同意,刘岩给《解放军报》社打电话,将载有罗荣桓和李天佑追悼会消息和悼词的《解放军报》迅速调到三座门供参阅。

刘岩参照罗荣桓、李天佑的两篇悼词,按时完成了陈毅悼词的起草工作。下午,他把初稿交给王迪康审示。王迪康口头提了几点文字方面的意见,对实质性的问题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动笔在稿子上修改。刘岩抄正后,王迪康交给在场其他两位领导过目,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晚饭后,悼词初稿随同军委办公厅代军委草拟的治丧《请示》稿一并呈治丧小组讨论,这时悼词的呈报稿共为566个字。两件稿子经治丧小组通过,将《请示》打印后,将手抄稿附在《请示》件后面,由李德生签名“呈叶副主席阅示”,落款时间是“元月八日二时”。

叶剑英于“一月八日三时廿分”签名“呈总理阅示”。

第 1234 回：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 政治局，在解决新疆问题

1月8日凌晨，周恩来收到叶剑英代表军委报送的陈毅治丧《请示》和悼词草稿。《请示》中提出，陈毅的治丧活动包括两项，一项是用3个半天向遗体告别，一项是用1个半天开追悼会。追悼会的规模建议组织1200人参加，其中党中央机关100人，国务院机关400人，军队系统700人，建议参加追悼会的领导名单有：

中央政治局的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

中央军委副主席及办公会议成员徐向前、聂荣臻、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

党中央机关的负责人耿飚、郭玉峰、王良恩；

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员李富春、郭沫若、张云逸、张鼎乙、曾山、王震；

国务院业务组及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华国锋、粟裕、余秋里、苏静、姬鹏飞、方毅、白相国、王国权；

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

北京市委吴德；

军委各总部负责人；

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各1至2人；

陈毅生前友好。

周恩来审阅军委的《请示》时，在参加追悼会人员的名单中加上了乔冠华、韩念龙、李耀文、王海容、陈德和、马文波、李强7人。同时注明：“因八宝山灵堂太冷”，江青、宋庆龄、廖承志只向遗体告别，不参加追悼会。

周恩来随后批示：“拟同意。即专送康生（不送）、江青、春桥、文元

(不在)、先念、登奎、东兴同志批。周恩来 1972.1.8 五时”。

江青传阅时批了：“我可以去参加追悼会”9个字，其他4人圈阅完毕，早晨上班前，周恩来让值班人员告知治丧小组，可以按计划从上午9时开始向遗体告别。

1月8日，周恩来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静静地走近陈毅的床边，恭恭敬敬地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而后，伸手掀起覆盖在陈毅身上的白布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握住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

陈毅死后，301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许多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干部和群众。他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人数越聚越多，最终惊动了中央高层。

当天，周恩来审改了陈毅的悼词，补写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改后，于当日夜间给毛泽东写报告，呈报陈毅治丧工作安排，重点是请示关于陈毅悼词的写法和修改问题。全文如下：

主席：

陈毅同志于一月六日深夜在抢救无效中逝世，七日已托张耀祠同志转报。今(八)日政治局、军委、国务院有不少同志前往医院向遗体告别，九日火化，十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只请内宾，不请外宾。

这里，有一个问题，悼词怎么写为好。军委建议、政治局传阅同意，悼词由叶剑英同志念，剑英审阅后的悼词如另稿。除第一页对陈毅同志在离职假期中患病不治而死必须有所交代外，对第二页有两个方案，一个照原稿除两三处小增改外均不动；一个照我的修改稿，增写一长句，删去用红笔勾的一短句，这样可免去悼词的老一套，也为陈毅同志作了一定意义上的估价。但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但如发表在报上，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想。究如何为好，请主席指示。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一月八日夜

因为悼词中已有“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

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的结论，毛泽东接到周恩来送来的陈毅悼词后，将周恩来补写的那段评价陈毅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在稿纸一边批示道：“基本可用。删去两段”，“前面已作了结论，后面两段均可不要。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当天毛泽东就圈发了有关召开陈毅追悼会的文件，包括陈毅追悼会的规格。

按照文件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定于1月10日下午15时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

但是接连两天，副主席宋庆龄来电话，坚持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发来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许多民主人士也纷纷表示要前来悼念。

周恩来均以天气寒冷、场地狭小等理由反复劝阻他们前来。

1月10日中午饭后，按惯例毛泽东是要休息一会儿的。可是他裹着睡衣，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卧床上躺着，辗转不安。

张玉凤发现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起来到沙发上坐一坐。张玉凤搀扶他走进书房。毛泽东坐下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显得心事重重。

自从圈阅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他就一直这样意乱心烦，越加显得面色憔悴，腮边的胡须很长。

当时毛泽东手边没有日历，桌子上没放钟表，也没有任何人提醒他，在追悼会快要开始之前，毛泽东突然抬头询问张玉凤：“现在是什么时间？”

当张玉凤回答他是1点30分的时候，毛泽东拍打了一下沙发的扶手：“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完，他便缓缓站起身来。

太突然了！毛泽东的这个举动，谁都没有想到。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一月十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

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也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周恩来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说：“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接着他又电话告知外交部：“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周恩来搁下电话，忘记了自己身上还穿着睡衣，一边让卫士长张树迎赶紧调车，一边匆匆往外走。他要赶在毛泽东之前到达八宝山！

在汽车抵达目的地之前，周恩来才好不容易将睡衣换了下来。而毛泽东则穿着睡衣走进了追悼会场。

1月10日早饭后，参加陈毅治丧活动的工作人员就已进入八宝山礼堂布置会场，午饭由三座门食堂送到现场。

刚吃过午饭，现场总指挥吴庆彤把刘岩叫去说：“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另外还要增加宋庆龄等一批各界人士，你马上办三件事，一是让写花圈飘带的同志赶快准备笔墨纸张，给毛主席等领导同志新增加的花圈写飘带。毛主席的花圈怎么也不能比西哈努克送的差，八宝山

库存的花圈都不合适，已派人另行采购去了；二是重新测量划分场地，把中央领导同志站的前区位置多让出一块来；三是要求各休息室服务人员和门口的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保证秩序，保证安全。”

之所以要重新购买花圈，是因为西哈努克送的花圈是鲜花做的，八宝山没有鲜花圈。

开追悼会的1月10日，正值三九，是北京最冷的季节，而八宝山礼堂和各休息室都没有暖气设备，只能靠火炉取暖。但八宝山殡仪馆只有一般的小火炉，没有大炉子，国务院和总参管理部门从别处找到一些铁铸大火炉，但找不到大烟囱，只得临时上街定做。火炉取暖带来的问题是煤气中毒。为了保证安全，调防化兵部队的一个小分队，携带仪器进入八宝山，从8日晚炉子点火开始，昼夜检测，保证厅、室内既达到要求的温度，又要保持空气洁净。

周恩来比原定时间提前到场了。他一下车，就三步并作两步。一进八宝山休息室，就激动地通知张茜：“毛主席要来！”

神情黯淡的张茜听到这个突如其来消息，泪水流下。

周恩来安慰道：“张茜，你要镇静些啊！”

张茜强忍住抽泣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

周恩来没有回答。

毛泽东一下车就被人们簇拥着来到燃着电炉的休息室里。他的悲切和疲倦显而易见地印在明显苍老、憔悴的脸上。

张茜看到了毛泽东，令人心碎地惨然一笑，泪花在眼眶里盘旋：“主席，您怎么来了？”

毛泽东也忍不住凄然泪下！他握住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激动地挽住毛泽东的手臂。她尽力抑制悲痛，对毛泽东说：“陈毅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12月26日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但是还吃了一点寿桃、寿面，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毛泽东眼眶红了，他深知陈毅的至情至诚。他关切地问：“孩子们呢？叫他们进来嘛。”

陈毅的4个孩子进来后，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要努

力奋斗,深情地对孩子们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立了功劳的。”

“陈毅同志 26 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主席,从那时起,在你老人家的指引和教导下,他才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我们这一家。”张茜说。

毛泽东回应:“陈毅同志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听到这些,张茜心潮起伏,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陈毅同志和我有过几次争论,那个不要紧嘛,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是能团结人的。”毛泽东说。

谈话告一段落时,张茜真诚地请求:“主席,您坐一会儿就请回去吧!”

毛泽东微微摇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张茜忍着泪水连忙说:“主席,那怎么敢当啊!”

有人进来报告:“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来了。”

毛泽东稍稍地一怔,立刻转身朝门外望。

西哈努克和陈毅相识了十多年,交往颇多,对陈毅的感情很深。陈毅去世后,他几次向周恩来提出要亲自来八宝山,参加追悼会。周恩来没有同意,因为当时定的规格是不请外宾。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互致问候,然后对他说:“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 9 月 13 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西哈努克惊异地望着毛泽东。林彪出逃,中国还未向国外公开发布消息,他是毛泽东亲自告知林彪死亡消息的第一个外国人。

“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叛逃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陈毅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他和另外一些人不一样,例如林彪,他要搞政变,搞阴谋投降苏联。”

毛泽东左顾右盼。在接着的谈话中,他不仅谈了陈毅,还谈到了

邓小平。他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陈毅追悼会由于毛泽东的突然出现，原定较低的规格一下子提了上来。才接到通知的宋庆龄和一批民主人士也纷纷赶来。八宝山礼堂并不宽敞，一下子搁不了这么多人，很多冒着寒风赶来的老干部只能站立在追悼会场外为陈毅元帅送行。尽管1月10日那天下午气温在零度以下，阴沉的天空还飘散着零星雪花，寒风刺骨，可是没有一人退场，没有一人抱怨。

这时，叶剑英起身轻轻来到周恩来身边，把两页文稿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不解地问：“这是什么？”

叶剑英没有做声，只是望着周恩来，双手抱拳在他面前拱了拱，转身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周恩来展开文稿一看，明白了。原来叶剑英要周恩来为陈毅致悼词。

追悼会下午15时整准时开始。会场内没有军乐队，只有一架留声机反复播放着哀乐。

这时，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向会场走去。

哀乐声中，毛泽东和全体人员面对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毛泽东凝重而深沉地弯下他高大的身躯，低下他花白的头颅，为他的战友致哀。当他再次抬起头时，泪光盈盈，久久凝视着陈毅肃穆的遗像……

追悼会上，周恩来念着悼词，深情地说：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不足600字的悼词，周恩来竟读得两次哽咽失语……

1500多人的会场笼罩在深深的哀痛中，人群里不时传出低低的悲

咽声。

毛泽东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他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望着，双唇不停地抿动，似乎有无尽的话要说……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张茜搀扶着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到汽车前。毛泽东双腿明显无力，几次用力迈步都没有登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坐了进去。

张茜和所有到会人员没有想到，这一次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的追悼会。

追悼会结束后，杜修贤一头扎进了照片的后期制作，暗红色的灯光下他熟练地将一张张白色的相纸放进药水中显影，没有一会功夫儿，白天追悼会上催人泪下的悲伤场景就跃然纸上。他在洗好的照片中首先选了一张全景照片，将它从毛泽东大衣下摆处裁去。这样就遮挡了毛泽东身着睡衣的痕迹。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的通栏标题、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陈毅追悼大会，同时刊登了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的悼词和西哈努克撰写的悼文。此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新华社又继续播发了一些外国政府首脑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陈毅追悼会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工作情况。会议认为：新疆、江西、贵州、云南等地问题值得引起注意，尤其是新疆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仍将主要斗争矛头指向王恩茂，不利于团结对敌。会议商定近期约新疆党委和军区负责人来京一谈，以促进他们的认识和团结。

原新疆第一书记王恩茂在“九大”后既已调离新疆，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劳动锻炼。

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并讲话说：“把批判矛头对准王恩茂的‘两个主义’和‘一个王国’，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中央的政策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这里说的“两个主义”指“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一个王国”指“独立王国”。是文革开始后批判王恩茂的内容。

周恩来强调：“现内部最大的问题，是出了林陈反党集团，从‘913’至今，已经四个多月了，你们还没有自觉地深挖思想。”

他谈到邓小平，说：“林彪就是要把邓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又说：“听说新疆现在还有人讲‘二月逆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你们听到那些话，为什么不批驳？”

最后，他要求代表们多作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搞好团结。

第1235回：年事高，毛泽东身患肺炎 性执拗，一月内两次昏迷

1972年的新年是寒冷的。严冬中的中南海，曾经郁郁葱葱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谢、飘零……1971年入冬前，毛泽东患大叶性肺炎。1972年初，医护人员又发现毛泽东的腿部开始出现轻度的浮肿，两小腿和足踝部都有明显的压痕。他的血压也在升高，以前，他的血压始终都维持在高压130毫米汞柱、低压80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可是到了1972年1月，毛泽东的高压在最高时竟然升至180毫米汞柱，低压也大多徘徊在100毫米汞柱左右。血压的居高不下导致了毛泽东的体力下降。他每日须遵医嘱卧床休息，便秘的症状也在加重，有时两三天才解一次大便。这期间，毛泽东的胃口又不好，食量的减少也影响了他的抵抗力。

参加完陈毅的追悼会后，毛泽东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肺部感染也明显加重，并伴有低烧症状。两天后，他的双腿浮肿开始加重，浮肿部位向上蔓延。医生在检查中发现，毛泽东肺部杂音不断加大的同时，又出现了心律不齐等症状。尽管疾病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可是毛泽东仍然不同意注射抗菌素，只同意口服消炎药。

由于不断的咳嗽，毛泽东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床上平卧而眠了，他在夜间只能倚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睡觉。

1月18日，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周恩来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只见他脸色灰白，挥挥手说：“散会散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去，已没有了往日的镇定。

卫士长张树迎扶着周恩来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周恩来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周恩来的声音也微微发颤。

张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中南海游泳池，就看见毛泽东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刚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脸色发青，嘴唇发紫，正大口喘着气。周恩来如释

重负。

原来,毛泽东突然发生昏迷,这是自他患病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况,让他身边的医护人员大为不安。中央决定立即成立专门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治病。除原来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外,又临时从北京医院、阜外医院、北京中医院和中南海门诊部等单位,抽调有治疗经验的内科医生多名,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病情的检查和诊治工作。

经过医疗小组对毛泽东的会诊,一致认为应对他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以期对毛泽东的病情做出最后确诊。

然而,当医疗小组把上述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时,他仍然不同意做全面的身体检查。后来,还是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现在马上治疗,病情不但会好转,而且恢复也比较快,如果继续拖延下去,肺炎有可能转为其他疾病。从当前下肢浮肿有明显向上扩散的迹象上看,主席最好尽快做一次心电图的检查。”

毛泽东尊重了周恩来的意见,但他只同意做一次心电图,其他繁琐的检查仍然不愿意配合。经过医疗小组的再次力争,毛泽东最后只同意做心电图和 X 光胸透两种检查。

胸透片子出来以后,证实了毛泽东肺部感染已相当严重。医疗小组还发现,由于肺部感染长期得不到进一步的有效治疗,现已危及到病人的心脏。心电图显示毛泽东已出现了肺心病的明显症状。不仅如此,专家们还发现,心电图显现的结果已经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病情转重,在肺炎的基础上,又发现了血性心力衰竭和阵发性心动过速。专家们通过 X 光和心电图检查所得到的结果,诊断并认定毛泽东 1 月 18 日的昏迷,就是因为肺性脑病所致。这是因为肺心病可以直接造成脑部的缺氧,所以也才有毛泽东平日精神不振及昏睡等相关症状。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坚信自己的病情并没有医疗小组所估计的那么严重。对于医疗小组提出的强心、消炎和利尿三大医疗方案,毛泽东虽然勉强接受,但是他仍然说:“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在医疗小组开始为他实施注射青霉素和口服抗炎药之后,毛泽东又派人去询问当时也生病住院的康生实施的治疗方案。当他听说康生只用抗生素,其他药品一概不用时,毛泽东又回到他原来固有的立场上来,决定马

上中断正在进行的黄胺制剂的注射。

毛泽东的病情继续加重。1月21日晚19时30分，周恩来和江青一起来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在听取医疗小组汇报的时候，周恩来也为毛泽东越加严重的病情及他本人仍没对疾病引起高度重视而感到忧虑。鉴于毛泽东的病情确实在悄悄转重，周恩来决定在当晚21时召开政治局会议，把毛泽东最近病情的变化及医疗小组的意见，一并提交政治局会议研讨讨论，以期达成共识尽快制订一个让毛泽东能够接受的治疗方案。

怀仁堂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如期举行。会议期间，姚文元从会议室来到怀仁堂东大厅，接见了等候在那里的几位医疗小组成员和内科专家。

政治局研究毛泽东病情的会议一直进行到凌晨4时方才结束，叶剑英就和李先念再次接见了医疗小组的主要成员。叶剑英说：“政治局让我们再和你们谈谈主席的情况，你们不要有顾虑，把主席的病情讲清楚。”

医疗小组把毛泽东不愿接受医疗小组关于施行消炎、强心、利尿三套医疗方案，始终坚持自己病情并不严重等情况作了汇报。正是因为医生们无法改变毛泽东对医疗方案的观点，所以，本来可以早见疗效的肺炎竟久治不愈。如果继续这样拖延下去，甚至还有可能累及心脏。医生们认为，根据最近一次心电图显示，毛泽东已经出现了心律不齐和心肌缺血的情况。专家们把对毛泽东病情发展的估计，也向叶剑英和李先念作了汇报。叶剑英当即认为医疗小组关于毛泽东心脏已出现心室性早搏等情况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4人负责领导对毛泽东疾病的医疗救治工作。

毛泽东因心情不好而拒绝配合医疗小组的治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2月初。在此期间，他只能倚靠在沙发上睡觉，咳嗽也越来越重，有时坐在沙发上就不知不觉陷入了昏睡状态。2月1日，他抱病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

就在这时候，一个促使毛泽东主动要求治疗的契机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请示报告

摆到了毛泽东卧室的茶几上。毛泽东批阅文件以后，顿时产生了快点治好病、准备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的强烈愿望。毛泽东的这一突然转变，使得整个医疗小组成员的精神为之一振。由于毛泽东希望和尼克松会见的心情十分强烈，所以他这次对医疗小组的医治方案相当配合，不但接受了消炎、强心和利尿同时并进的方案，而且又同意在服药的同时进行静脉滴注抗菌素。

2月4日的治疗刚开始不久，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突然休克，脸色发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摸不到脉，已完全昏迷。起因是医护人员在为毛泽东进行肌肉抗生素注射后，他即开始剧烈的咳嗽。忽然，毛泽东咳上一口痰来，由于体力衰弱，这口痰竟然咳了许久也无法吐出来。卡在喉咙里的这口痰，使毛泽东当即发生昏迷。

由于发病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发病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身旁，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也没有反应，意识到他发生休克，立刻大声喊人。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的张玉凤，听到她的呼叫，几个人一起跑到已成为毛泽东卧室和治疗室的会客厅，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正在给他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她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由于毛泽东游泳池住地内不准运进各种医疗器械，所以医疗小组一时无法采用吸痰器进行抢救。这样只好打电话求助于距游泳池住地尚有一段距离的中南海门诊部，让其火速将相关急救器械运到游泳池住地。

正在西华厅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惊悉毛泽东再次发生昏迷，马上中断会议，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因两腿无力，他许久都下了车。

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他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周恩来疾步来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

大约 15 分钟后,抢救人员将医疗器械运到。这时,毛泽东仍处于昏迷之中,情况非常危急。

在将氧气瓶、吸痰器、呼吸机及大批相关药物运到毛泽东身边后,医疗小组和中南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先对毛泽东注射强心和缓解气管的激素类药物,又用吸痰器将毛泽东喉咙中的痰块吸出。这时,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困难,医护人员马上为他加用了呼吸罩。在场的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扶起主席,用力并有节奏地捶主席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

大约 20 分钟过后,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他慢慢醒来,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睡了一觉。”当他发现在自己床边围满了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时,才知道自己刚才因为一口痰咳不出而发生了极度的昏迷。

毛泽东清醒过来后,体温仍在摄氏 38 度以上。工作人员把周恩来、汪东兴请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毛泽东:“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毛泽东看看大家,又看看周恩来,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

周恩来当即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召开医疗小组成员碰头会,总结这次抢救毛泽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在对医护人员紧急抢救并使毛泽东转危为安表示肯定之后,同时指出在毛泽东身边找不到吸痰器等医疗器械而险些酿成大祸。当他听医疗小组介绍说,此前不允许把各种相关医疗器械运进毛泽东住地的规定时,周恩来立即决定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尽快安装必要的医疗器械。同时,他又和医疗小组一起研究了治疗毛泽东疾病的新方案。

由于医疗小组有效的输液和施用大剂量的利尿药物,毛泽东在 18 时就排出 1800 毫升积存在体内的尿液。这是毛泽东近一个月来排尿量最多的一次,也是他病情好转的先兆。

多时为下肢浮肿所困的毛泽东,得知自己忽然排除了这么多的尿液,顿时精神一振。他当晚亲自请医疗小组成员吃饭,再一次表示他希望以健康的身体在 2 月 21 日会见尼克松。

毛泽东的病情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可喜的新转机。医疗小组再

接再厉,不断为毛泽东的施治过程修改医疗方案。到了2月中旬,已经困扰毛泽东多时的下肢浮肿症状,由于排尿顺利而出现了明显的消肿,肺内感染也同时消除了,剧烈的咳嗽和低烧症状也随之缓解。到了2月17日左右,多时不能在床上平卧而眠的毛泽东又能够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觉了。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遵医嘱施行戒烟。到了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的当天清早,毛泽东已经能够在住地小范围行走了。

但是,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人小心翼翼地不使他再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对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他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时,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热手巾、要换垫子等。但他的个性依然那么强,有什么不舒服,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39度的时候,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周恩来到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说:“我什么事都没有。”有一次他要睡又躺不下去,憋气,吴旭君难过的掉下眼泪。

毛泽东说:“你哭了。”

吴旭君说:“没有。”

毛泽东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

失去健康的毛泽东,整日躺在床上看大本线装书,可是就在此时,他又发现自己的眼睛不仅老花程度加深,白内障也随之严重起来,他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几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对此就深有体会。

曾经有记者问她:“毛主席向你们发脾气吗?”

张玉凤毫不犹豫地回答:“发!1970年以后,主席身体患了多种疾病,有时情绪不好,渐渐地,我就觉得毛主席也和平常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不过,他始终像父亲一样对待我们工作人员,是位非常慈祥

的老人！我们在他身边久了，他也熟悉了我们，就像对家里人一样。有时遇到我们做错了事，或是他的情绪不好，就会发脾气。当时我也觉得委屈，觉得自己已经尽责尽力了，还是挨批评。现在看来，这不能怪主席。他操劳的是国家大事，加上国际风云不断地变幻，国内形势也不稳定，他心头有很重的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年轻人无法认识和体会的。所以就不能准确把握主席的内心活动。比如，主席正在看文件，我见饭要凉了，就提醒主席说：主席，饭菜要凉了，还是先吃饭吧。主席一听，火了：你没有见我在看文件吗？不吃！不过，主席发脾气，从不往心里去，发完也就忘了，并不计较我们的过失。主席一辈子爱看书，他读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主席读书有个习惯，不爱坐着看，常常捧着书靠在床上看。他的眼睛老花，又有白内障，看不清字体，却又不肯配带老花镜，只好借助放大镜看书。放大镜是象牙做的框，很重，他竟能拿着看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书。主席读书范围很广，历史天文地理文学，几乎没有他不读的。”

第 1236 回：历史性，尼克松总统访华 没想到，毛泽东当天接见

1972 年 2 月 17 日 10 时 35 分，尼克松的“空军一号”从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这也是第一个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访问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几个月前基辛格访华的秘密而不宣相反，这一次是公开而高调。飞机先在关岛加油，按照中美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于 2 月 20 日 21 时到达上海。机门打开，按照中美事先约定，中方的 7 人先遣小组按礼宾顺序登上美国的“空军一号”：第一个是乔冠华，第二是章文晋，第三是王海容，然后两个翻译——章含之、唐闻生，还有礼宾司的唐龙彬及一位警卫人员。

尼克松与夫人对中国客人给予了很大的礼遇，带着他们从头到尾参观了美国的总统专机：最前面是总统套房，里面有床和卫生间，外面有个大会客室；第二个舱是高级官员乘坐的，有点像头等舱，可以坐六、七个人；再后面是通舱，技术员会在靠前位置，记者们坐在靠后位置，这样总统可以随时发布消息。大名鼎鼎的“空军一号”并不是想象中那般奢侈，但是其内部设施的齐全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地印象。

2 月 21 日北京时间上午 11 时，尼克松的专机出现在北京的上空。周恩来和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从休息厅走出来，跑道两面站着衣装笔挺的三军仪仗队。

11 时 10 分，美国总统的副机首先降落在东郊天竺机场。11 时 27 分，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11 时 30 分，飞机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

2 月的北京依然寒冷，站在舷梯前的周恩来并没有戴帽子。尼克松考虑得的确很周到，他在飞机上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恩来是否穿了大衣？得到的消息是肯定的。于是，尼克松也穿上大衣。

机舱门打开了，穿着大衣的尼克松总统与穿着火红呢子大衣的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

按惯例，应该是随行人员先出现在舱门，而尼克松却早有安排，他让其他人员退后，自己第一个出现在舱门，他要人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在第一时间照面的镜头，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群众的注意力。这一安排，在抵达北京前，尼克松告诫基辛格和罗杰斯至少十几次。于是，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留在飞机里。

周恩来站在寒风中，旁边有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姬鹏飞外长等中国要员。当尼克松下舷梯走到快一半时，周恩来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他步子很快，一边招手一边鼓掌，不等走下舷梯，尼克松已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伸向了两、三米外的周恩来。

周恩来也迎上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足足有一分多钟。现场的100多部照相机随即发出一片爆豆子般的声音，大家都拍到了两国领导人握手的照片。

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也是一个时代开始。尼克松显得很激动，说道：“总理先生，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你们伟大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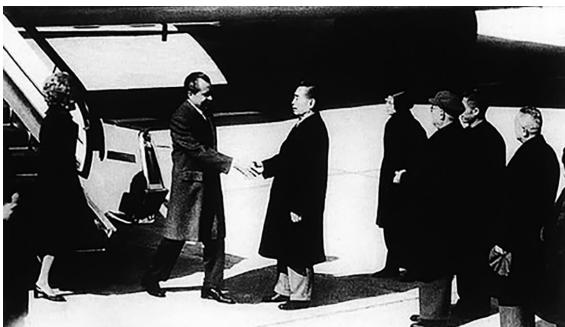
周恩来说：“总统先生，非常欢迎你到我们的国家访问。”

紧跟在周恩来后面的翻译冀朝铸翻译出尼克松那句有名的话：“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

周恩来回答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这一划时代历史性场面通过卫星电视传到全世界。

时任新华社中央组驻中南海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抓到了俩人的手尚未握在一起、但又迅即在握的瞬间。它不但表现了握手的结果，更突出了握手的欲望，画面效果超凡脱俗，可谓是“决定性的瞬间”。就是这零点几秒的时间差，就是两只手之间这微小的间隙，使得这张照片在无数的握手照片中脱颖而出，成为经典新闻事件的经典新闻摄影之作。第二天全国的报纸都发了这张照片，世界各国的报纸也用了这一张。后来《尼克松回忆录》的封底也用了这张照片。



周恩来迎接尼克松(杜修贤 摄)



上面两张图片取自同一场景，角度不同，人物也有差异。下图是美国记者拍的，周恩来身后是冀朝铸，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1948年考入哈佛大学，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他回到中国，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54年4月在外交部工作，先后参加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但是，中国公布的这张著名中美“握手”照修掉了冀朝铸，突出了王海容。

躲在机舱里的基辛格和罗杰斯等人，直到尼克松单独一人和周恩来历史性地握手完满结束以后，他们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走出机舱。



接着，在机场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检阅了三军仪仗队。中国三军仪仗队的最高规格为 151 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是这一规模的两倍。他们排成整齐划一的人群，对 15 人组成的代表团行注目礼，尼克松后来说，“中国仪仗队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

这一刻，成为举世瞩目的时刻。此时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 10 时 30 分，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中美双方精心挑选了这一时间，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刻，出现在大洋两岸数以亿计的电视荧光屏上。

中美关系的冰河，从此解冻。

美国一家电视台在转播这一实况时，还插播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北京机场受到身穿彩装的几千名群众欢迎的场面。解说词说：尼克松访华历史事件是分水岭。同北京接待齐奥塞斯库规格相比，对尼克松的接待规格差多了。到机场迎接的官员很少，没有群众，没有儿童献花，没有各国的外交使节。美国记者还说：“除了仪仗队以外，在场的美国人比中国人多。”

欢迎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和尼克松随后一同进入一辆挂着帘子的防弹高级红旗轿车。

汽车驶进钓鱼台国宾馆后，在 18 号“元首楼”前停下，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在此迎候美国客人。

尼克松、基辛格和白宫来的人住进 18 号楼。国务卿罗杰斯等国

务院人员住 6 号楼,记者和其他人员住在民族饭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方不安窃听器,也不搞录音。在钓鱼台 18 号楼的餐厅里特意挂上了一幅毛泽东的诗句:“无限风光在险峰”,寓意深远。

在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与尼克松漫谈了 20 多分钟,分手时已是中午 13 时多了。按照原定计划,中美双方将在下午 16 点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可是届时周恩来和尼克松都没有露面。随访的美国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门前苦等应来参加会谈的尼克松而未果。一向守时的尼克松的“迟到”引起种种猜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对此评论说:“尼克松迟到了。尼克松平时是严格遵守时间的,这次迟到不知是旅途劳顿了呢,还是另有隐情。”还有人猜测说,也许尼克松对机场没有群众欢迎的场面感到不满。

下午 17 时,中方宣布全体会议推迟至 18 时开始。可是出人意料的是,17 时 55 分,白宫发言人齐格勒突然宣布:“尼克松总统在到达北京 3 小时后,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认真和坦率的会谈。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

这太出乎预料了。虽然事先双方商定的程序表上列有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这一最重要的会见,但没有确定时间,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中国方面无法事先定下毛泽东何时能够会见尼克松。所以,周恩来走后,尼克松吃过午饭,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

“总统先生,毛泽东主席想见您。周恩来已经来到楼下。”

原来,下午 14 时 30 分,有人来告诉刚刚吃完丰盛的午餐的基辛格:“周总理有急事在会客室等着要见你。”

基辛格赶紧来到会客室,一见面,周恩来不像往常那样先寒暄一番,而是直接对他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并询问美方都有哪些人陪同参加?

这是一次人数受到限制的会见,双方参加人员都不多。基辛格回答说,尼克松总统让基辛格本人陪见,另派洛德去做记录。基辛格提出,希望中方不要告诉国务院的人,特别是洛德参加会见的事不能讲出去,新闻、照片、电视里都不要出现洛德。基辛格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是不让美国国务院的人参加,二是怕引起国务院的人不满,只好让

中方为此保密。

基辛格还问周恩来：“今天晚上的祝酒辞是温和的还是不温和的？”

周恩来说：“我待会儿给你看。现在主席等着，我们先过去。”

对于尼克松来说，与毛泽东会谈是早有所准备的，但是没有想到会安排得这么快，他内心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喜悦。

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毛泽东突然休克的危急日子只有9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会见尼克松呢？毛泽东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力，决定仍会见尼克松，尽管人们当时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实际健康状况，外国新闻界盛传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病重，甚至国外还有传言，他已逝世。

美国人显然知道这个接见的分量——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5个月里，毛泽东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过4次。

尼克松带上基辛格和洛德匆匆忙忙上车，只带了两个随身警卫。这两个警卫是在出发前一两分钟前才知道此事，当他们匆忙走出门外，看见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唐龙彬正招手让他们上自己坐的车，将他们带往中南海。

这次会见，连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人都毫不知情，更何况那些跟隨尼克松而来的大批美国记者。不过也有例外，英国《泰晤士报》和法新社的记者从一大早就派人在中南海外面蹲点，15时多，他们看到一个车队疾驰而入，马上发了第一条新闻。事后，美国记者非常气恼：美国总统的大新闻却不是美国人先发的。

尼克松到达北京前，护士长吴旭君给毛泽东念外电评论，其中朝鲜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投降的意思。

毛泽东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2月21日，毛泽东尽管昨晚工作到很晚，但今天却起得很早。他把吴旭君叫到床头，对她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

此事非同小可，十万火急，必须马上准备。

吴旭君首先照顾毛泽东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然后，小

跑着出了屋，赶紧通知张玉凤，因为届时将由张玉凤负责搀扶老人家迎接客人。接着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毛泽东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时的茶水。然后，吴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毛泽东的贴身警卫李连成，再由他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南海西门门卫。另外还通知了秘书徐业夫。细心的吴旭君还通知了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让他准备点食物，因为她担心老人家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最后，她跑到因毛泽东病重而常驻中南海游泳池的医疗组，告诉他们即将会见的消息，请大家随时待命。办完这些事情，吴旭君赶回卧室，把老人家扶到会见厅，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医疗组，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物品。

中南海内外很快被装饰一新，毛泽东书房里还破例摆满鲜花。理发师不仅为他修整了头发，还仔细地为他刮了脸；护士小张则特意拿出那套灰色的“毛式”中山装，小心翼翼地帮毛泽东换好……一切准备完毕，毛泽东便坐在沙发上，托起一本书，静静地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下午14时左右，周恩来在第一时间得到毛泽东决定会见尼克松的消息。他很着急，立即让王海容将礼宾司代司长韩叙叫来，一见面就对他说：“赶快准备，赶快准备。”

一向精明能干的韩叙一时不知准备什么？见此情况，王海容对韩叙说：“毛主席要马上接见尼克松。”

最后，周恩来做了分工：自己赶往尼克松所在的钓鱼台18号楼说明情况，再去游泳池检查会见准备；王海容去中南海游泳池，安排安全保卫及摄影、摄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松尽快前往毛泽东住处。

很快，美国客人就动身了。

中南海游泳池门口，周恩来在此迎候他们，并引领尼克松一行向陈设简单的书房走去。

按照惯例，外宾的警卫人员不能进入毛泽东住处。因此，汪东兴安排尼克松的警卫去怀仁堂休息。该警卫在此无法与仍在钓鱼台的美方警卫主管取得联系，尼克松去往何处，一时间成了空白。美国总统丢了。美国总统警卫主管如雷轰顶，并因此向中方诉苦。

第1237回：书如海，基辛格由衷感慨 说哲学，尼克松赞叹万分

尼克松、基辛格曾把斯诺的文章作为访华人员的必读材料，他们自己也都读过，因此，对于“毛酷爱读书”这一点并不陌生。尽管如此，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时，基辛格还是发出了感慨。对美国人而言，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书桌上摆满了古书。基辛格曾描述过：“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从毛泽东的书房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巨大的窗户都藏在厚厚的大红窗帘之后，书房顶部装有日光灯，沙发旁边还有落地灯。在基辛格看来：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此外，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



毛泽东的书房

构成灰色主调的是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

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思考和阅读的记号,乍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基辛格还在他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使用自己的书房会见国宾。第一次是在20天前,1972年2月1日,病体未愈的毛泽东改在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在此之前,他都是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1972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强打精神,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和越南总理范文同后,再也没能到人民大会堂会见过外宾了。此时的毛泽东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与中南海新华门一步之遥的人民大会堂,在毛泽东政治生涯中已成为“遥远的地方”。

看见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他们走进书房,坐在沙发上等候的毛泽东在张玉凤的搀扶下站起来,他努力站直了身子,面露微笑地迎接尼克松。毛泽东的身体已不容许自己走到门口迎接客人了。

毛泽东伸出手来,尼克松马上也伸过手去,当两人握手时,毛泽东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毛泽东握住尼克松的手约一分钟之久。他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到来,尼克松总统也说,他“非常高兴与主席会晤。”

随后,毛泽东又和基辛格握手,并上下打量着,说道:“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连忙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尼克松说:“你读过很多书。总理说你读的书比他多。”

毛泽东:“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

尼克松:“我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泽东手指基辛格说:“他是个哲学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泽东：“今天请他做主讲人如何？”

基辛格：“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我的学生研读您的著作。”

毛泽东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什么可学的。”

尼克松连忙接着毛泽东的话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这个世界。”

毛泽东说：“我沒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你见到啦？”

尼克松：“蒋介石把主席称为共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周恩来：“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他们也回敬我们为匪。不管如何，我们是互相对骂罢了。”

毛泽东：“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历史比你跟他做朋友的历史长得多。”

尼克松：“是的，我知道。”

毛泽东：“我们两个不要垄断整个谈话，不让基辛格博士说说不行。”他对基辛格说：“你跑中国已经跑出了名嘛。”

基辛格：“是总统确定方向，决定方案。”

尼克松：“他这么讲，说明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助手。”

毛泽东和周恩来笑了。毛泽东：“他在夸你，说你这样做很聪明。”

谈到美国的总统竞选时，毛泽东说：“讲老实话，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

尼克松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毛泽东说：“我是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英国的希思首相是右派，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是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谈了其他许多问题后，尼克松说：“我希望同总理，稍后也和主席讨论台湾、越南和朝鲜问题。我还希望讨论关于日本的未来，次大陆的未来，印度将起到什么作用；还有，讨论美苏关系的未来。因为只有放眼全世界，我们才能对近在眼前和迫切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所有那些麻烦的问题我不想再深谈。我看你的题目更

好——哲学问题。”

尼克松：“有意思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赞成我们此次会晤，但苏联、印度不赞成，日本表示有疑虑。我们必须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同时决定我们应如何发展我们应对世界的政策，而不是诸如朝鲜、越南、台湾这样眼前的问题。”

毛泽东：“对，我赞成。”

尼克松：“比如说，我们必须问自己，苏联为什么向贵国边界部署的兵力比向西欧边界部署的兵力多？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对此存在分歧，那么，是让日本中立和全无防卫更好？还是让它在一个时期内同美国具有一些关系更好？我现在讲的属于哲学范畴，问题在于，在国际关系领域没有好的选择。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会被填补。例如，总理指出，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问题是你们面临何种危险，是美国侵略还是苏联侵略的危险？有困难，但必须讨论。”

毛泽东：“来自美国侵略的问题，或者来自中国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可是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 22 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 10 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周恩来：“这也是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的事。”

毛泽东：“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那时候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坚决反对跟你往来，他说要比较一下约翰逊总统或尼克松总统哪个更好。但是叶海亚说这两个人没法比。他说一个像土匪——指约翰逊总统。我不知他从哪儿得到那么个印象。我们这方面也不那么高兴那位约翰逊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是都不那么高兴的。这个中间有 8 年是共和党的总统，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周恩来：“主要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政策。”

毛泽东：“之前他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事。”

尼克松：“但是他们握了手。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泽东：“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博士？”

基辛格：“主席先生，世界形势在那个时期也已发生急剧变化。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原以为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都千篇一律。直到总统当政，我们才理解中国革命的不同性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革命道路。”

尼克松总统：“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所持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同意的。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是我们对世界新的形势有了一个认识，而我方认识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我们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我认为可以实话实说——我们存在分歧的原因。总理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些分歧。”

毛泽东：“就是啰。”

尼克松：“我还想说的是，审视两个大国，美国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泽东：“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周恩来说：“任何国家都不威胁。”

尼克松：“我想你们也知道，美国对中国的领土没有企图。我们知道中国不想统治美国。我们相信你们也认识到美国不想统治世界。另外——也许你们不相信，但我相信——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都不想主宰世界。因为我们就这两个问题上持相同态度，我们不威胁彼此的领土。

因此，尽管存在分歧，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共同的立场，来建立一个双方都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安全发展的世界构架。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则谈不到这一点。”

这次谈话本来预计只进行 15 分钟，却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从 14 时 40 分持续到 15 时 50 分。在此期间，尼克松注意到周恩来在频频地看表，毛泽东向周恩来核对时间：“你看今天我们谈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克松：“是的。我想在结束时说，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和总理冒了很大风险邀请我们到这里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的一些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个一旦机会来临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争朝夕’。”

就个人而论，我还想说，这也是对你，总理先生你说的，你们并不了解我，因此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将会发现，我从来不说我不能做到的事情。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在此基础上，我希望同主席，当然还有总理，做坦率地谈话。”

毛泽东指着基辛格说：“只争朝夕的是他。我想，大概我像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建立社会主义’这些话。”

尼克松总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泽东：“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他指着基辛格说：“可能他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克松总统：“主席先生，主席的一生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你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

我的背景，不那么为人所知。我也出身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并登上了另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的顶峰。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问题是，我们的哲学不同，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也在今后的岁月中有益于全世界。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毛泽东：“你的书，《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听到这话，尼克松对其他人说：“他读的书太多。”

毛泽东说：“太少。我对美国了解不多。我要请你派一些老师来，主要是历史和地理老师。”

尼克松：“好哇，太好了。”

毛泽东：“我对埃德加·斯诺先生就是这么说的，这位记者在几天前去世了。”

尼克松：“真是令人遗憾。”

毛泽东：“是啊，非常遗憾。

我们谈得成也行，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人

们会说话的。如果我们第一次没谈成,那么人们就会议论,为什么我们第一次没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如果第二次我们谈成了,他们怎么说呀?”

在谈话时,洛德的口袋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他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摆弄了几下,却依然无法使声响停下来,只得无奈地从口袋里把发出声响的东西拿了出来。原来是一个微型录音机。也许是带子到头了,或出了什么故障,所以发出了声响。他本想在口袋中操作,把声响制止住,但没有做到,只好把录音机拿出来,尴尬地当众关上。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幽默地对尼克松说:“我就要去见马克思了,用你们西方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去见上帝了。”

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这句话。两人商量片刻,尼克松说道:“您不会很快见上帝的,因为,要想同时容纳上帝和毛主席,天堂还不够大。(Heaven is too small for both God and the Chairman)”

毛泽东说:“我什么时候去见上帝,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这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喔!”

大家起身结束谈话,毛泽东在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和美国人告别。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泽东没有回应,只是说:“我就不送你了。”

毛泽东这次会见尼克松,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由于担心他在谈话中随时有可能再发生险情,周围的人都十分紧张。会见时,医护人员在附近房间里做好了随时抢救的准备。后来周恩来说:“真不容易,70多分钟,主席一声都没咳嗽,忍住了。”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已十分疲劳,先在沙发上休息了30分钟,才上床休息。

尼克松后来回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时,生动描写了毛泽东的境况和心态。他说: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过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经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它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它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

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安排我们只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经开始疲乏了。”

同时,尼克松又记下了毛泽东这样的情形: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他同时感叹这位“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伟人,“非凡的幽默感”,仍然有统帅整个中国的气度和魄力。

半个多月以后,聪明过人的基辛格,在其白宫那特具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品位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纪录稿时,欣然悟出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已经勾勒出了上海公报的基本线条。就是说,这位伟人,不仅在思索中国的目前,还在构思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

对这次谈话,基辛格后来写道:“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个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的驻军问题。”

会见结束后,总统安全官泰勒找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说:“今天发生了很意外的情况,我们的总统跟我们失去联系 70 多分钟。我们不担心总统的安全,我们完全相信中国的保卫措施。不过如果在这个时间里发生战争导致核战争或发生其他的意外情况,总统不了解情况,没法处理。按照美国的法律,总统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杨德中说:“这是两国领导人临时决定的,我也不清楚。”

第 1238 回：欢迎宴，美国总统“争朝夕” 漫天雪，急动员连夜清扫

2月21日晚，中美举行首次大范围会谈，商讨和宣布了会谈办法和公报形式与内容。会谈结束后不久，晚19时，周恩来举行欢迎尼克松总统宴会。



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尼克松总统及其夫人一行。

周恩来对此次尼克松访华的重视不言而喻。尼克松夫妇房间的布置周恩来都要亲自过问，而在欢迎晚宴上，甚至播放的歌曲也是周恩来亲自决定的。当时，一般国宴上的音乐都是中国的革命歌曲，这一次，周恩来让下面的人事先做好调查：美国人喜欢什么曲子？尼克松喜欢什么曲子？他最后选择了尼克松最喜欢的《美丽的亚美利加》，这也是尼克松就职时演奏的音乐。

果然，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宴会上为客人们演奏《美丽的

阿美利加》音乐一响，尼克松非常高兴。这种热烈的场面通过卫星传递在美国早晨的电视节目中实况转播，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周恩来在祝酒时说：“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当天晚上的尼克松还是遇到了一点麻烦，不过这麻烦跟中方无关——美国国务院来的外交官、年仅28岁的傅立民(Chas W. Freeman)拒绝上台翻译他们总统的致辞。

傅立民是在当天晚上才接到尼克松的私人秘书霍尔德里奇打来的电话，通知他说：“总统要你在晚宴上为他的祝酒词做翻译。”

傅立民说可以，但要先给他尼克松总统发言的书面稿。霍尔德里奇答复是没有书面稿，傅立民坚持说肯定有。霍尔德里奇说他再去问问总统，回来后还是告诉傅立民说没有稿子。傅立民只好向霍尔德里奇摊牌说：“这里一定有鬼，因为祝酒词就是我本人起草的。”

傅立民坚持要尼克松的讲话稿，是因为他知道其中加进了一句毛泽东的诗词，他想知道是哪一句，不然上台把毛泽东的诗句翻错了，那就糟糕了。可是总统坚持没有书面稿，于是傅立民就拒绝上台翻译。

尼克松坚称没有书面稿，是因为他的记忆力很好，讲话稿过目不忘，想给外界留下一个即兴演讲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印象。他怕傅立民到时候拿出讲稿来对着翻译，那就穿帮了。其实傅立民的记忆力也很好，如果尼克松将实情告诉傅立民，他肯定会好好配合尼克松“演出”的。即便如此，尼克松会告诉他实情吗？

无奈下，美方只好求助于中方翻译。

尼克松在祝酒时说：“过去的一些时期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

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的时候，我们哪一方都不会在我们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起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结构。……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尼克松的讲话里果然有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诗，他说：“毛主席说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结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傅立民在那天晚宴上很郁闷，他后来被安排给姬鹏飞和罗杰斯当翻译，同桌还有李先念。李先念递给他一支烟。这是傅立民平生第一次抽烟，从那天起，他一抽便是30年。很多年后，傅立民才知道李先念递来的那支很像英国烟味道的香烟，是中国很有名的“熊猫牌”香烟。

尼克松显然对这次来访做了充分准备：在盛大的国宴上，在座的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对付中餐，唯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味佳肴，他那挺像回事的一招一式，吸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原来，自从访华之事决定之后，尼克松和夫人就开始在家里练习如何用筷子。不仅如此，尼克松还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文，比如“你好”，“谢谢”。

宴会结束时，尼克松刚起身离席，加拿大《多伦多环球报》驻北京记者伯恩斯便快步走到尼克松的座位旁，一把将尼克松用过的筷子揣入怀中。有顷，人们才省悟到伯恩斯的灵敏反应。据传后来有人愿出2000美金买那双筷子。

宴会结束。尼克松夫妇走出人民大会堂，到北门外上车。尼克松夫人边走边兴奋地说：“太美了，可不是吗？太好了，可不是吗？确实

如此。”

尼克松总统一行在中国北京的第一天圆满结束了。

但是，基辛格和美国国务院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了。毛泽东和尼克松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内的会见，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但是美方陪同会见的人员中，除了基辛格，就只有一个洛德。连国务卿罗杰斯也无份，更不用说尼克松随团来华几百人中的其他官员了。这件事是谁决定的？当时愤愤不平的国务院官员都抱怨基辛格。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双方人员基本上是对等的。中方只有周恩来在座，王海容做记录，唐闻生做翻译。美方代表团的翻译是傅利民，他是国务院的人，尼克松不但这次会见没有带他去，而且当晚在周恩来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尼克松发表即席讲话时，也是用的中方翻译唐闻生。中方谁出席或不出席都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大家的共识是服从组织安排。但美方就不同了。尽管中方在发表会见照片和电视转播时，按美方要求把洛德的镜头盖掉了，发新闻时也没有提到洛德参加，但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次会见没有罗杰斯先生的份儿，按职位来说，国务卿不应低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洛德陪见的事也难于保密。结果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国务院的人怒不可遏，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基辛格。

第二天起，由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坦率而又深入地交换意见。

在台湾问题上，美方认可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逐步从台湾撤出美军，但仍存在不同看法。

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2月23日、24日、25日，中美继续举行三次限制性会谈。

从2月22日至27日，双方重就联合公报内容展开讨论。这次中方由乔冠华副外长主谈，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等协助。美方仍由基辛格主谈，只带洛德一人出席，有时也有霍尔德里奇参加。这次会谈涉及余下的各种分歧，包括中方声明中所述“人民要革命”一词，美方坚决不同意；美国声明中所述它对韩国和日本的条约义务问题；关于“双方

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提法问题等等。最关键的分歧是中方要求美国无条件从台湾撤军问题。

公报草案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一句，是中方的底牌，争取不改。于是，乔冠华让中方谈判班子的人“集思广益，想想点子”。外交部业务组的王立因整理过尼克松的历次讲话，记得他多次讲到“革命”一词，很快就整理了一份关于尼克松讲到“革命”的语录材料，供乔冠华选用。

2月23日，乔冠华在与基辛格讨论公报时，大量引用了尼克松在何时何地讲到支持“革命”的话，包括尼克松1967年10月23日说“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变化是革命的”，及1971年1月3日讲的：近年出现了“新的美国革命”等等。他质问：为什么你们的总统多次可以讲“革命”，中方在自己的单方声明中就不能讲这个词？再说，你们美国也是从革命中诞生的，中国也是革命胜利后立国的，我们都是革命的后代，关于“人民要革命”，我在联合国已经公开讲过了，为何现在不让讲？一席话说得对方无言以对，只好说：“把革命一词放进去吧”。

关于台湾问题，从中方的立场看，未在公报内提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只提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已经是对美方的照顾和妥协；但美方强调公开宣布撤军将引起国内右派亲台势力的强烈反对。因此双方就此问题一直争论到最后一天。

2月23日的限制性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进行。周恩来的车到达时，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都站在楼门口迎候。

握手之后，尼克松亲自为周恩来脱掉呢子大衣。这个镜头，也被美国的电视记者拍下来传回国内播放。美国的报纸称：“在美国民众对周恩来表示极大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1972年2月23日，北京，尼克松总统帮周恩来总理脱下外套

会谈后，晚20时，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行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由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就在看表演的时候，外面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而且越来越大。这让中方的接待人员很揪心。按照计划，尼克松第二天的行程是去长城、定陵。虽然25日是机动的，但此时在《上海公报》的问题上，中美双方分歧还很大，还要留一天讨论，留给尼克松的只有24日了。其间，中方接待人员都知道，尼克松夫妇“最看重的是长城”，就是说，此次中国之行，长城，是尼克松夫妇一定要去的。

周恩来陪尼克松看体育表演，没有一点焦急的样子，神色如常。21时30分左右，他出去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又一脸平静地回来继续看演出。待表演结束，从首都体育馆出来时，沿途已经有或扛着锹或拿着扫帚的军人和老百姓在扫雪。

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松夫妇很惊讶地发现，昨天夜里厚厚的大雪骤然“消失”了，而路边堆着高高的雪堆。尼克松夫妇仍然按原计划向长城出发。

原来，头天晚上，晚会一结束，吴忠、杨德中、刘传新带着负责安全的部分人员，就赴长城等参观点去做实地勘察。雪确实下得很大，沿途积雪很厚，特别是从南口到八达岭一段，由于山路崎岖，更加危险。

回城后，他们紧急动员了几十部洒水车，连夜对次日游览要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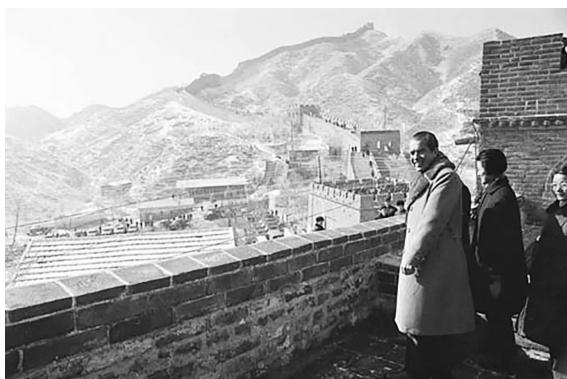
的路面,进行喷洒盐水和清理工作。同时还安排人力,对登长城的步行道上的积雪,也进行了清扫。2月24日出发前,有关人员又对所有驾驶人员,做了绝对保证安全行车的动员。

24日上午8时,参观游览的车队出钓鱼台国宾馆北门,按照预定的路线奔八达岭而去。

第1239回：游长城，尼克松自称“好汉” 到沪杭，《公报》稿基本就绪

叶剑英陪同尼克松登上长城。八达岭一片银装素裹。尼克松站在长城上赞叹着说：“这的确是一座伟大的建筑、人类的奇迹。”又说：“我们今天到了长城，成为主席说的‘好汉’了。但是，今天是爬不到顶峰了。”

叶剑英笑着说：“我们不是已经在北京进行着顶峰会谈嘛！”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登上长城，笑言
自己从此就是“好汉”了

尼克松夫人帕特听了，笑着说：“为什么毛主席写诗只讲‘好汉’，不讲‘好女’呢？我们妇女不是也到了长城吗？”

尼克松和叶剑英听了都哈哈大笑。

那一天去长城的气氛格外热烈。此时，记者们也围了上来。意犹未尽的尼克松，即兴对记者讲了一番话。

为了这次来华访问，尼克松专门阅读了毛泽东的大量诗词和部分

哲学著作，此刻他踞高远瞩，感触颇多，讲到长城反映的中国历史，说长城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建筑，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到长城来看看，了解了解中国，了解了解中国人民，也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还联系中美两国关系，说了一些含有政治寓意、哲理性的话。

这群“第一线”的记者们，推选合众国际社采访白宫新闻老资格女记者海伦·托马斯，代表大家以最快速度发出报道。她随即请求中国外交部新闻司记者处的陪同人员江承宗，想办法找到一部电话，以便打电话到民族饭店新闻中心做口述报道，再经由卫星地面站把报道转发出去。

此时江承宗到哪里找电话呀，那时也没有手机，他就劝她别着急，先等等。到第二站十三陵后，尼克松他们去地下宫殿参观，江承宗就带着托马斯到陵园管理处的办公区里找电话，还真在一栋小房子里看到一部电话。他们赶紧过去，结果被门口站岗的一名解放军战士拦住，不让进。

江承宗跟那位解放军解释，他是外交部的，那位是美国的记者，她要打一个电话告诉市里，去发报道。

解放军战士很有礼貌的说：“对不起，不能让你用这个电话。”

江承宗说：“没有人用啊？不会影响你执勤任务的。”

那位战士坚持说：“不行，我接到上级的死命令，这个电话只能让安全保卫的人用，别人一概不许用，没有办法。”

江承宗再三请求无济于事，情急之下，他找到了中央警卫团的政委杨德中来帮他说情。

那位执勤战士看看杨德中，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我是死命令，我不能让别人用。”

海伦·托马斯那个急呀，杨德中说：“放心，放心。”他又亲自去到了负责警卫的这个战士的连长，把连长找来，连长下了命令后才让海伦·托马斯这位外国记者用了这个电话，发出了这个报道。

尼克松夫妇登长城那天，零下好几度的天气，路边却有一些“村民”在下棋。当尼克松夫妇手挽着手经过的时候，“下棋人”仍低头下棋，对总统夫妇驾到无动于衷。尼克松说了一句：“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在场还有许多孩子穿着毛衣玩耍，天气十分寒冷，那些外国记者奇怪这些中国孩子怎么这么耐寒。等到他们上车后，看到那些孩子也都纷纷上了公共汽车。记者们说：“原来是做给我们看的。”

情况报给周恩来，他很生气：“这是谁安排的？”后来在与尼克松会面时，他很坦率地说：“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1972年2月25日，基辛格和洛德商量后，提出了如下的美方声明：“……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基于这一前提，美国展望它将从台湾逐步减少，并最终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乔冠华副外长与中方官员略做商议后，对此做出了敏捷的反应。他说，“前提”的说法太重，而“展望”的说法又太轻，必须找到把“前提”减轻和“展望”加重的词句才行。乔冠华建议将“展望”改为“预期”一词。接着章文晋司长提出可将“前提”改为“前景”。洛德听到后马上点头示意可以接受。这时基辛格开玩笑说：“我们的洛德先生已经站到中国一边了。”于是大家哈哈一笑。基辛格表示接受这种提法，一个难题终于解决了。

尽管双方大部分时间唇枪舌剑，争论激烈，但有时会场也传出一阵笑声，这多半是基辛格又说了一句什么俏皮话。

有一次，在公报谈判处于僵局时，基辛格突然说起他1971年7月第一次访华时把衬衫丢在巴基斯坦旅馆的事情。他话锋一转，又说“我这次访华，可能是次外交灾难”，因为美国有句话，“丢掉背上的衬衫”，意思就是指某人“输得精光”。大家听了哈哈一笑。其实他的玩笑是有用意的，就是抱怨中方在公报稿上逼得太紧。

这时洛德出来打圆场说，“你不会输的，因为你的衬衫是借来的，是别人的，输不到自己头上”。

这又引起一阵哄笑。

基辛格又挖苦洛德说，“洛德先生这次随尼克松总统访华，把头发都剪短了，以便给中方一个好印象”。其实这是一句反话，因为在代表团中，洛德的头发是最长的。

直到2月25日下午，周恩来同基辛格举行会谈，中美联合公报稿中有关措词还没有确定下来。

这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

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的立场。基辛格没再坚持。

事后,周恩来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

2月25日晚,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尼克松在向他的东道主敬酒时说:“长城令我们想到,在几乎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有一堵墙。在过去四天里,我们开始了拆除这堵墙的漫长过程。”

2月26日凌晨2时,中美联合公报的全部文本基本落实,基辛格、乔冠华总算松了一口气,现在就等着公布了。

在北京,中方为美方每个房间都提供了北京果脯、巧克力等糖果,服务员第二天打扫房间,发现糖果盒空了;于是再放两碟,又没了。后来一个服务员整理房间时,偶然看到一位随行人员没盖上的行李箱中,下面一层全部是糖果。原来他们因为工作太紧张了,很多人根本没时间去街上买纪念品,眼看就要离开中国了,回去总要对亲友有个交代,周恩来知道后,决定在他们离开上海时,每人加送10斤糖果。

在连续几天的中美会谈期间,周恩来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肯定的基辛格的说法:“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说:“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时,周和毛一样睡得很少,可是周仍然显得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唐两人紧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此情此景真使人感觉振奋。”

2月26日上午,周恩来同尼克松在机场休息室举行第二次大范围会谈。接着,他们同乘中国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专机,前往杭州。

就在尼克松总统一行前往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格林助理国务卿看完刚打印出来的公报文本，大为不满。这固然有对公报本身的观点分歧，但更主要的是由白宫与国务院越来越深的矛盾引发的。国务院对尼克松、基辛格背着自己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本来就有意见。这次对未让其参加公报起草小组也一直耿耿于怀。

到了杭州，尼克松被安排在刘庄，周恩来住在西泠。根据预先日程安排，下午是游西湖，周恩来和尼克松在花港观鱼景点会合。

由于工作人员没有领会好意图，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在花港观鱼的景点一直等到过了汇合的时间，仍不见尼克松一行的身影。现场保卫人员一阵紧张，周恩来也怕出什么意外，连忙吩咐有关人员立即联络寻找。

原来此时，尼克松一行就在距汇合点不远处的一片草坪上等候，他们也是准时到达的。负责外宾警卫的工作人员此时也在心里嘀咕：“一向守时的周总理，怎么没能按时出现在汇合地点？”

两边的人终于联络上了，但游西湖的活动却因此而稍有耽搁。

刚到杭州，罗杰斯就找到尼克松，对基辛格与中国商定的《中美联合公报》提出意见，并交给尼克松一份国务院工作人员认为公报应该加以修改的地方的清单，竟有 15 条之多。

尼克松接过那份清单，立即嘱咐罗杰斯国务卿，意见可以提，但回国后不得自行其是。他不想把白宫与国务院的关系搞得太僵。

21 日晚，拒绝为尼克松翻译祝酒辞的傅立民，在当时尼克松怒气冲冲的眼神下，觉得自己的外交生涯肯定就此结束了。但出乎他的意料，到了杭州，尼克松专门为这件事向他道歉。

在晚宴之前，尼克松把基辛格找来商量：“我已批准了公报，毛泽东也批准了，我们却又要单方面提出修改，中国人将会怎样看我这个总统？”尼克松近乎嚷了起来。

“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了，全世界都在等着明天在上海发表公报呢。”基辛格忿忿地说道。

尼克松不停地来回走着，他处于两难之中。

基辛格当然理解尼克松的处境，于是建议说：“总统，您看是不是晚饭后由我再找乔冠华先生谈谈，能否在部分内容上满足国务院的

要求?”

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基辛格说：“亨利，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宴会之后你再去找乔先生谈谈吧！”

乔冠华听了基辛格的话后严肃地说：“博士先生，修改公报之事我做不了主，必须请示周总理。”说完就走出房间。

周恩来听完乔冠华的汇报后，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然后又将烟放在烟灰缸上，说道：“你说说你的看法。”

“美国人内部看法不一致，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不能答应。他们自己内部有矛盾，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乔冠华大胆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周恩来对美国代表团内部的动向十分关注，对国务院官员与白宫的矛盾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此事非同儿戏，他立即向北京毛泽东汇报了情况，然后对乔冠华说：“主席指示说，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特别强调，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乔冠华得到指示后又回来和基辛格磋商，同意对公报中除台湾部分以外的大多数文字进行修改。凌晨2时，另一个“最后”公报草案终于完成了，并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清晨，双方首脑批准认可。

27日，周恩来陪尼克松一行到上海。

一到上海锦江饭店，周恩来就去拜访住在13楼的罗杰斯国务卿，正好格林和傅利民等都在那里议论纷纷，他们对尼克松住15层总统套间没有意见，但对基辛格住14层不满。

周恩来一见面，就对他们说：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工作，“我记得当中国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大使馆开了绿灯……”一席话说得这些面有愠色的美国人开始笑逐颜开。

周恩来还对安排他们住13层（西方人忌讳的数字）表示抱歉，说这是中方人员的疏忽。说到这里，他还讲了不怕鬼的寓言，使气氛更加活跃了。更令他们高兴的是，周恩来当场答应赠送一部中国《二十四史》及《鲁迅全集》给国务院，另一套送白宫。周恩来还把章士钊先生新出版的《柳文指要》赠送美方翻译傅利民先生。这些国务院官员

一再感谢周总理，并表示今后愿致力发展中美关系。

周恩来为什么想到送美国人《二十四史》和《鲁迅全集》等书呢？这是有原因的。当尼克松在北京时，不喜欢用国务院的翻译傅利民，也不要国务院官员出席重要活动，他们闲来无事就到北京逛书店，想买《二十四史》等书，但没有找到。周总理把这些小事与国务院和白宫的矛盾联系起来考虑，所以决定买这些书，一份送国务院，一份送白宫，使两家皆大欢喜。

这天中午，基辛格和乔冠华又在上海花了两个半小时再次检查了新完成的文本。

第1240回：送熊猫，中国外交新局面 为吃药，江青那里又出事

2月27日，中美双方终于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双方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中美《联合公报》内容。

在中美双方签订《联合公报》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周恩来特地把负责尼克松访华新闻接待的新华社副总编辑彭迪叫去，将最后签字的文件交给他，同时提醒他说：

“中美之间有时差，新华社发表时一定要注意时间，绝对要和美国同时发表。”

在当晚为尼克松举办的送别宴会上，中方在每人面前摆放了一盒“熊猫”牌香烟，香烟盒上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立即引起了尼克松夫人帕特的注意。她拿起香烟盒，连声赞叹：“真是太精美了！我太喜欢大熊猫了！”

坐在旁边的周恩来指着画有熊猫的烟盒对尼克松夫人说：“我想送给你这个。”

“送我什么？香烟吗？”尼克松夫人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不是香烟。我要送你们两只熊猫。”周恩来解释说。

帕特里夏·尼克松惊喜万分，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尼克松也一副惊喜的表情。尼克松马上召集身旁的基辛格等人，一起举杯庆祝。同在宴会厅里的记者看到这边发生了“骚动”，马上聚过来打探，然后饭也顾不上吃，匆匆赶回去发稿。有一位记者可能被绊了一下，摔了一跤，还没等服务员过去扶他起来，他已经爬起来又往外跑。

两个月后，中国的一对大熊猫定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成为尼克松带回去的又一件大礼，也成了中美两国友好的特殊纪念。

尼克松决定,把两头麝香牛给中国作为回赠。

周恩来看似随意的话,其实背后早有一番深思熟虑。尼克松到达当天,送了中国一对别致的“瓷塑天鹅”作礼物,它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陶瓷艺术大师波姆辞世之作,目前世界上仅存两件。中方在筹备自己的国礼时,也费了一番脑筋。在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动物园熊猫馆的时候,左照相,右照相,说要是美国有这样一对熊猫多好啊。其实当时中方已心里有数,考虑送熊猫了。但是中方并没有马上把这个决定透露给美方,直到所有的问题都谈妥了,周恩来才在送别的宴会上,传递了这一信息。

2月28日,周恩来同尼克松在上锦江饭店举行第五次限制性会谈。

当天,中美《联合公报》正式发表。在《联合公报》中,美国表明对“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持异议,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和平共处。《联合公报》既陈述了中美双方的共同点,也用各自分别表述的方式将彼此的分歧讲得明明白白,创造了世界外交文书的新风格。

2月28日,尼克松满意地离华返美。第二天,周恩来也从上海飞回北京。毛泽东指示:“安排5000人到机场迎接周总理。”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告诉新闻组成员:“和你们一起聚聚吧。”大家看了场电影。新华社副总编辑彭迪的夫人钱行告诉周恩来,一个美国记者在文章中说:尼克松来居然达成协议,美国做了让步,所以在外交战上,这个回合中国以21:2(21分是乒乓球比赛的分制)战胜了美国。周恩来先是笑了一下,问是哪个记者,钱行做了回答。

第二天,彭迪夫妇和周恩来坐同一架飞机回北京。飞机上,周恩来特地从前舱走过来,对彭迪等人说:“你们听着,千万不能按那篇报道的调子写,你们记住了吗?”他对负责新闻的工作组成员,一个一个地叮嘱。因为,周恩来知道尼克松是顶着极大压力来的,美国国内反对声音很强烈,如果中国国内报道也是这样的调子,那更会陷尼克松于不利。

到了北京,周恩来从机场直驱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说:“尼克松

高兴地走了。他说他这一周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说：“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中美《联合公报》在世界发生的影响很大。1954年中英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在1972年3月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的外交关系也升为大使级，中国同希腊建交。随之而来的是，当年9月下旬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和中日建交，接着是中国同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建交。这一年，中国同18个国家建交或提升外交关系级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

3月1日，毛泽东听取周恩来关于中美会谈情况的汇报。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中美会谈情况的汇报。

3月3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宣读中美《联合公报》。他说：“尼克松上台后，情况有变化，事物前进了，这就要求解们要在原则性基础上有灵活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进国际和平的实现。”

“此次中美高级会晤，第一，双方没有密约；第二，我们坚持原则；第三，谈不上那一方胜利。将来，要用实践证明《联合公报》是否有效。”

3月4日，周恩来飞往河内，向越南党政领导人通报尼克松访华情况。

3月5日，周恩来送审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向驻外使领馆等的通报稿。

通报稿中写道：“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际上震动也很大。总的说来，对公报的反映是积极的，大都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协议还是纸面上的，能否实现还要看美国今后的实际行动。今后事态发展还会有曲折反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同美驻外官方人员的接触，我不主动，也不回避，应掌握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精神，注意礼貌、落

落大方。”

3月7日至9日，周恩来前往平壤同金日成会谈，通报尼克松访华情况。

3月13日，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两国之间自1954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3月5日晚上19时许，江青要秘书通知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汪东兴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到钓鱼台17楼“议事”，说出了大事情。

待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到达时，江青正在纪登奎、张春桥、姚文元面前大发雷霆，指责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毒害她。她要纪登奎找护士赵柳恩谈话，要赵柳恩坦白交代“后台”。

周恩来一进门就劝说：“江青同志，有什么事慢慢说，不要激动。我们都来了，有事能讲清楚。”

江青大声地对周恩来说：“不是我说，而是要审判罪犯！我已经要纪登奎找赵柳恩交代罪行，交代同伙，还有她的‘后台’。”

这时，从会议室可以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哭泣声。

周恩来对大家说：“先把情况搞清楚，我看先由汪东兴主任去找小赵谈谈，要她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

叶剑英表示同意：“我看也是，先由汪主任找小赵谈谈，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再‘审’也不迟。”

汪东兴说：“现在纪登奎正和小赵谈着，还是看他谈的结果如何？需要时我再去谈。”

一会儿，纪登奎回到会议室，他对大家说：“小赵边哭边说，都是按常规准备的安眠药，没有犯什么罪。”

江青听后大叫起来：“这个小东西想要赖，要她坦白交代。”

周恩来说：“还是由汪主任去谈好一些，要小赵冷静下来，认真地谈清事实。”

赵柳恩见到汪东兴，满脸泪痕，伤心地说：“汪主任，你还要我谈什么呀？刚才我已经向纪登奎同志都谈过了。”

汪东兴劝小赵不要哭了，冷静下来，把这次用安眠药的经过，详细说说。

赵柳恩抽噎地对汪东兴说：“江青同志用的安眠药是按医生的嘱咐准备的。每天睡觉前安眠药分三次服用：晚饭时服一次，临睡前服一次，万一睡不着再服用药一次。昨晚她没有睡好，把备用药服了。她起床至中午饭后都没有事，到晚上快7点了，不知从何想起，说有人要毒害她。不一会儿，就说我毒害她。还说有‘后台’支持，大发脾气。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汪东兴听完小赵的话，没有多问，回到会议室，向周恩来等人把小赵的话如实汇报了。

江青立时跳了起来：“小赵不老实，想逃避罪责，不要再谈了，马上进行审问。”

周恩来说：“还是用集体谈话的方式好。”

江青指着护士赵柳恩、秘书杨银禄、警卫周金铭大声说：“他们3人串通起来毒害我，对犯罪的人应当审问，不叫谈话。”

叶剑英说：“今晚在座的是7位政治局委员，还是谈话妥当，首先让他们讲清情况。”

汪东兴表示：“同意周总理、叶帅的意见，不能用审问的说法，还是集体谈话为宜。”

纪登奎也说：“用谈话的方式吧。”

张春桥、姚文元也同意用谈话方式。

江青只好同意大家意见，但又说：“你们都一致要谈话，那就要赵柳恩、杨银禄、周金铭站在我们的对面答话。”

这时，到了周恩来服药的时间，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让服务员进会议室送开水的时候，顺便把药带进去。不料服务员却对他说：“我要去准备夜餐，你自己送进去吧！”

张佐良只好自己手里举着小药瓶，轻轻地开门进去。当他走近会议桌时，江青突然问他：“你不是跟总理来的张大夫吗？”

张佐良回答：“是的。”

“正好，你是个医生，懂得安眠药，你就坐在这儿听听吧！”

张佐良只好把药递给周恩来服下，然后在后排找了个位子坐下。

由于心里紧张,不一会,冷汗就把内衣湿透了。

周恩来吃完了药,用手指着对面的椅子对赵柳恩他们3人说:“你们坐下来谈,不要紧张,主要说说出事的经过。”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警卫周金铭、护士赵柳恩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许久,会议室里没人说话。

江青按捺不住,又大声喊起来:“你们要坦白交代罪行,交代你们怎么合伙毒害我!谁是你们的‘后台’?坦白从宽处理,不坦白从严处理!”

周恩来对江青劝说道说:“别着急,冷静些,还是让他们3人先讲讲。”

赵柳恩说:“刚才纪政委和汪主任同我个别谈过了,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

江青不依不饶:“你说,谁叫你给我多服一次剂量大的毒药?你们3个事先商量过没有?”

赵柳恩抬起头,以抗争的口吻激愤地说:“我没有毒害你,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我每次都多准备一次药,怕你万一睡不着,可以再服一次,而且每次的剂量都一样。我也没有同杨银禄、周金铭商量过。”

见赵柳恩顶撞自己,江青气的拍着茶几跳了起来,朝门外使劲喊道:“来人哪!”

门外进来一名军人,站在一旁。

江青命令道:“你把她的领章、帽徽给我摘下来!”

“别动!”就在这一瞬间,周恩来大声喝住了军人的行动,挥手让他退出去,并对张佐良医生说:“这里没有你的事,快出去!”

周恩来这时也起身来,朝坐在他右侧的江青大声地说:“江青同志,你不要这样激动嘛!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你怎么能这样!”

江青不说话了。

沉静了一会儿,周恩来又说:“杨银禄、周金铭你们两个讲一讲。”

杨银禄慢慢地说:“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工作上有缺点我负责任,但绝没有商量毒害江青同志的事,请组织上调查清楚。”

周金铭也争辩地说:“我是组织上派来的警卫人员,负有保卫江青同志安全的责任,哪能商量毒害江青同志?这是绝对没有的事,请领

导查明。”

江青仍不甘罢休：“你们不交代罪行，反而说是保卫我的，没有商量毒害我，那么，安眠药是谁放进来的？看来你们是不敢交代‘后台’，送公安部审问。”

周恩来见事已至此，便说：“时间不早了，已经 12 点多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让他们回去想一想。”

江青不同意，大声说：“不行，要叫他们作检讨！”接着，她突然又转换话题说：“为什么总理那里的大夫、护士都那么好，为什么不给我派好的？小许就很好。”

小许是周恩来的护士许奉生。周恩来离开会议室，走进电话间。卫士高振普跟在身边。周恩来问：“小许在哪里？”

高振普答：“她在西花厅。”

周恩来对高振普说：“是江青同志要找小许，你马上把小许接来。”

说完他又进了会议室。

许奉生接到高振普的电话，很紧张地问他：“总理怎么了？”

高振普说：“总理没什么。”

“那你半夜里来电话干什么？”

“有人看上你了，要你到她那里工作。”

小许未在意，以为是高振普同她开玩笑。当高振普说：“我真的不是开玩笑，是总理要我打电话叫你的，车子快到了，你马上来吧。”她这才断定是真的，马上哭了，从电话里传来了“不去，不干！”的声音。

高振普说：“那怎么行呢？你先来吧！总理在这里等着呢。”

约 10 多分钟，小许来到钓鱼台 17 号楼，只见她手里提个小包，低着头，进了楼。高振普看到她的眼圈已哭红了，顿时紧张起来，这怎么行呢？他给小许出了个主意：先到洗手间用冷水洗把脸，然后再进去。

高振普拉开会议室的门送她进了会场，随手轻轻地关上门，仍退守在外面。约两、三分钟后，会议室的门开了，是小许。她笑了，笑得很开心。

高振普走过去问她：“怎么啦？”

她边笑边说：“她不要我了，说我太紧张，手那么凉，一拉手吓了她一跳。”

高振普说：“那你快走。”小许飞快的上了汽车回西花厅了。

原来是凉水洗脸起的作用。

事情应该结束了吧？江青又出题目：“叶剑英不能走！还有颐和园军代表的问题。他们不可靠，要把他们抓起来。”她提出，这个房间空气不好了，换到礼堂东会议室继续开。

于是，7个人先后向东会议室走去。叶剑英、汪东兴走在最后。叶剑英对汪东兴说：“又出新招！”

汪东兴：“情况不明，不好说话。”

叶剑英：“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无法表态。”

进入东会议室，6个人坐在一张长形会议桌旁，准备听江青讲颐和园军代表是什么问题。

江青坐在另一张小四方桌旁，桌上摆着为她准备的夜餐。

服务员进来报告周恩来，说夜餐准备好了。周恩来吩咐：“送进来吧。”

每人一碗挂面，一盘小菜。只有叶剑英不吃。

周恩来问他：“已经凌晨一点多了，还不饿吗？”

叶剑英说：“不饿，就是想睡觉。”

江青边吃边对叶剑英说：“你要休息，把问题解决了，可以先走。”

接着她说了“颐和园军代表问题”：“前几天，我到颐和园走走，园内的军代表对我进行刁难，限制老娘的行动。我看他们不像军代表，像便衣侦探。”

叶剑英说：“我对情况还不了解，待我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说吧！”

周恩来一听，随口说：“这件事情让有关单位调查处理吧。今天大家都累了，回去休息吧！”

散会以后，当走到17楼东门口时，叶剑英叫住周恩来和汪东兴，进入走廊南侧的一个房间。叶剑英说：“今天我们又中江青的计了，但我们没上她的圈套。她的矛头是对着汪主任和我的。她诬陷身边的工作人员，又诬陷颐和园的军代表。今晚我们顶过去了，但她还会无事生非。我们应该把今天发生的事向毛主席汇报。”

周恩来说：“事情来得突然，我们没有精神准备，但也没有匆忙表

态。向主席讲讲是必要的。我看这件事就由汪主任去报告吧！”

汪东兴说：“找个机会，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好，我一个人怕说不完全。”

几天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汪东兴在外屋。周恩来问汪东兴：“谈了没有？”

汪东兴说：“没有谈。如果主席今天精神好，我们一起跟主席谈。”

结果周恩来陪外宾回钓鱼台继续谈判，没有谈成。

过了几天，汪东兴见毛泽东饭后精神很好，就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毛泽东听完后，批评了江青，表扬汪东兴他们顶得好。

汪东兴将毛泽东的话转告周恩来和叶剑英。

第 1241 回：看宁夏，西海固回民叛乱 张国华，心脏病逝世成都

宁夏固原地区，也称西海固地区，包括西吉、海原、固原、隆德、泾原五个县，是回民聚集居住区，占人口总数 42.8%，个别县如泾原县回族占到 97%。这里自然环境极其恶劣，1972 年曾被联合国评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地区。

由于解放后一些地区将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视为“封建迷信”和“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严厉禁止，这里发生了几次“叛乱”。文革期间，1968 年 6 月 19 日，海原县灰条沟附近几个村子的二、三百人在灰条沟举行伊斯兰教的“尔麦里”(amal)仪式时，突然被全副武装的县武装人员包围。原来是革委会命令他们到红羊公社灰条沟抓“坏头头”马生祥阿訇。武装人员先是开枪，然后下车在人群里搜查马生祥，没有找到，就要把马生祥的弟弟马生录带走。教民挡住不让带走，县里来的人开枪，当场打死 3 人，打伤 1 人。在场支左的解放军高喊：“不能开枪！”未能阻止。这年 8 月，马生祥被捕。海原县革委会把附近村庄的阿訇当作反革命阴谋暴乱的首犯，先后逮捕了十余名阿訇和乡老。固原县阿訇杨如德被指为反革命阴谋暴乱的首犯，与马生祥阿訇、田成仁阿訇、安克明阿訇等 7 人在 1970 年 4 月 29 日被判处死刑。

1970 年 3 月，西吉县回族群众要求过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的节日——圣纪节，开放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也被确定为“预谋反革命叛乱案”。

1970 年 7 月 14 日，宁夏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指示》，鼓励回民养猪。

1971 年国庆节后的一天，公安部核心小组会上，时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的李震传达国务院指示：“农林部的杨立功同志去了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来向中央汇报：西海固地区群众生活困难，发生过多次叛乱，一批批的‘匪属’产生，使一些生产大队发展党员

没有对象,征兵没有对象,选举基层干部没有人选。周总理决定公安部去个副部长带工作组蹲点调查,配合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干部摸清历次叛乱情况,进行平反。”

杨立功,时任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

1971年11月,公安部革委会副主任施义之带了十几名干部,经银川到西吉、海原调查。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

当地地处黄土高原六盘山区,自然条件极差,常年干旱,缺水少雨。山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没有草,生态失衡,粮食亩产量很低。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吃的主要是一些土豆和返销的玉米、薯干等,白面很少。很少吃到盐,更没有油。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与群众同吃同住,一天两餐,吃的是白水煮土豆、荞麦面饼,没有盐没有油,大家反映吃不饱。这里缺柴,烧的是牛粪和有限的麦秆、秫秆,不够烧就用铁丝耙草,连草根耙出来烧掉。这样年复一年恶性循环,黄土上的草越长越少。缺水,有的村庄只有个积少量水的水窖,大家都吃用这小水窖里的水。真是缺粮、缺柴、缺水、缺盐。我在刚进入固原地区的路上,看到一个老汉带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女孩身上只披了张羊皮而没有穿裤子,非常惊讶。到了村里,我看了一下,每家屋内只有土炕、土墩,炕上有一条破席和破旧不堪的棉被,有的只有破棉花套。一些极贫困户到了冬天,一家大小就围在炕上,有的只有一套衣服,谁出去谁穿,回来又蹲在炕上。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光了屁股,男孩子更不用说了。看到这样的景象实在不少,部队来的年轻卫生员都落了泪。

施义之他们还了解到,当地公社卫生院只有一两个医生,但没有药,更没有医疗设备。群众有病没处治,随调查组蹲点的医生、卫生员天天在村里给群众看病,给些常用药,或用针灸治疗,可解决不了严重的缺医少药问题。

这里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常年干旱,亩产量很低。农业生产只让种玉米、小麦、荞麦、土豆等粮食,不让种植固原地区过去常种的胡麻等经济作物,而小麦、荞麦亩产量只有几十斤,玉米有时长势很好,但常遇雹灾、霜冻等自然灾害。1971年,固原地区产粮仅26万吨,除去种子、饲料,人均口粮所剩无几。人均收入仅47元。

当地是回族聚居区,但由于没有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不尊重回民习俗,不提倡养牛养羊,不论汉民、回民硬要响应每户养猪的号召,引起回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说:“现在强迫我们养猪,以后要强迫我们吃猪肉哩。”而且宗教活动场所甚少,甚至原来每村有一个阿訇负责念古兰经,负责宰牛宰羊,当时都没有了。

还有平叛扩大化的问题。解放后这个地区的回民发生过八次叛乱。在处理叛乱案件中,由于政策上没有分清主谋和胁从,不少被裹胁、被欺骗的群众也被打击,家属成了匪属,造成了平叛扩大化,解决矛盾的同时又激化了矛盾,形成了又一次恶性循环。

施义之回京后,向公安部核心小组详细汇报了固原地区的所见所闻。主持公安部工作的副部长李震让施义之写个书面报告上报国务院。周恩来看了报告后非常重视,把施义之叫去,沉重地对他说:“群众的生活那么苦,我们工作上有错误。”他当即批示对固原地区进行救济,将海军仓库积压的被服拿出来组织救济;指示国务院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兰州军区卫生部等单位派出十多个医疗队下到固原农村,给群众检查治疗;同时批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干部来北京召开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指示施义之和农林部杨立功副部长参加。

当施义之汇报到他们正在对固原地区解放后发生的八次叛乱案情和档案进行了解时,纪登奎说:“不用那么细的查档案,宣布全部平反算了。”

1972年1月24日至2月12日,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讨论叛乱和群众生活问题。会议认为,宁夏固原地区的主要问题是干部的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政策,不尊重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混淆两类矛盾,使少数敌人有可乘之机。会议明确:对“扩大化”的问题、对逼供信造成的假案必须平反,对错判、错管、错戴、错划的群众必须平反。

会后,形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上报中央。

这个座谈会刚开完,2月29日,固原地区隆德县又发生以糟占林、咸荣华、咸得有等人为首的叛乱事件,这是全国解放后该地区回民发生的第九次叛乱。他们以林彪的名义起事,串联了陕西省陇县,甘肃

省灵台、张家川，宁夏的隆德、固原、海原、西吉等县 11 个公社的 150 余人，杀死了前来阻止其叛乱的隆德县保卫处长君连升和保卫干事杨效智，并抢去他们的手枪。

中央仍派施义之、杨立功处理此事件。

3月1日，李德生、纪登奎召施义之和杨立功前去人民大会堂，告诉他们：武装叛乱分子和民兵正在隆德县中岔大队的山头对峙，要他们立即去平叛。

他们对施义之说：“你是 21 军出来的，21 军在当地驻军，你去有很大的方便，临时需要动用一些兵力也好办。”

第二天，施义之和杨立功乘专机飞往西安，在那里又换乘空军小飞机到甘肃平凉。平凉没有机场，是在塬上用石灰画了一个大圈，作为临时机场。他们下飞机后在驻军 63 师师部吃了晚饭，赶到隆德县已是深夜。在那里见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康健民和隆德县委领导，听取了叛乱情况的汇报，知道叛乱分子糟占林是从外地来到隆德，自称是大依玛穆，刚从麦加朝圣回来，说“在北京见到了林彪，林彪领导西北五省区，要我领导西海固回民，在西安与林彪会师”等等。叛乱分子打死了干部，夺取了武器。大肆宣传欺骗群众说，打死了干部，共产党不会罢休，胁迫村民近 200 人上了山。

伊玛穆(Imam)，是阿拉伯语单词的汉语音译，意为领拜人，最早源自对穆斯林祈祷主持人的尊称，又称领拜师、众人礼拜的领导者，原是阿拉伯语中的“领袖”，在伊斯兰教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隆德县领导于 3 月 1 日拂晓组织了一个民兵营上山清剿。天黑后，叛乱分子下山占领村头的窑洞，民兵在外把守，想等天明后处理。

但是天明后，发现叛乱分子都跑了，首犯也没有抓到。

这次平叛武装冲突中，干部民兵死 13 人，伤 12 人，击毙叛乱分子咸荣华、咸有忠等 13 人，伤十余人。

由于叛乱分子有枪，老百姓害怕，民心不稳，天天跑反，影响生产。

3 月 3 日，隆德县开了一天县委常委会，杨立功和施义之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同时施义之与兰州军区取得联系，兰州军区请示中央后，派 21 军一个连在交通要道将台堡驻下，稳定了民心。

3 月 6 日，施义之建议到叛乱的现场——中岔大队去看看。他同

杨立功、自治区及县里的干部一起，分乘三辆车出发。来到中岔大队后，他们先看叛匪打死武装部干部的地方，再一家一户地看。有的家没有人，有的家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的院子里散着一地鸡毛，宰羊锅里散发出一股股腥臭味。

施义之走到一处院落门口坐下喝水后，顺便到旁边的院子里看看，发现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正在和面烙饼，烙的饼已有尺把高。在当地吃到小麦面是很不容易的，这引起了施义之他们的怀疑，上前问她家有几口人？那个妇女说两三口。怎么两三口人烙了那么多的饼？施义之让大家仔细观察周围的窑洞，发现一个窑洞上了锁，便让那位妇女打开。进门后看到炕上有被子，掀开被子、炕席，果然下边露出一个炕洞。

施义之问那妇女：“下面有人吗？”

妇女答：“没有。”

施义之的秘书王京宗用手电一照，发现洞里有一支带刺刀的枪。施义之觉得首犯可能就藏在这儿，就向下面喊话。

经过一番喊话，果然炕洞下面有枪送了上来，接着钻出来一人，竟然是公社革委会的委员，原来这立是他的家。

施义之等人向他问话，那个公社革委会委员支支吾吾，后来终于供出大依玛穆糟占林也在下面。施义之要他下去，把大依玛穆叫出来。经过初步审问，这二人便是发动叛乱的首犯和主犯，于是交县保卫处处理。

叛乱平息了。

1972年2月21日，张国华在成都主持解决四川大学问题的会议上，心脏病猝然复发，倒在会场上。党中央闻讯，立即派出专家小组，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连夜飞往成都，依然抢救无效，不满58岁的张国华于次日凌晨1时左右逝世。

悲痛中，周恩来作出三点指示：“一、国华同志的工作由李大章代理；二、查清死因；三、骨灰送到北京。”

原准备2月24至26日送骨灰回京。正赶上此时周恩来秘密访问越南。周恩来一到越南，就对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伤心地说：“知道吗，国华同志死了。”

王幼平是张国华的老战友，大吃一惊。周恩来说起详情，边说边流泪，说到后来，二人相对而泣。

一直等到3月11日，周恩来到北京，张国华的骨灰才运到北京西郊机场，周恩来从正在与尼克松会谈的忙碌中抽身亲往机场迎接。周恩来一生只去机场接过两个人的骨灰，除了张国华，另一个是陈赓大将。寒风中的周恩来接过张国华的骨灰，伤心得不能自持，潸然泪下：“中央正要重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地走了……”旁边的其他领导人也都恸哭出声。周恩来和张国华的爱人樊近真在机场留影，对她说：“生活上的问题我会安排的。你在北京检查身体，有事到京西宾馆，让秘书告诉我。”

不久，中央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周恩来询问毛泽东是否接见干部。一般情况，毛泽东总是满足地方干部的愿望，但这次，他拍了一下沙发把，神色黯然，许久，叹了一口气：“不见了，再见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张国华死后，有一些人联名上告说：“张国华是门诊部主任梁兴初的老婆任桂兰迫害致死的。”其实此时任桂兰已经和梁兴初一起被监禁审查了。但是，这还是给梁兴初又多加了一个罪名。

也就在张国华去世不到一个星期，2月26日，梁兴初也心脏病发作，中央批准他到北京301医院治疗，至9月出院。

黄永胜的儿女亲家、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可能是在毛泽东南巡时给他留下了较好的印象，“913事件”后，他不仅没有被审查，而且在张国华去世后，接替了张国华的职务，主政四川。

3月11日、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两次接见了刘兴元、李大章等四川省负责人，宣布刘兴元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3月19日，四川刘兴元、李大章等7人上报《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

“林贼一伙把温玉成派来成都军区，又先后派出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刘锦平、王飞、鲁珉等人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空军成指原政委）等人策划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

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军区党委和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召开了几次会议,在狠批林陈反党集团的同时,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对梁兴初等同志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耐心诚恳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在会上作了检讨和交代,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同林贼一伙划清界限,彻底决裂。”

此时,梁兴初正在北京治病。

3月23日,中共中央[1972]14号文件批转了四川省委《关于继续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梁兴初和陈仁麒、谢家祥,以及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成都军区空军司令员丁钊、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等6个人都被点名。

1972年8月,成都军区向中央报告“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称:“在四川,梁、陈、谢上了贼船,梁兴初是头子。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梁参与了林彪反革命政变活动。”

8月9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听取四川省和成都军区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的工作汇报。中共中央发了[1972]31号文件,批转“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

第1242回：再解决，两广、川、浙、赣与湘 下通知，杜绝招生“走后门”

1972年3月18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两广、四川和湖南等地批林整风中存在的问题。

3月21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的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铁瑛、王子达、白宗善、马龙、张孝烈、万振西、夏琦、侯建新到北京开会。这次会议由许世友主持，联系浙江实际，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

当天，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约见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南萍、熊应堂，要求他们采取主动，将批林整风中揭发出来的若干问题说清楚。

3月27日，根据中央的指示，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和江西省的领导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白栋材、李登云、于德馨、黄知真、陈昌奉、熊振武、张志勇、邹文泗等11人，先后到达北京，听取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联系江西的实际，揭发江西的问题。

3月30日、3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江西、浙江问题。

4月21日，浙江到京开会人员向中央递交《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报告》点了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萍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20军军长、浙江省委书记熊应堂的名，说：

“林陈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浙江十分重视。林贼死党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维国、王飞、胡萍、鲁珉、李伟信、刘锦平、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搞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并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

“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观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

“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在检查交代中初步认识到，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月来，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耐心启发教育和与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步提高。”

4月24日，江西来京开会人员向中央递交《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点了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于德馨5人的名，重点是批程世清。《报告》中说：

“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交代，早在‘九大’以前，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谎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九年九月，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窜到井冈山，阴谋策划在江西建立反革命‘根据地’，林贼还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同程世清同志进行了广泛深谈。”“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期间，程世清同志与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等多次密谋，向党进攻。庐山会议以后，程世清同志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制造水陆两用汽车，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九月间，林贼的死党周宇驰、刘锦平、查全伦、程洪珍、王佐、顾同舟、解耀宗等人，纷纷窜到江西，紧锣密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程世清同志先后同周宇驰、查全伦、顾同舟、解耀宗见面前谈话，相互送礼，行动很不正常。”

“几年来，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受到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的交代，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程世清同志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例如：在农村中，不区别具体情况，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全面实行扩社并队；不根据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可能，不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便，拆掉一批民房盖新村。在城市中，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全部解散；不区别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界限，均按地、富、反、坏对待；要南昌市拆掉大批房屋，另建新城镇。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工作中，存在有乱出主意，乱

提口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错误。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作风上，骄横跋扈，家长制，一言堂。尤其严重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有的严加封锁，有的肆意歪曲，有的弄虚作假，欺骗干部和群众。”

“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三同志，也初步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于德馨同志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4月25日，毛泽东约见准备派往浙江帮助贯彻中央精神、解决浙江问题的许世友、王洪文。这天，中共中央批转浙江到京开会人员向中央递交《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4月26日，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许世友、王恩茂接见了来京的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周恩来说：

“文件主席已经批了，你们也看到了，回去后先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中央派许世友、王洪文去帮助。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同志参加浙江省委常委，担任书记。要把浙江搞好，常委扩大会是第一步，开的时间不要长。个把星期后转到第二步，扩大到师级、地委级，这一段要开透点。”

王恩茂1969年因为与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的矛盾，离开工作了20年的新疆，到北京二七车辆厂劳动。1971年“913事件”后，他被安排到安徽芜湖任地委副书记。而这次接见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也让他参加了。

再说时任舟山要塞区委、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的铁瑛，此时听到中央的干部任命决定，也感到非常意外。他参加革命以后，基本都是在部队工作。这次赴京开会前，他还在舟山群岛靠外海的一个前沿小岛上检查部队的战备工作。现在要到地方去，尤其是到省一级领导岗位，他有些突然。铁瑛向周恩来如实讲了自己的顾虑：“总理，我一直在军队工作，只有抗战时期兼过一段县委书记。我对地方经济工作不熟悉，水平又低，恐怕干不了。”

周恩来说：“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吧。只要认真，可以做好的。”

从1972年6月7日开始的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至6月28日结束，参加会议共3038人。会议上报中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称会议“狠揭狠批了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

反革命罪行,狠揭狠批了南萍、熊应堂两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南萍,熊应堂虽还称“同志”,但已是“罪行”。

1972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浙江省的报告,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查的措施,并将二人送京交中央专案组继续审查。

在中央接见了浙江省负责人后的第二天,4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政治局还商定了江西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排序方案。周恩来和政治局成员约见程世清、杨栋梁。

此时,毛泽东多次对老干部问题作出批示。

1972年3月5日,毛泽东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来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3月25日,毛泽东在杨成武女儿杨俊生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3月26日,谢富治因病逝世。追悼会规格隆重。追悼会上,江青与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抱头痛哭,可见悲痛之情。

3月31日,纪登奎在国务院汇报干部会议时讲了三个问题:

一、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他说:“最近发了毛主席的谈话纪要,精神就是要解放干部。国家机关解放一批干部,解放了就要分配工作。有的要经中央批准,有的要经毛主席批准。过去是正部长如谷牧同志、胡耀邦同志都要报毛主席批。现在报的材料太简单了,手续也不完备,要报毛主席看,不行。最近苏振华同志写了一个检查,很认真检查了在地方工作时的错误,军队里犯的错误,一段一段很清楚,毛主席看了批了,可以安排工作。林业部一个副部长写的检查很认真,但我们整理时只说他犯了一般错误。他检查他过去支持了出版刘志丹的小说。毛主席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就是指的这本书,他那时的错误,就等于现在出版林立果的反党材料一样是反党性质的,但结论是一般错误是不对的。又如有个同志反对学习大寨,实行包产到户,是犯了走资派错误,他本人写得很深刻,但我们写得太轻了。不要在原则问题上马马虎虎,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样对他们有利,

也不会背包袱，否则到下面工作也不好。有个副部长在土改时有反攻倒算问题，没写清楚，这是个大的问题，路线问题，要在结论中写清楚，没有还的账一定要还，你忘了群众忘不了。欠了帐一定要还。各省委成立党委时，总理亲自抓，对这类似的问题都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检查，有的受了处分。这样对本人有好处，这笔帐要还，至少要写封信，回到原来的地方作检查。当了官也不行，欠了账要还，如果不愿意这样做就不好。”

二、整理材料问题。他说：“正部长和中央文革直接处理过的人的材料要报主席批，副部长报中央批。本人检查要用路线观点来说清问题，光用‘滔天罪行’、‘狼子野心’这些不能解决问题。不要在批判他的时候‘滔天罪行’，解放他时又不讲原则，原则是非要分清楚，不要写得太长，要实事求是，另外要写个报告，对这个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一贯表现和对他检查的要表态，提出使用意见。”

他强调：“组织结论要和本人见面，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知道，意见不一致就不要分配。如有个单位对一个副部长的入党时间问题，他自己说是1937年入的党，但调查的是1938年，他一直保留意见，故必须把问题弄清楚。不要带着问题下去，矛盾不要带到地方去。结论是斗批改的最后阶段，思想要做通，不要把不干不净的分到地方去。哪些材料装档案，哪些不装还要研究。对副部长的材料各个核心小组的成员要看，领导不看材料不好。”

他提到一份材料上写着“一般的吹捧蒋介石”，说：“这种提法就不确切，怎么叫‘一般的吹捧蒋介石’？这也是斗批改的水平问题。前一段分配到各省市去的干部，大部分是好的，但也存在问题，有人批评我们把‘516’也派下去了。”

三、清查“516”问题。全国总工会汇报时，纪登奎说：“有人告状，江青同志把信转给我了。”

他问总工会：“你们单位有多少‘516’？”

答：“有200人。”

纪登奎：“有那么多吗？这就是扩大化了。”

总工会说：“我们定了两个。”

纪登奎又问农林部有多少“516”？

答：“有 100 多。”

纪登奎说：“有这么多吗？会后全总和农林部的留下谈谈。”

接着，他又问了交通部有多少“516”？交通部的人没有说。

4月下旬，中央批准陈云返回北京。4月24日，陈云回到北京检查身体，并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在国务院的安排下，他参加了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活动。

5月12日，汪东兴传达毛泽东关于老干部出来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有些问题是逼供信搞出来的，我早就说过不能搞这个东西，逼供信在中央苏区搞过，在延安也发生过。逼供信搞出来的不可信，不能算。我们一些干部的看法不对，有的是形而上学，把干部一时的错误说成是一贯的错误，这样不能正确地认识一个干部。”

自从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后，因为采取的是“群众推荐”方式，没有考试，而推荐的标准十分模糊，无法量化衡量比较，于是，有些干部利用职权，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等现象开始盛行。有权力的人又利用这种状况将自己亲朋好友的孩子送去上学，这种情况在部队干部中更为普遍，群众称这种现象为“走后门”。这在1970年招收第一批学员时就已经存在，到1971年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指出：“目前，高等学校1972年春季招生工作正在进行，遵照毛主席关于‘从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自1970年招生试点以来，招生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

《通知》要求：各级领导部门要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在方法上要切实执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

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对招生工作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对检查出违反招生规定的问题，各级领导机关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和纠正。“今后，如再有干部滥用职权、违反招生规定‘走后门’者，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外，也要把学生退回。”

《通知》还特别指出：“对干部子女应和广大工农群众子女一样看待，都要按招生条件办事，即：具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年龄在二十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第 1243 回：检查出，周恩来身患癌症 汇报会，中央发六个文件

5月3日，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意见。5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决定从5月20日起，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

此时，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不好的症状。5月12日，中南海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个红细胞。5月18日，经京、津、沪三地的著名专家确诊为膀胱癌，立即报告毛泽东。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当他一字一句看完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并指示：“由剑英、颖超、汪东兴、张春桥领导医疗组工作。”他还告诫周恩来：“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毛泽东住处的沙发，原来的又大又笨，坐垫比较硬。对于长时间坐着不动的老年病人来说，很不合适。因使用这种沙发，毛泽东背上长起了褥疮。工作人员给他又设计了一种，坐垫是用海绵做的，下面钻了很多蜂窝形的小孔。毛泽东坐在新沙发上摇了摇，说：“这种沙发好多了。原来的那种沙发又高又大，像我这样高的人坐上勉强可以，脚能着地，像总理坐上去就不舒服。他的脚就得悬着。”他嘱咐工作人员：“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

周恩来坐在毛泽东送来的沙发上，觉得很舒服。

对怎样治疗，毛泽东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说要“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

5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批林整风汇报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等。

这天,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下发参阅文件之一:《揭发林彪在历史上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目录是:

一、朱德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1)
二、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	(4)
三、李富春同志揭发林贼的罪行	(8)
四、陈毅同志给毛主席的信和揭发林彪早年的反党罪行	...	(11)
五、聂荣臻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和揭发林彪的反党罪行	...	(21)
六、肖克同志对林彪的揭发	(34)
七、曾山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	(46)
八、邓子恢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	(48)
九、蔡畅同志提出的林、叶二贼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几个线索	(50)

5月21日晨,周恩来前往毛泽东处汇报即将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谈话中,毛泽东对即将印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前言提出修改意见,说:“继续审查”那句话可以不写。大的罪状已经很够了,再多就是补充了。

当天,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

“我们这次会议人数是312人,比去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99人扩大了。鉴于去年那个会议的人数比较少了一些,因此传达也就不很广。地方还好,中央的比如军事系统,中央文件发了60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就扣住了,只发了7份。所以当时批陈整风的传达,在军事系统,军委直属的,就非常狭窄。去年7月被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方打招呼。犯错误就是要自己引以为戒,就要逢人便讲嘛,这才能够自己得到教训,得到警惕,人家可以监督,人家也可以引以为训嘛。这是主席对于历来犯路线错误的教导嘛。但是,当时黄永胜他们就不是这个态度。”

这一次我们这个会议的名字改成批林整风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干部，还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个错误的严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是如此。《我的一点意见》，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陈伯达这个骗子，由于主席的教导使相信他的人、上当的人觉悟了，警惕起来了。使跟他搞阴谋的人就不要搞了嘛。所以，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9月13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陈整风。整个精神，从文件上你们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9月13日把这个问题真相揭穿了，头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陈，不像高饶联盟那样。林彪搞的是阴谋活动，他反党、反主席的思想是长期存在的。刘少奇以后就是他挂帅来反对主席了。他是搞阴谋的，但是阴谋逐步要暴露，最后灭亡。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所以，这次开的会议就定名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也不要再说林陈反党集团了，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他说：“这一次批林整风会议，首先要学文件。文件相当多，要把它归一下类。政治局原来讨论了，昨天又请示了主席，刚才政治局又开讨论，大概初步定为这样的一些文件，正式的会议文件，有六种。”

接着，周恩来分别介绍了文件之一：《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

文件之二：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的八个批示、中央的有关文件、跟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有关的材料之一、材料之二。周恩来说：

“另外有一个单页电报，是批评新疆关于新疆日报擅自登出林彪大幅照片等严重错误的。这样性质的错误，不仅新疆有，浙江也有，比如这回安徽报告上检查也有。恐怕别的省这回讨论，你们回去自己检查也可能有。在去年九月十三日以后，我们只说以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有林彪的话就不要勾掉了。但是还继续登林彪的照片，还不断地引林彪的语录，一直到10月、11月，吹捧林彪的话在报告上还有，这就是错误的了。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把这件也印出来，大家再看一看。这都是发过了的，但是不见得到会同志都看过。这是文件之二。”

文件之三：就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的材料

之三。周恩来说：“原来已经发了材料之一、材料之二；现在发材料之三。这个作为送审稿，还不作最后稿。主席在上面批了：‘同意印发，征求意见。’就是到会的 312 位同志都可以直接提意见，同时也可以拿这些材料深入地批判，深入地揭发。如果在批判和揭发当中，还有新的、好的材料，更有分量的材料，还可以补充进来。会后我们再进一步修改，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各地去，层层下达。”

文件之四：是中央专案组关于陈伯达的审查报告。周恩来在介绍内容时说：“主席昨天还说了一件事，就是文字上我们应该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说这个形容词，修正主义还有革命修正主义吗？当然只指反革命了，你要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好像对立面还有革命修正主义了，说笑话的。那么文字上应该是反革命的，就是他这个性质是反革命又是修正主义，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文字修辞若不那么严格，常言可以引起误解，主席昨天举了这个例子。”

文件之五：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周恩来说：“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913’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 1966 年 5 月 18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 1966 年 7 月 8 日，在武汉写的，我是 7 月 11 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

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7、8年后，结果6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大懂的了，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的做日常工作的9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这个大概明天可以印给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这是会议文件之五。以上这些文件现在有的已经发了，有的明天要印发。”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的会议除正式文件外，还有参阅的文件，我们也是不多选，选那些重要的。

参阅文件之一，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收集的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罪行，有两本，我们现在选他第一本。就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也挂了一点抗美援朝。重点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有人把他说得好像是了不起的。现在陈毅同志故去了，他生前揭发了一件事，这个文件上面也选了。就是说，从三河坝离开，朱德同志拍胸脯，要大家跟他走。因为他是在旧军队呆过，懂得怎么样能够避开敌人，还能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团结在一起，来继续打仗。三河坝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个连长吧？”

聂荣臻：“连长。”

周恩来：“连长。他也离开队伍。当时离队之风那就是很盛了。比如那个时候师长周士第就离队了，还有李硕新也离队。李硕新后来做白区工作牺牲了。林彪也带着钱，带着枪离队，走不出去了，才折回来。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

朱德：“连长。”

周恩来：“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井冈山被林彪去逛了一下子，程世清同志他们就这样子写，这是错的。所以，从军事路线的斗争上看出，林彪的

‘左’倾路线是一系列的。我也犯了‘左’倾路线错误，那应该承认嘛，检讨自己嘛。那么林彪一点份没有吗？就那么正确吗？现在把他《论短促突击》印出来给大家看，他那篇文章最后一段是支持李德的，这也是关键性的文件了。长征的时候，在遵义会议上，他并没有发言。遵义会议以后，他不断地反对主席。给他的命令，他就反抗回去，不执行。到会理会议就更厉害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那个军事文件上，对会理会议这部分，语言不详细，只有一两句。会理会议，他反对毛主席，要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我都下野，他推彭德怀挂帅。这一段，文件上没说几句。剑英同志，恐怕那要请你补充几句。主席现在在看，他对这个有兴趣，我们还可以补充几句。因为那一段会理会议只有几行，这是大事情。这个事情，荣臻同志也清楚。红军不少干部知道会理会议这个事情，但是不晓得内容。”

聂荣臻：“没有传达。”

周恩来：“没有传达，照顾了当时那个困难的环境，应该这样子。他到张国焘那里，他也动摇；到陕北，他两次写信给主席要到陕南打游击；东渡黄河，他也动摇。大相寺会议，批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批判了聂荣臻同志，他也有份嘛，他一句话不吭。一直到抗日战争的平型关战斗等等。他后期在苏联，回来崇拜国民党。现在还查出来，他就在莫斯科的时候，大概是共产国际动员他写了一篇文章，大捧蒋介石、陈诚，还把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话引了一段，但是只字没提毛主席。这是在1940年7月写的，我们都回来了，我们是3、4月回来的。就是说，他的一些文章不亚于王明。他回来以后，解放战争，主席昨天说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他大概觉得他占了一个半。今天剑英同志说，恐怕他不止只认为一个半，是两个。因为主席说，辽沈战役是他指挥的了，平津战役有晋察冀、有华北的部队了，他算一半吧，所以一个半。实际上这一个半战役，主席说，最麻烦就是他了，不断地跟他商量，不同意又改，改了还不同意。总是主席的命令下去，三番五次地商量他才同意，有时硬不执行，几乎让东北的敌人跑掉，几乎让平津的敌人跑掉一部分。这个大家看文件就晓得。所以这本东西主席要去看，看了以后我们再印。”

接着周恩来又介绍了参阅文件之二，就是5月20日中央下发的

那份朱德、陈毅、李富春、聂荣臻、曾山、邓子恢等 9 位在京中央委员中的老干部写的书面意见。

参阅文件之三是高岗妻子李力群对林彪的揭发。

参阅文件之四是林彪在五次反围剿时写的《论短促突击》，是在军事博物馆的军事文献里找到的。周恩来说：“我看军博的那个管事的人大概也没去看，被我们耿飚同志派人去发现了，抄给我，是全文。”“他最后一段就是引用华夫的文章。华夫是谁呢？就是四中全会‘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统治的时期，当时，共产国际派来一个军事顾问，这个人是个德国人，中国名字叫李德。”

参阅文件之五，是中央联络部写的中苏关系 11 个问题，说明中苏关系是怎么造成的。

周恩来说：“今天政治局讨论，打算在会议文件里加一个之六。就是在两年半之中，前年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批陈整风，吴法宪、叶群先作了检讨，这个检讨都是前年写的，吴法宪检讨是 9 月 29，叶群检讨是 10 月 12，这个检讨当然不深刻，但是先给主席看了，主席批得很尖锐。这两个批件很值得学习。所以，我们打算把他们这两个检讨印出来。”“然后就是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黄、吴、叶、李、邱五大将的检讨了，那个检讨他们都是对了口径的。我们有时候帮他改，说那些东西应该说的更深刻一点，因为他给我们看过嘛。”

周恩来最后说：“这一次是我们党内第十次的路线斗争，也是最尖锐、最严重、最复杂的一次阶级斗争。”

第1244回：江青谈，毛泽东的那封信 周恩来，再说明“伍豪事件”

周恩来在5月21日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提到的文件之五：《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就是第86回提到的毛泽东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那封信。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周恩来在1972年5月21日晨请示毛泽东：可否将这封信印发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表示可以印发作会议文件。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注：指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注：指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

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注：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注：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称“西方”）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注：指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

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注：指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任何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

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七月八日

这封信写好后，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交徐业夫存档。

1966年7月11日，周恩来陪外宾到武汉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让他在武汉留一天。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和王任重一同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将写给江青的那封信给他们二人看了，是徐业夫誊写的抄件，抄在直条纸上，上面有一、两处改动处，是毛泽东的笔迹，改动不大，有一处把“他就逃到一个海岛上去了”改成“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周恩来当时阅毕，即向毛泽东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

毛泽东表示同意，说：“可以。”

1966年7月14日，周恩来乘飞机到大连，向住在那里林彪转达了毛泽东7月8日信件中的意见。林彪听到后吃了一惊，表示接受“主席的意见”，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

毛泽东对林彪的悔悟之意表示满意，认为林彪只要今后改正这种作法，可以把他信烧掉，信的内容不再下达。

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

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

江青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

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那就烧了吧。”

于是江青把叶群叫到钓鱼台，当着叶群的面，叫戚本禹和卫士大孙把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亲笔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江青和叶群就站在窗前看着他们烧。不过，抄件保留了下来。

1972年5月21日，在请示毛泽东同意后，这封信的抄件复印后发给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与会者人手一份，并形成中央文件。在铅印印发时，江青要求把原信开头的称呼“江青”改成“江青同志”。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同意，印发时仍维持原称呼，只是在作为中央文件印发时加上了一个标题：《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这封信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为此，5月25日、26日和27日，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华东组和中南组小组会上，先后作了3次发言，说明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她说：

“1966年，中央在杭州开四月会议，当时我在上海，不知道会议情况。5月初，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还在上海，也不知道会议情况。1966年7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当我读到：‘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当时和现在，我始终认为，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信中讲了世界革命问题，所以，也是写给全世界人民的。不过在当时，主席不好写给别人，只能写给像我这样的人。”

“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之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

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证明，他实际上是要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1966年9月20几号才批发。”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15年后才发表。毛主席的这封信，在6年后同志们就看到了。我们现在能看到这封信，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的毛主席健在，我们的党非常好，是团结的。”

“毛主席的著作，我没有全部读完，而且读的不好，时常是读一次领会一点。主席写的这封信共两千字左右，我觉得是我读过的短篇中很少见的重要著作。信的文字结构严谨，一气呵成，非常幽默，很有层次，通篇是说理，绝无剑拔弩张之处。这封信使人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感到意义深远，涉及中国、外国、政治、历史、哲学，高度概括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必然的发展规律，总结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宝贵经验，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宝库里的光辉文献，对于指导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直至建设共产主义，都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林彪叛党叛国以后揭发的大量事实来看，林彪是历来反对毛主席的。我们这儿的老同志们是否知道林彪的底细呢？我就不知道。可能有的老同志知道，但顾全大局，不说。毛主席是深知其人的，但是在同志们面前，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讲过。毛主席背后很少说人家的坏话，总是说人家的功劳。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林彪并非一贯正确，更不是像黄永胜、李作鹏他们颂扬的那个样子。这几年来，他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更加深了我对林彪这伙的认识。毛主席在写这封信时，已经看出林彪不讲马列主义，不讲阶级，不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群众，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看出了林彪在思想上、理论上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说，主席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看穿了林彪搞的全部阴谋诡计，那怎么解释‘九大’呢？直到林彪叛党叛国之前，主席和你们谈话时，还是要保林嘛，这怎么解释呢？毛主席对他一直是采取了团结、教育、保护的方针，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这说明毛主席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力魄。林彪干坏事，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

态度。主席是很尊重历史的。《我的一点意见》原件上有：找到林彪的几条，如获至宝。原件上陈伯达的名字后面也没有‘同志’两个字。原件是我们回到北京后，我向主席做了请求，主席批准之后，才看到的。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中央印发这个文件时，我们想恢复原件那样子，主席不同意，说这是历史，不要再恢复原件了。”

“林彪把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奉为钟馗，名义是打鬼，实际是为着实现他的个人野心。毛主席的信中说：‘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这段话，我个人现在看，是活龙活现地揭露了林彪的反动面目。林贼从当抗大校长到当国防部长，拉山头，结死党，‘打着 B——52 旗号，打击 D——52 力量’，这不是同蒋介石如出一辙吗？”

“在国际上，苏联的党变修了。这同南斯拉夫不一样，因为苏联是个大国，是列宁的故乡。它的变修，影响是大的。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要知道苏修是怎么整我们的，可以看会议发的参阅文件之五。”

“毛主席虽然看到了国际国内这些阴暗面，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革命胜利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有人问，虎气和猴气怎么理解？我是这样理解，虎气和猴气是对立的统一，主席讲虎气为主，这就是说不能搞折衷主义。”

“毛主席说：‘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不到六年，林贼一伙就自己跳出来。现在全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着斗争。斗争并不是就此完结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七、八年横扫一次牛鬼蛇神，以后还要搞好多次。我们决不能搞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主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政变，迅速地被粉碎了，这一事实，证明主席这段话是多么英明的预见啊！我们要很好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决不能让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主席不知给我说了多少次，要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我自己并不比同志们高明多少，主要是有毛主席这样的严师，不然尾巴也可能翘到天上去了。如‘天才’、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我能坚持原则，是因为主席讲过多次，我对主席的指示是坚信不疑。因为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一起工作，已经几十年了，看到主席是说了就算数的。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信不疑，要坚决贯彻执行。”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公布后，会议分组进行了讨论，大家的发言，基本都是：“读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毛主席高瞻远瞩，对林彪的问题早有察觉”等等。

邓颖超在发言中说，她从三十年代起就知道了江青，读了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江青致唐纳的公开信，认为江青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林彪一伙要收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什么“黑材料”，而是“红材料”，等等。

5月27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从毛泽东处回来后，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说：“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讲一点个人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

次日，5月28日，周恩来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召集人会议上宣布此事。

5月28日这天，周恩来在一则反映山东、江苏等地聚众抢扒援越物资列车事，批告在京参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省负责人：“务望你们电话告省、地委、军分区、各县市，动员各公社和城市居民点进行群众教育，加以劝阻。有关地方，车站徒手军警加以宣传驱阻，但切不可动用武器，也不可打骂，还是实行‘四不’或‘五不’。”

5月29日至6月7日，周恩来起草他准备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报告提纲。

5月3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我现在正写一个讲话要点，写成后将先送主席审查，并请约我一谈，好当面请示。”

6月7日，周恩来将所写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

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语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

毛泽东圈阅了提纲和附信。

当天，中央政治局会后，周恩来去毛泽东处。

6月9日，周恩来修改、补充《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形成二稿。

6月10日，周恩来将提纲稿送中央政治局成员阅。

6月10日至12日，周恩来连用3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报告依次就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过程、错误危害等详加论述和说明。

在谈到王明右倾错误问题时，他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自己作了严厉的剖析、检讨。并表示：“我入党50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这几年我党说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我平常爱读鲁迅和毛主席的各两句名诗以自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应该得到启发，不应该有任何顾虑。要彻底交待，认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6月13日，陈云以当事人身份，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所谓“伍豪问题”说道：

“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

当天，陈云还写下书面证明：

“我现再书再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在此之前,1972年2月18日,康生也病床上口授了一份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另外,“913事件”后,谢富治去世前,于1971年9月20日,也曾在医院说:“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像。”

6月23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今后有人利用这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

周恩来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词”的情况作了说明。还讲述了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公布了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为此写的批示。并在会上公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区存档。

第 1245 回：枪响处，军政委妻子被杀 余洪信，麦田中自杀身亡

1972 年 5 月 18 日凌晨，几声枪响惊破了太原 63 军军部大院，军政委曹步墀的妻子邢玉荣被打死，军副政委杨兆魁和战士张彦平被打伤，杀人者竟是该军副军长余洪信，事发后潜逃。

自 1969 年秋北京军区各军增援内蒙，1969 年 12 月 19 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后，巴盟、包头分给了 63 军负责。巴盟“前指”主要负责人是 63 军副政治委员田荫东。1970 年春，63 军副军长、战斗英雄余洪信接替田荫东，并出任张家口一带的北方边界总指挥。

余洪信到巴盟后，工作很努力。但他从来没有当过地方“父母官”，把地方当军队一样管理，举手投足仍是百分之百的“军阀作风”，即部队做派。他在县百货商店看到手表不错，二话不说戴到手腕上，转身就走。第二天，商店的经理正在着急，余洪信派警卫员把钱如数送来了。

1970 年 7 月底，石家庄地市代表团到巴盟慰问解放军。临河县没有组织好欢迎，余洪信在火车站当着上千群众的面把县革委会主任、武装部政委张兴旺骂得狗血喷头，谁也不敢阻拦。

1971 年 10 月，余洪信到五原县复兴公社，看见办公室几个人正在打扑克，顿时大怒：“上班竟敢打扑克，谁给你们的胆子？都给我捆起来！”连闻讯赶来的公社领导也不由分说，统统被押进县城大牢，成了囚犯，小县城一时轰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制约，不受监督，大权在握的余洪信，其“军阀作风”很快就发展成为真正的军阀作风。他不仅当众辱骂地方党政领导，甚至还捆绑、扣押、打骂群众，甚至采取种种手段，强奸、奸污、侮辱妇女。对余洪信的种种恶行，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1972 年 5 月，中央军委决定在 6 月底前撤销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

指挥部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除参加地方“三结合”的人员外,其他军管人员一律返回部队。

余洪信也离开了巴盟。谁知他刚离开巴盟,告状信就寄到了周恩来那里,反映他生活腐化,乱搞男女关系,强奸、侮辱 33 名妇女的种种劣迹。

63 军核查后,召开常委会讨论余洪信的问题。余洪信自知理亏,在军政委曹步墀主持的多次常委会上,他虚心接受批评,表示给他什么处分都可以,只希望保留党籍。

63 军常委会充分考虑了余洪信的意见,给他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撤销副军长职务,从 12 级降到 17 级。余洪信表示同意这样的处理,没有更多的意见。

63 军常委会将处理意见上报北京军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批示:“此人错误严重,检讨不深刻。”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画了一个圈,退回了 63 军。

李德生和纪登奎历史上都与北京军区和北京军区的老部队 63 军无缘。余洪信这时体会到“山头主义”的好处了,如果北京军区是杨成武、郑维山等老首长坐镇,或许会对这位战斗英雄网开一面?他们是看着余洪信成长起来的,可惜他们在 1968 年 3 月“杨余傅事件”中都被打倒,如今不知被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63 军军长阎同茂是河北深县人,与余洪信是老乡。他 1966 年 7 月任 63 军副军长,1970 年 12 月任 63 军军长,和余洪信共事时间比较长,对余洪信的历史和性格都比较熟悉。但也许正因为此,他更不敢替余洪信说话。

曹步墀和阎同茂传看了北京军区的批示,通了气,然后召开常委会,叫来余洪信,把纪登奎的批示念给他听,让他再作进一步的深刻检讨。然后叫他离开,继续召开常委会。

曹步墀说:“看来老余的问题上边看得很严重,我们两位书记研究了一下,老余的问题下一步各位常委就不要插手了,由我们两位书记负责,有事我们直接找他。”曹步墀一连说了几遍不要插手。

会后,惴惴不安的余洪信找 63 军副政委宋双来,也找了另一位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李立。他反复问:“我的错误这样处理还不行吗?

难道还要判我的刑吗？军区领导是不是还有其他批示？”

余洪信之所以第一个找宋双来，因为宋双来也是63军著名的战斗英雄，彼此关系不错。宋双来注意到余洪信的脸色很不好看，但因为曹步墀明确交代不让其他常委管，所以宋双来等几位常委对余洪信都没敢更多的劝解。宋双来坦率地告诉余洪信：“上边的批示内容就那么多，别的问题没有。”希望他把检讨再写深刻一些。要相信组织，着重是提高对错误的认识。

5月17日早晨，余洪信注意到军部小招待所的战士在打扫高级房间，得知是为北京军区张正光副政委准备的。此时余洪信非常敏感，他心想：张副政委来军里干什么？一定与处理他的事情有关，会把他怎么样？没准会宣布判他的刑？这些天，余洪信真成了丧家犬，走到哪里都成了议论对象。人们在远远近近的议论他的作风问题，当他走过时，大家又装作什么都没说，只用异样的目光偷偷打量他，男女作风问题使一个人的从前和以后都变得不光彩。

回到家，平时言听计从的老婆、女儿都在，可是没人理他。他在家里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心中的落差可想而知。

5月17日晚上，部队文工团在军部礼堂演出《白毛女》。余洪信以前忙得四脚朝天，哪有时间看这类节目，现在他没事干，又心里烦闷，便跟老婆一道去消磨时间。他清楚，他老婆已经被组织上安排秘密监视他，所以走哪跟哪。偏偏这天演出《白毛女》，余洪信心情复杂极了。按说他也是大春式的英雄人物，怎么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黄世仁呢？

余洪信这个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回到家，老婆和女儿都不理他。他越想越没有出路，决定孤注一掷。5月18日凌晨2点多钟，他乘老婆熟睡，从家中跑出来，到了军警卫连。哨兵见是副军长，以为他查哨，给他敬了一个礼，就专心站岗了。余洪信径直走进去，从挂在墙上的手枪中抓了两支往腰里一插，拔腿就走。

当他再次推门回到家里时，他手里有了一把枪。老婆诧异地问：“你的枪不是收回了吗？你怎么又有枪了？你这是怎么回事？”

他什么都没回答就朝着他老婆开枪了。他女儿警醒得比他的老婆快，抢先一步拦了他一下，子弹没打中他老婆。他喜欢他的这个小

女儿,所以也就没有朝女儿再开枪。

63军军部大院里最初的两声枪响,就是余洪信向他老婆开的,因女儿拉住而没打到。余洪信的老婆从家中边喊边跑了出来,余洪信也从家里追了出来。

恰在此时,他迎面碰到听到枪声走出家来的杨兆魁副政委。杨副政委高度近视,还没看清提着枪的余洪信,刚问“哪里打枪?”已被余洪信抬手一枪,打到他的肩膀处,应声倒地。

余洪信没有再追他的老婆,而是提着枪来到63军军长家,敲军长家的门,里边没人应,没人开灯。他在军长家的门外站了一会儿,等着有人给他开门,谁给他开门……

没人开门,余洪信转身就往政委家走。政委家也黑着灯。他敲门,屋里的灯亮了,余洪信在暗处,透过敞开着的窗子,看见是政委的老婆邢玉荣开的灯,他等不及政委的老婆走到门口给他开门,透过敞着的窗子就从窗外就朝里打了几枪,政委的老婆一命呜呼。正在床上睡觉的曹步墀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抗美援朝立过特等功,他见事不妙,一骨碌滚到床下躲藏起来,毫发未伤。

余洪信从军首长住的小院往外走,这时候,负责首长小院警卫的战士张彦平正一路循着枪声跑过来,看见迎面过来了一个人就赶紧问:“谁啊?”

话刚出口,子弹也到了,余洪信举手就朝着那位战士开了枪,战士受伤倒地,这是最后一个看见余洪信的人,自此,余洪信就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不见了。

余洪信跑了。

“913”事件发生还不到一年,又发生军级干部开枪杀人事件,此事非同小可。总政治部接到北京军区的紧急报告后,将余洪信案通报公安部。搜寻到第12天,余洪信仍踪迹全无,国家公安部连续两次向全国发出《查缉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通缉令》。

通 缉 令

各市、地、州、县公安机关军管会、革委会人保组，成都铁路局公安处军管会、人保组：

现将公安部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九日第二号通缉令转发你们，请按照公安部要求，立即传达布置，切实认真的贯彻落实。在未接到公安部通知前，不得撤销工作，不得放松警惕。发现问题，请速告我们。

(请勿张贴)



附：公安部通缉令（第二号）

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凌晨二时许，行凶杀人后，畏罪潜逃。

余犯现年四十七岁，男，身高约1.8米，身体肥胖，留短发，黑红长圆脸，肉泡眼皮，厚嘴唇；头顶稍后有拇指大的一块伤疤没头发（内有弹片），左右上眼皮留有做倒睫手术的伤疤，但不明显；上门牙中间镶有白色塑料牙缝；喉头下方偏右有子弹伤疤；右或左鬓角下有不明显的伤疤；右肩有伤疤，比左肩低。余犯操河北省武强县口音。潜逃时，着旧草绿色单军衣一身，戴一号新军帽，佩戴领章、帽徽（注意余犯化装），内着天蓝色府绸衬衣，驼色毛背心，浅鱼肚白色秋裤，穿黑色松紧口四眼鞋和驼色尼龙袜。携带“54”式手枪两支（枪号：后三码360、639），子弹若干发，以及电饭锅式手电，会开汽车、摩托。



各单位接此通缉令后，立即传达到所有工人、贫下中农、干部、职工、学生、居民及解放军指战员，并熟悉其特征，在车站、码头、边防口岸等地布点查找，发现后将其拘留，严防行凶、自杀、逃跑，并速告我部。

查缉余犯的各项具体措施，必须保证落实，各边防口岸必须严密控制，严防外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其中第二号“通缉令”称：

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军管会：

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凌晨二时许，行凶杀人后，畏罪潜逃。

余犯现年四十七岁，男，身高约1.8米，身体肥胖，留短发，黑红长圆脸，肉泡眼皮，厚嘴唇；头顶稍后有拇指大的一块伤疤没头发（内有弹片），左右上眼皮留有做倒睫手术的伤疤，但不明显；上门牙中间镶有白色塑料牙缝；喉头下方偏右有子弹伤疤；右或左鬓角下有不明显的伤疤；右肩有伤疤，比左肩低。余犯操河北省武强县口音。潜逃时，着旧草绿色单军衣一身，戴一号新军帽，佩戴领章、帽徽（注意余犯化装），内着天蓝色府绸衬衣，驼色毛背心，浅鱼肚白色秋裤，穿黑色松紧口四眼鞋和驼色尼龙袜。携带“54”式手枪两支（枪号：后三码360、639），子弹若干发，以及电饭锅式手电，会开汽车、摩托。

口四眼鞋和驼色尼龙袜。携带“54”式手枪两支(枪号:后三码360、639),子弹若干发,以及电镀钢笔式手电。会开汽车、摩托。

各单位接此通缉令后,立即传达到所有工人、贫下中农、干部、职工、学生、居民及解放军指战员,并熟悉其特征。在车站、码头、边防口岸等地布置查找,发现后将其拘留,严防行凶、自杀、逃跑。并速告我部。

查缉余犯的各项具体措施,必须保证落实,各边防口岸必须严密控制,严防外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考虑余洪信曾任巴盟前指总指挥,对巴盟边界一带很熟悉,怕他从巴盟越界逃跑,便在巴盟地区加强封锁。当地驻军和内蒙古建设兵团的知青都参与搜捕工作。

这天上午,一辆军用北京吉普从五原方向向乌不浪口疾驰而来,从车牌上看是巴盟前指的车。站岗的士兵举起手中的小红旗,示意停下车检查。没想到北京吉普不但未减速,反而加大油门想冲过去。带班的见情况不好,迅速拔出手枪朝着天“啪啪”就是两枪。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停在了岗哨前。

停车后,吉普车司机往对面山梁上望去,立刻吓出了一身冷汗:只见山梁上架着一挺轻机枪,两个当兵的爬在机枪后边,已经瞄准了他。如果再不停车,肯定就是一梭子。

巴盟前指与巴盟军分区的关系一直不好。巴盟军分区是个师架子,是地方部队,前指的人一直不把军分区放在眼里。在乌不浪口设卡的是军分区骑兵团的,而这辆吉普是前指的,自然没把他们当回事,于是发生了上述一幕。当然,车上并没有余洪信。

在潮格旗有一个空军的雷达站。雷达站的一辆汽车修理后在荒滩上试车。负责追捕余洪信的解放军战士从望远镜里发现一辆军车走走停停,怀疑是余洪信要越界逃跑,就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指示,必要时可将其击毙。解放军战士埋伏在汽车前方,待汽车离近后,一梭子冲锋枪打了过去。军车被打懵了,停在原地动也不动。战士们围过去才发现是空军的车子。幸好子弹没有打着人,只是把车身打成了

筛子眼。

各地的消息纷纷报来,到处都说发现了余洪信!

这一天,又有报告,黄河老牛湾那个地方漂着一具尸体,头上有疤,很像余洪信。中央专案组乌国庆等人申请了一架直升机,直奔老牛湾现场。

飞机降落到一个叫偏关县的地方。直升机降落到离地没多高的距离时,驾驶员忽然看见下边有电话线,飞机要是落到电话线上或是电话线要是缠到飞机上,那可就全完了,驾驶员赶紧关油门,惊魂未定中飞机就掉下去了……

直升机重重地墩在了地上,没有爆炸,但飞机上的暖壶水瓶都碎了。机上人员侥幸受了点轻伤,其实他们都心知那是侥幸地逃过一劫。

当地老百姓没见过飞机,这个稀罕啊,什么都不干了,纷纷从田间地头和家里往落飞机的那块地界跑,不一会儿就把乌国庆他们连同飞机都围上了。

乌国庆一行人下了飞机,不敢耽搁,就往现场奔。离开县城没多远就进到了沙漠里,车子在沙漠里走不了,乌国庆他们只好下来推。可是,那车子在沙漠里推也推不动,退也退不出来了,没辙,他们只好带上勘查检验现场必备的工具和照相器材,身背肩扛,在沙漠里走啊走,整整走了一个晚上,带路的人说离现场还远着呢。一行人一听几近崩溃,这时才觉出又困又饿,他们寻到一个老乡家,放倒身子睡了一觉,再走,到了中午12点,终于走到了现场。那儿的确横陈着一具尸体,已经腐烂了。一检验,乌国庆说,这个人不是余洪信。余洪信打仗时脑袋受过枪伤,弹皮留在了头皮里。这个人虽然头上也有疤,但头皮里没有弹皮。再有,余洪信的阑尾不在了,经解剖尸体,这个人有阑尾。这个人肯定不是余洪信。

来时的飞机摔坏了,乌国庆他们只能等救援的飞机。

救援的飞机降落时没有通知当地驻军,所以当地部队看着在空中盘旋来又盘旋去的飞机,以为是余洪信来了。等飞机一落,他们就把飞机包围了。机上的人赶紧跟部队说明情况,说是来接中央派来的办案子的同志。一说老牛湾,战士们说那远了,飞过几十公里了。

直升机重新起飞。这一回看见乌国庆他们几个人了。飞机在他们头顶的上空转了半天,最终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实验机场。机场那儿有部队把他们往县城送,沿路看到处都在设卡,跟他们同车的一个战士,长得有点胖,过卡下车接受检查时,人家就把他给按住了,非说他长得像余洪信。乌国庆他们解释半天,才让人相信他们是来抓余洪信的,并非余洪信。

1972年6月,山西省榆次的一垄麦田,发现一具尸体和两把枪。发现尸体的两个后生不知深浅,一人用镰刀挑着一把枪,到支部书记那儿报告去了。而支部书记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了桌子一角的那张通缉令上:一张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和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红色印章的通缉令,后附公安部的二号通缉令。

书记看着通缉令,越看眼睛越发花,头皮越发麻。他一时无法把麦田里的那具尸体和两把枪跟这么大的一件事儿联系起来,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抓的人,63军副军长余洪信,居然就死在了自己管理的地界上?社会上早已把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了,远比通缉令上说得邪乎。通缉令上只说是行凶杀人后畏罪潜逃,杀了什么人?杀了了几人?因何杀人?一概没说。传言满天飞,人们乐于听更乐于传,哪儿管传言有几句是真,有多少是假。况且,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余洪信究竟逃到了哪里?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

书记的眼睛盯在那两把枪上,冷汗顺着手心就流了下来。天下传言汹汹,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不论那人是真的余洪信还是假的,都必须赶紧向上报告!

报告一级一级,从县到省,不敢延迟。省里派人去看,觉得没问题,63军军长看后说就是余洪信,公安部报给中央。中央说:“那不行,不能说就是,得拿证据说话,首先要弄清是不是余洪信,如果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

奉命抵达山西榆次的乌国庆看见了那片麦田,麦子倒伏。一个人就躺在一片麦子的倒伏里。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余洪信?从中央到地方,直至这一片麦田四周站满的人群,远的近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层一层的人都等着乌国庆看后给出一个结果。

两支枪在。是被搬动过的那两支枪。那两个报案的后生头都不敢抬，生怕他们因动过那两支枪从此牵累到他们。

乌国庆仔细查枪号，余洪信的两把枪是从警卫连拿走的。枪号正是63军军部警卫连的。此人应该是余洪信。但这并不能足以就证明该人就是余洪信。

乌国庆又看那人头上的帽子，帽子上有余洪信的名字。

那人身上还有钥匙。紧急派人送军部，一串钥匙，有能打开他家门的，也有能打开他办公室门的。

血型，和余洪信档案里的血型一致。

这个人的头部有疤，头皮里有弹片。跟余洪信的特征一致。

再有，尸体腐败的程度，与余洪信逃出的时间吻合。

另外，让他的老婆孩子们看，他的老婆说，毛衣是我给他织的，鞋垫是他在内蒙古时，那些野女人给他纳的。他的孩子看了也说是。

乌国庆认定该人就是余洪信确定无疑了。

那么，接下来的关键就是余洪信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

乌国庆鉴定为自杀：死者的头部同时各有接触射击的射入口和射出口，说明余洪信是用两支枪同时发射的。

第 1246 回：为治安，决定开全国会议 放汉生，恩来谈基础理论

“913 事件”后，各地来北京上访、申诉和要求平反的人员一下子多了起来。由于北京外来人员激增，他们的心绪不平，导致 1972 年以后的北京社会秩序一度比较混乱，甚至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案件。在此期间中南海周围发生过危及安全的事情 22 起，71 人次。其中闯门的 11 起，拦阻首长、外宾车汽车 4 起。投北海自杀、吞针、自焚、沿街卖子、白日打灯笼的 5 起。公开投递反革命信件、胸挂白布反动标语牌等 2 起。大会堂周围发生危及安全的事情 6 起，首长行车出过险情，上访人员企图闯门求见首长，反革命分子公开递交反动信件等。钓鱼台 1972 年 5 月发生过一起精神病人闹事。京西宾馆周围尚未发生什么问题。

这些事情多数是上访人员因为问题没有恰当解决而发泄不满。

6 月 2 日，周恩来批示治安和警卫部门，对北京特别是中央核心驻地和办公点的安全保卫形势做一汇总和归纳，并制定出相应方略。

6 月 9 日，公安部部长李震、副部长于桑、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刘剑，联名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概述了 1971 年 12 月以来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和京西宾馆一带的治安情况，并提出了今后加强警卫的措施。

在叙述了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京西宾馆四个重点地方的具体警卫措施后，报告还提出要采取内部保卫、治安管理和武装巡逻三结合的办法，加强工作，既有分工，又密切联系。日常工作和遇有重大活动，建议由中办警卫处实施统一领导。

报告还谈及中央重地和首都的安全与相邻地方的关系。因为最近几个月，华北和东北几个省来京上访人员又有增多，对社会治安发生不利影响，对安全保卫工作威胁较大。

周恩来在这份报告的许多段落旁边都做了批语。从批语上看，他

对这份报告不是十分满意,而且认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在报告最前面做了一个总的批示: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同志:

兹事体大,务请德生、登奎、东兴、吴德、吴忠、杨俊生、李震、于桑同志邀集中办、国务院办公室、军委办公厅和杨德中、刘剑、刘传新、邬吉成等同志切实一商,务求合乎政策,件件落实,并保证情况在六月下旬能开始好转。

周恩来对李震、于桑、杨德中、刘剑报告做出批示时,已经是6月13日了,他要求保证在当月的下旬形势就呈现好转,简直是要立竿见影。于是,公安部和中央警卫局立即商议,拟订具体措施,进行部署,展开有效的工作。

在商议的过程中,大家普遍感到,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从事警卫的部队的战士已经因老兵退伍、新进兵员产生了一些变化,但警卫业务的学习却基本处于废止状态,只靠在执行任务的布置时简单的交代,是不能很好地胜任警卫工作需要的。因此对警卫工作人员进行警卫业务的教育,十分必要。

此外,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重点地方,都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警卫的措施。例如针对报告中提到的有人在北海大桥上往中南海这边投水自杀的情况,将北海大桥两边的栏杆加高了。第一次,加高的高度不够高,还是有人攀上去往里跳。周恩来提出再加高些,并且要求铁栅栏的顶端做成尖的,以有效地阻拦投水者。

因为1972年以后出现的社会秩序和治安问题,并非只在北京有所反映,而带有普遍性,在全国各地皆有所反映。而周恩来在6月13日批阅李震等人的报告时,也有“要正式提起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和有关八个省、市、区党委开会同志注意”批语,中央决定,于当年8月底,召开了全国的警卫工作座谈会。

此时,又有很多老干部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们的问题。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的来信上批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当天,周恩来和叶剑英、李先念先后就贺诚工作事批告有关部门做出安排。

这天，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对她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7月5日，周恩来在上海送走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后，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同他们就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主要任务谈话。他说：

“当前世界局势复杂，我们总的战略是利用矛盾，分化孤立主要敌人。团结朋友，包括间接同盟军，各个击破。推迟战争爆发。”

关于对外交往问题，他说：“凡是我们不能做的，不要人家做；越是小党小国，越要注意，否则是大国沙文主义。”又说，“二十多年，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是事实，但同时又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在谈到国内问题时他说：“出了林彪事件，出现这么一个结局，谁也没料到，谁也无法导演。林彪之死，真是天造地合。这是必然性的结果，偶然性的出现。关于当前的主要工作，有两件事：一是专案审查，这么多人，要清查一下，排个队。要给他们政治生活、学习，不要搞政治隔绝；二是‘三支两军’，军代表、军宣队问题，要肯定基本成绩，但也有许多地方风气搞坏了，要改。”

廖汉生子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其父在1967年被隔离审查后，毛主席曾几次提到要他出来工作，但至今未见动静，希望让其父回京治病，等待组织结论。7月7日，毛泽东在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

“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7月8日，周恩来将毛泽东所批廖汉生子女来信，派专人送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以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传阅。

7月10日，廖汉生被告知要回北京。廖汉生以为又要接受更大的批斗。他被押着来到石家庄火车站。列车开动后，看守班的战士没有上车，只有专案组的两个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连上厕所也要跟着。到了北京站，车厢门口已经停着两辆车，一辆伏尔加小轿车，一辆是北京越野车。开始，他们叫廖汉生坐进伏尔加车，没过两分钟，又觉得不

对头,把他从伏尔加车里拉出来,坐上越野车。坐了一两分钟,他们又觉得不对头,把他又拉回到伏尔加车上,把廖汉生搞得莫名其妙。

汽车驶出北京站,廖汉生听到有人对驾驶员说了一声:“去宾馆。”猜想大概是押到北京军区的西苑宾馆。没想到,汽车驶过军事博物馆,向左一转,进入京西宾馆,在宾馆大楼前停下来。门口有总政治部的一位干事等在那里,问清楚情况后,把廖汉生带到二楼西头的一个大套间里,转身走了出去。过了大概一两分钟,那位干事进来对廖汉生说:“李主任要你去。”这次,专案组的人没有跟着,只有廖汉生一个人在那位干事的带领下来到另外一个房间。

李主任就是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廖汉生不认识他。

李德生代表总政治部谈话,告诉廖汉生:“第一条,毛主席说的,你没有罪行,有错误。第二条,你从现在起解除监护。”

“什么监护?”廖汉生对这个词很生疏,心想:我不是被关起来吗,噢,这叫监护。

李德生又问:“五七一,你知道不知道?”

廖汉生回答:“我不知道什么五七一。”

李德生告诉他:“五七一,就是林彪搞的那个‘武装起义’计划。”

接着,李德生给他简要地讲了一下林彪的情况:阴谋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以及怎么摔死的。

随后,廖汉生向李德生讲了孩子们都被赶下乡的情况。李德生告诉他:“孩子们现在还不能回来,这是一项大政策。”

谈完话,总政干部部魏伯亭部长送廖汉生回到二楼西头的大套间。在那里,魏伯亭当着他的面对北京军区专案组的两个人说:“你们回去吧,他已经解除监护,今后就由总政负责管理。”

专案组的人走了,魏伯亭也走了,大套间里只剩下廖汉生一个人。他掐指一算,5年多来,身边24小时都有人“监护”,“前呼后拥”的,也习惯了,现在突然一下子就他一个人了,又恢复了自由,真是百感交集,欲哭无泪!

一天,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楼下的会议室里开会,抽空上来看廖汉生。叶剑英告诉廖汉生,是毛主席要他来的。毛主席说:“廖汉生出来啦,你去看看他。”叶剑英关心地询问了廖汉生的身体状况。随即,

总政治部安排他到301医院检查身体,治病。

7月31日,廖汉生接到去人民大会堂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通知。他怀疑地问通知人:

“我还能出席‘八一’招待会呀?”

一会儿,廖汉生碰见了久违的王“胡子”——王震。王“胡子”问:“通知你了没有?”

廖汉生答道:“通知了,我能出席吗?”

王“胡子”语调重重地说:“当然能出席,一定要出席!”

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可分配,希望能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在春秋季节到外地去看看,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毛泽东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泽东在第二天,7月22日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请总理办。”

不久,陈云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方针、政策问题。同时,参加了在京老同志学习班。

7月31日,陈云和王震、苏振华、杨勇、廖汉生等一起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陈云的名字前又冠以“副总理”的字样出现在报纸上。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于1971年首次访华,在中国逗留了四个星期,看了不少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合肥和山西大寨,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及他的母校原崇德中学,当时已改名叫北京第三十一中学,并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这次访华,使他看到了当时的中国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比较,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看到了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变化。他回到美国后,做了多次演讲。其中,他于1971年9月21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的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中,开宗明义地说道他在中国的感受:

“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

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生活的主调。”“到中国几天后，我就体会到这句话的巨大意义。因为这句话不但是同事们每天谈论的主题，而且也是他们每个人每天不论在公共场所或私下里用来批评自己以及批评别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标准。”

杨振宁一开始也是带着偏见进入中国的，他说：“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氛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都似乎毫不紧张，而且表现得很轻松。事实上，他们还乐意以此为话题。”

对中国百姓的生活，他说：“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及水果也是极多的。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

而农民精神面貌的改变更令他印象深刻。他说：

“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见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

杨振宁的结论是，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和以大寨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有关。

中国教育的巨大变化也令他印象深刻。他说：

“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学校，现在学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于原来数目的四倍了。”

“教育上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的招生制度。要是认为这里的美国学校的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

对中国的中学生在毕业之后，要先到工厂、农村、部队工作两三年，然后再经过工农兵推荐的程序到大学学习。杨振宁说：

“我深切地感觉到用这种形式选择出来的学生中绝大多数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学动机,而我也相信他们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旧制度下的学生一样的好。”

杨振宁的这次演讲,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还涉及到了当时的医疗,包括针刺麻醉、避孕与堕胎、烧伤康复等内容,也还有他和大寨社员交流的感受以及科研、工业、市民的日常生活、妇女解放等方面的内容。

在演讲中,杨振宁也没有讳言当时中国存在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他看到的是毛泽东时代明朗自信的人民,以及一派欣欣向荣,已经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他认为中国的一切积极变化,都和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有关,所以,他深有感触的说:

“难怪中国人民都说毛泽东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在演讲结束后回答问题时,杨振宁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感叹道:

“在中国,在物质上,很多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需求。但我发觉到最令人感动的是在精神方面。回过头来看看美国这个国家,我怀疑是否因为过分注重物质享受,因而使到这个国家失去那份使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

掌声响起。

1972年6月,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探亲,7月2日凌晨,周恩来会见杨振宁。在会见中。周恩来对杨振宁提出的中国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交流的建议表示赞同,他说:

“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理论不提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能总结经验,再回到实践中去,再提高,二是对人家的经验不那么感兴趣,不能去多听多看。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我们应该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去你提的意见,或者表面上说好,接受,你走了以后就无所谓了。你热情指出我们一些缺点,我们要是听了当耳边风就很危险,我生怕我们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这样。”

7月14日晚,周恩来会见正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全体成员。会见前,他与一些参与会见的中国科学家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员谈及大学招生中的“走后门”问题。

他对北京大学的周培源说：“北大应招一些条件好的学员，给科学院培养。”

然后对中科院物理所、数学所的负责人说：“你们是见证，今天说了。”

他又问时任北京大学革委会主任的杨德中：“新学员水平问题怎样？”

周培源回答说：“新学员水平有困难。”

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秦力生说：“科学院从山西招了一百多学员，交各大学培养，都是县委书记的子弟，水平不够。”

周恩来很生气的说：“都给我退回去！”

秦力生：“也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反正都是干部子弟。”

周恩来：“我也知道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都退了，名单给我。”

秦力生：“我和岳志坚同志商量过，觉得这事不好办。”

周恩来：“你们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只在旁边说，不敢负责，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以后这样就得搬开。”

岳志坚是国务院科教组一位负责人。

因为要接见的代表团就要进来了，谈话就此结束。

由于“走后门”上大学的情况当时已成风气，这批学生最终也没有退掉。

特权在文革前也有，但那时是以合法、明确的形式出现。文革开始后，特权已成过街老鼠，被批的臭不可闻。但是在局势稳定后，一些部队干部利用权力“走后门”却又变得如此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当时各级革委会中的领导，大部分是部队干部担任，工作方法简单，其专横跋扈，听不进不同意见的现象，在个别地方甚至较文革前的地方干部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主似乎又开始离群众越来越远。当然，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在文革前很多人并没有参与到民主中去，所以对民主的要求并不迫切。而经历了文革大民主后的中国百姓，对领导中出现的任何特权和专权的行为，都非常敏感，并且敢于表示反对了。所以，他们对一些部队干部压制民主的现象尤为反感。而“走后门”的行为，其实也没有人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去做了，形式上都履行了当时的

相关规定和程序。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干部子弟参军、上学的比例远大于普通百姓,这不能不让经过文革洗礼的群众感到不公。有些人认为,仍然活跃在台上的一些积极分子此时已不再代表任何群众。无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一些人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群众之间的裂痕开始消弭,思想开始趋同。

周恩来在7月14日晚与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访问团谈话中,提出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同时,他再次称赞杨振宁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意见,并对参加会见的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7月20日,毛泽东在商业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报纸上的文章太长,谁看?要改一下。”周恩来看到后说:“林彪就是搞这一套,批林整风要从整顿文风开始。”

这天,周培源致信周恩来,说“在北大传达周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切感谢党中央的关怀。”信里也反映了许多教师仍然存在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

7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20日来信事批告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第 1247 回：换内阁，日中邦交正常化 震动大，西德施罗德访华

为加强中日民间交流，1972 年年初，中国确定上海芭蕾舞团访日演出，中央决定由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担任上海芭蕾舞访日代表团团长。于是，正在“五七干校”的孙平化回到北京。一个星期后，7 月 4 日，他率领从朝鲜演出归来后正在北京休整的上海芭蕾舞团，从北京坐火车出发，经广州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去日本。就在这时，日本政局也发生了变化。

6 月 17 日，日本佐藤内阁下台。7 月 7 日，田中角荣就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上任当天就在讲话中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他还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明确表示：“要以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为急务”。

第二天，7 月 8 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及其它外事和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日本田中讲话。他说：“新华社昨天送来的关于日本新内阁组成的稿子写得太简单，既不写新内阁是怎么产生的，也没摘他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言论。我们对日本，过去只搞人民外交，不同官方往来。今后当然主要是搞人民外交，但同官方也要往来。形势变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不变。情况变了，我们要积极工作，在报道上就要反映出这一精神。”

当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谈话。

7 月 9 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宴会上讲话中提到：日本“田中内阁 7 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7 月 10 日，上海芭蕾舞访日代表团抵达日本，在羽田机场受到日本各界 2000 多人的欢迎。

7 月 16 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时说：

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华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

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田中政府采取这样向前看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恢复日中邦交并不要反对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反对美国或者苏联。

以中国为中心，我不同意。如果说中日两国友好来推动远东的和平，那还可以。但拿中国作中心，那恐怕不恰当，是错误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应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一句话，就是我们反对任何霸权，也不谋求霸权。

7月17日，以中国农林部副部长郝中士为团长的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抵达日本。周恩来委托随团访日的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陈抗，向正在日本的上海芭蕾舞访日代表团团长孙平化和7月3日晚刚刚抵达东京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新任驻日首席代表肖向前，转达“抓紧时机、多做工作”等重要指示。

陈抗一到东京，即来到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向孙平化和肖向前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为了保密，陈抗是通过当时日本小孩子用的简易文具板作的传达。他在文具板上写字，写完后一拉，字就消失了。这样既能防窃听又能防拍照。陈抗连写带说，一字一句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田中要加紧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我们表示欢迎。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毛主席讲，我们要采取积极态度。对方能来谈就好，谈得成谈不成都行。总之现在已经到了火候，这回不能只刮‘旋风’了，要落地。”

周恩来在这里说“旋风”，是指1971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王晓云，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日本广泛接触日本各界知名人士，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日中热”，被当时的日本媒体称之为刮“王旋风”。

同时，周恩来还拿孙平化、肖向前的名字打比方说，孙平化就是要“把荒地化为平地，盖万丈高楼，平地起高楼”，肖向前要“继续向前”

“永远向前进”，“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7月27日，周恩来接见受田中首相委托访华的日本公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并举行第一次会谈。

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报告同日本竹入义胜会谈情况。

会议通过《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及复交三原则：

(一)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二)联合声明公布后，日本政府将从台湾撤出其使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蒋介石集团的使领馆从日本撤走；

(三)对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在台湾解放时当予以适当照顾。

7月28日，毛泽东审阅《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

7月28日、29日，周恩来、郭沫若、廖承志等与竹入义胜继续举行会谈。

与此同时，中国与当时联邦德国的外交关系也出现了新的进展。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同样在联邦德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要求加快采取措施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呼声日高。

1971年年底，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向记者表示，他愿意到北京去同中国领导人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1972年1月，联邦德国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勃鲁纳在一个友人家里同中国新华社常驻波恩记者王殊会面时，建议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或别的地方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1972年1月底，王殊在罗马尼亚驻联邦德国的招待会上看到施罗德，问到他曾两次对记者表示愿到北京去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对此他有何具体想法？

施罗德想了一下，然后说，这里谈话不太方便，过些天他将打电话约王殊到他在议会的办公室去谈。

过了十几天，施罗德的秘书果然来电话，约王殊在2月21日下午到他的办公室去。

2月21日下午,王殊驻波恩新华分社的邢桂敏如约来到议会施罗德办公室。他们就欧洲和国际局势谈了两个小时,但始终没有涉及施罗德访华问题。王殊不免有些着急,便直截了当地问施罗德对访华的具体想法。施罗德表示愿在方便的时候前去访问。王殊问什么时间比较合适?施罗德表示听从中方的安排。王殊说,他将向国内有关方面报告后再来同他商谈。

王殊他们回到办公室后才知道,就在当天,施罗德的基民盟主席团已正式作出决议,要求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王殊他们立即将与施罗德见面的情况报告了中国外交部和新华社。

3月,王殊收到国内电报,通知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施罗德以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可以在1972年7月14日到28日访问中国两周。王殊立刻告知了施罗德,他很高兴,说完全同意中方提出的时间,具体安排客随主便。他当晚就对报界作了宣布,在国内外立刻引起了震动。很多报刊和人士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两国关系正在揭开新的篇章”。也有些报刊和人士冷言冷语地说施罗德“并不能代表政府”,甚至说他是“从即将到来的大选的考虑出发谋求政治好处”。许多记者打电话或写信给王殊和施罗德,要求陪同访问,国内原来准备接待10个记者,后来不得不增加到30人。

7月15日,西德代表团在施罗德率领下首次来到中国访问。第二天,施罗德在同中国外交学会会长乔冠华会谈。施罗德说:他来北京前曾同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讨论过两国建交的问题,他的印象是他们都欢迎建交。谢尔的设想是两国举行谈判就建交问题达成原则协议,他再应邀到北京正式签署协议。第三天,双方的会谈进入实质性商谈,施罗德说,他的想法是两国应尽快举行谈判,争取在当年11月内西德大选之前达成协议,到时像谢尔所设想的邀请他到北京签署建交公报。为此,他建议由他和乔冠华会长就建交问题达成内部谅解,以便他回国后报告政府。中方同意这个意见,经过简短商谈达成协议。双方在7月20日上午签了字。

20日下午和晚上,周恩来两次会见施罗德,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

就在施罗德离开波恩赴华后几天,新华社给波恩新华分社发来

急电，要王殊马上回北京。

7月21日晚，王殊回到北京。7月22日晚19时，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

7月24日晚上21时多，王殊乘公共汽车回新华社宿舍，刚下车，就被早已等候在汽车站的外交部几个人拉住，欢喜若狂地对他说：“真是好不容易找到你了！”

原来，外交部在晚上19时左右接到通知，要王殊务必在晚上21时到外交部大门口。大家赶紧来到新华社宿舍找王殊，但是家里及邻居那里都没有。于是他们就在宿舍区内一面找一面喊，过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结果，最后决定到公共汽车站上等，终于等到了。当王殊来到外交部大门口时已近22时，外交部翻译唐闻生已在那等他很久了。

上车后，王殊才知道，是毛主席要召见他。王殊心里那个激动呀，去除了电影、电视之外，他还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呢。当他忐忑不安、懵懵懂懂来到中南海，走进毛泽东书房时，看见老人家正坐在左边的大藤椅上，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海蓉谈话。

王殊激动的上前与毛泽东握手，周恩来介绍说：王殊过去在上海复旦大学上的学，学的是英文，长期在国外当驻外记者。毛泽东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啊。”

王殊顿时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后来，有人估计，毛泽东这句话可能是指他过去编《湘江评论》和在解放战争时期给新华社写过不少评论和消息。

接着，毛泽东赞扬了王殊对西德和欧洲的看法，对他说：“你很了不起，可以当大使。”王殊非常激动，眼泪夺眶而出。

为缓和王殊情绪，毛泽东请他抽支烟。

王殊接过烟仔细端详，那是一支特制的尼古丁含量极低的小雪茄烟，他觉得太珍贵了，舍不得抽，放在身边的小茶几上，准备召见后带回家留做纪念。

可没想到，坐在他身旁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顺手拿去抽了起来。屋内烟雾缭绕，香气扑鼻。王殊后悔极了，当初为什么不放在自己的衣兜里呢！

毛泽东说：“西方有些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些人在幻想祸水东移。”

“西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想推德国向东，不使它向西。现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都想推动苏联向东，推苏向华，西方无战事就好。”

他列举了中外史上一些声东击西的战例，接着说：“我讲过多次，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的。但现在要吃呢，要用文的，用武的难，过去可以，过去清朝、北洋军阀、蒋介石的时候都可以。”

“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不过我也不大相信会打，但准备打。”

“苏联原来搞威胁，威胁不灵，威胁不搞了，只搞演习。如果是真要打，就不搞演习。”

“如果打游击我们就要准备，黄河以北它占不了好多，大城市我们也不放弃，在洞子里头照样打。如果俄国人真打中国，它就失败了。横直我们是打游击，不损失主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能吃下的就吃一口，至于你要打我，横竖我就两条腿走路。”

“我的看法，苏联是声东击西，口里讲是整中国，实际上是向欧洲和地中海。有个英文刊物叫《新闻周刊》，有篇文章算了一笔账，说苏联是整欧洲的。它在欧洲那边包括在东欧驻扎的部队，有九十九个师，国内靠西边还有八十个师，对中国这边不过四十多个师。这种估计只当一种想法，你们外交部研究一下。我出点题目，究竟是声东击西，还是真正向东？准备它是要打。可以请一些人来，也可以派一些人出去，要搞些调查研究，情况弄得确实一些。”

“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双方的大军都摆在欧洲地区，争夺越来越激烈。西欧国家太多、太散、太软，受到美苏两霸争夺的威胁，要联合起来，维护和平与安全。”

“两个德国应该统一，搞两个干什么呢？无非是雅尔塔搞的。”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了施罗德访华的情况。毛泽东说：“可以请一些人来，右翼的也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们谈得还不错。欧洲矛盾很多，局势很复杂。没有什么明灯，全是胡扯的。可以请一些人来，也可以派一些人出去，要搞调查研究，

情况弄得确实一些。”

“我们外交部有条路线，中左路线，喜欢左派和中间派，就不喜欢右派。世界上就是右派当权，你怎么办呢？而我呢，都喜欢，特别喜欢右派，尼克松一类人，我就说服我周围的这些人。”

在谈到中国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那件事时，毛泽东说：

“那个文件，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他们那边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毛泽东还说：“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的吸收。”

谈到国内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次我们国内开了 300 多人的会，他们都没有注意我的那几句话：‘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什么叫‘跌了几跤之后’呢？包括开除党籍，开除出政治局，赶出红军三四次，等等。我总是每一次就声明，要么就听我的，我就干下去，就要怎么怎么。要不然，我就滚蛋。你们再需要我来呢，那我就再来吧。”

毛泽东说的“300 多人的会”，是指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除党籍是指 1928 年 3 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根据地传达 1927 年 11 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将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外国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 30 至 40 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也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避孕措施的问题，说：“关于避孕，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

毛泽东精神爽朗，洋洋洒洒纵论国内外大事 3 个多小时。王殊第一次这样近距离聆听毛泽东的讲话，一代伟人善纳反面意见的胸怀，

深深感动了他。

之后，周恩来又在小会客室和大家谈了很久。他把经毛泽东批准的《外交部关于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请示》给大家看，王殊看到周恩来在请示报告上写的“请主席考虑，如果有时间，接见王殊一次”，刚刚平静的心又一次翻起了波澜。

第 1248 回：说新疆，一份内参震天津 问“伍豪”，全军掀起退房潮

7月16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央转发新疆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关于贯彻在北京召开的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和《赛福鼎同志在两个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批语说：“新疆地处反修斗争前线，要百倍提高警惕，切实加强战备，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一切都应从这个大局出发。”

7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中共新疆军区党委电：“电话会议，除传达毛主席、党中央七一六批示和中央关于调整两个党委领导班子外，不要作过多解释，免生枝节。”

7月27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合下发《中发28号文件》，批转北京军区党委、66军党委、天津警备区党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整顿军队纪律，纠正不正之风分别逐级上报的3个报告。批示指出：

“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因而有一部分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闹名誉，闹地位、贪图享受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占用学校、医院和工矿企业的房屋，无偿占有地方的车辆和物资等情况，不仅天津一地有，全国许多地方也有；各级地方和部队党委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克服。”

毛泽东在报告的批示中特别提到：“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到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天津驻军66军党委和天津警备区党委报告的起因是新华社天津分社写的四篇内参：一、《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

系》；二、天津驻军领导人对此事的自我批评；三、天津驻军退还民房的情况；四、退房后天津军民关系得到改善。

其中第一篇内参《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是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杨继绳写的。5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后，他到天津南开大学，想了解那里的学生走后门的情况。接待他的南开大学负责招生工作的一位负责人很干脆地回答说：“没有这回事！”

杨继绳要求查招生资料，校方搬来了。他仔细翻了一遍，每一份材料上都手续齐全。哲学系60多名新生，尽管一半以上是干部子弟，但也没有找到“走后门”的痕迹。调查失败了，他怏怏地离开了南开大学。在回分社的路上，看到一座原地方机关的门前有军人站岗，他马上联想到文革“支左”部队占用地方住房的情况，不觉眼前一亮，觉得自己在大学招生走后门的问题上抓不着，军队占用地方房子的事情总是滑不掉的吧！于是第二天，他在分社经济组研究报道题目时，主动报了军队占用民房这个题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随后，他即到天津公用局开座谈会，了解了部队干部占用民房的情况。又调查了民园和体育馆两个房管所，了解了更多的情况。接着，他又去了市卫生局，卫生局的张玉昆向他介绍了天津第二工人疗养院被北京军区后勤部八分部占用、第一工人疗养院郑州道分院被天津警备区占用、河西区尖山一所大医院被天津警备司令部全部占用的情况。随后他又调查了天津师范学院八里台校区被天津驻军66军军部占用的情况，据此写出稿子，打印后交分社负责人任丰平签发，于6月29日，电传发给新华社总社，题目是：《天津驻军及部分负责同志占用民房过多严重影响军民关系》。这份内参写道：

“天津一些驻军的负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占用了一批被查抄的爱国知名人士的私人住宅。这些住宅都是高墙、深院的小洋楼，设施讲究，环境幽静，在天津很引人注目。天津驻军有些师以上干部、一些区局的支左干部，大部分住的是独楼、独院、小别墅。”

“著名瘤科专家、市政协委员金显宅，私房一所十五间，被天津警备区委（市委书记）占用，现在金显宅全家只住一小间。妇科专家、市政协委员林崧，私房一所十三间，被天津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占

用。原天津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内科专家杨济时,私房一所十三间,被警备区副司令员占用,现在杨一家三口占一间地下室。河北省军区副参谋长、天津市革委会财贸组组长,占用了市政协委员乐肇基私房一所十间。”

“有的团级干部也通过各种手段占用小洋楼。某部团政治处主任,原来住房一间,文化大革命中换成六间,后来又换成九间三层小洋楼一所。他还把另外一个军人(已调走)占用过的房子私自分配给自己的熟人,房管站出来制止,他坐着小汽车去把女房管员骂了一顿。”

“现在天津睦南道、大理道、重庆道、常德道一带比较好的小洋楼,几乎大部分被部队占有。有的军队负责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搬迁,每迁一次,房屋都大修一次。如睦南道一四八号市政协委员张重威三层八间小洋楼一所,张迁出后,大修一次,六十六军军长迁进;一年后,又大修一次,六十六军副军长搬进;又过一年,又大修一次,警备区副政委搬进。每修一次耗费几千元。而群众住房很难得到修缮机会。”

“天津驻军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扩大了机关办公用房,搞办事处,设招待所,占用了一大批房屋。六十六军三个师占用了相当五个师的营房。部队占用地方房产后就转为‘军用户’,以后地方就永远没有使用权了。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转为‘军用户’的建筑面积就达三十万平方米。群众最有意见的是:一些部队占用医院和学校,致使一些病人不能住院,一些学生不能上学。”

“天津一些驻军单位还用了规模较大的医院、疗养院五所,改为办公楼、家属宿舍、部队医院。天津市第二工人疗养院,是过去用工会会费修建的,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病床七百张,是全市工人唯一的结核病疗养院。现被后勤八分部改做办公室和宿舍,致使有些肺结核病人无法疗养。原河北省在天津的省医院是一个设备较好的大型医院,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病床五百多张,文化大革命中被天津警备区作为司令部办公楼占用,而把警备区旧址作为自己的招待所,天津市医院病房床位是很紧张的,不少需住院的病人无法住院治疗。在病床这样紧张的状况下,部队又占用了一些医院,引起群众强烈的不满。近四万平米的东风大学(原天津师范学院)被六十六军占用作为军部。学生无处上课。(天津分社)”

这篇内参稿件随即刊载于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上。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让新华总社将此稿加印若干份送到人民大会堂。

7月9日晚，北京军区党委派工作组到天津。

7月10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第一政委纪登奎、政委陈先瑞先后找天津警备区和66军的领导谈话，传达了中央领导指示。

66军、天津警备区等部队立即召开党委会，态度坚决，表示：“就是住帐篷也要退房！”

很快，新华社总社通知天津分社前往天津驻军66军听取刘政军长的自我批评，并写成内参。杨继绳和分社负责军队报道工作的马杰来到66军。刘政军长站在军部传达室门前迎接他们，一见面，就向他们立正，敬礼，说他已恭候多时。

7月12日，66军党委和天津警备区党委分别作出关于占用地方房舍、车辆的检查、处理报告。

66军党委的《报告》称：

“近几年来，我军先后占用地方房产六处，共50,367.3平方米。其中，占天津师范学院院址一处，36,260平方米；天津市农业技术中学校址一处，7,124.4平方米；天津市一轻局幼儿园一处，2,349平方米；桂林里七号小楼一幢，408平方米；常德道七十二号平房一处，225.9平方米；一九八师占用天津市唐家口新村新建宿舍楼两幢，4千平方米。”

有的支左人员利用职权之便，不经正当手续，占用了地方的一些房屋。

占用地方小汽车六辆。其中，伏尔加一辆，华沙二辆，小六九一辆，天津吉普一辆，罗马一辆。”

《报告》表示：

“占用地方的房舍，除一轻局幼儿园的房舍缓退外，其余全部于八月一日前，打扫干净，退还地方。在师范学院增建的地面上的4,894.1平方米房舍、固定设备和两个地下指挥所及其固定设备一律全部移交地方。

前已移交地方的11,615平方米军产房，除原军部营房新华路二

十八号 9,215 平方米已报请天津市委还回外,其余 2,404 平方米仍归地方使用。

军司令部、政治部和部分直属分队搬回原军部营房(新华路二十八号),军后勤部、部分直属分队和部分机关干部宿舍,搬至海光寺大街一号(此处原为解放军二五九医院,后改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房产也随之移交。一九七〇年该所大部分内迁四川,部分扩建为我军一〇六野战医院,房产随之移交),军工兵营移至汉沽营房。”

“占用地方的六辆汽车经检修后,于八月一日前交还地方。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按地方规定乘坐汽车,一律使用地方车牌。”

“对支左人员个人占用的地方房屋,协同地方于八月一日前进行一次彻底清查,然后分别情况具体处理,该并者并,该退者退。凡利用职权之便占用的房屋,或占居的查抄、压缩的私产房屋,一律退回。”

天津警备区党委的《报告》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利用支左的方便和人民群众对军队的信任,在警备区机关扩大和独立师换防的情况下,占用了地方的不少房屋和车辆。如警备区六位领导同志和其他单位的三位同志,占用了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和资本家自有的九个小楼;警备区机关占用了原河北省医院;独立师二团团部和一个营,占用了天津市滑翔学校等,共占用应退还地方房屋 26 处,计 61,762 平方米。同时,还占用地方小汽车九辆、中型轿车两辆。”

“我们决心在七月底前将占用的九所属于私产的宿舍、原河北省医院、市滑翔学校,全部交给地方。其它不应占用的住房,也要陆续交出,占用地方的车辆,一律于七月底以前退还地方。”

“同时对所属机关、部队的住房情况,进行一次彻底普查,凡是不该占用的地方房屋一律交出,住房过多的坚决压缩。”

“为了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在党委领导下,由党委书记许诚同志挂帅,朱彪同志和司、政、后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组成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具体的落实工作。”

关于把全民所有制的泡沫塑料厂改变为我单位所有的问题,已有专题检查报告,目前正在移交中。

处理结果,容后再报。”

7月15日,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提交《报告》:

“送上六十六军党委、天津警备区党委的检查报告两件。军区党委同意他们的检查和处理意见。”

《报告》检查了北京军区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全区共占用学校161所,医院13所,工矿房舍111处,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房舍369处,共239万平方米。”“通过各种关系接收了地方一些厂矿和农、牧场,一不上交利润,二不纳税,变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为部队某个小单位所有。”“长期使用和占用了地方一些车辆和物资。”“有的人利用职权,违法乱纪,走后门,抢购、套购物资,有的还用来投机倒把、从中渔利。”

北京军区表示对这些问题要坚决予以纠正。

7月19日,66军军部从天津师范学院,当时叫“东风大学”,搬回新华路28号原66军军部所在地,即原国民党陈长捷的警备司令部。66军从1951年朝鲜回国后,直至1985年番号撤销,军部一直都在这里。

之后,新华社天津分社的马杰先后又写出三篇内参,即:天津驻军领导人对占用民房的自我批评;天津驻军退还民房的情况;退房后天津军民关系得到改善。于是有了中共中央28号文件。

中央28号文件下达后,全军退出了大量在“支左”中占用的民房。军队退房也带动了地方。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提出:“军队带了头,地方怎么办?”他要求政府部门也退出占用的房子。

7月30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上海京剧团演员、现代京剧《龙江颂》女主角的扮演者李炳淑,对几部现代京剧样板戏作了评价。他说:

《龙江颂》这个戏不错,我看过四次电视,一次电影。五亿农民有戏看了,你回去告诉他们,说我感谢他们为五亿多农民创作了一出好戏。现在结尾不好。《海港》太平,矛盾不突出,玻璃纤维吃了能有生命危险,人们都不知道,那个女演员太过分了。《红灯记》我原想一家三口都不要死,看了太悲,可那个时候的情况确实如此。日本人、国民党对我们的残杀是很厉害的,都改掉可能不行。《沙家浜》里阿庆嫂比

较好，也讲斗争，但未死人，一般人爱看。《智取威虎山》没有戏，只有一场“打虎上山”有戏，还是学的“林冲夜奔”，其实都是过场戏，特别是“定计”就是过场戏，大段唱腔搞得那么长。杨子荣上山孤军作战，八大金刚一个金刚也没有分化过来，杨子荣孤立得很。后来栾平跑上山，差点把他搞掉，为什么“定计”那一场不让少剑波审他而让杨子荣审他，结果又跑上山，人为地紧张。我看能够流行的还是《龙江颂》、《沙家浜》。

毛泽东又说：

现在剧太少，只有几个京剧，话剧也没有，歌剧也没有。以前说人家演样板戏是反样板戏，我说不要那么讲嘛，要允许人家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只要脸上不抹白鼻梁就行了。样板戏能有几个人看，大家都演了，看的人就多了。《龙江颂》拍成电影就好了，广大农民就可看到了。

8月1日，周恩来对外交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有关人员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后来又针对一些单位的情况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8月2日，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时又说：“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

8月3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约周荣鑫和他的女儿周少华谈话，询问1967年南开大学“卫东战斗队”发现《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以及抄件送戚本禹的情况，并要周少华就此事经过情况写了一个材料，即《汇报我和张国忠通过戚本禹向中央报告国民党反动派捏造总理黑材料的经过》。

而南开大学化学系学生、“卫东”红卫兵二把手张国忠已在隔离审查期间，割断肠子自杀而死。

第 1249 回：邓小平，长信再致毛泽东 维特克，要求采访见江青

1972 年“五一”节前夕，与邓小平一起住在江西南昌的邓朴方获准去北京看病，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哥哥邓朴方一同前往。

他们到了北京，王震托人找到毛毛，要她上他家去一趟。

毛毛来到王震家。王震向毛毛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近况后，对她说：

“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你父亲出来工作。”

回到南昌，毛毛把“胡子叔叔”王震的话，转告了父亲。于是，8月3日，邓小平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永不翻案。他在信中写到：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

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信中对陈伯达也做了一些揭发和批判后，接着写道：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邓小平在作了“永不翻案”的保证后，又继续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他说：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〇、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信的最后以“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结束。

这封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于8月5日转给了毛泽东。

8月8日,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社几位负责人谈话,要他们注意:“批极左思潮不要过头”。

针对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由于内部意见不统一出现的一些问题,8月9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听取四川省和成都军区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等人的工作汇报,做了工作。

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致信毛泽东、周恩来,反映被关押的父亲的病情,请求尽快将其父放出治疗。8月11日,毛泽东在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当晚,周恩来约有关人员谈专案问题。

1972年7月20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首都机场迎接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国女历史学家,年方34岁,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历史系的副教授,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尤其是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

1967年,她曾经就毛泽东的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叫做《毛泽东、妇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自杀现象》(Mao Tse-tung, Women and Suicide in the May Fourth Era),发表在《中国季刊》上。露克珊·维

特克还与 Robert Riden 合作著有《红旗飘飘：“红旗飘飘”文集指南》(The Red Flag Waves: A Guide to the Hung - chi piao piao Collection)，于 1968 年在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

1971 年深秋，维特克例行到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中国研讨会，住在罗斯福饭店。恰巧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也临时住在这里。维特克没有让机会从身边溜走，立即前去拜访，一位中国官员接待了她。他们用汉语、法语和英语彬彬有礼的交谈，谈到中国外交的转变，交换留学生的可能性以及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观念和思想相互交流的可能性问题。最后，维特克带着那位中国官员“下次再来”的邀请离开了。

几个星期后，维特克因为另一学术活动回到纽约，此时中国代表团已经住进位于西区第 66 街的饭店。维特克决定再次拜访他们。这次却不是那么容易了，她前前后后打了大概 20 个电话。其中有一个还被误接到台湾驻联合国的办公室，电话里传来一个狂怒的男人声音，咆哮着说：“共匪不住这里！”

最后，她终于接通了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黄华的夫人何理良。当天下午，维特克前去拜访何理良，她们的谈话在汉语和法语之间变换（当时法语是她的主要外交语言），当时担任代表团二等秘书的高粱也参加了谈话。高粱身形魁梧，精力充沛，兴致也很高，他只说汉语。

中国代表团已经知道维特克正准备出版一本主题为“现代中国的女权运动”的书，她的研究方向使她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前辈的革命经历很熟悉，而且她也是美国翻译中国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文摘的合著者之一。

维特克在谈话中提到她在 1967 年秋曾读了很多关于江青的报道，她对这位毛泽东的夫人很感兴趣。一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毛夫人，忽然成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维特克禁不住想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来进行一项几乎不能的计划：记述江青的故事。但是，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界对她的个人经历，几乎很难看到，使得那些中国观察家们不得不进行臆测。

维特克觉得：“在纷纭众声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绅士宣称了解这位复出的旧日明星，说她当初只是一个貌不惊人、也未曾引起

轰动的演员,但却以脾气乖戾、性格孤僻而闻名。与此相应的还有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桃色新闻,似乎在她走上政坛的路上,满是电影明星的罗曼史和一颗破碎的心。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及其价值都很令人怀疑。如果所有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是位大权在握的男人,情况又会如何?”

当维特克向何理良他们谈到江青在国外的这些反映时,引起何理良他们的注意并感到愤怒。何理良说,江青是一个革命家,为什么总是要纠缠她的过去?“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

何理良对维特克说:“你只有亲眼到这个国家看看,同人民群众直接对话,才能避免以国外图书馆里一些错误的,或是不令人满意的文献为基础进行‘学术性’写作的缺陷。”她问维特克,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维特克给北京写一封信,说维特克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

几个星期后,高粱给维特克打来电话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已经邀请她在1972年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她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将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

1972年7月19日早上,维特克坐火车穿过九龙半岛到达深圳。由于天气的原因,第二天早上,她才乘飞机到达北京。

在下榻北京饭店不久,维特克被要求起草一份他的旅行路线计划,以及一份她想采访人员的名单。在维特克的采访对象中,包括邓颖超、康克清、江青。

在以后的三周时间里,维特克游览了北京,参观了西安,然后去了延安。每到一地,翻译都安排维特克和不同年龄的男女见面,维特克认为,“他们一成不变的政治性发言是令人苦恼的”,“绝大多数关于过去的旧社会和现在的新时代、罪恶的刘少奇和非凡的毛的汇报都极其简单,使我不得不告诉要对我的工作成绩负责的几位同伴,如果他们期望外国读者会读我的有关中国妇女的描述,那么我们的中心应该转移。不应该完全谈这些人民群众中的‘典型成员’,他们已经变得很普通因而外国人对他们没有兴趣,如果我见一些不平常的人,当然他们的姓名起码要为国外所知,展现出他们是是怎样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的,这样不是更好吗?”

维特克的建议被采纳了。8月1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和中国红军之父朱德的从戎夫人康克清会见了她。邓颖超在那天上午,回忆了过去50年里的一些斗争历程,让维特克脑子里充满了过去那些激动人心的事情。

维特克提出采访江青的报告也呈送到周恩来那里。8月10日,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

正准备去外地休养的江青看到了周恩来的批示,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即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一起会见维特克女士。

8月12日下午,刚刚采访完邓颖超和康克清的维特克有些头昏脑胀。回到北京饭店后,她第一次睡了一个中国式的午觉,却被中方的陪同人员于世莲唤醒。她有些迷惑,因为每天这个时候通常都是中方人员打瞌睡的时间。

于世莲压低声音对她说:“今天下午一些年轻同志们可能会到你房间来拜访你。”

“谁?”维特克问。

“我也不知道。”于世莲答,“你最好收拾一下,我会准备一些好茶叶和干净的杯子。”她嘱咐维特克。

维特克赶紧收拾好整理桌子上的纸和书,这时候,茶杯的托盘、矿泉水和一盘堆着象金字塔的新鲜水果送了进来。于世莲又回来了,眼里闪烁着激动和兴奋:“她们已经在路上了。看起来似乎她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

15时整,维特克看到“两名具有严肃的革命风格、极具吸引力的年轻女性,站在了我的门前。徐尔维和沈若芸同我握手之后,带着高层党务工作者的诚恳作了自我介绍。我用汉语向她们问好,她们用标准的英语作了回答,带着上层英国人的口音。”

那是标准的牛津口音。

“江青同志想让你了解她的政治思想，她指示我们把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4次讲话读给你听。”

“为什么这么急？”维特克觉得很奇怪。

“我们对此也不知道。”她们微笑着回答，然后开始工作。

在随后的两个半小时里，她们用英语读着江青1966年在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期间仅仅因为喝水而中断了一次。在听这些辞藻华丽的或重复的篇章时，维特克时而将笔停下，她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人一起就会盯着她，直到她重新写下去为止。

“为什么不让我自己看这些原文呢？”

“因为江青同志指示我们读给你听。”

维特克后来说，她们给她念的是最原始的印刷版本，里面还战友般地提及到林彪和陈伯达，而此时，他们已是革命的敌人。

她们就这样读着，维特克不停地记着，一直到于世莲向徐尔维和沈若芸示意，已经17时30分了，她们才迅速收拾起她们的黑色塑料包和江青的讲话稿，匆忙和维特克告别。

于世莲告诉维特克：“最好洗一洗，收拾干净。”

但是维特克觉得，她和缔造新中国这个特别的社会秩序的女性们在一起谈了一个上午，然后又在热浪中写了一个下午，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她告诉于世莲，她只想晚上一个人静静地吃一顿晚餐，写下自己的一些想法之后，早点睡觉，好好休息一下。

“你不能那样，”于世莲坚决地回答道。

“为什么？”维特克不解的问。

“因为今天晚上江青同志有可能会有时间会见你，所以动作快点吧！”

一会儿，于世莲的这个“有可能”变成了“很可能”，接着变成了“肯定”。

“20分钟后出发！”于世莲匆匆对维特克说。

维特克赶紧脱掉从早上5时就一直穿在身上，已经被汗水浸透了的衬衫和裤子，冲进浴室洗了个凉水浴，吃了双份剂量的头痛药后，穿上于世莲为她选中的一套黑色连衣裙。

第 1250 回：忆往事，两位女人侃侃谈 说戏剧，共同观看《红灯记》

8月12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参加江青会见维特克的外交部相关人员都已到达接见厅。主管礼宾司的王海容也来了。按常规她是可以不来的，但这次是江青接见，她很重视，不敢出漏子。

一会儿，王海容急匆匆跑进来对大家说：“来了，来了。”很快，在人们的簇拥下，江青和姚文元走进会见厅。王海容把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拉到江青面前说：

“今天外交部由她来陪见，首长认识她吗？”

江青一见，大声说道：“原来是你呀，小鬼，去年范文同来访问的时候，我还见到你。是啊，嫁鸡随鸡，你就去了外交部。”然后挥了挥手，哈哈大笑起来。

张颖与江青在延安时都在鲁迅艺术学院，彼此认识。

王海容见江青还记得张颖，就先出去忙外边的事了。江青又对大家介绍说：“姚文元同志你们大家都熟悉吧？他是当今最杰出的理论家、批评家。”

大家坐下后，张颖站起来，把对外友协负责人丁雪松请到江青面前介绍说：“她是对外友协负责人，维特克来访是友协接待的，是否请她汇报一下情况？”

江青挥挥手说：“你们写的情况，我全看过了，不用再说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请客人来吧。”

维特克的车慢慢靠近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当她登上大会堂台阶的时候，新华社的摄影师一下聚到跟前，不停地拍照，电视摄影机也跑前跑后。走进大会堂，维特克不停地向周围的人点头致意，互相介绍姓名，其中包括王海容。

来到江苏厅。“江青同志准备好了！”有人通报说。

门开了，维特克看见江青昂首阔步向她走来，微笑着向她伸出手。

维特克也赶紧伸过手去，她们相互握手，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持续了约两分钟。

“你比我想像的要年轻。”江青说。

“我实际要比看起来老。”维特克回答道。

江青笑了，说：“我是越来越大了，马上就要 60 岁了。”

维特克忍着没有说出来，她觉得江青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在场的记者，咔嚓、咔嚓按快门，一阵耀眼的闪光灯过去了。江青将她旁边的姚文元介绍给维特克。随后将她们领进接待室。



江青毫不掩饰地仔细观察了维特克的脸、头发、衣着和高跟凉鞋。维特克也同样很好奇的观察着江青。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的塑料边框的眼镜，珍珠灰的裤子配着一件相衬的束腰外套，里面是白色丝质衬衫。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虽然她的凉鞋是与众不同的白色。维特克还注意到，江青“还带着一个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她的装束的风格、裁剪和质量都和邓颖超的差不多，衣服的边角不是很精致。维特克想：“难道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风格的体现吗？”

她们先是用普通话开始了漫谈，彼此对对方的文化作一些恭维的评论后，便进入了彼此希望的谈话主题。由于维特克的汉语水平有

限,以后的谈话都通过译员翻译成了英语。担任翻译的就是下午给维特克念文件的沈若芸和徐尔维。

这次谈话被维特克称之为“是我在华国期间进行的最为活泼的谈话,谈的内容都是预想不到的,我告诉江青我已经完全忘了记笔记。她向我保证,所有的谈话内容都已经被录音,速记员也做了记录,在其他领导同志批准之后,会将谈话内容文稿的中文和英文版本交给我。”

“装在有盖子的青瓷色杯子里的茶送了上来,散发着芬芳的气味,茶杯是以宋代的模型制造的。除了江青的茶杯把上系着一根红色的细线,以及她身旁桌子上放着一个用毛巾裹着一个电控呼叫按钮外,她享受的服务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谈话迅速、愉快地进行着。江青好像回到数十年前一样,非常亲热地对维特克说:

“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鹤是一种轻盈美丽的鸟,两条腿很美。我小的时候,两条腿也是细长细长的,所以我父亲给我起名叫云鹤,鹤立鸡群嘛。就是出众呀。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天上有彩云,仙鹤在空中轻盈地飞翔,多么美丽,多么富有诗意,真是美极了。”江青边说边加有一点演员的表演味道。

“后来为什么要改名字呢?那时我到了上海,找职业。组织上让我去电影厂,有一个导演给我取名蓝平,别人写错了字,才变成蓝萍。哈哈,蓝色的苹果,有新意。我用这个名字当演员,在舞台上也在银幕中……”江青微微仰头,像是回忆什么……

“我是有艺术经验的。我很下功夫,背台词可不容易了。如果没有经验,我能把样板戏排得那么好吗?”“唔,对了,今晚我要陪你去看样板戏《红灯记》,我们要到剧场去看。在剧场你会看到观众的情绪,……”

姚文元坐在近旁,显得沉稳,这时他插话:“江青同志既是艺术家,又是政治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样板戏都是她亲自创作出来的,她的贡献很大,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江青又挥了挥手,接着说下去:“后来我要革命,要到延安去,我自己取了这个名字。大海浩瀚,江水滚滚东流去,多么有气魄。江水也是蓝色的,清清的江水,多么迷人,多么有诗意。哎,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呀,所以叫江青。哈哈哈哈哈。我最喜欢蓝色,以前我最喜欢穿蓝色的衣服,从月白到藏青,我都爱穿,蓝布旗袍,既朴素又大方……有意思吧,是不是?”

维特克:“非常有趣,我相信这是所有美国人都不知道而又非常愿意知道的。你真是当代中国一位了不起的妇女!”

江青:“不应该简单说妇女,我不做妇女工作。”

“我还有一个名字叫李进。你读过毛主席的一首很著名的诗词吗?我给你背一背:‘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首诗词是毛主席赠给李进的,李进就是我。”

江青继续说道,“喏,今晚我请你在这里吃饭,说是宴会也可以,你是我的客人呀。这里是江苏厅。”这时她站起身来,拉着维特克的手,很热情地带着维特克观赏江苏厅,“你看这周围装饰着江苏省的手工艺品,苏绣是世界闻名的。你看这围屏绣得多美,孔雀开屏。这是缂丝,是一种特殊的丝织艺术品,全世界都没有的啊。这里的厨师是特别从苏州请来的,他能做全国各地的名菜。今晚我还请你吃北京烤鸭,比全聚德的要好吃多了。”

维特克说:“那是我的最爱。”

江青大笑着说:“我知道”

江青拉着维特克的手,绕江苏厅走了一圈,边走边讲解,兴致很高。

晚宴上,江青对维特克说:“今天的菜谱是我亲自定的。我知道,你们美国人不讲究吃,尽吃牛排,是不是?我尊重别国人的习惯。但是中国菜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很有科学性的,营养价值更甭提了。我们还讲究食物治疗。喏,这个炸子鸡,绝对不能用冷冻的,完全新鲜。它的重量不超过一斤,否则太老。喏,这个鱼,我最爱吃活鲫鱼了,全是刚从河里抓来的,每条只有半斤多。还有这个烤鸭呀,不油腻,不能用太肥的鸭子,并且把油都去掉了,胆固醇对你还没有太大的威胁。”

维特克吃得很有滋味,她赞叹道:“江青夫人,你真是了不起,你对中国什么都懂。这几个小时,你教会我很多东西。”

江青说：“总理建议我应该接见哪些外国客人。当斯诺和他的夫人1970年9月来北京访问的时候，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安排接待工作。通知我参加接待的时候，我正在休息。因为没有任何提前的通知，我一时不知道应该送给尊贵的客人一份什么样的合适礼物。而在斯诺夫人这一边，她也被弄得有些混乱，结果意外地把本来准备送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礼物送给了我！”

“你见过斯诺夫妇吗？”江青问维特克。

维特克没有见过他们，但是她和斯诺的前妻奈·威尔士有联系，因为她曾经在三十年代末期采访过中国的女性革命领导人，与维特克的研究有关。

“他现在的妻子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如果你见到她，请转达我对她和她的家人的问候以及欢迎她再次来访。你成为我的朋友后，你也可以经常来看看我们。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接待你。”江青说。

提到将来和死亡的时候，江青的情绪变得严肃起来。她望着桌上的其他人说：“辩证唯物主义者能理解人生老病死的规律。保持人政治上的年轻是可能的，但是永远保持身体健康却很困难。现在我承认我老了。”

姚文元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这几句诗写得非常好。”姚文元感叹道。

“这首诗的其他几句也很不错，”江青继续念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后面还有四句，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江青长期为病魔所累，已经把疾病和个人的敌人当作身体和政治上生存意志面对的两个并行的挑战。她的筷子飞快地掠过几道新上的菜，同时说道：“最近我一直在休息。但是因为你，我今天就过来了。近来我身体比较差，睡眠也不太好。我需要药物治疗和休息，也需要体育活动。”

“你一般都做什么运动？”维特克问道。

“游泳、骑马、慢走，还有整理花园，”她一边回答，一边把手伸进口袋拿出来一把气味浓烈的茉莉花，放到维特克手里。维特克的脸上充

满了惊讶和高兴。

“我还种一些中草药，”江青继续说：“我自己种茉莉花，还种各种各样的蔬菜。除此之外，我还种了一小块棉花。所有这些都帮助我精神上和身体上得到放松。”

江青话锋一转，又说到样板戏：“今晚我们去看的《红灯记》，是由我改编和导演的，连服装都得我亲自设计。他们不懂，他们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呀。那个导演顽固得很，简直是破坏，他就是不采纳我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哼，原来他是个叛徒，现行反革命。小张，你应该认识他的，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小张”是延安时期江青他们对张颖的称谓，早已多年没人叫了。此时外交部的人都已经叫张颖是“老张”了。所以，一声“小张”，张颖没有马上反应过来。江青本能的向她这里看了一眼，张颖这才猛然醒悟，赶紧答道：

“他原名叫符律衡，原来是杭州美院学美术的吧，到延安后才改名阿甲。”

张颖和阿甲是老同学，《红灯记》原是阿甲编导的。

江青又谈到美国电影《飘》：“这个女作家了不起，从小说到电影都是第一流的。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吗？唔，我看大概有 10 遍了，每看一遍都很感动。”

姚文元轻轻地说：“从历史观点来看，内容是有缺点的，她同情奴隶主。”

江青：“电影可没有那么明显。”

吃完饭，江青站起来向大家说：“现在我们该去剧院了。”

车队从人民大会堂出发，经长安街、西单过西四。此时马路两旁灯光微弱，行人稀少。车队进入护国寺人民剧场。门外入场口，并无往常那种喧嚣之声，仅在剧场院内有个别的警卫人员。

剧场内灯光已经暗了下来，演出即将开始。只见旁门一开，全场灯光大亮，江青带领这一群人走了进来。楼上楼下所有的观众都起立鼓掌欢迎。江青依然是昂首阔步，向大家鼓掌致意，走向座位，然后回过头来向楼上楼下的观众颔首微笑，举手鼓掌表示感谢。

观众看见江青身边还有一个外国人，更是一片哗然，欢呼大叫。

戏剧结束后，江青把维特克引到剧场的一个会客室，她们又坐到一个大沙发上。关上门，散场观众的喧闹声都听不到了。江青专注地看着维特克说道：“我希望你走埃德加·斯诺的路，走斯诺夫人的路。”

“一个令人敬畏的榜样！”维特克回答道，颇有些诚惶诚恐。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把你洗脑了，”江青笑道：“你害怕吗？”

“不，我不怕。这种洗脑是不可能的。”

“毕竟，”江青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也来过这里。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松总

统和夫人，为什么我不能陪同你呢？你都可以竞选总统！”

江青转到了更加严肃的问题，她说：“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您谈的都可以发表吗？”维特克问。

“你可以发表。但是你必须认识到我不是把你当成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好朋友。首先我还得请总理检查这次会谈的文字稿。我今晚告诉你的都是事实。很显然，我们走的是一条曲折困难的道路。即使我现在都快 60 了，我仍然有决心保持政治上的青春。”

江青又解释了“政治上的青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含义。

“这次没有时间了。下次你来中国的时候我们再谈。同时我会送给你一些纪念品。虽然我是一名技术不怎样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我会送给你一些我拍的作品留作纪念，也许这是‘班门弄斧’。我现在身上没带好的作品。我曾经拍过女民兵的照片，但某些人拿走了些好的。我回中南海的家里要好好找一找。”

.....

江青和维特克握别时又说，她会找机会，再约见维特克，还可以详谈。

8月13日，在《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江青、姚文元同志会见美国女作家维特克。”消息说：“参加会见的有对外友协秘书长丁雪松，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以及单达坼、陈明仙、沈若芸、徐尔维、于世莲等同志。”

维特克在这次与江青的突然会见后，没有指望再见到江青。但江青咄咄逼人、机智善变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维特克感

到,江青虽然只是四亿中国女性中的一位,然而她独特的阅历将会为理解中国革命中的妇女和政治权力面临的最基本的困境提供线索。

第二天上午,维特克继续同邓颖超和其他妇女领导人讨论,她们的谈话连续进行了4个上午。每天下午,在她和邓颖超谈话之后,徐尔维和沈若芸两位使者就会来到她的房间,继续为她念江青的讲话。此外,她们还带来一些江青和毛泽东四十年代在延安的未发表的照片,一些江青人拍的彩色艺术照。其中,有一张是庐山的汉阳峰。在这张题为“庐山汉阳峰”的照片背面,江青用红色铅笔写了诗:

“庐山汉阳峰: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江青摄,诗赠维特克夫人,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

8月13日上午,即江青与维特克见面后的第二天,外交部张颖到乔冠华那里,将陪同江青与维特克会见的情况向他做了简要汇报。乔冠华听完后,嘱咐道:“江青要说说什么要干什么谁也管不了。你听了就算了。”

张颖又说:“江青说她还要见维特克,还要整理记录,这些是否都交给友协办呢?”

乔冠华愣了一下,想了会儿说:“再说吧。”

第 1251 回：归专案，周恩来见林立衡 赴广州，调总参测绘局长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和她的男友张清林从北戴河转移到北京玉泉山后，开始接受专案组审查，专案组的负责人是谢静宜。

1971 年 11 月，遵照上级指示，中央警卫局李钊副局长把林立衡、张清林护送到北京卫戍区警卫 1 师师部驻地。

林立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跟毛主席谈话”。毛泽东把信批给了周恩来。

1972 年 8 月，周恩来约林立衡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林立衡走进大会堂谈话的房间，发现屋里坐满了人。除周恩来外，屋里还有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张才千、田维新、杨德中以及谢静宜等。

周恩来一见林立衡进来，就对她说：“你一个小孩子家，胡写了些什么？我都看不懂。”

接着，周恩来说：“你要找毛主席谈，毛主席让我找你谈。我拖了八个月。不过，现在看来，晚点儿也好。”

“你也是有错误的嘛。空军给林立果搞了个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两个一切’，不也给你搞了个‘五条’吗？说什么事要向你请示，处处要向你学习！”

林立衡说：“他们搞那个‘五条’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一知道，连夜搞了个针对‘五条’的新五条，都是反那个五条的。”

周恩来问到会的其他人：“是不是有这回事？”

有人回答说：“有。”

周恩来说：“那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嘛。”

李德生说：“毛主席同意让林豆豆回空军参加运动，接受再教育。”同时宣布空军报社由于执行了林彪路线，停刊两年检查。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站起来跟林立衡握手，其他人也站起来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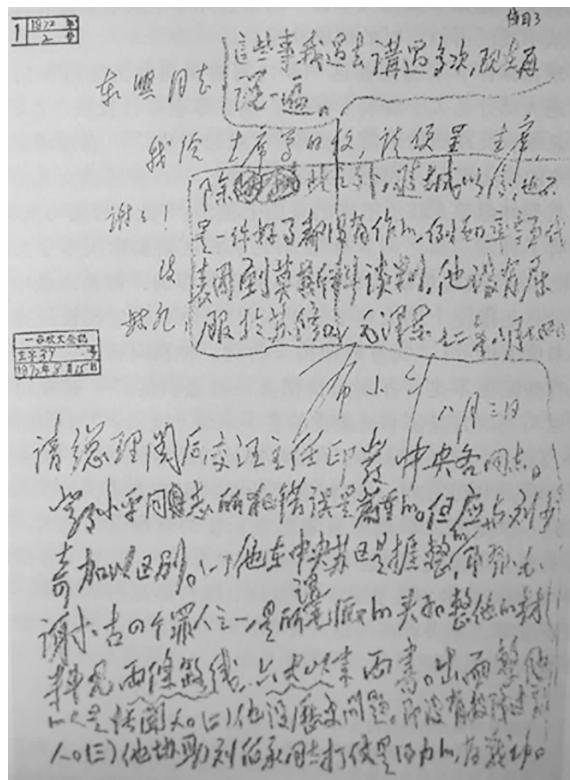
握手。林立衡觉得在这次谈话时，纪登奎和谢静宜的态度“特别凶”，所以没跟纪登奎握手，转身要走。这一细节，被周恩来发现了，他十分严肃地说：“还有一个呢！”

林立衡转回身来，跟纪登奎握了下手，走了。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8月3日的来信做出批语说：“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提及的“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由于支持毛泽东，在1933年4月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路线执行者们的批判。

8月15日，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语和邓小平的信派人送往印刷厂排印。并于当天，批告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他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批语。会后，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邓小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可以作一些调查活动。此后，邓小平即到江西瑞金、湖南韶山冲等参观访问、调查研究。



正在广州的江青也收到毛泽东8月14日对邓小平8月3日长信的批示了。她将秘书杨银禄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小杨，你看看这份文件。”

杨银禄将文件接过来一看，是邓小平8月3日致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他看完后，望着江青。

江青严肃地对他说：“我今天违反了保密纪律，叫你看了这样重要的文件。让你看，主要是想听听你对主席批示的看法，你说说。”

杨银禄说：“我看了还没消化，不敢说，怕说错了。我想听听江青同志的意见。”

江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你听我说，还叫你看什么？你说！说错了没有关系，不会定你什么罪，大胆说，不要有任何顾虑，你

说吧。”

杨银禄只好说：“第一，从主席的批示上看，邓小平同志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第二，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是肯定的。就这两点看法。”

江青听罢，又问他：“你估计今后如何对待邓呢？”

杨银禄心想：“这可能是江青叫我看文件的主要目的吧。”于是就大胆地说：“可能主席准备要解放他，起用他吧。”

江青说：“第一点、第二点不用你说，主席批示讲得很清楚了。第三点，你分析得有一定道理，算你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和预测性。我看主席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重新使用他了，主席下了决心，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有服从了，下级服从上级嘛。我是主席的学生，学生听老师的，拥护和执行老师的决定。我相信主席的决定总是英明的。据说邓的信是汪东兴同志亲自送给主席的。汪和邓的关系很密切嘛。”

8月17日夜，已看到对外友协的接待简报周恩来召集所有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接待人员开会，对大家说，江青已经乘专机飞到广州，行前决定，还要把维特克接去广州再谈。为此，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没有人说话。周恩来让对外友协负责人丁雪松先说。丁雪松觉得，没有必要再见了，因为维特克想了解江青的历史，那一天已说了不少了。

周恩来说，是否再了解一下维特克女士的情况：她的水平如何？她希望了解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他指着丁雪松和张颖说：“你们分别找她再谈一次，尽量多了解维特克本人的情况。”

张颖第二天来到北京饭店拜访维特克，问她在中国过得如何？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否符合她的需要？其实她是想知道维特克的中文水平如何，及她对中国近代当代史的了解和研究的情况，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但结果使张颖相当失望。维特克看不大懂中文报纸，中国近代史她知道些，但当代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张颖觉得她是一窍不通，但对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奇闻轶事却知道得不少。其实这很正常，当时的中国人对美国社会又了解多少呢？大陆的人对国民党内部的奇闻轶事又知道多少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铁幕”隔断了两大阵营之间人民的交流，更何况是海峡两岸、东西德、南北韩了。

8月18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5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

“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19日晚上,周恩来再次召集所有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接待人员开会了解情况。丁雪松了解的情况与张颖很有同感:维特克对蒋夫人宋美龄津津乐道,还有特殊的见解,认为蒋夫人在美国很有影响,所以蒋介石就能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因此如果新中国要得到美国的援助,就必须把江青捧出来,使美国人对待江青也像对宋美龄那样。所以她对江青有兴趣,她要把江青介绍给美国人,使美国也援助新中国。她的这种见解令丁雪松和张颖她们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革命怎能依靠美国的帮助呢?美国又怎么可能帮助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维特克的这一说法,刊登在《友协简报》上,周恩来和江青都看到了。

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通知》后还附有《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通知》说,三支两军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在一个地区,应当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3级军事机构,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同时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驻各地的野战军,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中,也必须接受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少数有某种特殊需要的地方和单位,对外可保留军管名义,对内不再行使职权。“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以后属于部队支援地方的各项工作,由部队政治机关负责;调整地方党委成员,更多地挑选一些熟悉全面工作的比较有经验的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继续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除主管省军区、军分区、县

人民武装部工作的军政主要负责干部外,原则上不再兼任军职。文件发出后,自1967年1月派出的军队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8月24日下午,正在上海访问的维特克被告知:江青正在广州回忆她的过去和革命的历史。她将会再见维特克一次或两次,回答维特克提出的所有有关她的问题。

8月24日夜,经过一天忙碌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又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只有接待过维特克的6个人参加。

周恩来显得很疲劳。他从办公桌边站起来走到大家身旁,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来回踱步,然后停下来说:“对不起,这么晚还把你们叫来,有点急事。刚才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是江青在广州一定要见维特克,明天就把维特克接到广州,陪见翻译还是你们原班人员吧。今晚再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几个人都认为其实可以不见,江青让陪同维特克去上海的人带去了5部有关战争的电影,他们从上海打来电话说,维特克一部都没有看。据说维特克除了对江青个人的历史以外,她表示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周恩来对张颖说:“不要谈什么战争。你到达广州以后把我的意见立刻转告江青同志,只谈文艺。再见一次就够了。”

然后又对礼宾司的人说:“维特克女士的签证是28日到期。她不是说要赶回美国开课吗?不要再延期了。”

说完,他停了一下,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拿出一本《鲁迅诗选》交给张颖说:“这是老版本,《鲁迅全集》没有收进去。对了解鲁迅思想有参考价值,你带到广州交给江青同志,也许对她有用。”

在场的人看到周恩来如此关心江青,都深深的为之感动。

8月25日,从北京派出的一架飞机飞到上海。维特克一行人乘坐这架专机,于这天上午11时30分,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张颖等人也是乘坐这架飞机从北京经上海来到了广州。他们被安排住在解放路广东省迎宾馆。而张颖则被单独拉到江青的住地。

游泳池池旁,身穿游泳衣的江青很高兴,亲热的对张颖说:“你们都来了?维特克也来了?很好,很好。”

江青拉着张颖的手,问起了她的工作情况,表示希望张颖到文化

组工作。事出突然,张颖不知江青所言为何,只好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执行错误路线,觉悟不高。这几年我也不搞文艺了,现在许多事我也不懂,知道得太少……”

江青打断她的话说:“不懂可以学呀,你可以当领导嘛,在我的领导下工作嘛,算了,算了,现在不谈。”

张颖手中还拿着周恩来临行前交给她的那本《鲁迅诗选》。立即对江青说:“周总理让我转告您,维特克女士只有很少时间了,请您就谈一次文艺问题。这本诗选是他送给您参考用的。”并双手将那本《鲁迅诗选》交到江青手里。

江青接过《鲁迅诗选》,随手放在旁边的躺椅上,对张颖摆摆手说:“行了,行了,你走吧,下午3点钟来向我汇报维特克的情况。”

张颖回到迎宾馆,维特克已坐在会客室里等着她了。她的脸上不像往常那样微笑媚人。张颖和她握过手,刚坐下,维特克就迫不及待的说:“我和江青夫人第一次谈话的记录,相信你已经带来了,就请交给我吧,这对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张颖委婉的答道:“还没有整理好,需要修改和翻译。你要的不是中文原稿呵。答应过的事情,我们会一定做到的。”

维特克:“我必须亲自带走这份记录,明天你一定交给我。这是江青夫人亲自答应我的。”

“在你离开我国之前,第一次谈话记录,一定能交给你。今天下午江青夫人还要接见你。”张颖依然是不温不火的回答说。

8月25日下午15时,张颖按照江青的吩咐,又提前到江青那里。江青问她:

“维特克的情绪怎么样?在上海谈得有意思吧?几部有关战争的影片是否都给她看过了?她都说了些什么?”

“据说她一部战争的电影都没有看。小于告诉我,维特克自己说对战争什么的都没有兴趣。她只对你本人的历史有兴趣……”

“呵,你没有跟着去上海,算啦,她们也快到了,一切准备齐全了吧?”她们走进会客室,张颖看见四周摆满了舒适的小沙发,中间正对大门还有几张大沙发,显然是为部长准备的。离沙发不远处,有一张大长形桌,上面已摊开几幅大地图。矮矮的几处茶几上都放着一个或

两个麦克风，连接着录音设备。一会儿，一个穿军装的人从里间走出来，江青对张颖说：“你们认识吧，我的老战友，在西北战场我们一起作战。”

进来的是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他和张颖抗战时期就同在重庆周恩来办事处工作，早就认识。但是对张清化出现在这种外事场合，张颖还是颇感意外的。

十几天前，8月13日晚，正在青岛海滨休养的张清化，突然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是当时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才千打来的。他告诉张清化：

“江青要会见一位外国记者，东兴同志让你回北京整理有关解放战争的军事材料。”

张清化对张才千说：“张副总长，我早就离开作战部门了。现在身体不好，是不是改派其他更合适的人？”

张才千没有再说什么话。

张清化抗战期间在重庆的“周公馆”任军事参谋。解放战争时期，特别在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他又派往中央前方工作委员会的军事组，归汪东兴大队领导，一直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江青认识了张清化。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汪东兴向江青推荐了张清化。

8月16日夜23时左右，从青岛来到长岛继续休养的张清化再次接到张才千副总长的电话，命令张清化立即返回北京。张才千对张清化说：

“汪东兴指名必须由你来完成这项任务。你连夜赶到山东烟台机场，那里有一架专机等你。”

8月17日凌晨2时左右，张清化赶到了烟台机场，乘坐北京来的一架军用飞机，于凌晨6时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向张才千报到。张才千让张清化立刻赶到人民大会堂，说：“现在给你整理军事材料的任务。到哪里去？给谁执行任务？汪东兴同志会告你的。……要作为政治任务好好完成。整理材料所需资料报告我，由作战部负责提供。你去人大会堂找汪东兴同志接受具体任务，一切按汪东兴同志指示办理。”

在人民在会堂，汪东兴在等着张清化。张清化敬礼后，双方一握手，汪东兴多一句话没有，直接对张清化说：“给你一个任务，你去广州，为江青同志接见外国记者整理军事材料，到广州后按江青同志的具体要求办理。你要努力去完成这一任务。整理材料所需材料，由张才千副总长提供，这些已经告诉他了。”

说到这里，汪东兴从衣兜里拿出一份材料，是毛泽东当年转战陕北战场时的详细纪录——《李德胜（即毛泽东）同志行动日程（1947年3月18日—1948年5月27日）》。汪东兴指示张清化：“要按此材料标出1:5万、1:10万、1:20万等比例尺图各标3份，送江青一份，供江青使用和整理材料使用；其余两份给我，我转交总理一份。”

张清化随即向汪东兴请示：“是否可以多标出一份，以便留总参测绘局一份存档备用。”

汪东兴十分爽快地同意了他的建议。

张清化又提出：“江青所需资料请告诉张才千副总长由我带去。”

汪东兴说：“你明天就走，先去看看江青究竟要整理什么材料，再报告副总长张才千提供。你告诉张副总长，中央办公厅每天有机要通讯员去广州送文件，经江青处即可转给我。”

说完，汪东兴从衣兜中拿出一张第二天直达广州的飞机票，交给张清化。

8月18日，张清化飞到广州，住在江青下榻的珠岛宾馆。江青要求他于8月25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行动路线图，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当天晚上，张清化按照临行前的要求，向张才千在电话上报告了他到广州后的情况和居住地点，详细汇报了江青要他整理的3份材料和所附图表；报告需要整理这些材料所需要的资料。

张才千随即指示：“所需资料，由作战部即行办理，搞好送去。”并要张清化与作战部部长王扶之联系。

此时，已经看到桌子上摆开3张“西北战场图”的张颖，似乎明白到什么。她凑到江青身边，再次低声提醒说：“维特克夫人对战争没有兴趣。周总理叫我转告你，再谈一次就够了，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

维特克夫人的签证是 28 号，不要再延期了。”

江青脸色一变，两眼瞪着张颖，“哼”地一声就转身走开了。但过了一会儿，她又转过脸来，笑嘻嘻地问张颖：“哎，小张，你看我今天穿的布拉基怎么样？藕荷色，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蓝色当然也是我喜欢的。”

这时张颖才发现，江青今天穿着一身真丝双皱料子的连衣裙，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很难看到的。

江青又说：“我觉得女孩子穿裤子不好看，为什么不穿裙子呢？你们都没有裙子吗？”她叫来秘书说：“明天给她们每人发一条裙子，算我送的。”

第 1252 回：说战争，维特克再见江青 忆往事，饭桌上滔滔不绝

8月25日下午16时，当维特克听到接待人员对陪同她的中方人员说“江青同志准备好了”，知道她们可以去见江青了。三辆小轿车一路按着喇叭穿过广州人和牲畜挤在一起的混乱的街道，来到了郊外。坑坑洼洼的路上到处都是急转弯，两边都是高大茂盛的竹丛。

车子开过几户人家，数丛翠竹，看见一个宽阔的广场。车子停住了，只见场地上，中间有花坛：外层一圈是茉莉花，散出浓郁的香味；中间是各色盛开的鲜艳花朵；四周一根根柱子上还有圆顶的路灯。一幢漂亮宽敞的现代化平房别墅，坐落在寂静的自然保护区里，被热带花园包围着：颜色鲜艳的爬墙虎、木槿，池塘上漂着的淡粉红色的莲花，气味芬芳的木兰、茉莉和姜花，还有蝉儿有规律的鸣叫，以及小鸟毫无曲调的合奏。

“呵，这是一所多么美丽的乡间别墅呵，建在丛山之间，幽雅清静，超凡脱俗。按照中国的说法，真是世外桃源。”维特克用孩童般清脆甜蜜的声音说着，面带微笑走了进来。

江青迎了过来。她拉着维特克的手，一起走进大客厅，边走边说：“你是我的客人，所以特别请你到这里看看。……这房子是盖得不错，你看，前面有这样宽敞的走廊，夏天可挡太阳避暑，散步，冬天可以晒太阳而不受风吹。后边还有哩，一会儿我在里边请你吃晚饭。”

江青让维特克坐在紧靠自己的大沙发上，又向她介绍了总参的张清化局长：“他是我的老战友，谈西北战场，他是我的助手，喏，这些地图都是他准备的。”

维特克看到桌上的地图，有些吃惊，但立刻又镇定下来。她注视着茶几上的麦克风，轻声的问道：“关于战争，我懂得很少，我怎么能记录下你的谈话呢？我想这不是扩音器吧？”

江青：“这是录音机，我所讲的全部录下来，我不仅可以给你全部

记录稿,而且全部录音带都送给你,该满意了吧?”

江青又问:“听说你急着要走。”

维特克:“我将在30日离开中国。自从两星期前见到你以后,对时间的概念已不清楚了,不知今天是星期几,是几号。自从上次谈话以后,我看了一些你亲自培育的戏,也读了剧本又加以研究,我感到好像进入了不同的世界。”

江青:“你只知道一个方面,你总想和我谈文艺,这只是整体的一个方面。你同样板团谈就行了。”

维特克说她同样板团谈了,并对江青表示感激。

江青说:“我读了一个材料,说邓大姐已经见了你。当时我的飞机已准备起航,但我留下来了。如不见你,显得我骄傲、自满。所以临时组织了戏请你看。晚上回家,我想应该对你尽点义务。我还是起航,在这里休息了三、五天,是绝对休息,记忆力有了很大恢复。这以后知道你要写一本斯诺那样的书,我就有点担忧,有点替你着想了。当然也是为了对中国人民负责。”

她问维特克:“你到底想写一本什么书?是本浮光掠影的书还是有分量的书?”

维特克:“我确实希望写本书,描写文化和政治,文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的书。如可能,想写本关于江青同志个人在改造文艺方面所起领导作用的书。过去外界对文化大革命有很大歪曲,他们在各方面都有误解,全然忽视文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也不了解文化大革命在文化方面意味着什么。”

江青:“不仅是文化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大革命,总之是一场全面内战。我不是对你说了吗?我为你着想。斯诺比你有优越的条件,因为他与毛主席进了长谈。此外还与周恩来和其他老革命者谈了话。而你呢,最老的是邓颖超同志。邓大姐工作历史长,但工作角度我比她宽。我为你这本书在做钢筋水泥的基本建设。这段历史可以生动地告诉你,可以使你了解长征和现在。但我不强加于人,你如不喜欢军事,我们就不谈,你愿谈什么就谈什么,你问的其他问题我没有准备,但我们可以漫谈。”

维特克:“你刚才谈的都很重要,至于谈什么和怎么谈,可以让你

来决定,军事也好,其他也好。你可以谈延安或上海时期,革命怎么进展的,还有你一生的情况。”

江青:“如果你了解我的历史,那谈起来就长了。我建议先不写我,而写中国革命的书。如有时间再写我。当然你也应该对革命过程中个人所起的作用有所了解,不然我们怎么能保持革命青春?但必须加上革命。”

“当人们谈到整个革命的全局的时候,任何个人的角色都显得很渺小。我自己的角色也非常渺小。”江青说。

维特克:“自从我来华后,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文艺方面了解得很充分。江青同志的作用在国外受到很大误解,对此我感到很难过,我想在今后的作品中予以纠正。我不是指外国人反对你,而是不了解你,他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你。因为在国外材料很少。我认为我了解中国,我十分尊重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我感到你个人这方面的情况,应向外国人做出澄清。我愿做些事情,对此予以纠正,我对在外国介绍你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很感兴趣。我把自己当作一张白纸,在这张白纸上可以写任何东西。”

江青:“今晚能否谈解放战争时期?因为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别的问题,不瞒你说,广州的同志又搞掉了我两天时间,给1500人作个报告,给干部作的。我在这里是保密的。因为群众一发现就不得了了,我就休息不成了。”

这时江青站起身来,走近那张已摆着三张大地图的长方桌,拿起一根教棒,又叫服务人员摆好录音设备,向维特克讲起三年解放战争。

江青看到维特克在不停的做这记录,就说:“不做记录不是更好吗?”

维特克:“我知道不能用录音机,所以拼命记。”

江青:“记录很累,记录时不能听到我讲的每一件事。”

维特克:“你能否给我录音带?”

江青:“可以。我不是说过吗?录音也是为你准备的。”

江青看着地图说:“这张图是关于战略反攻的,……二野刘伯承司

令员、邓小平政委从大别山向武汉进攻。一边武汉，一边南京，敌人无法招架。……

“西北战场，毛主席坚持西北战场，指导全国。党中央分成前委、工委、后委，这张图标了敌人从进攻到完蛋的全过程，每个战役的数字都有，我就不详细说了。如果你同意，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吃饭。饭后再介绍西北战场的情况。”

维特克：“能否给我这些图的复印件？”

江青：“这些图就是为你的书画的，都是给你的。你看我把国家测绘总局局长都请来了。他也是跟我一起，跟随毛主席和党中央坚持在西北战场的。”

维特克：“那好，这样我就可以把你的解释和图联系起来了。”

江青：“今晚先把这个讲完，先讲三年半解放战争的概况，然后重点讲西北战场，这样可以讲得更生动，这就是我给你那本书所做的钢筋水泥的基础。工作非常累，因为得反复核实，拿出根据，别人驳不倒，这是历史，不能歪曲。”

维特克：“对任何提供的材料，我都很感谢。”

江青：“我告诉你的材料斯诺没有，今天我给你讲的比给斯诺讲的要深。我给你的这些材料很扎实。我搞了那么多样板戏，我自己没有实际经验，能帮助他们吗？我读了大量军事历史，不管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甚至被歪曲的，我都读，单华北军区的历史材料就一大堆，我都读了，还到地方去调查，每个戏都要去调查。”

维特克：“经过军事研究，再打仗你们就容易得多了。”

江青：“一般人都知道怎么打仗，珍宝岛的战役就是没有打过仗的人指挥的。会打仗的人牺牲了，不会打仗的边防站长出来指挥，只二十几岁，不满30岁，是我们党‘九大’代表，指挥得很好，叫孙玉国。”

已经是晚上21时了，江青站起来，拉着维特克的手说：“哎哟，说了这么多话，累了，也饿了，休息一会儿，咱们该吃饭了。”

坐在饭桌上，江青介绍说：“今天请你吃广东饭，中国有句老话：在广州，穿在杭州，死在柳州。因为柳州的木头特别好，而广州人特别会吃。这是盐鸡，味道不错，还有清蒸鱼，这种芥蓝菜只有南方生产……你最好同群众接触接触，到越秀山去看看，我现在不能去了，否则

成了展览品了。我在这儿必须保密,因为广州军区要为我的安全对中央负责。因为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会给我保密,所以我请你到这里来。”

维特克:“希望你有时间好好休息。”

江青:“对,我应好好休息。但我怕把电报和文件压得太久,怕落后。我应有责任,我在这里同你谈话,我对广州军区的讲话已经经过政治局批准,我们是严格遵守纪律的。”

维特克:“我相信。”

江青:“当然我们不是从早到晚都很严肃的,不是这样的。过去当我能同主席经常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各种问题,经济、政治、文艺等等,我们从来不枯燥。你一定知道毛主席很会游泳,也很会打乒乓球。”

维特克:“这方面的照片我都有。最近我买了几幅毛主席打乒乓球的丝织画,我想带回去送给我爱打乒乓球的朋友。我知道毛主席早在1917年时就写过关于体育的文章。”

江青:“那时他的观点还不是马列主义的。毛主席对自己做过分析,开始他信孔夫子,后来他信资产阶级,以后感到这些都没用。五四运动时他是个领袖,带一个代表团去请愿。北洋军阀的总理叫靳云鹏,他拒绝见代表团,但代表团一定要见他。进去了,毛主席说过,当时出来一个人,这个人连话都说不清,后来这个人说,他就是靳云鹏,这个名字还得查一查。”

维特克:“这录音了吗?我怕丢了这一段,我可以记录吗?”

江青:“不需要,有人替你记录,你知道我们为你负责,为中国人民负责,为世界人民负责。不讲假话。”

维特克问:“你1933年入党,作为一个青年,你入党后的职责是什么?”

江青:“责任很大。我做各种超过我能力的事。我冒了生命危险找党。因为穷,几乎给流氓骗了。当然他不能骗我,但欺侮我。”

维特克:“什么样的流氓?”

江青:“有一次我弄了点钱,只够买三等舱的船票,是日本船。我的朋友送我,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朋友给我,让他在船上照顾我,

因为我晕船。我坐过三次海船，还爬过崂山，爬山我是老虎，在女学生爬山中我是冠军。坐船是狗熊。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非常坏。我晕船，吐。因为他听说我下船时有朋友来接我，他就起坏心了。他说我们到上海，你的朋友不来接你没关系，我们开旅馆去。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那时我知道上海有专门为女人开的旅馆，我想女人总会帮女人的。如果没有人来接我，一下船我就叫个黄包车到女人旅馆去，那是我当时的看法。实际上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不行的，因为要住那个旅馆，先得交 15 块钱的押金，所以我就绝望了。总向外边看，也不晕船了。这个坏蛋站在我后面，提着我的小行李，对我说咱们开旅馆去，我没有理他。下船后看到没有人来接我，我决心叫黄包车。就在这时候，来接我的人从人群中突然走过来，我什么都忘了，高兴得跳起来了，把那个坏蛋也忘了。他把我的行李拿走了。你对这一定最感兴趣。”

维特克：“你逃掉了。这是你作的最有战略意义的安排，通过这个例子可看出你在那时就有军事战略天才。”

江青：“文化大革命期间晋东南打得一塌糊涂。有一次，我开完会后读了一个文件，总理叫我休息，在人大会堂。突然间许多人拿着地图等东西进来。郑维山和他那一伙说，现在我们有权利开枪扫荡。那时两边都有几万人。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当时还不知道。我说，那怎么行，两边都有几万人，不考虑人民的生命财产怎么行？他们说，我们现在宣传没用，要派坦克，挖战壕。我说，我要派比你们更多的军队，但远离现场，在坦克装扩音器。当时总参的副总参谋长也在那里。吴法宪说：哎呀，江青同志你也知道怎么打仗呀。我说：‘我跟随毛主席几十年，连这点事还不知道？不能开枪。’总理支持我，半夜里总理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办法很有效。这以前榆次县开枪打起来了，但我不知道，是突然袭击，我 1967 年 9 月 5 日的讲话把这股风刹住了。”

维特克：“你刚才讲的情况对理解你 9 月 5 日的讲话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背景。”

饭后，维特克从洗漱间走出来，一手拉住张颖说：“Miss 张，我对战争的事听不懂，很难懂，尤其是中国这么复杂，我感到很困难。”

“你可以提出来，请江青夫人不再谈战争了，我想她也许愿意对你

谈别的,而且你的时间有限,后天就要离开中国,是不是?”

维特克:“是啊,学校要开学了,我还要讲课。”

江青带着维特克走进饭厅旁边的娱乐室,和张颖打了会儿乒乓球后,大家又回到客厅。张颖乘机悄悄走到江青身旁说:“刚才维特克女士向我表示,她听不懂战争,希望你能讲点别的,有关你自己的事。”

江青坐下,慢吞吞地对着维特克:“我讲的战争故事,不是非常有趣吗?你不愿意听?这就是我的事呀。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

维特克:“江青夫人,我非常有兴趣,只要是关于你的一切,我非常愿意听,听不懂,我可以学,是不是?这是你刚才对我讲过的……”

江青:“这就对了。这个图是毛主席的行动路线图,……那时撤离张家口不容易,撤出延安也不容易。很多人不愿意,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坏人,当然也有坏人的捣乱。中央那时决定要撤到后方去,那个决定是在王家坪作的。有些好心同志动员我去向主席讲讲,留在这里多危险呀,我也很傻瓜,就去说了。毛主席说,你是胆小鬼,你就走。我很冤枉,这不是我的意思,我是坚持留下来的唯一的女同志。我认为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应该有人照顾他,应该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开始毛主席和我带着李讷行军,李讷与你同岁,带孩子行军以示坦然。李讷当时6岁,白天还好,夜里行军孩子睡了,就不好办了。软了,甚至几个人都没办法对付她,更甭说一个人了。后来我就求毛主席,带着孩子不行,后来就让她与邓颖超同志一起过黄河,所以李讷一直叫她邓妈妈。我事先做好工作,她答应过河,但过去后,睡醒一觉,哭起来要回来。我就跟你讲这么多。”

但是,整个晚上,江青依然是在不厌其烦,十分详细、具体,甚至是诸天的向维特克讲述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及三大战役的全过程,一直讲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

维特克说:“现在感到越来越清楚。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为一个外国人服务。”

江青:“为中国人,信任你,相信你能写好书,我不信一个女同志不能写好书。”

维特克：“我原则上相信这点。”

江青：“你到联合国代表团去要求，谢伟思也介绍你来。见你以后，你给我印象是好的，你对中国人民友好，对世界革命……你不仅是个好的美国人，也是个好的知识分子。”

维特克学的很快，她说：“这是我最大的弱点。”

江青：“人是变的，但天不会塌。希望你逐渐进步，千万不能骄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鲁迅讲：‘我经常解剖别人，更多的是解剖自己。’你对鲁迅看法不正确，可以举例子，反对托洛斯基。有西北战场的经验，才可以理解主席长征和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河，那是为了甩掉强敌，其中一次在贵阳，两边强敌，毛主席出其不意，中间插入。我没有长征经验，但在西北战场跟随主席，知道如何对敌调来调去。”

维特克：“也许当我整理加工这些材料后，发现问题再来请你澄清。这些不仅够一本书，而是够几本书的材料。”

江青：“你知道我不是光搞文艺的了吧！”

维特克：“任何人不会像江青同志文艺上有才能，在舞台上能表现。有革命朝气的人不会是只搞艺术了。我开始从表面，进入肉，现在进入骨头了。”

江青：“今天重头戏过去了，以后可开神仙会了。今天 9 个小时多了，我也要睡大觉了，明天游泳后再开神仙会。”

维特克：“你把解放战争战略阶段一步步谈了，很清楚，下步你怎么谈？”

江青：“鲁迅，延安文艺座谈会。你还想了解什么，我可以重点告诉你。一生虽不长，也够曲折复杂了。你想了解的 30 年代都可以谈。”

维特克好像突然惊醒了似的，赶紧跑到大桌子旁边，抢起那些地图说：“这些都是送给我的吧？江青夫人，对于我这真是太宝贵了！”

江青：“是送给你的，不忙拿吧，我让人给你送去。你拿着不方便。”

维特克：“还是我自己拿走好，这些对我了解你的讲话是非常有用的。”

张颖慢慢地靠近张清化，在他耳边小声地问了一句：“审查没有？”

张清化小声回答说：“江青同志要我交给她亲自审查的。”

张颖没有再说话。

维特克双手紧紧抱着那几卷地图，走出门外，登上了汽车。

第一次与江青会见维特克的谈话文字手稿也很快交给了维特克。

第1253回：谈身世，从孩提到抗美援朝 回北京，要整理会谈记录

8月26日凌晨，维特克等人从江青处回到了广东省迎宾馆。虽是凌晨，广东的闷热仍让人难耐。张颖把两架电风扇打开，躺在红木躺椅上。这时，她听到轻轻叩门声，接着，住在她对面的于世莲和陈明仙轻轻推门闪了进来。

小于一进门就说开了，对这天江青谈话的内容感到奇怪。陈明仙也长吁口气后问张颖：

“不是说周总理只让她谈文艺吗？……”

因为江青在谈话结束时说：“明天游泳后再开神仙会。”就是说，她还要和维特克谈。所以，陈明仙继续问：“维特克后天就该出境了，她要赶回去开课的。谁该管这些事呢？”

张颖没有回答，陈明仙追问：“你们来时，周总理有交代吗？”

“有非常明确的交代：只谈一次，只谈文艺。我已经转告首长了。”张颖说。

“维特克的机票已全部订好了，她要赶回去教课，后天一定要到香港的。”

张颖说：“我知道，也着急。但看样子走不了，看这架势，恐怕挺麻烦。”

“你们从北京来时，不知道这些事吗？”

张颖摇摇头。

于世莲和陈明仙轻轻退了出去。张颖又躺到那张大躺椅上，还没有回过神来，又传来叩门声，进来的是翻译沈若芸。同于世莲一样，她一进门就嚷嚷起来，也是对江青的谈话内容不理解，而且也问：“明天还要继续谈，你看怎么办？”

张颖轻轻推推小沈，让她小声点，夜已深了，让别人听到不好。然后反问沈若芸：“你看怎么办？行前周总理的交代你也听到了，我今天

一到这里，就已经全部向江青转达，她显得很不高兴……”

小沈让张颖给北京打长途，请示汇报一下。

上午 10 时，张颖给北京外交部打长途电话找王海容，向她详细汇报了昨天江青与维特克会见的情况和谈话内容，请示如何处理？王海容说她一定转达上级。

刚过 11 时，张颖接到通知，江青要见她。张颖拉上外交部礼宾司的唐龙斌一同前去。

江青一见到张颖就问：“维特克女士对于昨晚的谈话有什么反应吗？她的情绪如何？”

“昨晚在汽车上，她又表示对战争听不大懂，想听你私人的故事。”张颖回答。

江青说：“我当然会给她讲的，忙什么，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

张颖请示说：“明天，最迟后天维特克女士必须到香港，她的机票已订好，假期也满了。今天是否让她在广州附近参观一下，比如去佛山看看美术陶瓷，还有祖庙，这也是旅游点。下午 4 点以前可以回来。”

“你说什么？去佛山参观，那么远下午能赶回来？我去过，走一趟得 8 个小时。”江青当即表示反对。

“如果坐小汽车最多两小时可以往返的，下午准能赶回来。我可以陪她去。”张颖还要坚持。

没想到，江青的声音突然提高了 8 度，近乎是吼叫的喊出：“你以为我没有去过吗？我说 8 小时就是 8 小时，你敢顶撞我？！”

张颖吓了一大跳，睁大眼看着江青，本能的轻声解释说：“是三、四十分钟的路程。佛山是近郊，我们都是去过的。不信你可以问问大牛。”

站在江青身旁的大牛是江青的贴身警卫，一个山东大汉，为人耿直，对江青忠心耿耿，不离左右。

“报告首长，老张同志说得对，最多需要 40 分钟。”大牛如实回答。

江青那个火呀，向前走了几步，手指着张颖的鼻尖，一手叉着腰，大声的嚷道：“好呀，你们今天都是怎么了？围攻我呀？胆子不小呵，你要知道，围攻我的都没有好下场！”

谁都不说话了,怎么说呢?3人沉默了几分钟,江青让大牛把唐龙斌叫了进来,吩咐将维特克的飞机票改期。

训练有素的礼宾官唐龙斌,文质彬彬、心平气和、非常婉转地向江青陈述,这种事情很不好办,要涉及许多方面的关系。但是江青好像没有听见,仍然坚持把维特克的行期推迟6天。

下午18时40分至27日凌晨4时,江青与维特克又谈了将近10个小时,主要是江青讲述自己的身世,从孩提时代讲起。

所有在座的人,都不了解江青的身世,更没有听她讲过自己的童年经历。这晚,大家都饶有趣味地静静的听着。

吃过晚饭,江青开始讲她在上海的经历,最后说:

“1937年,我放弃上海的优越条件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在上海,一个电影明星,物质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心情郁闷得很呀!到了延安,一看到红旗就激动得潸然泪下呀!”

江青擦了擦眼泪,又指了指维特克说:“你没有我那种经历,是体会不到我那时的心情的。”

江青一直谈到次日凌晨。

8月27日傍晚,她们又移到了另一栋更大的别墅,江青讲了她去延安的前后经历,又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讲到解放后对《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的批判,然后说到《红楼梦》,详细讲述了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风波的来龙去脉,介绍了自己对《红楼梦》一书的看法。

晚饭后,江青和维特克又讲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斗争。她叫人拿来一个皮包,从中取出16开本的文件和几卷纸,一件件放在身边的茶几上,然后拿起其中的一本,翻开来念。

.....

维特克非常紧张地在记录着,突然,她停住笔问:“江青夫人,这太重要了,你这是印好的,是否也可以送给我呢?”

江青:“当然可以,这是为你准备的,喏,这里还有林彪的信、二月提纲……”

坐在旁边的张颖一听,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江青念的关于建国以

来所有事件的大事记,在国内还是保密的;而林彪的信,在内部尚未传达,《二月提纲》也没有对外公开。这些,能送给外国人吗?她如坐针毡,急想对策……那张茶几正好摆在她和江青之间。张颖随手拿过那些文件,交还给工作人员,对江青和维特克说:“这些材料还需要翻译,以后和记录一起再送吧。”

江青又讲起了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反击战……她指着放在茶几上的地图说:“这里是抗美援朝时五次战役的地图,还有图解,也是送给你的……”

张颖赶紧起身把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拉到客厅外的走廊上说:“老张,首长今晚拿出来的地图,我想也是你带来的吧?因为我事先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朝鲜的地图,怎么能送给美国人呢?”

“我也不知道首长要送给美国人呵。”

“不管怎么说,这些图绝对不能送给维特克。”

“这是首长的吩咐,我没办法阻止吧?”

“如果要送,我们现在就去打电话请示周总理,他主管外事的。”

“首长的事谁敢阻拦,她发脾气怎么办?”

“首长发脾气我承担。如果把地图给维特克拿走,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他们又回到会客厅,各人坐到原位上。

会谈结束时,张清化匆忙走近江青身旁,小声地解释着。维特克起身告辞,双手去取茶几上的那些地图。张清化赶紧走过来,非常礼貌地说:“维特克女士,这些地图里面可能还有些地方需要修改,你今天不要拿,以后……”说着,他就把那些地图卷起来拿走了。

维特克用惊异的眼光投向江青。

江青笑着和维特克握别。

29日下午16时,江青陪维特克游兰圃。她这天穿着乳白色连衣裙,戴着金丝眼镜。兰圃的一群女服务员,也都穿上藏青色裙子,白色上衣,拿着许多厚纸板,还有各种植物标本。

江青看见张颖,大声问道:“我送给你的裙子呢?为什么不穿?我不是让你们都穿裙子吗?”

张颖已经有许多年都不穿裙子了。那天,江青的秘书给陪同维特

克的 5 位女士送来 5 条黑色麻绸短裙，谁也没想到今天要穿。张颖只好抱歉地说：“江青同志，我的皮肤过敏，怕蚊虫咬，所以没穿。”

江青显然极不满意：“我都不怕咬，你就怕咬吗？”

张颖还想解释两句，江青的秘书赶紧过来拉着张颖轻轻地说：“快走吧，我用车子送你回去，换了裙子赶快回来。”然后，又打电话到宾馆通知：“告诉所有女同志，通通穿上黑裙子。”

这天下午在兰圃，维特克为江青拍了很多照片。

晚上，女服务员引导大家走进一间大厅，长条桌上堆满了书。最引人注目的是放在木匣子里的线装《二十四史》，是清代版本，在国内已不多见。另外还有重印的线装《古诗源》，新版 20 本精装《鲁迅全集》，线装新印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还有不少其他各种书籍。

江青说：“你们看，这些书都是我预备送给维特克女士的，她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没有一套《二十四史》怎么行？”

大家都有点吃惊，这样名贵的《二十四史》送给维特克个人？张颖说：“江青同志，这套《二十四史》，国内也不多见。按规定是不能送给私人的，你或者送给维特克女士所在的大学，也许更有意义。”

江青：“谁说不能送？我自己花钱买的，我爱送给谁就送给谁！”

“这是有关文物出口的规定，需要文物局批准的。”陈明仙轻声解释了一句。

江青火了：“谁的规定？周总理不是送给尼克松总统一套吗？周总理能送，我就能送。”

“周总理是用国务院名义，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沈若芸很认真地又说了一句。

这时，小于陪着维特克进来了，服务员快步走上前去，把那盛满鲜花的盘子送过来，江青高兴了。她上前拉着维特克的手说：“这是茉莉花穿成的花球，你看还有小花环，你看还有白兰花，这样清香，这样洁白，美国有这些花吗？”

维特克：“也许夏威夷岛上有，我不清楚，不过不会有这么清香的花，真美，真可爱。”

江青：“这是我特意准备送给你的。休息的时候，我很喜欢穿花球，每天换一个，你看穿在扇子下边香得很。”

江青手上拿着一把檀香扇，下边坠着茉莉花球，她对维特克说：“这是我的檀香扇，送给你作纪念吧，这是新的，今年我才用。我用过的送给你，才更有意义，是不是？这把扇子是特制的，比市面上卖的要精致得多。”

维特克接过扇子和花球，细细把玩。江青这时拿出几串小茉莉花，笑着对张颖她们几个人说：“这是送给你们的，不然我就太偏心了。”

江青又对维特克说：“维特克，你是我的朋友，我还要送你一些纪念品：这是特制的书签和裁纸刀。你看，这是不久前从湖南马王堆出土的漆器上的花纹，刻在象牙的裁纸刀上。这是竹制的，也有雕刻。这样的手工艺品，又好看又有纪念价值，而且是我自己设计，特级技工为我雕刻的。除了我自己，谁也没有哩，送给你，作为永久纪念。呵，还有这一套瓷制的小猫，送给你的女儿，是景德镇的产品。你看看多么可爱！你知道景德镇是我国出产瓷器最好的地方，以后你应该去看看，那里的瓷窑有上千年的历史哩。”

维特克睁大眼睛，惊讶和喜悦使她不断点头微笑。

江青：“你看，那边桌上放着许多书，有《二十四史》，你当然知道的，作为中国问题专家，你应该有这么一套。这是我送给你个人的，不要不好意思，这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她们让我送给你们大学图书馆，我一定要送给你个人。还有这本《古诗源》，这本书是我挖掘出来的，要他们重印，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极为重要。”

太阳落山了。江青对维特克说：“今晚我请你吃山东菜。这里不是山东，但我有从山东来的好厨师，做我的家乡菜，你一定会喜欢的。你知道，在中国北方，山东菜是最负盛名的。比如说吧，北京烤鸭原来是从山东传过来的，在清宫廷得到皇帝和慈禧太后喜爱，就在北京流传下来了。山东菜也很有特色，与广东菜、上海菜都不一样的。”

8月30日晚饭后，江青又一次接见维特克。这次主要是维特克向江青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江青补充或解答。

31日上午10时，江青最后一次接见维特克，说是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要告诉维特克。

终于，维特克女士飞回美国了。所有陪维特克女士的人员，也于

31日下午坐上飞机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张颖拿着从广州带回来的全部录音记录稿，去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汇报。开始，乔冠华还饶有兴趣听，接着就不耐烦了，挥挥手叫张颖去找王海容。张颖又拿着记录稿去找王海容汇报，王海容听了说：“这事谁都管不了，等以后再说吧。”

张颖将记录稿交给王海容。

9月6日上午，王海容匆匆来到张颖办公室，将她叫出门外，说：“首长有命令，要把记录稿赶快整理出来，还要寄给维特克女士，要你继续负责。今天10点在129室，大家集中讨论如何整理。”

张颖说：“你是否看一下那份记录呢？你不能提点意见？我认为这不是件小事，应该向上级反映！”

王海容说：“别啰嗦了。这种事儿我们都管不了，你还是赶紧去集合人吧。”

于是，除礼宾司的唐龙斌外，全体陪同维特克的人员全部来到外交部129室，包括穿军装的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当大家知道是要整理广州的谈话录音，立刻就嚷嚷开了：

“怎么个整法呀？人家广州不是已经根据录音整理了吗？”

“为什么还要整理记录？维特克自己是作了记录的，没有这样的先例要为她采访整理记录。”

“整理记录的目的何在？为了存档还是干别的用，应该明确，不然我们也不好整。我们只是接待班子，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有别的工作哩。”

“如果要送给维特克，那还得翻译成英文，得花多少功夫呵！”

王海容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着急了，提高嗓门说：“首长秘书刚才来电话，要整理这份记录，我们只能照办。首长指示：第一步要按录音整理，一字不许错，等一会儿我去找几台录音机来，你们两人一组，轮流核对。”说完转身走了。

大家鸦雀无声，每人找把椅子坐下，然后分散在小屋的每个角落，准备核对。

7个人用了整整3天时间，终于整理完毕。

第 1254 回：抓保卫，召开全国座谈会 说贵州，王洪文进京学习

8月26日开始，有中央部分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负责人参加的全国警卫工作座谈会，按计划在北京召开。这次座谈会主要是汇报各个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现状，警卫工作问题，应对措施等。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从1971年毛泽东南巡后，林彪集团成员通报毛主席的行程，并策划刺杀毛泽东的行动说起，谈到了湖南存在的问题，湖南驻军的问题，最后转到警卫工作。

他说：“从去年揭发林彪问题后，我们都感到当时的情况很危险，是伟大领袖的行动将敌人部署打乱了，想起来就让人后怕。看来警卫工作我们不认真抓不行，有的同志过去没抓过，从现在起就要认真抓。中央负责同志的安全，外宾警卫任务很重。这次开会，就是要交流一下经验，并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一番整顿。”

总政保卫部部长蒋润观在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说：“1970年12月，谭甫仁同志被害，而警卫员贪生怕死，听到凶犯开枪，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今年5月，63军副军长余洪信行凶，打伤该军副政委杨兆魁同志，打死该军政委的爱人。余犯行凶持续二十分钟左右，打了十几枪，当即有人报告警卫分队，竟无一人出来捉拿凶犯，甚至慌乱一团，有的吓得跳窗逃命，有的吓得趴倒在地。这两起案件是我军历史上没有过的。”

王洪文代表上海市在会上做了发言，他说上海的警卫权基本让“林贼”掌握了。他们利用警卫处搞中央情报，搞破坏。利用工作方便谋害毛主席。

随后发言的有广东的孔石泉，浙江的铁瑛，外交部的符浩，江西的黄知真。

在8月27日的会议上，北京卫戍区吴忠、江苏吴大胜、广东王元

生、河北郑三生、安徽李任元、中共中央联络部的杨玉衡、山东的张钰秀先后发言。

8月28日在会议上发言的有天津的刘政、云南的武健、广西的刘重桂。

所有代表的发言皆与华国锋、王洪文的程式、内容基本相同，都是叙述了本地区或本部门文革以来的社会治安、警卫和接待工作情况，目前存在和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像边境地区和有进出口岸的省份，都提到了边防形势严峻，有外部特务渗入的问题。如广西在越南战事紧张的时候，有大批人从越南过来，一来就是几千人，来了就不走，里面混有“苏修”的特务。云南在1972年几个月间就有敌特遣入38起，破获了31起，敌特将中央文件带出国境。广东接待外来人员的任务量大，外宾、华侨多，出入境21000人，是敌特混进来搞我们情报的一个渠道，1972年发现特嫌36个。

外交和联络部主要谈的是外交及接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如礼宾工作不规范，受到周总理批评；互通情况不够；资料发得不及时；中央接待部门规格不统一。存在大国沙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出了索马里代办出席宴会受阻事件。还有联合国首席翻译的钱包在中国被偷事情，接待中铺张浪费问题很大等等。

大城市主要是社会秩序和治安问题，如天津66军政委费国柱的汽车让人给推跑了，其实可能是汽车的刹车没有拉，汽车自行溜出车库的。另外，社会闲散人员多，南京1972年1至3月，游散人员1万多，不少是劳改劳教分子，出现了一些行凶杀人案子老破不了的情况。交通事故频繁，仅天津1972年上半年就发生46起，死36人，伤300余人。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公安部部长李震对全国的治安情况进行了总的介绍，他说：当前国外阶级敌人加紧了派遣活动。国内散发投递反革命传单、匿名信，为林彪招魂的情况不少。有的反革命分子很嚣张，如武汉一电影院跑片员，到处散发反革命传单。有人公开为林贼招魂，广州军区政治部干部，在食堂贴4000字的大字报，反对批判林彪。

9月12日,贵州省蓝亦农等13位领导人给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汇报他们9月3日进京后,对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进行的总结。《总结提纲(修改稿)》称:

“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

《总结提纲(修改稿)》将这些错误归纳为:一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和梁兴初、谢家祥等人串连,提出在宪法上加上“三个副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二是转移批陈大方向,吹捧林彪;三是“九一三”事件后,不揭发批判林彪,不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不听从周兴、王必成的命令;四是拉山头,搞宗派,与黄永胜、邱会作、黄志勇以及梁兴初、谢家祥、韦统泰等来往频繁。

9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批转《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

周恩来1972年8月与林立衡谈话后,总政通过电话向空军报社传达了周恩来关于林立衡的指示:“林立衡经过前一段学习之后,应回到空军报社接触群众,一起学习,以党员相待,同志相称。她在空军报社是有错误的,要帮助她提高认识,接受教训,并要注意她的安全。”

为此,空军报社专门成立了一个陪同林立衡学习的小组,成员有后来任空军报社社长的金为华、张炳根,有各处处长和编辑徐臣、龚克平、石玉增、谭先德等人。并规定了几条:一是不许追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问题,不问也不许打听。林立衡写的材料密封,直接上送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总理。二是学习情况由总政驻空军机关工作组组长、原总政直属政治部主任李平单独整理成简报上送中央和总政,每期印7份,由《空军报》的金为华执笔,经直接掌握空军报社学习的总政工作组成员李珉报工作组组长李平审核完稿后上报。三是真诚帮助林立衡提高认识,保证她的安全。

总政工作组组长李平在空军报社作了动员。他说:“过去她是仙女,你们夹道欢迎。现在不是仙女,你们也要欢迎。”

李珉说:“她是起义的,起义说明她也是有错误的。”

之所以说林立衡“起义”,是因为林立果1971年9月7日把谋杀

毛泽东不成就去广州另立中央，再不成就去苏联的计划告诉林立衡后，她后来说“当时怕林立果对自己下毒手，曾向林立果表示‘跟你们走。’”而9月8日晚，林立果乘飞机回北京时，林立衡尽管思想斗争激烈，不同意林立果的行为，却因林立果向她说过“首长也同意”而不敢去当面劝阻父亲制止林立果的活动。9、10、11日三天，林豆豆都在北戴河林彪身边，还去山海关游览购物送给父亲。她知道林立果在北京从事谋害毛泽东的活动，但没有及时向中央检举揭发，直到9月12日晚，林彪、叶群、林立果要逃跑之前才去8341部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所以中央、总政认为她是“起义”。

说到林立衡的错误，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前期，她在空军报社支持造反派批斗了一批政治部领导和二级部正副部长，还把报社5名正副处长，包括她所在的三处处长林毅、袁亮还有赵鹏、刘昌东、许广信打成“反党小集团”。1967年3月才参军的林立果被提升为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后，林立衡也同时被提升为空军报社副总编辑。

1970年8月3日，空军政治部党委第67次会议讨论学习林立果“讲用报告”，同时向空军党委建议提升林立果任空军副参谋长，林立衡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并为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决定请林立衡给政治部干部作一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根据空军政治部党委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一个紧跟林立果、林立衡的5条措施，其中规定：

“一切重大问题，例如工作计划、决定、报告、干部配备以及重要问题的处理等，都要及时主动地向立果、立衡同志请示报告，争取他们的领导，真正做到大事不遗漏，不延误，小事不干扰。对林立果、林立衡必须时时想到他们事事请教他们，处处保卫他们，要老老实实服从他们的调动，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们的指挥……”

这就是8月周恩来接见林立衡时提到的“五条”。据说周恩来看到这5条之后，斥之为封建法西斯的东西。

1972年9月1日，林立衡在卫戍区警卫一师两名中年女干部程言翠、侯颜娥陪同下回到空军报社，报社为她开了欢迎会。林立衡说：

“受到总理和中央首长的接见，激动得两宿没有睡着。”

“毛主席对我很关心。”

“中央首长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对我的教育很大。我过去生活在林彪这样的家庭，有不少的缺点错误和罪恶，愿意向群众揭发交代。这一次一定要很好学习，改造世界观。”

“空军报社的问题很严重，这些问题的根子在我这里。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要向同志们请罪。”

当天晚上，她又几次对陪同她到报社来的程言翠、侯颜娥说：“没想到报社的同志这样热情，很受教育，很感动。”

以后林立衡每次到报社参加学习，都是由程言翠、侯颜娥陪同，为了保护她的安全。

9月8日，林立衡在小组讨论中发言时说，自己1971年9月5日在报社支委会上的那次讲话，错误是严重的。“我有时听到林贼一些反动言行很气愤，另一方面，还觉得他过去打过仗，理论上也有一套，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也希望他早点死，保持个晚节算了。”

9月20日，林立衡在小组会上对林彪1966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518”讲话作了一次批判发言，并参加了一次党小组会，大家反映较好。

9月28日，林立衡在同程言翠、侯颜娥闲谈中说：“过去我与林立果是同盟军，有些情况我是从他那儿知道的。在北戴河林立果叫我到他住的楼谈了两个多小时，我当时不得不表态‘跟你们一起’。我如果不表态，就暴露了。”

她还说：“张清林是我看中的，叶群看不上他。71年4月来北京，先在304医院学习，后住在邱会作家，到了8月8日，我们的关系才确定下来。”

29日下午，林立衡参加了报社批林彪的大会并发了言，大家反映较好。

9月初，在上海的王洪文接到北京张春桥的电话，通知他把工作移交一下，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去学习。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问学习什么、怎么学习？

张春桥说：“学习要有一段时间，所以要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随带一个秘书。”

放下电话，王洪文赶紧找徐景贤、马天水和王秀珍商量，他们在康

平路市委小礼堂议论半天。

徐景贤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

王秀珍嘴快，一拍巴掌：“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

王洪文赶紧制止她：“嘘，不要乱说。”

马天水频频点头：“林彪集团垮台以后，中央的人越来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回不来了……”

9月6日晚上，他们几个在锦江饭店小礼堂设宴为王洪文饯行，9月7日上午，到虹桥机场为他送行，王洪文和秘书小廖提着手提箱向大家挥手告别，乘坐飞机，青云直上，向北京飞去……

到了北京，他们直接来到北京钓鱼台9号楼，这里的二楼住着姚文元和张春桥。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也住进了9号楼二楼的侧楼，和张春桥、姚文元成了邻居。当然，此时的钓鱼台9号楼二楼住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二、三把手，自然也成了上海的大本营。

王洪文不知道调他进京干什么。而张春桥的心中，则是一清二楚。那是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毛泽东忽然问他：“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琢磨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当然无法直接问毛泽东，便求助于江青。

江青告诉张春桥：“前几天，康老跟主席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这次，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毛泽东召见王洪文，使王洪文深感意外。在毛泽东的书房里，老人家紧紧地握着这个37岁的年轻人的手，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毛泽东关照周恩来亲自帮带王洪文。以后，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他都通知王洪文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连绝密的讨论运载火箭把人造卫星送上天的项目会议，都要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还给王洪文送来了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供他学习使用。

刚到北京的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可是，张春桥、姚文元都是这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后，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因为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所以张春桥、姚文元要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 17 厂的夜班工人的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但他还是兢兢业业，谨慎小心的开始了新的生活，像模像样地学习起来。

为了更好的学习，王洪文向徐景贤提出，要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肖木调去北京，当他的理论学习辅导员。肖木是写作组的主力，有理论水平，笔头又好，文采风流，徐景贤当然舍不得他走。但是王洪文指名要人，他不得不放。肖木帮王洪文订了一个学习马列著作的计划，每天共同读两小时，工作再忙，雷打不动。

王洪文看到毛泽东认真学习英语，他也仿效起来，又通过徐景贤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物色到一位姓黄的英语教员，调往北京，辅导他学习英语。

王洪文很快适应了中央高层的工作习惯。实在闷得慌，他就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的电话记录：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3点出去，夜里3点回来。我看不进书。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了，“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文。”

毛泽东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9月2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第 1255 回：“言必信”，中日、中德建邦交 批极“左”，《文汇报》提出质疑

9月20日，周恩来单独会见受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之托，带来日方准备的联合声明草案的古井喜实。周恩来就这个草案发表意见。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关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华的公告。

9月25日，田中首相一行应邀访华。9月25日晚，周恩来为田中举行欢迎宴会。

田中在宴会致词时谈到日本历史上侵华战争时表示：“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



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多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

田中解释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

周恩来强调，“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

田中表示，“我们两国之间需要互相理解，应当寻找能为两国国民所接受的表达方式。”

9月25日,26日,27日,周恩来同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举行三次会谈。

9月27日晚饭后,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通知日方:“今晚8时或9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

20时刚过,周恩来前来国宾馆,亲自陪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前往中南海。

到了中南海游泳池,田中一进门就提出要到洗手间去一下。

当田中一行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迎上去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田中显得十分的拘谨。毛泽东一边与他握手一边说:“欢迎你,我是个大官僚主义者,见你们都见得晚了。”

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二阶堂进分别说了自己的姓名,并说“能见到毛主席感到很荣幸。”

毛泽东用日语说:“谢谢!”接着问道:

“怎么样,吵了架吗?总要吵一些,天下没有不吵的。”

“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田中首相很有礼貌地说。

“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毛泽东说。

周恩来在旁插话说:“两位外长很努力。”

“是的,两位外长很努力。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田中首相也补充了一句。

毛泽东侧过脸,对着大平外相说:“你把他打败了吧?”说着,他用手指了一下坐在周恩来旁边的姬鹏飞外长。说完哈哈一笑。这笑声顿时也感染了在座的其他人,大家都笑了起来。

“没有,我们是平等的。”大平外相不好意思地连忙解释。

田中首相接着大平外相的话说:“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

“那就好了,天下太平。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毛泽东问。

“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田中说。

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

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田中说：“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来。”

毛泽东说：“美国好一点，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二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毛泽东问：“你看这个世界怎样呢？”

田中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大国想用实力政策进行侵略的做法到极限了，所以现在世界进入了新的谋求和平、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时代。”

毛泽东说：“不错。”

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

毛泽东说：“是啊，他先来了嘛。”

毛泽东问：“两国联合声明什么时候发表？”

周恩来说：“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

毛泽东说：“你们速度很快啊。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而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对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

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陪同会见的除周恩来、姬鹏飞外，还有外交部顾问廖承志。

当廖承志讲到他出生在日本时，毛泽东同田中开玩笑说：“你们如果要，把他带回去嘛”

田中也笑着说：“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对周总理说，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肯定可以当选。”

毛泽东说：“那他到日本去当参议员好了，好不好？跟你开始谈判吧！”

田中说：“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

毛泽东说：“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

周恩来：“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

田中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

毛泽东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了书，你看，”他指着周围书架及书桌上堆积的书籍，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这是《稼轩》，那是《楚辞》。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送给你。”毛泽东指着书橱上六卷本《楚辞集注》说。

原来，田中在宴会上说的那句：“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其中“添麻烦”一词，日语是“迷惑”めいわく，汉语拼音读 meiwaku，汉语意思是“添了麻烦。在《楚辞·九辩》中有“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那是“迷惑”一词的源头。

田中收下书，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住地点头说：“多谢，多谢。毛主席知识渊博，还这样用功。我不能再喊忙了，要更多地学习。那么，祝您健康长寿。”

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的，话题涉及政治、历史、文化、哲学、生活，气氛友好、轻松、活跃。

此次田中角荣访华，特地赠送毛泽东一份国礼，是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的风景画作《春晓》，其意义应该是：中日之间明媚的春天即将开始。

9月28日，周恩来和田中首相举行第四次会谈。

周恩来：“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讲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

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话：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种精神。”

周恩来当场将“言必信，行必果”写出交给田中。

田中也将日本旧宪法上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写成汉字交与周恩来。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批准中日联合声明草案。当天，田中首相举行答谢宴会。

9月29日上午10时，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联合声明》说：

“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关于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的条款，周恩来后来对大家说：这是主席决定了，不向日本索赔了。为什么不索赔呢？实际上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中国人民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比如庚子赔款为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实际上等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从这个角度，觉得战后的日本，也是从战争的废墟当中重建起来，重新发展经济的，尽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他们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了。但是赔款毕竟还得从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来，是在加重老百姓的税赋。

对日本的侵华战争，《中日联合声明》中的表述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9月29日，日本外交大臣大平正芳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

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宣告结束。

这天，周恩来陪同田中首相到上海参观访问。第二天，周恩来送别田中首尔回国。

9月29日这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会谈也顺利结束，外交部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在波恩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顺利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姬鹏飞邀请联邦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联邦外交部长接受了这一邀请并将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十日至十四日访问北京。

在访问期间，两国外交部长将签署和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的联合公报。此外，联邦外交部长将同中国政府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进行会谈。

10月11日，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

9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室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批语要求各单位认真检查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爱国人士3种人的住房情况，并规定住房被挤占的，原则上应予退还。

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作的调查指出，这4所学校中的老干部（副部长级以上）、高级知识分子（三级教授以上）、爱国人士（全国人大、政协常委以上）共有208人，文化大革命前原有住房1036间，20105平方米。文化大革命中，住房被挤占的有189户191人，占上述3种人总数的91.8%。被挤占住房508间，共10101平方米。此外，这4所学校的9至12级干部中还有17人被挤占住房88间，687平方米，占原住房面积的41%以上。

10月6日，周培源《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登在《光明日报》上。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

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篇文章，原来是为《人民日报》撰写的。文章写成后，周培源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陪同周恩来接见外宾时，曾想请周恩来审阅一下。

周恩来问：“文章有多长？”

周培源说：“有 5000 多字。”

周恩来说：“来不及看了，你就拿出去发表吧。”

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在审稿时认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样的文章，会干扰“批林整风”，就把它批到《光明日报》发表了。

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一篇是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一篇是署名“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还有一篇是署名“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批判无政府主义。

事情的起因是1972年3月，国务院领导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省的领导，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几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时，提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于是，黑龙江省委写作组根据国务院这几位领导的讲话精神，写了一篇文章，署名龙岩，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另外配了两篇文章，组成一块版，都是反“左”的，颇有声势。当时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的王若水审定后，交当时《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认可，于10月14日，在理论版上发出去了。

这块版立刻引起广泛关注。法新社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龙岩文章是为老干部说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同时上海方面也打电话向鲁瑛查问：文章作者是谁，谁组织的，谁审定的，送给谁看过。还说“上海工人反映强烈”。

11月4日，上海《文汇情况》312期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个版的报道，说这一版的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群众”。《文汇情况》一连发了三期，最后一期说，这篇反无政府主义文章，全国有九个省市报纸转载，八个报纸虽未转载，但也跟着发了反无政府主义文章。

姚文元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给《人民日报》，随后又将

《文汇情况》转到《人民日报》，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当时理论部党支部书记是胡绩伟，管业务的是王若水。胡绩伟对王若水说：“怎么讨论啊，同意吧，它是错的；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怎么好反驳？”

他们把“球”踢到看大样小组，让他们先讨论。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4次，也没有结论。姚文元没有办法，只好让大家学习中央文件。这下好，不学则已，一学反而更理直气壮了。1972年26号、31号、38号、42号文件，多次提到反无政府主义。而且，姚文元自己主持的《红旗》杂志1972年第11期中，也有反无政府主义的内容，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

于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出来了：批林到底批什么？《文汇报》说要批右，11月6日，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几天后，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

第1256回：再商议，整理江青记录稿 湖南省，解决卜占亚问题

10月末的一个下午。王海容又找到陪江青会见维特克的张颖说：“首长把你们整理的记录都看过了，大发脾气，说是整理得不像样子，你们是怎么搞的嘛。”

张颖：“我不是把广州根据录音整理出的原记录送给你看了吗？而我们又一字不差地核对过一遍，连一个字都不差，这你很清楚呀。她的谈话一字不改就是这样。”

王海容说：“别的事我也管不了。我是来告诉你，今晚6点你和徐尔维到首长那儿去，该怎么办，你去听她的。而且首长吩咐，这件工作还得保密。”

张颖和徐尔维来到钓鱼台，江青对她们说：“你们都坐下。整理的记录我看过了，不行。完全照录音，有些地方就不通顺了，得重新整理，我亲自修改。你们不懂，把张局长也请来，他也可以出主意修改，你们作记录好了。”

总参张清化局长来了。江青一见他就说：“老张，还是得把你请来，因为你是我的参谋，关于记录的事，还得请你来办，你知道，她们都不懂战争，而第一次谈的就是西北战场，没有你怎么行。”

张清化说：“首长，核对录音的时候，我也参加了的，初稿校对，一字不差，但是还得修改，特别是文字润色。”

江青：“那太好啦，那就不光是西北战场了，全部记录修改，你都来参加，我已经对她们两个说过了，我们修改，她们作记录，这样会比较快一些。”

这时张清化才看见张颖她们坐在对面一个角落，不无歉意地走过来和她们握手，并说：“我们一起修改，一起修改。在文字润色方面，她们比我强，今晚我们先试试看，您看可以吧？”

在座4人，各人手里拿着一本铅印好的记录稿，开始修改记录。

徐尔维一句句念，江青手里拿着铅笔，在那份记录稿上圈点划线，不时停下来议论一番，然后在记录稿上改过来。到午夜时分，还没有改出几页来。突然江青叫停住，她站起身来，伸伸腰腿：“唉呀，都过 12 点啦。”她在椅子扶手上按铃，随即进来一位女服务员。江青吩咐：“带她们两个到大食堂吃夜宵。”

吃完夜宵，江青看见张清化局长自己在看那份记录，高兴起来，对张清化说：“哎，这份记录呀，请你先整理一遍，我们再一起来修改，好不好？这样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了。我忙，维特克女士还等着这些记录写书哩。”

张清化点头表示照办。江青又对张颖她们说：“你们随时听候招呼，随传随到，今晚就散了吧。”

张清化用他的汽车把张颖她们送回家。

3 天后，张清化、张颖、徐尔维 3 人又被召到钓鱼台 10 号楼，还是修改记录稿。这一次顺利多了。因为张清化已经改过一遍，把段落整理清楚了，江青表示很满意，只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或者江青提出某些地名要核对，或者哪些人的名字应该出现在记录稿上等等。到凌晨 1 点多钟，西北战场部分的记录就完成了。江青十分高兴地对张颖说：

“小张，这部分记录今晚就算定稿了，你带回去交给外交部，铅印 10 份，编号留底，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请他们审阅。周总理那份我要亲自送去，外交部就给乔副部长一份吧。小徐，这份稿子不会有太大修改了，你可以着手翻译成英文，你就定稿吧，反正是送给维特克女士参考用的。都记住了吧？”

大家正要出门时，江青又说：“小张，我看张局长先整理一遍的办法很好，有一些个别部分你也可以照他的办法，把容易整理的先修改一遍，整理出来。比如关于《红楼梦》的部分，你可以先整理，把故事情节、时间顺序、诗词等等都与原书核对清楚。还有关于上海文艺那些，都可以先整理，这样我修改起来就省时间多了。”

一天，徐尔维对张颖说：“我说老张，从广州回来以后，你还没有向周总理汇报过吧？既然部领导不敢说话，你应该向周总理汇报，如果一点不向上级反映，那倒不对了。你去见总理也不是难事嘛，我想甚至可以反映我们大家的意见。”

张颖也觉得,找周恩来谈一次是应该的。于是她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请秘书转达,希望能有机会见见周总理。

周恩来的秘书请示后,通知张颖去西花厅。当张颖走进西花厅时,看见周恩来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他见张颖进来,花镜拿下来问道:“你们回来好多天了吧?我没时间找你问问情况。你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先说说吧。”

张颖说:“如果要简单,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60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

张颖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周恩来笑起来:“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今天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

说完,周恩来朝客厅那边喊邓颖超,张颖也走进那客厅。

邓颖超招呼张颖,让她慢慢说。

张颖和邓颖超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那天下午,她们谈了整整3个小时。

过了几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召开一个专题性会议,外交部张颖也参加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张颖招手,随他一起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进屋后,张颖看到办公桌子上堆满了书报和待批阅的文件,最显眼的地方摆着她们整理过的铅印好的江青谈话记录稿“西北战场”部分,江青亲笔写着“请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的字样。张颖轻轻坐在周恩来对面的小椅子上。

周恩来说:“那天我实在忙,没有听你的汇报。不过小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你和徐尔维是否还在整理记录呢?”

张颖点点头,接着说:“除了我和徐尔维,还有总参测绘局的张局长,他说比我们早到好几天,那些地图和材料是他预备的。”

周恩来:“啊,他也在广州吗?现在也一起整理记录?”

“关于西北战场这部分,是张局长先整理,又和江青同志一起修改,我和徐作记录,记他们商量好的定稿。”张颖回答。

接着,张颖说:“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

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周恩来说。

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恩来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

当年11月间,维特克从美国寄来数幅已经放大的江青彩色生活照片。维特克说她已经写好了一篇报道江青的文章,准备登载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封面就用江青的彩色照片。由江青选择其中的一张,并盼赶快把所有记录稿寄去,以便她着手写书。江青收到照片后,打电话到外交部,把参加会见维特克的几个人,用一辆面包车拉到钓鱼台10号楼。

张颖他们到了10号楼,看见江青心情极好,她那张大大的长方形办公桌上,摆满了江青的照片,有维特克寄来的,也有不是维特克寄来的。江青让张颖他们帮助她挑选。

一天下午,周恩来召开了一次会议,把所有参加过接待维特克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专门讨论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记录如何处理的问题。他征求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表示,这份记录无需送给维特克女士,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的。而维特克女士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后边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要逐一核实,得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而且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

周恩来一言未发,只是在会议结束前说:“对这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很好。但今天还是决定不了,还需要商量和请示。”

他对张颖和徐尔维二人说:“你们继续去作记录,根据江青同志的要求整理和修改。”

1972年岁末,周恩来又召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

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第二天,张颖、徐尔维、于世莲把在北京的所有记录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

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记录稿一事算是告一段落。

1972年10月19日,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在广州接到北京汪东兴给他打来的电话,说是“毛主席有事和你们商量”,随即派专机把丁盛和广州军区政委任思忠接到北京。他们刚到北京京西宾馆不久,汪东兴便来了,对他们说:

“卜占亚在湖南出了问题。”

说着,将几份揭发卜占亚的材料交给丁盛和任思忠,要他们认真阅读。

稍后,周恩来、叶剑英也来了,交代他们两人这次来京的任务,要求他们协助中央解决好卜占亚的问题。

汪东兴带来的几份材料都不长。其中两份是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写的:一份控告卜占亚不重视接待处的建设,对工作人员态度恶劣,而接待处是为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的,这表明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缺乏感情;另一份说,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蓉园休息时,卜占亚对老人漠不关心,很不尊重,卜的妻子、接待处副处长谭淑珍又偷看老人的笔记本,惹得老人很生气。

还有一份材料,是摘抄林立果“小舰队”成员李伟信笔记本上写的,提到卜占亚是他们“信得过的人”。

几份材料只用个把小时便看完了,丁盛和任思忠悄悄议论,觉得前面两份材料实在上不了大“纲”,李伟信的笔记也不难查清,对卜占亚的审查这么兴师动众,是否有些小题大做呢?

第二天,10月20日,由华国锋出面,召集丁盛、任思忠和刚从朝鲜访问归来途经北京的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研究如何解决卜占亚的问题。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也来参加研究。华国锋和杨大易揭发了卜占亚的一些问题。丁盛和任思忠什么也没揭发出来,只是一再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积极配合中央把卜占亚的问题早日查清。

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约见来京参加解决湖南问题座谈会的广州军区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就解决湖南问题打招呼。

10月21日晚上，周恩来和叶剑英又来到丁盛、任思忠住处，说毛泽东今晚要接见他俩，稍后就会有电话通知。电话果然来了，周恩来去接。几分钟后，周恩回来对他们二人说：“主席认为你们两个对卜占亚的态度很明确，他很高兴，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是他还要我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还有没有必要接见？”

任思忠认为见一见好，有些问题可以当面请示明确一下。丁盛却认为，“主席倾向于不再接见，我们尽量不要干扰他老人家，不接见也可以”。丁盛过去是任思忠的上级，任思忠不好再坚持自己意见，于是周恩来马上按丁盛的意见与毛泽东通话，决定不再接见。

大局已定，周恩来便来组织落实。他把华国锋、丁盛、任思忠、杨大易召到一起宣布：对卜占亚问题的讨论到此结束，下一步回湖南具体解决他的问题。决定此事由华国锋牵头，丁盛、任思忠协助，共同负责领导；湖南省委负责具体工作。

丁盛首先提出：“总理，我参加领导怕不合适。”

“为什么？”

“我和他是20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参与领导对他的审查多有不便。”

“噢！你这是要避嫌哪！”

“该避的还是避一避好。再说，我参加进去效果也未必好。”

周恩来迟疑片刻：“那丁盛同志就不参加了。任思忠同志，你可以吧？”

任思忠说：“总理呀，我和丁盛同志的情况是一样的，我同卜占亚也是长期在一个部队工作的老上下级关系。我也不参加了吧。”

周恩来真为难了。但是两个人反映的情况不能不予重视。他终于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决定：“那就都算了吧。不过，你们两人要和华国锋同志到长沙走一趟，和省委、省军区的同志见见面，讲讲话，表示对华国锋同志的支持。中央明天就派飞机送你们回去。”

10月22日，周恩来等领导人出席湖南问题座谈会。在谈到“三支

两军”问题时，周恩来说：“三支两军”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林彪的一套做法助长了军队干部的骄气，党、政、军有好些好作风被破坏了。要认真进行教育，纠正不正之风。在会上还批评了军队党委凌驾于地方党委的错误做法。

当晚，周恩来继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参加湖南问题座谈会成员回去后继续做工作，以推动湖南全省批林整风进一步深入。

丁盛、任思忠和华国锋一起来到了长沙。10月22日下午，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接到通知，要他晚上到蓉园1号楼开会，但没有告诉他会议内容。卜占亚感到奇怪：华国锋不在长沙，他是湖南省的最高领导，怎么反而是别人叫他去开会？

当晚，满腹狐疑的卜占亚来到会场，一进门便目瞪口呆。会场鸦雀无声，参加会议的是省委常委和省军区领导，大家都把异样的眼光投向他。只见华国锋绷着脸端坐在主席位上，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任思忠坐在旁边！

没人和卜占亚打招呼，他在有意留给他的座位上刚坐下，华国锋便讲话了：“我和丁司令员、任政委受中央委托，专程来长沙解决卜占亚同志的问题。卜占亚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追随林彪反党集团，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913’事件后，中央耐心等待了他一年多时间，可他执迷不悟，始终不肯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企图蒙混过关。现在中央不得不直接处理他的问题，最后给他一个机会。希望他认清形势，丢掉幻想，老实交代，不要自绝于党和人民！”

华国锋宣布要卜占亚交代的主要问题是：积极参加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向李作鹏泄露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仇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刁难、赶走叶剑英元帅，苛待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冷落、仇视张春桥；拉山头，搞宗派；捂盖子，不批林。

他给卜占亚一天准备时间，要求他24日在省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上作交代。

华国锋请丁盛和任思忠讲话。丁盛首先说明，他和任思忠是去北京受领任务后，奉命和华国锋一起来解决卜占亚问题的。他虽然对具体情况了解不多，但从华国锋揭露的许多情况看，卜占亚的问题确实很严重。他代表广州军区坚决拥护中央对卜占亚进行审查，支持华国

锋对清查工作的领导。军区将积极配合湖南把卜占亚的问题彻底查清。他希望与会人员积极对卜占亚进行揭发批判,也希望卜占亚端正态度,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任思忠除了表示赞同丁盛的意见外,还特别指出:“你卜占亚同志犯错误绝不是偶然的,这和你的骄傲自大是分不开的。你这个老毛病要不彻底改正,将来还要摔大跟头!”

卜占亚一时有些发懵,不知道此时此地该怎样说才好。最后,他终于表示:拥护中央对他的审查决定,老老实实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

第1257回：要交代，如何连接北西东 谈问题，概括为“三专一通”

10月24日，卜占亚吃过早饭，来到会场，惊奇地发现，到会的除省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外，还有接待处的科长和3个女服务员。

华国锋又讲了一遍卜占亚问题的性质、重点和对他的政策以及会议开法，便要卜占亚作交代。

卜占亚还没讲完一个问题，接待处的科长就打断他的话说：

“不要讲了！你讲了半天，根本就没涉及要害问题！你不是什么思想认识问题，更不是工作中的错误，你的要害问题是投靠林彪反党集团，积极参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你到湖南来就是为林彪集团夺权的！”

接着，这位科长举了个卜占亚“仇恨毛主席”的例子：

“去年冬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兄王老住在蓉园1号过九十大寿，你不准给老人家生暖气，差点儿把王老给冻病了，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你还限制王老的行动，不准他接触群众，怕群众向王老揭发你的问题；你老婆谭淑珍也怕王老搜集整理你的罪行材料，居然偷看王老的笔记本……”

王老即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1971年冬，华国锋从北京打电话给省委布置任务：王季范要到长沙过九十大寿，省委要把他安排到蓉园，保证他住好，吃好，休息好……

卜占亚不敢怠慢，亲自布置接待处做好接待工作。王季范到长沙时，陪同的亲属有他的儿媳，即王海容的母亲肖凤林和王季范的孙子、王海容的弟弟王启华，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人还没到，取暖锅炉就烧起来了。直到老人离开长沙，暖气一天没断，怎么会有接待处科长说的“不准给老人家生暖气”的事情呢？

说到谭淑珍偷看王季范笔记本一事，据说是王季范生日那天，卜占亚和省委常委于明涛、孙国治、万达等人到宾馆向老人祝寿，并举办

了寿宴。谭淑珍作为接待处负责人，在现场照料。参加宴会的领导人都劝她入席，因为是卜占亚主持宴请，她没有露面。开始上菜后，她便坐在王季范的房间内，翻看桌上放着的一本诗集。后来，谭淑珍谈起这段，还生气地说：“王海容的爷爷已经是 90 的人了，哪里还记得什么笔记！我又怎么会知道他的笔记本里有卜占亚的材料！”

接着，3 个女服务员也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揭发，并讲了王海容安排她们去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卜占亚问题的过程。

原来，1972 年 9 月，中央专案组看到李伟信笔记本上在“信得过的人”中写有卜占亚的名字，于是展开调查。湖南省委接待处的一些人来到北京，其中就有接待处的这 3 个女服务员。

这些人到北京后，写了三份关于卜占亚的材料，两份是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写的，控告卜占亚不重视接待处的建设，对工作人员态度恶劣。另一份就是说王季范在蓉园休息时，卜占亚对老人漠不关心，很不尊重，卜占亚的妻子、接待处副处长谭淑珍偷看老人的笔记本，惹老人生气。

女服务员在揭发时说，她们在北京时，专门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了卜占亚的问题。毛主席说卜占亚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临走时，毛主席还送她们每人一部半导体收音机，握着她们的手说：“回到长沙，你们把收音机音量开得大大的，向他们示一示威！”那个时候，半导体收音机可是一般人看不到的。

卜占亚听了这几个女服务员的发言，犹如天方夜谭，将信将疑。但是，旁边坐着中央首长华国锋，他脸上并没有丝毫讶异和不快之色，卜占亚又不能不信。

当天散会后，卜占亚便被指定住在会场旁边的一个房间，吃饭由服务员送到房内，楼门口站有岗哨，只允许他在楼内活动。

会议连续开了 9 天。到会的省委和省军区的领导干部都发了言，华国锋向卜占亚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讲到了。一些重点问题，反反复复被提出。但是，卜占亚对任何一个问题的交代检查，都未被认可和通过。

华国锋作总结讲话时认为，卜占亚态度很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要他打掉幻想，认真思考，准备在更大的范围检查交代。

两天后，召开省委、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华国锋以中央代表身份讲话，然后叫卜占亚上台交代。开会的人多了，会议的气氛、温度也与前一个会议有很大不同。卜占亚上台讲了还不到 10 分钟，便被轰了下来，由几位领导干部带头揭发。

扩大会议开了 10 天，卜占亚仍然只肯承认错误，拒不承认和交代阴谋、罪行。华国锋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召开全省县团以上干部会议，深揭狠批。

大会在省军区礼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 1000 多人。除县团级以上干部外，到会人员中还有几年来卜占亚所到过的各大小单位的领导或代表，他们的任务是揭发卜占亚在这些单位的“放毒罪行”。会议的开法与前两次相仿，只是“温度”更高。为了制造气氛，会场楼上楼下安了很多扩音器，不断有人抢麦克风，连揭带批加质问，有的还要求当场交代、表态。

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政委张立宪揭发，1969 年底，经毛泽东批准，广州军区新组建并部署在湖南的 145 师、146 师两个陆军师是林彪准备用于政变的“黑部队”！此言一出，一片哗然，有人高兴，有人气愤。146 师师长蒋金流和师政委陈怀琛一合计，以师党委名义给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对这两个师的性质加以澄清，否则他们无法保持部队的稳定。与此同时，部队也反应强烈，纷纷向省军区提出质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位领导人又被迫承认他们讲错了话。

在与会人员发言时，华国锋不时插话，引导会议方向。他在一次插话时说，林彪有一个反革命战略布局：西面的负责人是云南的雷远高（省军区政委）和贵州的蓝亦农（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省革委会主任）；东面有江西的程世清（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北面是河南的王新（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在中间，连接东西，贯穿南北，地位最为重要；再加上北京有个韦统泰（七机部军管组组长），是林彪的“情报部长”。这是林彪进行政变阴谋的基本班底。华国锋指名道姓地点了林彪在全国东、西、北、中各处的党羽，南面是谁？也许时机未到，他打了个哑谜。但是，谁不知道湖南的南面是哪里呀！

除了会上引导，华国锋还在会外与参加会议的省委、省军区领导

一一谈话，还把 145 师、146 师和湖南省军区独立师的师长召到一起，讲卜占亚的问题，动员他们揭发批判。

要求卜占亚交代的核心问题是参与林彪政变阴谋。而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专一通”。

“三专”即专列、专线、专人。据揭发，卜占亚早就得知林彪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他想当林彪的“开国功臣”。1971 年 9 月 10 日，卜占亚率全省地、师级以上干部去汨罗参观，但唯恐误了“大事”，为了保证能及时赶到广州，他特地下令调用一列专车，停在汨罗火车站随时待命，这就是揭发的“专列”问题；在汨罗期间，他为了与林彪那边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特地架设了专线电话，即所谓“专线”；与此同时，他又把自己的老婆谭淑珍先期派往广州，准备接待林彪，即所谓“专人”。

“一通”即卜占亚向李作鹏通风报信，泄露了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李作鹏又将此事火速密报林彪，引起林彪恐慌，提前发动政变，事败，仓皇驾机出逃，成为“913”事件！

专案组抓住“三专一通”这个要害问题穷追不舍。专案组在要卜占亚交代的同时，又根据揭发线索，展开调查取证。但是，卜占亚死不承认，取证工作也很让专案组泄气。

首先是“专列”问题。据专列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省委党委办公室主任阎文超提供的情况：去汨罗参观，原计划乘坐汽车。临出发前两天，卜占亚把李振军和阎文超找去商量：8 月底、9 月初因为接待毛泽东，接着又是将毛泽东南巡讲话精神向干部“吹风”，致使学习班的学习时间超出计划。去汨罗参观，如乘汽车，因这段公路路况差，又要耽误半天时间，而且汽车多了容易出事，不如改乘火车，可以晚间出发，在车上睡觉，省出半天时间。阎文超认为汽车已备好，改乘火车组织准备工作也很麻烦，以不变为好。李振军没有吭声。卜占亚最后决定：“这样吧，你们把铁路局军代表找来，请他们根据情况决定，争取坐火车去。”

军代表表示改乘火车无大困难。两天后，长沙铁路分局按要求挂了几节车厢，把学习班全体人员送往汨罗。在汨罗期间，卜占亚再未过问火车的事，更未指示将火车留在汨罗“待命”。此事的几位主要经办者说法一致。

再看“专线”的调查情况。卜占亚的秘书叶子鸿证明：卜占亚作为湖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和省军区第一把手，外出到一个地方住下，为了保持与机关的顺畅联络，照例都是要架设专线电话，不需首长交代。卜占亚在汨罗期间住在县武装部。出发前，叶子鸿主动通知省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张处长，要求沟通汨罗县武装部与省委、省军区的专线电话。这条专线不通北京，更不知道如何与北戴河的林彪联络。

最后再说“专人”问题。据谭淑珍本人陈述，她到广州带有很大偶然性。9月初，她们刚刚完成接待毛泽东的任务，广州军区招待处处长张小军便带着两名干部来到湖南省接待处，学习湖南接待毛泽东的经验。其实广东的接待任务比湖南重，经验自然比湖南丰富。湖南接待处的工作人员都很想到广州看看。大约是9月1日，接待处政委王信对谭淑珍说：“老谭，你对广州熟悉，就由你带几个人去广州参观学习吧。”于是谭淑珍带着接待处的一名科长、一名服务员和两位厨师，一行5人于9月12日夜乘火车出发，于13日中午抵达广州。这4个人都有名有姓，可以调查。

他们到广州时，丁盛已经接过周恩来的电话，整个军区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丁盛一早便进入军区指挥所。而这天下午，不明就里的谭淑珍喜孜孜地去拜访丁盛夫妇，只有丁盛的妻子孟文虹和秘书在家。秘书一见到谭淑珍，便“唉”了一声问：“你这时候到广州来干啥？”

谭淑珍说：“我是来参观学习的。”

秘书问：“卜政委知道你来广州吗？”

谭淑珍说：“他到汨罗去了，我没告诉他。”

秘书说：“他已经回长沙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虽说彼此都是熟人，谭淑珍还是因秘书这番没头没脑的话而深感不快。不料，紧接着丁盛的妻子孟文虹又让她一头雾水。她们见面还没有寒暄几句，孟文虹便小声嘱咐她：

“你早点回去吧，今晚哪儿也不要去了！”

谭淑珍满腹狐疑地回到住处，和几个随行人员研究了一番，最后决定，既然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去。

9月14日、15日两天，广州军区招待处处长张小军陪同谭淑珍等人先后参观了白云山下老虎洞为林彪修的房子，新建的南湖宾馆和珠

岛宾馆毛泽东、江青的住所。这中间，谭淑珍还带领她的几个部下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看了广州市容。在参观过程中，张小军悄悄告诉谭淑珍，最近战备形势紧张，军区首长都进了指挥所，以后他也可能没有时间陪她们了。15日晚，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杨梅生夫妇请谭淑珍吃饭，她便在那里给卜占亚打了电话，卜占亚也催她赶快回去。当天夜间，谭淑珍便带着科长和服务员返回长沙。两位厨师则留在珠江宾馆学习粤菜技艺，半个多月后才回长沙。

谭淑珍来广州参加接待林彪问题可是个大案，“913”事件后组建的广州军区清查办公室查得也最仔细。谭淑珍在广州一共呆了50多个小时，经过反复排查，从头到尾，几点几分，她在哪里，干什么，都查得清清楚楚，都有人可以证明。结果什么可疑问题也没发现。她就是来广州参观学习的。可是时间上那么巧合，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情！

“一通”问题，说的是1971年9月4日，李作鹏陪同外宾到韶山参观，卜占亚作为地主去大托铺机场迎接。李作鹏共在长沙、韶山停留22个小时。有人揭发，卜占亚在这段时间里，与李作鹏进行了4次密谈，向李作鹏泄露了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导致林彪决定提前发动武装政变；李作鹏也向卜占亚作了“路线交底”，甚至告诉他“林副主席最近可能到广州”，叫卜占亚“思想要有准备”。

卜占亚辩解说，专机降落后，他便以主人身份陪同外宾赶赴韶山，李作鹏乘坐另一辆车，两人根本没机会说话。下午从韶山返回长沙，李作鹏和外宾都住湖南宾馆，卜占亚把他们送进房间便告辞了。但以后有人揭发卜占亚就在这时同李作鹏进行了“第一次密谈”。当晚举行宴会，卜占亚到李作鹏房间请他赴宴，免不了又讲些客套话。有人说这是“第二次密谈”。宴会之后又参加晚会，晚会结束时卜占亚把李作鹏送回住处。李作鹏已相当疲劳，卜占亚匆匆辞出。又有人说这是“第三次密谈”。次日8时左右，卜占亚去宾馆送行，这时李作鹏已吃过早饭，正坐在大厅的沙发上休息。卜占亚也坐到沙发上和李作鹏闲谈，一起等候外宾。大约十多分钟，外宾来了，卜占亚便陪他们一起去机场。这就是“第四次密谈”。

卜占亚说，他与李作鹏过去没在一起工作过，也没有私人交往，这次李作鹏陪外宾到湖南来，几次短暂交谈都是礼节性的，李作鹏从未

向他打听毛泽东来湖南巡视情况，他又何必主动透露？

其时，李作鹏在“913”前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听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讲的。

关于卜占亚“怠慢叶帅”和“仇视春桥同志”的问题，是指1970年春，卜占亚刚到湖南时，叶剑英住在蓉园1号，他没有去主动谒见。在批斗卜占亚时，有人说，因为叶剑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卜占亚对他特别仇恨。有人揭发，卜占亚刚到长沙，去蓉园洗澡时，别人问他去不去看叶剑英？他鄙夷地说：“看他干啥，不看！”

又有人揭发，叶剑英离开长沙，是被卜占亚赶走的。事实是，1970年5月7日晚，华国锋通知卜占亚到九所4号楼开个小会，华国锋说，他接到汪东兴从武汉打来的电话，毛泽东明晚要来长沙，要求明天上午便把毛泽东住的6号楼准备好。他特别提到：“汪主任讲，听说叶帅现在住在蓉园，万一主席要到那里散步，碰见怕有不便，最好把他迁出长沙。”

此事本来是与卜占亚无关的。但此时要揭发他的问题，自然也就算在了他的身上。更有人揭发说：“叶帅走时少交了2两粮票，卜占亚还派人追讨。”

卜占亚与张春桥可谓素昧平生，如果不是到湖南支左，也许永远和他挂不上钩。

1971年7月14日，卜占亚正在涟源钢铁厂参加现场会议。忽然省外事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张春桥将于次日陪同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湖南，外交部指定由卜占亚出面接待。卜占亚考虑会议已到最后一天，总结不能不作，而总结稿又是他自己写的，不能由别人代讲，便提议改由杨大易出面接待。省外办将他的意见上报，外交部不同意。他不甘心，要省外办再次请示。外交部终于勉强同意。

张春桥陪同朝鲜党政代表团在韶山参观时，曾指出韶山毛泽东陈列馆第五展室的《遵义会议放光芒》油画存在问题，说画面的“这样安排恐怕不符合历史实际。其实当时的情况连外国人也知道一些，没有这个场面，也不可能出现这个场面。那时候比较出名的是王稼祥、张闻天。当然不能出现他们啰。当时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周总理还没有这样的关系。这幅画在北京流行时，总理看到后不同意这样安排。说

当时他也是受批评的嘛。这幅画要很好地改一改。在遵义会议上不可能林副主席和周总理站在毛主席左右嘛。”

《遵义会议放光芒》是仿照文革期间那幅著名的毛泽东与林彪井冈山会师的油画而成，毛泽东在画的中央，林彪在毛泽东的左边，周恩来在画的右边。这也是当时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唯一的一幅有林彪的画。

1971年5月13日下午，韶山正下着雨，细雨霏霏。邱会作和一行解放军的干部、战士，用了两天时间，从长沙走到韶山。韶山人上上下下都为解放军精神所感动，夹道欢迎，表示要“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邱会作当时摇摇头说：

“我们是奉林副主席的指示来韶山学习的。韶山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家乡，是红太阳永远不落的地方，我们早就想来了。军内的斗争一个接一个，先是罗瑞卿、贺龙，后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党内、军内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有熄灭呀。”

邱会作在韶山说话不多，手中始终捧着《毛主席语录》，在毛泽东故居门前、韶山毛泽东陈列馆门前、当时的第五展室《遵义会议放光芒》巨幅油画前各照了一张相。

对张春桥要求把《遵义会议放光芒》撤下来的意见，杨大易后来请示卜占亚。卜占亚稍加考虑后说：“这类事情要慎重。再说，把这幅画撤下来，一时又没有别的画补上，墙上空一大块，参观者问起来也不好解释。我看暂时先不要动。”

但是张春桥在离开韶山时也再三叮嘱，《遵义会议放光芒》那幅画要换一张，下个月他要派人来检查的。

韶山毛泽东同志陈列馆还是很尊重历史的。他们将《遵义会议放光芒》画换了下来。张春桥果然也在8月5日从北京派人前来检查。

1971年9月4日上午，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参观韶山毛泽东故居和毛泽东陈列馆。在第五展室，李作鹏没有看到邱会作曾经照过相的那幅《遵义会议放光芒》油画。他悄悄地问身旁陈列馆的一位小伙子吴大为，建馆后陈列馆展室有几次改动？吴大为扼要地作了汇报，特别提到张春桥的建议。李作鹏边听边点头。

在批判卜占亚时，将这些事情串联起来，似乎就有问题了。有人说，卜占亚不肯出面陪同张春桥，是因为张春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决捍卫者”，他“仇视春桥同志”。对于不肯撤换韶山展馆的油画问题，说他是“抗拒中央首长指示”，实际上还是爱谁恨谁的问题。

这自然又在会上引起公愤。

第 1258 回：批王新，王若水上书被批 毛泽东，逐步解放老干部

1972 年 9 月 7 日至 10 月 15 日，河南省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河南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王新。会议一结束，又都到北京。

1972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 日，河南省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在北京召开。河南省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和驻豫部队三个军负责人 30 余人参加。江青、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王洪文到会。

北京汇报会结束时，形成《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河南省问题的报告》。这个文件当日呈报党中央、毛泽东。3 天后，中共中央以中发〔1972〕42 号文件形式，批准了这个《报告》。毛泽东批示：“同意”。

河南省的《报告》写道：

“王新伙同刘丰攻击和陷害省委几位负责同志，阴谋篡权。他背着党中央和河南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省军区党委，两次向刘丰等人送陷害刘建勋同志的黑材料。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正在筹备召开九大的时候，王新把一份写有同名人刘建勋名字的敌伪档案材料交给了刘丰和黄永胜、吴法宪。第二次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新将刘建勋同志的所谓五·一六问题的两份材料带上庐山，送给刘丰。”

“王新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不断传播：‘林副主席有指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革命的成果有被小资产阶级抢走的危险。’他甚至到了林贼叛党叛国的九一三前夕，还猖狂叫嚣‘现在是小资产阶级干扰，争夺领导权。’‘这个命不革不行。’”

“王新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他通过省军区个别人，指示军分区党委考核、建立地、县委，胡说什么要把地方党委‘军起来，’‘要占领阵地’。”

“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竭力扭转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的大方向，硬

说‘河南的主要矛盾是派性’，大批所谓‘派党论’，他利用‘批陈整风’、‘整顿机关’和‘清查五·一六’之机，把派性与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混为一谈，把造反派与极左思潮，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同起来，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对许多地方新老干部和军队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72年11月，张春桥回沪。他听取了上海市革委会各组办汇报工作。在汇报上海清查“516”的问题时，这项工作的负责人王绍玺首先概述了一年半的清查情况：全市被群众大字报点名批判的有1000人左右，各系统立案的有100多人，审查重点近40人。但怎样才算“516”，还吃不准，如果按照既有三反罪行，又有秘密组织及黑手操纵的标准衡量，上海还没有查到一个像样的“516”。他还提到，艾玲的案子也没有进展，查不下去。这时，张春桥突然板起面孔，气呼呼地说：“怎么能说一个没有？艾玲总算一个吧！朱锡琪也总算一个吧！”

他换了一支烟，可能火气太大，划了几次火柴，才把烟点着。王绍玺正等着继续挨批，徐景贤趁机插话说：“在领导面前，你们讲话怎么能这样随便！你们要好好领会春桥同志的讲话，回去认真分析总结工作！”

徐景贤讲话语气的严厉，为以前少见。徐景贤这样讲了以后，张春桥没有再为“516”问题发火，改听其他方面的汇报了。

在张春桥这次讲话之前，全市各系统对所立案审查的“516”嫌疑对象，都已经因为难以认定，希望早早结案，予以解脱。那次会议以后，案件又拖了下来。

1972年11月11日，中南海门诊部医生卞志强、张佐良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写报告说：

昨晚再次组织了有关的心脏科医生会诊，大家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动脉硬化的情况，特别是主动脉硬化引起主动脉瓣膜关闭不全的情况有所加重，导致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及心脏功能均较前为差，要及时严重注意。平时虽随时研究病情，调整治疗，但药物的力量毕竟有限，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

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考虑，并给以指示。

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并转报毛泽东。

11月12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批道：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毛泽东

1972,11,12

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11月7日就66届至70届的大学毕业生工资待遇等问题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说：

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教育革命中，有一个问题急待解决，就是如何处置六六届至七〇届的大专毕业生。六六届已经毕业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目前这些大学生全国有八十万左右，处理好他们的问题关系重大。

周培源信中提出了几点建议：

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老五届毕业生的待遇不能比六五年以前的毕业生降一级。大学生待遇改革应从新招的工农兵大学生算起。工资转正定级工作宜速完成，不要拖到参加工作七八年以后。

11月12日，毛泽东在周培源11月7日的信上批示：

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

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共同打报告给周恩来，请示即将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报告提出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这一报告是根据毛泽东1972年6月28日与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谈话精神写出来的。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曾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11月30日，周恩来在病中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的这份报告，写了批示：“拟同意，请送耿飚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翌日，12月1日，张春桥在外联部和外交部的这份报告上批道：“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然后在下面写道：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妥否，供参考。

春桥

1972年12月1日

12月2日，看了张春桥的批语，江青表示完全赞同。她在文件上批道：

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时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供总理参考，又及。

江青

1972年12月2日

12月3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在修改时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

批林到底批什么？是批“左”还是批右？12月5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

王若水的信发出的第二天，12月6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

当天，江青见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

12月6日，周恩来在江青所送批件上批示：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

王若水给毛泽东的信发出的第三天，他就听到一个觉得是不好的消息：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又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12月10日，周恩来和江青谈话。

12月15日、16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王若水12月5日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从王若水的来信谈起。他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

毛泽东接着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

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在文革初期被捕入狱，从此音讯全无。直到1972年6月8日，专案组才准予家属探视。探视时，刘建章趁看守不注意，小声告诉夫人刘淑清说：“我几次向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写申

诉材料,都被专案人员当场撕毁。”并说,在狱中解决不了他的问题,让刘淑清想办法将他的情况“向周总理和毛主席反映……”

1972年7月20日,刘淑清写了反映丈夫1968年2月至1972年6月关押在秦城监狱时遭受虐待的信,“怎么才能将情况反映给毛主席呢?”刘淑清思来想去,想到了自己在外交部工作的大女儿刘润芬,她和能经常接触到毛泽东的王海容、唐闻生是同事。刘淑清认定,她们是将自己的信转呈毛泽东的最好传递者。

王海容、唐闻生得知了刘建章在狱中备受虐待,以及刘淑清准备上书毛泽东的想法,义无反顾地表示坚决支持。她们让刘润芬转告刘淑清,请她以家属的身份,将狱中对老干部的待遇如实写下来,并且认为,“如果这封信毛主席批了,将可以解救一大批遭受迫害的老同志。”

刘淑清的“上书”不久即由王海容、唐闻生呈交给了毛泽东。

1972年12月18日,毛泽东看过刘淑清的来信后,很快便找王海容和唐闻生询问情况,她们便趁这个机会,将老干部们的状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对监狱中老干部的情况,刘淑清的信里有一段这样写道:“在探视过程中,我发现他(刘建章)体质很差,面黄肌瘦,胳膊不能高举,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我对他的身体状况非常担心,加之监狱生活条件如此之差,每天饮水也有定量(每日三杯),再渴时就只得喝冷水,每天‘放风’只有30分钟时间……”

毛泽东震怒了,当即提笔在刘淑清的信上作了如下重要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12月18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周恩来即批示公安部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震、交通部革命委员会主任杨杰、国务院办公室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

李震、杨杰、吴庆彤三同志: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况,或送复外,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要清查北京监

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作废；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去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事办好退回。

周恩来

1972年12月18日

曾在1965年1月提出“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补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八机部部长陈正人也被关了多年。在此之前，他也给毛泽东写信说：“记得您在井冈山曾亲口对我们说，要优待俘虏。可我们，现在的待遇比当年的俘虏却差远啦！”

12月17日晚，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负责干部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复信周恩来，提出：邓小平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阅后表示：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1972年，外交部上呈周恩来的报告称，外交部有20余名“516分子”，姚登山、原“联络站”核心组头王中琪等榜上有名。此外还有百余人被列为敌我矛盾，受到各种不同的处分。

外交部清查“516”的运动有乱咬、乱供的现象，也有逼、供、信，弄虚作假，以假乱真，真假难辨。有的嫌疑对象怕受煎熬，就乱咬、乱供；有的是有意为清查组专案人员设陷阱，胡诌瞎编。所以，打击面宽了。另外，文革初期挨造反派批的当权派，重新掌权后，自觉不自觉地对造反派伺机打击报复，彰显秋后算账的情绪。

总之，在外交部各个干校的专案组，在清查工作中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

同年，复查工作由军代表李耀文领导，纠正审查偏向。经复查，一些在干校的“516”嫌疑对象得到解放，重新安排工作。少数人的复查结案拖了好几年。极个别人例如姚登山，一直到1982年才最终结案，办理离休手续，恢复原级别待遇。

外交部清查“516反革命组织”的结果表明：

第一，“打倒陈毅”、“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砸政治部”等重大事件，是少数狂热分子煽动起来极左的、过火的行动。没有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火烧英代办处”、砸印度、印尼、缅甸等“三砸一烧”等重大涉外事件系无政府主义的乌合之众所为，并非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

第三，外交部的一些过激行动不是“516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狂热的姚登山、王中琪等人的极端行为。

第四，没有证据表明，“王关戚”是这些事件的幕后直接指使人。

1980年5月，外交部党委复查姚登山的案子时，党委内部有不同意见。刘振华副部长在党委会议上说，在外交部大家都说姚登山很坏，但也应该对他落实政策，是什么问题，作什么处理。他又说，姚登山有错误，有的很严重，但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问题，有其特殊的背景，应该实事求是地对他作个结论。人已坐了9年监狱，这个教训对他够深刻的了。

经充分讨论，按照当时的政策精神，外交部党委做出的结论是，姚登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犯有严重错误，他犯有反对周总理、坚持打倒陈毅等错误。对他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自1971年11月至1972年11月止。外交部宣布此处分时，姚登山的处分期早已过了，对他已无实际意义。

姚登山不承认反周总理，只承认犯有“不应扩散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讲话、支持造反派《联络站》封政治部、参与研究改组外交部领导班子”等错误。外交部将他的申诉与结论一并归档。

1980年8月姚登山出狱，恢复原来的行政10级待遇，过起普通人的正常生活。1985年办理离休手续。1998年在北京病逝，终年80岁。

第 1259 回： 杨易辰，批极右思想不通 议青岛，三司令致信林彪

12月19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约《人民日报》社鲁瑛、吴冷西、崔金耀、王若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小型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指示。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对王若水说：“主席收到你的信后，批给我们办。”“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周恩来接着说：“我8月1日讲极左思潮要批透，那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杂志11期也提过，但我们没把林彪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同志。”“《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是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无政府主义代表也不对，林彪也有他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批判的主要矛头。”

接着，江青说：“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是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分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对鲁瑛进行人身攻击。”

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

江青接着说：“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她提出：“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个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

张春桥说：“《人民日报》不是王若水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需要研究。”然后，他又自己回答说：“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要注意。”

姚文元说：“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他们讨论，为什么不讨论？”

周恩来对王若水说：“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

12月27日，纪登奎和汪东兴给周恩来回信，建议邓小平仍任副总理，适当分配工作。

此时，黑龙江省正在召开批林整风会议。他们在会上传达了周恩来贯彻毛泽东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指示。在此之前有一种倾向，老干部的发言，重点批林彪的极“左”，而一些年轻人的发言则认为，主要应该批林彪反对毛主席，投降、叛变。

在学习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时，造反派出身的省革委会常委范正美和原黑龙江省副省长、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杨易辰有过这样一次对话。他们安排在同一个小组。一次，杨易辰在会上当众问范正美：

“小范，林彪明明煽动极‘左’，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怎么是极右？我想不通。”

范正美说：“林彪的罪行是分裂，投降卖国，而不是文革中的极‘左’错误。这是认识林彪罪行的关键。所以主席说：林彪是极右，是从这个角度讲的。主席点的很明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

计,都是右的。批极‘左’,就要联系文革,这样就要产生分歧。对于文革中的打倒一切,要分析是怎么来的,有些与林彪有关,有些不是林彪的问题。主席早在67年南巡时就讲了。所以,批极‘左’,就丢了林彪投降卖国的实质,放了他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些极右的东西,同时容易引起分歧,使批林走偏方向。《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是假,形‘左’;背后下毒手是真,实右。”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还是想不通。”杨易辰说。

范正美没有再说什么,心想:“我和你的思想体系不同,所以看问题、想问题的立场、角度相左。你想的是文革初期挨整,当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文革不满,对自己前期镇压群众、对自己在文革前的错误不认账,必然把林彪的文革错误放在重点,而淡化林彪叛逃、卖国、谋杀毛主席之罪。尽管我受潘复生的打击迫害,但我是文革的积极分子、造反派头头,我想的是,林彪后来要谋杀毛主席、否定毛主席,投敌叛变,要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范正美感到:“现在差不多的老干部不但解放了,而且都官复原职。他们在一起,就非难文革,只讲自己挨批、不讲50天、不讲自己有错误。对文革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上,在他们眼里,文革什么都不对,只有恢复文革前的那一套,才心安理得。”这些,肯定是范正美他们造反派不能同意的,他想:“这也是毛主席不能同意的。”

在传达毛泽东纠正批林彪极“左”的指示,范正美由衷的感到:“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

他同时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显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审视世界的犀利目光;毛主席要求我们不要仅仅看到林彪极‘左’的表面,而要特别看到他投修卖国的实质。不能只批形‘左’不批实右。在毛主席看来,形‘左’原因复杂,如果只批形‘左’,就容易放走林彪实右的罪行;实右危险性最大,后果不堪设想。这些道理很浅显,主要在于自己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不是想不通,而是不愿意、不能够按照毛主席要求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观,去审视林彪问题的真正要害。”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批林彪其“左”还是右,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这实际上,是中国政坛上自建国以来两种力量的较量,进

而演化为以后的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

12月底,曾在绥化八一厂当过工人的范正美,担任绥化地区工作组组长,到绥化地区征粮。因为1972年,黑龙江省各地发生了大小不同的灾害,年成不好,粮食征购工作进展迟迟不力。于是,黑龙江省委向各个地区派出省委工作组。这是范正美重新工作后,新省委交给他的第一项工作。

接受这件工作后,范正美的一位同学对他说:“这是两面不讨好的工作。完不成任务,难向省委交差;完成任务,往往挫伤农民、引起农民不满。”

范正美带着工作组到达绥化地区后,先搞调查,天天坐着北京吉普车,跑村串屯,既看好的,也看差的,特别是受灾的村屯;既走访社队干部、察看场院,也走访农民家、了解农民的看法;既去地、县推荐的乡镇村野,也自己想到哪里就去哪里。有马上观花,还有下马观花,走马观花;拜访粮食部门有经验的专家和地、县有关干部。经工作组成员反复碰情况和磋商,和地委分头开会,最终取得了一致意见:原来所定任务十七亿六千万斤完成不了,只能完成十五亿斤,并且还需要下决心,做好工作;如果再拖下去,恐怕连这十五亿斤也难完成。

范正美明确告诉省里领导:绥化完成十五亿斤,是几个政策设定的情况下做出的估计。如:饲料地不给了;羊留饲料不给了;投肥粮减少了;农建粮减少了;有些地方口粮也节约了10至20斤;大牲畜也分开计算了,役畜留饲料少了;非役畜两个按一个算;种子每亩留10斤等。言外之意,这十五亿斤已经到头了,只能更少,不能更多了。

负责黑龙江省工作的沈阳军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刘光涛看完范正美的电话记录稿,表示同意他的观点和做法。

由于范正美开了第一腔,许多人开始渐渐说真话。随后,刘光涛又接到嫩江、松花江等地工作队上报的了大致相同的报告,促使他下决心调整了原来的计划和部署,妥善结束了有关催粮工作。

后来有人对范正美说:“谢谢你开了第一腔,帮了我们的忙。要不然,我们还得在农村呆下去。不能回家过春节。”

范正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么一个电话举动竟如此这般反应。

这使他感到十分吃惊。他第一次意识到,当官、搞政治不容易,在中国更不容易。讲真话、听真话两者都难。那一天,他回办公室找到了《韩非子》的《说难》,细细地品味起来: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明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不可不察也。

他掩卷思忖,想起当年“炮轰派”要求潘、汪晋见、反映情况,而横遭镇压,以及自己经历的桩桩往事,脑海掀起了狂澜,心跳一时无比激越:老百姓的生生死死,往往就在那些大官们的心绪好坏或手掌俯仰的一刹那之间。所谓明哲保身,就是熟谙世故、保官保命者吧。所谓说话要看对象,就是看人下菜碟、注意察颜观色者吧。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者吧。

他想到这里忽觉好笑。这些都是旧社会人们得出的处世哲学。今天如果用以作为行为准则,岂不是对人民、对社会不负责任?中国自古就有所谓“以天下为己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中国共产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实事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等说法。遇到民间问题,应该如实反映,说真话、讲实情、用不着遮遮掩掩,去违心地办事。至于大是大非,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生死攸关的大事,更应该挺身而出,不能见风使舵,两面三刀,这才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年轻领导干部应该有的情怀和操守。

1972年,青岛市委尚未成立,市核心小组内部思想不统一,加上社会秩序混乱,青岛干部和群众纷纷写信和上访,要求解决青岛问题。山东省委决定:由杨得志率工作组帮助青岛解决问题。

1972年10月16日,山东省委4名常委来到青岛,参加青岛市党的核心小组批林整风会议。

通过谈话、座谈,山东省委认为,青岛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内的分歧,主要是青岛驻军支左代表和地方干部各为一方。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公开点名批判原北海舰队政委兼市核心小组组长易耀彩。部队

支左代表主张,青岛的批林整风,必须公开点名批判易耀彩,以“分清路线是非”,“重新调整班子”;地方干部则认为,易耀彩已于年初离开了市核心小组,青岛的落后局面,主要责任在现任领导。

山东省委认为,易耀彩的问题主要是表现在军队内部。“913事件”后,经中央和军委批准,已对他进行了“离职审查”,没有发现重大问题,当时也没有做结论。因此省委认为,地方干部的意见是对的。经山东省委常委集体研究后,由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代表省委讲话,提出“四个区别”,即:对待易耀彩的问题,军内和军外要加以区别;与市核心小组的集体领导要加以区别;与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要加以区别;与广大支左人员的成绩要加以区别。并指出,对易耀彩的问题,在没有定性结论之前,只在内部讲,不公开点名批判。整风要坚持“三个为主”:领导问题同下面问题,以解决领导问题为主;当前问题与过去问题,以解决当前问题为主;政策原则问题与一般问题,以解决政策原则问题为主。到会绝大多数同意这些意见,可是也有俩人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袁升平的讲话是“和稀泥,不讲路线斗争”。

为了慎重起见,山东省委将青岛情况和省委解决问题的措施,发电请示中央,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九大”以来青岛形势估计问题;二是易耀彩的错误问题;三是逐步撤回军代表,由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发挥地方干部积极性的问题。并具体汇报了省委对青岛问题的“四个区别”、“三个为主”和青岛市核心小组中的两种不同意见。

11月1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给济南军区司令员、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得志来电话说:“省委给中央的电报,周总理批示请政治局研究答复。中央政治局研究后,先电话上打个招呼。拟同意省委的意见,准备给省委发复电,并请毛主席批发。”

四天后,11月17日早上,纪登奎又给山东省委来电话通知:“省委给中央关于青岛问题的电报,毛主席已经阅示,周总理到主席那里去了,要中央政治局帮助解决一下青岛问题。因此,中央决定,请省委杨得志、袁升平、白如冰、秦和珍4同志和青岛去4名同志到京解决问题。”

青岛去的4人是:驻军两名:马忠全、邓龙翔;地方干部两名:刘众

前、郑干。

当日上午 10 时 30 分,中央派的飞机降落青岛,下午 14 时 40 分,山东 8 人登上飞机,直飞北京。

他们到北京后,参加了“山东青岛汇报会议”。但内容很快发生了变化,不是汇报青岛情况,也不是“解决一下青岛问题”,而是揭发批判杨得志和袁升平,重点是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山东 7 人联名写的“表态信”的问题,表态支持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参会人员也由原定的 8 人扩大到 25 人,要求山东省地委以上、济南军区军以上单位均派人到京参加会议。姚文元说他是“中央委派解决山东问题的组长”。

“山东青岛汇报会议”开了 40 多天,围绕着庐山会议问题,杨得志和袁升平先后作了 3 次书面检讨。期间又发生了追查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司令员致信林彪一事。

原来,林彪出逃后,清查人员在林彪北京和北戴河的住处查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泽东、林彪的那 3 封信,就是第 1141 回提到的“三司令同时写信”的事情。

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封上写的是“汪东兴同志转呈毛主席亲启”。

3 封信中,有一封信附有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给周恩来的呈阅件,其他两封都只是信封带信件。

这 3 封信,因为有林彪 1970 年 8 月 28 日对秘书于运深明确指示:“此件压 10 天。”故未送出。

据当年参与清查林彪住处的当事人回忆:“这几封信都在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中。我们在清查中发现后,感到不好把握,就一起交给办公室主要的负责人、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他负责呈给上面。”

林彪专案办公室将从林彪住处查到这几封信送到王良恩处后,王良恩又上呈至周恩来。周恩来在专案办公室呈报的信件上批示:

此件是在传阅中被叶群扣压的。退。周恩来。

于是王良恩将信退回林彪专案办公室存档。

江青听到山东省反映在 1970 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山东省领导曾向中央写信,建议处理当时在庐山犯错误的人,马上嘱咐

查找。

信件很快摆在江青的案头，正是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3人的信。信件涉及到周恩来、王良恩、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等人。而王良恩则是由许世友推荐从军队调到中央的。

江青批到：“这几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态信！”将信转报毛泽东。

接着，江青又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要追查这几封信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代表与这3人谈话，弄清情况。于是，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三位大军区司令员和有关领导分批进京。

杨得志让秘书给福州军区韩先楚和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的秘书打了个电报，查问一下“表态信”上交的经过。结果这个情况被省委一位副书记报告了参加“山东青岛汇报会议”的江青。江青斥责他们“搞小动作”，组织了专场专题批斗。

会上，又有人提出：“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路过济南时，杨得志擅离岗位，借故不见毛主席”，“袁升平带着保卫部长携枪进入车站，企图谋害毛主席”。这无异于又一个重磅炸弹，袁升平赶紧分辩说：

“9月12日凌晨4时许，我突然接到负责三支两军工作的张铚秀副司令员来的电话，说车站军管会报告，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停在济南车站，请杨、袁首长去接受接见。当时杨得志同志正在曲阜开会，我火速赶到车站，张铚秀同志已到，汪东兴同志在站台上会见我们，我告诉他杨得志同志不在家的情况。他说，主席还没有起床，杨不在家，天又早，不惊动主席了，列车马上就开。我说，那好，你们离开济南后，我立即报告中央。就这样，我们进站不到5分钟，主席的专列就驶向北京了。我立即回到宿舍将这一情况和主席离开济南的时间，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当时军区保卫部长晋国强同志下部队去了，根本不在济南。第二天凌晨5时许，我又接到周总理的保密电话，说‘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人，带着老婆孩子，乘飞机跑了。’并指示我们：‘加强战备，稳住部队，做好工作。’总理虽然没有点名，我立即意识到是林彪叛逃了。我赶紧通知杨得志同志赶回济南，传达总理指示，共同研究落实了加强战备的措施，没有出任何问题。”

有些人仍不相信。

参会的汪东兴说：“主席原来是预定找杨、袁谈话的，是我事先没

有通知他们，想到济南再通知，结果杨不在家，没有谈成，不能怪他们。”

“山东青岛汇报会议”在讨论给中央的报告时，一些人坚持要点名批判杨得志和袁升平，并写上“山东省委执行了林彪路线”。山东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文欣不同意，他说：“我是坚决不同意点名的。你们说杨、袁错误严重，该坐班房就坐，该杀头就杀，我不同意说山东省委执行了林彪路线。”结果，刘文欣因此被山东省委在京五常委撤销了他的到会资格和党内外职务。还有两名参会人员拒绝在报告上签名，其中一人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送给负责“山东青岛汇报会议”的中央负责人姚文元。

1972年12月25日，许世友被叫到北京。中央找他谈话，了解他在庐山会议上和韩先楚、杨得志三个司令员给中央写信的事。追问他信中写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信件为什么落到林彪手中？为什么三大军区司令员写的信件内容一样？是不是事先串连，搞非组织活动？

信中“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许世友当然不能说是张春桥。可是坏人是谁呢？秘书提醒了一句，许世友想起来了，毛泽东与他谈话时，说到陈伯达是坏人。“对，我们信中指的坏人是陈伯达。”

事情能不能说清楚呢？许世友血压陡升，心绞痛也犯了，住进301医院南楼。

许世友躺在301医院高干病房，又叫秘书继续回忆：“我跟林彪的事没什么说不清楚的。我看林彪几次，和他照过一次相，要警卫员打野鸡、野兔送过他。”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也被叫到北京。当他在京西宾馆一住下，就有中央领导同他谈话说：“你们有责任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据了解，为写信碰过头的大军区领导还有好几个，中央对此事清楚，主要看你们的态度！”

韩先楚与许世友不同，他从延安到了山西，又随林彪到平型关。后来，林彪到东北，他也到东北，从东北一直到海南岛，他都是林彪的部下。

“我与林彪有什么黑关系？从打仗到部队建设，哪一条不是工作

关系？我同林彪照过一张相，林彪和多少人照过相？文化大革命要打倒我，是毛主席保的我！”韩先楚气呼呼地说。

关于信中所指“犯错误的人是谁？”韩先楚还真是有点搞不清楚。许世友听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而韩先楚不知道，他当时还以为是“鳝鱼眼”张春桥，此时他当然不能承认是张春桥了。

而且，许世友的表态信是四条，韩先楚的信讲的是三条，第一条就是拥护林彪讲话。

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就更说不清了。他从红军时期就在林彪麾下，是典型的“双一”干部，即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说杨得志给林彪写效忠信最符合逻辑。

1972年底，江青又给中办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表示：一定要彻查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3人的信是如何到林彪那里去的！

江青的信送到了中办秘书处文电组。信封上注有“办后退中央专案组”。

文电组的值班员将信送给了时任中办副主任，而且又是中央专案组办公室负责人的王良恩。他看了江青的批示心里一惊，迅速将信送给汪东兴。

12月31日，姚文元通知开全体会议，继续批判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文欣。下午15时，大家都到了会议室，等候中央领导到来。正在这时，周恩来意外地与中央其他领导一起来到京西宾馆，他宣布：“同志们在北京过个年，今天的大会不开了。”接着，批判刘文欣的一期大会简报也收回了。随后，周恩来主持接见了山东省委在京5名常委。他说：

“庐山的错误改了就好。林彪搞武装政变，没有你们的事。主席9月12日通过济南，袁升平同志给我打的电话，我亲自接的，他没有给林彪通风报信。”

他接着说：“今天晚上，请江青同志准备一点便饭，大家在一起团圆团圆。我因为有外事活动，现在见见面，晚上就不来了。”

当晚，江青同大家共进晚餐。第二天，又送了“新年祝词”：“祝杨得志同志和山东来京开会的全体同志新年好……”落款是：“江青 1973年元旦。”

许世友到北京7天，住了5天医院。经中央同意，1973年元旦，许世友回南京休养。

一回南京，许世友马上召集常委会会同江苏省和南京军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起回忆，写出检讨电报，由他签发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他说：

“庐山那封信是大家写的，我同意签发，有什么事我承担。没什么偏差，就是言词过激，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不应该。”许世友承认，“林彪当国防部长时，我去看过几回，带过几次野鸡野兔。”

此事没有了结，下场如何还不清楚。眼看着程世清、卜占亚、蓝亦农、王新等省级部队干部在林彪事件中下台，许世友心中窝火，经常喝闷酒。

第五部下卷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202 回；第 1220 回；第 1238 回；第 1242 回；第 1246 回；
军委办事组、中央军委：

第 1201 回；第 1202 回；第 1203 回；第 1204 回；第 1206 回；
第 1209 回；第 1210 回；第 1211 回；第 1216 回；第 1217 回；
第 1219 回；第 1220 回；第 1221 回；

清华大学：

第 1202 回；

空军：

第 1202 回；第 1203 回；第 1204 回；第 1205 回；第 1206 回；
第 1207 回；第 1208 回；第 1209 回；第 1210 回；第 1211 回；
第 1212 回；第 1213 回；第 1214 回；第 1215 回；第 1216 回；
第 1217 回；第 1221 回；第 1222 回；第 1223 回；第 1224 回；
第 1225 回；第 1251 回；第 1254 回；

外事口、陈毅：

第 1203 回；第 1218 回；第 1220 回；第 1221 回；第 1226 回；
第 1227 回；第 1228 回；第 1229 回；第 1230 回；第 1232 回；
第 1233 回；第 1234 回；第 1236 回；第 1237 回；第 1238 回；
第 1239 回；第 1240 回；第 1246 回；第 1247 回；第 1249 回；
第 1250 回；第 1251 回；第 1252 回；第 1253 回；第 1255 回；
第 1256 回；第 1258 回；

五七一工程纪要：

第 1206 回；第 1221 回；第 1224 回；第 1225 回；第 1230 回；

五一六：

第 1207 回；第 1223 回；第 1224 回；第 1225 回；第 1230 回；
第 1242 回；第 1246 回；第 1258 回；

中美关系：

第 1207 回；第 1220 回；第 1226 回；第 1227 回；第 1232 回；
第 1233 回；第 1236 回；第 1237 回；第 1238 回；第 1239 回；
第 1240 回；

海军：

第 1210 回；第 1211 回；第 1242 回；

总政：

第 1217 回；

专案组：

第 1221 回；第 1231 回；第 1249 回；第 1251 回；

贺龙：

第 1230 回；

王、关、戚：

第 1230 回；第 1246 回；第 1248 回；

杨、余、傅：

第 1230 回；第 1231 回；第 1242 回；

二月逆流：

第 1230 回；第 1232 回；第 1258 回；

邓小平：

第 1231 回；第 1249 回；第 1251 回；第 1258 回；

“走后门”：

第 1242 回；第 1246 回；

老干部：

第 1242 回；第 1246 回；第 1249 回；第 1255 回；第 1258 回；

文艺：

第 1246 回；

教育革命：

第 1246 回；第 1255 回；第 1258 回；

北京大学：

第 1246 回；

公安部：

第 1246 回；第 1254 回；

批“极左”：

第 1248 回；第 1249 回；第 1255 回；第 1258 回；第 1259 回；

文艺：

第 1248 回；

《红都女皇》：

第 1249 回；第 1250 回；第 1251 回；第 1252 回；第 1253 回；

第 1256 回；

刘少奇：

第 1251 回；

三支两军：

第 1248 回；第 1251 回；

上海：

第 1202 回；第 1203 回；第 1205 回；第 1207 回；第 1208 回；

第 1209 回；第 1213 回；第 1214 回；第 1215 回；第 1216 回；

第 1217 回；第 1221 回；第 1222 回；第 1223 回；第 1224 回；

第 1225 回；第 1233 回；第 1239 回；第 1246 回；第 1254 回；

第 1258 回；

天津：

第 1224 回；第 1248 回；

华北地区：

内蒙：

第 1245 回；

山西：

第 1245 回；

东北地区：

黑龙江：

第 1231 回；第 1259 回；

西北地区：

宁夏：

第 1241 回；

新疆：

第 1234 回；第 1242 回；第 1248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1201 回；第 1230 回；第 1241 回；第 1242 回；第 1249 回；

贵州：

第 1254 回；

中南地区：

河南：

第 1258 回；

湖北：

第 1203 回；第 1204 回；第 1216 回；第 1225 回；第 1230 回；
第 1231 回；

湖南：

第 1225 回；第 1242 回；第 1256 回；第 1257 回；

广东：

第 1201 回；第 1202 回；第 1203 回；第 1205 回；第 1209 回；
第 1213 回；第 1221 回；第 1225 回；第 1226 回；第 1242 回；
第 1251 回；第 1252 回；

广西：

第 1242 回；

华东地区：

山东：

第 1259 回；

安徽：

第 1242 回；

江苏：

第 1203 回；第 1213 回；第 1217 回；第 1221 回；第 1222 回；
第 1223 回；第 1224 回；第 1225 回；第 1259 回；

浙江：

第 1203 回；第 1205 回；第 1213 回；第 1214 回；第 1221 回；
第 1222 回；第 1223 回；第 1224 回；第 1233 回；第 1239 回；
第 1242 回；

江西：

第 1242 回；

福建：

第 1259 回；